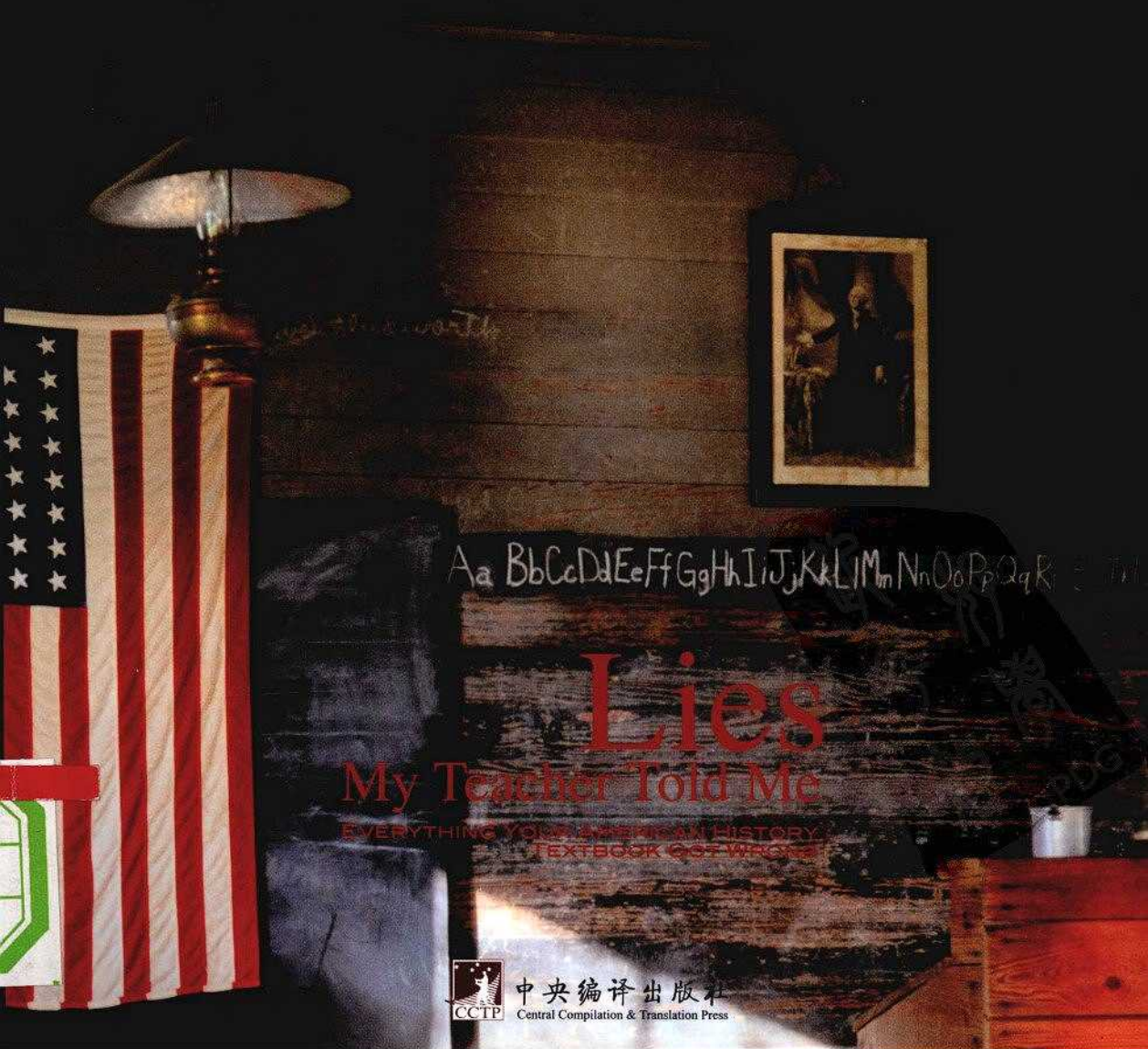


每个教历史的老师、学历史的学生，每个公民，都应该读这本书。
——霍华德·津恩（美国左翼历史学家、政治学者、社会评论家、剧作家）

老师的谎言

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美国〕詹姆斯·洛温（James W. Loewen）著
马万利 译 刘北成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历史是一系列尚待解答或尚待完善的问题，而不是一系列确定的答案。

- 阅读的盛宴，对美国教育的严肃批评。……更重要的，它还是对美国历史应该怎么讲、能够怎么讲的精彩再叙述。

——“美国图书奖”颁奖词

- (洛温的书) 包含了大量的历史；通览全书，它不只是一部批评的作品，而且还是一部重新讲述美国过去故事的“反教科书”。

——《国家》

- 洛温坚信，美国历史可以是很有趣的，为证明这一点，他在本书精彩而引人入胜的十三章中，讲述了一系列关于我们过去的令人惊叹的故事。

——《旧金山纪事报》

- 掷地有声的控诉，雄辩的行动号角。

——《科克斯书评》

- 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不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也不论是专业还是业余人士，都将在这里找到精神食粮。

——《出版家周刊》

- 《老师的谎言》揭示了美国历史教科书作者及出版商的多种罪过，读起来惊世骇俗。

——《丹佛邮报》

- 宝石般珍贵的杰作……它分析了主流中学教科书是如何讲（或不讲）美国历史的，并提出了批评。在我看来，洛温最独特的贡献在于，他解释了历史神话是如何通过我们国家里的历史教学被建构起来的。

——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网站

- 洛温为我带来了新的视野，也让我更加珍爱我们的国家。

——布赖恩·伍德兰德，一位八年级历史教师



定价：48.00元

老师的谎言

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美国〕詹姆斯·洛温 (James W. Loewen) 著
马万利 译 刘北成 校



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 (美) 洛温 (Loewen, J.W.) 著；马万利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书名原文:Lies My Teacher Told Me

ISBN 978-7-5117-0072-8

I. 老… II. ①洛… ②马… III. 历史课-教材-编制-研究-美国-现代 IV. G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7137 号

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

© 1995, 2007 by James W. Loewe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New Press, New York

老师的谎言

出版人：和 龔

责任编辑：张维军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话：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1(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址：www.cctpbook.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9

字数：420 千字

版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谨以此书献给
所有反教科书而教的美国历史教师
(他们的地位正在上升)

詹姆斯·洛温官方网站上对《老师的谎言》的部分评论^①

这是我一年中读到的最好的书,也是最有趣、最有益的书。

——彼得·纳普,维拉诺瓦大学社会学教授

阅读这些章节是一种极大的愉悦,它们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我被作者的热情与观点深深打动,这将是一本重要的书籍。

——罗伊·罗森茨威格,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教授

我觉得自己从没读过像《老师的谎言》这样好的稿件。

——乔希·布朗,“美国社会史”项目组

你的确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使历史鲜活起来的方法,并再次唤醒了我们的辩论意识和反叛意识。

——鲍勃·斯塔姆,《不加思考的欧洲中心论》(*Unthinking Eurocentrism*)的作者之一

真想告诉你我多么喜欢你的书籍,它让人大开眼界。

——理查德·扎克斯,《赤裸的历史》(*History Laid Bare*)作者

最近我晚上大多时候在读《老师的谎言》,它应该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指定阅读书目!太神奇了!!!

——伊薇特·罗塞尔,德克萨斯大学历史教育专业研究生

与我讨论这本书的大多数同学都发誓说,只要一有钱就去买它……我打算把这本书带回家给兄弟姐妹们看。我希望他们作为年轻人能更具批评意识,这样他们的教育就更有希望。

——雷纳·波曼,汉普顿大学学生

谢谢你写了这样一本书,它是我成年生活里读到的最具思想启发性的书籍之一。

——凯莱·科莫林,华盛顿州,贝尔维尔市

① 詹姆斯·洛温官方网站: <http://sundown.afro.illinois.edu/>

我向大家推荐詹姆斯·洛温的《老师的谎言》。它以轻快的笔调讲述美国历史教科书，以第一手资料、丰富而严谨的描述，揭示了教科书中的谎言与疏漏……在某些“真相”面前，即便历史爱好者也会感到震惊。

——《罗茨沃德》期刊网络版

对于《老师的谎言》，学生们反应强烈。似乎我在告诉他们一些秘密，那是他们被蒙蔽的“真相”。

——卡洛琳·阿姆斯特朗，高中历史教师、
《华盛顿邮报》网站“《老师的谎言》讨论组”发起人

把美国历史翻个底朝天，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于历史教师、历史著述者，而且对于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是一本必读书籍。

——见网页 independentreader.com “一流的独立书店推荐新书榜”

关于对美国历史的歪曲，本书给出了精细而令人惊奇的考察……不读此书，你不会知道真相！

——乔·莫纳德，亚马逊网站网上书店

每一位有责任心的老师、父母和公民都应该阅读此书，并努力改变他（她）所在的校区的历史教学。

——佩恩·舒瑞福勒留言，亚马逊网站

我感谢你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我希望会有很多人继续读你的书，我希望他们的好奇心被激起，开始对真理的探寻。

——卡罗尔·安德鲁斯，加利福尼亚州，拉米萨市

简单地说，你的《老师的谎言》从根本上涤荡了我的思想……在我的历史意识中闪现了一道新的光明。

——提姆·克斯，明尼苏达州，威诺娜州立大学历史专业学生

我是一名非裔美国男子，你写出了美国黑人的痛苦与情感，似乎你就是黑人一样，但你不是。你何以能够用如此诗意的语言去解释非裔美国人的困境？

——阿依兹，北密歇根大学历史专业大四学生

你以《老师的谎言》为我们做出了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你对种族主义、反种族主义的分

析特别及时、特别重要。你分析了教科书如何讲政府所做的事情,如何讲政府从不犯错,而那样会使学生缺乏思考能力;你的这些分析是一种有力的武器,有助于学生把自己从意识形态的训练中解放出来。

——斯蒂文·罗森塔尔,汉普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我在读詹姆斯·洛温写的精彩著作《老师的谎言》……我想起以前学校里教的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这让我感到震惊。

——大卫·伊奥·克莱尔,威斯康辛州

我喜欢它!太有启发性了。我把它指定为我的博士生历史与哲学课程的阅读书目。

——克特·道森,堪萨斯州立大学

通过《老师的谎言》这本书,你为每位历史课或社会课教师、历史学或社会学教授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卡拉·肯恩斯,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与社会学系

我禁不住给你留了一个便条,告诉你我多么喜欢你的书……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们。它真是不同凡响的读物……

——乔那·谢尔曼,孟菲斯大学历史系

我发现,让学生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是非常有益的。那就像欣赏好的艺术品,当你离开时,你会得到新颖的观点,你的立场或许会改变,你的视野会更加开阔。

——里奇·吉布森,韦恩州立大学教育系

我还没读完你的书,但是我发现自己已经迷上它了。它甚至影响到我的婚姻,因为我的妻子抱怨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读这本书上了。

——罗纳尔多·科比,巴西

《老师的谎言》不只是对历史的谬误及美国人的想象的纠正,它还提出了那些被误传的社会问题、被歪曲的思想,并鼓励学历史的学生们不仅思考现实,而且思考那些被粉饰的言论报道。本书是对读者的宝贵引导。

——亚马逊网站书评

《老师的谎言》让人视野开阔,这本让人爱不释手的书为读者提供了人性化、纯净的美国历史。我为自己知道那些谎言之下的真相而自豪,而洛温先生又让我察觉到自己的不

足，并反思自己对美国那些英雄和传说的基本信任。每一位重视自己的孩子以及祖国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Seanchai@ix.netcom.com 亚马逊网站发帖

身为两个正读小学孩子的父亲，读了你的书，我在与孩子们讨论历史问题时，开始采取全新的方式。这本书也是小学历史教师的必读之物。

——吉姆·佛特，亚马逊网站发帖

《老师的谎言》不止一次地让我热泪盈眶。

——玛丽·安·斯蒂芬，1998年2月电子邮件

《老师的谎言》内容丰富，包含了对美国历史的各种新颖的再叙述，反映了美国历史教育所应该涉及的内容：相互冲突的悬念、变化不定的戏剧性、智慧、激情、同情心以及与当前事务的关联……当你用这本书的视角看世界，过去和现在都将变得不同。

——安德里亚·利比索，中学社会研究课教师、大学社会研究方法教授。

如果你冒险走进这本书的深处，你就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教历史了……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在我的大学课堂里，这本书极大地影响了我的课程计划和进度。它对你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洛温不仅指出我们在用净化过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历史去烦扰学生，而且指出我们正在给他们带去极其不正确的美国历史图画，在那幅图画中，学生们看不到自己的位置。

——大卫·丹纳伯格，给《自由》杂志编辑的信

致谢

初版

以下人士(按姓氏字母排序),或曾与我交谈,或曾就某些章节进行评论,或提供资料建议,或纠正某些错误,或提供道义上或实质性的援助。我非常感谢他们:

Ken Ames, Charles Arnaude, Stephen Aron, James Baker, Jose Barreiro, Carol Berkin, Sanford Berman, Robert Bieder, Bill Bigelow, Michael Blakey, Linda Brew, Tim Brookes, Josh Brown, Lonnie Bunch, Vernon Burton, Claire Cuddy, Richard N. Current, Pete Daniel, Kevin Dann, Martha Day, Margo Del Vecchio, Susan Dixon, Ariel Dorfman, Mary Dyer, Shirley Engel, Bill Evans, John Fadden, Patrick Ferguson, Paul Finkelman, Frances FitzGerald, William Fitzhugh, John Franklin, Michael Frisch, Mel Gabler, James Gardiner, John Garraty, Elise Guyette, Mary E. Haas, Patrick Hagopian, William Haviland, Gordon Henderson, Mark Hilgendorf, Richard Hill, Mark Hirsch, Dean Hoge, Jo Hoge, Jeanne Houck, Frederick Hoxie, David Hutchinson, Carolyn Jackson, Clifton H. Johnson, Elizabeth Judge, Stuart Kaufman, David Kelley, Roger Kennedy, Paul Kleppner, J. Morgan Kousser, Gary Kulik, Jill Laramie, Ken Lawrence, Mary Lehman, Steve Lewin, Caret Livermore, Lucy Loewen, Nick Loewen, Barbara M. Loste, Mark Lytle, John Marciano, J. Dan Marshall, Juan Mauro, Edith Mayo, James McPherson, Dennis Meadows, Donella Meadows, Dennis Medina, Betty Meggars, Milton Meltzer, Deborah Menkart, Donna Morgenstern, Nanepashemet, Janet Noble, Roger Norland Jeff Nygaard, Jim O'Brien, Wardell Payne, Mark Pendergrast, Larry Pizer, Bernice Reagan, Ellen Reeves, Joe Reidy, Roy Rozensweig, Harry Rubenstein, Faith Davis Ruffins, John Salter, Saul Schneiderman, Barry Schwartz, John Anthony Scott, Louis Segal, Ruth Selig, Betty Sharpe, Brian Sherman, David Shiman, Beatrice Siegel, Barabara Clark Smith, Luther Spoehr, Jerold Starr, Mark Stoler, Bill Sturtevant, Lonny Taylor, Linda Tucker, Harri-

2 老师的谎言

et Tyson, Ivan von Sertima, Herman Viola, Virgil J. Vogel, Debbie Warner, Barbara Woods, Nancy Wright, and John Yewell.

三个机构为我提供了具体帮助：

史密森学会资助我两次高级博士后研究，那里的成员就像我以前在美国历史国家博物馆的那些研究伙伴一样，对我思想触动很大。史密森学会里的来自密歇根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基金会特别是来自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客座研究者们指出了我的一些随意性错误。

佛蒙特大学灵活地允许我告假去写作本书，包括 1993 年的学术假。

新出版社(The New Press)的安德烈·希夫林(André Schiffrin)，特别是本书的编辑戴安·沃奇特尔(Diane Wachtell)为我提供了始终如一的精神鼓励和思想批评。

第二版

当我在 2006—2007 年间因批评六本新版中学美国历史教科书而备受道义上与思想上的折磨时，下列帮助非常重要：Cindy King, David Luchs, Susan Luchs, Natalie Martin, Jyothi Natarajan, 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生命周期研究所(the Life Cycle Institute a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以及训练用导盲犬“乔伊”(Joey)。还要感谢在本书初版时帮助过我的那些人在这个第二版中的一如既往的帮助，包括新出版社里的很多人，以及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社的阿曼达·佩顿(Amanda Patten)。

第二版导言

我实在太喜欢你的《老师的谎言》了。我一直在用你的书从教室后排向我的老师发难。

——一位中学生^[1]

我只想告诉你,我并不认为《老师的谎言》过时了;我真的压根就没看见教科书有所改进!

——一位中学教师,舍伍德市,阿肯色州^[2]

我过去是喜爱一些自由的胡说,但我认为它好极了。

——一位工人,拜耳制药,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3]

如果你是《老师的谎言》的新读者,你可以直接翻到后面的第一页。这个导言告诉老朋友(以及老对手?),这个新版本为何问世,与初版又有何不同。这个新版本的问世,主要是因为读者们对初版的反应是如此积极;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再版导言似乎是在自我炫耀——这是跳过不读的第二个理由。然而,《老师的谎言》的确带领读者经历了一次对我们的历史的探索之旅,一些读者可能想知道旅伴们的反应。

从一开始,读者们就使《老师的谎言》获得了成功。“新出版社”(The New Press)是一家名符其实的初出茅庐的出版社,它没有广告预算;销售全凭好的口碑。本书最初在西海岸引起轰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海沃德分校有篇文章报导:“虽然一些人认为此书尚待争议,但阿拉米达县(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图书馆员却无法让它留在架上不被人问津。”一位中学生致信《旧金山观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的一位编辑:“在读到《美国人民的历史》(*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和《老师的谎言》之前,我的历史课成绩一直很差(D+)。但读到这两本书之后,我历史课的GPA^①达到3.8,并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如果你

(说明:本书所有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① GPA, Grade Point Average, “年级平均分”, 美国很多中学评定学生平均成绩的方法。

2 老师的谎言

真的想让学生对历史发生兴趣,那么,停止对他们说谎吧。”^[4]早期发表在《旧金山纪事报》的一篇书评称《老师的谎言》“极其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教育的真相。”1995年,我的这本书在湾区^①畅销书排行榜上保持了好几个星期。^[5]

独立书店——那种店主与员工自己读书,然后向顾客推荐的书店——将这种口碑传遍北美。1995年,多伦多市一位署名为“琼”的顾客在一块“一流的独立书店推荐的最好新书”的布告栏上写道:“(此书)颠覆了美国历史。”接着她又写道:“一本里程碑式的书籍,不论是对历史老师,对那些写历史教科书的人,还是对任何有思想的个人,这都是一本必读书。”^[6]《国家》(*The Nation*)是一份全国性杂志,它说《老师的谎言》“包含了大量的历史,通览全书,它不止起到批评的作用,而且还是一部重新讲述美国过去的故事的‘反教科书’。”不久,《老师的谎言》上了波士顿市、佛蒙特州的伯灵顿市以及其他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它还是“历史与优质平装书俱乐部”的畅销书。就平装本而言,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商已先后印刷了该书30多次。自亚马逊网站^②开办以来,《老师的谎言》在其图书(历史学类)销售榜上一直名列前茅。因此,到我说这话为止,《老师的谎言》是由健在的社会学家所著的最畅销的书籍。^[7]各种版本加到一起,包括“录音图书”(Recorded Books)出版商出版的在内,本书初版共销售大约100万册。

我写作《老师的谎言》,部分原因是,我相信美国人既对自己国家的过去感兴趣,又饱受他们的中学美国历史课程的折磨。读者的反应证明了我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他们的反应是广泛而深刻的。一位读者从旧金山地区写电子邮件给我说:“我发现,我中学的那些历史课对我或者我的生活并不重要,”因为它们“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无关。”一些成年读者一直抱怨自己失去了对中学历史的兴趣。一位犹他州的妇女写信说:“这么多年来(我今年49岁了),我一直认为我并不喜欢历史;其实,我不喜欢的是那种逻辑不清,或者说自相矛盾的东西。感谢你的著作。你改变了我的生活。”

很多读者发现,阅读本书是一次改变生活的体验。一位俄亥俄州的铲车工、一位丹佛市47岁的家庭主妇,以及一位纽约市远郊的“空想改良家”,读了此书后,都想完成大学学业,然后重新选择职业。一位纽约市的妇女说:“你的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无以言表”,“就像是用新的眼光看待一切,我把它叫做‘真理的眼睛’”。读者们反复用“令人震惊”、“晕倒”、“醒悟”这样的词形容本书,一些人甚至发现本书催人上进。

① 湾区, Bay Area, 即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

② 亚马逊网站, 现今全球最大的网络图书交易平台之一, 网址: <http://www.amazon.com>。

的确,并非所有的反应都是正面的。虽然会有读者“无法判断你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共和党人”,但其他读者会认为自己能判断得出来,并认定《老师的谎言》深受左翼偏见之害。亚马逊网站的一位网友评论说:“(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嬉皮士、社会主义者、反美分子、反基督教分子”——这个人如果知道我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感觉,一定会震惊不已的。有人从得克萨斯的埃尔帕索寄来一张匿名明信片说:“种族主义的垃圾。把你那些酸腐的思想带到非洲,到那里去矫正那种历史吧。”

当然,这都是白人(白色在英文里有反动之意——译者按)的反应——相当“白的”反应。“印第安国”的反应则大不相同。一位读者——我推测他是半印第安人——写道:

你的《老师的谎言》,特别是其中“红眼人”一章,对我如何看待世界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以前,我很少写信表达自己对所读到的东西的赞同。你对印第安人在美国的经历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你关于美国社会融合的观念,巧妙而有力地改变了我对于我的国家——事实上,是对我自己的祖先的理解。

如果就像我的《老师的谎言》所揭示的,在美国中学,历史是最不受人欢迎的课程,那么,在印第安人社区,历史课绝对是令人憎恨的。在那里,历史只是记录了五个世纪的失败。然而,在正确的理解下,美国历史不是关于土著居民虚弱无能的记录,而是关于他们顽强生存的记录。我曾在六个州向印第安人演讲,我逐渐理解了那些错误的历史对印第安人的贬低程度。今天,我相信,年轻的美国印第安人只有正确理解他们的过去——包括最近发生的事,才能找到在 21 世纪重塑历史所需的社会与知识力量。这种理解还必须吸收文化融合的观念——把两种不同文化的某些要素融到一起,以适应某些新的事物。融合是文化改变与生存的惯常方式。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懂得,土著美国人的文化要生存下去,也必须改变。土著人与非土著人都常常陷于这样一种误解:“真正的”印第安文化是那些只存在于白人到来之前的实践。实际上,真正的印第安文化层出不穷,创造者们就是像那勒尼克·特马拉(见第四章图 13)那样的雕塑家,像基斯·舍库拉(Keith Secola)那样的音乐家,以及遍布各地的美洲印第安族父母。

《老师的谎言》还在非裔美国人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比如,2004 年秋季,在《精华》(*Essence*)杂志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它名列第三,并且是唯一一部非黑人所写的书籍。汉普顿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写道:“我的学生都是非裔美国人,他

4 老师的谎言

们被你的书激动得热血沸腾。”一位密苏里的居民也写道,他发现《老师的谎言》以及《谎言遍布美国》“具有难以置信的力量”,他打算“把这两本书再各买一本,放到我在圣路易斯市区资助的那家理发店里。我想,如果有一两个孩子读到它,就会使下一代人不同凡响。”

工人阶级群体以及劳工史学家也喜爱《老师的谎言》。2004年,一位并不富裕的读者写道:“再次感谢你的学术研究与声援,它们有助于证明,故事里的另一方才最能反映90%的并不富裕的人的根本。”一些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研究项目以及关于妇女问题的研究项目也邀请我演讲,尽管《老师的谎言》——不像后来的《谎言遍布美国》——并不包含关于性别认同、性取向以及社会性别问题的直接论述。^[8]囚犯们也反应积极。比如,一位威斯康辛州的囚犯写道:“要写这样一本针锋相对的书籍,需要很大的勇气;为此,我向你表示祝贺!”并不夸张地说,“正规的”白人——甚至是男人——也都喜欢我的这本书,这或许是因为,对于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①,到罗伯特·弗鲁努瓦(Robert Flournoy),再到密西西比州法官奥马·史密斯(Orma Smith)等为我们的正义而战的白人们来说,我的这本书对他们予以了肯定,也显然会让他们满意。

如果《老师的谎言》初版即已影响巨大,特别是2007年卖得前所未有的好,平均每周销售近2000册,为什么还要出这个新版本呢?

早在2003年,一位热心读者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核桃溪市给我写信,告诉我重新出版的必要性。她在电子邮件里写道:“我想,很多人都认为,你的书描写的都是学校课本里曾经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当前的问题。”“我自己对我孩子的学校课本的体会是,你原来对很多问题的批评依然是对的。一个与时俱进的版本会使人很难用原来的出版日期来贬低你的书的正确性。”多年来,读者们提了很多问题,使我逐渐懂得,尽管我在第11章已经揭露了所谓自动进步的神话,但依然有许多人相信它,甚至认为它也适用于教科书出版业。我提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那些问题是如此烦人,以至于这些读者想要相信——也的确相信——那些教科书一定改进了。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假设这种进步。教科书改进与否是一个经验问题,只能用事实来说话。这也是个有趣的问题,特别是对我来说如此;因为它包含着另外一个问题:我的书是否起了作用?

因此,2006到2007年,我用了很长时间考察六本新出版的美国历史教科书。我的确发现它们在少数(或一些)方面有所改进,特别是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及随后发生的“哥伦布交换”(Columbian Exchange)的论述。我也发现它们

^①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474-1566),西班牙传教士,曾随哥伦布航行到美洲,著有《印地安史》,反对西班牙征服者对印地安人的残暴压迫。

在很多方面没有改变甚至变得更差——这是本书后面将要讨论的问题。可以有把握地说,《老师的谎言》对教科书出版商的影响并不大。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早在15年以前,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关于教科书的批评书籍《重写美国》(America Revised)也很畅销,但是对图书界也是影响不大。

然而,教师们确实接触到了《老师的谎言》,并且有所感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个教师一年要接触100名学生,下一年又是100名。我在写作《老师的谎言》时,教师是我心目中的核心读者群。教师们对本书态度如何呢?

令人悲哀的是,一些教师还没有看这本书就产生反感,仅从书名就得出结论说,我是又一个诋毁老师的人。这本书绝无诋毁老师之意。我以前任大学教授时,每学期里每周有九个小时与学生在一起;我对于“K-12”^①教师们怀有很高的敬意。他们在教室里有大量的事情要做:首当其冲的是,他们必须布置、批阅和评价作业,必须出卷、改卷,还必须写一周的教案,他们哪有时间去研究自己在美国历史课中都教了些什么?怎么能让他们在没有薪酬的暑假和周末做研究?而且,我还认识到,相当大的比例——我过去认为是25%到30%,但是这一数字在不断增长——的中学美国历史教师对这一课程都是认真的。他们不仅自己研究这门课程,还指导他们的学生做历史研究和对教科书提出批评。我过去在给老师们演讲时,常常一开始就对他们此前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劝他们不要为本书的标题所误导。^[9]而且,本书的标题与副标题“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之间,也显然有矛盾。然而,如果教师们只依靠他们手中的教科书,并试图让学生们“记住”它们,那么,一旦教科书如本书后面11章所分析的那么糟,教师们就是向学生错误地讲授我们历史的共谋。

在伊利诺斯州中部,有个教师提供了一个如何对待坏教科书的例子。2003年秋,在讲授共和国的早期历史时,她顺带告诉正在读六年级的学生们,林肯之前的总统都是奴隶主。她的学生被激怒了——不是因为总统,而是因为这位老师;学生们认为她在向他们说谎。学生们抗议道:“那不是真的,否则书中会写到的!”他们说自己的教科书中有大量关于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杰克逊及其他早期总统的介绍,但只字未提他们曾经拥有奴隶。她回答:“或许,是我错了”;她建议学生去考证一下她所说的事实。于是每个同学都选取了一位总统去调查。当学生们聚拢时,他们再次愤怒了——这次是因为教科书对他们掩盖了这些事实。学生们写信给出版商以及那些可能是教科书作者的人。作者们从不答复——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们将看到,很多作者从不谈论“自己的”教科书,特别是在

① “K-12”,指基础教育。其中“K”代表 Kindergarten(幼儿园),“12”代表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三年级的12年中小学教育。

6 老师的谎言

后来的修订版中。有些作者甚至已经过世。学生们的确得到了一份答复，它来自于一家出版商的发言人。回信称：“我们总是十分乐意地收到关于我们产品的反馈意见”——大意如此的官样文章。接下来它又称：“如果你愿意看看第 501-506 页，你会发现关于民权运动的重要论述。”学生们面面相觑：这与他们的投诉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学生来说，这种批评是一种“双赢”的行为。或者，学生们可能会为自己的下一代改进教科书；或者，学生们懂得了，教科书出版机构的核心知识部门里，其实空空阙如。不论哪种情况，在这一学年的剩余时间里，学生们将成为有批判眼光的读者。

这些六年级学生们的故事说明，我们低估学生是危险的。一些教师曾让四年级这样低年级的学生去检讨教科书，或让他们做一些原创性研究，结果发现，学生们比自己期望的要好得多。弗吉尼亚州最西南部的一位五年级教师写信告诉我，在年初，学生们说他们不喜欢历史，“但两个星期不到，大多数人、甚至所有的人都爱历史了。”这位教师让学生们接触：

第一手资料，如：报导被解放的黑人受私刑的报纸及真实照片。虽然这些小孩对于这项工作感到有些吃力，但是他们完成得很好。他们形成了疾恶如仇的态度，发誓要让它们不再发生。他们不再觉得那些把人“嘭——”炸飞的视频游戏很好玩。他们甚至开始检查历史书籍，阅读它们，避开教科书里那些被净化了的“香草乳”栏目，并开始找寻有五个红辣椒标志的历史叙述。他们喜欢那种“货真价实”的历史。但后来，他们又被催促回到教科书中！这就造成问题。他们是下一位教师的地狱！他们变成了中学里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看上去要成为好公民。

的确，好公民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好公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教育家们首先要求美国历史作为一门中学课程，应该是 1900 年前后狂热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然而，历史课的民族主义起源一直妨碍着它的基本使命：让学生长大后“像个美国人”做好自己的工作。

再者，什么是我们作为美国人该做的工作呢？的确，那就是“使美国的未来变成现实”。我们这个国家的特征应该如何界定？它应如何平衡公民自由与监视潜在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它该不该允许同性恋者结婚？当世界有限的石油供给开始对我们造成压力时，它的能源政策应该如何？要参与这些讨论并对这些辩论有所影响，好公民就需要能够对我们的领导人以及未来领导人所提的各种主张进

行评价。他们必须批判性地阅读,必须去伪存真,并且能够理解历史的前因后果。在任何称职的历史课中,这些本领的培育都应处于核心地位。

但美国历史教科书并没有培育这些本领,即便那些新版教科书也是如此,采用这些教科书的课程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教师们还要用这些教科书呢?答案在于:它们会让它们繁忙的工作变得轻松。以《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为例,它一开始就用22页的广告宣传这一好处。有一页吹嘘自己的“管理体系”。它对比了两幅照片:一幅照片上,教师费力地带着一本教科书、几本其他的书、一些头顶式投影仪,一包演讲卡片,以及各种各样的纸张;在另一幅照片上,一位教师嘴角带着微笑,背包里只带一张CD。“你所要带的仅是一张磁盘!”这个广告吹嘘,它里面有“可编辑的教案”,它的“课堂演示”栏目中还包含适合投影的演讲注脚,它还有“易于使用的试卷编辑器”。教师们不再需要自己制作教案,或者自己出卷;而如果你们在课堂上没话可说了,霍尔特版还为你提供了辅助性的电影资料。这些辅助资料甚至包括一套CNN的音频材料,它们比教科书更有价值的教育工具。问题是,所有这些辅助材料的目的,都是使教师采用霍尔特版的教科书。这样,由于这本教科书厚达1240页——太多的教师把每一页都指定为必读作业——学生们就不太可能有时间再做与这些附加材料有关的事情。

有时候,会有一些自上而下的帮助。一些学校的历史课因采用这种教科书而导致学生无精打采;对此,很多学校管理机构越来越感到不满。至少有两个学校管理机构要求社会课与历史课的教师阅读我的这本书,并要求将此列为校务委员会的一项政策。“在家自学者”们也在《老师的谎言》中找到共鸣。一位名叫大卫·斯坦顿的“在家自学者”教学资源目录编辑写道:“我从头读到尾(包括注释),爱不释手;读罢掩卷,又感到悲伤。”

学生们自己也会处理问题了。南达科他州芒特弗农^①的一位即将升入九年级的14岁学生就已经读过我的《老师的谎言》和《谎言遍布美国》了。她写道:“这些书都是精品!读了它们之后,我在学校里向不同教师推荐。所有的老师都感到震惊,并由此改变了他们的教学方法。”“约翰·詹宁斯”——一名中学生,他写信说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读过你的《老师的谎言》,它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历史真相,它既有正面,也有负面。”他还说,他“下学期要上美国历史课……我们将采用你所考察过的12本教科书中的一本,因此我迫不及待地在课堂上讨论你书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并以你的书为参考。”一位北卡罗莱纳州的父亲写信说:“我女儿在她11年级的美国历史提高班上将《老师的谎言》当做游击战指南,并且特别喜欢它;虽然老师并不总是感到满意。”我最得意的一封电子邮件来

① 芒特弗农(Mount Vernon),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故居所在地。

8 老师的谎言

自于一位小伙子,他通过 AOL.com 网站写信对我说:“亲爱的洛温先生,我实在太喜欢你的《老师的谎言》了。我一直在用你的书从教室后排向我的老师发难。”他还说,他的朋友们都喜欢它;“如果我能从出版商手中搞到团购价,那我会在我的中学走廊里卖这本书。”我帮他搞到了团购价,自那时起,不少老师——或许也包括他的老师——都告诉我,我的书一旦到了这些早熟的孩子手中,就把他们这些老师的生活搞惨了,直到老师手中也有了这本书,使他们跳出了教科书的雷池,情况才发生变化。看来,有时候,希望是自下而上出现的。

最让人高兴的事是“后续市场”的反应——这些成年人看好《老师的谎言》,因为他们感觉到了自己乏味的中学历史课里的某些疏忽之处。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本值得分享的书籍。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警卫写道:“我读了两遍,它在我的朋友圈子里被互相借阅,很多人不愿意还它,但我最终还是把它要回来了。现在,我又读了一遍。”一位在读研究生也写道:“每读完一章,我总是感到想要找个朋友评论一下我刚读到的内容。”一位蒙大拿州的教学助手写道:“我只要与哪位教师站在一起聊上五分钟,我就会向他提到这本书。”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教授写道:“这本书你可以买两本,一本自己阅读和收藏,另一本借人或送人。”一位加利福尼亚州谢尔曼橡林市的读者说:“这本书不只是有趣,它还能丰富生活。每到新年快来时,我就把它当礼物送出去好几本。”一些读者会很便宜地买到它。他们加入“优质平装书俱乐部”,以每本一美元的价格搞到四本,送给四位朋友,然后退出俱乐部,然后又重新加入,再搞四本。^[10]

我希望,你会觉得,这个新版本与初版一样有助于人们去质疑他们对自认为知道的那些美国历史。如果你同意,请与他人分享。出版商无疑希望你认识的每个人都买一本;但是对我而言,如果《老师的谎言》的读者数能够翻番,就是最开心的事了。读者们对我的作品做出回应也是让我开心的事,无论回应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11]你可以登陆我的网页: uvm.edu/~jloewen/, 或给我写电子邮件: jloewen@uvm.edu.

注释

[1] 一位学生,通过 AOL.com 发来的电子邮件,1996.

[2] Tomi Evans, 电子邮件, 10/2005.

[3] 通过 Erik Bailey, 电子邮件, 11/2005.

[4] Dudley Lewis, “Teaching the Truth,” *San Francisco Examiner & Chronicle*, 11/26/1995. Lewis 是第一位将霍华德·津恩 (Howard Zinn) 的《美国人民的历史》与

《老师的谎言》相提并论的人。但他绝不是最后一个。我们的教科书差异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政策不同,但我们对那些仍然主导着美国中学历史的自鸣得意但令人乏味的教科书做同样的评论。

[5] Mary Mackey, "Don't Know Much About Histor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12/1995.

[6] "Joan", at independentreader.com (1995); 这个网页后来几易其手。

[7] 也有人写了更好的书,但是他们都过世了!

[8] 有几位读者给我加派了写妇女问题的任务,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几乎没写什么。的确,就像我在结束语里写到的,我应为忽略了这一问题而负责;为解释这一点,我指出,已经有人在做这项工作了。那一章有个尾注("结束语"原注6——译者按)为读者介绍了六本书籍,它们都从不同角度批评了历史教科书对妇女问题的论述。别人已经做得这么好的事情,我没必要再去做了。然而,我应该承认,我还应当去见一下某位因我的建议读过这种批评书籍的人,因此,或许我应该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9] 在波士顿的一个讨论会上,Herbert Kohl and Howard Zinn 也在座;Zinn 劝我:"或许,你应该把你的书起名为'70%的老师所说的谎言'。"

[10] 在你退出之前,请至少从俱乐部买一本!

[11] 只不过,请注意礼貌。

导言

有些事情大错特错

1

不知道这么多的事情,要比知道这么多不真实的事情好。

——乔希·比林斯^[1]^①

美国历史比任何人曾讲述过的都更长、更大、更丰富多样、更美丽,也更可怕。

——詹姆斯·鲍德温^[2]^②

隐藏历史真相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彼得罗·G. 格里戈连科将军,致一家历史刊物的信,约1975年,
苏联,地下出版物^[3]^③

那些不记得过去的人应该被打回11年级。

——詹姆斯·洛温

中学生讨厌历史课。当让他们列出自己最喜爱的科目时,历史课总是排名最后。学生们认为,在中学通常所开设的21门课程中,历史是“最无关紧要的”。“烦——人——”,这是他们赋予这门课的形容词。学生们能避开就避开它,即便大多数学生历史课的得分要比数学、科学或者英语的得分高。^[4]甚至在他们被迫去上历史课时,他们排斥自己所学的内容。因此,每年都有人谴责我们的17岁学生什么都不知道,另外的两项研究也谴责这一点。^[5]

连富人家庭的白人男生也认为中学所教的历史“过于干净和粉饰”。^[6]在非

① 乔希·比林斯(Josh Billings),美国当代作家,以幽默风格见长。

②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美国流亡作家,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之一。

③ 彼得罗·G.格里戈连科(Petro G. Grigorenko,1907-1987)苏联军队高级将领,晚年成为不同政见者。

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以及拉丁美洲裔学生眼中,历史课特别令人讨厌。他们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糟糕。有色人种的学生在数学方面只比白人学生略差一点。请原谅我的语法不好,但非白人学生的英语更糟,而历史最糟。^[7]这里有件奇怪的事²情:其实,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历史并不比三角函数或者福克纳^①难学。学生们并不知道自己被离间了,只知道自己“不喜欢社会课”,或者“不怎么擅长历史”。在高校,大多数有色人种的学生对历史系敬而远之。

很多历史教师都发觉自己的课堂上学生情绪低落。对此,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家务负担较少、有足够的教学资源,以及有一位灵活的校长,一些教师会放弃那些被填充了太多内容的教科书,并重新设计自己的美国历史课程。太多的教师日益气馁,随波逐流。至少,这些教师知道,他们的学生并不认可自己对历史的热爱。这时,他们从这门课中撤回了自己的热情。渐渐地,他们摆摆样子,领着学生读课本,只讲那些可能要考的内容。

当自己的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就对本学科有了重要的了解时,高校里的大多数数学科的教师都感到很高兴,但历史学科除外。高校的历史学教授通常贬低中学历史课程。我的一位同事将自己对美国历史的概述称为“破坏偶像一、破坏偶像二”,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破除他的学生在中学学到的东西,以便为更准确的信息腾出空间。在其他学科,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比如,数学教授们知道,非欧几何在中学是很少教的,但是他们不会因此推断,欧氏几何被误教了。英语文学教授也不会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学阶段被误解了。实际上,历史是唯一一门让学生学得越多就越愚蠢的学科。

或许,我不需要说服你相信美国历史是重要的。相比其他课程,它更关乎“我们”。不论你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好是坏,或好坏兼有,历史都会向你展示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理解过去是一种理解自身、理解周围世界的关键能力。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历史。用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的话说,我们知道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8]

在学校之外,美国人反而对历史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历史小说——不论是艾尔·威达尔的(他写了林肯、伯尔^②,等),或者德纳·富勒·罗斯的(他写了爱达荷州、犹他州、内布拉斯加州、俄勒冈州、密苏里州,等等等等!)——通常都很畅销。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史密森学会所创办的三大展览机构之一。《内战》系列的电视连续剧吸引了新的观众。从《一个国家的诞生》、《飘》、《与狼共舞》、《肯尼

① 福克纳,在此指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

② 在此指亚伦·伯尔(Aaron Burr,1756-1836),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的副总统(1801-1805年)。曾在一次决斗中使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受到致命创伤。

迪》，到《拯救大兵瑞恩》，基于历史事件与主题的电影一直是令人着迷的素材。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传统的美国历史课程让学生感到厌烦。

现实情况是：美国历史充满着迷人而又重要的故事，这些故事有力量使人们着迷，甚至使最难对付的七年级学生着迷。这些故事告诉人们美国曾是什么样的，以及它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何关系。美国人，甚至是年轻的美国人，都需要，也想要知道自己国家的过去。然而，在讲这些过去事情的课堂上，学生们呼呼大睡。

问题出在哪儿？

在开始解开这一谜团时，我们要注意到，在美国历史课程中，教科书的支配性要比任何其他学科都强。当我第一次在一些教育研究方面的文献中了解到这一点时，我不禁哑然。我还揣测过其他学科的情况，比如平面几何。毕竟，对于学生来说，就平面几何的问题去请教他们社区中年龄大的人，或者查阅图书馆藏书或旧报纸，或者浏览国会图书馆网站里的数千种照片和文件，要困难得多。所有的这些资源——以及更多的资源——都涉及美国历史。但是，正是在历史课教室而非几何课教室里，学生们花更多的时间阅读教科书，回答每一章末尾的 55 个乏味的问题，再把这些答案大声读出来，如此等等。^[9]

在两张光洁的封皮之间，美国历史教科书充满了大量的信息——过多的信息。这些教科书都很厚重。我一开始收集到的十几本最普及的教科书平均重达四磅半，厚达 888 页。令我惊讶的是，在过去 12 年间，它们越来越大。2006 年，我考察了六本新书。（由于出版界的整合，今天不再有 12 本了。）其中三本是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出版了的“遗产型教科书”的翻新；另外三本是“全新”的书籍。^[10]这六本新教科书平均厚达 1150 页，几乎有六磅重！我从没想到它们会变得更大。我以为——我希望？——丰富的网络资源会明显地使这些庞然大物遭到遗弃。早期的教科书问世时，还没有网络。那时，历史教科书很厚重还情有可原，比如说密西西比州博格契托地区或威斯康星州比弗丹地区的学生，除了他们的课本之外，没有什么美国历史方面的资源。现在情况不同了：今天，每所学校都有一根连着网络的电话线，学生们可以在网上浏览成百上千种一手材料，包括报纸文章、人口普查、历史照片、原始文件，以及学者、公民、其他学生乃至捣蛋鬼、谎言家们的二手的解释性文献。今天，不再需要向学生提供一书籍两张封皮之间需耗时达 9 个月去阅读的材料了——何况它们是由同一批作者写作或汇集而成的。

这些新教科书如此厚重，以至于可能危害读者的健康。《美利坚之旅》(The American Journey)共有 1104 页，每个页面都比我一开始所考察的那 12 本已经很厚重的中学教科书的页面还要宽大。该书重达 5.6 磅，是美国教育史上中学生指定用书中最重的一本。（价格超过 84 美元，或许也是最贵的。）“美国背包安全”

是一家新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由一些脊柱按摩医师及其他职业健康护理师发起，其宗旨是“减轻教科书与背包的重量”。为解决这类问题，按摩师们走访学校，教给人们正确的身体姿势和携物技巧。^[11]

出版商也意识到了这些书籍看上去大得可怕，因此他们试图用创造性的页面处理方式掩饰它们的庞大页数。比如，《美利坚之旅》有 1104 页，但是，出版商对一开始的 32 页以及最后的 72 页重编页码，这样就使整个页码控制在 1000 页以下。学生们也不是好糊弄的。他们知道，这本书是他们拖回家的最重的书，是他们放在大腿上的最大的书，也是最难让他们感到兴奋的书。

编辑们也知道，对于那些必须读这些书的可怜孩子来说，它们看上去是多么令人生畏；因此，他们编辑了蛊惑人心的导言，并一开始就附上内容目录。以《美国人》为例，这本由麦克杜格·李特尔公司出版的教科书厚达 1358 页，重将近七磅，“内容目录”长达 22 页。该书配有大量插图，还有带有浅色标识的标题，如“地理聚焦”、“每日生活”、“历史聚焦”。接下来又设计了三页篇幅的“历史话题”和“地理话题”。接下来，又提示学生如何阅读那些长达 30 到 49 页的综合性的、杂乱的章节。它说：“每章都有两页的开场白，阅读这些开场白有助于你的进一步阅读。”

“噢，不，”学生们叹道，“从这里学不到什么好东西。”他们知道，对于《哈利·波特》或其他可读性强的书籍，不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准备阅读。但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幸的是，一位尽责的教师在使用这本厚重的书籍时，反而会花更多的时间⁵来保证学生们去读它，去做完那些要用几百分钟才能完成的问题与目标。这使得历史课愈加乏味。出版商于是添加各种专门的辅助材料，以吸引学生的眼球并最终使教科书变得更加有趣。很多材料完全是无用的——只对市场部有用。看看《美国人》“内容目录”中的那些浅色标识吧，没有哪位学生会需要这本书里的那一串“地理聚焦”。其中有个“聚焦”恰巧是“巴拿马运河”，但是学生在寻找这方面的信息时，会在书后的索引里去查这个词条，而不会先推测它可能是一个“地理聚焦”，回到前面那个 22 页的“内容列表”中找，看看里面有没有出现关于“巴拿马运河”的内容。这些浅色标识唯一可能的用途，只在于销售代表们在说服学校片区接受自己的教科书时所用。

这些书籍如此厚重，是因为出版商担心课本遗漏了涉及某个地区或人群的细节而不被采用。教科书作者似乎是被迫写一些关于美国历史上的每位总统的段落，甚至是关于威廉·亨利·哈里森或者米勒德·菲尔莫尔的段落。这样，在每一章的最后，都有多页的复习内容。再拿《美国人》为例，它提出了 840 个“正文里的主要观念”。此外，书中还包括 310 个“技巧训练”、890 个“术语与人名”、466 个

“批判思考”问题,并且在每章内都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这还没有算上每章之后两页复习中的数百个术语与问题,这类术语与问题全书共计数百个。到了年底,没有哪个学生还记得 840 个主要观念,更不用说 890 个术语以及无数个其他似是而非的叙述。这样,学生与老师都退回到一个“主要观念”:记得每章要考的术语,通过测验后就忘掉它们,以腾出大脑记下一章的内容。难怪有这么多的中学毕业生不能记住内战是哪年爆发的了。^[12]

学生们是对的:教科书太乏味了。^[13]历史教科书所讲的故事都是预言性的:每个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或一定会得到解决。教科书排除了冲突,排除了真正的悬念。它们剔除了任何可能给我们国家的国格抹黑的内容。当它们追求戏剧效果时,也只能采用情节剧,因为读者都知道,结局总是大圆满。用一本教科书的话说,“尽管遭到挫折,美国战胜了这些挑战。”大多数教科书作者甚至连情节剧也不愿尝试;他们写作的腔调如果能听得见的话,可以用“嘟嘟囔囔”来形容。难怪学生们不感兴趣。

教科书作者从来不用现在反观过去。他们本可以让学生思考当代社会的性别角色问题,并以此为手段,促使学生去思考:在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或更近的妇女运动中,妇女赢得了什么,没有赢得什么。他们也可以让学生为一个看门人和一个股票经纪人的家庭准备一份家庭预算,并以此为手段,促使学生思考过去与现在的工会与社会阶级。他们可以这么做,但是他们没做。历史教科书编写者不把当下的情况作为信息资源。

反过来看,教科书也很少用过去观照现在。他们把过去描绘成头脑简单的道德剧。“做一个好公民”是教科书从过去提取的信息。“你有一份值得骄傲的遗产。做你能做的!毕竟,看看,美国取得了多少成就!”乐观主义没什么错。但对于有色人种的学生、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对于那些认为历史人物很少是女性的女孩,以及那些没有取得社会和经济成功的人群来说,乐观主义可能是一种负担。乐观主义的写作手法妨碍了人们对失败者的理解,造成对受害者的一味指责。难怪有色人种的孩子们感到隔膜。在写了一千多页之后,苍白的乐观主义让每个人都倒胃口。

在美国历史课中,教科书与其他教学材料形成强烈的反差。为什么历史教科书如此糟糕?民族主义是祸根之一。教科书常常纠缠于互相冲突的要求之间:既要促进思考,又要灌输盲目的爱国主义。“看一看你的历史书,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如此自豪”;类似的话就像赞歌,常常被中学合唱团唱响。但是,我们只需走马观花。^[14]书名本身就讲述了故事:《伟大的共和国》、《美利坚盛典》、《希望之地》、《美利坚民族的胜利》。^[15]这类书名不同于学生们在中学或高校读到的其他教科

书的书名。比如,化学书的书名是:“化学”或“化学原理”,而不会是“分子的胜利”。你从教科书的封面就可以识别那是什么教科书;那些封面很优美,印有美国国旗、秃鹰以及华盛顿像。

学生记不住任何史实,因为它们都只是该死的一个接一个的事实。教科书作者想要写进大多数的树木以及太多的枝条,但是忽略了让读者看一眼就可能记住的东西——森林。教科书排斥因果关系,因此缺乏意义。学生们合上教科书时,7 全面思考社会生活的能力没有得到提升。

即使教科书突出细节,即使是因为课时紧张而难以涉及1960年的内容,问题是,我们的教师和教科书仍然忽略了我们对于美国历史所应该知道的大多数知识。尽管他们强调事实,他们所呈现的某些“事实”是明显错误,或者难以证实的。错误常常得不到纠正,部分原因是,历史学教授们不屑于评论中学教科书。总之,忽略和歪曲的惊人错误败坏了美国历史书籍。历史可被想象成一座金字塔。底部是数百万的一手材料——标有过去时间的各种种植园档案、城市名录、人口普查数据、演讲、歌曲、照片、报纸文章、日记、信件。基于这些一手材料,历史学家写作二手著作——这些著作与文章涉及极其广泛的话题:从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岛聋人家族到格兰特在维克斯堡的战术。历史学家每年写出数百部这类作品,其中很多是非常好的。这样,在理论上讲,会有少数历史学家——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团队的——综合这些二手文献写成三手著作,即,涵括美国历史各个阶段的教科书。

然而,在实践中,事情并非如此。相反,历史教科书都是在互相“克隆”。当编辑们在聘请新的作者时,第一件事就是送给他们几本竞争对手出的书。通常,写作教科书的人不是出现在封面的名人,而是出版商办公室里的俯首听命的写作团队。历史学家如果写教科书,可能会遭到同行的耻笑——还带有一丝嫉妒,但是耻笑是注定的——“为什么你把时间倾注在课堂教育而非原创性研究上?”

这一结果对教科书的学术性影响是不乐观的。很多历史教科书在其参考书目中列出了最新的二手资料,但其叙述仍然是传统的——对近期研究无动于衷。^[6]

如果学生们从未读过诗歌,却要上诗歌课程,对此我们该怎么看呢?在英语文学教科书中与历史教科书里都能听到编辑的声音,但是,在英语教科书中,至少当它呈现一些原创性文学作品时,那种声音会减弱。在历史教科书中,那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声音将学生与原始材料隔离。历史教科书作者们很少引用演讲、歌曲、日记或信件。学生们其实不必躲避这些材料。他们读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金十字架”演讲的某段话,与读《美国的经历》中关于这一演讲的那两段文字,效果是一样的。

教科书还使学生对历史学的性质茫然无知。历史学本是用证据和理性展开的激烈争论。教科书却鼓励学生相信,历史就是一些要记住的事实。“我们没有回避有争议的问题,”一套教科书的作者们声称,“相反,我们试图(对那些问题)提供理由充足的判断。”——以此消除那些争议!由于教科书采用的是这样一种庄严的语调,大多数学生从不会想到要去怀疑它们。我的一个学生1991年写信给我说:“回想过去,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没想过要提问,比如说,谁曾经是美洲的最早居民?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哥伦布到来后,他们的生活有何改变?”她接着说:“然而,那时,一切都展现得像一幅完整的画面,因此我从没想过它不是那样的。”

所有这一切产生的结果就是,大多数中学高年级学生没有能力对我们社会上的各种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分析。(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每年遇到将在下一年成为大学生的高中生。)我们没有什么改进。六分之五的美国人除了在中学阶段外没有上过美国历史课。我们的公民在中学阶段“学到”的东西构成了他们关于我们历史的大部分知识。

本书有11章都是关于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令人震惊的故事——有些很精彩,有些很可怕——其中有一章是新加的,讲的是我们的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仍在持续的“反恐战争”。这些章节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排,不仅叙述了更多的细节,而且还介绍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与进程。然而,大多数教科书都不提或者歪曲这些事件与进程。我了解这一点,是因为20年来,我追踪了18本教科书,我把它们当作史学与意识形态的著作来认真对待,我研究它们说了些什么,又没说什么,并试图找出其中的原因。我选择这18本教科书,认为它们代表了美国历史课所能用到的各种教科书。^[17]我在附录里列出了这些教科书的详细清单,它们就像一扇窗口,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学生带回家的、阅读的、记住的、忘记的东西。另外,我还花了很多时间观摩过密西西比州、佛蒙特州、华盛顿特区以及大都市区的中学历史课教学,花了更多的时间与中学历史老师交谈。

第12章分析教科书的创作与采用过程,试图解释是什么导致了教科书像现在这样糟糕。这里我必须坦承,我曾与他人合著过一本教科书:《密西西比:冲突与变革》,它是美国第一本经修订的州用教科书。虽然此书1975年曾赢得“莉莲·史密斯‘最佳南部非虚构类’图书奖”,但密西西比州拒绝在公立学校采用它。结果,三家地方学校机构、我的合著者以及我本人一起对州教科书委员会提出申诉,是为“洛温诉特尼浦西德(Turnipseed)案”。1980年4月,以《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为依据,该案取得了彻底胜利。这段经历让我比大多数作者或出版商更深切地体会到了教科书的采用流程。从中我还知道了,不能把一切罪过都归咎于教科书采用委员会。

第13章考察了使用标准美国教科书所造成的后果。它证明,那些教科书的确使学生变得愚蠢。最后,在结束语里,我列出了前面章节没有讨论的一些被歪曲与忽略的历史,并向教师们和学生们推荐了一些如何更加诚实地教历史、学历史的方法。这是一种类似于接种疫苗的做法,有利于防范我们将来一定会遇到的各种谎言。

作为一位社会学研究者,我时刻不忘历史的力量。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赤条条地来到人世上,但我们都不是全新的造物。我们都有自己的社会位置,不仅生在特定的家庭,而且还带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属于特定的团体,当然,还属于特定的民族与文化。社会学家懂得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力量,懂得它不仅可以塑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轨迹,而且还决定我们对这一轨迹与这个世界的理解。然而,我们常常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去让学生明白他们所继承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对自身生活的影响。很多美国人理解自己的过去,因而不能有效地思考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如果,通过对此书的阅读之旅,你能看清我们过去的那些事实;那么,美国历史这一“无关紧要的”课程与你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密切。至少,我希望如此。

注释

[1] Biuings. whose real name was Henry Wheeler Shaw, coined this phrase probably between 1850 and 1885.

[2] James Baldwin, “A Talk to Teachers,” *Saturday Review*, 12/21/1963, 收录于 Rick Simonson and Scott Walker, eds., *Multi-cultural Literacy* (St. Paul, MN: Graywolf Press, 1988), 11.

[3] Gen. Petro G. Grigorenko, 引自 Robert Slusser, “History and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 载 Rudolf L. Tökés, ed., *Dissent in the USS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329-53.

[4] 我使用“历史”这个词时,还包括社会课;大多数研究者与学生也是如此。在二者之间出现重要差异时,我会特别说明。Robert Reinhold, Harris poll, *New York Times*, 7/3/1971, 引自 Herbert Aptheker, *The Unfolding Dram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8), 146; Terry Borton, *The Weekly Reader National Survey on Education* (Middletown, CT: Field Publications, 1985), 14, 16; Mark Schug, Robert Todd, and R. Beery, “Why Kids Don’t Like Social Studies,” *Social Education* 48 (May 1984): 382 - 87; Albert Shanker, “The ‘Efficient’ Diploma Mill,” 开辟了专栏: New York

Times, 2/14/1988; Joan M. Shaughnessy and Thomas M. Haladyna, "Research on Student Attitudes Toward Social Studies," *Social Education* 49 (November 1985): 692-95. 全国平均成绩分析, 1992 ACT Assessment Results, Summary Report, Mississippi (Iowa City: ACT, 1993), 7.

[5] Diane Ravitch and Chester E. Finn Jr., *What Do Our 17-Year-Olds Know?*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Geography: An International Gallup Surve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988). 自初版《老师的谎言》问世以来, 这类研究不断涌现, 比如: Elizabeth McPike, *Education for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Albert Shanker Institute, 2000);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 发起, the Associated Press 总结的一项针对 55 所好的学院与大学的 556 名学生的研究——“Students Ignorant of History,” *USA Today*, 6/29/2000; the 2001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in History, Diane Ravitch, “Should We Be Alarmed by the Results of the Latest U.S. History Test? (Yes),” History News Network, hnn.us/articles/1526.html, 10/19/2003; Sheldon M. Stern, *Effective State Standards for U.S. History* (Washington, D.C.: Thomas B. Fordham Institute, 2003); and Joe Williams, “Duh! 81% of kids fail test,” *New York Daily News*, nydailynews.com/front/story/308139p263646c.html, 5/10/2005. McPike 指出学生们对历史知之甚少, 此外, 他还说学生们民族主义不够强烈, 他们被教了关于我们的过去的太多的坏的东西。我不同意。

[6] James Green, “Everyone His / Her Own Historian?” *Radical Historians Newsletter* 80 (5/99): 3, 书评及引用见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7] Richard L. Sawyer, “College Student Profiles: Norms for the ACT Assessment, 1980 - 81” (Iowa City: ACT, 1980). Sawyer 发现, 在社会课中, 种族与收入造成的成绩差异要比英语、数学以及自然科学课程中大。

[8] 几年前, Mills 就觉察出美国人觉得需要把自己置于社会结构中去考察, 以便理解形成我们这个社会以及自身的各种力量。见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3-20.

[9] Paul Goldstein, *Changing the American Schoolbook* (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78). Goldstein 说, 在 75% 以上的课堂时间里, 教科书都是基本的教学组织手段。在历史课中, 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10] 一本“全新”的书籍 *We Americans*, 其实也有其“老祖宗”, 只不过换了作者, 并在 1990 年左右做了大幅修订。

[11] ——, “Ask an Alum,” *Vermont Quarterly* (Fall 2005): 53.

[12] Ravitch and Finn, *What Do Our 17-Year-Olds Know?* 49.

[13] Mel Gabler 的右翼教科书批评家与我也都认为教科书是乏味的。W. Kelley Haralson 夫人写道:“上半个世纪里对教科书里的带情绪色彩的内容的审查, 导致教科书令学生感到乏味。”“导致他们反对(《美国的冒险历程》)”(Longview, TX: Educational Research Analysts, n.d.), 4. 然而, 我们有自己的解决办法, 因为 Gabler 及其同仁的想要添加的情绪是令人骄傲的。

[14] “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来自密苏里州的韦伯斯格罗夫斯一所中学的唱诗班自豪地唱道; 还上了 CBS 的新闻电台, *Sixteen in Webster Groves* (NY: Carousel Films, 1966).

[15] 即便在越南战争的余波里, Harcourt Brace 也把这最个事件重新命名为“美利坚民族的胜利”。这就是诵经式的历史研究手法: 我们在东南亚的战争中失败了, 但是我们在书的封面上胜利了!

[16] James Axtell, “Europeans, Indians, and the Age of Discovery in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 (1987): 627. 像 Axtell 的这种评论大学层次的教科书的文章, 在史学期刊中很少见到。中学教科书几乎没有书评。

[17] 其中 12 本是我在写作本书初版时所考察的教科书, 六本是我写作此版, 也就是第二版时考察的。其中《发现美国历史》、《美国的冒险历程》这两本是“探究型教科书”, 里面有地图、插图, 以及日记、法律条文等的摘录, 它们都被用一种包罗万象的叙述串在一起。这些书旨在激发学生自己去“做”历史,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曾盛行一时。《美国之路》、《希望之地》、《合众国: 共和国的历史》、《美国历史》与《美国的传统》都是我最初考察的传统的叙述型中学历史教科书。《美国的经历》、《生活与自由》与《自由的挑战》也是我最初所考察的教科书, 它们为中学低年级学生而写, 但是常常被中学高年级中的“慢班”采用。《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与《美利坚盛典》常常被中学的“提高班”的历史课所用。那六本新教科书是: 《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它是继承了《美利坚民族的胜利》而写的)、《美利坚盛典》的最新版本、Daniel Boorstin 与 Brooks Mather Kelley 所作的《合众国的历史》、《美国人》(现在所列的作者名为 Gerald Danzer 等四人)、《走向今天》(也列出了四个作者名) 以及一本七年级教科书《美利坚之旅》——我考察这本书是因为 McGraw-Hill 的一位销售代表要我这么做, 因为该书的作者中列出了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销售数据是商业秘密, 但是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有五本可能是销量最大的, 并且可能占据了全美四分之三以上的教科书销售量。

目录

Contents

- 第二版导言...1
- 导言 有些事情大错特错...10
- 第一章 被历史致残:英雄的塑造过程...1
- 第二章 1493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真正意义...22
- 第三章 感恩节的真实来历...67
- 第四章 红眼人...95
- 第五章 《飘》:美国历史教科书隐瞒种族主义...144
- 第六章 约翰·布朗和亚伯拉罕·林肯:美国历史教科书隐瞒反种族主义...187
- 第七章 机遇之地...225
- 第八章 看看“老大哥”:教科书是这样讲联邦政府的...242
- 第九章 不见罪恶:教科书选择不讲越南战争...271
- 第十章 探索记忆之洞:消失了的近期历史...287
- 第十一章 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309
- 第十二章 历史为什么要这样教?...333
- 第十三章 这样教历史的后果是什么?...378
- 结束语:未来的谎言——兼论我们该如何应对...394
- 附录...407
- 索引...409
- 图片索引...427
- 译后记...430

第一章

被历史致残：英雄的塑造过程

11

构成美国形象的,正是一系列关于某个人的英雄祖先的神话。

——詹姆斯·鲍德温^[1]

在研究历史时,人们一想到污点必须被遗忘、被修改、被匆匆略过,就会感到不解。我们只须记住丹尼尔·韦伯斯特是了不起的宪法学家,无须记得他曾酩酊大醉;我们必须忘记乔治·华盛顿曾是一位奴隶主……我们只需记住那些我们觉得值得信赖的、鼓舞人心的事情。当然,这种思想也有它的难处,那就是担心历史失去了它作为模范的激励价值。它描写完美的人和高尚的民族,但就是不说实话。

——W.E.B. 杜博伊斯^[2]

把我们尊崇的人奉为偶像,既伤害了他们,也伤害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行事。

——查尔斯 V. 威利^[3]

本章讨论英雄化问题。英雄化是一个退化的过程(很像地质学上的石灰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的教育机构把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虔诚的、完美的造物,他们没有矛盾,没有痛苦,没有人情味,也没有可信性。

美国的很多历史教科书都配有插图,有些是非常著名的(《希望之地》为每一位总统提供了一个小头像),有些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自由的挑战》准备的小头像上标有“你以前知道吗?”几个字,问的是关于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这位从医学院毕业的第一位美国女性的故事,以及《阳光下的葡萄干》^③等电影的编剧

① 杜博伊斯(W.E.B. Du Bois, 1868-1963),美国学者,著名人权主义活动家。

② 查尔斯 V. 威利(Charles V. Willie),美国当代学者。

③ 《阳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又名《日光下成长》,是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部著名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生活在芝加哥的黑人家庭与他们白人邻居之间的故事。

2 老师的谎言

罗兰·汉斯贝里的一些事情)。插图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它们树立榜样,展示了各种不同的出人头地之路,它们还使教科书为布莱克威尔和汉斯贝里等人提供了空间——要不是有她们,历史只会是对男性政治领袖的大检阅。人物插图还能够促使我们思考我们教历史的目的:是否切斯特·A. 阿瑟^①就比弗兰克·劳埃德·赖特^②更值得介绍?他们俩谁对我们今天影响更大呢?赖特发明了车库,改造了住宅建筑空间,至于阿瑟么——嗯,他签署了第一部《公务员法》。还有,谁的出名更有戏剧性?是布莱克威尔还是乔治 H.W. 布什(后者出生时嘴里含着一把银质参议院座椅^[4])^③? 如何选择是有争议的,但是,教科书要写进一些人确实应该不仅根据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还要考虑他取得那些成就所经历的过程。

我们还可以对课本中的那些英雄谱做第三层、第四层的推测。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谁入选了这种英雄谱,我关心的是当他们被写进教科书、被带进课堂时,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两位 20 世纪的美国人是这种英雄化的绝佳例子,他们是伍德罗·威尔逊和海伦·凯勒。威尔逊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总统,他受到大量教科书的关注。另一方面,凯勒则是个“小人物”,她没有促成一部立法,没有改变任何一门科学的进程,更没有宣布进行什么战争。在我所考察的所有历史教科书中,只有一本载有她的照片,多数教科书甚至没有提到她。但是,老师们都对她们津津乐道,并且经常展示一些声像材料,或者推荐一些将她树为楷模的传记。所有的这些刻意行为都旨在确保学生对这两位历史人物产生某种认识,但是学生并不会因此而知道得更多。英雄化就是这样扭曲了凯勒和威尔逊(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生平,以至于我们不能如实地想象他们。

老师们抬高了海伦·凯勒的形象,他们用这位失明又失聪,但身残志坚的女孩的事迹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学生。每个五年级学生都知道这样一幅画面:安妮·沙利文^④在一个水泵旁把“水”这个字拼写到海伦的手掌上。迄今描写凯伦生平事迹的电影和幻灯片已不下十部,每一部都在说着同样的陈词滥调。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发行的一部教育片最后总结说:“海伦·凯勒和安妮·沙利文带给整个世界的礼物就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多么奇妙,有那么多人教我们认识它;没有哪个人是不值得帮助或无法帮助的,一个人对我们的最大益处就在于帮助他人发挥其真正的潜能。”^[5]

① 切斯特·A. 阿瑟 (Chester A. Arthur), 美国第 21 任总统 (1881-1885), 有“好好先生”之称。

②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 1867-1959), 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 其代表作有 1936 年完成的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熊跑溪的流水别墅。

③ 这里指美国政界流传的一句笑话: 大人物出生时嘴里含着一把银质座椅 (一说汤勺)。

④ 安妮·沙利文 (Anne Sullivan), 海伦·凯勒的良师益友, 比凯伦·凯勒年长 14 岁, 也是身残志坚的典范。

历史学家和制片人从海伦·凯勒身上得出这样空泛的格言，而无视她的真正生平，并把她特意告诫我们要从她身上学习的那些东西扔到一旁。凯勒顽强地学习说话，但历史却让她再度无言。结果，我们其实对她知之甚少。

过去 20 年间，我问过很多大学生海伦·凯勒是谁，她做过什么。他们都知道她是一个盲聋女孩。大多数人还都知道她有一位良师益友，叫安妮·沙利文，她教她读书、写字甚至说话。有些学生还能记得凯勒早年生活的某些细节：她住在阿拉巴马州，在遇到沙利文之前，她蛮横无理、没有规矩，如此等等。一些学生知道凯勒上过大学，但至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的整个成年生活又是怎样，他们就一无所知了。一些学生大胆地说，凯勒成为“公众人物”和“人道主义者”，或许是由于代表了盲人和聋哑人。“她写作，真的吗？”或者，“她说话”——无稽之谈。凯勒生于 1880 年，1904 年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卒于 1968 年。忽略她 64 年的成年生活，或者只用一个“人道主义者”对它进行概括，那是以一种省略来说谎。



图 1 为无声者呐喊

海伦·凯勒积极参加妇女选举权运动。她在 1912 年的这次示威中处于中心位置，这说明她的重要地位和对这项事业的热衷。图中盾牌来自西部各州，在那里，妇女已经参加选举。

事实上，海伦·凯勒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1909 年，她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社会党。早在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之前，她就是一位社会激进分子。她本人强调，这并非由于在那里所受的任何教育。俄国革命爆发后，她对这个人新的

4 老师的谎言

共产主义国家大唱赞歌：“在东方，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在痛苦的挣扎中，新秩序从旧的秩序中降生。看哪！在东方，一个男婴降生了！向前！同志们，齐向前！奔向俄罗斯的营火！迎接黎明！”^[6]凯勒在她的书房书桌上方悬挂了一面红旗。后来，她逐渐成为社会党的左翼，成为一名“沃布利”(Wobbly)，即“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这是一个遭伍德罗·威尔逊迫害的工团主义者联盟。

凯勒致力于社会主义，源于她作为残疾人的特殊经历，以及她对其他残障者的同情。起先，她简化字母表，使之适合残障者使用；但是她很快意识到，单纯地解决失明问题，是治标不治本。通过研究她发现，盲人并非随机分布在各种人口中，而是集中在社会底层。穷人更容易由于生产事故或者得不到充分的治疗而失明。有些穷人沦为妓女，又多了一种因梅毒而导致失明的危险。于是，凯勒认识到，社会阶级制度控制着人一生的命运，有时甚至决定他们是否会失明。凯勒的研究并非书斋式的：“我参观过糖果店、工厂、棚户区。就算我看不见，我也闻得到。”^[7]

当凯勒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时，她已经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女性。但她很快声名扫地，因为转向社会主义，从而引起了一场新的舆论风暴——这次是招致怒火。那些曾经赞美她的勇气和智慧的报纸，转而强调她的残障。专栏作家们指责她没有独立的感官接受能力，受制于那些向她灌输思想的人。最典型的是《布鲁克林鹰报》^①的一位编辑。他写道，凯勒的“错误源于她生理发育的明显缺陷”。

凯勒回忆说，她曾经见过这位编辑。“当时，他对我的恭维是如此慷慨，我都不好意思再提。但是现在，我站出来支持社会主义，他就提醒我和大众，我是一个又聋又瞎、特别容易出错的人。大概，自从见过他以后，我的大脑就缩水了。”她接着说：“哦，《布鲁克林鹰报》太滑稽了，它在社会问题上又聋又瞎，它维护着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我们努力预防盲聋病症，而这个制度正是造成多数盲聋的根源。”^[8]

凯勒的后半生主要致力于为“美国盲人基金会”筹募资金，她坚信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激进的变革，这个信念从未动摇。她本人为说话而历经磨难，她还帮助建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他人的言论自由而奋斗。她捐赠 100 元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②，并在该组织的刊物《危机》上公开发表支持信——这个行为对于

① 《布鲁克林鹰报》(Brooklyn Eagle)，美国的一份右翼报纸，曾刊登海伦·凯勒的文章《我为什么成为社会主义者？》

②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是美国一个由白人和黑人组成的旨在促进黑人民权的全国性组织，总部设在纽约。

20世纪20年代的阿拉巴马州的白人来说,是激进的。她支持社会主义者尤金·V. 德布斯^①的历次竞选总统活动。她还在妇女运动、政治、经济方面发表文章。在晚年,她写信给美国共产党领袖伊丽莎白·G. 弗林——她是麦卡锡时代的牺牲品,当时正在监狱里度过风烛残年:“亲爱的伊丽莎白·弗林,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生日祝福!愿服务人类的美好感受为您无畏的心灵带去力量与安宁!”^[9]

有人或许不同意海伦·凯勒的立场。她对苏联的赞扬甚至对某些叛逆者来说也是奇特和令人不安的。但她确实是一名激进分子——这在美国是鲜为人知的,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都对此避而不谈。^[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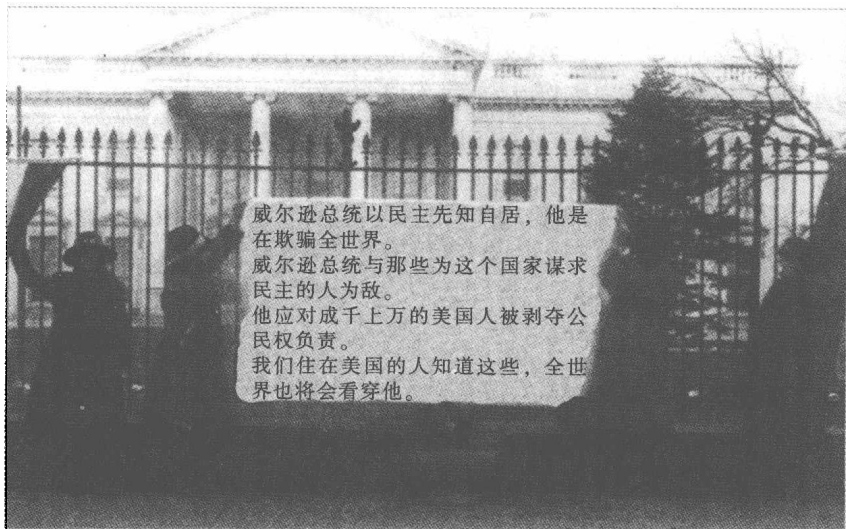


图2 关于威尔逊总统

学生们通常把进步时代的各项改革归于伍德罗·威尔逊的功劳,妇女选举权就是其中之一。然而,虽然在威尔逊执政时期妇女的确得到了选举权,但总统对此并不支持。他逮捕妇女参政论者,他的妻子也厌恶那些人。是绝食等斗争方式造成的压力,使威尔逊认识到,反对妇女选举权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教科书通常都不能说明英雄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作者们把很多事归之于英雄,其实只说了历史的一半还不到。

我们对伍德罗·威尔逊的无知更加严重。当我让大学生们告诉我,一提到威 16
尔逊总统他们会想到什么,他们都积极回答。有的说威尔逊让我们的国家不情愿地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于战后在国内和国际上积极倡导建立国联;有的把威尔逊与进步事业,如妇女选举权,连到一起;少数学生还想到了威尔逊政府对左翼联盟的“帕尔默大搜捕”^②。但是我的学生很少知道,或者说很少谈到威尔

① 尤金·V. 德布斯(Eugene V. Debs, 1855-1926),美国政治活动家。

② “帕尔默大搜捕”(Palmer Raids),美国20世纪20年代由联邦检察官帕尔默发起的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主义者、激进团体的搜捕行动。

6 老师的谎言

逊实施的两项反民主政策：联邦政府的种族隔离，以及对他国的军事干涉。

在威尔逊执政下，美国干涉拉丁美洲的频繁程度甚于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我们1914年出兵墨西哥，1915年出兵海地，1916年出兵多米尼加共和国，1916年再次出兵墨西哥（到威尔逊离任止，又出兵该国九次），1917年出兵古巴，1918年出兵巴拿马。在他整个任期内，威尔逊在尼加拉瓜一直驻有军队，以武力决定尼加拉瓜的总统人选，迫使其签订亲美条约。

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开始对俄国内战中的“白方”提供秘密经济援助，这时候他的权势盛极一时。在1918年夏天，他签署了一项针对苏联的海上封锁法令，并派兵远赴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爾、符拉迪沃斯托克，以颠覆俄国革命。在英法支持下，美国与日本联合派兵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向西一直打到贝加尔湖，支持捷克与白俄军队宣布成立以鄂木斯克为总部的反共产主义政府。在西至伏尔加的前线短暂驻扎后，白俄军队于1919年底崩溃，我们的军队也于1920年4月1日最终撤离符拉迪沃斯托克。^[11]

不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很少知道那场我们“与俄国的不为人知的战争”——这个词源于罗伯特·马多克斯^①的那本论述这场惨败的书名，甚至连我所列举的那12本美国历史教科书也无一提及那场战争。只是六本新教科书中的两本提到这场战争。比如，布尔斯廷与凯利写道：“当布尔什维克俄国退出战争后，美国希望这座军需仓库能远离德国人之手，于是派一支5000人的部队加入在阿尔汉格爾对北俄罗斯的联合入侵。威尔逊还派出将近10000人的部队，作为协约国远征军的一部分进入西伯利亚。”通过这段话，美国学生就有可能——虽然有一定难度——推论出，威尔逊卷入了俄国内战。

相比之下，在俄国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一事件占了大量篇幅。马多克斯指出，“干涉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延长了那场血腥的战争，由此额外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对已经千疮百孔的社会予以重击，其涵义是深远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有清楚的证据证明……西方势力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破坏苏维埃政权。”^[12]

这场侵略使冷战时期的苏联戒心重重，难以释怀，直到解体前夕，苏联还在申述侵略造成的损害。

相比威尔逊的俄国政策，人们对威尔逊入侵拉美要知道得多些。一些教科书确实记载了这些事件，而考察一下作者们为证明这些事件的正当性所做的努力，是很有意思的。只要是准确地描述这些事件，就不可能对威尔逊和美国报以好感。事后我们发现，威尔逊对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及尼加拉瓜的干涉，帮

① 罗伯特·马多克斯(Robert Maddox)，美国当代历史学家。

助了巴蒂斯塔、特鲁西略、杜瓦利埃、索摩查斯等独裁者上台，这些人的余毒至今仍未肃清。^[13]即便是在 20 世纪初，这些入侵大多就已在我国国内不得人心，并在国外招致批评的浪潮。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威尔逊的继任者修改了对待拉美的这种政策。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知道这一点，在接威尔逊之后的一两章里，他们开始宣扬什么“睦邻友好政策”——柯立芝与胡佛开始从拉美撤军，富兰克林·D. 罗斯福继续推进这一政策。^[14]

相比之下，教科书本该（但没有）把威尔逊的拉美行动称作“与邻为敌政策”。相反，在各种指责面前，它们总是设法为英雄开脱，就像《自由的挑战》一书所说的，“威尔逊总统希望美国与那些拉美国家成为朋友，但他发现那非常困难……”；有些教科书把入侵归罪到被侵略国家头上，《美利坚盛典》说：“威尔逊尽量避免侵略性外交政策。海地的政治动乱很快迫使威尔逊收回了他的反帝言论……威尔逊很不情愿地派遣海军去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样的说法纯粹是无中生有。他的海军部长后来抱怨说，威尔逊“强迫（我）在海地做的那些事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没有文件材料证明，威尔逊在出兵加勒比海问题上有过任何疑虑。

我所考察的每本教科书都提到了威尔逊的 1914 年入侵墨西哥，但是它们都认为那些干涉并非威尔逊的错。2006 年，《美利坚盛典》写道：“对干涉的叫嚣发 18
自美国沙文主义者之口”，“威尔逊反对干涉的立场是坚定的。”但后来，威尔逊的确下令部队进入墨西哥，当然，还是在国会授权他这样做之前。沃尔特·卡普已经揭示，认为威尔逊不愿意干涉的观点，再次违背了这样的事实：入侵从一开始就是威尔逊的主意，它冒犯了国会，也冒犯了美国人民。^[15]威尔逊的入侵行为是如此蛮横，当时墨西哥内战的双方领袖都要求美国军队撤离，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压力最终迫使威尔逊召回了军队。

教科书的作者在描述我们在墨西哥的冒险活动时，通常采用另外一种套路：他们把威尔逊说成是命令我们的军队撤离的人，但是从不明确指出是谁命令他们去入侵的！以被动式语句写成的片面信息帮助了历史人物从他们本来不英雄或不道德的事实中脱身。

有些书籍远不止隐匿行动者，甚至对行动本身也避而不谈。在那 12 本教科书中，有一半甚至根本没有提及威尔逊接管海地的事。美国海军在 1915 年入侵之后，迫使海地立法机构选举产生亲美总统。当海地没有继我们之后向德国宣战时，我们就解散了海地立法机构。当时，美国操纵所谓的全民公决，通过了一部新的海地宪法，它比原先的宪法更不民主，在那场全民公决的闹剧中以 98225 对 768 票通过。皮耶罗·格雷耶稣士曾指出：“并不是威尔逊没能尽最大努力向那些

8 老师的谎言

小国输出民主。他从未那样做。他干涉的目的是推行霸权,而不是推行民主。”^[16]美国还破坏了自海地革命以来海地人民引以为傲的小块土地私有传统,而扶持建立大种植园。美国军队强征农民进入筑路队,戴着镣铐工作。1919年,海地人民起义,反抗美军占领,在一场游击战中,双方死亡3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海地人。关于威尔逊对海地的干涉,学生们在《走向今天》中读到这样的文字:“在海地,一系列的革命使这个国家衰弱和动荡,美国的介入使其恢复了稳定。威尔逊……1915年出兵,美国海军占领海地,直到1934年。”这些平淡的语句为我们所做的事蒙上了面纱;当时一位名叫乔治·巴尼特的美国海军将领向他的海地指挥官抱怨说:“对当地人的滥杀无辜事实上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巴尼特把这一暴力事件称为“海军陆战队中所发生过的同类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17] 19

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间,美国有效地使尼加拉瓜、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等国家成为殖民地。威尔逊对俄国革命的反应强化了美国与欧洲殖民势力的联盟关系。在他的任期中,美国政府首次被共产主义幽灵——国外的,以及国内的——所困扰。威尔逊对之束手无策。他来到西部,在蒙大拿州的比灵斯,他登台演说,寻求人民对国联的支持,他警告说:“在我们中间,有列宁的追随者。我不能想象成为一名列宁的追随者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追随黑暗、追随骚动和追随混乱。”^[18]即使是在白俄夺权者崩溃之后,威尔逊也拒不承认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他参与阻止俄国一战后签署和平协议,帮助驱逐匈牙利领导人、共产主义领袖库恩·贝拉。威尔逊对“自决”与“民主”的热衷从来没有脱离三个基本的“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当时年轻的胡志明在凡尔赛和会上向威尔逊呼吁支持越南自决,但是胡志明反对所有这三种主义。威尔逊不听,而法国也坚持要控制印度支那。^[19]对威尔逊来说,自决似乎只对比如说比利时这样的国家才是正确的,而对拉美或东南亚国家就不适合了。

在国内,威尔逊的种族政策也使他的任期很不光彩。他的共和党前任们都曾照例任命黑人担任重要职务,包括财政登记官和新奥尔良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报关员。他们有时还任命非裔美国人担任邮政局长,特别是在黑人居多的南部小镇。非裔美国人还参加共和党的全国大会,并有机会进入白宫。而伍德罗·威尔逊,这位在1912年选举中得到许多非裔美国人选票的总统,却改变了这一切。威尔逊是一个南方人,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这是当时唯一一所拒绝接纳黑人的北方主要大学。他是一位公开宣扬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者——他的妻子更甚,他甚至在内阁会议上给大家大谈所谓“黑鬼”的故事。他的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旨在降低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的提案,但遭到国会拒绝。威尔逊毫不顾忌地利用政府首脑的权力在联邦政府里搞种族隔离。他任命南方白人担任传统上由黑

人担任的职位。他的政府以反共产主义为借口,监视和破坏黑人报纸、组织及工 20
 会领袖。他在海军里搞种族隔离,把非裔美国人转移到厨房和锅炉间,这在以前
 是没有过的。他本人对《国联盟约》中的种族平等条款投反对票。威尔逊曾唯一一
 次在白宫会见非裔美国人领袖,但这类事情随着那次他把那些人轰出白宫而再
 也没有出现过。威尔逊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他的影响下,民主党的大门在此后的
 20年间再次向黑人关闭,而联邦政府的某些部门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
 远时代都处于种族隔离状态。^[20]1916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有色人种咨询委员
 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威尔逊的决议,决议尽管有些偏颇,但仍是正确的:“民主党尚
 未执政,威尔逊先生和他的幕僚们就已经制订政策,要把所有的有色公民从联邦
 政府的代表中清除出去。”^[21]

在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有八本根本没有提到威尔逊任期的这个“污点”,只
 有四本正确地描述了威尔逊的种族政策。1983年的《希望之地》做得最好:

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公然仇视黑人。威尔逊是一位公然鼓吹白人优越
 论的种族主义者,他认为黑人是低劣的。在他竞选总统期间,威尔逊向新
 闻界承诺人权。但是一当上总统,他就背信弃义。威尔逊命令在联邦政府
 工作的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必须互相隔离。这样的隔离,在南方重建之后
 是破天荒的!当南部城市的黑人联邦雇员抗议这一命令时,威尔逊就将他
 们解雇。在1914年11月,一个黑人代表团要求总统收回成命,威尔逊表
 现得粗鲁而仇视,拒绝他们的要求。

大多数教科书也确曾提到威尔逊的种族主义,但也只是只言片语,有些书还
 煞费苦心地为威尔逊从这种事情中开脱。《走向今天》的原话是这样的:“威尔逊
 听任其内阁成员在联邦政府里扩散吉姆·克劳^①种族分离的做法。”忽略威尔逊的
 种族主义或者为其开脱,远不止是掩藏了一个个人污点。他是一个公开的种族主
 义者。没有哪位黑人会把威尔逊看作一位英雄,那些把他称作英雄的教科书都是
 从白人的角度来写的。掩盖真相就等于剥夺所有学生了解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 21
 间关系的某些重要内容的机会。在威尔逊执政期间和结束之后不久,美国白人发
 起了一场新的种族暴行。这里,行政部门所定的基调是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就
 是美国第一部史诗电影的上映。^[22]

导演 D.W. 格里菲斯在其电影《三 K 党人》中曾援引威尔逊的两卷本美国历史

① 吉姆·克劳(Jim Crow),原是19世纪上半叶一部黑人歌舞剧及其主人公的名称,后来代称黑人或
 种族歧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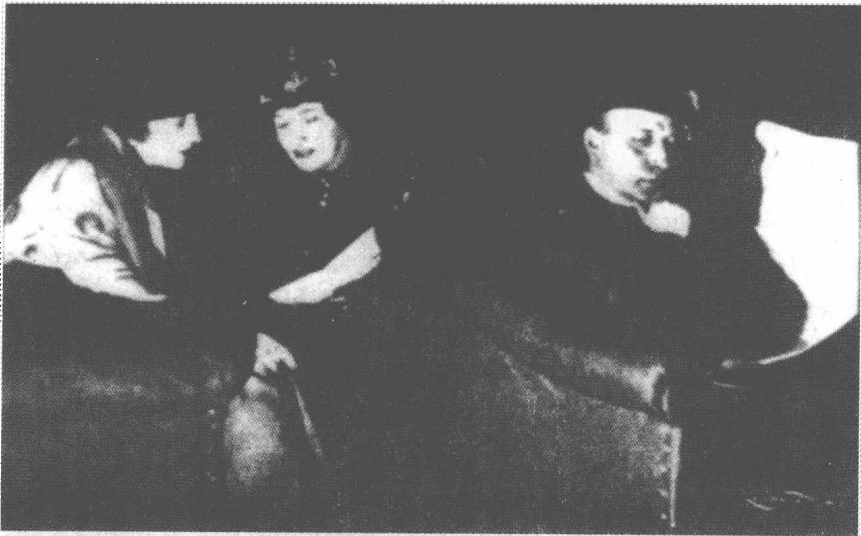
书——该书现在已由于其对重建问题的种族主义立场而声名扫地,该片也同样由于其大肆颂扬“三 K 党”在重建期间颠覆“黑人主宰”的共和党州政府而臭名昭著。该片是格里菲斯根据威尔逊的同学托马斯·迪克松的著作改编而成,而按照历史学家韦恩·维德的说法,托马斯·迪克松在种族问题上的成见“与《我的奋斗》不相上下”。在白宫的一次私人观影中,威尔逊看了这部电影,当时它已改名为《一个国家的诞生》。面对格里菲斯的阿谀,威尔逊回答说:“它像是一部用闪电照亮的历史,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它全都如此真实。”格里菲斯于是使用这句话,成功地抵御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该片煽动种族主义情绪的指责。^[23]

作为美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片不仅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技术产品,而且很可能还是所有时代里种族主义题材最为鲜明的电影。迪克松意在“通过再现历史,使每个看过我的这部电影的人都变成好的民主人士,从而彻底改变北方人的情操!在这个问题上再也不要犯错!我们做的就是这些!”^[24]迪克松并非夸大其词。在《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刺激下,乔治亚的威廉·西蒙斯重建了“三 K 党”。种族主义从白宫中扩散出来,对这些党徒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使得他们胜过自己的重建时期的先辈们——在重建时期,格兰特总统成功地在一个州(南卡罗莱纳)消除了“三 K 党”,并使其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受挫。新“三 K 党”很快蔓延全国。在印第安纳州、俄克拉荷马州、俄勒冈州以及很多南部州,“三 K 党”发展成为民主党内的主导力量。20 世纪 20 年代,在从佛蒙特州的蒙彼利埃,到伊利诺斯州的西法兰克福,再到俄勒冈州的梅德福,“三 K 党”聚会是这些城镇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场景。威尔逊连任总统后,一股反黑人的种族主义浪潮席卷全国,白人对黑人的虐待之风向北一直蔓延到德卢斯。^[25]

美国人需要通过威尔逊时代懂得,一位种族主义总统与有类似倾向的民众反应是脱不了干系的。为了教育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教科书本应该讲清楚原因与结果、英雄与崇拜者之间的关系。但相反,它们却为英雄赋予高尚的动机,激发“人民”去谅解那些有问题的行为与政策。《美利坚民族的胜利》写道:“作为总统,22 威尔逊似乎表达了大多数美国白人的心声:种族隔离最符合白人和黑人的双方利益。”

威尔逊不仅打击黑人,无疑还是一位最强烈的本土主义者。他反复强调,那些所谓的“归化的美国人”的忠诚是值得怀疑的。他说:“所有那些带连字符称谓的人^①,都随身带有刀剑,时刻准备刺向共和国的致命之处。”^[26]美国人民响应了威尔逊总统的榜样,掀起了压制白人少数族裔的浪潮,但结果,大多数教科书指

① 这里所谓“带连字符称谓的人”,即指“归化的美国人”(hyphenated Americans),在美国,移民常被称为“某某裔美国人”,中间用连字符隔开,比如“德裔美国人”(German-American)。



Spies and Lies

German agents are everywhere, eager to gather scraps of news about our men, our ships, our munitions.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get such information through to Germany, where thousands of these fragments—often individually harmless—are patiently pieced together into a whole which spells death to American soldiers and danger to American homes.

But while the enemy is so industrious in trying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nd his systems elaborate, he is not superhuman—indeed he is often very stupid, and would fail to get what he wants were it not deliberately handed to him by the carelessness of loyal Americans.

Do not discuss in public, or with strangers, any news of troop and transport movements, or bits of gossip as to our military preparations, which come into your possession.

Do not permit your friends in service to tell you—or write you—"inside" facts about where they are,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seeing.

Do not become a tool of the Hun by passing on the malicious, disheartening rumors which he so eagerly sows. Remember he asks no better service than to have you spread his lies of disasters to our soldiers and sailors, gross scandals in the Red Cross, cruelties, neglect and wholesale executions in our camps, drunkenness and vice in the Expeditionary Force, and other tales certain to disturb American patriots and to bring anxiety and grief to American parents.

And do not wait until you catch someone putting a bomb under a factory. Report the man who spreads pessimistic stories, divulges—or seeks—confidential military information, cries for peace, or belittles our efforts to win the war.

Send the names of such persons, even if they are in uniform, to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ashington. Give all the details you can, with names of witnesses if possible—show the Hun that we can beat him at his own game of collecting scattered information and putting it to work. The fact that you made the report will not become public.

You are in contact with the enemy *and*, just as truly as if you faced him across No Man's Land, in your hands are two powerful weapons with which to meet him—discretion and vigilance. Use them.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8 JACKSON PLACE, WASHINGTON, D. C.

Contributed through Division of Advertising



United States Gov't Comm. on Public Information

George Eastman
The Bureau of War
The Bureau of War
The Bureau of War

Creel Committee Advertising in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图3 间谍与谎言:CPI在《星期六之夜邮报》上的公告

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对此表示悲观,都是危险的。克里尔公共资讯委员会要求所有的美国人“揭发那些……呼吁和平、贬斥我们为赢得战争而做的那些努力的人。”它告诫人们把那些人的名字报告给华盛顿的司法部。一战后,威尔逊政府对公民自由的打击不断加强;现在,又多了一条反共产主义的借口。这些举措使美国在那个时期空前绝后地近似于一个警察国家。

责人民,而不指责威尔逊。《美国的传统》承认,“威尔逊总统建立了所谓‘克里尔公共资讯委员会’,后者使美国到处充斥着将德国人与野蛮人相提并论的宣传。”但是,对于由此引发的国内问题,该书又赶紧为威尔逊推卸责任:“虽然威尔逊总统在其战争咨文中谨慎地指出了多数德裔美国人都是‘忠诚的公民’,但是那些反德宣传仍然使他们遭受不幸。”

威尔逊漠视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的权利,但是教科书却竭力为他开脱。1917年6月的《反间谍法》以及次年的《反叛乱法》,可以说是继1798年短命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之后最严重地侵犯了美国人的公民自由的法案;但是教科书却将这两种法案的通过归咎于“国会”,而与威尔逊无关。事实上,威尔逊试图强化《反间谍法》,在其中加入直接赋予总统更广泛的书刊审查权的条款。更严重的是,在威尔逊的批准下,邮政总长动用其新的书刊审查权扣押所有社会主义的、反英国的、亲爱尔兰的,以及其他在他看来对战争意图构成威胁的信件。罗伯特·哥德斯坦因为拍摄了电影《1776年精神》而遭致10年的牢狱之灾。该片描写了美国革命期间的英国人,英国人现在是我们的盟友,因此这种描写不合时宜。^[27]教科书的作者们解释说,战时压力使威尔逊对公民自由进行压制情有可原。但是,到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威尔逊却仍然否决了一项旨在废除《反间谍法》和《反叛乱法》的提案。^[28]教科书的作者们把威尔逊连任总统后针对共产主义者和劳工组织的“猎巫运动”归咎于他的身体多病以及当时联邦检察官的嗜血好杀,但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实际上,联邦检察官帕尔默在威尔逊离任前夕请求他赦免尤金·V. 德布斯,后者当时正在坐牢,罪行是曾发表言论,把“一战”说成是为经济利益而战,并批评《反间谍法》是不民主的。^[29]总统回答:“绝不!”,于是德布斯继续在牢中煎熬,直到沃伦·哈定赦免他。^[30]《美国之路》采取了可以说是最为新奇的方法来为威尔逊的恶行开脱,它干脆把“红色恐惧”^①移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威尔逊已从白宫一走了之!

英雄化阻碍了教科书暴露威尔逊的缺点,因此教科书很难对19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做出解释。当时,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考克斯本来有望成为威尔逊的继任者,但却被没进行竞选活动、无足轻重的哈定所击败。在这场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一边倒的选举中,哈定几乎囊括了64%的多数党选票。教科书指出,人民“厌倦”了,只想“回到常态”。选举人有可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抵制威尔逊的事情,但教科书的作者们从未想到这一点。^[31]然而,海伦·凯勒知道这一点,她认为“威尔逊是世人所知道的最令人失望的人!”

① 在英文中,“红色恐惧”(Red Scare)与莫斯科红场(Red Square)谐音,此乃威尔逊总统的讽刺之辞。

并非只有中学历史课程在英雄化威尔逊。《希望之地》讨论了威尔逊的种族主义，但屈指可数的这类教科书也不得不面临一场攻坚战，因为它们要应付那么多的历史博物馆、公共电视档案以及历史小说里所纪念的那位模式化的威尔逊。

25年来，迈克尔·弗里奇教授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开展一项关于社会模范人物的试验。他让一年级大学生列出内战前美国历史上“你最先想到的十位人物的名字”。但他发现，每年他的学生一开始给出的名单都是那些同样的政治和军事人物，这再次反映出他们中学教科书为那些人物所提供的突出地位。于是他增加一条限制，“总统、将军、政治家等除外。”但弗里奇得到的名单也几乎不变，只不过已较少有历史教科书的痕迹。在大多数时候，贝琪·罗斯^①都名列榜首。（保罗·里维尔常常紧随其后。）

就学生们的这种选择而言，有趣的是，贝琪·罗斯其实什么也没做。弗里奇指出：“在真正的第一面国旗的真正的制作过程中，她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罗斯大约在1876年前后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她的后人们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费城旅游，就编造了所谓第一面国旗的传说。中学教科书普遍忽略贝琪·罗斯，是公正的，也没有一本教科书把她列入书中的索引。^[32]那么，她的故事为什么得以流传开来呢？对此弗里奇做了饶有趣味的解释：如果说华盛顿是国父的话，那么贝琪·罗斯就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弗里奇描述了我们小学阶段盛传的那些故事（或者 25 只是我们的想象？）：“华盛顿（上帝）在简陋的小屋里找到卑微的女裁缝贝琪·罗斯，问她是否愿意根据他的设计缝制一面国旗。贝琪立即从她的衣服下摆掏出了这个民族和人类的自由和天赋权利的希望。”^[33]

我想弗里奇触及了某些问题，但仍只是在就事论事。不论你对他的解释是不是买账，贝琪·罗斯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都足以证明社会楷模的力量。就伍德罗·威尔逊的例子而言，教科书的确参与了对社会楷模的塑造。威尔逊被用这样的术语来描绘：“善良”、“理想主义者”、“主张民族自决，反对殖民干涉”、“单挑孤立主义的参议院”、“时代的先行者”。我们将很多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从华盛顿特区里根大厦里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到位于伊利诺斯州迪凯特市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学”——我在这所学校虚度了青春时光。如果总统山要添加第五副面孔，很多美国人会认为那非威尔逊莫属。^[34]在这种美好的模范面前，即便是《希望之地》里关于威尔逊总统的种族主义的罕见的直白论述，也不能动摇学生的观念。

① 贝琪·罗斯(Betsy Ross)，传说中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英雄，据说是她为华盛顿设计并且缝制了第一面美国国旗。后文的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是一位银匠，也是传说中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英雄，据说他曾策马星夜报信，打响了“莱克星顿枪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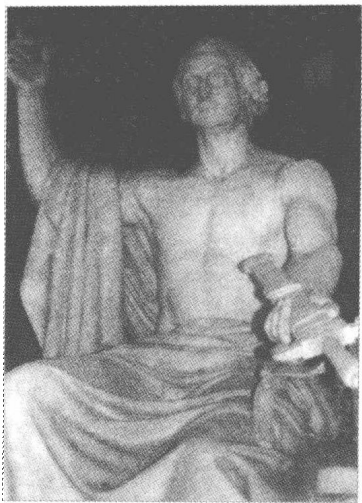


图4 乔治·华盛顿像

这座乔治·华盛顿像现藏于史密森学会，它反映出教科书在塑造美国英雄时所惯常采用的方式：10英尺高，不带瑕疵，具有希腊神祇的体态。

历史博物馆馆长们知道参观者们会心怀一些理想的形象。一些馆长有意识地设计一些展览，来反驳那些不准确的形象。如果教科书作者、教师以及制片人也能针对性地反驳那些错误的形象，他们也能履行自己的教育使命。其实，伍德 26
罗·威尔逊毕竟不需要他们为尊者讳。仅其任期前两年所取得的立法成就，包括关税改革、收入税、《联邦储备法》、《劳工补偿法》等，都是空前的。威尔逊支持民族自决的演讲震动了整个世界，尽管他有些言行不一。

为什么教科书要推出完美无瑕的典范？作者的省略和错误并非偶然。相关影片和幻灯片以及其他教育素材的制作者并非不知道海伦·凯勒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也没有人能够在不了解她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情况下读懂她的著作。至少，有一位教科书作者，即《美利坚盛典》的资深作者托马斯·贝利，非常清楚美国1918年对俄国的入侵，因为在1973年，他在其他场合写道：“美国军队在1918至1920年间与俄国武装力量在俄国土地上的两座剧院内发生枪战。”^[35]或许还有一些作者也知道这一事件。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对于职业历史学家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让公众去探知那些事情呢？

对此，英雄化本身就首先给出了答案。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也是如此。迈克尔·坎曼指出，作者们有选择地忽略了某些瑕疵，其目的就是使一些历史人物能被尽可能多的人所敬仰。^[36]教科书评论家诺玛·加布勒证实，教科书应该“以一种尊敬和荣耀的方式呈现我们的民族英雄”；在她的眼里，如果承认凯勒的社会主义以及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就几乎做不到那样。^[37]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有人曾言，教科书的作者们“把我们国家的伟大英雄和爱国者的错误、弱点和不足都呈现在了年少

无知的学生面前;这是不对的。”^[38]而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就几乎挑不出这方面的毛病了。

或许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让我还是从海伦·凯勒谈起,因为对她64年后半生的忽略,代表了某种在文化运用方面的歪曲做法。对这一问题我将在后面的章节继续讨论。我们把凯勒当做一位完美的、非真实的人,以此激励年轻人去学习,于是凯勒成为一位神话人物,一个“战胜困难的女人”——但是,那是由于什么呢?没有了下文。只要看看她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就受到勉励了——但是我们无从知晓事情的真相。

凯勒少年时不想像个冰人似的哪也去不了。她自己强调,她生命的意义在于一旦克服了自己的身体缺陷后所做的事情。当然,她并非有案可查的第一位学说话的聋盲孩子,这一荣誉应该属于挪威姑娘朗希尔德·卡塔,是她的成就激励了 27 凯勒。她也并非第一位学习读书写字的美国盲聋人,这一荣誉应该属于劳拉·布瑞吉曼,是她教会了安妮·沙利文触摸式字母表,沙利文又教给了凯勒。1929年,凯勒快50岁时,写了第二本自传,名叫《中流》,书中通过细节描述了自己的社会哲学。凯勒记录了她参观以煤矿、采石以及搬运为业的城镇的经过,在那里,工人们在罢工。她想让我们知道她的这些经历,以及她从这些经历中得到的结论。为迎合我们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删节后的海伦·凯勒的故事净化了英雄的形象,只剩下自助与勤劳的美德。凯勒本人虽然几乎不反对艰苦劳动,但明显反对这种意识形态。

我一度相信,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可以随意地塑造自己的生活……我克服了盲聋的障碍,这给我带来足够的欢乐。我还认为,只要投入到与生活的抗争中,任何人都能取得胜利。但是,走访了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之后,我认识到,我对于自己知之甚少的事情说得过于肯定了。我忘记了自己的成功有一部分得益于我的出生和环境……现在,我懂得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往上爬的能力。^[39]

教科书都不想涉及这一观念。“教科书的出版有三大禁忌”,一家规模很大的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这样告诉我:“那就是性、宗教和社会阶级。”对于前两者我都可以想象,但最后一点却让我费解。毕竟,社会学家知道社会阶级观念的重要性。然而,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考察又使我相信,这位编辑说的是对的。有些观念——比如,在美国机会是不平等的,并非每个人都有“在这个世界上向上爬的能力”——对于教科书的作者乃至很多教师来说,都是大逆不道的。教育家们希

望把凯勒树立为能使年轻人受到鼓舞和激励的教育素材——如果她做到，你能做到！于是，我们就不提她的成年生活，把她完整的生命变成模糊的“拎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提上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这位为穷人而战的热情斗士变成她一生中从未表现出的那个样子：乏味。

伍德罗·威尔逊也被同样地美化了。虽然有些历史教科书比其他的教科书揭露了更多的威尔逊任总统期间的劣迹，但是我所考察的 18 本教科书对他全都采取一个基调：尊敬、爱国，甚至阿谀奉承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遭到广泛轻视，只是到了二战后，才受到一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好评。戈登·莱文指出，我们两党战后一致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实行广泛的对外干涉的外交政策，而这一切都“决定性地肇始于威尔逊政府提出的意识形态和国际纲领”。^[40]教科书的作者们因此对威尔逊执政期间的对外干涉——大多是得不偿失的错误举措——以及其他令人失望之处轻描淡写或予以辩解。

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教科书会略去那些令人头疼的真相，比如：来自“统治阶级”的压力、来自教科书审查委员会的压力、人们希望避免模糊性、人们要求保护孩子远离伤害与冲突、人们认为有必要对孩子施加控制以避免课堂骚乱、迫于压力必须提供答案，等等。某种礼节也要求我们以一种尊敬的语调谈论过去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向年轻一代传授所谓“我们的遗产”时。但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不愿意把威尔逊往坏处想呢？我们似乎觉得，像海伦·凯勒这样的人，只有始终保持是没有冲突的、单向度的，才会有励志价值。我们不想要复杂的偶像。“人们不想思考。如果人们思考，他们就一定会得出结论”，海伦·凯勒指出：“结论并非总是令人满意。”^[41]我们多数人都很羞于卷入纷争，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特别在意要避免课堂上的冲突，原因之一就是习惯：我们如此习惯于温和，以至于任何教科书或教师只要把真正有见地的思想带到课堂上，都会使我们受到打击，并被视为对我们的政治言论以及课堂纪律的冒犯。毕竟，我们要为死者避讳。或许，当我们在读到我们的民族英雄时，也应该保持同样的尊敬、尊重和敬仰态度，就像在参观我们的国家大教堂、瞻仰海伦·凯勒及伍德罗·威尔逊的最后安息地时一样，我们在肉体上与死者如此接近，但在精神上却相去甚远。

不论什么理由，英雄化的结果都是对学生的潜在伤害。海伦·凯勒并非唯一一位被这样当作孩子来对待的人。向学生否定凯勒、威尔逊等人的人性将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思想不成熟的状态。它将使那种迪斯尼式的历史永远存在下去。迪斯尼乐园里的总统厅就是这样把我们的领导人美化为英雄政治家，而不是不完美的个人。^[42]我们的孩子们最终无法找到现实的角色可作激励的模范。学生们对

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也无从理解。比如说,我们的国家 13 次侵扰尼加拉瓜,就的确 29 值得我们反思,特别是当我们试图理解那个国家为什么在 20 世纪 80 年代要拥护一个共产主义政府之时。教科书应该把历史视为偶然,受到思想和个人力量的作用。但相反,它们却把历史呈现为一道“做熟的佳肴”。

教科书、电影以及美国历史课有没有取得它们在我们的英雄问题上所想达到的结果呢?的确,教科书作者们希望,对于那些他们用同情的方式来处理的历史人物,我们要往好处想。实际上,我们做到了,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近来的中学毕业生几乎没人会说凯勒或威尔逊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这二位是否就被认为是英雄呢?我曾经多次在我的第一次课上问过共几百个大学生(多数是白人),在他们心目中,谁是美国历史上的英雄。结果,他们并没有选择海伦·凯勒、伍德罗·威尔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普利茅斯的迈尔斯·斯坦迪什^①或其他什么人、弗吉尼亚的约翰·史密斯^②或其他什么人、亚伯拉罕·林肯,甚至也没有选教科书告诉他们应该选的那些美国历史人物。^[43]“水门事件”之后的一代学生对所有这些“既定的”英雄抱以冷嘲热讽,说他们“令一人一乏一味”。

有些学生选择“无”。——也就是,他们说美国历史上没有英雄。有些学生把我们具有美国特色的同情心付给了那些可怜的失败者,因此选择了非裔美国人,比如,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X,或许还有罗萨·帕克斯^③、哈丽特·塔布曼^④、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⑤。还有些学生甚至选择外国人,不管是男是女,比如,甘地、特蕾莎修女^⑥、尼尔森·曼德拉,乃至(现在已销声匿迹的)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健康的倾向。我们的确希望学生具有怀疑精神。或许我们想让他们敢于挑战,不再需要别人来告诉自己该去相信谁。但是,以我的品味,回答“无”太油腔滑调,太目空一切。但是,对于英雄化来说,这种态度又是

① 迈尔斯·斯坦迪什(Miles Standish),相传最早到达北美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英国清教徒船长。

② 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17 世纪初欧洲航海家,相传最早到达弗吉尼亚。其经历被改编进美国著名电影《风中奇缘》。

③ 罗萨·帕克斯(Rosa Parks, 1913-?),美国民权运动历史人物,她因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给一个白人而引起了全市范围汽车公司的联合抵制,激起了全国型的民权运动。

④ 哈丽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非裔美国人,废奴主义者。她担任“地下活动”组织者,曾协助无数黑奴奔向自由。

⑤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1817-1895),美国著名黑人废奴主义者。

⑥ 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1910-1997),印度著名的慈善家,印度天主教仁爱传教会创始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慈善机构网,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1979 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教科书的作者们回避那些瑕疵、问题、不幸的人格特征,以及错误观念时,他们就把英雄从生动的男人和女人变成僵化的木偶。那些人的内心斗争消失了,他们不但不善,而且是伪善了。

学生们拿海伦·凯勒开玩笑,嘲弄那些道学家。中小学生们并非在残忍地取笑残疾人,他们这样做时,是在贬低那些好得不真实的虚假形象。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失去了海伦·凯勒,她沦为一个笑柄,这的确令人颓丧。了解她极不平凡的一生,不仅能赋予盲聋学生以力量,而且对正常的女生,或许还有男生,都是一个鼓励。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我们美国人也需要英雄。像“如果马丁·路德·金 30 还活着,他会……”这样的表述,说明了历史人物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某种作用。我们大多数人在做一件事时,如果想到英雄也会这样做,就会对自己充满信心。谁是英雄,他们是否被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对待,以及他们是否能被用作某种模范,都会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们下面将要讨论我们的第一位英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华盛顿·欧文曾写道:“要警惕有害的学问侵害伟人的英名。”这是在为英雄化辩护。^[44]1828年,欧文的三卷本哥伦布传记出版,该书至今仍影响到中学教师和教科书如何讲授这位“大航海家”。因此,不足奇怪,英雄化从我们手中盗走了哥伦布一生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只留下一一些戏剧性的情节。

注释

[1] James Baldwin, “A Talk to Teachers,” *Saturday Review*, 12/21/1963, 转载于 Rick Simonson and Scott Walker, eds., *Multi-cultural Literacy* (St. Paul, MN: Graywolf Press, 1988), 9.

[2] W. E. B. Du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Cleveland: World Meridian, 1964 [1935]), 722.

[3] Charles V. Willie, 转引自 David J. Garrow, *Bearing the Cros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6), 625.

[4] 当然,这里指的是他父亲的财富和参议院议席。

[5] *Helen Keller* (New York: McGraw-Hill Films, 1969).

[6] Helen Keller, “Onward, Comrades,” 访谈, the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12/31/1920, reprinted in Philip S. Foner, ed., *Helen Keller: Her Socialist Year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107.

[7] 引自 Jonathan Kozol, *The Night Is Dark and I Am Far from Hom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1975]),101.

[8] Foner, ed., *Helen Keller: Her Socialist Years*, 26.

[9] Joseph P. Lash, *Helen and Teacher* (New York: Delacorte, 1980), 454; Dennis Wepman, *Helen Keller*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7), 69; Foner, ed., *Helen Keller: Her Socialist Years*, 17-18.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allow Flynn to receive the letter.

[10] 在1975年在怀俄明大学的一次发言中,科佐尔(Jonathan Kozol)使我注意到这一迫害。

纳粹首领也知道海伦·凯勒的激进主义倾向。1933年,他们焚毁了她的书籍,因为其中含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并禁止图书馆收藏这些书籍。我们忽略她的激进主义倾向,因此并不比德国大众更了解她的这一面。见 Irving Wallace, David Wallechinsky, and Amy Wallace, *Significa*(New York: Dutton, 1983), 1-2.

[11] N. Gordon Levin J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67. Everett M. Dirksen, "Use of U.S. Armed Forces in Foreign Countries," *Congressional Record*, June 23, 1969, 16840-43.

[12] Robert J. Maddox, *The Unknown War with Russia* (San Rafael, CA: Presidio Press, 1977), 137.

[13] Hans Schmidt, *The United States Occupation of Haiti, 1915-1934*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1), 86.

[14] 同上, 66, 74.

[15] Walter Karp, *The Politics of Wa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158-67.

[16] Piero Gleijeses, "The Other Americas,"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12/27/1992, 5.

[17] "Reports Unlawful Killing of Haitians by Our Marines," *New York Times*, 10/14/1920, 1ff. 另见 Schmidt, *The United States Occupation of Haiti*.

[18] *Addresses of President Wilson*. 66th 国会, 参议院文件 120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133.

[19] Jean Lacouture, *Ho Chi Minh* (《胡志明》)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24, 265.

[20] Rayford W. Logan, *The Betrayal of the Negro* (New York: Collier, 1965 [1954]), 360-70; Nancy J. Weiss, "Wilson Draws the Color Line," in Arthur Mann, ed., *The Progressive Era* (Hinsdale, IL: Dryden, 1975), 144; Harvey Wasserman,

20 老师的谎言

America Born and Reborn (New York:Macmillan, 1983), 131; Kathleen Wolgemuth, "Woodrow Wilson and Federal Segregation,"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44 (1959): 158-73; and Morton Sosna, "The South in the Saddle,"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54 (Fall 1970): 30-49.

[21] Colored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Address to the Colored Voters," October 6, 1916, reprinted in Herbert Aptheker,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Negro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0-1932* (Secaucus, NJ: Citadel, 1973), 140; Nancy Weiss, "The Negro and the New Freedo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4, 1 (March 1969): 66; Theodore Kornweibel Jr., "Seeing Red": *Federal Campaigns Against Black Militancy, 1919-192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22] Wyn C. Wade, *The Fiery Cro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115-51.

[23] 同上, 135-37.

[24] 同上, 138.

[25] Lerone Bennett, Jr., *Before the May-flower* (Baltimore: Penguin, 1966 [1962]), 292-94. Bennett counts twenty-six major race riots in 1919 alone, including riots in Omaha; Knoxville; Longview, Texas; Chicago; Phillips County, Arkansas; and Washington, D.C. Also see Herbert Shapiro, *White Violence and Black Respons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123-54.

[26] *Addresses of President Wilson*, 108-99.

[27] William Bruce Wheeler and Susan D. Becker, *Discovering the American Past*, vol. 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127.

[28] Ronald Schaffer, *Americans in the Great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引自 Garry Wills, "The Presbyterian Nietzsc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16/1992, 6.

[29] Karp, *The Politics of War*, 326-28; Charles D. 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 (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90), 10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战后, 威尔逊同意德布斯所说的积极利益的力量: "这里难道有人……不知道, 在现代世界, 工业与商业竞争会埋下战争的种子?" (在 Saint Louis 的发言, 9/5/1919; *Addresses of President Wilson*, 41).

[30] 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 109.

[31] 同上。该文指出, 威尔逊对民权的攻击已变成一项政治责任, 总检察官帕尔默在 1920 年秋已成为可悲的笑柄。

[32] 七年级教科书 *American Journey* 的确有两处提到她,每一次都说“据大众传说……”

[33] Michael H.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39–47.

[34] 在亚瑟·M. 施勒辛格 1962 年关于 75 位“最了不起的历史人物”的民意调查中,威尔逊位居第四,排在托马斯·杰斐逊之前。(Kenneth S. Davis, “Not So Common M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4, 1986, 29). 846 位美国历史学教授把威尔逊排在第六位,位居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及总统山上的其他四位人物之后 (Robert K. Murray and Tim Blessing, “The Presidential Performance Stud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0 [December 1983]: 535–55). See also George Hornby, ed., *Great Americana Scrap Book* (New York: Crown, 1985), 121.

[35] Thomas A. Bailey, *Probing America's Past*, vol. 2 (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73), 575.

[36] Michael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701.

[37] 引自 Marjory Kline, “Social Influences in Textbook Publishing,” in *Educational Forum* 48, no. 2 (1984): 230.

[38] Bessie Pierc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6), 332.

[39] Charles Dickens, American Notes, Chapter 3,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arles Dickens*, dickens-literature.com/American_Notes/3.html, 11/2006; Elisabeth Gitler, *The Imprisoned Gues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1); “Laura Dewey Bridgman” at Wikipedia, 11/2006; Helen Keller, *Midstream: My Later Life* (New York: Greenwood, 1968 [1929]), 156.

[40] Levin,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1. 由于威尔逊政府是 20 世纪前三分之一年代内的唯一一届民主党政府,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同党们,包括他本人,都接受威尔逊治下的外交政策经验。

[41] 引自 Kozol, *The Night Is Dark and I Am Far from Home*, 101.

[42]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639.

[43] 另见 Arthur Levine, *When Dreams and Heroes Di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0), and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44] 引自 Claudia Bushman, “America Discovers Columbus” (Costa Mesa, CA: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1992), 9.

第二章

1493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真正意义

31

哥伦布首先是一位可能开启了近代历史的人物——我们用“近代”(Modern Age)来描述过去500年的历史。从哥伦布其人,从哥伦布的拓殖活动中,我们获得了对一些从那时开始塑造这个时代,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它的历史模型的独特理解。

——柯克帕特里克·塞尔^[1]

有没有可能是非洲人发现了美洲?对美国历史学家来说,这从来就不是一个诱人的研究课题。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在选择自己的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有选择地追忆某些历史,以此开展我们的历史考察;这为我们带来了最大的惬意,我们也不再有欲望去探索我们的国父是否有可能是一位黑人。

——塞缪尔·D. 马布尔^[2]

历史是胜利者的诡辩。

——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

我们在印第安人身上所干的那些事,在我们对上帝、对人类曾经犯下的那些最不可饶恕的罪行中,最为突出;而在那些事中,这桩(美洲印第安人奴隶)贸易是最不公正、最邪恶、最残忍的贸易之一。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3]

1493年,哥伦布偷走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

——传统诗歌《新潮》

① 柯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当代美国学者,生态史学家。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突然跨海而来。美国的历史书认为哥伦布是史无前例的,把他描绘成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英雄。历史书对哥伦布的这一“加封”,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某种特性。事实上,美国的“总统节”是以华盛顿和林肯的生日确定的,^①而在仅有的两个被美国人以其名字命名国家节日的人中,哥伦布是一个。^②有一个历史年代是每一位学生都会记得的,那就是1492年;的确,我所考察的每一本教科书都提到这个年代。但是,凡是对学生了解哥伦布、了解欧洲人对美洲的扩张至关重要的内容,大部分教科书都省略了。同时,它们又拼凑了种种细节来讲述一个更好的故事,并对哥伦布进行更人性化的处理,以便读者能接受他。

哥伦布如同耶稣基督一样,是划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他开辟了美洲历史的新纪元,从而把1492年之前称为“前哥伦布”时代。美国历史教科书承认哥伦布的重要性,平均为其写了1000字,也就是3页(其中包括一幅地图和一幅插图)——这是很大的篇幅了,考虑到了这些教科书所必须覆盖的全部材料。教科书都对其英雄事迹大致都做如下论述: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的一个下等家庭,成年后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海员。他在大西洋的航行最远曾到达冰岛和非洲西部。他的冒险经历使他深信地球是圆的,因此,可以向西航行取得传说中的东方财富——香料、丝绸和黄金,而不需通过传统的那条穿越中东的陆上通道,而后者作为商路已经被土耳其人中断了。

为了筹集活动所需的经费,哥伦布四处向西欧各国君主游说。一开始,他遭到了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拒绝;但最后,机会终于来了——伊莎贝拉女王承诺支付一次适度的远征的费用。

哥伦布装备了三艘可怜的小船——“尼娜号”、“平塔号”和“圣玛利亚号”,从西班牙出发。旅途是艰险的。在陌生的大西洋海域,船队航行了两个多月。最后船员几乎哗变,甚至有人威胁要把哥伦布丢进大海。最后,在1492年10月12日,他们达到了西印度群岛。

① 在美国,各州对“总统节”的庆祝是不同的。有些州以华盛顿生日(1月21日)为总统节;有些州以林肯生日(2月12日)为总统节,还有些州不庆祝总统节。

② 这两个节日当指“哥伦布节”(10月10日,部分州庆祝)和“马丁·路德·金节”(1月15日,全国性节日)。

哥伦布后来又进行了三次到美洲的航行，但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他没有得到赏识，在贫困中默默死去。然而，如果没有他的勇气与胆量，美洲的历史将是另外一副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哥伦布使一切变成可能。

不幸的是，在这种传统的描述中，几乎一切都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无证可考的。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把我们带上他们自己的思路，却让我们远离了历史事实，进入了神话的境界。他们和我们都在被一个由谎言、半史实、史实以及删改等等炮制出的混合物所欺骗，这个混合物的产生可追溯至十九世纪上半叶。 33

教科书的第一个错误是淡化先前探险家的重要性。1492年之前，其他各大洲就有人多次达到美洲。即使没有哥伦布的航行，也会有别的欧洲人很快到达美洲。事实上，在15世纪80年代，欧洲人可能已经在纽芬兰岛周围捕鱼了。^[4]从某种意义上说，哥伦布的远航不是第一次，而是最后一次对美洲的“发现”。它的划时代意义源于欧洲对它的回应方式。因此，哥伦布的重要性首先可归因于欧洲形势的改变，而不是他到达了一个“新”大陆。

美国历史教科书似乎懂得，介绍一下1492年前欧洲发生的那些社会变化是必要的。它们指出，历史已经抛弃了北欧海盗。一些教科书花了好几页去写欧洲人这次为什么打算——就像一本教科书所说的——“从发现美洲中获益”。但遗憾的是，没有哪本教科书对引起这种新反应的那些主要变化提出了实质性的分析。

我所考察的教科书在写哥伦布时，大多从马可·波罗和十字军东征开始。以下是它们对当时欧洲所发生的事情的概括：

“欧洲的生活节奏是缓慢的。”“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好奇心还很弱。”后来，“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500年间，欧洲发生了很多变化。”“人们的视野逐渐开阔，他们对于自己的居住地以外的世界也越来越好奇。”“新思想使欧洲躁动起来。许多欧洲人充满了炙热的好奇心。他们开始生活在一个叫做‘文艺复兴’的时代。”“文艺复兴鼓励人们把自己看做一个个生命个体。”“是什么开启了欧洲人的新思路和新梦想呢？由一系列的十字军东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十字军战士们在亚洲体味到了异国情调的愉悦。”“对于更大规模贸易的渴望迅速蔓延。”“旧的通往亚洲的商路一直非常困难。”

这类描述大同小异,不同的教科书有时甚至使用相同的词句。整体而言,学术水平之低令人沮丧,这或许是因为,对于美国历史,教科书作者们要比对欧洲历史更在行。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文艺复兴是一种综合。也就是说,意大利融合了来自印度(经土耳其人)、希腊(由穆斯林学者保存下来)、阿拉伯的思想及其他文化,创造了某种新的文化形式。教科书作者们没能解释欧洲征服时代的真正原因。相反,他们用了一些显然属于心理学的术语——“人们的好奇心不断增强”——来为欧洲的强大辩护。这种论调使社会学家不禁发笑:我们知道,没有人衡量过1492年西班牙人的好奇心水平,也没有人能够将它与诸如1005年挪威人或冰岛人的好奇心水平做出权威的比较。³⁴

有几本教科书声称,欧洲当时正变得日益富裕,新的财富导致贸易的增长。其实,正如历史学家安格斯·考尔德所指出的,“比起13世纪,15世纪的欧洲更小且更贫穷,”其部分原因是淋巴腺鼠疫(即“黑死病”——译者按)。^[5]

一些老师仍在讲授自己的老师在50年前讲授的那些内容:欧洲需要香料以去除腐坏的肉的味道,但可恶的土耳其人切断了香料贸易。在我一开始考察的那些教科书中,有三本——《美国的传统》、《希望之地》和《美国之路》——仍然在重复这一谬误。《希望之地》说,“后来,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后,与东方的所有贸易全都停止了。”但是,A. H. 利布耶尔早在1915年就证明这是错误的!土耳其与开辟通向印度的新航路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土耳其人有理由去保持地中海以东的古老道路的通畅,因为他们要从中赚钱。^[6]

1957年,雅克·巴尔赞与亨利·格拉夫出版了《现代研究者》,该书现已成为历史专业研究生的一种标准论文范式,它指出了自1915年以来教科书如何使这个特别的错误经久不衰。那些令人讨厌的教科书的作者们大概半数以上都在自己的研究生阶段读过《现代研究者》这本书。但不知为什么,该书中的这些信息没有被继承下来。这可能是由于,谴责土耳其人符合西方人的信念模式;西方人相信,伊斯兰教的追随者在行为上可能是不理性甚至是污秽的。1963年,在提议国会宣布哥伦布日为国家法定假日时,众议员罗兰·利博纳蒂说:“他(指哥伦布——译者按)的基督教信仰赋予他一种宗教力量,去阻止土耳其掠夺者劫掠那些来自基督教世界的商船的海盗行径。”当然,近些年事态的发展,特别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强化了伊斯兰教是威胁这一认知模式。因此,当今天的大学生得知,在土耳其人和摩尔人允许犹太人和基督徒信仰自由的时候,欧洲的基督徒却在迫害或驱逐犹太人和穆斯林,他们该是多么的惊讶。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我们,葡萄牙舰队曾在1507年封锁红海和波斯湾,以阻断传统的贸易路线,因为葡萄牙控制了环绕非洲的新航路。^[7]

大多数教科书都注意到了国际贸易与商业的增长,有些还论述了君主制下 35

民族国家的兴起。否则,他们就不能很好地描述欧洲发生的那些导致“探险时代”的变化。一些教科书甚至用新教改革来解释这一问题,虽然新教改革要比1492年晚25年才开始。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必须注意教科书告诉了我们什么,又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欧洲的变化不仅促成了哥伦布的航行,促使同时代的葡萄牙人、巴斯克人和布里斯托的渔民可能出航美洲,还为欧洲未来500年的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铺平了道路。除了农业发明,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我们的历史书籍应该认真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发生,而不是像《美国的传统》那样提供一些空泛模糊的、圆滑的宣言:“对现实问题以及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兴趣导致了造船和航海的进步。”

或许,在众多被教科书遗漏的重要因素中,首先是军事技术的进展。1400年前后,欧洲统治者开始使用大型枪炮并学会在船上装备它们。欧洲连续不断的战争助长了这种军备竞赛,而这种竞赛又导致射击、军事演练以及围攻战术的发展。最终,中国、土耳其帝国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国家都将不得不在欧洲枪炮前俯首称臣。早在1493年,美洲开始屈服。^[8]

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种军备竞赛之下。但是,西方人是否从1400年代以来就一直令人称羡地保持着这种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优势,仍然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当初,13个英属殖民地试图宣称向土著美国人^[9]出售枪支是不合法的;现在,美国也试图禁止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核技术。乔治·W. 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主要一点,就在于禁止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伊拉克、伊朗及朝鲜这样的国家,并使它们远离诸如“基地”这样的恐怖分子组织。然而,既然武器贸易可以赚钱,既然所有的国家都须有军事同盟,那么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武器贸易就会存在。西方国家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现在仍然是个焦点问题。可是,并没有一本书上提到武器是欧洲成为世界霸主的原因。

在哥伦布航行前几年,欧洲人还大量使用新形式的社会管理技术——官僚机构、复式记账和机械印刷。官僚机构在今天是具有消极含义的东西,但在当时实际上是一项实践创新,它使统治者与商人能够有效地管理分支广泛的企业。基于十进制的复式记账法也是如此,欧洲人最初是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学来的。印刷术的发展以及文献的大量增长使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消息传到欧洲,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远非北欧海盗的冒险所能比拟。

第三个重要的进步是意识形态乃至神学上的。积累财富和统治他人渐渐被赋予正面的价值——人们视其为赢得此生威望和死后救赎的关键。就像哥伦布说的:“黄金是最好的;黄金就是财富;谁拥有了它,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一切,甚

至把自己的灵魂引向天堂。”^[10]1005年,海盗们还仅仅是打算占据“威兰”(Vineland)——这是他们为今天的新英格兰和加拿大的近海省份起的名字。到1493年,哥伦布便打算掠夺海地。^[11]关于哥伦布的这一动机,史料讲得极其清楚。比如,1495年,米歇尔·德·库尼奥记录了他伴随哥伦布1494年远征海地腹地的旅程:“我们在驻地休息了几天之后,舰队司令(指哥伦布——译者按)似乎觉得,把自己寻找黄金的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到了,这是他开始这样一次如此危险的伟大之旅的主要原因。”^[12]哥伦布其实并不比西班牙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更贪婪。但是大多数教科书在描述哥伦布以及后来的探险家和殖民者时,并不敢说追逐财富是他们来到美洲的动机。实际上,就连“清教徒始祖移民”们^①离开欧洲的部分原因也是为了钱。但是你永远不会从我们的教科书中知道这些。教科书作者们明显相信,把对美洲的探险和殖民说成是为了经济利益,是大不敬的。

第四个影响欧洲人打算拥抱“新”大陆的因素,是欧洲基督教的特殊性质。欧洲人信奉便于迁徙的、可改宗的宗教,那可以使他们的征服活动合理化。(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也有这一特点。)典型的例子是,在“发现”一座岛屿和遇到一个对自己来说是新奇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后,西班牙征服者就会(用西班牙语)大声念出后来被称为“规则”的条款。下面就是一段:

我恳请你们尊教会为母,并以教皇的名义,尊国王为这片土地的领主并服从他的统管。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告诉你们,我会在上帝的帮助下,直接进入这片土地,并打击你们所有的人。我将在各个地方、以各种我能采取的方式开战。我将使你们屈服并遵从教会及陛下。我将带走你们的妇女和儿童,使他们成为奴隶……你们从这里开始所遭受的伤害与死亡,都将是由于你们自己的过错,而不是陛下或者我身边的这些绅士们的过错。^[13]

37

这样,西班牙殖民者先是向土著美洲人提供皈依基督教的机会,以使自己良心上得到满足,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这些被他们刚刚“发现”的人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第五个导致欧洲人对哥伦布关于海地的报告所做出的反应,与他们对那些早期探险的反应有着天壤之别的原因是,欧洲在近期连续地接管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岛屿社会。通过马耳他岛、撒丁岛、加那利群岛,以及后来的爱尔兰,欧洲人懂得了这种征服是通往富裕之路。下面将要介绍,今天的教科书还讲到了第六个原因:

① “清教徒始祖移民”们(Pilgrims),在此指前往美洲的早期英国移民。以下译文简称为“始祖移民”。根据本书的定义,“始祖移民”们是“五月花”号成员的少数和领导人,清教徒等是多数。

欧洲人带进了疾病,而疾病有助于他们的征服。自北欧海盗开始海上航行以来,各种形式的疾病,特别是致命的天花、流感和淋巴腺鼠疫开始在欧洲发作。^[14]

为什么教科书不提武器是探险与统治的得力助手呢?为什么它们要忽略上述的这些因素呢?如果那些粗鄙的因素——比如军事力量,或者为宗教所认可的贪婪——被认为对我们产生恶劣的影响,那么,“我们”究竟是谁?教科书由谁而写,又为谁而写?坦白地说,答案就是——欧洲人的后裔。

中学生通常不会思考欧洲的世界霸主地位的形成。它很少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它似乎是自然的,是既定的,是无需解释的事情。从更深层次上看,我们的文化鼓励我们去设想我们比别人更富有、更强大,原因就在于我们更聪明。(如果思考一下这里的“我们”究竟是谁,是很有意思的。)当然,并没有什么研究表明,美国人就比——比如说伊拉克人,更聪明。恰恰相反,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最近非常畅销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开头,提到了他的一位朋友、一位新几内亚的部落男子。戴蒙德认为他至少和自己一样聪明,只不过他的文化必须被视为“原始的”。但是,既然教科书并不赞同或鼓励我们去思考事情的真正原因,“我们更聪明”这句话就化为一种可能性。同样,一个群体统治另一个群体是“自然的”这种观念也化为一种可能性。^[15]历史既有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例子,但也不乏相反的例子。美国教科书对待哥伦布的方式,使人们更少思考统治如何实现的问题。哥伦布踏上美洲海岸便立即成为统治者这一画面,是基于一个史实:哥伦布宣布他从船上所看到的一切都归自己所有。当教科书在称颂这一过程时,它们就是在说,占有 38 这块土地、统治土著人,即便不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真不幸,因为哥伦布的那几次航行构成了一个辉煌的、富有教导意义的时刻。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官方使团,他的航行证明了一个新欧洲的出现。商人与统治者共同批准他的行为并为其提供财力支持,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配备了重型军事装备。哥伦布详细记录了航海经过,包括航向、海潮、鱼群,并描述了哪些居民是可以被征服的。正是得益于这些印刷品,关于海地及其被征服的详细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哥伦布本人曾亲身到过葡萄牙和西班牙新近征服的那些大西洋岛屿,并参与过西非的奴隶贸易。最重要的是,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仅是探险或者贸易,还包括征服和掠夺,并用宗教证明这些活动的合理性。^[16]如果教科书写了这些事实,它们就能够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思考,为什么西方今天处于世界的主导地位。

教科书也承认,哥伦布并非白手起家。每一本教科书在讲述欧洲人对美洲的探险时,都从葡萄牙“航海王”亨利亲王 1415 至 1460 年间的活动开始。它们把亨利描述为第一位发现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并派船队环绕非洲航行的人。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似乎并不知道,古代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在公元前 600 年之前就曾

航行至少远至爱尔兰和英格兰,到达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与加那利群岛的土著居民贸易,并环绕非洲航行。相反,教科书把巴托罗缪·迪亚士推为在1488年第一个环绕非洲南端好望角航行的人。忽略腓尼基人的成就是很讽刺的,因为亨利亲王正是认识到了腓尼基人的航海技艺,才受到启发去效仿他们。^[17]但是这种信息冒犯了另一个定论:我们的文化视现代技术为欧洲人的发明。因此,腓尼基人的业绩不符合这些教科书的总体故事线索——是欧洲白人教会了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如何做事情。这些教科书也都不提穆斯林对希腊学问的保护,以及他们把希腊思想与中国、印度和非洲的思想融合起来,然后把这一融合结果通过西班牙和意大利传到了欧洲。相反,它们证明亨利发明了海航术,并暗示在欧洲之前,人类没有什么成就,至少,没有现代成就。有几本教科书还讲到了“葡萄牙人如何设计出新的航海船只——轻快帆船”——这句话是布尔斯廷与凯利说的。

实际上,亨利的成就所基于的理念,早已为古代埃及人与腓尼基人所知道,并且已经在阿拉伯、北非和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葡萄牙人用以指代新型船只的那个单词 *caravel* (轻快帆船),也是源自埃及语 *caravos*。^[18]文化不可能在真空中发展,思想的传播或许是文化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常常触发文化繁荣,人类学家称此为文化“融合”(syncretism):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思想融在一起,产生新的文化。小学生都学过,在古代,波斯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因为处于商路之上而得以繁荣。亨利亲王处于欧洲即将主导世界的黎明时刻,对此,教科书本可以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把这个同样的文化融合的观念用在欧洲身上。但它们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根据《美国之路》,亨利不仅不得不发明新设备,而且“人们都不知道如何建造可以出海的船只。”^[19]关于澳大利亚土著人如何达到澳大利亚、波利尼西亚人如何到达马达加斯加,或者史前人类如何到达加那利群岛,没有给学生留下任何去思考的提示。当然,《美国之路》所说的“人们”实际上是指欧洲人——这是“欧洲中心论”在教科书中的典型例证。

这些教科书所表达的,正是人类学家斯蒂芬·杰特所称的“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一教条”。^[20]本章“表一”提供了一份可能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探险活动的纪年表,并对每一个事件的相关证据依据2006年时的标准,进行可信度评价。^[21]这份名单太长了,但仍可能不够完整。有一份1513在土耳其发现的地图,据说是基于亚历山大大帝图书馆里的材料绘制而成的,其中包括了关于南美和南极洲的海岸线的细节描述。古代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的钱币一直在美洲到处都能发现,这导致某些考古学家得出结论,罗马海员不止一次到达过美洲。^[22]土著美洲人也曾穿越过大西洋——人类学家推测,土著美洲人千年以前从加拿大向东航行到斯堪的纳维亚或苏格兰。公元前60年前后,两艘美洲印第安人船只曾在荷兰遇难,这在欧洲成为一大奇事。^[23]

就这些航行而论,每一次航行的证据材料都对1492年以前大西洋两岸和亚洲曾经存在的社会与文化提供了令人兴奋的一瞥。它们也暴露了研究远古历史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如果教科书介绍了这些分歧,它们就能告诉学生,哪一种观点证据更有力,哪一种更站不住脚。既然他们要激发学生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自己的判断,它们就应该给学生介绍研究者们用以获得关于远古历史的知识的各种形式的史料和研究方法——口述历史、文字记录、文化相似性、语言变化、人的遗传、陶器、年代考古、植物传播。不幸的是,教科书似乎拘泥于那种关于必然性的论调。《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的作者詹姆斯·W.戴维森与马克·H.莱特尔还为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写了《事实的背后》(After the Fact),该书强调,历史并非一系列的事实,而是一系列的观点、问题和争论。^[24]然而,这二位所写的这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与自己的竞争对手一样,把历史描述为答案,而非问题。

对美洲的探险

40

年份	出发地	到达地	可信度
7000? B.C.-12000? B.C.	西伯利亚	阿拉斯加	高:幸存者成为美洲的主要居民。
6000? B.C.-1500? B.C.	印度尼西亚	南美洲(或其他方向)	中:吹笛筒与造纸术等方面的相似性。
5000? B.C.	日本	厄瓜多尔	中:制陶术与捕鱼方式上的相似性。
10000? B.C.-600? B.C.	西伯利亚	加拿大、新墨西哥	高:纳瓦霍人与克里人的植物栽培方式彼此类似,但区别于其他印第安部落。
9000? B.C.至今	西伯利亚	阿拉斯加	高:一直与跨过白令海峡的因纽特人接触。
1000 B.C.	中国	中美洲	低:中国的传说;文化上的相似性。
1000 B.C.-A.D.300	非洲-腓尼基	中美洲	中:雕刻与陶器上的疑似的尼格鲁人和高加索人;阿拉伯的历史等。
500 B.C.	腓尼基、凯尔特不列颠人	新英格兰,也可能是其他地区	低:巨石阵、在手稿和语言上的可能的相似性。
A.D.600	爱尔兰,经由冰岛	纽芬兰? 西印度群岛?	低:圣布伦丹史诗,写于AD850,后被证明是挪威的史诗。
1000-1350	格陵兰、冰岛	拉布拉多、巴芬岛、纽芬兰岛、新斯科舍,可能还有鳕鱼岛及更远的南方	高:口头传说,为纽芬兰岛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1304?-1424?	波利尼西亚	智利	中:西班牙人到达之前的鸡骨遗存;相似的鱼钩。
1311?-1460?	西非	海地、巴拿马,可能还有巴西	中:在西非有葡萄牙人的史料、哥伦布在海地的史料、巴尔博雅(Balboa)在巴拿马的史料。
1460	葡萄牙	纽芬兰? 巴西?	低:由葡萄牙的相关材料与活动推理而来。
1375?-1491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纽芬兰沿岸	低:史料不明。
1481-1491	英国布里斯托尔港	纽芬兰沿岸	低:史料不明。
1492	西班牙	加勒比海地区,包括海地。	高:有史料。

41

当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将美洲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与非洲、欧洲及亚洲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相比较时,就会得到新的证据证明或驳斥那些来访是否属实。研究这些证据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为了讲述早期探险家,教科书作者们就必须使自己熟悉这些证据材料,比如,我前三个注释所提到的那些材料。单单复述大家都知道的那个老套的哥伦布故事,是很容易的。

我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大都至少提到了古代挪威人的探险活动。这些勇敢的水手们经过一系列的航行,穿越大西洋到达美洲,并在法罗群岛、冰岛和格陵兰岛建立起新的社会。挪威人在格陵兰岛的殖民地维持了500年(982-1500),这与欧洲人在美洲到今天为止的定居时间一样长。以格陵兰岛为基地,人们发起了一系列的探险活动,有的是有计划的,有的是偶然的,他们到达了北美各地,包括巴芬兰、拉布拉多、纽芬兰,甚至有可能到达了后来的新英格兰。 42

大多数教科书虽然提到北欧海盗的探险活动,却都贬低它们。《希望之地》写道:“他们只是短暂地靠岸,很快就驾船离去了。”《希望之地》的作者或许并不知道,1005年前后,托尔芬·卡尔瑟夫尼与古德里德·卡尔瑟夫尼夫妇带领一支由65或165或265个自耕农组成的队伍(与古老的挪威史诗所写的不同),带着家畜和生活必需品,到达“瓦恩兰”定居。他们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古德里德还养有一子。后来,由于发生与土著美洲人的冲突,他们离开了那里。这次旅行并非孤立的事件。350年后,挪威人还在把木材从拉布拉多转运到格陵兰岛。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挪威人最远到达过北卡罗莱纳海岸。挪威人对美洲的发现,数世纪来一直在西欧家喻户晓;而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们从未忘记它。哥伦布如果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1477年到过冰岛,那么,他一定知道格陵兰岛,甚至还有可能知道北美。^[25]

公正地讲,北欧海盗们的那些航行对世界的未来并未产生持久的影响。但是教科书是否就可以因此就把它们排除在外呢?一个事件或事实是否对今天产生影响,难道就是教科书写不写它们的唯一标准吗?当然,决不是如此;否则,我们的教科书就会压缩成二十页的小册子了。我们写挪威人的航行,不是由于其表面上的地理意义,而是因为,写了它们,就会提供关于过去的更完整的画面。而且,教科书只要用心地比较一下挪威人的航行与哥伦布的第二次远航,就会有助于学生理解1000至1493年间欧洲所发生的那些变化。我们将会看到,哥伦布的第二次远航的影响要比挪威人的殖民尝试的影响大十倍。新欧洲的动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哥伦布的远航具有了巨大的意义。

虽然来自非洲和亚洲的航海家们也曾到达过美洲,但他们却没有进入历史教科书。其中最著名的是腓尼基人的旅行,他们可能本来是从摩洛哥或西非出发

的,但最终是从埃及出发,并且据说在公元前 750 年左右到达了墨西哥的大西洋海岸。在墨西哥的东海岸伫立着很多用玄武岩做成的头像,与之相关的生物遗迹可上溯到至少公元前 750 年。根据人类学家伊凡·范·塞蒂玛的研究,这些巨石头像可能是西非人,或许还是一部分腓尼基人的现实肖像。伊凡·范·塞蒂玛为使人们重视这些头像,做了大量工作。^[26] 乔斯·梅尔加是第一位描述过这些头像的非土著人;他于 1862 年总结道:“无疑,在这一地区曾经有黑人。”或许,几乎同时,墨西哥其他地方的土著人也建有小的、陶制或石制的雕像,它们的面部看上去像是高加索人或黑人。亚历山大·冯·乌森瑙收集了很多这种陶瓦塑像。他指出,“一个印第安人能够以一种精巧的方式描绘一个黑人或白人的头像,却不丢失他们的任何种族特征,这有悖于基本的逻辑,也不符合一般的艺术体验;除非他见过这种黑人或白人。”^[27] 一些学者把这些高加索人头像贬斥为在“风格”上模仿印第安人,并且质疑它们是仿古的,理由是它们大多是舶来品,而非考古学家的发现,考古学家无法根据出土情况去推断它们的年代。一些玛雅学专家指出,“黑人脸庞”代表着美洲虎或人类婴儿。还有人指出,今天我们在这些地区附近见到的土著人都长着宽鼻子和厚嘴唇;当然,如果非洲人曾在古代或者在 1492 年之后的奴隶贸易中到过这些地方,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28] 范·塞蒂玛等人还举出了其他一些小例子,包括在织布机等文化元素方面的相似性,以及阿拉伯史料中关于非洲人和腓尼基人在公元 8 世纪曾有过广泛航海活动的记录。^[29] 43

哥伦布的这些可能存在的非洲人和腓尼基人前辈们,对于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像北欧海盗一样,他们提供了一个迷人的故事,会让学生心醉神迷。如果我们想一想“哥伦布节”的特定含义,我们又会认识到另外一层意义。意大利裔美国人从自己祖先的开拓活动中推演出某些可证明自己的“民族特征”的东西。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曾以调侃的口吻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自己的东英格兰祖先,而不写其他地方的更大的人群。他说:“他们是人,但他们不是霍曼斯人!”^① 同样,斯堪的纳维亚人与斯堪的纳维亚裔美国人也总是认为,挪威史诗与北欧海盗有关,尽管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这样认为,并且最终用在纽芬兰的考古发现向他们证实这一点。

如果哥伦布对西欧人、北欧海盗对斯堪的纳维亚人,都具有特别的意义,那么,前哥伦布时代的来自非洲的航海对非裔美国人有什么意义呢?在参观完墨西哥城的冯·乌森瑙博物馆后,非裔加勒比学者提奥·那瓦写道:“面对身边的这些 44 非凡的收藏品,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那些蒙在历史上的面纱似乎都被撕得粉碎了……不知怎的,离开博物馆后,我突然觉得,以后,我将更堂堂正正地行走在

① 在英语中,“人”(human)与“霍曼斯”(Homans)这两个单词谐音,在此可增强讽刺效果。

人世间。”^[30]范·塞蒂玛的书先后再版 20 多次，他本人也成为全美国黑人大学生心目中的雄狮。说唱音乐组合在唱到哥伦布时富有韵律地唱道：“可是——我们——先到那里。”^[31]显然，非裔美国人也想在美国历史中看到“自己”的正面形象。人同此心啊。



图1 巨石头像

在墨西哥东南，一些9英尺高的巨石头像面向大海站立着。考古学家称它们为“奥尔梅克头像”，名字取自雕刻他们的印第安人。按照一位曾协助发现这些巨石头像的考古学家的说法，这些面庞“与黑人惊奇地相似”。今天，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嘴唇的线条很像玛雅小孩仍然常带有的类似于美洲虎的表情。也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雕像属于“胖孩子”，或者印第安人的王，或者类似于东南亚的雕塑。

与挪威人一道，腓尼基人和非洲人构成了更完整、更复杂的历史画面，它们一起证明了航海与探险都并非始于 15 世纪的欧洲。也与挪威人一样，腓尼基人与非洲人有力地说明了人类的某种可能性——在这里，就是黑人的某种可能性，更准确地说，就是多民族社会的威力。^[32]但又与挪威人不同，非洲人与腓尼基人似乎对美洲产生过持久的影响。墨西哥的巨石塑像就说明了这一点。那些玄武岩石材每一个都重达 10 到 40 吨，人们开采它们，把它们从 75 英里外的采石场运过来，再把它们雕刻成 6 到 10 英尺高的塑像；这一切，都要花费巨大的努力。不管从何而来，这些头像所模仿的人类原型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些作为原型的人曾被崇拜、被服从，至少被纪念。^[33]然而，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那些原型就是玛雅人，因此，其他说法，包括关于非裔腓尼基人的说法在内，都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尚在进行的争论。

在我所考察的所有教科书中，只有两本提到非洲人或者腓尼基人探险的可能性。《美国的冒险历程》提了两个问题：“玛雅人的这些巨大石雕与古代埃及人的那些建筑物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有没有可能，来自亚洲、欧洲、非洲或南太平洋的水手们被风暴吹到这里，与‘新世界’的早期居民混居？”对于这两个问题，这本教科书没有提供任何相关信息，但声称：“这些问题你不经过研究都可以解决。”这简直是胡说。大多数课堂对这些问题都讳莫如深。^[34]《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提到了前哥伦布时代的探险活动，但只是为了使我们相信，我们不需要关注那些事情。它说：“这些欧洲人、非洲人或者亚洲人没有留下持

久的、能说明他们曾在美洲出现的痕迹,他们也没有与最初的美洲人结成任何持久的关系。”

美国历史教科书促使人们相信,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都可追溯到欧洲。如果承认前哥伦布时代的非洲人也拥有很多的人类潜能,可能会刺激美国人的神经。正如塞缪尔·马布尔指出的,“非洲人发现美洲的可能性,对美国历史学家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吸引力。”^[35]那些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非洲历史及非裔美国人的教师和课程,都常常被指责为“非洲中心论”。白人历史学家坚持认为,非洲裔尼基人的问题尚未得到证明。他们说,我们不能为了改进黑人孩子的自我认识就歪曲历史。他们是对的,问题的确没有得到证明,但是,教科书应该把非裔腓尼基人问题作为某种可能性、某种争论予以介绍。

正统的历史教科书和课程歧视那些在说唱音乐或者范·塞蒂玛的影响下长大的学生。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一个初秋时节的一堂美国历史课。课本是《生活与自由》,学生们正读到第二章《探险与殖民》。当一个非裔美国女生举手发问,质疑“直到1497到1499年,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才绕过非洲航行”这一说法时,会发生什么呢?从说唱音乐里,这个女生了解到,腓尼基人要比达伽马早两千多年。而教师会不会花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去发现这个女生是对的,而教科书是错误的呢?很有可能,他(她)会这样去否定学生的这一认识:“说唱音乐对历史课是不合适的!”或者他(她)会诙谐地告诉学生:“是的,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并且它没有带来任何结果。达伽马的发现才是重要的事件。”这些回答让学生“向前”看下一个问题。这些回答还说中了某些实情:腓尼基人的环球航行并没有带来新的贸易路线或民族联盟,因为腓尼基人已经通过红海及波斯湾与印度通商。然而,教科书提到达·伽马的名字,不是因为他的“发现”产生了某种后果,而是因为他是白人。在两页之后,《生活与自由》告诉我们,赫尔南多·德·索托^①“发现了密西西比河”。当然,这条河之所以被发现并被命名为“密西西比”,是因为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当时把德·索托追到这条河边。教科书保护德·索托,不提他到达这条河时,他的男女随从的衣物都被阿拉巴马的土著人一把火烧光了,他们只好穿着用芦苇编织成的衣服。德·索托的所谓“发现”没有什么更大的意义,没有带来贸易和白人定居点。^[36]他的发现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第一个面朝密西西比并紧盯着河水的白人。从红发埃里克^②到北极的皮利^③,再到第一个到达月球的人,我们歌颂大多数发现者,这既因为他们是先驱,也因为他们是白人,但不是因为那些从他

① 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西班牙探险家,1539年到达阿巴拉契地区。

② 红发埃里克(Erik the Red),挪威探险家,据说一头红发,第一个达到格陵兰岛(986年?)。

③ 皮利(R. E. Peary),美国探险家,1909年4月6日历史上第一次到达北极点。

们的成就中涌现出来或没有涌现出来的事件。我所设想的这位老师巧妙地为达伽马改变了评判规则,但这些规则又变回来支持德·索托,这样,学生就会懂得,黑人的功绩并不重要,而白人的功绩才是重要的。^[37]

比较一下可能发生的另外两次前哥伦布时代的探险活动——来自非洲西海岸的探险以及来自爱尔兰的探险——会为我们考虑上述争论提供一个有趣的切入点。当哥伦布到达海地时,他发现阿拉瓦克人拥有一些用“金物”做成的长矛头。阿拉瓦克人说,他们是从南部或东部来的黑人商人那里搞到这种东西的。“金物”是一种用金、银、铜等做成的合金,西非人认为它就是合成的黄金,因此把它叫做“金物”。伊斯兰历史学家记录了曼萨巴卡日第二王朝期间大约1311年前后西非马里人的来航。在14到15世纪,非洲失事船只——或许是跨大西洋的商队——的残骸不断地拍打着佛得角的海岸。从与西非的接触中,葡萄牙人了解到,非洲商人在15世纪中期曾到访巴西;这一认识可能对葡萄牙人产生触动,他们坚持要订立《托尔德西拉斯条约》(1494),将教皇的“分界线”向西推进。^[38]从前哥伦布时代巴西的尸骸中也可以看出非洲常见病的踪迹。哥伦布的儿子斐迪南伴随着这位舰长参加了第三次航行;根据他的报道,他们在洪都拉斯东部所见到和所听说的人“肤色都几乎完全是黑的、且长相奇丑”,这可能指的就是黑人。第一批到达巴拿马的欧洲人——巴尔博雅及其随从——曾报道他们在印第安人镇上看见黑奴。印第安人说,他们是从附近的黑人社会捕获这些黑奴的。非裔墨西哥人的口述历史包含了前哥伦布时代启始于西非的越洋航行。总之,各种材料中的数据都能证明前哥伦布时代发生过从西非到美洲的航行。^[39]

相比之下,关于有位爱尔兰人曾航行到美洲的说法,只有在大西洋对岸才有 47 单方面的证据。根据9或10世纪的一些爱尔兰传说,在几个世纪以前,“一位修道院长和17名修道士用皮革做船,在里面呆了七年,最后航行到‘圣徒的天国’。”这类故事包含了一些纯属虚构的细节:每到复活节,牧师及其副手们大概都会在鲸的背上做弥撒。他们造访“水晶柱”(那可能是冰山)和“火岛”。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忽视这些传说。当挪威人第一次到达冰岛时,爱尔兰修道士正生活在这个岛上,岛上的火山爆发可能把它变成了一个“火岛”。^[40]

美国历史教科书是如何对待这两种航海传说的呢?我一开始所考察的12本教科书中,有5本承认爱尔兰人航海的可能性。对此,《自由的挑战》论述得最为充分:

一些人相信,……爱尔兰传教士曾在哥伦布首航之前几百年就到过美洲。根据爱尔兰传说,爱尔兰修道士跨越大西洋,向他们所遇到的人传

播基督教。有一个爱尔兰传说还具体讲到亚速尔群岛西南部的一座岛屿。这座岛据说是由一位名叫“圣布伦丹”(St. Brendan)的爱尔兰传教士于公元500年左右发现的。

然而,没有一本教科书——无论新旧版本——提到西非人。

撇开哥伦布的那些前辈不说,美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这最后一位“发现者”时,仍然是错误不断。它们只提供删减过的、干巴巴的答案,并且大多是在赞美哥伦布,它们总是避免谈论不确定性和有争议的观点。通常,它们的错误似乎是从其他教科书中照搬过来的。让我们再看一次它们所共同讲述的那个关于哥伦布的故事,这次,对那些我们有坚实的理由去相信的内容,我都加下划线标示。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的一个下等家庭,成年后成为一名有经验的海员。他在大西洋的航行最远曾到达冰岛和非洲西部。他的冒险经历使他深信地球是圆的。因此,可以向西航行取得传说中的东方财富——香料、丝绸和黄金,而不需通过传统的那条穿越中东的陆上商路,而后者作为商路已经被土耳其人中断了。为了筹集活动所需的经费,哥伦布向西欧各国君主四处游说。在一开始,他遭到了西班牙王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拒绝,但最后,机会终于来了——伊莎贝拉女王承诺支付一次适度的远征的费用。哥伦布配备了三艘可怜的小船——“尼娜”、“平塔”和“圣玛利亚”,从西班牙出发。经过两个多月艰苦的旅程,期间哗变的船员差点把他丢进大海,哥伦布终于在1492年10月12日发现了西印度群岛。虽然哥伦布后来又进行了三次到美洲的航行,但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他没有得到赏识,在贫困中默默死去。然而,如果没有他的勇气与胆量,美洲的历史将变得非常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哥伦布使一切变成可能。

48

如你所见,教科书关于日期与船只的名字都说对了。但是,它们所告诉我们的其他内容就是不值得信任的。哥伦布一生有很多未解之谜。他说自己来自意大利的热那亚,也确实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是也有证据证明它不是如此。哥伦布似乎不能用意大利文写信,即便在给热那亚人写信时也是如此。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是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后来才皈依了基督教。(西班牙当时迫害犹太人,迫使他们要么改宗,要么离境。)他也可能一度是热那亚的犹太人。还有一些历史学

家指出,他来自科西嘉、葡萄牙或别的什么地方。^[41]

哥伦布的阶级背景如何呢?有一本教科书告诉我们他是穷人,是“一个贫穷的热那亚纺织工人的儿子”;但另一本教科书告诉我们他是富人,是“一个发迹了的羊毛纺织商的儿子”。这两本教科书都振振有词,但多年倾心研究哥伦布的学者们却告诉我们不能相信这些说法。

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哥伦布自己想要去哪里。有证据表明,他是在寻找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有证据表明,他想要到达通往西方的“新”土地。几个世纪以来,每一种观点都有历史学家赞同。拉斯·卡萨斯指出,由于“印度的巨大财富闻名遐迩”,哥伦布的目的就在于“劝说对他的计划总是怀疑的国王相信自己将启程寻找的是一条向西通往印度的航线。”^[42]哥伦布传记作家柯克帕特里克·塞尔最近在查阅了这一证据后总结道,“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证实这一切。”塞尔指出,这样的结论“对于那些在自己的历史故事中寻求确定性的人来说,是很不令人满意的。”^[43]可以预料,我们的教科书都属于这一套路:人人都“知道”他在寻找日本和东印度群岛。这样,教科书作者们不让读者知道:历史学家并非无所不知,历史学也并不只是死记硬背的课程。

教科书之间有时说法不一,特别是每一本教科书都似乎对自己所宣讲的内容确信不疑,这足以令人惊叹。哥伦布1492年航行时的天气如何?根据《希望之地》,他的船队“被风暴击毁”;但是《美国的经历》又说,他们航行在“平静的大海”上。这次航行历时多久呢?根据《自由的挑战》,“在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后,”船员们看见了陆地;但是《美国的冒险历程》说,航行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哥伦布到达时,美洲是什么样子呢?有一本书引用哥伦布的话说,“人口稠密”,但另一本书又说,“人烟稀少”。

为了制造一个更好的神话,美国文化一直推崇这样的观点:当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他的船员都认为地是平的时,哥伦布仍然大无畏地前行。1991年版的《美利坚盛典》是唯一一本仍然采用这一谬论的教科书。根据该书,“迷信的海员们渐渐躁动不安起来,”因为他们“担心航行到世界的边缘之外去。”实际上,到1492年,大西洋两岸已很少有人认为地是平的。大多数欧洲人以及美洲的土著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地球看上去是圆的,地球在月亮上投下圆形的阴影。海员们能看见这个圆,他们目睹船队在地平线上消逝,一开始是船身,接下来是船帆。

华盛顿·欧文在1828年将地球是平的这一假说普及开来,并因此赢得好评。在他那本畅销的哥伦布传记中,欧文描写了哥伦布据说曾在萨拉曼卡大学的“地平说”专家面前捍卫“地圆说”。欧文本人对这一故事的虚构性心知肚明。^[44]他可能

认为,这个故事可以产生戏剧轰动,但没有什么坏处。但是,恰恰就有坏处。它让我们认为,在得到思想前卫的欧洲人的帮助之前,这个世界的“原始人”——不可否认,也包括前哥伦布时代的欧洲人——对于自己所赖以生活的这个星球知之甚少。它还把哥伦布变成了一位有科学头脑的人,是他纠正了我们错误的地理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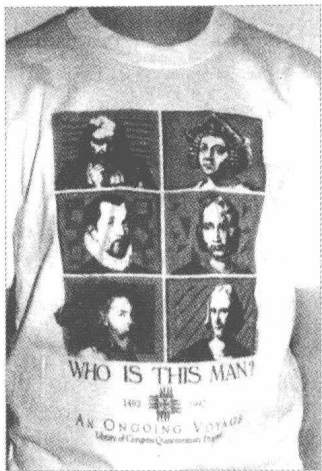


图2 这个人是谁?

大多数教科书都印有哥伦布的肖像。这些半身像作为历史文件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在我们所掌握的这些数不胜数的图像中,没有一副是在他在世时绘制的。这些图像是仿冒的,为指出这一点,国会图书馆发售这样的T恤衫,上面印了六幅不同的哥伦布的面相。

在1992年哥伦布航海500周年之际,人们对“地平说”故事提出了激烈的驳斥,这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到1994年,甚至连《美利坚盛典》也剔除了那些“地平说”语句。“迷信的海员们……渐渐焦躁不安起来”,只是因为他们的“害怕会驶入未知的汪洋”,今天看来,这是一种经过谨慎修改的表述。不幸的是,那些自己知道“地平说”故事的教师们,却不会从这一表述中推断出这个故事是错误的。^[45]布尔斯廷与凯利要比其他教科书更直接挑战这一传说,但再次使用这样一种完全无效的话语:“在哥伦布时代,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以及大多数海员都认为地球是球形的。”诚然,这句话平静地指出,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地平说”。但是,这句话又暗示,“地圆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观点。在阅读诸如布尔斯廷与凯利的教科书时,无论教师还是学生也都不会挑战这些作者提出的哥伦布证明了地球是圆的这一说法。这样,很多教师就仍然在有意无意地向学生传递关于“地平说”的那一故事。



哥伦布恳求国王资助一项前景可观的事业，西班牙，1489年。

Without project funding, the world might still be flat.

图3 “没有投资，大地将仍是平的。”

美国文化一直宣传这样的观点：当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他的船员都认为地是平的时，哥伦布仍然大无畏地前行。比如，在电影《星际旅行V》中，有个角色就反复说着华盛顿·欧文的这样一句话：“你们的人一度相信地是平的，但哥伦布证明地是圆的。”每年10月，麦迪逊大道都在“地平说”上借题发挥。这幅广告就是为那些大无畏的股票经纪人寻找客户。面对我们文化中的这些图片，历史教科书需要为学生解开那个关于“地平说”的神话。

甚至哥伦布的死也被改编成一个美好的故事。让哥伦布的一生以悲剧而告 51
终——死于疾病、贫穷以及怀才不遇——会增强戏剧效果。《美国的冒险历程》
说：“哥伦布的发现并没有立即得到西班牙政府的赏识。”布尔斯廷与凯利也总结
说：“他于1506年默默地死去。”“他最终收获的只是不幸与羞辱。”他们还加上一
句：“他至死都相信自己抵达了亚洲的海岸。”事实上，西班牙“很快就赏识了”哥
伦布的“发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立即赞助他再次发起更大规模的航行。1499
年，哥伦布在海地“收获”了一个主要的金矿。他与他的后继者们迫使成千上万的
土著人为自己采掘金子。大笔钱财源源不断地流进在西班牙的哥伦布手中。或许

哥伦布还认为自己应得的不止如此,可那些钱财足以让他成为一个土皇帝。哥伦布死时安享富贵,为子嗣留下大笔钱财,甚至还有头衔——“大洋司令”,这个称号一直传到他今天的第18代子孙。此外,哥伦布自己的航海日记也清楚地表明,他当时知道自己到达了一个“新”大陆。^[46]

我也认为,教科书作者们堆砌的某些细节是无伤大雅的,比如,他们虚构说,在哥伦布出航之后,伊莎贝拉即刻修书一封飞递给哥伦布,愿意以自己的珠宝做抵押,资助他探险。^[47]然而,所有这些添油加醋的做法都美化了哥伦布,夸大了他的伟业,目的是使学生认同他。下面是《希望之地》的一段话:

1492年10月,三艘遭遇风暴的小船在海上迷失方向,航行到一片未知的海域。一位吓坏了的的船员一直威胁要把他们的顽固的船长丢进大海,把船掉头,停靠到熟悉的海岸。

这时,奇迹出现了:水手们看见海面上漂浮着一些绿色的树枝。陆地上的鸟在头顶盘旋。高高的帆索上的瞭望员大喊:“陆地,前方有陆地!”恐惧变成了欢喜。很快,感动不已的船长踏上了海岸,向上帝表示感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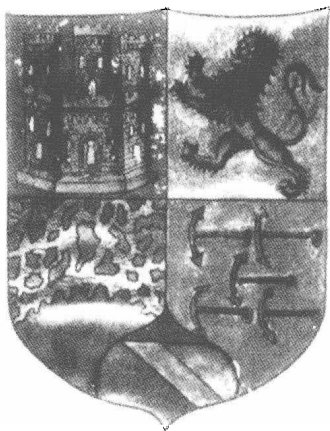


图4 航海图

当哥伦布在其第三次航海中绕委内瑞拉海岸航行时,驶入过奥里诺科河。他写道,“我开始相信,这是一块巨大的大陆,至今不为人知。”“这条巨大的河流,这片新奇的大海,都使我对这一看法深信不疑。”哥伦布知道,单凭一座岛,是不会有如此大的水流的。返航后,他在自己的两只衣袖上所画的那些岛屿间添加了一块大陆。它出现在坐标的左下象限的底部,这对美国历史教科书作者们的视觉神经是个很大的刺激。

今天人们知道,实际上,“尼娜”、“平塔”和“圣玛利亚”三艘船都没有“遭遇风暴”。为了编造一个更好的神话,教科书作者们希望航行比本来的更艰险,因此,他们捏造出恶劣天气。哥伦布则在自己的航海日记揭示,那三艘船航行得很顺利。大海一度连接几天风平浪静,以至于水手们能够从这艘船换到那艘船。实际上,唯一一次它们经历的海浪也不是特别大,并且当时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离陆地不远了。

为了编造一个更好的神话,为了使航行显得比本来的更漫长,大多数教科书都忽略哥伦布在加那利群岛的滞留。他们穿过这片未知的大西洋海域上花了一个月时间,而不是两个月。

为了编造一个更好的神话,教科书把哥伦布的船只描写为短小无用的,但实际上,正如海军作家彼得罗·巴罗奇指出的,“这三艘船完全符合哥伦布的要求。”^[48]

为了编造一个更好的神话,一些教科书把船员的抱怨夸大成差不多快造反了。在这方面,有一些不同的一手资料。一些资料断言,哥伦布丧失了信心,而其他两艘船的船长劝他坚持。还有一些资料提出,三个头头开会,最后同意再向前航行几天,并对形势做了重新估计。在研究了这一问题后,哥伦布传记作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把抱怨降为仅仅是牢骚:“他们只是互相使对方神经紧张,就像日常发生的一样。”^[49]至于船员们威胁要把哥伦布扔进大海,也是如此。

这种夸张并非完全无害。在其外表之下,潜伏着另外一种社会定见:那些主 53
导着社会事业的人比社会底层的人更有智慧。一位名叫比尔·比奇洛的中学历史教师曾经指出:“海员们愚蠢、迷信、胆小,有时还诡计多端;而另一方面,哥伦布勇敢、英明而正直。”这类描述沦为“反工人阶级、颂扬老板阶层的论调。”^[50]实际上,即使在2006年,《美利坚盛典》还在把那些船员说成是“乌合之众”,尽管他们已经了解到地球是圆的。

“圣玛丽亚”号航海日志里的那些错误条文今天被解读为另外一种神话。《合众国的历史》说,“哥伦布是一位真正的领导者。”“他篡改了他们的航行的里程记录,好让船员们不觉得自己已离家太远。”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①令人信服地指出,要相信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认为那次航行中的其他人都是傻瓜。哥伦布“并没有什么独门秘籍,怎么他对航海里程的记录就比其他领航员或师傅们更正确呢?”实际上,作为海航家,哥伦布并不比“尼娜”、“平塔”两艘船的船长平松兄弟经验丰富。^[51]在返航途中,哥伦布在其航海日记中道出了其中的错误记录的真实原因:他想保守通往(西)印度群岛的航线的秘密。^[52]

为了编造一个更好的神话,我们的教科书还花很多篇幅去介绍其他的人性化的细节。它们让瞭望员高喊“陆地!”大多数教科书都告诉我们,哥伦布上岸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感谢上帝引导他们平安地穿越大海”——但哥伦布本人的航海日记的一些残篇所表明的只是:“当着众人的面,他宣称为国王和王后陛下占领这块陆地,好像他实际上已经占领了一样。”^[53]很多教科书谈到哥伦布的后三次美洲航行,但是大多不花笔墨告诉我们哥伦布是如何对待他所“发现”的那些

①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西班牙现代学者、外交家。

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的。

由哥伦布开始的两种现象,使种族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现代世界:其一,从西半球的土著居民手中掠夺土地、财富和劳动力;其二,导致那些居民近乎灭绝,导致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的出现并造就了劣等种族。

哥伦布对加勒比海众多岛屿上的居民阿拉瓦克人的最初印象是相当好的。他在 1492 年 10 月 13 日的航海日记里写道:“黎明时分,一大群男人来到海岸, 54 他们都很年轻、体型不错且长得很帅气。他们的头发没有卷曲,而是蓬松而粗糙的,像马鬃一样。所有的人都前额宽大,比我见过的其他人都要宽大。他们的眼睛又大又漂亮。他们肤色不黑,而是像加那利群岛的居民的那种肤色。”(此言一语成讖,西班牙人当时正在灭绝那些岛屿上的土著居民。)哥伦布接着写到阿拉瓦克人的独木舟,“有些很大,足以容纳 40 到 50 人。”最后,他落笔到做生意上:“我特意留意他们,费尽周折去了解他们是否有金子。我看见他们有些人用小块金属挂在鼻子上,我就通过打手势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如果一直往南走,绕着岛屿航行,就会找到一位国王,他拥有大块大块的金子。”第二天一早,哥伦布就朝着岛的另一侧航行,或许到达了巴哈马的某座岛屿,他看见了两三个村落。在描写这些村落的最后,他恶狠狠地写道:“我只要带 50 人就能把他们全部征服,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治理他们。”^[54]

在第一次航行时,哥伦布把 10 到 25 个美洲印第安人强行带回西班牙。^[55]但最后只有七八个活着到达。哥伦布还带回了鹦鹉、黄金饰品及其他新奇古怪的东西,这在赛维利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又送给哥伦布 17 艘船、1200 到 1500 人,还有大炮、石弩、枪支、骑兵和猎犬,资助他再次远航。

看一看 H. G. 威尔斯的著名科幻故事《星际大战》,有助于我们去想象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H. G. 威尔斯讲述了一个地球人遭遇技术更加先进的外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寓意深远。他所塑造的英国平民(由奥森·威尔斯改编的著名广播剧中的新泽西人)类似于加那利群岛或美洲的“原始”人,而他笔下令人生畏的外星人代表着技术先进的欧洲人。我们就是那些无助的地球人,威尔斯希望我们能够对 1493 年海地的土著人、1788 年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以及今天亚马逊丛林里的人寄予同情。^[56]

当哥伦布及其随从 1493 年再次达到海地时,他们想要得到当地人所拥有的一切——食物、黄金和棉纺织品,他们甚至希望与土著妇女发生性关系。为确保对方合作,哥伦布采取种种惩戒措施。印第安人即使有轻微的冒犯,也会被西班牙人割下耳朵或鼻子。这个被毁容的印第安人还会被送回他的村庄,以作为鲜活的例子来证明西班牙征服者的凶狠。

很快，土著人忍无可忍了。他们一开始的反抗大多数还是消极的。他们不再耕种庄稼，以免西班牙人不劳而获。他们离开那些与西班牙人定居点毗邻的城镇。最后，阿拉瓦克人奋起还击。但是，他们的木棍和石头在全副武装的西班牙人面前不再有效，就像《星际大战》里地球人的枪支在外星人的致命射线面前一样。

土著人的反抗为哥伦布提供了战争的口实。1495年3月24日，他出兵征服了阿拉瓦克人。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描述了哥伦布镇压反叛时所装备的武器。

司令（指哥伦布——译者按）察觉到，那座岛上的人正日益武装起来——其实那些武器简陋得可笑……他急不可耐地要开赴那些村庄，用武力驱散和征服整个岛屿上的居民……为此，他选拔了200名步兵、20名骑兵，还带上大量石弩、轻型火炮、标枪、剑，还有一种比马更令印第安人生畏的武器——20只猎犬，它们一旦被放出去就能立即将印第安人撕成碎片。^[57]

很自然，西班牙人赢了。柯克帕特里克·塞尔引用哥伦布的儿子斐迪南德·哥伦布关于父亲的传记说道：“士兵们对他们扫射，像割草一样使他们一排排地倒下，并放出猎犬撕裂他们的肚子和四肢，还在灌木丛里追逐他们，把他们叉在剑与长枪上。就这样，‘在上帝的帮助下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屠杀了许多印第安人，并在随后捕获并屠杀了其他的土著人。’”^[58]

由于没能找到黄金产地，哥伦布不得不向西班牙退回部分股本。1495年，海地的西班牙人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猎捕奴隶的活动。他们包围了1500名阿拉瓦克人，从中选出500名最强壮者送回西班牙（其中又有200人死于途中）。另外500名被选做奴隶，供留在岛上的西班牙征服者役使。剩下的都被释放了。一位目击这一场景的西班牙人描述道：“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妇女，怀抱着吃奶的婴儿。妇女们为了更好地逃脱，就把婴儿随便扔在什么地方，绝望地逃走了。由于害怕被我们再次抓到，她们有的跑了七八天，跨越大山大河，远离我们的伊莎贝拉定居点。这就是为什么这里从此人烟稀少的原因。”^[59]哥伦布激动不已，他1496年写信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说道：“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我们可以从这里输出所有可出售的奴隶和巴西木材。”“在卡斯提尔、葡萄牙、阿拉贡……以及加那利群岛，他们都需要大量奴隶。而我认为他们没有从几内亚得到足够的奴隶。”他对印第安人的死亡率感到满意：“虽然他们现在死掉了，但他们不会总这样死下去。最先死掉的是黑人和加那利群岛的人。”^[60]

用汉斯·科宁^①的话说,“从此,伊斯帕尼奥拉岛(今海地——译者按)的恐怖统治开始了。”西班牙征服者猎杀美洲印第安人,只是为了消遣;或者把他们杀了,只是为了喂狗。而哥伦布相信这座岛上一定有金子,只是自己不能确定它的位置,因此懊恼不已,于是建立了一种贡赋制度。斐迪南德·哥伦布描述了这种制度的实施情况:

(印第安人)都答应每三个月向天主教君主进贡一次,方式如下:在金矿所在地西堡(the Cibao),每个14岁及以上的人都要缴纳一大鹰嘴钵的金砂,其余的每人缴纳25磅棉花。印第安人缴完了自己的贡赋后,就得到一块铜的或者镀铜的牌子。他必须将这块牌子挂在脖子上,以证明自己已经交纳了。任何印第安人,只要被发现没有这块牌子,都要受到惩罚。^[61]

有了这块牌子,土著人就可以安然度过三个月。而这三个月里的主要时间还是要被用以搜罗更多的金子。这位哥伦布之子忘了提到西班牙人是如何处罚那些牌子已过期的人的:砍掉他们的手。^[62]

所有这些可憎的事实,都能在拉斯·卡萨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第一手材料,如哥伦布及其探险队其他成员的书信中找到支持。拉斯·卡萨斯是美洲的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用第一手材料写作,并且竭力保存好这些材料。我在本章引用了很多第一手材料,而大多数教科书都不用第一手材料。有些教科书引入了一些简短的摘录,这些摘录经过精心选择,它们被编到一起的目的只是为了展现大航海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比如,《美利坚之旅》引用了我以上提到的关于阿拉瓦克人很“帅气”的那段话,但它就此打住,而没有说哥伦布是如何“用50个人随心所欲地治理他们”的。^[63]

这一贡赋制度后来逐渐被废止,因为它的要求不可能实现。于是,哥伦布用“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取而代之:他把所有的印第安村庄赠与或“推荐”给殖民者个人或群体。由于这种强迫劳动制度不能被称为奴隶制,因此避免了一般奴隶制所受到的道德谴责。西班牙人效仿哥伦布,于1502年在海地使这种“监护征赋制”成为官方政策,其他征服者随后又把这一制度引入墨西哥、秘鲁和佛罗里达。^[64]

贡赋制度和“监护征赋制”导致了惊人的人口锐减。在海地,殖民者们驱使阿拉瓦克人为自己开采金矿、种植西班牙食物,甚至把他们随身携带到各个地方。

① 汉斯·科宁(Hans Koning),当代美国历史学家。

阿拉瓦克人不堪忍受。佩德罗·迪·科多巴 1517 年在给斐迪南国王的一封信中写道：“印第安人不堪忍受苦难与艰辛劳动，正在或已经选择自杀。有时候，成百人会集体自杀。妇女们由于劳动的折磨，不愿意怀孕，不愿意生孩子……很多妇女在怀孕后服用药物流产。其他妇女在生下小孩后亲手杀死自己的婴儿，以便不把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受压迫和奴役。”^[65]

除了这些针对人的残忍行为外，西班牙人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与土著文化。他们强迫印第安人在矿井而不是在自己的园地里劳动，这使他们的营养系统普遍失调。兔子与家畜加剧了生态灾难。传到美洲的新疾病扮演了毁灭性的角色，其中包括猪流感——这种疾病可能是通过哥伦布 1493 年第二次航行到达海地时带来的猪而产生的。^[66]一些阿拉瓦克人试图逃到古巴，但是西班牙人很快尾随而至。一些对前哥伦布时代海地人口数的估计显示，当时的人口数达到 800 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回到西班牙时，留下自己的兄弟巴托罗缪管理该岛。巴托罗缪在 1496 年发起了一项对成年印第安人的人口普查，得出的数据是 110 万。西班牙人并未统计 14 岁以下的儿童，也无法统计那些逃到山区的阿拉瓦克人。柯克帕特里克·塞尔估计，更准确的数字应该在 300 万左右。而根据本杰明·基恩的说法，“到 1516 年，由于哥伦布所发起的邪恶的印第安人奴隶贸易及劳工政策，只有 12000 人活下来。”拉斯·卡萨斯也告诉我们，1542 年，只有不到 200 名纯海地血统的印第安人还活着。到 1555 年，他们就全死光了。^[67]

相比与“陆地”亲密接触之类的细节，诸如砍手的肮脏细节具有某种更为重要的意义。哥伦布不止是送出了第一批奴隶到大西洋彼岸，他送出的奴隶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送出的都要多——大约有 50000。出于尊严，伊莎贝拉女王反对赤裸裸的奴隶活动，曾把一些美洲印第安人送回加勒比。但是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哥伦布。1501 年，葡萄牙人开始使拉布拉多人口减少，把贝奥图克印第安人运到欧洲和佛得角作为奴隶，今天，贝奥图克印第安人已经灭绝。当英国人在北美大西洋 58 海岸建立据点之后，他们怂恿海边部落去抓捕和贩卖其他边远部落的人。查尔斯顿、南卡罗莱纳成为美洲印第安人奴隶的主要输出地。1637 年，“始祖移民”等清教徒们在百慕大将皮科特战争的幸存者当作奴隶卖。1731 年，法国人实际上把整个纳齐兹人部族拷上锁链，用船运往西印度群岛。^[68]



图5 《哥伦布登上巴哈马群岛》

《美国历史》收录了油画《哥伦布登上巴哈马群岛》(如上),这幅画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圆形大厅收藏的八幅大型绘画中的第一幅。这幅约翰·范德林 1847 年的作品可以说明大多数教科书对哥伦布的英雄化做法。

西奥多·狄百瑞大约 1588 年所作的木刻画(如下)或许是对哥伦布的事业的另外一种再现。狄百瑞用自己的刻刀描绘了印第安人在自虐、服毒、跳崖、自缢、杀婴等场景。艺术家将所有这些致命之举融为一体。狄百瑞所描绘的图像本身就足以成为重要的历史文件。它们与拉斯·卡萨斯的著作一道,在 16 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形成了关于西班牙人凶残行径的“黑色传说”。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也借此抨击西班牙人的殖民主义,当然,大多是出于嫉妒。没有教科书收录了对哥伦布及其随从的那些并不光彩的行为的视觉描述。

奴隶贸易中令人憎恶的另一面就是性。1493 年,在探险者们尚未到达海地之前,哥伦布一踏上加勒比海的土地,就奖励他的副官们去奸淫土著妇女。^[69]在海地,性奴隶是西班牙人最喜爱的又一种奖赏。哥伦布于 1500 年写信给朋友道:“用 100 个卡塞蓝^①就可以买到一个妇女,就像买农庄一样;这种情况很普遍,大量商人在四处寻找姑娘,连那些 9 到 10 岁的小女孩也在需求之列。”^[70]

奴隶贸易与新的疾病摧毁了整个美洲印第安民族。印第安人在奴役中死去。为取代日渐灭绝的海地人,西班牙人从巴哈马群岛运来了数以万计的印第安人,西班牙历史学家彼得·马特 1516 年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巴哈马群岛“现在一片荒芜”。^[71]他们把奴隶们塞在甲板下面,为防止他们逃跑,他们紧锁舱门。在旅途中,奴隶大批死亡,以至于“一艘船没有罗盘,没有航海图,也没有向导,但仅凭被扔进大海的印第安人的尸体所留下的轨迹,就能找到从巴哈马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路线”,拉斯·卡萨斯这样悲叹道。^[72]下一个,就是波多黎各与古巴。

① 卡塞蓝,castellanoe,一种西班牙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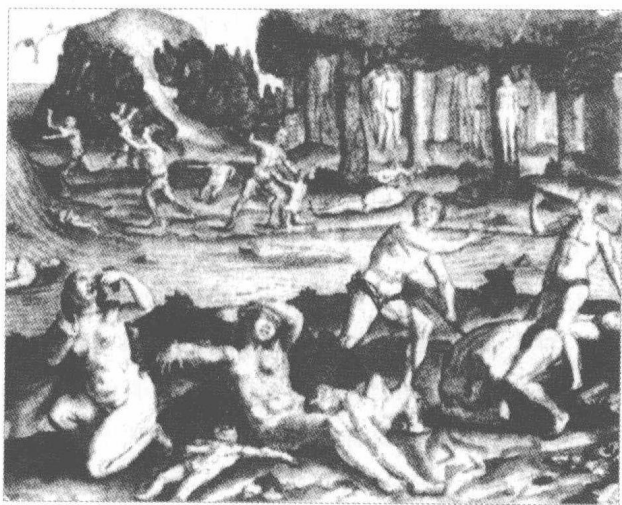


图6 狄百瑞的木刻画

由于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印第安奴隶贩运催生了另外一条大规模奴隶贸易的路线:来自非洲穿越大西洋的路线。这种贸易也是始于海地,由哥伦布的儿子于1505年发起。可以想象,后来,当黑人与美洲印第安人1519年联合起来时,海地成为第一个发生大规模奴隶反叛的地方。起义历时十余年,最终被西班牙人于16世纪30年代扑灭。^[73]

有一本新教科书^①《美国人》揭示了海地的那场冲突。该书还引用了拉斯·卡萨斯的下面这段话,以说明海地起义还只是个开始:“这种战术从这里开始,(将很快)蔓延到整个印度群岛,并且只有当地球上的这一区域再也没有人口和岛屿去征服和破坏的时候,它才会结束。”在我最初所考察的12本教科书中,《美国的冒险历程》把哥伦布与奴隶制联到一起。有一本新教科书和一本旧教科书只是说了句“事实证明,哥伦布作为船队司令要比作为总督好得多”或类似的话,就一笔带过了。而其他的教科书,不管新旧,大多对哥伦布大加称赞。

60

显然,大多数教科书都不打算教给我们关于哥伦布的真实历史。它们的使命似乎在于“培养品性”。因此它们把哥伦布当作一个起源神话:他是好样的,所以我们也是好样的。^[74]1989年,乔治·H. W. 布什把哥伦布奉为国家的典范:“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不仅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而且为我们所有的人树立了榜样,告诉我们通过坚持与信仰可以取得彪炳史册的成就。”^[75]专栏作家杰弗里·哈特甚至说,“诋毁哥伦布就是诋毁人类历史上以及我们所有人中间的有价值的东

① 本书所言“新教科书”系指出版于初版《老师的谎言》(1995年)之后、作者在写作这个修订版时所补充考察的六本美国历史教科书。详见本书“附录”。

西。”^[76]那些借哥伦布来“培养品性”的教科书作者们,显然没有兴趣去讲述他踏上美洲的土地伊始就对美洲人所做的事情——尽管这是另一半历史,或许还是更重要的一半历史。

柯克帕特里克·塞尔用诗歌般的语言总结道:哥伦布的“第二次航海标志着欧洲社会与印第安社会的第一次广泛接触,文化碰撞的回声响彻此后的五个世纪。”^[77]《美国人》的作者们一定读过塞尔的著作,因为他们写道:“(海地)标志着接下来五个世纪的文化碰撞的开始。”关于1493年到1500年之间的海地的一些细节,其他教科书所忽略或掩盖的远远不止于此。而那些细节对于理解美洲与欧洲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比如,约翰·史密斯船长视哥伦布为榜样,他在1624年对弗吉尼亚的印第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强硬政策:“关于如何压制他们,已经讲得太多了,大家也都没什么意见,我这里就不提了。你们也可以通过很多的例子,去了解西班牙人如何得到西印度群岛,如何强迫桀骜不驯的异教徒像奴隶一样为自己做所有的苦差事,而他们自己则活得像个士兵,监管着那些人的劳动成果。”^[78]实际上,哥伦布开创的那些手段构成了他的主要遗产。毕竟,它们屡试不爽。这座岛屿被治理得一片安宁,以至于那些西班牙罪人们如果有第二次机会进入海地,他们能够“想去哪就去哪,想带多少妇女或姑娘都可以,带什么都可以,甚至可以让印第安人驮着他们,似乎那些人都是一群骡子。”^[79]1499年,哥伦布终于在海地发现了数量巨大的金矿,西班牙成为欧洲羡慕的对象。1500年以后,葡萄牙、法国、荷兰和英国加入了征服美洲的行列。这些国家的凶残程度比西班牙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英国人与西班牙人不同,他们并不征用土著劳动力去拓殖,而是直接强迫印第安人滚蛋。很多美洲印第安人从英国殖民地逃到西班牙领地(佛罗里达、墨西哥),以寻求较“人道”的待遇。 61

哥伦布的航海给美洲带来的变化与给欧洲带来的变化不相上下。农作物、动物、思想观念、疾病开始不断地穿越大洋两岸。哥伦布的发现所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或许表现在欧洲基督教上。1492年,整个欧洲都被控制在天主教会之下。正如《拉鲁斯百科全书》所指出的,在发现美洲之前,“欧洲人根本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80]发现美洲之后,欧洲人的宗教统一局面被打破了。因为,如何解释那些被新发现的人呢?《圣经》没有提到过他们。美洲印第安人并不符合正统基督教关于道德世界的解释。而且,与穆斯林不同——他们或许可被当作“可恶的异教徒”一笔勾销,美洲印第安人并不抵触基督教,他们只是从未接触过它。他们是否该下地狱?甚至连美洲的动物也构成对宗教的挑战。根据《圣经》,在创世之初,所有的动物都生活在伊甸园里,后来,每样选了两个进入诺亚方舟,最后停泊在亚拉腊山。既然伊甸园和亚拉腊山都在中东,那么这些新发现的美洲物种从何而来

呢？这类问题动摇了正统天主教，促进了1517年开始的新教革命。^[81]

从政治角度看，像阿拉瓦克人这样的民族，没有君主，也没有什么等级制，这很让欧洲人震惊。托马斯·莫尔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可能就是以秘鲁的印加帝国为基础而写的。该书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更高级的社会模式，这是对欧洲社会组织的挑战。另外一些社会哲学家把美洲印第安人当作欧洲历史上原始阶段的活生生的例子，约翰·洛克所说的“最初，整个世界都像美洲一样”就是这个意思。一些欧洲人根据自己的政治理论，把美洲印第安民族盛赞为小国寡民的良好国度的典范，并认为欧洲文明就是从中发展而来的。而另外一些欧洲人则把他们污蔑为原始的、不发达的。不管是哪种观点，从蒙田、孟德斯鸠、卢梭，一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欧洲思想家关于好社会的观念都是借鉴对美洲的认识转变而来的。^[82]

美洲不仅令普通民众好奇，也令精英分子着迷。在《暴风雨》中，莎士比亚指出了这种普遍存在的好奇心：“他们不愿出一文钱救济一个跛脚的乞丐，却愿出十文钱看看一个死了的印第安人。”^[83]事实上，欧洲人对美洲的着迷直接导致了欧洲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从一开始，美洲就被视为欧洲的“对立面”，在这一点上，其程度甚至超过非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1492年之前没有所谓“欧洲人”，只有托斯卡纳人、法国人等等。现在，欧洲人至少在与土著美洲人相对照时，开始找到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就此而论，1492年之前，也无所谓“白人”。由于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首先是印第安人奴隶贸易，接下来是非洲人奴隶贸易，欧洲人逐渐把“白人”看做一个种族，把种族看做人类的一个重要特征。^[84]

哥伦布自己的著作也反映了这种不断增长的种族主义倾向。当哥伦布向惊叹不已的印第安人兜售伊莎贝拉女王时，印第安人“体格匀称”，并且“思维敏捷”。他写道，“他们民风淳厚，国王将一个非凡的国家管理得如此井然有序，看见这样的国家真是一件快事。他们记忆力好，他们看这看那，问它们是什么，怎么用。”后来，当哥伦布转而为自己的战争行为以及对土著人的奴役行为辩护时，土著人就变得“残忍”而“愚蠢”，变成“好战而人口众多，其风俗与信仰与我们的迥然不同。”

把那些被征服或即将被征服的人想得很坏，总是有益的。根据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①的说法，修改自己的观念，使之符合自己的行为或计划中的行为，是那种被称为“认知失调”过程的最为常见的结果。没有人愿意把自己想作一个坏人。把一个我们看来完全符合人性的他人视为坏人，会在行为与态度之间

^① 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 1919-1989),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提出“认知失调理论”。

造成紧张;这是需要解决的。我们不能抹去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改变将来的行为也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而改变态度就比较容易。^[85]

哥伦布在美洲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认知失调的有案可循的例子。虽然土著人可能由好客变为易怒,但他们也几乎不会这么快就从聪明人变成笨蛋。改变一定是发生在哥伦布身上。

美洲的影响还远不止在思想上。非洲及欧亚大陆人的胃口也受到了影响。今天世界各地生长的主要农作物几乎有一半来自于美洲。根据小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研究,把玉米添加到非洲人的食谱上,导致了人口的增长,这又有助于非洲到美洲的奴隶贸易;把马铃薯添加到欧洲人的餐桌上,导致了16、17世纪的人口爆炸,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为欧洲向美洲与澳大利亚的移民提供动力。来自美洲的农作物还对英格兰、德意志以及俄罗斯的先后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国家的崛起使欧洲的权力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北方。^[86] 63

在哥伦布的船队第二次回到欧洲之后不久,梅毒开始肆虐西班牙和意大利。这其中应该有因果关联。另一方面,人们从植物中提取了200多种药物,它们的药效已经被美洲印第安人发现。^[87]

对美洲的探险也改变了欧洲的经济。西班牙首先富裕起来。然后,通过贸易与海盗行为,其他国家也富裕了。哥伦布在海地发现了金子,但没过多久,在墨西哥与安第斯山脉的金银发现面前,这一发现相形见绌了。欧洲的宗教与政治领袖们很快积累起大量的金子,他们用金箔装饰教堂和宫殿的天花板,在大厅的角落竖立起黄金塑像,并用金质的葡萄藤缠绕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些财富“为商业、航海和工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一些作家称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工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可能已经上路,但美洲的财富至少在这场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来自美洲的金银取代土地成为财富与地位的来源。新商人阶层的力量不断增强,这使得他们很快成了世界的主宰。^[88]在那些被穆斯林国家压制的欧洲地区,新的财富动摇了伊斯兰教的力量。美洲的金银造成了400%的通货膨胀,这削弱了大部分非欧洲国家的经济,并帮助欧洲发展起全球的市场体系。非洲遭殃了:由于美洲能比黄金海岸付得起更多的金银,横跨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崩溃了。非洲商人现在只有一件商品是欧洲所需要的,那就是奴隶。用人类学家杰克·魏泽福的话说,“非洲人于是成为美洲大发现的牺牲品,就像美洲印第安人一样。”^[89]

这些巨大的变化被称为“哥伦布交换”;这一术语源自小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1972年的同名著作。20世纪90年代,在哥伦布500周年之际,这一术语开始流行。虽然在我最初考察的教科书中,没有一本讲到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地缘政治

意义,但是这一术语逐渐渗透进了美国历史教科书。今天,大多数书籍都赞赏美洲印第安人开发出了重要的农作物。教科书作者们也承认,欧洲人(以及非洲人)把牲畜带到美洲的同时,也带去了疾病。然而,思想的双向交流仍不为人注意,特别是从西向东的交流。

但是,“欧洲中心论”使教科书作者们看不到其他地区对欧洲的贡献,不管 64 是阿拉伯的天文学家、非洲的航海家还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结构。由于拘泥于这种有限的视角,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从来不让我们去思考是什么导致美洲大陆印第安社会——这个社会的财富与城市曾经让西班牙人震惊——衰落成至今仍然贫困的农业社会。教科书还让我们没有机会去欣赏美洲印第安人的思想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样一来,教科书使学生永远无法理解是什么导致世界发展成今天的这个样子,包括欧洲(及其延伸——美国、加拿大等)为什么会胜出。

有些人会批评我在这里对哥伦布形象的展现过于消极。我也不赞同我们应该从高喊“哥伦布是坏人,我们都是坏人”这一口号去开始我们的美国历史课程。教科书应该说明,道德或不道德都不能通过历史来简单地告诉我们。不考虑我们自己的行为和观念,仅仅作为美国的一个成员,并不能使我们更道德或更不道德。历史要远比此复杂。

我们还须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是谁?在墨西哥,哥伦布就不是英雄,虽然墨西哥在文化上比美国更接近西班牙,并且人们也希望能够从西班牙历史上的这位英雄身上找到自豪感。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墨西哥要比美国更具印第安色彩,墨西哥人认为哥伦布是白人和欧洲人。乔治·P·豪斯·开普切(George P. Horse Capture)写道,“没有哪位有思想的印第安人会赞美哥伦布的到来。”^[90]歌颂哥伦布乃是白人历史、而非美洲历史的典型特征。

哥伦布征服海地可以被视为帝国第一批勇敢的创建者们充满勇气与想象力的惊人壮举,但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场血腥的罪行,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大屠杀与奴役就是它绵延不绝的遗产。这两种关于哥伦布的看法都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哥伦布的历史意义恰恰既在于他是英雄的航海家,也在于他是巨大的掠夺者。如果哥伦布只是前者,他可能就是莱夫·埃里克森^①的对手。哥伦布的行为证明了“开拓”这一词的双重含义——壮举与获利。我们的大多数教科书所提供的崇拜性的哥伦布传记和肖像,只能向学生灌输一种对殖民主义的不假思索的接受,这与今天这个后殖民主义时代是极不相称的。用历史学家迈克尔·华莱士的话说,哥伦布神话“使我们接受当前关于世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划分,

① 莱夫·埃里克森(Leif Eriksson),北欧航海家,可能在公元1000前后到达过美洲。

并且认为这种差异是自然的、既定的,而不是发端于哥伦布首航的历史产物。”^[91] 65

如果我们把 1492 年看成三种文化(非洲文化随后到来)的聚会,而非某一种文化的发现,那么我们就更清晰地理解哥伦布及所有的欧洲开拓者与定居者,有几本教科书做到了这一点。“新世界”的提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已经有人在美洲生活了数千年之久。美洲只是相对欧洲人来说才是新的。所谓“发现”,也是一个有问题的说法,因为一个人如何发现他人已经知道甚至拥有的事物呢?教科书作者们在这上面费尽心机,他们竭力超越殖民历史与“欧洲中心论”话语。布尔斯廷与凯利在其著作的第一章一开头就写出这样一句话:“美洲的发现(他们指的是哥伦布的发现——引者)是世界上最惊人之举。”五页后,两位作者又似乎想收回原话:“只是对欧洲人来说,美洲才被‘发现’。数百万土著美洲人已经生活在那里了!”然而,话已出口就收不回来了。布尔斯廷与凯利的整个基调都在于描绘白人对非白人的发现,而非多种文化的互动。实际上,他们过于“欧洲中心论”了,他们甚至不提自己在讲那些同样“发现”了美洲的人时遗漏了“非洲人与亚洲人”。

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言辞是重要的,它能够影响决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使决策看似合理。1823 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裁定,切罗基人由于对佐治亚州的土地的“占有”而享有对这片土地的当然的所有权,白人由于他们的“发现”而拥有对这片土地的最高的所有权。至于美洲印第安人何以在事先没有发现佐治亚州的情况下占有佐治亚州,马歇尔忘了做出解释。^[92]

探险本身通常总是和多种族、多文化联系在一起的。非洲领航员帮助亨利亲王船队的船长学会了如何沿非洲海岸航行。^[93]在 1492 年圣诞节,哥伦布遇到了麻烦,“圣玛利亚”号在海地搁浅。哥伦布派人到附近的阿拉瓦克人镇上求助,“这个镇上所有的人”群起响应,他们带来“很多、很大的独木舟”,“他们很快就清理好了甲板”,哥伦布继续写道,首领“把我们所有的物品放在一座宫殿的附近,直到为我们找到空房子,能够装下我们的所有物品,并安排人看管。”^[94]在最后一次航海中,哥伦布的船队在牙买加失事,当地的阿拉瓦克人逮住了他及随行的 100 多名生还者,并关押了整整一年,直到海地的西班牙人把他们营救出来。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一位名叫威廉·伊拉斯谟的加拿大印第安人指出,“被 66 你们称为伟人的探险家们其实是很无助的。他们像迷路的孩子,是我们的人民照顾了他们。”^[95]卡蒂埃^①的部下 1535 年在蒙特利尔附近染上了败血病,是土著美洲人治愈了他们。土著印第安人还在加利福尼亚为弗朗西斯·德雷克^②修好了“金鹿号”航船,使他能够完成其 1579 年的环球航行。刘易斯与克拉克对西北部太平

① 卡蒂埃(Jacques Cartier),法国航海家,16 世纪到达北美。

② 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 1540?-1596),英国航海家。

洋的远征,沿途得到了美洲印第安人一个部落接一个部落的帮助,其中两名肖肖尼族向导萨卡加威和托比给他们当翻译。当皮利司令发现北极时,那里可能有的第一人既不是欧裔美国人皮利,也不是他的助手非裔美国人马修·汉森,而是他们的四名因纽特人向导,他们的整个探险都受益于这些男女。^[96]我们的历史书的作者们不提这些协助者,在他们的笔下,高傲的西方征服者高居于世界之上,就像罗德岛上的巨人像一样。

只要我们的教科书对我们隐藏有色人种在至少公元前 6000 年至 20 世纪的一系列探险活动中的那些作用,它们就是在鼓励我们把欧洲及其延伸地区视为全部知识与智慧的所在地。只要它们一说“发现”这个词,它们就是在说,白人是唯一重要的人。只要它们只讲哥伦布,而不讲其探险活动的双方情况,它们就是在要求我们确认西方白人的探险活动,而不是去研究它。

图 7 骡子与酋长

一个人骑着骡子缓慢行驶在西班牙的一条满是尘土的小路上,他身披一件又破又脏的斗篷。他的脸看上去很年轻,但他的红头发已开始变白。此时是 1492 年初,哥伦布正要离开西班牙。

他曾两次向西班牙国王与王后索求船只,但都遭到拒绝。他希望得到他们的赞同,为此浪费了 5 年的时间。现在,他要去法国了。或许,法王会赠给他所需要的船只。

哥伦布听见一阵啾啾声。他转过身朝大路望去,一匹马正疾驰而来。骑马人递给他一封信,哥伦布于是调转骡子往回走。信是西班牙国王和王后送来的,他们命令他返回。哥伦布能得到自己的船队了。

一天,得知西班牙人要来,(酋长)把众人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西班牙人对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居民的迫害:

“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迫害我们吗?”

众人回答:“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是残忍的坏蛋。”

“我来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这样做”,酋长说道,“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位神,他们非常热爱它。我来展示给你们看。”他举起一只用棕榈做成的小篮子,里面满是金子,说道:“这就是他们的神,他们伺候他,崇拜他……为了拥有这样一位神,他们让我们遭受苦难;为了这位神,他们迫害我们;为了这位神,他们杀死我们的父母、兄弟和所有同胞……让我们不要再将这位神东躲西藏,免得基督徒们发现它,因为即便我们把它藏到肚子里,他们也会把它挖出来。因此,让我们把它扔进河里,沉到河底,他们就找不到了。”

于是,他们把金子扔进了河里^[97]。

上面左栏的文字是关于哥伦布的众多传说之一,它们像笼头一样套在哥伦布的头上,它们是“神话,无稽之谈。”^[98]右栏文字是现在的一段关于一位从海地逃到古巴的阿拉瓦克人酋长(头目)的叙述。

或许有读者已经猜到,左栏文字来自某本美国历史教科书,那就是《美国的经历》。既然所述事件可能从未发生过,那么把它写进教科书就很难说得过去了。要想理解它为什么会被写进教科书,一个方法就是考察它在故事讲述中的作用。它就像情节剧中的一个事件,造成了一些悬念,只不过,当然,我们都相信,到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的确,这段话鼓励我们赞赏哥伦布的伟业,先使哥伦布成

为落魄者——骑着骡子，衣衫褴褛，由此使我们站到他的一边。

右栏是拉斯·卡萨斯的记录，很明显，他是从古巴的阿拉瓦人那里知道这些的。与骡子的故事不同，酋长的故事告诉我们更重要的事实：西班牙人寻找金子，他们屠杀印第安人，印第安人逃跑和抵抗。（事实上，在古巴的武装抵抗无效后，这位酋长逃“进了树林”。几周后，西班牙人抓住了他，把他活活烧死了。）然而，没有哪本教科书讲述了这位酋长的故事或类似的其他故事。如果讲了，那或许会使我们站到土著人一边。教科书作者们不提阿拉瓦克族某些个人的名字和故事，也忽略他们的观点，由此使印第安人成为“他者”。读者无需关心印第安人的凄惨命运，因为美洲印第安人从来就没有作为可认知的人类出现过。似乎，教科书本身也得了认知失调的毛病。 67

排除右栏的段落，引用左栏的段落，排除可能正确的内容，写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殖民主义者的历史，这就是主导着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哥伦布的故事。然而，就全球范围看，那些曾被欧洲列强“发现”、征服、“文明化”和殖民化的国家今天已经独立。欧洲人及欧裔美国人不再像主人对土著人那样颐指气使，因此必须不再认为自己在道德上和科技上是高级的。一种新的、更准确的关于哥伦布的历史——有一本教科书（《美国人》）曾向学生提供过——或许能够促成这种转变。

当然，新的历史学不必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哥伦布。比如，在1493年，整个世界还不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一些美洲印第安民族也奴役其他民族，非洲人也奴役其他非洲人，欧洲人也奴役其他欧洲人。攻击哥伦布做了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当时也有西班牙征服者——比如，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就反对哥伦布在海地施行奴役、掠夺土地以及强制劳动。拉斯·卡萨斯一开始是一位冒险家，后来成为种植园主。最后，他转变了立场，释放了自己的土著人，成为一名牧师，与对印第安人的不人道行为做坚决斗争。当哥伦布及其他欧洲人辩称印第安人是低等人时，拉斯·卡萨斯指出，印第安人与大家一样，是有情感、有理性的人。当一些历史学家试图避而不谈由哥伦布开始的印第安奴隶贸易或为其辩护时，拉斯·卡萨斯批判那些是“有史以来最不可宽恕的冒犯上帝、冒犯人类自身的行为。”他促使西班牙颁布反对美洲印第安奴隶制度的法律。^[99]虽然这些法律通过时为时太晚，已不能保护阿拉瓦克人，并且常常被漠视，但毕竟有助于印第安人生存下来。拉斯·卡萨斯已作古几个世纪，但仍影响着历史。西蒙·玻利瓦尔曾用拉斯·卡萨斯的著作去为拉丁美洲1810年和1830年从西班牙独立出去的革命事业辩护。

当历史教科书不提阿拉瓦克人时,它们就侵害了土著美洲人。当它们不提非洲人及腓尼基人可能是哥伦布的先驱时,它们就侵害了非裔美国人。当它们因为像德·索托这样的探险家们是白人而歌颂他们时,我们的历史学就侵害了所有的有色人种。当教科书不提拉斯·卡萨斯时,它们就忽略了一位可能受到我们一致赞赏的动人的理想主义者。当教科书歌颂哥伦布时,它们就是在促使我们去肯定压迫者。当教科书作者们忽略欧洲世界主导地位形成的原因与过程时,他们为我们所提供的历史一定是为了让我们无从知道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最糟糕的是,当教科书简单地描绘出一副虔诚的、英雄化了的哥伦布的肖像时,它们提供的是自我感觉良好、但人人都觉得乏味的历史。

注释

[1] Kirkpatrick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0), 5.

[2] Samuel D. Marble, *Before Columbus* (Cranbury, NJ: Barnes, 1989), 25.

[3]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译者:Andrée M. Collar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289.

[4] David Quinn, *England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1481-162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 5-105; Robert Blow, *Abroad in America* (New York: Continuum, 1990), 17; Jack Forbes, *Black 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20.

[5] Angus Calder, *Revolutionary Empire* (New York: Dutton, 1981), 5.

[6] A. H. Lybyer, "The Ottoman Turks and the Routes of Oriental Trad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30, no. 120(10/1915): 577-88. 然而,由于土耳其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战争,土耳其可能一度中断了与这两个国家商人的贸易活动。

[7] 同上。

[8] William H. McNeill, *The Age of Gunpowder Empir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89).

[9] 有些教科书使用“土著美洲人”这一术语,有些使用“美洲印第安人”,有些两者并用。大约1975年后,一些土著美洲人反对使用“美洲印第安人”这一术语。其他的人,包括“美洲印第安人运动”,都坚持使用这一术语。因为土著人同时使用这两个术语,我也就这样使用了。

[10] 致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信,7/1503, in *Select Letter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R. H. Major 编译 (New York: Corinth, 1961[1847]), 196.

[11] 哥伦布把这块今天系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所在地的岛屿重新命名为“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 即, “小西班牙”的意思。我把这个岛叫做“海地”, 是因为, 作为一个术语, “伊斯帕尼奥拉”没有“海地”那样为大众所知; 还因为, “海地”是一个土著术语, 只不过它到底是指整个岛屿还是仅指高地, 今天仍混淆不清。见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44.

[12] Michele de Cuneo, 1495 letter referring to 1/20/1494, 引自 Sale, *Conquest of Paradise*, 143.

[13] 这一《规定》一直被广泛引用。这里的译文选自“500 Years of Indigenou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Campaign” (np: Guatemala Committee for Peasant Unity, 1990).

[14] 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71-93.

[15] bell hooks (这是一位美国女作家的名字, 她特意反常规地将自己的名字的首字母小写。——译者按) 指出过这一点, 见 “Columbus: Gone but Not Forgotten,” *Z*, December 1992, 26.

[16]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71-72.

[17] Constance Irwin, *Fair Gods and Stone Faces* (New York: St. Martin's, 1963), 193-211, 217, 241; Cyrus Gordon, *Before Columbus* (New York: Crown, 1971), 119-25; Geoffrey Ashe et al., *The Quest for America* (London: Pall Mall, 1971), 78-79.

[18] Richard Eaton, *Islamic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90), 17; 关于 *caravel* (小帆船), 见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举办的展览 “Seeds of Chang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91).

[19] 《美国的冒险历程》指出, “罗盘来自中国”, 而“一种叫‘星盘’(astrolabe)的东西来自阿拉伯”。《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认为中国人发明了罗盘, 波斯人和印度人发明了用三角帆船航行。除此之外, 所有的 18 本教科书都把葡萄牙人的成就说成是史无前例的。

[20] Stephen C. Jett, “Diffusion v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Carroll Riley et al., eds., *Man Across the Se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1), 7.

[21] 关于这些据说的哥伦布的先行者, 如果列一个入门级的历史材料的清单的话, 那一开始就是 John L. Sorenson 与 Martin H. Raish 的大部头传记 *Pre-*

Columbian Contact with the Americas Across the Oceans (Provo, UT: Research Press, 1990), 及此后的“Sorenson and Raish.”另见:

关于印度尼西亚人,见 Stephen C. Jett. “Th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Blowgu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Dav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cember 1970). 同样的手抄本有 Paul Tolstoy, “Paper Route,” *Natural History*, 6/1991, 6-14; and *Feats and Wisdom of the Ancients* (Alexandria, VA: Time-Life, 1990), 122. 另见 Carroll Riley et al., eds., *Man Across the Sea*, 特别是 Jett 的论文,以及 Sorenson and Raish, entries H255, M109, and S57.

关于日本人,见 Betty J. Meggers, “Did Japanese Fishermen Really Reach Ecuador 5000 Years Ago?” *Early Man 2* (1980):15-19, and Ashe et al., *The Quest for America*, 239-59. Also see *Feats and Wisdom of the Ancients*, 124.

关于克里人、纳瓦霍人以及因纽特人,见 William Fitzhugh, “Crossroads of Continents: Review and Prospect,” in William Fitzhugh and V. Chaussonet, eds., *Proceedings of the Crossroads Symposium*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8). See also Ian Stevenson, *Twenty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74), 218-19.

关于中国人,见 Joseph Needham and Lu Gwei-Djen, *Trans-Pacific Echoes and Resonance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1985). Also see *Feats and Wisdom of the Ancients*, 121; Stevenson, *Twenty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 218-19; Irwin, *Fair Gods and Stone Faces*, 249-51; Paul Shao, *The Origins of Ancient American Culture*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d Sorenson and Raish, entries L228, 231, 238-41 et al.

关于非裔腓尼基人,见 Alexander von Wuthenau, *The Art of Terracotta Pottery in Pre-Columbian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New York: Crown, 1970), and *Unexpected Faces in Ancient America* (New York: Crown, 1975). Also see Ivan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Thor Heyerdahl, “The Bearded Gods Speak,” in Ashe et al., *The Quest for America*, 199-238; *Feats and Wisdom of the Ancients*, 123; Irwin, *Fair Gods and Stone Faces*, 67-71, 89-96, 122-45, 176-86; J. A. Rogers, *100 Amazing Facts About the Negro* (St. Petersburg, FL: Helga Rogers, 1970), 21-22; and Sorenson and Raish, entries J13-17, G71 et al. Kenneth Feder attacks Van Sertima’s evidence in *Frauds, Myths, and Mysteries*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1990), 75-77.

关于凯尔特人,见 Barry Fell, *America B.C.* (New York: Quadrangle, 1976),

and Barry Fell, *Saga America*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0).

关于爱尔兰人,见 Ashe et al., *The Quest for America*, 24–48. Ashe concludes that the evidence for Irish voyages is weak.

关于挪威人,见 Erik Wahlgren, *The Vikings and America*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86).

关于西部非洲人,见 Marble, *Before Columbus*, 22–25. See also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Arthur E. Morgan, *Nowhere Was Somewhe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6), 198; Michael Anderson Bradley, *Dawn Voyage* (Toronto: Summer Hill Press, 1987); Pathe Diagne, “*Du Centenaire de la Decouverte du Nouveau Monde par Bakari II, en 1312, et Christopher Colomb, en 1492*” (Dakar: privately printed, 1990); and Sorenson and Raish, entry H344.

关于波利尼西亚人,见 Heather Whipps, “Chicken Bones Suggest Polynesians Found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 Live Science website, 6/4/2007, livescience.com/history/070604_polynesian_chicken.html.

关于葡萄牙人,见 Marble, *Before Columbus*, 25. See also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Morgan, Nowhere Was Somewhere*, 197; Ashe et al., *The Quest for America*, 265–66; Quinn, *England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41–43, 85–86; and H. Y. Oldham, “A Pre-Columbian Discovery of America,” *Geographical Journal* 3 (1895):221–33.

关于巴斯克人,见 Forbes, *Black 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 20.

关于布里斯托尔渔民,见 Quinn, *England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5–105. 另见 A. A. Ruddock, “John Day of Bristol,” *Geographical Journal* 132 (1966): 225–33; Blow, *Abroad in America*, 17; G. R. Crone,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New York: Weybright and Talley, 1960), 157–58; and Carl Sauer, *Sixteenth-Century North Ame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6.

[22] Charles H. Hapgood, *Maps of the Ancient Sea Kings* (New York: Chilton, 1966). Hapgood 认同这份土耳其地图,他相信,这份地图包含了欧洲探险家在 1513 年所不知道的事情,因此不可能有假。*Current Anthropology* 21, no. 1 (February 1980) 中收录了赞同钱币是罗马人到达过美洲的证据的观点,也收录了反对的观点。

[23] Forbes, *Black 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 7–14; William Fitzhugh 的个人谈话, November 16, 1993;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Chapter 12. 另见 Alice B. Kehoe, “Small Boats Upon the North Atlantic,” in Riley et al., *Man*

Across the Sea, 276.

[24] James West Davidson and Mark H. Lytle, *After the Fact* (New York: McGraw-Hill, 1992).

[25] Forbes, *Black 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 19; Morgan Llywelyn, "The Nors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Early Man* 2, no. 4 (1980): 3-6; Marshall McKusick and Erik Wahlgren, "Viking in America—Fact and Fiction," *Early Man* 2, no. 4 (1980): 7-9. 与大多数学者不同, Sale 在其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374 中, 并不确定哥伦布到达过冰岛。关于欧洲人知道挪威人的那些发现, 参见 James Duff, *The Truth about Columbus* (London: Jarrolds, 1937), 9-13.

[26]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30. See also Irwin, *Fair Gods and Stone Faces*, 126.

[27] Von Wuthenau, *The Art of Terracotta Pottery in Pre-Columbian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50.

[28] Jose Maria Melgar, 引自 Jaquest Soustelle, *The Olmecs*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84), 9. Gabriel Haslip Viera, Bernard Ortiz de Montellano 与 Warren Barbour 总结了一些与非洲人到来的观点不相符的案例, 见 "Robbing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 #3 (6/1997), 419-31.

[29] 本章注 21 指出了关于非裔腓尼基人是否到达美洲的正反两方面的材料。

[30] 转引自 Jan Carew, *Fulcrums of Change*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88), 13.

[31] 比如, "Acknowledge Your Own History" by Jungle Brothers.

[32] 腓尼基人与埃及人并不符合今天所说的“种族”脉络, 他们的肤色有深有浅(就像今天一样)。

[33] 有一种相反的观点, 对这些所谓的新来者的意义提出了激烈的争论。持“欧洲中心论”的人认为是白人造访者的思想导致了奥尔梅克和玛雅文明。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 Pierre Honore, *In Quest of the White God* (New York: Putnam, 1964). 少数作者认为, 黑人造访者才是奥尔梅克人的很多技艺和思想的源头; 见 Irving Wallace, David Wallechinsky, and Amy Wallace, *Signifca* (New York: Dutton, 1983), 58. 很多中美洲人认为, 奥尔梅克人完全是独立地自我发展着。对于这种批判观点的早期论述, 见 Gregory Mason, *Columbus Came Late* (New York: Century, 1931). 第四种观点认为, 非洲-腓尼基人的到来可能激起了奥尔梅克社会的繁荣。这种观点保留了两个半球的天才人物的潜力。

[34] 《美国的冒险历程》是一本“探究型书籍”, 它含有地图、图表、日记、法规等

原始材料节录,还带有口述段落。这类问题是探究型书籍的死穴。对付它们需要大量的图书资料、大量的课时和高超的教学能力。

[35] Marble, *Before Columbus*, 25.

[36] 德·索托 (De Soto) 在地缘政治上的唯一意义是他为印第安人带来了天花,并使其人口锐减,直到 140 年后拉撒 (La Salle, 西班牙探险家——译者按) 漂流到密西西比河下游。在我所考察的书籍中,只有《生活与自由》提到这一瘟疫,但也只写了五个字而已。

[37] 在 *The Truth About Columbus* (New York: New Press, 1992) 一书中,我提到了自己所设想的这种课堂讨论;该书出版之后,我又从历史学家 J. A. Rogers 那读到另外一则材料,讲述的是非裔美国小说家 Ishmael Reed 在其四年级历史课上的类似的成长经历。Reed 说,他的老师批判他的思想是“冗长的发泄”。见“The Forbidden Books of Youth,”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une 6, 1993, 26–28.

[38] Diagne, “*Du Centenaire de la Decouverte du Nouveau Monde par Bakari II, en 1312, et Christopher Colomb, en 1492,*” 2–3;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6. Forbes, *Black 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 13–14, 该书以 Las Casas 为证据,说明哥伦布知道美国从西非的贸易。

[39]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21, 26. 关于美洲的非洲疾病,见 Sorenson and Raish, entry H344, and Richard Hoeppli, “Parasitic Diseases in Africa and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n *Acta Tropica*, Supplementum 10 (Basel: Verlag für Recht und Gesellschaft, n.d.), 54–59. Forbes, *Black 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 警告说,“黑人”(black)与“黑奴”(Negro)是两个易引起误解的术语,因为欧洲人经常用这两个属于形容任何身份低下的黑皮肤人。Forbes 相信 Balboa 见到过黑人,但是认为这些黑人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来自海地。既然非洲奴隶只有在 1505 年才被带到海地,那么他们就一定是与印第安人一道从海地逃到巴拿马,以便先于 Balboa 1510 年到达。关于黑人在墨西哥的口述传说,见 Gonzalo Aguirre Beltran, *La población negra de México* (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89); and John G. Jackson, *Man, God, and Civilization* (New Hyde Park, NY: University Books, 1972), 283.

[40] Riley et al., *Man Across the Sea*, 特别是 Alice B. Kehoe, “Small Boats upon the North Atlantic,” 275–92. 甚至 Marc Stengel 在他那生动而观点一致的总结中,也完全不提 Brendan, 见 “The Diffusionists Have Landed,” *Atlantic Monthly*, 1/2000, 35–48.

[41] 关于哥伦布的身世的三个知识片段, 见 Lorenzo Camusso, *The Voyages of*

Columbus (New York: Dorset, 1991), 9–10. See also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51–52.

[42]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21.

[43]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23–26.

[44] 同上, 344; J. B. Russell, *Inventing the Flat Earth* (New York: Praeger, 1991).

[45] 到2003年,其后的教科书《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将这一修改完全抛弃了。

[46]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171, 185, 204–14, 362; John Hebert, ed., 1492: *An Ongoing Voyag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92), 100.

[47] Hans Koning, *Columbus, His Enterpris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39–40;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238.

[48] Pietro Barozzi, “Navigation and Ships in the Age of Columbus,” *Italian Journal* 5, no. 4 (1990): 38–41.

[49]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Great Explor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397–98. 莫里森在其他地方把他们对造反的议论讲得更为可信。但是, Koning, *Columbus, His Enterprise*, 50, 对那一反叛不屑一顾。哥伦布的航海日记是关于这次航行的最好材料,原本现已遗失,但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做过内容摘要,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述:“这次(10月10日),人们失去了忍耐,抱怨漫长的航行。但是司令竭尽所能地鼓励他们,唤起他们获取财富的希望。他还说,无论他们怎么抱怨,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就只好走下去了,除了达到印度,别无他途。不找到印度,他绝不罢休。”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60, 认为这段材料没有多少历史可信性。实际上,到10月9日,他们就开始追随一大群鸟,并(正确地)认为它们将把自己引向陆地,这使得10月10日的反叛威胁很不可能。

[50] Bill Bigelow, “Once Upon a Genocide...,” in *Rethinking Schools* 5, no. 1 (October–November 1990): 7–8.

[51] Salvador de Madariaga, *Christopher Columbus*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7 [1940]), 203–4.

[52] *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Cecil Jane 英译 (New York: Bonanza, 1989), 171.

[53] 同上, 23.

[54] *The Log of Christopher Columbus's First Voyage to America in the Year 1492*, Las Casas 节抄, 未分页 (Hamden, CT: Linnet, 1989).

[55]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122.

[56] Philip Klass, "Wells, Welles, and the Martian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30, 198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威尔斯的故事里,外星人最终被微生物所压倒,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土著人被疾病所灭绝一样。"Amazon tribe faces 'annihilation'," BBC, 5/17/2005, news.bbc.co.uk/go/pt/fr/2/hi/americas/4554221.stm, 11/2006.

[57] 引自 Michael Paiewonsky, *The Conquest of Eden, 1493-1515* (Chicago: Academy, 1991), 109. 我对 Juan Friede and Benjamin Keen,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in History* (De Kalb: Northern Illinois Press, 1971), 312. 译文略有改动。

[58]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153-54.

[59] Cuneo, 引自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138. 另见 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4.

[60] 1496 年来信, 引自 Eric Williams, *Documents of West Indian History*, (Portof-Spain, Trinidad: PNM, 1963), 1:57.

[61] Ferdinand Columbus, *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9), 149-50.

[62] Maria Norlander-Martinez, "Christopher Columbus: The Man, the Myth, and the Slave Trade," *Adventures of the Incredible Librarian*, 4/1990, 17; Troy Floyd, *The Columbus Dynasty in the Caribbean*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3), 29.

[63] 有一本书,《美国人》写得较好。它引用了关于用 50 个人去征服这座岛屿的那段话,还引用了拉斯·卡萨斯的著作,并讲述了 1493 年的航行以及随后发生的对土著人的征服。

[64] James Axtell, "Europeans, Indians, and the Age of Discovery in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 (1987): 621-32;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156.

[65] De Cordoba letter in Williams, *Documents of West Indian History*, 1:94.

[66] 天花常常是大的杀手,可能到 1516 年之后仍未从这个岛上灭绝。

[67] Benjamin Keen, "Black Legend," in *The Christopher Columbus Encyclopedi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Sale 引 Las Casas cited,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160-61. 另见 Alfred W. Crosby Jr.,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72), 45.

[68] 关于伊莎贝拉女王, 见 J. Leitch Wright Jr., *The Only Land They Knew*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 128; Forbes, *Black 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

- 28; Morison, *The Great Explorers*, 78. Warren Lowes, *Indian Giver* (Penticton, British Columbia: Theytus, 1986), 32 中说,“拉布拉多”(Labrador)的意思是“有廉价劳工的地方”。关于纳齐兹人,见 James W. Loewen and Charles Sallis, *Mississippi: Conflict and Change* (New York: Pantheon, 1980), 40.
- [69] Michele de Cuneo 的书信,引自 Paiewonsky, *The Conquest of Eden*, 50.
- [70] 哥伦布的信,引自 Williams, *Documents of West Indian History*, 1:36-37.
- [71] Ronald Sanders, *Lost Tribes and Promised Land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sm* (Boston: Little, Brown, 1978), 131, 另引自 Peter Martyr, *De Orbe Novo* (1516).
- [72]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转引自 Williams, *Documents of West Indian History*, 1:67. 另见 Sanders, *Lost Tribes and Promised Lands*, 131 中也引用了 Las Casas 的观点。
- [73] Norlander-Martinez, “Christopher Columbus: The Man, the Myth, and the Slave Trade,” 17;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156; Sanders, *Lost Tribes and Promised Lands*, 169; Eduardo Galeano, *Memory of Fire* (New York: Pantheon, 1988), 72; Floyd, *The Columbus Dynasty in the Caribbean*, 75, 222. 根据 J. A. Rogers, 迭戈·哥伦布 (Diego Columbus) 在这次起义中几乎丧命, 见 *Your History* (Baltimore: Black Classic Press, 1983 [1940]), 71. 尼古拉斯·德·奥万多 (Nicholas de Ovando) 可能早在 1505 年就把非洲人作为奴隶输入了。
- [74] 这是 Bill Bigelow 说的话。
- [75] 官方报告, 1989 年 6 月 8 日, 引自 *Five Hundred* (magazine of the Columbus Quincentenary Jubilee Commission), 10/1989, 9.
- [76] Jeffrey Hart, “Discovering Columbus,” *National Review*, 10/15/1990, 56-57.
- [77]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129.
- [78] 引自 Sanders, *Lost Tribes and Promised Lands*, 290.
- [79] Koning, *Columbus, His Enterprise*, 86.
- [80] Marcel Dunan, ed., *Larousse Encyclopedia of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Crescent, 1987), 40.
- [81]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11-12. 另见 Calder, *Revolutionary Empire*, 13-14; Dunan, ed., *Larousse Encyclopedia of Modern History*, 40, 67; Crone, *Discovery of America*, 184.
- [82] Morgan, *Nowhere Was Somewhere*; Marble, *Before Columbus*, 73-75; Calder, *Revolutionary Empire*, 13. Lowes, *Indian Giver*, 82, 关于蒙田 (Montaigne), 另见

Sanders, *Lost Tribes and Promised Lands*, 208-9. 人类学家 L. H. 摩尔根 (L. H. Morgan)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影响, 见 Bruce Johansen, *Forgotten Founders: How the American Indian Helped Shape Dem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Common Press, 1982), 122-23.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另见 Crone, *Discovery of America*, 184.

[83] 转引自 Peter Farb,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 (New York: Avon, 1969), 296. 《暴风雨》(*The Tempest*) 也表明了莎士比亚本人的好奇心: 他根据加勒比印第安人刻画了剧中的“土著”角色“卡利班”(Caliban, 莎士比亚该剧中古怪、丑陋而凶残的人——译者按), 而根据阿拉瓦人告诉哥伦布的, 加勒比印第安人是“食人族”(cannibal)。

[84] 就此而论, 欧洲不是一个大陆, 除非这个词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含义。欧洲是一个半岛, 欧亚之间的分界线是任意的, 不像其他的洲之间那样。

[85] Leon Festinger,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1957).

[86]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124-25 and Chapter 5; William Langer, “American Foods and Europe's Population Growth, 1750-185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8(winter 1975): 51-66; Jack Weatherford, *Indian Givers* (New York: Fawcett, 1988), 65-71; “Seeds of Change” exhibi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91).

[87]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124-25; Lowes, *Indian Giver*, 59-60; Weatherford, *Indian Givers*, 65-71; Boyce Rensberger, “Did Syphilis Sail to Europe with Columbus and His Crew?” *Burlington Free Press*, 7/31/1992, 3D.

[88] 另见 Williams, *Documents of West Indian History*, 1:xxxi. Karl Marx and Fredrich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in Robert C.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Norton, 1978), 474. Weatherford, *Indian Givers*, 43, 58 指出, 美洲的长纤维棉花要比“旧世界”的那些材料更适合织布制衣, 由此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他还认为, 玻利维亚的制币业与加勒比海的制糖业达到了工场的规模, 这刺激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

[89] Weatherford, *Indian Givers*, 12, 15-17. Dunan, ed., *Larousse Encyclopedia of Modern History*, 69, and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236 中关于通货膨胀的论述。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90] Herman J. Viola and Carolyn Margolis, eds., *Seeds of Change*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186-207.

[91] Michael Wallace, "The Politics of Public History," in Jo Blatti, ed., *Past Meets Present*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7), 41-42. 另见 Garry Wills, "Goodbye, Columbu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22, 1990, 6-10. 有趣的是,在哥伦布 500 周年之际,联合国投票决定 20 世纪 90 年代是“根除殖民主义的 10 年”。连西班牙等西欧前殖民势力也让步于尊重新的全球现实。只有美国不同意。见 John Yewell, "To Growing Numbers, Columbus No Hero," *St. Paul Pioneer Press*, 10/11/1990.

[92] *Johnson v. M'Intosh*; see Robert K. Faulkner, *The Jurisprudence of John Marshal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53; and Bruce A. Wagon, "Advancing Tribal Sovereign Immunity as a Pathway to Power,"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Law Review* 27, no. 2 (Winter 1993):419-20.

[93] Roy Preiswerk and Dominique Perrot, *Ethnocentrism and History* (New York: NOK, 1988), 245-46.

[94] 哥伦布,转引自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116; 另见 201.

[95] John Burns, "Canada Tries to Make Restitution to Its Own," *New York Times*, 9/ 1/ 1988.

[96] Virgil Vogel, *This Country Was Our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38, re Cartier. Weatherford, *Indian Givers*, 30, re Drake. 关于刘易斯和克拉克,有一本教科书《美国历史》对其因纽特人向导大加赞赏。Romeo B. Garrett, *Famous First Facts About the Negro* (New York: Arno, 1972), 68-69, re Henson as first at Pole. 有些人认为,皮利的探险队从来没有到达过极地;如果他到达了,我们今天就不会去判定谁最先到达那里。有趣的是,皮利与汉森都在探险中当上了爸爸。1987 年,这几个孩子 8 岁了,他们参加了一次皮利与汉森的“合法”子嗣的聚会。在这次聚会上,他们的母亲在探险中的作用才为人所知。见 "Discoverers' Sons Arrive for Reunion," *Burlington Free Press*, 5/ 1/ 1987; 另见 Susan A. Kaplan 对马修·汉森的介绍, *A Black Explorer at the North Pol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一个关于汉森的简短而不错的论述, 见 Wallace, Wallechinsky, and Wallace, *Significa*, 17-18. 关于皮利如何借助于因纽特人,包括对其“科学罪行”的指责, 见 Michael T. Kaufman, "A Museum's Eskimo Skeletons and Its Own," *New York Times*, 8/ 21/ 1993, 1, 24.

[97]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238.

[98] Las Casas, 口述历史, 从泰诺人中收集而来, 见 *Documents of West Indian History*, 1:17, 92-93.

[99] Las Casas, 引自 J. H. Elliot,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48;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289; John Wilford, *The Mysterious History of Columbu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40. 也有人公正地批评拉斯·卡萨斯曾提议用非洲奴隶代替美洲奴隶。但是,他后来放弃了这一提议,并总结说,“黑人奴隶与印第安奴隶是一样不公正的。”(*History of the Indies*, 257).

第三章

感恩节的真实来历

试想一下,实质上,感恩节的那些标准食谱,没有一项包含了哪怕一盎司的真实性、历史准确性和任何跨文化观念,那么,为什么感恩节还会如此深入人心呢?对于美国人的心智来说,难道有必要去不断压榨并贬低受害者来为自己的历史正名?

——迈克尔·多瑞斯^[1]

欧洲探险者与入侵者发现了一个已有人居住的陆地。如果那块陆地当时真的那么荒凉,那么它现在还会是那样;因为,欧洲人无论是凭其16和17世纪的技术还是他们的社会组织,都没有能力依靠自己的资源去维持一些远离自己的家乡数千公里之外的殖民地前哨基地。

——弗朗西斯·詹宁斯^[2]

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征服美洲,并非由于他们的军事天赋,或者他们的宗教动机,也不是由于他们的野心或者贪婪。他们征服美洲,靠的是发动人们始料未及的生化战。

——霍华德·辛普森^[3]

注意这些事物是令人痛苦的。我们的先辈们,虽然英明、虔诚、真挚,但在基督的仁慈方面,却总是让人心生疑云;在历史学中,真理应该保持神圣,不论付出什么代价……特别是要批驳那种狭隘、琐碎的爱国主义,那种爱国主义非但不去追寻真理,反而以为先人们盖上最后一块遮羞布而感到自豪。

——托马斯·阿斯平沃尔上校^[4]

① 迈克尔·多瑞斯(Michael Dorris, 1945-1997),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

最近几年,我问过几百个大学生,我们现在称作“合众国”的这个国家在什么时间开始有人定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心胸开阔的表现。“我们现在称作……”这一提法的确暗指在合众国建立之前美国就有人定居。我原以为,当然我更希望,学生们会说是公元前 30000 年,或者哥伦布之前的某个时代。

71

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回答。他们一致回答:1620 年。

很明显,我的学生们满脑子都是那个关于美国起源的神话,即,第一个感恩节的故事。教科书就是这种神话的传播者之一。

问题部分出在“定居”(settle)这个词上。一次,学生向我指出,“定居者”是白人,“印第安人”不定居。“定居”这个词带有误导性。被误导的还不仅仅是学生。那部向旅客推荐参观“普利茅斯种植园”的电影就讲述了“殖民者们如何驯服了充满敌意的蛮荒环境”。最近,在一个感恩节的周末,我听一位导游在自由女神像前介绍说,欧洲移民“散布在蛮荒的东海岸”。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要不是美洲印第安人已经先行居住在新英格兰,欧洲人可能举步维艰。

以“始祖移民”为起点去写美洲的历史,被遗漏的不只是印第安人,还有西班牙人。“我们现在称作‘合众国’的这个国家”的第一批非土著居民是西班牙人在 1526 年放弃一项定居企图时留下来的非洲奴隶。1565 年,西班牙人屠杀了在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定居不久的法国新教徒,并在那建立了自己的城堡。1565 至 1568 年间,西班牙人探险至卡罗莱纳,建立了一些要塞,但那些要塞后来被印第安人烧毁。一些后来到达的西班牙定居者就是我们的第一批“始祖移民”。他们是为了寻找新的宗教、确保宗教自由才来到这里;他们是西班牙犹太人,在 16 世纪定居于新墨西哥。^[5]美国很少人知道,今天合众国的三分之一的土地,从旧金山到阿肯色到纳齐兹到佛罗里达,属于西班牙人的时间远比属于“美国人”的时间长;也很少人知道,“美国革命女儿会”^①的最早祖先离开英格兰之前,西班牙裔美国人就已经居住在这里了。而且,西班牙文化在美国西部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西班牙人引进了马、牛、羊、猪以及美国牛仔文化的基本元素,如牛仔文化的词汇:野马(mustang, bronco)、套牛(roped, lariat),等等。^[6]西班牙人的马匹逃到别处,并大量繁殖,这导致一种新的文化在大平原印第安人中快速繁荣。詹姆斯·阿克斯特尔写道:“我们发现,如果有一本教科书在讨论传统的东部殖民地之前,先讨论一下西海岸的事情,那将多么令人耳目一新啊。”

但教科书为什么没这样做呢?这或许是因为,大多数教科书作者都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我所考察的 18 本教科书的 46 位作者有姓“鲍尔”(Bauer)

① “美国革命女儿会”(DAR,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美国早期支持革命的妇女组织。

的,有姓“伯金”(Berkin)的,有姓“威廉姆斯”(Williams)的,还有姓“伍德”(Wood)的;但是只有两个人是姓西班牙姓氏的,一个是《自由的挑战》的作者琳达·安·德利翁(Linda Ann DeLeon),另一个是《美国人》的作者J.克洛尔·德·阿尔瓦(J. Klor de Alva)。并非偶然的是,后两位所写的书籍都提供了对“今天所称的合众国”里的早期西班牙定居者的最为完整的叙述,包括提到了西班牙人建立的传教机构遍布从卡罗莱纳到墨西哥湾、从圣地亚哥到旧金山的广大地区。^[7]我们这代人可以看到,美国的学龄人口将注定以少数民族居多,而西班牙裔、非裔、亚裔以及土著美洲人总体上将占51%之多。在这一点上,或许,在经过多次痛下决心之后,历史教科书将给予我们的西班牙史更多的关注——这是它们终将会做的。此外,西班牙人总被视为入侵者,而英国人则被视为定居者。^[8]

从1620年写美国的历史也忽略了荷兰人。荷兰人在1614年以前就居住在现在叫做奥尔巴尼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准确地说,1620年也不是英国的第一批永久性居民到来的时间,因为早在1607年,伦敦公司就派人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定居。

这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称为合众国的这个国家”的神话起源在于普利茅斯岩,时间是在1620年。下面是摘自《美国的传统》的一段代表性描述: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险之后,“始祖移民”们在普利茅斯港口选了一块陆地定居下来。不幸的是,他们到那的时间是12月,他们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然而,印第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印第安人为他们提供食物,教他们种植粮食。天气转暖的时候,殖民者们开始种植粮食、钓鱼、打猎,并为冬天做准备。在收获了第一季庄稼之后,他们与自己的印第安朋友庆祝了第一个感恩节。^[9]

我的学生们还都知道,在英格兰,“始祖移民”们曾因宗教信仰的不同遭受迫害,后来迁到荷兰。据学生们所说,“始祖移民”们乘坐“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并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这是宪法的雏形。岁月艰难,直到他们遇见了斯宽托(Squanto),他们的生活才有所改善。斯宽托教他们在种庄稼时怎样以小鱼做肥料,以确保获得大丰收。但是,当我问到瘟疫的时候,我的学生们对我瞪大双眼,什么瘟疫?黑死病吗?——不,我叹息,黑死病比这要早300年呢。

然而,黑死病的确值得一提。威廉·兰格曾写道,黑死病(或淋巴腺鼠疫)“无疑是有史以来降临给人类的最严重的一次灾难”。^[10]它从1348年蔓延到1350年,30%的欧洲人死于此疫。由于是灾难性的,疾病本身带来的更多是恐惧。根据 73

兰格的研究,在中世纪,几乎每个人都认为黑死病是上帝对人类所犯的罪恶的一种惩罚。一想到审判的日子即将来临,农民不种植庄稼,许多人酗酒堕落。文化和经济的衰落较疾病本身造成了更大的死亡,整个欧洲文化都受到了影响:恐惧、死亡、罪恶感成了艺术家的主要题材。较轻的瘟疫,像伤寒、梅毒、流感以及鼠疫等继续在欧洲肆虐,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11]

历史上,欧洲、亚洲、非洲的比较温暖的地带一直是大多数人类疾病的繁衍地。人类在热带地区发展,热带疾病伴随着人类进化。人类移居到寒冷地带时,要借助文化上的发明物——衣服、住所、火等维持自身及周围环境的温度。居住在人类宿主之外的微生物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要适应欧亚北部的气候是非常困难的。^[12]如果考古学界目前的看法是正确的话,当人类跨过新干涸的白令海峡迁移到美洲时,气候和物理环境的变化甚至还威胁到那些早期从非洲向北慢慢迁移过来的耐寒的寄生虫。第一批移民是通过严格的低温消毒的考验才进入美洲的。西半球的第一批定居者的健康状况可能空前绝后的好。而长期困扰他们的许多疾病根本不可能熬过这漫长的旅途。^[13]

一些动物也是如此。在1492年后欧洲人及非洲人到达之前,西半球的人没有牛、猪、马、绵羊、山羊和鸡。很多疾病——从炭疽热、肺结核、霍乱到链球菌、癣菌病、各种梅毒——在人和牲畜之间传播。然而,西半球的早期居民没有牲畜,因此也就不会从它们身上染病。^[14]

欧洲人和亚洲人还由于一个微妙因素的影响而很不健康,这个因素就是人口密集。引发疾病的有机物需要不断找到新的有机体供自身生存。这个需要,以天花为例来说明就再清楚不过了。天花不能在活的有机体外生存,但是在它大幅发作时,它经常杀死它的宿主。因此,瘟疫给自己造成困境:它定期需要新的受害者。各种流感病毒也同样需要不断传播,因为如果它们的感染者侥幸活下来的话,就会拥有免疫力至少几周,有时甚至终生。^[15]像内华达的派犹特印第安人这样的小社团,虽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家庭中,但可能、也确实是在后哥伦布时期患过天花病。这种天花病是由一些偏远的农村居民传给他们的,因为,为数极少的农村居民是不可能长时间维持这些天花病毒的生存的。^[16]甚至连村落的居民也没有见识过足够密集的人群。村民们每天见到300个人,但那几乎是同样的300个人。重复接触熟人和不断遇见新人,无论就人类的文化而言,还是就微生物的演化而言,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美洲的一些地区,人口密度确实很高。^[17]印加之路还把来自北部的厄瓜多尔和智利的市镇连接了起来。^[18]1500到2000年前,伊利诺斯的克霍基亚地区的总人口约4万人,贸易把大盐湖和佛罗里达、落基山脉和现在的新英格兰连接起

来。^[19]因此,我们现在研究的不是孤立的“原始”部族。不过,西半球的大多数地方都不如欧洲、非洲和亚洲人口密集,西半球也不像伦敦和开罗那样污水漫街,臭水沟助长疾病蔓延。

当年美洲人很少生病,部分原因也应归功于当地居民讲卫生的基本习俗。北欧和英格兰居民很少洗澡,认为那不健康,也很少一次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认为那样做不正派。根据斯宽托传记的作者菲尼·辛纳的描述,印第安人觉得“始祖移民”身上的气味很难闻,所以“斯宽托就尝试着教他们洗澡,然而没有成功。”^[20]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南北美洲的居民与澳大利亚土著人和偏远的太平洋岛上的各民族一样,在哥伦布到来之前是“相当健康的民族”。^[21]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事实证明,正是他们的健康使他们遭殃,因为他们没有通过遗传或幼儿疾病获得抵抗力,不能抵抗欧洲人和非洲人带来的病菌。

1617年,就在“始祖移民”到来之前,新英格兰南部就有疾病在传播。几十年来,英、法渔民一直在马萨诸塞海岸钓鱼。船装满鳕鱼后,他们就上岸躺在木柴上,或者干脆浸在清澈的海水中休息,或者抓获几个印第安人把他们贩卖到欧洲作奴隶。这些渔民很可能把一些疾病传播给了他们所碰到的人。^[22]相比而言,随之而来的疾病较黑死病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场疾病就是腹股沟腺鼠疫,另外一些认为这是病毒性的肝炎,还有的说是天花,也有的说是水痘、流感,众说纷纭。

三年之内,瘟疫消灭了90%到96%的新英格兰沿海的居民。土著社会瓦解。75
罗伯特·卡西曼是一位亲眼目睹过这一惨剧的英国人,他记录了这一人类先前从未遭遇的死亡率,他写道,只有“20来岁的人才能侥幸活下来”。^[23]幸存者由于无力处理这么多的尸体,就放弃了家园逃到附近的部落去了。由于他们身上携带着病菌,一些从未遇到过白人的美洲印第安人也死去了。霍华德·辛普森这样描写“始祖移民”们所看到的那一惨剧:“村庄成了废墟,没有人再管它。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尸骸遍地,无人埋葬。”^[24]

大多数新版教科书都收录了这幅图,这可以说是在对待土著美洲人问题上的一个最大变化。我的初版《老师的谎言》批评了那些无视那场反复摧残土著人口的流行病的做法。当时,没有哪本教科书收录了这幅插图或提到疾病问题。76

过了15年,又一场瘟疫爆发,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都是天花。的确,欧裔美洲人也感染了天花及其他疾病,但是他们一般都康复了,包括一度“浑身是疮的乔治·华盛顿”。土著美洲人通常都死掉了。这场病灾对两种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英国的分离主义分子把他们的生活看成是天启道德的显现,因此他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上帝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当时的马萨诸塞湾总督约翰·温思罗普称

这场瘟疫是“超自然的”。1634年，他给一位英国朋友写信说：“要不是上帝对本地居民还稍有偏爱的话，这地方大部分地区，大约300英里以内的地方都会有继续蔓延的天花病毒恣意肆虐。上帝剥夺了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所有权，那些继续留在我们一边、置身于我们的保护之下的人总共不到50个……”^[25]上帝，你这位最初的不动产代理人！



图1 阿兹特克人的绘画

这些阿兹特克人的绘画描述了天花，表现了普利茅斯附近的那场令人恐怖的流行病的某些场景，与威廉·布莱德福德^①说的话很吻合：

“再也没有比这更痛苦的疾病会降临到印第安人身上，他们担心它远远胜过瘟疫。那些得了这种病的人任由疾病蔓延，由于缺少被褥、亚麻及其他东西，他们只能躺在硬梆梆的席子上，陷入痛苦的哀嚎之中。脓包溃烂，流脓，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贴垫子躺的一面的皮肤裂开了。当他们翻过身来，整个一侧都会裂开，还有淤血，看起来非常可怕。再后来，加上感冒或别的大瘟疫，他们像绵羊一样一点点腐烂死掉。”引自辛普森：《无形的军队》

很多土著人同样得出结论：神抛弃了自己。罗伯特·卡西曼说：“那些活下来的人，勇气全失，表情沮丧，似惊弓之鸟。”天花瘟疫过后，切罗基族人“非常绝望，他们不再信仰上帝和牧师，他们的牧师也破坏掉部落里所有的圣物。”^[26]毕竟，印第安人与“始祖移民”都不懂得疾病的病菌理论，土著医师提供不了治疗方法，他们的草药不能减轻痛苦，他们的宗教也提供不了任何解释。但白人的却可以。像三个世纪前的欧洲人一样，许多美洲印第安人或沉迷于酗酒，或皈依基督教，或

① 威廉·布莱德福特(William Bradford, 1590-1657)，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五月花号公约》的主要起草人，据说“感恩节”就是由他首先提议设立的。

者干脆自杀。^[27]

或许,这些瘟疫构成了17世纪早期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瘟疫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在来到新英格兰的头50年里,不会遇到来自印第安人的真正威胁。实际上,瘟疫有助于普利茅斯人奇迹般地受到万帕诺亚格人的热情欢迎。马萨索伊特是一位万帕诺亚格人的首领,他急于和“始祖移民”联盟,因为瘟疫已经如此沉重地打击了他的村庄,他担心西部的纳拉甘塞特族人会乘虚而入。^[28]当1631年新定居者与索格斯^①的老居民发生土地纠纷时,用清教牧师英克里斯·马瑟的话说,“上帝在印第安人中间播下天花,从而结束了纷争。一个城镇一个城镇的人被灭绝。在某些城镇,没有一个灵魂得以逃脱大毁灭。”^[29]等到新英格兰的土著人口有所回升时,要赶走入侵者已为时太晚了。

今天,当我们把欧洲技术与“原始”印第安人的技术相比较时,我们会说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时却似乎不是这样。历史学家卡伦·库柏曼推断:

美洲东海岸的印第安人的技术和文化当时与英国人的技术和文化不相上下,孰优孰劣一时还不甚明了……人们只能想象,如果欧洲疾病没有对美洲人口产生毁灭性影响的话,其比拼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如果殖民者不占有已灭绝的印第安农夫开垦出的土地的话,殖民活动或许会进展得缓慢得多。如果印第安文化没有毁于它所遭受的那些从肉体到心灵的打击的话,殖民活动或许根本就无法进行。^[30]

不管怎样,当1606年塞缪尔·德·尚普兰^②试图在马萨诸塞定居时,土著美洲人赶走了他。第二年,阿本乃吉(Abenakis)带人把第一批普利茅斯公司的定居者赶出了缅因。^[31]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推断,如果挪威人当时不是时运不佳,迁出了远离欧洲疾病中心的格陵兰岛和冰岛的话,他们也许已成功地在新芬兰和拉布拉多殖民了。^[32]但这只是“如果”历史。新英格兰的瘟疫不是“如果”。它们继续向西推移,在与文化接触的赛跑中一路领先。

在美洲各地,第一批欧洲探险者所到之处遇到的印第安人要比后来者遇到的印第安人多得多。在赫尔南多·德·索托游历今天美国东南部一个半世纪之后,到达这里的法国探险者发现当地人口还不足德·索托走后的四分之一,这场人口锐减对土著的文化与社会组织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33]同样,在著名的1804至

① 索格斯(Saugus),位于今美国马萨诸塞州。

② 塞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 1567-1635),法国探险家。

1806年远征中，刘易斯与克拉克在俄勒冈遇到的土著人要比仅20年后居住在那里的人多得多。^[34]

亨利·杜宾斯罗列了1520至1918年间发生的93场悲惨的瘟疫。他记录了41场天花、4场鼠疫、17场麻疹、10场流感（这些都发生在土著印第安人身上），还有25场肺结核、白喉、伤寒、霍乱及其他疾病。这些疾病很多都流行极广，始于佛罗里达或墨西哥，一直蔓延到太平洋和北冰洋才停止。^[35]疾病在墨西哥、秘鲁与在马萨诸塞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西班牙人当年是如何设法征服现在的墨西哥城的呢？“当基督徒厌倦了战争时，上帝觉得，应该为印第安人送去天花病毒，于是城里瘟疫横行。”当西班牙人行进到特诺奇蒂特兰城^①时，尸横遍野，他们不得不从尸体上踏过。大多数西班牙征服者都对疾病具有免疫能力，而这一事实本身又有助于挫败阿兹特克人的士气。^[36]

如今，瘟疫继续流行。矿工和伐木工人又把欧洲疾病带到巴西北部 and 委内瑞拉南部的雅诺马莫人(Yanomamo)身上，1991年，雅诺马莫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死去。查尔斯·达尔文于1839年以一种接近诗体的语言写道“欧洲人所到之处，死神仿佛追逐土著。”^[37]

欧洲人一直未能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或者非洲的大多数地区“定居”下来，因为那儿已有太多的人居住。当年瘟疫在美洲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关于人口的简单估计中略知一二。一个是威廉·麦克尼尔的推测，1492年美洲的人口是1亿。另一个是威廉·兰格的推测，哥伦布出航时，欧洲的人口只有7千万。^[38]欧洲人在军事、社会技术方面的优势使他们征服了美洲人，就像他们最终征服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但是，他们最终没能在东半球“定居”。从这个角度说，瘟疫是必需的。因此，除了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入侵外，瘟疫的确是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第一批瘟疫不仅给美洲印第安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而且也使对前哥伦布时代土著美洲人口的估计困难重重。结果是，在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中间，争论持续不断。1840年，乔治·凯特林^②估计，在白人到来时，美国和加拿大的土著人口也许是1400万。他认为，幸存的只有200万。到1880年，由于战争、衰退和疾病，土著人口降到25万，下降了98%。^[39]1921年，詹姆斯·穆尼(James Mooney)推断，1492年，在今天的美国所在的区域，土著人口只有100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穆尼的推断一直被人接受，虽然它不那么可信，因为支持它的观点是建立在推论而非证据基础上的。科林·麦克伊夫迪的观点就是一个例子：

① 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an)，今墨西哥城的前身，相传为阿兹特克人所建。

② 乔治·凯特林(George Catlin)，美国画家和作家，以表现印第安人题材著称。

当然,较高的估计认为,土著人口由于天花病毒、麻疹和其他从欧洲带来的疾病,已减至较低水平(大约在100万到200万之间)。实际上,他们的确可能也就那么多。但是没有任何关于大陆(欧洲)人口减少比例的记录,只提到从2000万减到200万或100万。即使是黑死病,欧洲人口也只不过减少了三分之一。^[40]

请注意,麦克伊夫迪既忽略了数据,也没有对上述疾病进行推论,仅凭类似于常识的东西对它们一并排斥。实际上,他辩称:“没有什么能和常识抗衡。”但是“始祖移民”到来之前的美洲流行病学并非人人知晓的领域,不能用“常识”代替多年的相关研究。麦克伊夫迪所说的“常识”,其实就是指传统的说法,而这一传统说法是“欧洲中心论”的。我们塑造出“大陆处女地”及其必然衍生物“原始部落”等概念模型,这些对我们估计土著人口产生了微妙的影响:那些视土著美洲人文化为原始文化的学者们,出于这些概念模型的需要,会降低自己对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人口的估计。因此,穆尼的低水平估计“合乎情理”——与这一概念模型相呼应。它从不在乎,这块土地其实从不荒芜,恰恰相反,只是到了近代才被抛荒。^[41]

对于这一死亡率,今天一些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都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当年的“始祖移民”们都知道那是真实的。比如,威廉·布莱德福德曾这样描述荷兰人——普利茅斯人的对手——到康涅狄格的一个印第安村落旅行和做生意的情景:“但是他们的生意失败了,因为按上帝的意志,这些印第安人遭到了如此要命的疾病,1000人就有950人丧生,尸横遍野,无人掩埋……”^[42]这个95%的死亡率,正是麦克伊夫迪所拒绝承认的。在相对的海岸,加利福尼亚的土著人口在1769年为30万(到此时,由于西班牙携带来的各种疾病,人口已经减半),到一个世纪后降至3万;这主要是由于淘金热所导致的“疾病、饥饿、仇杀以及出生率下降”。^[43]

在凯特林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没注意到”“始祖移民”们及其他早期编年史家们所提供的证据。然而,自1947年开始,P. M. 阿斯本等研究者们提出了更加准确的估计,这些估计立足于对欧洲人初次到来时的情况的细化研究、对全大陆范围内的仔细汇总,以及早期瘟疫的相关证据。现在大多数人推断,欧洲人到来之前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数为1000万到2000万之间。^[44]

我最初考察的12本教科书大多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它们没有一本将

读者引入 20 世纪 60 年代与 70 年代初的那场激烈辩论之中，并介绍各种关于人口数的估计是怎样变化，为什么变化的；相反，它们仅提供数字，而且是彼此大相径庭的数字。《美国的经历》认为“有 1000 万人之多”；《美国的传统》认为“只有大约 100 万北美印第安人”，“大约 500 个不同的族群分布在北美大陆，他们大都过着游牧生活。”像其他没有研究过这些文献的美国人一样，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仍摆脱不了“处女地”及“原始部落”等概念模型。他们对美洲印第安人口的最为常见的估计是 100 万——有五本教科书都提供了这一不可信的数字。在那些教科书中，只有两本提出了 1000 万到 2000 万的估计，这才基本属于当时学界所认可的范围之内。有两本教科书信誓旦旦地说人口数为 100 到 1200 万——这或许会在课堂上引发激烈的讨论：为什么书中的估计这么模糊。有三本教科书完全不提这一问题。那些新版的教科书情况更糟：它们无一触及人口数估计问题。

问题如其说是出在数字估计上，不如说是出在态度上。提出争议似乎总有点过分。那要求学生自己得出结论。教科书作者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向孩子们展现“事实”，好让他们去“背”，而不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们忽视推理、辩论，不重视在社会科学中引入证据。

关于瘟疫，我最初所考察的 12 本教科书提的更少。仅有三本提到印第安人所患的疾病，并且只把它作为普利茅斯等新英格兰某地的问题。^[45]现在，大多数新版的教科书确实把“旧世界”的疾病视为“哥伦布交换”的一个部分。这一天总算是等来了！毕竟，在殖民地时期，每个人都知道瘟疫。甚至在“五月花”号启航之前，英王詹姆斯感谢“万能的上帝赐予我们伟大的善与慷慨”，“将这一非凡的瘟疫投向蛮族。”^[46]两百年后，我收藏到的最早的美国历史书——1829 年出版的 J. W. 巴伯的《美国历史上的有趣事件》——仍能记得那场瘟疫：

在普利茅斯移民到来之前几年，一场致命的疾病以势不可挡之势袭击了居住在新英格兰东部的印第安人。“整个城镇人口大减。活人来不及掩埋死人；多年后，仍然尸横遍野。据说马萨诸塞的 3 万印第安人到最后只剩下 300 名战士。1633 年，天花又使一大批人丧命。^[47]

81

“始祖移民”们来到马萨诸塞，但不幸的是，这又给后世教科书作者们造成了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史学难题。教科书说“始祖移民”本想去弗吉尼亚，那里已先期存在一个英国人定居点。《美利坚之旅》解释说，“他们所看见的第一块陆地是科德角，正位于他们的目的地的北方，”“由于时至 11 月，冬季很快就要到来，

殖民者们决定在科德角湾停泊。”然而,冬季来临并不是原因,因为,弗吉尼亚的天气要比马萨诸塞暖和得多。而且,“始祖移民”们花了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也就是一直到了12月26日以前——在科德角附近四处寻找最佳落脚点。如果“始祖移民”们向弗吉尼亚进发,他们又怎么首先在马萨诸塞停了下来呢?一些教科书说,“强烈的风暴使他们的船只偏离了航线。”而另外一些教科书则指出那是一个“航海错误”。这两种解释都可能不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荷兰人贿赂“五月花”号船长,让他向北航行,以便“始祖移民”们不会靠近新阿姆斯特丹定居。另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始祖移民”们的目标就是科德角。^[48]

不要忘了,在102个“五月花”殖民者中,只有35人是“始祖移民”,其余都是一般老百姓,他们只想去新弗吉尼亚殖民地寻求财路。历史学家乔治·威利森论辩说,“始祖移民”领导们想远离国教的控制,从未打算在弗吉尼亚定居。他们曾经争论南美洲的圭亚那与马萨诸塞海岸孰优孰劣;并且根据威利森的说法,他们打算劫持“五月花”号。

当然,“始祖移民”们十分清楚马萨诸塞究竟能为他们提供什么,那就是,从科德角的优良渔场,到那场为英国殖民者们提供了难得的定居机遇的“奇妙的瘟疫”。据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当时一位名叫“斯宽托”的来自马萨诸塞的帕图西特(Patuxet,后来的普利茅斯[Plymouth]——译者按)村落的万帕诺亚格人,向一位名叫“斐迪南·戈杰斯”的英国普利茅斯公司的领导详细介绍了这一地区的情况,戈杰斯甚至可能把这一地区回赠给了斯宽托与托马斯·德尔莫船长——这位船长先行到达那里等待“始祖移民”们的到来,只不过在“始祖移民”们滞留英国之际,他离开了这一地区。无论如何,“始祖移民”们是熟悉这一地区的地形的。塞缪尔·德·尚普兰1605年航行到这一地区时,曾绘有地图,补充了一些在16世纪探险者们之间流传的信息,这些地图最近已经出版。约翰·史密斯研究过这一区域,于1614年将它命名为“新英格兰”,他甚至为“始祖移民”领导人提供向导,只不过后者觉得索价太高,没有接受他的服务,只带上了他的旅行指南。^[49]

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始祖移民”领导人们也许是有目的地来到马萨诸塞的。但是不管哪种结论,证据都不很充足。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戈杰斯在定居马萨诸塞问题上功不可没。实际上,“五月花”号的确没有特定的目的地。教科书的作者写出两种或者更多种的可能性,这或许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是,与往常一样,向学生介绍历史争议是教科书的一大禁忌。每本教科书只选取一种解释,并把它说成是事实。

在我所考察的12本教科书中,只有一本坚持“劫持”说。《希望之地》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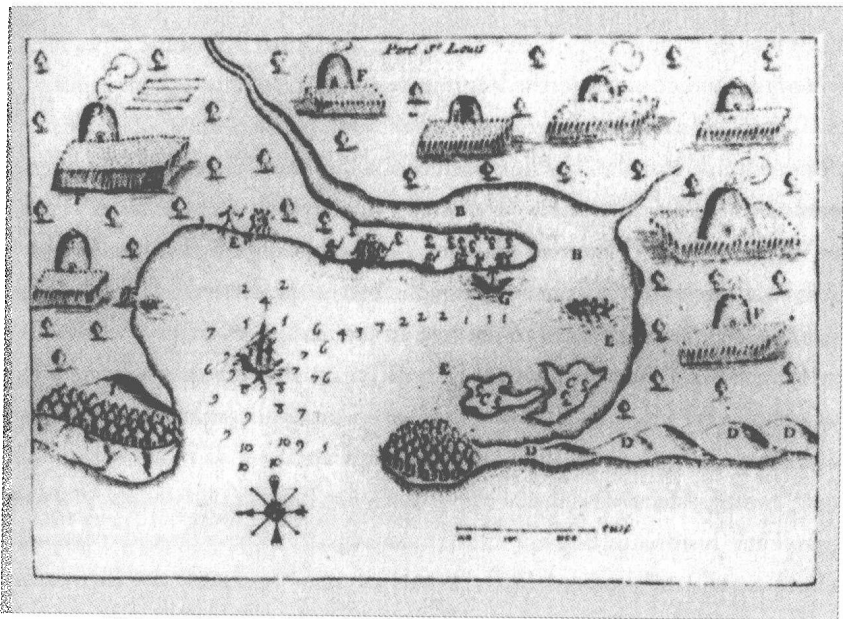


图2 塞缪尔·德·尚普兰的航海图

“始祖移民”关于新英格兰的信息，来源之一可能就是塞缪尔·德·尚普兰的那些地图，其中包括帕图西特（普利茅斯）的这张航海图。在1671年发生瘟疫之前，帕图西特还是一个印第安人村落。

“登上新英格兰后，疲惫不堪、拖拖拉拉的‘五月花’号中的（非‘始祖移民’）多数船员们的确又惊又喜。”“（他们）加入远航，本来是想在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园寻求商机。”很显然，这些乘客不愿意被带到另外的地方，特别是不愿意去以前没有英国人居住的海岸。“有人四处煽动反叛。”《希望之地》于是就把这次叛乱与《五月花号公约》联系起来。这样，关于为什么殖民者接受了这个协议，又为什么那么民主，该书给读者带来一个全新的解释：“为了避免叛乱，‘始祖移民’领导人们向其他殖民者做出了重要的让步。他们发出呼吁，船上的每个人，无论信仰何种宗教，处于何种经济地位，都可以参与建立‘全民政体’。”这个协议达到了它的目的：大多数人都接受了。 83

实际上，“劫持”说并没有以一种贬低的眼光去看待“始祖移民”们。《五月花号公约》对这一棘手的问题已经提供了巧妙的答案。尽管劫持和弄虚作假当时就像在今天一样无疑是一项重罪，但殖民地毕竟维持了下来，并且其死亡率要比弗吉尼亚低，因此没有造成任何长久的损失。然而，这个故事是以某种不太体面的方式描写“始祖移民”的，这足以说明为什么只有一本教科书选用了这种描述。

“航海错误”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在那个时代，水手们能够、或者说已经准确运用的一个航海参数就是纬度——离赤道以北或者以南的距离。“风暴”说或

许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风暴把他们吹离了航线,当天气放晴时,他们应该继续向南航行,驶入大海以避开浅滩。毕竟,他们食物充足,还有大量啤酒。^[50]但是,“风暴”说与“航海错误”说都使“始祖移民”们看上去心地纯洁,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教科书都会选用这两种说法中的一种。

不管动机如何,《五月花号公约》为普利茅斯殖民地奠定了民主基础。然而,由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实际上并不重视这个协议,它就似乎也不值得教科书作者们浪费笔墨。但是,教科书的作者显然想把“始祖移民”包装成虔诚的、有道德的人,认为他们为我们的民主传统开了先河。关于这个想法,体现得最明显的莫过于约翰·加勒蒂的《美国历史》。该书指出,“迄今发现的所有记录表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一群人有意地在一个先前没有政府的地方建立政府。”这里,加勒蒂是在解读 1802 年在普利茅斯举行的“祖先登陆纪念日”纪念活动上的一段演讲。在那个演讲中,约翰·亚当斯宣称要纪念“这一人类积极而首创的社会契约的唯一典范。”乔治·威利森冷冷地指出,亚当斯“无视几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首先就是那些导致这一契约的环境,其实,这一契约只是少数人统治的工具。”^[51]当然,加勒蒂的解读还暴露了他在冰岛共和国、易洛魁人联盟以及 1620 年前的无数其他政体上的无知。这样的记述只会让学生成为种族中心论者。 84

历史教科书在虔诚地描写“始祖移民”的同时,也引进了“美国例外论”——根据这一观念,美国不同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任何国家,并且比它们优越。美国何以例外呢?首先,我们例外的“好”。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指出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理想的国度。”^[52]我们还例外的强大和坚韧;我们直面命运,用《美利坚盛典》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一直传承着足智多谋、适应力强的传统。”(且不说圣马力诺这个小国在公元前 301 年已经建成共和国,冰岛共和国在公元 930 年,瑞士在公元 1300 年前后都已经成为共和国。)根据我们的教科书,这些永恒的品质从“一开始”、在普利茅斯岩就已显现。布尔斯廷与凯利告诉我们,“始祖移民”们具有“希望与恐惧、乐观与悲观、自信与谦卑的完美结合,足以成为成功的定居者。这就是我们历史上最幸运的巧合之一。”“始祖移民”们这样一种令人愉悦的肖像,只有在忽略了瘟疫、可能发生的劫持以及他们与印第安人的那种关系等问题之后,才能勾画得出来。

为了突出这幅令人愉悦的图画,一些教科书淡化詹姆斯敦以及 16 世纪西班牙人定居点,把普利茅斯岩誉为美国诞生地的象征。据 T.H.布里恩的说法,弗吉尼亚“在后来的历史学家寻找美国文化的神秘起源方面,起到了误导作用。”^[53]历史学家们几乎很难说弗吉尼亚充满着道德,因为,用一位弗吉尼亚人所写的第一本弗吉尼亚史中的话说,“各派所关注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从那里带走财富,他们

更多的是想一夜暴富,而非建立一个常规的殖民地。”^[54]弗吉尼亚人和印第安人的关系也相当紧张。斯宽托志愿为殖民者服务,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弗吉尼亚的英国人扣押印第安人俘虏,强迫他们教殖民者种植。^[55]1623年,英国人在殖民地首次进行化学战,当时正在与靠近波拖马可河的以齐斯基阿克(Chiskiack)为首领的一些部落达成一项条约。英国人设宴招待,以示“永久友谊”,结果,这位首领与他的家人、谋士以及两百名随从全部中毒身亡。^[56]此外,早期的弗吉尼亚人非常懒散、经常争吵,甚至煮吃人肉。一开始,他们根本不种庄稼,成天在地下乱挖,寻找金子,结果一事无成。不久,他们饥饿难耐,挖掘腐烂的土著人尸体吃,或者卖身到印第安人家里做仆人——这些人一点不像一个伟大的国家所需要的 85 那种英雄般的奠基者。^[57]

教科书确实也写过弗吉尼亚殖民地,至少提到过西班牙人定居点,但是他们仍用50%的篇幅去描写马萨诸塞。当然,结果,也由于感恩节,学生们更可能记住这些“始祖移民”,视他们为美国的建国者。^[58]当我提到弗吉尼亚和西班牙人时,学生们会感到很尴尬,因为只要提示一下,他们也会想起自己听说过他们。但是,无论是我们的文化还是我们的教科书,都没有赋予弗吉尼亚与马萨诸塞同样的榜样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我所有的学生都知道那艘“始祖移民”的船只的名字,却几乎没有一人记得那三艘把英国人带来詹姆斯敦的船只的名字。(下次你参加那档取名为“即拍题”[*Jeopardy*]的电视抢答赛时,它们会被说成是“苏珊·康斯坦号”、“发现号”和“神速号”了。)

“始祖移民”虽然是在远离别的欧洲人占领地的地方定居下来的,但是他们也并非在“蛮荒之地”“白手起家”。在整个新英格兰南部,土著美洲人反复地焚烧矮树丛,建立起公园似的环境。在普罗温斯敦登陆后,“始祖移民”们组装了一艘探险船,开始四处寻找新的家园。他们选择了普利茅斯,因为那里有清理出来的场地,十分美丽,上面还有新近种植的谷物,“溪水清澈”,还有港口可以出航。对于一个镇子来说,这是一个好地方。的确,瘟疫之前,这儿一直是一个城镇,所谓“新普利茅斯”不是别的,正是斯宽托所在的帕图西特的一个村庄。入侵者们遵循一个套路:在整个新半球,欧洲人最好在土著人——如库斯科^①人、墨西哥城人、纳齐兹部族人和芝加哥人——之间安营扎寨。在整个新英格兰,殖民者选择靠近印第安人农田设立他们的定居地,这样可以省去清理山林和山地等辛苦劳作。^[59](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今天该地区有这么多的城镇的名字以菲尔德(field.)结尾——马什菲尔德 [Marshfield]、斯普林菲尔德 [Springfield] 以及迪尔菲尔德

① 库斯科(Cuzco),秘鲁南部城市,历史上为印加帝国首都。

[Deerfield]。)”挺进蛮荒之地”可能是1650年生动的布道演说题、1950年某本畅销书的书名,或者2000年某类教科书中的习语;但是,它从来是不确实的。新定居者们并没有遇到蛮荒之地。一位殖民者在1622年写道:“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海湾,已有大约2000印第安人居住。”^[60]

另外,不是所有的本地居民都灭绝了,而幸存者后来也为英国人的定居提供了方便。“始祖移民”们自到达马萨诸塞第二天开始,就受到印第安人的帮助。一位殖民者的航海日志讲述了水手们发现两座印第安人房屋的经过:

我们这些人拿着枪,听听没有人,就进入了房子,结果发现屋里的人都走了。水手们拿了一些东西,但没敢久留……我们本来想留一些珠子和别的东西给他们,以示和平,表明我们有意要和他们交易。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做,因为我们离开得太匆忙了。如果我们遇到了印第安人,我们会为我们带走的東西付钱的。

86

“始祖移民”不止掠夺过这一间印第安人的房子。我们的目击者继续讲着自己的故事:

我们进入了一个叫“谷物山”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先前也发现过谷物。在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过谷物的地方,我们开始刨地,结果挖出了更多的粮食,有满满两三篮子外加一袋子的豆子……我们总共有10蒲式耳,作种子足够了。正是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才发现了这些谷物;因为要不是我们遇见了一些可能会骚扰我们的印第安人,我们怎么能发现它们呢?

对于美洲印第安人(不经意间)提供的帮助,“始祖移民”们从一开始感谢的就是上帝,而不是美洲印第安人;虽然这些帮助为后来的感恩节埋下了伏笔。他们的航海日志继续写道:

次日早晨,我们发现了一个像坟墓的地方。我们决定挖掘看个究竟。我们先发现了一个垫子,下面是一个做工精致的弓箭……我们还发现了碗、盘子、碟子之类的东西。我们挑了一些好的带走,然后把尸体给盖上了。^[61]

那真是一个“像坟墓的地方”吗?

卡伦·库柏曼说,“始祖移民”很多年一直在盗墓,^[62]但更多的帮助还是来自于一位印第安活人:斯宽托。这又使我的学生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地盘——他们都学过斯宽托的传奇故事。《希望之地》的描述较为典型:

他解释说,每年夏天,都有英国渔民冒险进入新英格兰水域,斯宽托向这些渔民学习语言。斯宽托还教“始祖移民”们如何种植玉米、西葫芦和南瓜。没有斯宽托的帮助,我们不敢说这群人将如何生存。但是,到1621年秋天,殖民者和印第安人就能够坐下来,大宴几天,感恩上帝(后被视为第一个感恩节)。

87

对于斯宽托,大多数教科书都忽略了什么呢?首先,是他如何学习英语的。根据斐迪南·戈杰斯的说法,大约1605年,斯宽托还是个孩子,一个英国船长掠走了他和四个佩诺布斯科特人(Penobscots),把他们带到了英国。在英国,斯宽托一呆就是九年,其中三年给戈杰斯做工。最后,戈杰斯帮助斯宽托安排行程,让他回到了马萨诸塞。一些历史学家质疑斯宽托是否就是1605年被掠走的五个孩子之一。^[63]所有的原始资料都表明,1614年,一个英国奴隶贩子抓走了斯宽托和20多个印第安人,把他们带到西班牙的马拉加(Málaga)卖作奴隶。接着发生的事,使斯宽托这位恋家汉子就像当年的尤利西斯^①。斯宽托摆脱了奴隶的身份,从西班牙逃脱,回到了英格兰。他曾打算取道纽芬兰回家,在1619年,他对托马斯·德尔莫说,下次出航去科德角时,把自己也带上。

碰巧的是,斯宽托的奥德赛式传奇成为瘟疫故事的一个“噱头”,但我们的教科书宁愿不采用它。因为现在看来,当斯宽托再次踏上马萨诸塞的土地,走回位于帕图西特的家乡时,只能惊恐地发现,“他是唯一一位存活的村民。其他所有的人都在两年前的那场瘟疫中死去了。”^[64]无怪乎斯宽托只得把自己的命运与“始祖移民”们绑在一起。

现在,这竟成了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试比较一下《希望之地》中的这种苍白的描述:“他向英国渔民学习他们的语言。”^[65]

作为翻译、使节和技术顾问,斯宽托对于普利茅斯人头两年的生存至关重要。与来到美洲的别的欧洲人一样,“始祖移民”们在印第安人告诉他们之前,不知道吃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找食物和种植粮食。威廉·布莱德福德称,斯宽托“是上帝赐予他们的一个特殊工具,完全出乎他们的料想之外。他指导他们怎么种

① 尤利西斯,Ulysses,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Odysseus)。据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记载,他曾远征特洛伊,并在返航途中历经艰险。

植,在哪儿钓鱼,在哪儿得到别的商品;他还带领他们到一些他们不知道的地方赚钱。”向“始祖移民”提供帮助的不止斯宽托一人。在1621年夏天,马萨索伊特派另外一位名叫“霍布莫克”的印第安人作为向导和使节,在“始祖移民”们中间生活了好几年。〔66〕

“赚钱”是“五月花”号上多数殖民者的最初旅行动机。正如罗伯特·摩尔指出的,“教科书没去分析隐藏于我们的大多数历史之下的赚钱动机。”〔67〕此外,利润是通过皮货贸易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赚到的;要不是通过这种贸易,普利茅斯或许从来就不能自立。霍布莫克帮助普利茅斯人在缅因的佩诺布斯科特河与肯纳贝克河的河口、在马萨诸塞的阿普图科赛特,以及在康涅狄格的温莎,建立了毛皮贸易港。〔68〕欧洲人从来就无法想象也没想过要“大胆地去别人从没去过的地方。”他们只走向印第安人。〔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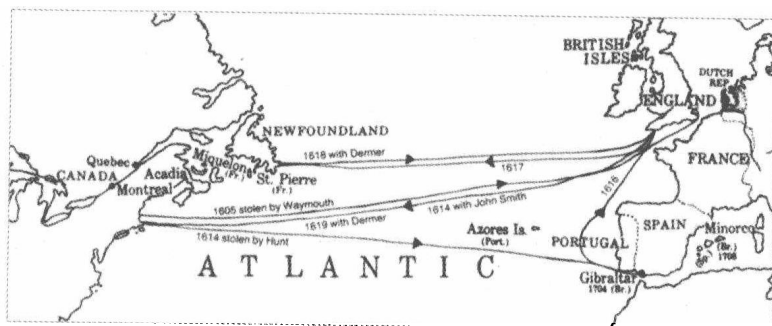


图3 斯宽托六次穿越大西洋

斯宽托的旅行经历使他对世界的了解比其他任何“始祖移民”都要广泛。他或许曾经六次穿越大西洋,在缅因、纽芬兰、西班牙、英国以及马萨诸塞都居住过。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想起感恩节。每年秋天,全美各小学的孩子都表演一个小道德剧:《第一个感恩节》,它讲述的是我们国家的起源之谜。剧目结束时,“始祖移民”们头戴纸做成的帽子,印第安勇士头插羽毛。感恩节是我们全国人民感谢上帝的恩赐的节日。庆祝之隆重,超过“独立日”和“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等这类弘扬爱国精神的节日,表达了我们的民族优越感。比如,我们已经知道,詹姆士国王和早期的“始祖移民”领导人感谢瘟疫,因为那说明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与感恩节相关的那些文化原型——上帝站在我们一边、从蛮荒到文明、从无序到有序、辛勤劳动以及“始祖移民”的优良品质——都仍然从我们的教科书中散发出来。几十年前,在分析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历史教学时,贝西·皮尔斯指出感恩节被赋予了政治用途:“由于这些无法超越的恩泽,小学生们被要求追随先人的脚步,忠心遵守这块陆地上的法律,继续先人们的未竟事业。”〔70〕

感恩节当晚有一个宴会仪式,米尔恰·伊利亚德从中看出了关于美国起源之

迷的全部仪式特征：

89

1. 它演绎了那些超乎自然之上的开国者们的行为史。
2. 它被认为是真实的。
3. 它告诉人们，一个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4. 在与起源神话相关的仪式中，人们“体验了关于起源的知识”，开始认祖归宗。
5. 这样，人使神话“复活”，并使之成为一种宗教。^[71]

在我手头的兰登书屋字典中，关于普利茅斯殖民者的词条标题不是“始祖移民”，而是“始祖移民之父”(Pilgrim Fathers)。直到近来，国会图书馆同样把其关于普利茅斯的馆藏置于“始祖移民之父”编目之下，当然，“之父”一词是大写的，意为“我们的国父”，而不是“始祖移民”孩子的爸爸。这样，感恩节就从历史学转到了宗教领域——罗伯特·贝拉称之为“公民宗教”。在贝拉看来，公民宗教能将社会整合到一起。1880年前后，普利茅斯岩获得了符号性的地位。当年，一些有事业心的城镇居民把水边的两块地连在一起，在周围建立了希腊式的神庙。今天，这座神庙成为圣地，《五月花号公约》也成为神圣的文本，我们的教科书像《国教公祷书》一样，表达着感恩节这一公民仪式背后的含义。^[72]

在瓦莱里安·佩吉特为威廉·布莱德福德的著名史书《普利茅斯种植园》所做的序言中，十分突出“始祖移民”历史中的宗教特征：

这一小群英国人自身并未想过自己是英雄和圣贤，但欧洲人却把目光投向他们，从他们身上汲取勇气，一步一步地前行。对于他们的子孙后代来说，自由理想之火如此清晰，如此旺盛……我们一直在思考的这一历史事件，导致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并且首先是导致了这个国家典型的人文精神的树立，为此，“始祖移民”们将自己牺牲在人子的祭坛上。^[73]

在这场祭祀中，“始祖移民”们不仅奠定了合众国的起源，而且激励了欧洲的民主精神，或许，还激发了今天全世界的全部的善！我猜想，早期的殖民者们，无论分离主义者还是英国国教徒，都会被逗笑了。

我们所进行的公民仪式使印第安人边缘化了。我们关于第一个感恩节的想象模型是这样的：森林聚会中传来哀号，“始祖移民”在几乎全裸的印第安人旁边呆板地做着礼拜，就像节日贺卡所写的：“我就是食物，我们邀请印第安人来一 90

起分享。”几十年来,在学童们带回家的出版物中,所有的无稽之谈被不断地发挥,还要加上标题,如:“他们奉上木瓜、火鸡、玉米和南瓜,印第安人从没看见过这样的盛宴!”当美国土著小说家迈克尔·多瑞斯的孩子从新罕布什尔小学把这段文字带回家时,多瑞斯指出,其实是“‘始祖移民’们没见过‘这样的盛宴’,因为以上提到的所有食物都是美洲的特产,一直以来都是由本地部落或者是在本地部落的帮助下提供的。”^[74]

我们这些“先进的”人提供的关于土著人的这一观念,与事实恰好相反,也是别有用心。它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反复出现,使我们的种族关系复杂化。例如,都说白人种植园主为奴隶提供食物和医疗;然而,在种植园里,奴隶的衣服是自己织的,粮食是自己种的,房子是自己建造的,或者,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今天,美国人认为,从外交援助上看,美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并认为这就是自己对世界政治的理解;然而,美国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美元都流向了美国。

感恩节的真实历史揭示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实。“始祖移民”们并没有引进新的传统,东方的印第安人几个世纪以来都懂得在秋天庆祝丰收。尽管乔治·华盛顿刻出几天作为全国感恩的日子,我们现在的感恩节却只上溯到1863年。在内战期间,联邦需要一切爱国主义精神,这样的纪念仪式应能鼓起这种热情,于是林肯宣布感恩节为全国性节日。“始祖移民”们与感恩节没有关系,直到19世纪90年代,“始祖移民”们才被纳入这一传统之中。由此可见,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们才以“始祖移民”为人所知。^[75]

美国历史书为感恩节赋予的意识形态含义加重了这种尴尬。关于感恩节的传奇导致了美国人的种族优越论情绪。毕竟,如果我们的文化有上帝支持,我们为什么还要考虑别的文化呢?这一种族优越论在上个世纪中期得到强化。在《种族与昭昭天命》一书中,雷金纳德·霍斯曼证明,“上帝在我们一边”的思想如何被用来证明盎格鲁-撒克逊人自认为的相对于墨西哥人、土著美洲人、太平洋上民族、犹太人,甚至天主教徒的优越性的。^[76]今天,当教科书以“始祖移民”们的历史来鼓吹种族优越论时,它们是在使学生不能向其他文化学习,也不能和其他民族相处。

有时,我们付出了更为直接的代价,那就是书刊审查。例如,1970年,马萨诸塞州商业部要求万帕诺亚格人派代表发表演讲,庆祝“始祖移民”登陆350周年。弗兰克·詹姆斯“被选上了,但是他必须首先提供一份演讲草稿,给负责这个仪式的白人审查。当他们看了他的演讲词后,却不允许他宣读它了。”^[77]詹姆斯是这样写的:

今天是你们的庆祝时刻，而不是我们的庆祝时刻。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我想到了我们所遭遇的那些事情……“始祖移民”们先是在科德角海滨探寻了4天，之后开始劫掠我们的祖坟，偷盗我们祖辈们的玉米、小麦和大豆……马萨索伊特，这位万帕诺亚格人的伟大首领，对这些事情是知道的。然而，他和他的族人依然欢迎这些殖民者，并和他们做朋友……他们不可能知道……再过50年，万帕诺亚格人……及其他与这些殖民者为邻的印第安人将死于他们的枪口之下，或因染上他们带来的疾病身亡……今天，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已不复存在，我们的语言几乎消亡，但是我们万帕诺亚格人仍行走在马萨诸塞的土地上……已经发生的一切，不能再改变。今天，我们仍在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好的美洲，一个有更多印第安人的美洲，在这里，人与自然再次变得重要。〔78〕

被马萨诸塞州商务部所审查掉的，并非无中生有的谎言，而是历史事实。如果允许詹姆斯演讲的话，那么他所说的没有一句话——除了“小麦”——是错误的。尽管盗墓、印第安人被卖作奴隶等行为在当时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我们今天的教科书大多数仍然不提它们。因此，我们今天关于“始祖移民”的普及性历史书籍已不再是为了获得真知，而是一种蓄意的遗忘。教科书对这些重要的事实只字不提，反而总讲那些令人舒畅的琐事，如：斯宽托的帮助、他的名字、谷物山里的鱼，有时甚至罗列第一个感恩节的菜单以及印第安人的出席人数。

我在这里紧抓住一些令人难堪的细节，这只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书对这类事实压制得太久了。“始祖移民”们在深秋出发，去开辟全新的大陆，其勇气可嘉。在头一年，“始祖移民”们也像印第安人一样，也遭受过疾病的折磨，如坏血病、肺炎等，一半的人都死掉了。“始祖移民”们接管了帕图西特，并非邪恶之举。他们并没有引发瘟疫，反而与深受其害的印第安村民一样，对其发病原因浑然不知。马萨索伊特当年非常高兴“始祖移民”们能利用海湾，因为帕图西特人正在死去，不再需要它了。“始祖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相当稳定地发展。新人们最终还是为自己挖到和带走的谷物向万帕诺亚格人付了钱。有些时候，欧洲人是受印第安人之邀才住在印第安城镇，以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部落或者附近强劲的欧洲势力的袭击。〔79〕总的来说，合众国的历史不像英格兰、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布隆迪的历史那样充满暴力和压迫，但也不格外地少有暴力。

要反对自我吹嘘的历史，并非就是要去写自我贬低的历史，而是要诚实地、

充分地再现历史。如果教科书作者们非进行道德说教不可——美国的起源神话就一直如此,那么,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这一任务,那就是,让学生了解关于“始祖移民”们的正反两面的传说。这样,冲突就会变成故事的一部分,学生们也许会发现,他们所学的知识对于自己的现实生活很有意义。只要得到正确的讲解,第一个感恩节那个时代的各种问题就可以使美国人更善于思考,更加宽容,而不是有更强的种族优越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作为那一神话的发祥地,今天成为这种做法的榜样。在1970年的静坐示威中,土著美国人与非土著人联合起来抵制对弗兰克·詹姆斯演讲的压制。在那一年,以及此后的每年11月,他们都会组织一场反抗游行——“全国哀悼日”,以直接针对传统的感恩节纪念活动。经过多年的冲突之后,普利茅斯不仅允许双方游行,而且拨款建立了两个新的历史标志来讲述万帕诺亚格人一方的历史。

教科书需要向普利茅斯学习。美国起源的神话可不是便宜货。歌颂“始祖移民”是危险的。我们的教科书为兜售“始祖移民”的理想模式所做的任何善意的删减和蓄意的捏造,都与马萨诸塞州商务部剥夺弗兰克·詹姆斯的演讲权的做法十分相近。确实,在历史学里,“真理应该保持神圣,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注释

[1] Michael Dorris, “Why I’m Not Thankful for Thanksgiving” (New York: 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 *Bulletin* 9, no. 7, 1978): 7.

[2] Francis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Indians, Colonialism, and the Cant of Conques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15.

[3] Howard Simpson, *Invisible Armies: The Impact of Disease on American Histor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80), 2.

[4] Col. Thomas Aspinwall, 引自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175.

[5] Kathleen Teltsch, “Scholars and Descendants Uncover Hidden Legacy of Jews in Southwest,” *New York Times*, 11/ 11/ 1990, A30; “Hidden Jews of the Southwest,” *Groundrock* (Spring 1992).

[6] Alfred W. Crosby Jr.,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72), 83. 我们的牛仔文化起源于西班牙,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类似于阿根廷的高卓人传统。

[7] 新版《美利坚盛典》还增加了对西班牙人统治的论述。

[8] James Axtell, "Europeans, Indians, and the Age of Discovery in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 (1987): 630.

[9] 这段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只不过,1620年与1621年之交的冬季并不特别寒冷刺骨,也没有让英国人感到吃惊,而在春季来临之前,印第安人也没有帮助他们。

[10] William Langer, "The Black Death," *Scientific American*, February 1964.

[11] 同上,另见 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6), 166-85.

[12] William H. McNeill, "Disease in History," 佛蒙特大学演讲, 10/ 18/ 1988. 我这里用“细菌”一词,后又用“病菌”一词,为的是更宽的含义,包括病毒与病原体。

[13]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34. 虽然人们在暴露户外之后会患上肺炎或其他疾病,但这种疾病并非来自于寒冷本身,而是由于人们生活在寒冷环境之中,他们的身体抵抗力太弱了。肺炎及其他的病原体并非潜伏于冰冷的湖泊以及积雪的山麓,而是在温暖的环境中,栖居在我们的身上,与我们一起生长。

[14] Peter Farb,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 (New York: Avon, 1969), 42-43; Hubbert McCulloch Schnurrenberger, *Diseases Transmitted from Animals to Man*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1975); 另见 Alfred W. Crosby Jr.,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31. 安第斯山脉的确有骆驼,但安第斯山脉太高了,使得疾病难以在骆驼或人之间传开;这一点可以从一个事实上得到证明,那就是,欧洲与非洲的流行病在1492年之后对这一地区的侵蚀要比其他地区弱得多。

[15] McNeill, "Disease in History";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37; Henry Dobyns, *Their Number Become Thinned*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3).

[16]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38-39, 该书指出,几乎每一代人都发生天花病,而天花瘟疫能够反复地吞噬掉这些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口。

[17]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201.

[18] Gregory Mason, *Columbus Came Late* (New York: Century, 1931), 269-70.

[19] Farb,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 268. See also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86;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210.

[20] Feenie Ziner, *Squanto* (Hamden, CT: Linnet Books, 1988), 141. 另见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48-52; Robert Loeb Jr., *Meet the Real Pilgrim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9), 23, 87; and Warren Lowes, *Indian Giver* (Penticton,

British Columbia: Theytus, 1986), 51. 还不止是“始祖移民”如此;伊莎贝拉女王炫耀说她一生只洗过两次澡,一次是出生时,一次是结婚前,见 Jay Stuller, “Cleanliness,” *Smithsonian* 21 (February 1991): 126–35.

[21] Simpson, *Invisible Armies*, 2;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37.

[22] Neal Salisbury, “Red Puritans: The ‘Praying Indians’ of Massachusetts Bay and John Eliot,” in Bruce A. Glasrud and Alan M. Smith, eds., *Race Relations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1607–1783* (Chicago: Nelson–Hall, 1982), 44; and Neal Salisbury, “Squanto: Last of the Patuxets,” in David Sweet and Gary Nash, eds., *Struggle and Survival in Colonial Ame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231–37. Dobyns 同意, 1617 年的大瘟疫是鼠疫, 但是又认为, 它从佛罗里达开始, 席卷了大西洋海岸; 见 *Their Number Become Thinned*. William Bradford, *Of Plimoth Plantation*, rendered by Valerian Paget (New York: McBride, 1909), 258, 该书认为, 印第安人知道, 1617 年肆虐他们的那场流行病并不是天花, 因为在描述 1634 年天花爆发时, Bradford 指出, “他们担心它比瘟疫更遭。” 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 87, 他赞成这次是水痘。

[23] 当然, 这里不包括美洲的其他瘟疫。Cushman 的这段话引自 Charles M. Segal and David C. Stineback, *Puritans, Indians, and Manifest Destiny* (New York: Putnam’s, 1977), 54–55.

[24] Simpson, *Invisible Armies*, 6.

[25] 同上, 7.

[26] Cushman, 引自 Segal and Stineback, *Puritans, Indians, and Manifest Destiny*, 54–55; William S. Willis, “Division and Rule: Red, White, and Black in the Southeast,” in Leonard Dinnerstein and Kenneth Jackson, eds., *American Vistas, 1607–187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66.

[27] 具体而言, 一度敌对的马萨诸塞人口从 4500 锐减到 750, 幸存者皈依基督教; 见 James Axtell, *The European and the Indi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252, 370; see also James W. Davidson and Mark H. Lytle, *After the Fact* (New York: McGraw–Hill, 1992), iii.

[28] Bradford, *Of Plimoth Plantation*, 93; 参见 Peter Hulme, *Colonial Encounters* (London: Methuen, 1986), 147–48.

[29] John Winthrop 致 Simonds D’Ewes, 7/ 21/ 1634, *Publications of the Colonial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 1900–02, 7(12/ 1905) 71, at books.google.com/books.

- [30] Karen Ordahl Kupperman,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 (London: J. M. Dent, 1980), 186; cf. Simpson, *Invisible Armies*, 8.
- [31] Tee Loftin Snell, *America's Beginning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1974), 73, 77.
- [32]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50-51
- [33] 同上, 202-15.
- [34] Simpson, *Invisible Armies*, 35.
- [35] Dobyns, *Their Number Become Thinned*.
- [36] David Quammen, "Columbus and Submuloc," *Outside*, June 1990, 31-34. Cf.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49;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205-7.
- [37] James Brooke, "For an Amazon Indian Tribe, Civilization Brings Mostly Disease and Death," *New York Times*, 12/ 24/ 1989. 土著文化也在继续被连根斩断, 见 Amnest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gains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 Amnesty International, 1992). Charles Darwin (查尔斯·达尔文), *Voyage of the Beagle*, 转引自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vii. 达尔文还了解到, 同样的惨剧在欧洲人、亚洲人或者非洲人与那些原本隔绝的人群相遇时一再发生, 从澳大利亚到复活节岛, 从夏威夷到西伯利亚, 莫不如此。因此, 举例来说, 南太平洋的马克萨斯群岛的人口在与外界初次接触时为 10 万, 但到 1955 年, 只剩 2500; 见 Thor Heyerdahl, *Aku-Aku* (Chicago: Rand McNally, 1958), 352.
- [38] Langer, "The Black Death," 5; 另见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 [39] Farb,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 294-95.
- [40] Colin McEvedy, *The Penguin Atlas of North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1988), 3. McEvedy 是一位临床精神病医生。
- [41]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16.
- [42] Bradford, *Of Plimoth Plantation*, 258.
- [43] Hurtado, *Indian Survival on the California Fronti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
- [44] 关于欧洲人到来之前的人口数的估计, 相关文献有: P. M. Ashburn, *The Ranks of Death* (Philadelphia: Porcupine, 1980 [1947]); Woodrow Borah, "The Historical Demography of Aboriginal and Colonial America," 载 William Denevan, ed.,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6), 13-34; Sherburne Cook and Woodrow Borah, *Essays in Population History*:

Mexico and the Caribbean, vol. 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Jared Diamond, "The Arrow of Disease," *Discover*, October 1992, 64-73; Dobyns, *Their Number Become Thinned*, 42; Jennings, *Invasion of America*, 16-30; Simpson, *Invisible Armies*; David Stannard, *American Holocau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1-24; 以及 Russell Thornton, *American Indian Holocaust and Survival: A Population History Since 1492*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7) 及 "The Native American Holocaust," *Winds of Change* 4, no. 4 (Autumn 1989): 23-28. 关于人口方面的文献的介绍, 见 Melissa Meyer and Russell Thornton, "Indians and the Numbers Game," 载 Colin Calloway, ed.,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Indian Histo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8), Ch. 1.

[45] 《美利坚盛典》中有段话确实提到了整个东半球的90%的税赋, 但是只字不提普利茅斯的瘟疫。

[46] 引自 Ziner, *Squanto*, 147.

[47] J. W. Barber, *Interesting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Barber, 1829), 30. Barber 没有指出他引证的专家。

[48] 虽然弗吉尼亚当时包括新泽西的大部, 但“五月花”号还是在西北部数百英里之外登陆了。认为“始祖移民”们的目的地就是科德角的历史学家有: George F. Willison, *Saints and Strangers* (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 1945); Lincoln Kinnicutt, "The Settlement at Plymouth Contemplated Before 1620,"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20): 211-21; and Neal Salisbury, *Manitou and Provid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09, 270. 另一方面, Leon Clark Hills, *History and Genealogy of the Mayflower Planters* (Baltimore: Genealogical Publ. Co., 1975), and Francis R. Stoddard, *The Truth about the Pilgrims* (New York: Society of Mayflower Descendants, 1952), 19-20, 都支持“荷兰人贿赂”说, 并且基于 Nathaniel Morton 的第一手材料。普利茅斯种植园的历史学家都支持“航海错误”或“风暴”的解释。

[49] Ziner, *Squanto*, 147; Kinnicutt, "The Settlement at Plymouth Contemplated Before 1620"; Almon W. Lauber, *Indian Slavery in Colonial Times Within the Present Lim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iamstown, MA: Corner House, 1970 [1913]), 156-59; Stoddard, *The Truth about the Pilgrims*, 16.

[50] 根据我们手头的好几本教科书所说, “五月花”号向南航行了半天, 后来遭遇了“危险的浅滩”。于是, 船长与“始祖移民”领导人们都坚持返回普罗温斯敦

(Provincetown), 最终到达了新普利茅斯。“共谋”说认为这是个计谋,以阻止多数人坚持去弗吉尼亚;见 Willison, *Saints and Strangers*, 145, 466; Kinnicutt, “The Settlement at Plymouth Contemplated Before 1620”; and Salisbury, *Manitou and Providence*, 109, 270.

[51] Willison, *Saints and Strangers*, 421-22.

[52] 在苏福尔斯(Sioux Falls)的演讲, 9/ 8/ 1919, 引自 *Addresses of President Wils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86.

[53] T. H. Breen, “Right Man, Wrong Plac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1/ 20/ 1986, 50.

[54] *Robert Beverley*, 1705, 引自 Wesley Frank Craven, *The Legend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83 [1956]), 5-8.

[55] Axtell, *The European and the Indian*, 292-95.

[56] J. Leitch Wright Jr., *The Only Land They Knew*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 78.

[57] Kupperman,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 173; James Truslow Adams, *The March of Democracy* (New York: Scribner's, 1933), 1:12.

[58] 我在新英格兰接触过大多数的这些学生,但是他们很多来自费城远郊、华盛顿特区或者新泽西州。我怀疑,或许除了那些来自偏远西部的学生之外,其他地区的学生也会做出同样的回答。

[59] Gary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4), 139, 该书描述了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同样情形。

[60] Emmanuel Altham 的信,引自 Sydney V. James, ed., *Three Visitors to Early Plymouth* (Plymouth: Plimoth Plantation, 1963), 29.

[61] 有没有一个关于“始祖移民”们的这一行径的类似的仙女传说呢?像仙女一样,“始祖移民”们破门、侵入、破坏、盗窃;像仙女一样,教育者们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是雅利安人。在仙女传说中,仙女使其受害者不那么具有人性,我们的历史书展现印第安人的那种阴暗方式也是使“始祖移民”们的受害者不具人性。我要感谢 Toni Cade Bambara 所做的关于仙女的这种分析。

[62] Kupperman,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 125.

[63] 所有的五个人除“斯宽托”或“替斯宽图姆”(Tisquantum)外,都还有其他名字,但印第安人有时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部落,有不同的名字。斯宽托的传记作者 Feenie Ziner 认为他就是这五人中的一个。而 Ferdinando Gorges(斐迪南·戈杰斯)在 1658 年指出,斯宽托就是 1605 年被诱拐的人之一,并与自己在英国

一起生活了三年,对此, Kinnicutt 深信不疑 (“The Settlement at Plymouth Contemplated Before 1620,” 212-13), 但是, 研究普利茅斯种植园的历史学家们却没有人相信, Neal Salisbury 也不相信 (*Manitou and Providence*, 265-66), 只不过, Salisbury 似乎更为积极一些, 见 “Squanto: Last of the Patuxets.” 另见 Lauber, *Indian Slavery in Colonial Times*, 156-59.

[64] Simpson, *Invisible Armies*, 6.

[65] 有一本教科书, 即最新版的布尔斯廷与凯利的教科书, 提到了斯宽托的村庄的被奴役与被毁灭。

[66] William Bradford, *Of Plimouth Plantation*, 99. See also, inter alia, Salisbury, “Squanto: Last of the Patuxets,” 228-46.

[67] Robert Moore, *Stereotypes, Distortions, and Omissions in U.S. History Textbooks* (New York: CIBC, 1977), 19.

[68] Robert M. Bartlett, *The Pilgrim Way* (Philadelphia: Pilgrim Press, 1971), 265; 以及 Loeb, *Meet the Real Pilgrims*, 65.

[69] Charles Hudson et al., “The Tristan de Luna Expeditions, 1559-61,” 载 Jerald T. Milanich and Susan Milbrath, eds., *First Encounter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89), 119-34, 该文对欧洲人在食物上对印第安人的依赖做了生动的描述。其中讲到人们不太知道的第二批西班牙远征队(继德·索托之后)进入了今天美国的东南部地区。由于印第安人从那里撤离, 并烧毁了自己的庄稼, 欧洲人几乎饿死。

[70] Bessie L. Pierc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6), 113-14. 另见 Alice B. Kehoe, “‘In fourteen hundred and ninety two, Columbus sailed...’: The Primacy of the National Myth in U.S. Schools,” 载 Peter Stone and Robert MacKenzie, eds., *The Excluded Past* (London: Unwin Hyman, 1990), 207.

[71] Mircea Eliade, *Myth and Re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3), 18-19.

[72] Robert N. Bellah,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Daedalus* (Winter 1967): 1-21. 关于普利茅斯岩, 见 Hugh Brogan, *The Pelican History of the U.S.A.*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1986), 37. 另见 Michael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207-10.

[73] Valerian Paget, 序言, *Bradford's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Settlement, 1608-1650* (New York: McBride, 1909), xvii.

[74] Dorris, "Why I'm Not Thankful for Thanksgiving," 9. 为了更准确,我作了一点补充。

[75] Plimoth Plantation, "The American Thanksgiving Tradition, or How Thanksgiving Stole the Pilgrims" (Plymouth, MA: n.d., photocopy); Stoddard, *The Truth about the Pilgrims*, 13. Jeremy D. Bangs, "Thanksgiving on the Net: Roast Bull with Cranberry Sauce Part 1," Society of Mayflower Descendant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Web page, sail1620.org/discover_feature_thanksgiving_on_the_net_roast_bull_with_cranberry_sauce_part_1.shtml, 1/ 2007.

[76] Reginald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5.

[77] Arlene Hirshfelder and Jane Califf, "Celebration or Mourning? It's All in the Point of View" (New York: 涉及种族关系儿童读物委员会《公告》(*Bulletin*) 10, no. 6, 1979), 9.

[78] Frank James, "Frank James' Speech" (New York: 涉及种族关系儿童读物委员会《公告》(*Bulletin*) 10, no. 6, 1979), 13.

[79] 然而, Willison, *Saints and Strangers; Salisbury, Manitou and Providence*, 114-17; Wright, *The Only Land They Knew*, 220. *Salisbury, Manitou and Providence*, 120-25, 从一开始就讲到了普利茅斯殖民者在与印第安人打交道时的黩武主义以及强制性。

第四章

红眼人^①

不对其本土的先人、盟友以及仇人给予密切而持续的关注，要理解盎格鲁-美利坚的形成是不可能的。

——詹姆斯·阿克斯特尔^[1]

准确地说，入侵者也知道其他欧洲人会质疑他们的事业的道德性。因此他们(准备了)……大量的宣传品，以排除其同胞的迟疑。这些宣传渐渐成为一种带有习惯思维与含义的意识形态标准。我们今天仍生活在其中。

——弗朗西斯·詹宁斯^[2]

记忆说：“我做了”；但虚荣心说：“我不可能那样做”。最终，记忆让步了。

——弗里德里希·尼采^[3]

在这整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印第安人不会因为这些教科书而深陷苦闷和沮丧之中，也没有一位印第安人的孩子不是带着羞辱与眼泪回家。

——鲁珀特·科斯托^[4]

古老的神话从不会消亡——它们只是深藏于教科书之中。

——托马斯·贝利^[5]

从历史上看，美洲印第安人是我国居民中蒙受谎言伤害最多的一群人。这就是为什么迈克尔·多瑞斯说，在了解土著美洲人时，“人们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

① 红眼人, red eyes, 在此一语多关, 既表示印第安人据说的红皮肤和红眼球, 又表示印第安人及其同情者因其苦难而哭红了双眼, 还表示用印第安人的视角去看待历史。

从零下十度开始。”^[6]中学生从零度以下开始,因为他们的教科书用白人的眼光论述土著美洲人,并且毫无歉意。今天的教科书应该有所改进,特别是由于历史学家所称的“印第安史”(尽管印第安人也是多种族的)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盛,而编写新教科书所需要的那些资料目前在图书馆都已经上架。

近些年来,教科书在土著人问题上有所进步。1961年,畅销的《美利坚民族的兴起》包含了十幅土著人肖像插图,有的是单独的,有的是与白人一起(白人插图共268幅)。这些插图大多数都集中于原始生活以及蛮族战争这类主题上。25年后,该书以“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为名再版,这一版本包含了15张美洲印第安人的图片,更重要的是,土著印第安人不再被描绘为单向度的原始人,而成为一群积极为坚守自己的身份与土地而斗争的人,其中包括:梅塔科米特(Metacomet,即“菲利普王”)、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美国革命中的第一位伤亡者,带有一半黑人血统)、希科雅(Sequoyah,发明了切罗基族字母表),以及二战中的一批纳瓦霍人(Navajo)密码员。2003年,该书又以“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为名再版,这个版本里有43幅美洲印第安人插图。2000年以后出版的其他教科书继续保持这一重视土著美洲人的倾向。《美国人》最为突出,它忠实地写进了本章以下将要讨论的一些事件。《美利坚之旅》这本初中教科书次之。 94

然而,正如詹姆斯·阿克斯特尔1987年所指出的,美国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仍“需要参加一个文化相对主义和种族敏感性的速成班”。《美国人》是这些教科书中卖得最好的,但连它一开始也仅花了两页去介绍本杰明·威斯特^①的油画《佩恩与印第安人的条约》。这幅画作于1771年,它所描绘的事件过去几乎一个世纪了。威斯特遵循惯例,描绘穿戴整齐(甚至戴了帽子、领带,穿着大衣)的欧洲人与几乎赤身裸体的美洲人交换货物。当然,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两群出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人,会穿着如此不同。艺术家无意于写实,他想要展示“原始”(美洲印第安人)与“文明”(欧洲人)的对比。

阿克斯特尔还批评教科书仍然使用诸如“杂种”、“血案”、作战时“嗷嗷叫”之类的字眼。^[7]实际上,把一些较温和的词语,比如“边疆精神”、“定居者”等留作形容白人,也同样是有偏见的。如果我们丢掉我们的美国气,听一下博茨瓦纳的这句经常听到的话(取自《美利坚之旅》)就非常奇怪了:“1637年,在康涅狄格,‘定居者’与皮科特族(Pequot)发生了战争。”实际上,皮科特人在康涅狄格的村庄里可能生活了几千年之久,他们才是“定居者”,而英国人是新来者,在那里至多才生活三年;英国商人也只是在1634年才开始在温莎镇安营扎寨。用“白人”来代 95

① 本杰明·威斯特(Benjamin West,1738-1820),美国画家。

替“定居者”，表达起来较为准确，但也更“令人不安”；而用“入侵者”来表达则更为准确，同时也更为令人不安。



图1 威廉·潘

一位近乎赤身裸体的美洲印第安人握着威廉·潘(William Penn)的手。

这个砂石雕塑伫立在国会大厦里。我曾在八月到过费城，我敢说，如果那时真的有这个谈判，潘几乎会被热死。我也曾在感恩节过后到过费城，我敢说，如果那场谈判发生在冬天，土著人可能会被冻伤。

更糟糕的是，教科书作者们总是用“习惯性推断和用语”构成的总体性解释框架“解释”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关系，这个框架已沿用了几个世纪。教科书的作者们仍然在为取悦“定居者”的后人而书写历史。

我们对印第安人及其与欧洲和非洲入侵者之间的关系探寻，不可能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旅程。土著美洲人不是、也不应该是摆在某种历史主题公园里的一些道具，让我们去消遣快乐的时光，体验异国风情。人类学家索尔·塔克斯指出：“我们对世代生活在北美的人所干的那些事，是我们的‘原罪’。”^[8]如果我们正视印第安人的历史，我们就会变成“红眼人”；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那就是我们的过去。现在，是教科书该让白人孩子靠边站了，即便不带着一双“红眼”，也要带上几个令人深思的发问。

今天的多数教科书至少想正确对待印第安文化。在我所考察的12本教科书中，一开始都几乎用了不下五页的篇幅预先讨论土著人的社会。^[9]从一开始，美洲印第安人社会就是教科书的一个难点。^[10]教科书的作者们只是考古学、人类植物学、语言学、人类生理学、民间传说研究、文化人类学、人种史学以及其他相关

学科的消费者,而非专业人士。这些领域的学者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尽管尚属假说——关于欧洲人和非洲人到来之前,美洲所发生的事情。不幸的是,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把考古学等当作死的学科,希望从中发掘答案。诚然,这些领域研究的是死人,但是死人是活生生的争论话题。每年,都有报刊用大幅标题报道诸如在巴西发现的四万年前古人取火造饭留下的碳化物,宾夕法尼亚的新的考古挖掘,或者关于中国、欧洲或非洲某个新的人类遗存、器物或观念的推论。2007年,有证据显示,彗星可能在一万三千年前进入过地球的大气层,使北美的多数地区一片火海,结果大火可能灭绝了大型动物,比如马、乳齿象,并使地球上的人口急剧减少。^[11]

然而,“可能”这一措辞并不适合教科书的风格,教科书需要给出准确的答案。只有《美国的冒险历程》承认不确定性。该书坦言:“本书今天读起来或许已经过时”,进而断言,人类在美洲生活了一万两千、两万一千或四万年。结果,《美国的冒险历程》虽然是这12本教科书中出版最早的,但它对于前哥伦布时代的描述仍没有过时。^[12]其他的教科书大多数仍带有往常的正规语调。关于人类在美洲的居住时间问题,有人认为始于一万两千年以前,有人提出已居住了七年以上。^[13]一些科学家认为,几千年间,早期定居者一浪接着一浪地到来;还有一些科学家根据基因的相似确信多数土著人都源于一个小群体。^[14]多数教科书只选择其中的一种观点,并认为那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某些新出的教科书加入了这样的“可能性”,比如《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提到人“可能尾随着兽群而至”;但接下来,像其他的教科书一样,它们只提供一种单一的知识给学生去记忆。

教科书的作者们需要走得更远些。徒步穿越白令海峡的说法只是一种假说。他们应该同时让人听到其他的学说,比如“渡船说”。他们不应该自己包揽一切,而要让学生在网络和图书馆里任意浏览,学生和老师脑子里都应该时刻想着要发现什么,想着如何找到真正有价值的新发现。这样一来,每一学年的课程都可能从学生们的争论开始,学生们选择不同的数据和路径,每个人都从词源分析、遗传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中搜罗证据去证明自己的结论。学生们会乐此不疲。从一开始,他们就会意识到,历史还有很多疑问,历史不是一堆让人记忆的毫无生气的史实。

我们刚才看到了教科书从一开始就缺乏思想活力。那些人是如何到达那里的?每本书都说着与布尔斯廷及凯利同样的话:

地球表面如此多的水都冻结成了冰,白令海峡的海平面下降了。这样,他们在追逐野味时,能够步行穿越那段从西伯利亚到阿拉斯加之间的

56英里的路程。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发现了两块大的陆地,那里完全无人居住,但却到处是野味……几千年过去了,其他的人群随之而来。这一小群人渐渐蔓延到北美洲和南美洲。

实际上,多数学者仍然接受的那个徒步穿越白令海峡的说法,其考古证据是 97 很薄弱的;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相信,当时可行的方法是乘船漂洋过海,或者是有意为之,或者是出于偶然。毕竟,人们至少在四千年前才到达澳大利亚,不论在冰川期的陆地上堆了多厚的冰,你也不能徒步穿越华莱士线^①这个海洋分界线到达澳大利亚。当然,考古学家还没有从世界任何地方发掘出一万年以前的渡船遗迹。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石器以外,没有什么人工制品能够保存这么持久,也没有哪种人类原始到使用石船的程度。但证据的缺乏不证明事实就不存在。^[15]

我认为,教科书的作者们之所以喜欢写穿越白令海峡的故事,是因为那符合他们整个故事的生硬的进步线索。那些人被刻画为原始和野蛮的,并被含糊地称为“尼安德特人”。这种描述——他们是蒙昧的,只知道与自然以及他人做斗争——或许为其关于“一定是徒步的”这一论断提供了基础。早期美洲人与我们不同,他们没有那么聪明,只能徒步行走。^[16]他们当然是蒙昧的,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了两块大的陆地。”这真是令人震惊的论断。真不知道我们的作者在至少一万一千年后写作那一事件时,是如何知道这些第一批的定居者是如何思考的,或者,换个说法,是如何知道他们没想到自己到达了新大陆的。约翰·加勒蒂的《美国历史》给出了同样的论断:“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今天,“大陆”指的是“一个大块的、四周被水环绕的陆地。”那时的人如何能知道加拿大的庞大——它本身比澳大利亚还要大,又如何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一个大块的陆地呢?这些第一批定居者想必是愚蠢之至了。^[17]

当加勒蒂说“流浪者们”“缓慢地向南和向东迁徙……几千年过去,他们的足迹遍布南北美洲”时,依然在坚持那种“精神迟钝”的描述。实际上,许多考古学家认为,当时人们在一千年之内就到达了美洲的大多数地区,其速度之快,使考古学家们不能轻易地判定他们迁徙的方向和时间。当我们的考古发掘向西北进展,穿越育空河(Yukon),跨过阿拉斯加时,发现的古物并非渐次古老。^[18]而且,即便第一批美洲人的确是徒步到达的,他们也一定只是一些像哥伦布那样的探险者。

加勒蒂喋喋不休,继续说第一批定居者是相当傻的:“没有哪群人能够发明哪怕是最简单的机械,用机械甚或畜力代替人力。”但这不是美洲人的“缺陷”。那 98

① 华莱士线(Wallace's line),是英国科学家华莱士(A. R. Wallace)于1868年提出的著名生物地理学界线,大致位于印度洋与大洋洲之间。

里当时没有“畜力”。换句话说,在欧洲与亚洲,在1769年之前的时代,大多数的“简单机械”主要依靠马、黄牛、水牛、骡子等家畜——这些牲畜在美洲还不为人知。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贾雷德·戴蒙德指出,至少,找到这些动物进行驯养,是促成发明机械和我们称之为“文明”的劳动分工的关键因素。^[19]

所有的教科书都拘泥于“野蛮——半开化——文明”这一人类学的旧学派,这一学派可追溯到L. H. 摩尔根和1875年前后的卡尔·马克思。这些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很可能在大学时代的人类学课堂上接触过这种思想;然而,这类学说今天已经没有人讲授了。加勒蒂照搬老套的进化论说:“那些耕种土地,而不只是狩猎和采集食物的人会生活得更安全、更舒适。”显然,作者没听说过“原始丰裕论”:这种学说四十年前就告诉人类学者,狩猎与采集生活会更加舒适。《美国历史》当时还说出这种更愚蠢的错话:“这些农业人口虽然有时也会为自己的土地激战,但大体上是和平的。另一方面,猎人和漫游者更加好战,因为他们需要四处流动,因而常常与其他人群发生冲突。”这里,加勒蒂夸大了“文明社会”与“文明”的优越性。几十年前,大多数人类学者开始挑战这一过时的思想体系,断言狩猎采集人群比农业人群生活得更加和平,现代社会更加好战。我们只要还记得20世纪的历史,就立刻明白,暴力可以与文明一同成长。

大多数教科书的确认为某些土著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和玛雅人——是文明的,但这只是基于当年西班牙征服者的这样一种假设:财富等于文明。《美国的冒险历程》里有句话:“与加勒比海的未开化的人不同,阿兹特克人是富裕而繁荣的。”布尔斯廷和凯利甚至对此也不愿接受。在仅用一页介绍了玛雅人、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先进文明后,布尔斯廷和凯利接下来对他们给予了较低的评价:“与欧洲人不同,他们没有造船航海,没有远航世界。在他们的封闭环境里,他们很难学习新的方法。西班牙人到来时,印加人、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似乎停止了进步。他们过于成熟,只待被征服了。”

这段话与其他问题一样,都是糟糕的历史学。事实上,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西半球的变化日益加速。印加人在此前的一个世纪里就建立了自己的广阔帝国。⁹⁹阿兹特克人也通过联盟和军事手段在更晚近的时期统治了墨西哥的中部地区。

对于布尔斯廷和凯利而言,北部地区——相当于今天的美国——的土著人要比那些“不进步的”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印加人更加落后。当然,如果布尔斯廷和凯利全面考察一下1392年的世界,他们就不会认为美洲与欧洲的文明有着如此决定性的差异。历史学家谈论着那些人的被征服,并提出种种理由证明那是对的,这是“宿命论”的世俗版本。在社会学中,我们把这种说法叫做“责难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美利坚盛典》的作者们所做的,就是如此:

欧洲人很快得出结论：人是地球的主宰，人通过技术改变地球的面貌；土著美洲人则不同，他们既不想、也没有办法主动地控制自然……他们稀疏地散落在大陆各处，那里广大地区实际上都人迹罕至。在1492年这一关键时刻，或许只有不到400万土著美洲人“插足”安静而原始的森林，或者在北美的各条波光粼粼的处女河里泛舟。他们沉浸在欣喜中，茫然不知封闭的美洲历史即将一去不复返。

这段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体现了出版商试图出版一本可以不断再版的教科书时所造成的可悲结果。1956年，托马斯·贝利写出了这本貌似不朽的教科书的第一个版本，其实当时就有人知道关于土著美洲人的这些陈词滥调是错误的。前面第三章也指出了这类“蛮荒论”的谬误，仅从一点看，它的数据就有问题，仅在墨西哥的中部谷地，当时就生活着大约二千五百万人。在北美洲的其他地方，居住着大约两千万人。而且，设想习惯穿鹿皮鞋的印第安人“插足”原始大森林是说不通的；而生活在今天的美国一带的土著美洲人大多数都从事农业。该书初版于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现在已经是第13版。1956年的初版可能有其“作者”——托马斯·贝利。现在的版本出自谁手，则要由人猜测了。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人——当然不是托马斯·贝利，他早已不在人世；可能也不是那两位署名作者——意识到教科书需要提到“哥伦布交换”，以及1492年之后导致美洲印第安人口锐减的流行病。结果，该书在后面一页讲到了这些令人惊愕的人口锐减，但又没有认识到这与上面那段话前后不符。因此，托马斯·贝利用他自己的著作证明他说过的话：“古老的神话从未消亡，它们只是深藏在教科书之中。”布尔斯廷和凯利更不合格，他们仍然完全忽略了“哥伦布交换”。

即便最好的教科书也难免会把“原始”美洲人与现代欧洲人相对照。这些书籍的部分问题在于，它们把北美乡村与欧洲城市相比——把马萨诸塞与伦敦相比。将特诺奇蒂特兰城与苏格兰乡村相比，会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当科特兹^①到来时，特诺奇蒂特兰城是一个拥有10万到30万人口的城市，根据随行的伯纳尔·迪亚兹记载，它的中心集市繁忙喧闹，“嘈杂之声四英里以外都能听见。”^[20]如果作者们能够抛弃“野蛮——半开化——文明”这一线索，事情就会好得多。毕竟，从那些普通居民的眼光看，生活在马萨诸塞或苏格兰，与生活在伦敦或阿兹

① 科特兹(Hernand Cortés, 1485-1547), 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探险家。后文的伯纳尔·迪亚兹(Bernal Diaz)是其随从, 著有《新西班牙征服记》。

特克的墨西哥一样地“先进”而舒适。

长期以来,土著美洲人一直在谴责教科书的作者们把“文明的”这一形容词留着指称欧洲文化。1927年,一个名叫“美洲印第安人篝火大会”的土著领导人组织批评教科书“对我们人的生活的不公正”。他们追问:“什么是文明?文明的标志是:高尚的信仰和哲学、悠远的艺术、动人的音乐、丰富的故事与传说。这些我们都有。因此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是文明的种族。”^[21]

即便赞赏土著文化,但如果没能挑战那种“原始—文明”的模式,也将助长种族主义。那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夸大了“文明的”这一词语的日常意义——“优雅的与开明的”,以及人类学家对其下的唯一定义——“复杂的劳动分工”。当我们仔细考察这一模式时,它立刻变得问题重重。比如,德意志第三帝国是文明的吗?大多数人类学家会说是的。我们怎样才能认为文明的第三帝国要比哥伦布所遇到的那个原始的阿拉瓦克社会要好?如果我们拒绝为第三帝国贴上“文明”的标签,我们是否就不把这一术语用作表示“礼貌与优雅”?如果这样,我们就应该说阿拉瓦克人是文明的,并且应该把哥伦布及其西班牙同行们说成是原始的——即便不是野蛮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以复杂的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社会,其突出标志常常是不平等,并且供养着一支大规模的、专业化的军队。恰恰是这些“文明的”社会有可能使用野蛮的暴力去征服那些“原始的”社会。^[22] 101

不假思索地运用“文明的”与“文明”这两个词语,阻碍了对“不文明”的人或社会的世界观及其社会结构的真正探寻。1990年,乔治·H.W.布什总统指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说:“整个文明的世界都在反对伊拉克,”——这恰是一个讽刺:贯穿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是已知的最早的文明发祥地。

在我所考察的新历史教科书中,有三本“从头开始”的新教科书要比老式教科书有所进步。他们认识到了土著社会的多样性。他们讲到了东北部易洛魁人的“五族同盟”、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冬节”、西南地区的崖居生活,以及东南部纳齐兹族(Natchez)的等级制度。然而,它们用六或八页的篇幅描写10或20种不同的文化,这些教科书很难达到精细的学术水平。因此,它们只是在猎奇。即便乔克托族(Choctaws)比纳齐兹族人数更多,在美国历史上更为重要,他们仍是平常的。学生们并不会在他们的教科书中所刻画的那些土著美洲人身上找到自己会认同的很多“正常人群”。

在接触到欧洲人和非洲人之后,美洲印第安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土著美洲人把许多事物加入自己的文化,不仅有枪支、毛毯和水罐,而且还有新的食物、新的居住方式以及基督教思想。多数美国教科书只强调一支印第安人——大平原印第安人的这种转变。西班牙人把马引入美洲西部后,多彩文化开始快速繁

殖，这是文化融合方面的一个令人愉快的例子——它把两种不同的文化的一些因素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某些新的东西。^[23]然而，大平原人的文化转型，只是文化变迁的冰山一角，当欧洲人把土著人与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更深刻的变形发生了。直到今天，这一过程仍在影响着那些原本独立的文化。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挪威的拉普兰人用雪地汽车代替了狗拉雪橇，结果发现自己容易受到阿拉伯石油封锁的打击。^[24]20世纪90年代，很多土著美国人 102 用他们新的娱乐业与旅馆业将自己与世界经济连到一起，不仅发家致富，而且赢得了自己的那些非土著邻人的尊重。这种联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或许难以对其做出褒贬；但它不能被忽视，因为它对理解欧洲人当年如何占领美洲是至关重要的。

在北美大西洋岸，许多印第安族都拥有高超的技能，从编织不漏水的篮子，到懂得什么植物可以止痛。一开始，土著美洲人用玉米、海狸皮、鱼、橡木等物品交换法国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的车轴、毯子、布匹、珠子和水罐，等等。然而，很快，欧洲人劝说土著人专门从事毛皮和奴隶贸易。土著美洲人比欧洲人更擅长追猎和铺设陷阱，使用欧洲人出售给他们的枪支，使他们更得心应手，而其他的一些本土技艺开始衰落。既然用十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捕到海狸，换来水罐，那为什么还有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编一只不漏水的篮子呢？甚至连土著美洲人曾向欧洲人炫耀的农业，也开始衰退了，因为交换粮食要比种植粮食容易得多。每个人都理性地、自利地加入了这一机制，也就是说，土著美洲人并不只是牺牲者，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至少理论上如此。

发生在那个东部印第安社会的某些急剧变化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文化融合。当易洛魁人把欧洲的枪支与土著美洲人的战术结合起来、重创休伦人时，他们尚且控制着自己的文化，对欧洲文化有选择地融合、改造、摒弃。土著美洲人学会了如何修理枪支，如何把子弹射出去，如何修筑更强大的堡垒，如何展开歼灭战。^[25]土著美洲人还作为语言专家而闻名遐迩，他们经常说两种欧洲语言（法语、英语、荷兰语、俄语或西班牙语）和至少两种美洲印第安语言，英国殖民者不仅是在与土著美洲人打交道时，而且有时在与西班牙人或法国人打交道时，都请土著人做翻译。

然而，这种发展并非总是令人惬意的经济活动或者自愿的文化融合和变化。土著人做这一切，乃是处在某种军事与文化的威胁之下，并且他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很快就明白，欧洲的枪支远比自己的弓箭厉害。欧洲人也很快意识到，商品贸易可用来赢得和维持与印第安各族的联盟。为了应对新的威胁，也由于“白人要求各种机构能反映他们自己的相关利益”，很多土著团体强化了他们的部落政

府。^[26]部落首领得到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权力。这些土著政府的治理范围空前广泛,因为日益升级的战争和瘟疫使小的部落要么消亡,要么加入较大的部落以求保护。大的民族成为种族的熔炉,吸收进了白人、黑人乃至其他印第安人。于是,出现了新的联盟和民族,比如,克里克人联盟(Creeks)、西米诺尔人联盟(Seminoles)以及拉姆毕人联盟(Lumbees)。^[27]各部落在效仿欧洲人的过程中,或者由于其文化中战斗本领变得日益重要的缘故,越来越成为男性主导的社会。^[28]

与欧洲人最亲近的部落最先得得到枪支;那些还没有得到枪支的人,也能够练习枪法。突然,某些民族取得了相对其他民族的军事优势。结果,印第安人战事不断升级。当然,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土著民族之间已经有冲突。然而他们很少一决雌雄。一些部落并不想要夺取属于其他部落的土地,部分原因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圣地。对一个民族而言,要消除近邻是总是很难的,因为所有的民族的军事技术都处于同一水平。现在,一切都变了。欧洲势力蓄意扩大印第安人的内部争斗,从而坐收渔利。比如,西班牙使用各个击破的策略击败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英国人曾挑起部落争斗从而扩展不列颠人的统治;现在,他们在北美又故伎重演。^[29]

内森·霍布鲁克家奴仆出逃

9月19日星期三,一名印第安青年从舍本县内森·霍布鲁克家出逃。此人现年18岁,名叫约翰·皮他涅,相貌俊美,神色慌张,短发,头戴毡帽;上身着灰色大衣、旧亚麻衬衫,大衣上有合金纽扣;下身穿着皮裤;脚穿灰色长袜,高档鞋。

有捉住这个奴仆,并将其送至舍本县其主人家中者,赏银40先令及一切相关捉拿开支。据说,该奴仆打算改名换姓,并改变装扮。

图2 悬赏通缉

与非洲奴隶一样,印第安奴隶也尽力出逃。这张告示来自于《波士顿每周新闻来信》(*Boston Weekly News-Letter*)1739年10月4日。

对很多部落来说,不断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把其他印第安人变成奴隶卖给欧洲人,以换取更多的枪支和水罐。北方部落专事毛皮贸易,而某些南方部落专做人口生意。在欧洲人尚未到达之前,一些土著美洲人早已互相奴役。现在,欧洲人大大加强了印第安人的奴隶化。^[30]我曾以为,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能够找到那些关于土著美洲人不会成为好奴隶的老套说法,但其实只有《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与《美国的传统》两本书才那样说。《美国历史》在讨论非洲奴隶贸易问题时,捎带了

这样一句话：“少数印第安人也被奴役。”除此之外，教科书都对发生在今天美国的那片土地上的这一土著美洲人奴隶贸易问题缄口不言——只有一本书不随波逐流。《美利坚盛典》有一段话讲述了卡罗莱纳殖民者是如何要求沿海的大草原印第安人从内地给他们带来奴隶，把这些“身带镣铐的印第安人……加入到这块年轻的殖民地的主要对外输出品之列”。该书还告诉人们，印第安俘虏在西印度群岛和新英格兰是如何最终变成奴隶的。^[31]

欧洲人对土著美洲人的奴役由来已久。庞塞·德·莱昂^①当年来到佛罗里达并非真的为了寻找神秘的不老泉，他主要是为了寻找金子，以及为伊斯帕尼奥拉岛捕捉奴隶。^[32]在新英格兰，对印第安人的奴役直接导致了非洲人的奴役——1638年，第一批黑人被从西印度群岛运到那里，以调换那些来自康涅狄格的土著印第安人。^[33]1712年，纽约市的土著和非洲奴隶联合造反，当时，在这个城市，四个居民中就有一个是奴隶，而四个奴隶中就有一个是北美印第安人。1730年罗德岛的南金斯敦的一项人口普查显示，该地有935名白人、333名非洲奴隶和223名土著印第安人奴隶。^[34]

《美利坚盛典》认为（也只有它这么说），土著北美奴隶与非裔美洲人奴隶一样，主要集中在南卡罗莱纳。该地区1708年共有3,960名自由白人、4,100名非洲奴隶以及1,400名印第安奴隶和120名契约奴（据推测是白人）。然而，这些数字并不能反映土著奴隶的巨大数量，因为它们不包括被输出的那些土著奴隶。殖民者把印第安人奴隶从卡罗莱纳、新英格兰送到西印度群岛（有些中途逃跑，但到达后从没有人逃脱），以交换黑人奴隶。从查尔斯顿，一年之内曾有至少10,000名土著奴隶被带上镣铐送往西印度群岛。^[35]再往西，许多波尼族（pawnee）印第安人被卖给白人，以致“波尼”^②成了所有奴隶的通称，不论他们来自印第安还是非洲。^[36]在西海岸，皮尔森·雷丁，这位约翰·萨特^③在加利福尼亚中部的庞大地产的管理者，赞叹自己1844年的舒适生活说：“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作为奴隶像南部黑奴一样温顺而卑贱。”在西南部，白人对纳瓦霍族（Navajos）和阿帕契族（A- 105 paches）一直奴役到内战中期。^[37]

战争和奴隶贸易的不断升级，致使本来稳定的定居生活不再安全，这有助于土著美洲人的去农业化。为了避免成为捕猎目标，美洲印第安人放弃了他们的玉米地和村庄，开始生活在一些更小的定居点，以便更快捷地逃入森林。最终，他们不得不从欧洲人那里交换粮食。^[38]欧洲人从土著人那里学会了种植什么、如何种

① 庞塞·德·莱昂（Ponce de Leon），16世纪初到达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

② 在现代英语中，pawnee有“典当”、“人质”的意思。

③ 约翰·萨特（John Sutter，1803-1880），瑞士殖民者，曾到达加利福尼亚。

植,由此更少地依赖印第安人及其技术;而印第安人却变得更加依赖欧洲人和欧洲技术。^[39]这样一来,那些暂时对土著美洲人有利的东西从长远看却对他们造成不利,印第安人被奴役和死亡,印第安技艺失传,印第安文化被瓦解。到马萨诸塞部落可悲的余部改信基督教,并加入清教徒的“祈祷的印第安城镇”之时,面对文化入侵,面对诸如“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基督教才是对的”这类劝告,印第安人所做的,就是如此。这一过程证明了人类学家所称的文化帝国主义。甚至自豪的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文化命运也是如此,当他们将西班牙人的马和枪支与土著的艺术、宗教、狩猎方式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反映了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在苏族语中,wasichu(指碧眼白人)的意思就是“拥有一切好东西的人”。^[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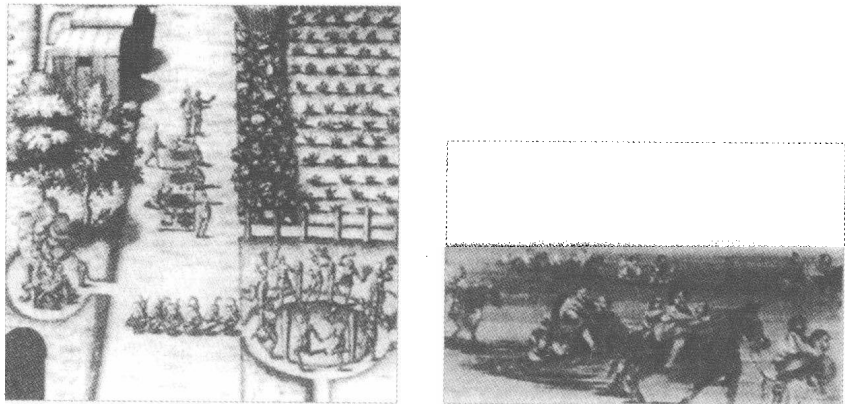


图3 1500年前后的印第安人生活

教科书《生活与自由》的最大特色是用图片来说明土著社会的变化。它向学生展示了一组具有诱导性的图片,并问学生:“哪一幅反映的是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印第安人生活,哪一幅反映的是之后的呢?你是从何看出来的?”《生活与自由》帮助学生认识到,欧洲人并没有使“游荡的”印第安人“文明”和“定居”,其影响恰恰相反。

要想成为研究文化碰撞的人类学学者,学生们就应该熟知“文化融合”以及“文化帝国主义”这两个术语,至少熟悉它们所指的概念。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没有一本提到这些术语,其中的大多数对于文化的演变过程都讲得很少,只有一点除外,那还是关于大平原印第安人的马文化。因此,这种文化看来与众不同。在最好的新教科书中也欠缺分析,它们没有论述融入全球经济的重大意义——融入全球经济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欧洲人有时与土著人互相交易、一起生活,另一些时候又攻击他们。没有哪本教科书讲到文化碰撞是如何夺去了土著美洲人的传统技艺。

美洲社会在遭遇白人时发生了变化。同样,欧洲人的社会在遭遇土著人时也发生了变化。教科书完全忽略了文化的双向调适过程的方面。^[41]相反,他们对于印白关系的理解,受到“边疆”思路的支配。教科书把这一文化过程说成是白人(以及

黑人)定居界线的移动过程——印第安人在一边,白人(以及黑人)在另一边。在教科书所描绘的历史中,除了波卡洪塔斯和斯宽托这两人的事例,除了白人不断向西驱赶印第安人,土著人与欧洲人并没有怎么相遇过。事实上,白人与土著美洲人在今天美国的所在地一起工作,有时还一起生活,争争吵吵,从1565年第一批西班牙永久居民,到1890年苏族人与阿帕契人自治的终结,达325年之久。

“边疆”指的是某种边界线,用这一术语来描述文化交流过程是有失公允的。接触,而非隔离,才是通则。“边疆”还把观察者置于东部城市,从那里看,边疆属于“外地”。“最先到来的究竟是什么?是文明,还是野蛮?”教科书的作者们似乎没有遇到过这一狡猾的问题。回答是文明,因为,只有“文明的”头脑才会把那些与森林、作物、动物相伴为生的土著农夫、渔夫、采集者以及猎人定义为“野蛮人”。把远离欧洲人安全控制的区域称为“边疆”或“蛮荒地帯”,巧妙地使得那些区域成为外族。这种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并且使非城市居民——无论是土著还是非土著——的活动被边缘化了。^[42]

在彼此交流的人群中,存在着惊人的文化多元性。1635年,“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定居者中,可以听到16种以上的语言”,人们操着北美、非洲和欧洲的不同语言。^[43]1794年,文化碰撞的区域延伸到“中西部”的东部地带时,仅一个叫做格雷兹的俄亥俄北部小镇,就有肖尼族人、迈阿密族人、特拉华族人等数百名印第安人,有英国和法国的商人和工匠,有一些南蒂科克人、切罗基人和易洛魁人,有少数非裔美洲人,还有被俘的白种美洲人,以及与印第安人联姻或被印第安人收养的白人。格雷兹还在节日上呈现出真正的多元文化性,有“滋润的星期二”^①、圣帕特里克节^②、英国女王诞辰日,以及各种印第安节日。^[44]1835年,当文化碰撞的区域逼近西海岸时,约翰·萨特经墨西哥当局的允许,征募土著美洲人收割小麦,创办酿酒厂、织帽厂、毯子公司,并构筑要塞(今萨克拉门托)。萨特从俄国商人那购得制服,又从欧洲招募军官,组成了一支200人的印第安人军队,他们穿着沙皇俄国的军服,由德国人指挥!^[45]

我们的教科书还剔除了“边疆”生活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多元性。布尔斯廷与凯利告诉我们:“约翰·萨特建造的那个要塞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焦点。”但他们根本没有提到,“社会”主要由印第安人组成。《美国历史》有一整页都是介绍萨特的这个要塞,但仅仅把土著美洲人说成是敌人:“他渐渐建成了一个防御小镇,把它叫做‘萨特要塞’。整个辖地被厚厚的、18英尺(大约6米)高的城墙包围着,墙头

① “滋润的星期二”,源自法语“Mardi Gras”,是天主教徒进入斋月前一天的一种娱乐聚会。后演变为今天美国的一个狂欢节,多在二月的某一个星期二。

② 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是每年的3月17日,是为了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

架设大炮,以防止那些不友好的印第安人的攻击。”从这一论述中,没有人会推论那个堡垒是友好的印第安人“建造”的。

历史学家加里·纳什告诉我们,文化互动始于弗吉尼亚,“并由于以下原因而得到发展:一些印第安人作为日工生活在英国人中间,而一大批殖民者也由于不堪忍受独裁的英国人统治下的严酷生活而逃进印第安的村落。”^[46]实际上,很多新来的白人和黑人选择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米歇尔·克雷夫科尔^①在《美国农夫书简》中写道:“在印第安人社会组织中,一定有某种异乎寻常的吸引人之处,那远胜于我们所吹嘘的那些东西。数以千计的欧洲人成为印第安人;但我们找不到例子说明,那些土著居民中哪怕有一人愿意选择做欧洲人。”^[47]克雷夫科尔有点言过其实:我们从斯宽托的例子中已经看到,有一些土著人从一开始曾选择生活在白人中间。但实际上,移民通常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的,“没有哪位品尝过‘蛮荒生活’的欧洲人后来能够忍受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中间。”^[48]

欧洲人一直竭力阻止人口外流。当年赫尔南多·德·索托不得不设置岗哨,禁止自己的男女出逃到土著人中去。“始祖移民”们也非常害怕被印第安化,连男人留长发都被定为有罪。卡伦·库柏曼告诉我们,如果被抓回,“出逃印第安的白人将被处以极其严厉的惩罚,甚至被处死。”^[49]但是,一直到1890年土著印第安人失去民族独立为止,一直有白人叛逃;而那些按照印第安人方式生活的白人,比如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则成为白人社会的文化英雄。

共产主义的东欧建立“铁幕”,以阻止人民外逃。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地球上最繁荣的社会,那为什么他们要阻止人民出逃呢?对此,很难做出解释。美洲殖民者的尴尬同样恰恰在于他们核心的意识形态——那也是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东欧与美国的教科书都以同样的方法处理这一问题,那就是:忽略事实。没有一本美国历史教科书提到土著社会对欧裔美洲人以及非裔美洲人的吸引力。

非裔美洲人常常为逃避奴役而逃入美洲印第安人社会中。那么,什么对于白人具有如此大的诱惑力呢?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他们的所有政府机构都是由‘贤人’会议掌管。那里没有军队,没有监狱,没有官员强令服从或实施处罚。”或许,首先是美国东部土著社会中没有社会等级之分,吸引了欧洲人的羡慕的眼光。^[50]边疆人被认为享有土著美洲人同样程度的自由。在多数土著社会,妇女也被赋予地位与权力,其程度要超过同时代的白人社会,对此,白人妇女曾以羡慕的口吻津津乐道。在墨西哥北部的美洲印第安人社会,虽然某些民族的领袖人物实质上是世袭的,但那些社会要比17和18世纪的西班牙、法国乃至英国更民主。1727

① 米歇尔·克雷夫科尔(Michel Guillaume Jean de Crèvecoeur,1735-1813),法国贵族、作家,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

年,纽约总督凯德沃拉德·科尔顿少尉夸张地说:“在‘五族同盟’中,没有一个人不是由于其品行而获得职位的。他们的权威仅仅在于人民的尊敬,一旦没有了尊敬,也就没有了权威。”科尔顿用易洛魁人的语言称颂“人的自然权利”:“在这里,我们看见,所有权力与威望的自然源头都在于自由的人民之中。”^[51]

实际上,土著印第安人的观念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已经知道,土著人的自由、友爱和平等的观念是如何传到欧洲,影响到诸如托马斯·莫尔、洛克、蒙田、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的。这些欧洲思想家后来又影响到美国的富兰克林、杰斐逊和麦迪逊。^[52]近年来,历史学家开始争论,美洲印第安人的思想是否也对我们的民主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在150年的殖民接触中,易洛魁人联盟作为一种客观教材伫立在殖民地面前,告诉他们如何以民主的方式治理一个辽阔的疆域。凯德沃拉德·科尔顿上尉所说的那句话回响在50年之后的109《独立宣言》中。



图4 释放白奴

当亨利·班魁特上校在1763年赢得布石烂战役(Bushy Run)的胜利之后,他下令释放所有的白人俘虏。他们大多数人,特别是儿童,都不得不“手足紧缚”地被强制押回白人社会。同时,土著犯人——用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在其《超越地理》(Beyond Geography, 245)一书中的话说,“欢天喜地地回到了他们那些被打散的亲友当中。”特纳把这些场景称为“令人尴尬又满怀羞辱的”,他说得是对的。

18世纪40年代,易洛魁人厌倦了与几个经常争吵的英国殖民地打交道,建议他们像自己一样组成一个联盟。本杰明·富兰克林曾为考察易洛魁人的思想而在他们中间度过很长时间。1754年,他建议殖民地的领导人们考虑他提出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如果六个未开化的野蛮民族能够提出这样的结盟设想,并且实施起来就像它已经存在了很久,显得不可拆散,那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类似的联盟,在10个、或者12个英国殖民地之间却很难行得通。”^[53]

殖民地拒绝联盟方案。但那一方案是《邦联条例》与《宪法》的前身。大陆会议 110 与制宪会议都公开提及易洛魁人的观念和具体做法。1775年,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由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签名的致易洛魁人的宣言,其中就引用了易洛魁人自1744年以来的建议。大陆会议写道:“‘六族人’是英明的人,让我们倾听他们的建议,并教导我们的孩子听从它。”^[54]



图5 鹰箭图案

作为新合众国的象征,美国人选择了鹰抓着一束箭的图案。他们知道,鹰和箭都是易洛魁人联盟的象征。一支箭容易折断,但没有人能一下子折断6或13支箭。

约翰·莫霍克^①指出,对公开集会的习俗、言论自由、民主以及“与《人权法案》相关的所有事物”,美洲印第安人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若没有土著人的示范,“你能相信,在一群因为宗教问题上的不宽容就与他人厮杀千年的人中,真的会产生出所有的这些观念吗?”^[55]莫霍克或许高估了土著人的民主,因为在很多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等级制度在官员任命方面仍然起着主要的作用。然而,莫霍克是有道理的,因为欧洲人在美洲所到之处,就在土著社会中扶植一批君主(“菲利普王”)或不民主的领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出自欧洲人的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样他们就可以宣称,他们是通过与某个人或某一派人的交易买到部落属地的。这一做法也暴露了欧洲人的习惯思维:欧洲人不相信那些民族没有这样的统治者,因为这是他们所知的唯一的政府形式。

① 约翰·莫霍克(John Mohawk),美国当代学者。

革命后一百年间,美国人奉土著美洲人为自己的民主制度的源头。革命年代的一些漫画家用美洲印第安人的图像来表现殖民地对不列颠的反抗。弗吉尼亚的“爱国者来福枪小分队”在与“红衣军”^①们作战时,身着印第安人的服装和鹿皮鞋。当殖民地人反对不公正的当局,发起“波士顿倾茶事件”时,当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发起抗议活动,反对将哈得逊河谷地租借给荷兰种植园主时,他们也都选择像美洲印第安人那样穿着,非但没有指责印第安人的示范,反而视之为自由的象征。^[56]

当然,荷兰传统也影响到了普利茅斯以及纽约,英国的普通法与《大宪章》也是如此。美国的民主似乎是又一个文化融合的例子,它把欧洲思想与土著美洲人的思想综合在一起。土著文化的影响力很难说清,因为这一影响有着多种方式。教科书可以视其为一定程度的假说,而非铁的事实;但是教科书不能否定这种影响。在我所考察的所有的教科书中,只有《发现美国历史》这一本书有一个标题提到了土著美洲人对欧裔美洲人的思想影响——该书中有一幅富兰克林的著名漫画,画的是一条被割断的、垂死的蛇,在漫画的上边,配有一串贝壳串珠,而那个标题就是“富兰克林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受启发于易洛魁联盟”,“贝壳串珠代表以联盟形式实现的部落联合。试将其与富兰克林的漫画相比较。”其他的教科书都没有提到这些。

但是,教科书仍然遗漏了土著美洲人对美国文化的多数贡献。我们的地方美食——那些独特的美国食物——常常将印第安元素与欧洲和非洲的元素混合在一起。这些食物包括从新英格兰的猪肉和黄豆到新奥尔良的秋葵、德克萨斯的红椒等。^[57]非裔美洲人与土著美洲人之间的双向交流——这源于共同的奴隶经历,特别是黑人向土著社会的逃亡——说明了其所谓“黑人传统食品”(soul food)部分地发源于印第安人,从玉米面包、粗玉米粉到青菜和玉米球。^[58]土著地名遍布我们各地,从“奥克弗诺基”到“阿拉斯加”^②。土著人的耕作方法并不“原始”。某些部落的农夫从土壤中收获的营养物质比我们多两三倍。^[59]地名还反映了不同思想间的相互交流。白人曾问印第安人:“我在哪里?”,“这地方叫什么?”,“那动物是什么?”,“那座山名叫什么?”

虽然教科书“赞赏”土著文化,但真正的文化融合的可能性,特别是思想融合的可能性,对它们来说仍是不足称道的。这是令人羞耻的,因为作者们会因此忽略了大多数使美国区别于欧洲的事物。彼得·卡尔姆^③曾在1750年写道:“法国人、英国人、德意志人、荷兰人及其他欧洲人在遥远的省份,与印第安人或远或近

① “红衣军”,redcoat,代指英国军人。

② “奥克弗诺基”(Okafenokee)位于美国南部,又称“大沼泽”,地名原意为“颤抖的大地”;“阿拉斯加”(Alaska)位于美国遥远的西北部,地名原意为“大土地”。

③ 彼得·卡尔姆(Peter Kalm, 1716-1779),瑞典生物学家,于1748年赴北美考察,写下《北美游记》。

地生活了几年之后,其举止变得与印第安人如此相似,以至于只有靠肤色才能辨别。”^[60]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其著名的《美国历史上的边疆》一文中指出了 112 边疆如何支配了欧洲人,如何“剥去了文明的外衣”,使得他们从衣着到思想都变成印第安人。“很快,他们开始种植印第安作物,用锐器犁地。”渐渐地,他们创造了新东西,“但那些东西已不是旧欧洲那样的了。”那是融合的,是美洲的。^[61]



图6 “基卡普医生”

在19世纪,美国人懂得土著美洲人对医学的贡献。当时60%的医学专利都标有印第安图像,包括基卡普印第安咳嗽药、基卡普印第安灵丹和基卡普印第安油。当时,美洲人视这些印第安图像为灵丹妙药。

承认我们的文化多么老土——即:美国和欧洲也曾受到土著美洲人以及欧洲 113 思想的影响——就要求对我们的教科书进行重大改写。如果我们承认美洲印第安人是我们政治结构的重要的思想先驱,我们就得承认文化融合是一条双行道,我们也将不得不重新评价那个为整个征服活动辩解的所谓印第安人文化原始论。^[62]1970年,印第安史学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针对我们的史学的批评著作《教科书与美洲印第安人》。该出版社决定是否出版某本书籍的标准是:“教科书是否描述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信仰、哲学,及其思想所受到的影响?”^[63]不幸的是,回答一定仍是否定的。

让我们考察一下教科书是如何将各种土著宗教混为一谈的。《美国之路》用这样一段话来描述土著美洲人宗教：“这些(东南部的)土著美洲人相信大自然充满了精灵。每一种生命形式,比如植物和动物,都有一个精灵。地球和空气也是有精灵的。人从来就不是孤独的。他们与自然的精灵分享自己的生活。”《美国之路》想表达对土著美洲人信仰的尊重,却没达到效果。如果只是泛泛地这样谈论信仰,信仰就似乎是虚幻的,而非一种高级文明的精致神学。让我们以一种同样简洁的方式去总结今天多数基督徒的信仰:“这些美洲人相信,有一位伟大的男性的神统治着世界。美洲人有时把他一分为三,分别叫做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吃饼干,喝葡萄酒或葡萄汁,相信他们是在吃圣子的骨肉、喝圣子的血液。如果他们笃信于此,他们将在死后获得永生。”

教科书从来不这样描写基督教。那是亵渎。信众们会立刻反驳说,这样一种描述没能表达圣餐的象征意义或精神享受。

教科书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介绍各种美洲印第安人的信仰,那就是,重视它们,并把它们视为有魅力、有说服力的信仰体系。^[64]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曾指出,印第安人相信每个动物、每块石头都有灵,而当白人对这些东西说三道四时,他们就承认自己失去了与地球的深刻的精神关联。特纳写道,土著美洲人是“整个有生命的宇宙的一部分;人只有接受环境,并试图与之和谐相处,才能获得精神健康。”特纳主张,这种世界观比欧洲的那些世界观更健康:“我们的世界观是令人震惊的死寂宇宙观。我们是宇宙中唯一能够提供真正活力的事物,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也是半死不活的。”^[65]这样,特纳证明,重视土著美洲人的信仰就要求重新考察犹太-基督教传统。没有教科书会提出这样有争议的观点。 114

如果从土著人的角度看,那些发生文化接触的地区又是什么样子呢?对此教科书作者同样没有给读者提供线索。他们重视那些投靠到入侵者一边的土著美洲人,比如,波卡洪塔斯和斯宽托。他们巧舌如簧,把白人侵略者描述为“定居者”,而把土著美洲人常常说成是侵略者。美国曾强迫各部落放弃他们的土地,撤退到所谓“保留地”中;《美国之路》在描述这一政策时却指出:“美国内务部曾试图送给每个部落金钱和土地。”该书还说,白人受到了忘恩负义的土著人的阻挠,他们不愿意被“提供”这种土地;“美国白人无法理解印第安人;对他们自己来说,拥有土地无异于梦想成真。”实际上,当时的白人很少受到阻挠。菲利普·谢里丹将军曾说过一句臭名远扬的话:“印第安人中只有死人才是好人”;但即使是他,也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他曾写道:“我们夺走了他们的家园,以及他们的生计;正是为此,他们发动了战争。怎么可能不是这种结果呢?”^[66]教科书完全颠倒了事实。

让我们试着公正地看这一问题。“菲利普王战争之后,新英格兰边境一直冲

突不断。在佛蒙特,定居者害怕野蛮人会剥他们头皮。”这一描述是正确的,但读者们须知,定居者是土著美洲人,而剥别人头皮的是白人。即便是最好的美国历史书籍也没有提到,不得不生活在白人控制区的土著美洲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白人战争行为的氛围之中。那种氛围太糟糕了,土著人无依无靠。1786年,当一个白人只身骑马突然闯入位于北卡罗莱纳的卡托巴部族人(Catawbas)的村庄时,族人们“四处逃窜”。而卡托巴部族其实是友好的部落! [67]

在大陆的另一侧,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它有助于人们理解这种逃窜行为:“一位年老的白人定居者将一段来自自己的牛仔和印第安生涯的故事告诉自己正在写俄勒冈边疆生活故事的儿子:一些牛仔未经引见闯入印第安人的家庭,他们像往常一样,追赶族人,打算强奸印第安“丝裤”^①。然而,有一位妇女为使强奸者不能得逞,竟在自己的阴道里塞满了沙子。”^[68]这样的抵抗是不寻常的,它使这件事不被人遗忘。否则,它就太寻常了。这种平常事件正是我们的教科书所忽略的。教科书不敢挑战劳拉·英格斯·怀尔德^②所描绘的那幅爱好和平的白人定居者时而遭到残忍的印第安人的伤害的不常见图景。如果它们这样做了,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部落,即便是在1815年之后反抗注定要失败的情况下,仍然诉诸战争。



图7 发生在威尔克斯-巴里的印第安人杀人事件

该图表达了19世纪平板画的一个常见主题:印第安入侵者玷污了白人定居者的家。但是像这样的画面,并不真实,只能说是一种虚构。实际上,是白人侵入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常常闯入他们的家庭。

① “丝裤”(squaw),土语对印第安妇女的戏称。

② 劳拉·英格斯·怀尔德(Laura Ingalls Wilder,1867-1957),美国作家,著有《大森林里的小木屋》等“小木屋”系列作品。

在我们的历史上,与土著美洲人各部族的战争比比皆是。大卫·霍洛维茨^①指出:“约两百年来,战争几乎一直肆虐着美洲大陆,这个大陆上的冲突比任何民族要面对的冲突更具危险性。”在华盛顿执政期间,美洲印第安人战争耗尽了联邦全部收入的80%;对于其继任者们来说,印第安人问题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构成一个主要问题,成为一项主要的开支。而我所考察的12本教科书,几乎都没有提到这一点。《美利坚盛典》提供的“美国主要战争中的经费支出与人员死亡统计表”仍然完全忽略了印第安战争。该书写了美西战争,据它的统计,这场战争共死亡385人;但它没有提到1790至1795年间的俄亥俄战争,仅其中沃巴什河一役,就有630名美军士兵死亡或失踪。^[69]

今天的教科书至少不再把所有暴行都归罪于土著人,但民权运动之前,多数教科书却并非如此。历史学家那时常说:“我们对于他们的战争是文明战争;他们对于我们的战争是野蛮和凶残的战争。”^[70]在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已没有一本把土著人描绘为野蛮人。新版教科书的作者们都谨慎地承认双方都有残忍性。有些作者还提到发生在沙溪和翁迪德尼这两个地方的对毫无防备的土著美洲人的大屠杀。像我们关于土著美洲人的多数“知识”一样,所谓“野蛮人”这类老生常谈不仅源于旧式教科书,而且源自我们的大众文化——特别是某些西部电影与小说,如达纳·富勒·罗斯的“西部马车”系列。这些平装书销售量很大,它们公然宣称自己“忠实地遵循着历史的总体框架。”这类小说以州名为标题,在封面上警示人们“劫掠成性的印第安匪徒正在杀戮惊魂未定的定居者。”^[71]在好莱坞的西部片中,马车队总是被野蛮的印第安游牧者围追堵截。土著美洲人围着“定居者”一圈圈地奔驰,约翰·韦恩^②把他们从马车轮边和箱子旁甩开。好莱坞从“野牛比尔·科迪”^③的“西部秀”中借鉴了印第安人骑马转圈的倒霉形象,在那些“西部秀”中,他们不得不扮成靶子骑马转圈,因为他们是在马戏团的帐篷里!

在真正的西部,在那些1840至1860年间穿过大平原的25万白人,只有362名拓殖者(以及426名土著美洲人)在有史可考的双方战争中丧生。更普遍的是,美洲印第安人为新来的定居者引路,指给他们水源,卖给他们食物和马匹,买他们的布匹和枪支,不少人还充当向导和翻译。^[72]这些事情在电影、小说和我们的教科书中都很少有反映。因为学生们接受的都是大众文化的那种错误信息,他们就无法理解土著人其实认为欧洲人的战争要比他们自己的更为凶残。

① 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美国20世纪历史学家。

② 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1979),美国著名影星,以西部片见长。

③ “野牛比尔·科迪”(Buffalo Bill Cody,1846-1917),是一位猎人、美军侦察兵及印第安战士。下文的“西部秀”指他发起的“西大荒及世界级驯马师大会”巡回表演。这种表演享誉全球并塑造了独特的美国西部形象。

大多数新教科书的确谈到了新英格兰的第一场对印第安战争——1636至1637年的皮科特战争,这是关于欧洲人带到美洲的惨烈战争的个案研究。通过与皮科特人的宿敌——纳拉甘塞特族人的联盟,殖民者在拂晓发起了进攻。英国人包围了皮科特人的村庄,当时里面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英国人烧毁村庄,向那些试图逃出火海的人开枪射击。威廉·布莱德福德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那真是可怕,那些人在火中煎熬,血流将火焰淬灭,从中发出的臭味更令人感到恐怖。但是,胜利似乎是一场甜蜜的牺牲,殖民者们口诵对神的赞词,似乎神为他们造就了这壮观的一切。”^[73]纳拉甘塞特族人也对屠杀感到震惊,他们本只想使皮科特人臣服,并没想要对他们斩尽杀绝。纳拉甘塞特族人指责英国人的作战手段,他们大叫:“完了,完了,那太激烈了,杀人太多了。”但是,约翰·安德希尔^①却不屑一顾,说什么纳拉甘塞特族人式的战斗就像是“消遣,不能压倒和征服敌人。”安德希尔对战争在纳拉甘塞特族人社会中作用的分析是对的,或许这种分析也适合其他的部落。几个世纪里,白人经常指责他们的盟友作战不够努力。清教徒甚至要把皮科特人从人们的记忆里根除。他们通过一项法令,规定说出“皮科特”这个词就是犯罪。布莱德福德自豪地总结说:“剩下的人四处逃散,而四周的印第安人极其恐慌,不愿给那些人提供避难所。”^[74]上面引的这些话,没有一句出现在我们的旧式教科书里,那些教科书对这场战争平均起来也只要一两句话。新教科书也没有一本引录了布莱德福德的话——它们经常不引用任何人的话,但是,它们的确提到了英国殖民者打击了皮科特人。或许,将来的大学生不会像我的学生这样,当被要求用5个形容词来描述印第安人时,会选择“野蛮”这个词。

今天的教科书还对菲利普王战争——它或许是所有对印第安人战争中最惨烈的——予以大量的关注。菲利普王战争始于1675年,当时,新英格兰的白人处死了三名印第安的万帕诺亚格人,致使万帕诺亚格人发起反击。导致失和的另一个原因是毛皮贸易,这项贸易一直是联系土著人与欧洲人的经济纽带,但现在在马萨诸塞却开始衰落了。^[75]《走向今天》引用一位土著人首领梅安特努莫的话,从土著人的角度向学生介绍这场冲突:“我们的父辈有充足的鹿和毛皮,我们的草原上到处是鹿,我们的森林里也是,到处都有火鸡,我们的小溪里都是鱼和飞禽。但是,这些英国人抢占了我们的土地,他们用长柄镰割掉我们的草场,用斧子伐倒我们的树木,他们的牛马吃我们的草,他们的肥猪拱翻了我们的蛤蜊塘堤坝。我们就要饿死了。”《美国人》也引用了梅安特努莫的话,还有几本教科书也公正地解释了菲利普王战争。这很重要,因为这场战争并非无关紧要。据加里·纳什介绍,“在90个清教徒城镇里,有52个遭到袭击,12个被捣毁。到战争结束时,几千名英国人,以及或许双倍的印第安人

① 约翰·安德希尔(John Underhill, 1609-1672),马萨诸塞英国殖民者,曾参加皮科特战争。

死去了。”^[76]在菲利普王战争中死去的美洲的土著人和盎格鲁人,绝对要比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美国革命、1812年战争、墨西哥战争或美西战争中死去的要多。从人口比例上看,伤亡人数要比美国的其他任何一场战争都多。^[77]

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战争始于1598年的新墨西哥,当时,西班牙征服者企图占领一个名叫“阿科马”^①的印第安人“普埃布洛”^②村落,村民杀死了他们中的13个人。^[78]战争蔓延到东南部,在那里,“由于印第安人的猛烈和顽强的抵抗,西班牙人用了100多年才得以在佛罗里达确立殖民统治。”^[79]在1890年,翁迪德尼发生了一场大屠杀。在此之后,除了一些小规模冲突之外,战争基本平息了。那些战争太多了,我们的历史书无法一一详述。但是恰恰是因为那些战争太多了,忽视对印第安人战争就更会歪曲历史。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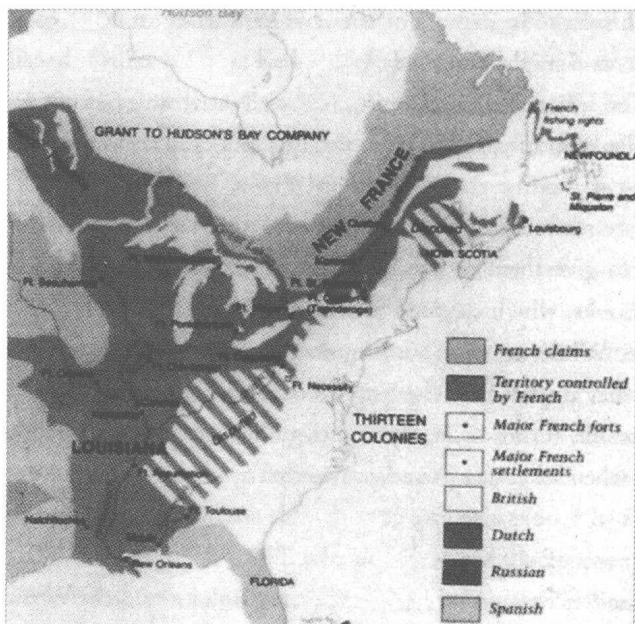


图8 领地图

大多数教科书里的地图,都与上图一样,标志出“法国领地”、“英国领地”、“西班牙领地”,有时还有“争议区”,但就是没提到印第安人的居住区。有些书籍包含了印第安民族的地图,比如在 D. W. Meinig, *The Shaping of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 209, 但其中印第安人居住区被明显标示为各殖民势力的缓冲区。

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其他的一些战争也都带有印第安人的印记。从1600年至1754年,欧洲战事不断,其中包括三次世界性战争:奥格斯堡联盟战争(1689-1697,在美国被称为“威廉国王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在美国被称为“安妮女王战争”),以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4-1748,在美国被称为“乔治国王战争”)。在北美洲,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这些欧洲强国以印第安

① “阿科马”,印第安民族的一部分,建立于公元1100-1250,被认为是美国最古老而且一直延续下来的居住群落。

② “普韦布洛”,源于西班牙语 pueblo,指一种印第安人的村落形式,以土石结构房屋为特色。

人居住地为缓冲区,并通过各自的印第安盟军互相开战。土著美洲人自身承受了战斗的冲击,但无意间给各殖民地馈赠了相对的和平。

另外一场世界性战争——“七年战争”(1756-1763),在美国被称为“法印战争”(法国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在北美也主要是双方印第安人进行的战争。土著美洲人不仅参加了美国革命,而且是那场革命发生的重要起因。《1763年公告》^①禁止殖民者拓殖阿巴拉契亚大陆分界线以外的土地,这安抚了土著印第安人各族,但激怒了很多殖民者。殖民者认为自己为供养英国军队出钱,但反过来却受到阻挠,不能获取西部边疆的印第安人土地。然而,在采取了对英国的敌对行动之后,1775年新生成的“联合殖民地”一开始更为关心的是他们与印第安各族的关系,而不是与欧洲的关系,于是,他们派富兰克林先到易洛魁人中去,然后才去法国。^[80]土著印第安人还在1812年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参加了墨西哥战争和内战。^[81]在每一场战争中,土著人主要是与其他土著人相互仇杀,而每一次都有更多的人联合起来,先是反对各殖民地,后来则是反对合众国。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他们正确地意识到,合众国的对手,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机会,给予他们人权,维护他们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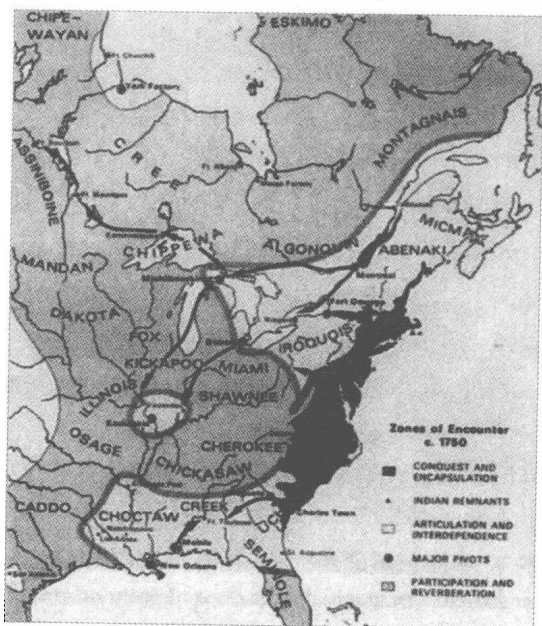


图9 领地图

即便是在讲述法印战争时,一些教科书居然也不提印第安人!美洲印第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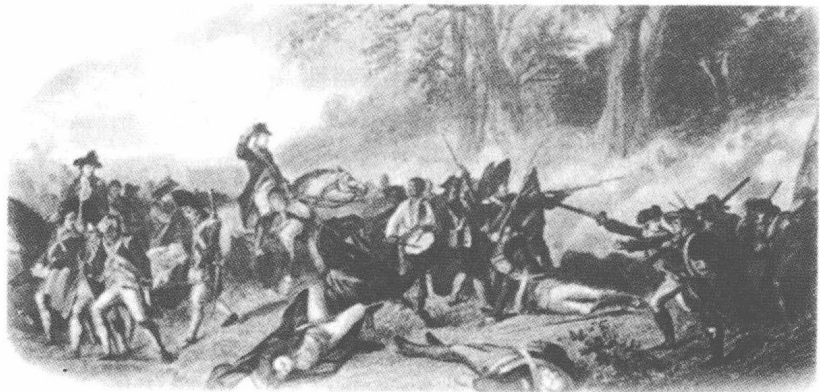
① 《1763年公告》,又名《1763年皇家宣言》(Royal Proclamation of 1763),为英国王室在赢得七年战争后发布。

给予白人军队最严重的一次打击,是1755年布拉多克将军的宾夕法尼亚的大溃败。布拉多克当时率有1460名士兵,包括8名印第安侦察兵和一支由乔治·华盛顿领导的附属弗吉尼亚民兵。他们的对手是600到1000名土著美洲人和290名法国士兵。但是,如果按照《美国的传统》的描述,你绝不会想到那里面还有印第安人。该书说:“7月9日,当他们逼近要塞时,法国人打响了伏击。布拉多克的军队被包围并被击败。身着红衣的英国士兵由于不习惯荒野作战(原文如此),伤亡达900人以上。布拉多克身负重伤,临死前悔恨地说,‘我们下次就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了’。”《美国的传统》使得布拉多克的遗言失去了原来的意思,因为,他所

图10 关于布拉多克将军(两幅)



此图是众多旧平版画之一,它展示了美洲印第安人攻击布拉多克的场面。今天的一些教科书忽略了印第安人。



选自2007年版的《美国人》,题名为“英国将军爱德华·布拉多克1755年遭到挫败并死于附近的杜克斯尼要塞”。从这幅图片中,没有人能看出土著人与这场战斗有什么关系。

说的“他们”，并非指法国人，而是土著美洲人。

在美国革命中，易洛魁联盟的大多数部族站在英国人一边，打击纽约及北宾夕法尼亚的美洲白人。1778年，美国遭到了重创，当时，数百名托利党人和塞内卡族人在宾夕法尼亚的四十堡(Forty Fort)与400名民兵和正规军遭遇，打死了340人。革命后，虽然英国人投降了，但其土著美洲人盟军并没放弃战斗。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打败了印第安人，这导致了1790至1795年的俄亥俄战争与1812年战争。

土地是无休止的纷争之源。为解释这一长期的纷争，我所考察的半数教科书，包括某些当前通用的版本，都依赖于一种陈词滥调，即：土著美洲人对土地所有权问题的理解是前现代式的。比如，学生们从《美利坚之旅》中了解到，荷兰人“用少量的珠子和其他一些物品从曼哈顿手中买得了曼哈顿”。这时，学生们或许就会哑然失笑，好一桩交易！多么愚蠢的印第安人，看不到这块岛的潜在价值！没有一本教科书指出荷兰人购买曼哈顿时找错了部落——他们“付错了帐”。无疑，布鲁克林人眼中的坎纳西土人对这桩交易非常满意，因为根据记录，可能没有任何珠子，而是一些金属壶、钢刀和钢斧、枪支、篮子，价值大约今天的2400美元以上。而维克魁斯基克人(Weckquaesgeek)则很不高兴，他们一直生活在曼哈顿，是曼哈顿的真正主人。后来很多年，他们一直与荷兰人摩擦不断。荷兰人为防止维克魁斯基克人进攻新阿姆斯特丹，建造了一个围墙(wall)；或许，今天美国最著名的街道华尔街(Wall Street)，就是以此命名的。这证明荷兰人自己也很少认为他们是从真正的主人手中买得曼哈顿的。但是我们的历史书对这一部分历史弃之不顾。《美利坚盛典》的作者们或许本来知道荷兰人“付错了帐”。然而，他们对此的描述方式——荷兰人“用一些不值钱的琐物从一些印第安人手中”(他们并不真的拥有曼哈顿)买得了“曼哈顿岛”——只会再次使读者们去想，土著美洲人并不在乎土地所有权，在交易中不够精明。^[82]

欧洲人总会“付错了帐”，或者把钱付给较大民族内的较小派别。对此通常他们无所谓，他们只是为自己的窃取行为寻找正当性。这种欺诈的交易很适合他们的口味，因为他们常常让一个部落或派别反对另外一个部落或派别。最大的一宗“付错了帐”的交易发生在1803年。所有的教科书都描述了杰斐逊如何通过从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从而使美国领土翻了一倍”。但没有一本指出，那被出卖的土地并不是法国的——它是印第安人的。法国人在出卖土地之前从未与土地所有者协商，甚至连大多数土著美洲人都从不知道这笔买卖。实际上，法国并未真的以1500万美元卖掉路易斯安那。法国只是卖掉了它对这片疆域的“声称拥有权”。美国在整个19世纪一直仍在为路易斯安那向土著美洲人付钱。我们还不停地为其战斗：《军队年鉴》列举了1819至1890年间涉及“路易斯安那购买”的50

多场印第安战争。把法国说成是卖家——就像我们的所有教科书那样——是一种“欧洲中心论”。教科书用以说明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的那些地图,同样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甚至最新的地图还在泰然自若地继续把那些巨大的扩张区域标示为“西班牙领地”、“不列颠领地”或“法兰西领地”,而土著美洲人不见了,似乎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的是空地。曼丹人(Mandan)曾招待了1804至1805年冬季到来的远征者,次年冬天克拉特索普人(Clatsop)也是如此;但尽管如此,这些部落仍被忽略掉。看起来,刘易斯和克拉克完全是在自力更生了。

一些新版教科书仍然指责土著人不懂得,当他们出卖自己的土地时,他们出让的不仅是耕种权利,还包括在这笔财产上从事运动、渔业以及纯粹娱乐的权利。《美国人》说:“对于土著美洲人来说,没有人是土地的主人——土地就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胡说!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财产观念大体相同,只不过土著人并不认为个人有权买卖土地,只有整个村庄才有这种权利。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似乎并不知道20世纪之前的那些土地买卖——包括白人之间的土地买卖——一开始出让的是耕种权、矿权以及用某种方式扩展土地的权利,而不包括禁止穿越土地的权利。未开发的私人土地被视为公共的,只要行为得体,任何人都可以进入。^[83]而且,部落协调员通常要保证,一些契约与协定都要特别保护土著印第安人的渔猎、聚集和穿越权利。^[84]

大多数教科书的确指出,土地纠纷是我们对印第安发动战争的根源。比如,《走向今天》在开始讨论1812年战争时,介绍了特库姆塞^①如何会见印第安领地的总督威廉·亨利·哈里森,抱怨白人侵越了印第安土地。最近出版的一些其他教科书同样强调与印第安人的那些冲突,并认为英国人在背后支持印第安人是造成冲突的关键原因。实际上,沿佛蒙特到乔治亚的皮埃蒙特山麓高原一线,美洲白人总想把白人居住点的疆界推至印第安人区域,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改进。早期的教科书只是重复当年麦迪逊政府提出的那一借口——尽管这一借口毫无道理:英国人拒绝对美国船只和海员表示适当的尊重。毕竟,在某些边疆州把“战鹰”们——那些发誓要用军事行动拓展合众国疆域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选派到1810年的国会中之前,英国的海事法律并没有导致战争。边疆州的白人叫器战争。1811年11月,针对特库姆塞的抱怨,哈里森采取的行动却是攻打肖尼人(Shawnee)及与之结盟的部落,这就是“蒂帕卡努河战役”,边疆的战火由此燃烧起来。在1812年战争中,美国发起的七次重大地面战争中有五次是主要针对土著美洲人。^[85]

关于战争的关键后果,除两本教科书外,其他教科书几乎完全忽略了。有些

① 特库姆塞(Tecumseh),印第安人领袖,曾发起反白人联盟。

作者居然把“星条旗永不落”引为主要的结果！其他的一些作者声称战争形成了“民族自豪感”，或者“帮助美国人赢得了欧洲人的尊重”。《美国的冒险历程》还算不错，它指出，“美洲印第安人是战争唯一的真正输家。”《美利坚民族的胜利》表达了同样的倾向，只是稍微委婉一些：“1815年后，美国人开始了激动人心的占领西部土地的任务。”其他的所有教科书都忽略了关键的结果：作为对我们放弃加拿大的回报，大不列颠放弃了与今天美国所在地范围内的各美洲印第安民族的联盟关系。失去了来自欧洲盟国的军需物资和其他援助，后来的对印第安战争从主要是国际冲突转变为国内的扫荡行动。这一结果成为印第安与美国在十九世纪余下时间里的关系发展的核心内容。因此，1815年之后的对印第安战争虽然夺走了双方数千人的生命，但不再对合众国构成严重的威胁。^[86]虽然土著美洲人在接下来的不少战争中赢得了胜利，但是谁是最后的赢家，向来是毫无疑问的。

1812年战争的另外一个结果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部分历史。正如历史学家布鲁斯·约翰森所说的，“一个世纪的（向土著印第安人）学习逐渐终止了；不止一个世纪的遗忘——把历史改编成替征服者说辞的工具——开始了。”^[87]1815年之后，美洲印第安人再也不能起到社会学家所称的“冲突对手”——他们是重要的“他者”，应该得到重视——的作用了。因此，美国人忘记了土著人曾经在我们历史上举足轻重，甚至连术语也发生了变化：在1815年之前，American通常被用来指土著美洲人，但从那之后，它指欧裔美国人了。^[8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少教科书忽略了菲利普王战争以及土著美洲人在1812年战争中的作用，却把注意力放到诸如1885至1886年间杰罗尼莫领导的“阿帕契战争”——大约只有40名阿帕契族战士参加了这场战争——等小规模的大平原战争上。^[89]大平原战争适合教科书的1815年之后的故事线索，因为，那些战争使白人定居者与半游牧的印第安人对立。大平原印第安人是教科书所热124
衷于哀悼的土著美洲人：作者们哀叹大平原人的逝去，但又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说法不会引起麻烦。

教科书也没能说明持续不断的印第安战争如何在我们的文化中引起反响。卡勒顿·比尔斯写道：“我们默许对印第安人的剥夺，这铸就了美国人的品格。”^[90]一旦土著人不再是“冲突对手”，他们在很多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降低了。卡伦·库柏曼向我们展示了印第安人17世纪40年代遭遇失败之后，这一变化是如何在弗吉尼亚展现出来的。他指出，“是印第安人最终被削弱了力量，而不是他们的种族劣性，才导致了他们有可能被视为无需权利的一族。”^[91]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认知失调”：土著人在1610年还被视为“机灵”、“勤劳”和“理解力

强”的,但现在变成了“懒散、恶毒、消沉和散漫的”。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样,乔治·华盛顿也改变了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华盛顿在早年曾对印第安人抱以肯定的评价,但在革命战争以及1790年俄亥俄战争中对他们发起攻击之后,他开始把他们贬斥为“猎物”。^[92]

这种论证思路在1812年战争之后演变成一种非官方的国家政策。1845年,威廉·吉尔莫·西姆斯写道:“我们用残忍无情的双手,捣毁(美洲印第安人的)居住点,把他们赶出家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盲目的偏见……被不断助长,并成为证明我们的手法之正确性的必要工具。”印第安事务委员会专员弗朗西斯·A.沃克认为美洲印第安人道德水平低下,1871年,他写道:“与野蛮人打交道时,就像与野兽打交道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升起一种把他们当作一个民族的尊敬之情。”美国所做的一切,出发点都“图己之便”。^[93]这样,这种认知失调败坏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理想主义精神。从1815年起,我们非但没有传播民主,反而是输出白人优越论的意识形态。渐渐地,我们寻求对墨西哥、菲律宾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很多国家的霸权,并且间接地谋求对其他国家的霸权。欧洲国家虽然表示,他们对我们的西部边疆感到震惊,但很快他们也效仿起我们了。英国灭绝了塔斯马尼亚岛^①的居民,德国人对纳米比亚的赫雷罗人(Herrero)发动总体战。多数西方国家还有待正视这段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甚至要比那些照本宣科的美国中学教师们更熟知我们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希特勒称赞我们在西部为美洲印第安人设立的集中营。根据其传记作家约翰·托兰的介绍,希特勒“经常向自己的身边人夸赞美国有效的种族灭绝政策——饥饿、以多制少的战斗”,并把它作为自己对犹太人及吉普赛人(罗姆人)实行灭绝政策的榜样。^[94]

在历史上,除了战争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当然有。实际上,法国、俄国和西班牙都曾在美洲采取不同的做法。然而,由于那些非战争方式基本上是美国没有采纳的,因此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棘手问题。正如爱德华·卡尔^②指出的,“总体上,历史是人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所没有做的事情。”^[95]另一方面,我们试图使今天的一切看似不可避免,这种做法剥夺了历史的生命力和大多数意义。历史在于人们行为的偶然性。“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戈登·克雷格^③提醒我们,“恢复过去曾经有过的各种可能选择。”克雷格还指出,这才是我们讲授历史并使人们记住历史的可取方法。^[96]美国白人们取舍于众多的现实可能性之间,而且常常因

① 塔斯马尼亚岛, Tasmania, 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个岛屿。

② 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 英国20世纪历史学家, 著有《历史是什么?》和《20年危机(1919-1939):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均有中译本)。

③ 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 美国当代历史学家。

此分裂。在美国历史的各个关节点上,反印第安政策本来或许是另外一种样子。比如,1812年战争在新英格兰非常不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就是,新英格兰人认为它是奴隶主在肆无忌惮地抢占印第安土地。

白人与土著美洲人曾经和平共处,这或许能说明取代战争手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真的可能吗?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须小心不要把静态的印第安文化与不断变化的现代文化相比较。我们已经看到,独立的土著文化中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欧洲军事行动面前放弃了耕种、多种语言的百花齐放、更正式的等级制的发展,以及大平原印第安文化的一体化。这类变化无疑还会延续。因此,我们不是在谈论,身背弯弓、腰缠利箭的猎户与计算机旁的都市人并肩而坐。

我们必须记住,在美洲,数以千计的白人和黑人加入印第安人社会,他们一定相信这种共处是可能的。然而,从一开始,白人的行为就阻碍了和平共处。数以千计的小侵扰最终使得美洲印第安人最终无法在白人的临近耕种土地。在普利茅斯周围,印第安人把他们的牧场租让出去,只保留了自己的种植用地。但等他们发现这并不能阻止殖民者放任牲畜践踏自己的庄稼时,为时已晚了。土著美洲人提出抗议,但他们常常发现,殖民者的法庭拒绝采信他们的证词。另一方面,“印第安人胆敢杀死英国人劫掠的牲畜,就要被立即带到一个敌对的法庭上。”^[97]大西洋岸的先例——美洲印第安人不是欧洲人的国家的公民,他们没有法律权利——阻碍了白人与印第安人在整个殖民地时期乃至后来的合众国时期的和平共处。即便是在那些被认为是土著人控制区的“印第安人领地”内,到底是印第安人侵犯了白人的土地,还是白人侵犯了印第安人的土地,这类纠纷的审判都必须在数英里之外的密苏里或阿肯色的白人法庭上进行。^[98] 126

既然很多白人从侵占印第安人土地上得到了切实的利益,既然当瘟疫肆虐大陆时,土著人口急剧下降但欧洲人和非洲人的数量却不断增长,那么,合众国统治的建立就是自然的了。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只是延缓了这种必然性。还有一种方式本也可以取代战争,那就是明确地维护种族和谐——合众国可以以欧洲人为主,但不能是种族主义的,不能在印第安人与非印第安人之间制造种族歧视。^[99]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个种族主义相对较弱的种族居住区的先例。社会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三族飞地”^①,因为这些居住区传统上同时存在着白人、黑人和红人的元素。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社群占据着沼泽及其他无人问津的土地,主要只是想不受打扰。革命战争的英雄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是一个万帕诺亚格人与欧洲人、非洲人的混血后裔、逃跑的奴隶,他也是这种隔离社群的一员。北卡

① “三族飞地”,triracial isolates,尤指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三个人种的互相隔绝的生活状态。

罗莱纳的拉姆毕族印第安人中有最多的这种隔离社群。其他的“三族飞地”部族还有：马萨诸塞的万帕诺亚格人、佛罗里达的西米诺尔人，以及从路易斯安那到缅因州的一些较小的种族居住地。^[100]

英国人 1585 年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居住点罗亚诺克岛 (Roanoke Island) 或许并未消逝，而是逐渐融入附近的克罗亚坦族 (Croatoan) 印第安人之中。用历史学家 J. F. 弗茨的话说，“他们由此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两族’社会，并一直在逃避殖民种植者。”渐渐地，英国人与克罗亚坦人成为拉姆毕人的一部分。然而，英国人从来不懂得那“失去的殖民地”的意义。弗雷德里克·特纳曾指出，他们并不想去思考英国殖民者通过与土著美洲人的融合而得以生存的可能性。J. F. 弗茨告诉我们，相反，“失去的殖民地”的故事被用作一个缩影，以反映敌对的印第安人背信弃义的本性，由此还被用作一种“血衫”神话，以证明我们若干年后对波瓦坦人 (Powhatan) 的入侵是正当的。三族飞地通常只是得到白人邻居的蔑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选择离群乡居的原因。我们的教科书也在隔离他们；没有哪本书提到了这一术语或这类人群。^[101]

土著人、欧洲人与非洲人还有可能通婚。通过婚姻的方式结盟是两个社会之间常见的交往方式，在美国，印第安人反复提倡这种方式。^[102]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西班牙男人娶土著女人为妻，使她们遵循西班牙的生活方式。而法国皮货商在加拿大和伊利诺斯娶了土著女人，开始过上土著生活。教科书本可以不无益处地向学生透露这一过时的说法——法国人渗透进了印第安社会，西班牙人改造了他们的文化，英国人则驱逐了他们。这种说法提供了对欧洲人与印第安人关系的大体上正确的总结。^[103]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英国殖民者很快发布命令，禁止种族通婚。^[104]波卡洪塔斯是最早、也几乎是最后一个通过婚姻被英裔美国人社——由此我们可称之为“白人社会”——所接纳的土著人。在她之后，大多数跨族配偶则更容易被土著社会所接受。在那里，他们的孩子常常成为首领，因为，融入复杂的世界乃大势所趋，这些孩子的双重文化背景对于这些部落来说是宝贵的财富。^[105]但在盎格鲁社会，“混血儿”非但不受尊重，反而是一种蔑称。

另外一种可以取代战争的方式是在合众国之内建立某种美洲印第安人州。1778 年，特拉华的印第安人提议土著印第安人可以作为独立的州加入邦联，但国会甚至拒绝考虑这一提议。^[106]在 19 世纪 40 年代，“印第安人领地”要求与其他地区一样，拥有向国会派驻代表的权利，但是南方白人拒绝了他们。^[107]通过许诺

① 中国学界习惯将美国内战时期的北方称为“联邦”(Union)，将南方称为“联盟”(Confederacy)。内战初，南方七个州宣布脱离合众国，它们是：南卡罗莱纳、乔治亚、亚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州。战争期间，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田纳西、阿肯色 4 州先后退出联邦参加联盟(有的又重新加入联邦)。

如果南方赢得内战南部“联盟”^①就接纳这个领地为一个州，“联盟”赢得了“印第安人领地”内多数土著美洲人的支持。内战之后，土著美洲人向合众国提出同样的要求；合众国再次拒绝了，但最终接纳了印第安人领地，建立了以白人为主的俄克拉荷马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乔克托语中，这个州名的意思是“红人（的土地）”。

我们的教科书对这些可能性置若罔闻。它们沉湎于另外一种未曾实现的模式：向白人社会的完全单向的转型。多数美国历史教科书用这样的总体思路来讲述美洲印第安人：我们试图使他们欧洲化，但他们不愿、也不可能接受，因此我们驱逐了他们。这种讲述虽然比早期教科书对印第安人保有较多的同情，但仍然落入圈套：19世纪政治家们只是把“土著美洲人阻碍了进步的道路”这类宣传口号作为驱逐土著美洲人的理由，但教科书却把这类宣传当作真实的历史。唯一真正的差别在于语气的不同。为美洲白人的驱逐行径辩护，其腔调更加刺耳。他们把土著文化贬低为原始的、野蛮的和游牧式的。教科书的作者们还常常借上帝之手，或上帝之口，向那些在土地上“勤勉有加”的人赐福。^[108]现在，驱逐已经完成，我们的1980年以后的历史教科书就能够在被征服的文化中看到更多的美德了。但是，它们仍然把美洲印第安人看做悲剧性的另类，说他们不能、或不愿意进行 128 文化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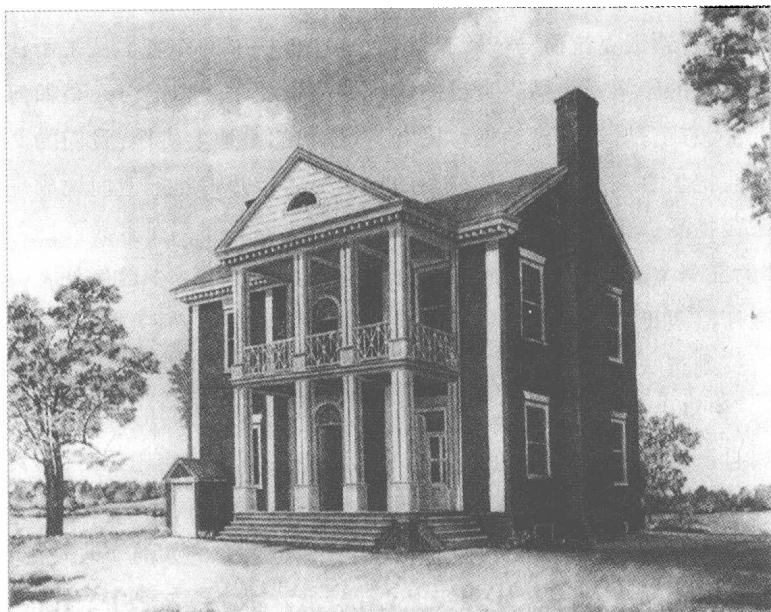


图 11 印第安人

当强调土著人据说不愿意进行文化交流时，美国历史就沦为一种带有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官方封印的故事线索。“过来，帮帮我们！”是白人殖民者的宣传口号，这后来成为表现心地善良的欧洲人和苦难另类的印第安人的模式。

麻烦的是，事情并非如此。问题并不是土著人没能实现文化转型。实际上，很多欧裔美洲人并不真的想让印第安人实现文化转型，那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这种事有时候很明显：1789年，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教授土著印第安人如何读写，“违者处以死刑。”^[109]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于1808年告诉切罗

基族代表团说：“因此，我恳求你们，每个人到你们现在所得到的土地上（原文如此）去建立一个农庄，把地圈起来，去耕种，去盖一个温暖的房子，在你们死后，土地属于你们的妻子和孩子。”^[110]实际上，切罗基人早就是农民，他们去找杰斐逊，恰恰是要求总统把他们的土地按照私人农场分发给他们，并让他们成为公民。^[111]杰斐逊搪塞他们。《美国之路》问学生：“为什么印第安人要被赶往大西部？”该书的教师用书所给的答案是，“他们被赶走，以便定居者能够在土地上种庄稼。”对这个提问，我们或许还要补充问一句：“印第安人在土地上做什么？”答案是“他们在种庄稼！”当杰斐逊向他们讲话时，白人正在焚烧他们的房子和玉米地；这把火自 1622 年在弗吉尼亚点燃以来，已经烧了 186 年。



129

图 12 约瑟夫·万的豪宅

1825 年佐治亚州的一项切罗基族人口普查（见 Vogel, ed., *This Country Was Ours*, 289）显示，切罗基人拥有“33 座谷物磨房，13 个锯木厂，1 个面粉厂，69 个铁匠铺，2 个皮革场，762 台织布机，2486 架纺车，172 驾四轮马车，2923 把犁，7683 匹马，22531 头黑牛，46732 头猪，2566 只羊。”一些切罗基人是富裕的种植园主，其中一位叫约瑟夫·万（Joseph Vann），他耕种了 300 英亩土地，还经营轮渡、汽船、磨房、酒馆，另外拥有上图的这座大房子。这引起了默里县治安官及其他一些白人的嫉妒；根据莱拉·拉奇·劳埃德（Lela Latch Lloyd）的介绍，他们于 1834 年驱逐了万，把这座房子据为己有。

不论土著美洲人的文化转型有多么彻底，他们都不可能在白人社会取得成功。白人不让他们成功。纳什说：“印第安人总被视为异类，他们很少被允许生活在白人社会里，最多只是生活在他们的周围。”^[112]土著美洲人积攒财富，置办欧式房

产,或许还经营锯木厂,结果却成为白人暴徒的首选目标,那些白人对他们的土地和物质生活改善垂涎已久。在战争时期,归化的印第安人的地位变得特别凄惨。就拿宾夕法尼亚来说吧,在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期间,萨斯奎哈纳人(Susquehannas)本来在白人的城镇里与他们和睦相处,现在却丧命于这些邻人的板斧之下。白人后来从政府得到奖赏——政府并不在意他们剥了谁的头皮,只要是印第安人的,一概有奖。几个世纪里,在这个国家,这种事屡有发生。又如,1860年,加利福尼亚的牧场主们屠杀了800名维约特(Wiyots)人中的185人。这个部落本已与白人结盟,但现在,白人却震怒于“外族”牲畜的袭扰,而使他们遭此大祸。^[113]

一些新教科书做得不错,它们讲述了“文明五族”——乔克托族、契卡索族(Chickasaws)、切罗基族、克里克族以及西米诺尔族——如何成功地实现文化转型,却又被排挤到俄克拉荷马^①。无论如何,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从来不让这些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妨碍自己的传统的故事线索。忘记白人是如何逼迫印第安人迁徙,忘记是谁教会“始祖移民”们在最初的土地上耕作,我们的文化和教科书仍然在把土著美洲人描绘成原始的狩猎民族,并由此把他们说成是历史进步的不幸牺牲品。布尔斯廷与凯利指出,“在墨西哥北部,大多数人过着漫游式的、简单的部落生活。北美印第安人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少数例外者——在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在某处定居下来,开始成为农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土著人眼中,欧洲人才是游牧民族。对此,1855年,西雅图酋长^②曾指出,“对我们而言,祖先的骨灰是神圣的,他们的安息地是圣地。你却远离自己祖先的坟墓四处游荡,似乎从不心生悔意。”相比之下,印第安人的“漫游”无非是从夏季房子搬到冬季房子,然后再搬回来而已。^[114]

只要设想一下,美国纵容针对所有姓氏首字母为L的人的非法歧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多数土著人不能实现文化转型。“我们”能呆多久?第一批非L姓的人想夺走我们的房子或工作,他们把我们赶走,于是我们失去了各种资源。我们周围的人会谴责我们这些L姓的人是游民。这就是土著美洲人所遭遇到的。在马萨诸塞,殖民者不断地向印第安家庭挑起事端,因为结果很可能是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115]在俄勒冈,240年之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到1862年,1万名白人移居内兹佩尔塞族(Nez Percé)的“保留地”,因此一位俄勒冈州的参议员建议,合众国应该除掉这个民族。缅因州参议员威廉·费森登指出了这一问题:“我认为,在俄勒冈,要不使他人染指白人所拥有的那些土地,毫无困难。但是,如果那

① 俄克拉荷马州现有大量克里克族印第安人后裔。

② 西雅图酋长(Chief Seattle),历史上一位对白人移民友善的印第安人酋长。今天的美国城市西雅图以他的名字命名。

些土地恰巧是印第安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16]没有合法权利,文化融合就不能成功。英穆图亚哈拉特拉特(Inmuttooyahlatlat)——白人称其为“约瑟夫酋长”——雄辩地说道:“我们要求对所有的人实行同样的法律。如果印第安人违法了,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白人违法了,他们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让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在我所选择的地方自由地旅行、自由地停歇、自由地工作、自由地贸易,自由地说我想说,想我所想,做我想做。”^[117]但事实并不如此。大 131
多数法庭根本拒绝听取土著美洲人驳斥白人的证词。人类学家彼得·法布指出了非印第安人是如何在土著社会的等级制中一步步上升的,并接着说:“在美国历史上,印第安人即便愿意归化,也几乎从来没有得到同样的机会。”^[118]文化转型后的土著人像靶子一样惹眼。

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在写作时有时也会坦露自己的意图。在《美国之路》的教师用书中,南希·鲍尔指出,“本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美国,为国家的强大而自豪,为其进步的决心而振奋,并以积极公民的姿态迎接‘美国之路’所带来的机遇。”从逻辑上推理,这位作者或许不可能对印第安人的历史予以适当的注意。不难理解,这类教科书的作者们的写作方式都带有这样一个特点:要让“定居者”的子孙们因为好的过去而感觉良好。自豪感是人所共需的,但是它导致一种困扰,使得历史很难不变得简单化。土著美洲人不能、或不愿意实现文化转型,因此使其历史蒙上悲剧色彩,这契合白人的历史自豪感。教科书对印第安战争轻描淡写,这有助于我们忘记是我们从土著美洲人手中夺取了大陆。今天的大学生们在被要求列出一串美国战争的名单时,从来没想到要写进印第安战争,不论是一场,还是整个的印第安战争。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战争占据了我们从1622年至1815年的历史的主线,直到1890年,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现在却从我们的民族记忆里消失了。

反对贬低对印第安战争,并不意味着要对其无限夸大。把印第安人历史讲述成白人恶棍的表演,或许很契合那些急于推断美国很坏或白人是坏人的人的口味。然而,事实远为复杂得多。因此,我们所讲的历史也不能简单化。一些教科书开始介绍白人内部的某些分歧,那种分歧其实就包含了众多可以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有些教科书谈到了萨勒姆的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 of Salem)。17世纪30年代,此人向马萨诸塞殖民者发出挑战,否定他们关于这片土地的王室特许权。他断言:“土著人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除非他们将它出售。(清教徒们拒绝了威廉姆斯,后者只好逃至罗德岛。)^[119]大多数教科书现在也会提到海

① 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 1830-1885),近代美国女作家,著有多部同情印第安人的作品及其他一些儿童文学作品。

伦·亨特·杰克逊^①。1881年,她自费印刷了其著名的谴责我们的土著美洲人政策的作品《一个世纪的羞耻》,并分发给每一位国会议员。^[120]最近的所有教科书都介绍了安德鲁·杰克逊与约翰·马歇尔在佐治亚州征服切罗基人问题上如何争执不下。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支持切罗基人,但杰克逊总统非但不把最高法院放在眼里,反而说:“约翰·马歇尔已经做出了他的判决,那就让他自己去执行好了!”但是,没有教科书展开论述,把它视为我们国家诞生之后整个一个世纪里的核心问题。也没有哪本教课书提到一些基督教派别——贵格会、“夏克会”(Shakers)、摩拉维亚教、长老会,以及一些辉格党成员——是如何动员大众舆论去为土著印第安人谋求平等待遇。^[121]通过忽略辉格党人,教科书使得切罗基人的消亡似乎不可避免;这成为又一个例证,以说明未实现文化转型的土著人在进步历程里是没有希望的。

土著美洲人将迫使教科书表明,尽管遭遇各种各样的战争、瘟疫,以及针对自身文化的各种压力,美洲印第安人依然生存了下来——不仅是身体上,而且是文化上,并且与美国保持着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及至1984年,一项关于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调查指责道:“当前对于土著人来说最重要的那些问题却被完全忽略了。”^[122]我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有所改进。“美国印第安人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起了三场重要的印第安人接管运动,他们接管了旧金山湾的恶魔岛、华盛顿特区的印第安人事务局,以及南达科他的翁迪德尼。大多数新教科书对这三场运动的前因后果都做了恰当的解释。

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主义在20世纪大幅减弱。通过充分利用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很久以前所宣布的印第安人作为“独立的国内民族”的独特地位,很多部落发展起博彩业和旅馆,建立了与全球经济的稳固联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开始允许土著人成功地实现文化转型,但由于方式是盎格鲁式的,结果仍对土著人的文化完整性构成新的威胁。贫穷和歧视长期以来一直加剧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孤立。如果他们现在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有些人的确找到了,能够购买新的交通工具和卫星电视——有些人的确买到了,能够过上半城市化的生活——有些人的确过上了。可是,要想保持印第安文化的那些核心价值,反而困难得多了。^[123]只有一本教科书——我所考察的最早的教科书之一——提出了这一现在威胁着土著美洲人的关键问题:独特的印第安文化能够保存吗?《发现美国历史》用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一问题:它同时要求学生说几句美国土著青少年常说的,以体会那种困境。新教科书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们选取的是非印第安人的素材,停留在非印第安人的解释框架之内。一些教科书仍然把土著美洲人说成是与文明相对立的,并且继续相信印第安文化就像人类学家就这个种族所谈论的

那样——在与白人一接触时就凝固了。教科书对美洲印第安人为保持自身的单一生活方式所做的“艰苦奋斗”表示同情时,也只会证明自己的视野狭窄。土著美洲人从来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有很多种。即便没有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到来,美洲印第安人也不可能使这些生活方式在过去的五百年里保持不变。印第安人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自治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甚至在今天,我们把土著美洲人的首领分为两类:想实现文化转型的“进步派”,与想“保持印第安风格”的“传统派”。教科书的作者们并不给其他的美国人套上这个紧身衣。我们这些非印第安人从历史中或从其他文化中任意选择接受自己想要的东西。18世纪80年代,我们抛弃了我们的医学传统,但同时保留了我们的宪法。但是,土著美洲人执业医师如果放弃了他们的传统治疗方式,从法国接受了巴氏杀菌法,或从英国接受了抗生素;就会被视为放弃了自己的印第安方式。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交通或居住模式,但仍不失为“美国人”。但印第安人在我们眼中却不能既有所改变又不失为“印第安人”。



图 13 “我舞我神”

或许,土著美洲人能够打破这种文化转型上的困境,变得既现代又保持印第安特色。当然,他们的艺术家做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加拿大的因纽特人艺术家开始以皂石为材料创作雕塑作品,这种材料原本是他们的祖先在上个世纪用以制作水壶的。左图雕塑名为“我舞我神”(Dancing to My Spirit),堪称文化融合的美之典范,作者是那勒尼克·特马拉(Nalenik Temela)。

历史学的进步或许会增加我们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垒双方的融合机遇。如果我们认识到美洲印第安人的思想对形成美国文化的作用,美国就能够把土著美洲人社会视为一种值得我们继续学习的文化财富。但现在,我们的教科书没有一本提到了这种可能性,甚至那些最开明的教科书也只是呼吁善待印第安人,而没

有提议我们的社会应该继续汲取美洲印第安人的思想精华。

然而,即便我们中间不再有土著人或土著文化,我们仍要意识到那些本来会发生的多种可能性,要记住那些战争,要了解白人-印第安人关系的原貌。印第安人的历史是一剂良药,能够治疗宣扬“美国例外论”的那种虔诚的种族优越感——所谓欧裔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印第安人的历史告诉我们,美国及其前身英属殖民地对这个世界罪孽深重。对此我们必须永记不忘——当然,这并不是要纠缠于我们的过失,而是要理解并记住,我们再也不能制造伤害。我们应该通过自我批评来调整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就像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维克西指出的:“深入研究我们与印第安人的关系,设想一下美国人自身的黑暗面,就会逐渐形成这种有力的自我怀疑感。”^[124]通过“红眼”看历史,而不是把历史说成一群好人必然胜利的故事,将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更为深刻的理解力。

注释

[1] James Axtell, “Europeans, Indians, and the Age of Discovery in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 (1987): 629–30.

[2] Francis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vii.

[3] 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New York: MacMillan, 1907), 86.

[4] Rupert Costo, “There Is Not One Indian Child Who Has Not Come Home in Shame and Tears,” in Miriam Wasserman, *Demystifying School* (New York: Praeger, 1974), 192–93.

[5] Thomas Bailey, “The Mythmakers of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68): 18.

[6] Quoted in Calvin Martin, ed.,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2.

[7] Axtell, “Europeans, Indians, and the Age of Discovery,” 621–32.

[8] Sol Tax, foreword to Virgil Vogel, ed., *This Country Was Our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xxii.

[9] 但也不尽然:《走向今天》,在其1088页中,只有一页半,或者说0.1%的篇幅讨论了印第安人问题。而《发现美国历史》的831页中只有2页,占0.2%。《美利坚盛典》(1991),1077页中只有4页,占0.4%。《美利坚盛典》(2006),1162页中

只有4页,占0.3%。而 Boorstin and Kelley 的书的1056页也只有4页,占0.2%。《走向今天》对美国历史从头讲到尾,但我所编撰的那部分更重视现代;另一个版本在印第安文化方面花了更大的篇幅。

[10] 我将交替使用“部落”和“民族”这两个词,因为土著美洲人的领袖认为“民族”是一种欧洲式的结构,它更强调国家,他们认为这不适合大多数印第安社会。就像前面一章指出的,我还将“土著美洲人”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等同使用。我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也陷入了这一语言困境。有趣的是,那些使用“土著美洲人”这一术语的书籍所提供的解释未必就是最新颖的。我是先用他们的对非本土读者更熟悉的名字来介绍土著人,然后再用他们的土著名字称呼他们。

[11] Robin McKie, “Diamonds Tell Tale of Comet That Killed Off the Cavemen,” *The Observer*, 5/ 20/ 2007; observer.guardian.co.uk/, 5/ 20/ 2007.

[12] 还有一本书:《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虽然拒绝放弃教科书惯常的“无所不知”的腔调,但也提到了考古学中的一些争论和分歧。

[13] John N. Wilford, “New Mexico Cave Yields Clues to Early Man,” *New York Times*, May 5, 1991, 描述了 Richard MacNeish 的研究,后者提出 35,000 年说。David Stannard, *American Holocau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0, 提出 32,000 到 70,000 年说。Sharon Begley “The First Americans,” in *Newsweek’s* special issue *When Worlds Collide* (Fall/ Winter 1991), 15–20. 中对此提出了一个有益的总结。参见 Andrew Murr, “Who Got Here First?” *Newsweek*, 11/15/99; Marc Stengel, “The Diffusionists Have Landed,” *Atlantic Monthly* 1/ 1/ 2000, 35–48, [theatlantic.com/ issues/ 2000/ 01/ 001stengel.htm](http://theatlantic.com/issues/2000/01/001stengel.htm); Steve Olson, “The Genetic Archaeology of Race,” *Atlantic Monthly*, 4/ 2001, 70–71; and Steve Olson, “First Americans More Diverse than Once Thought, Study Finds,” *Washington Post*, 7/ 31/ 2001.

[14] 根据 Robert F. Spencer, Jesse D. Jennings et al., *The Native American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7), 8, 大多数考古学家相信小基因库学说。

[15] 既然 12,000 年前人类到达澳大利亚,并且是步行到达,我们就不能确信印第安人没有渡船到达这里。虽然考古学在这一区域没有发现船只,但是当时他们不可能用石头造船,木船也很难保留至今。

[16] 根据 *American Journey*, “因纽特人(Inuit)是最后一批穿越大陆桥到达北美的移民。”这样推测,这些著名的爱斯基摩人大概是用肩膀扛运他们的船只。

[17] 诚然,海平面下降形成了一个沟通白令海峡的峡谷,南北美洲都并不完全被水包围,因此,第一批殖民者就没有理由说它们被水包围了——Boorstin, Kel-

ley, Garraty 也都不能这样说。欧洲在初具大陆特征的年代,远未被水包围;这是作者们的挑剔,而非见解。

[18] 这再次说明,证据的缺乏不证明事实就不存在。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考古工作尚显不足,今天已被海水浸没成为海岸线的地区也几乎没有考古发现,去证明早期的人类移民。

[19] 骆驼是美洲的唯一驮重动物,Diamond 解释了它们为什么并不真的适合。

[20] 人名引自 *Sou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Orlando, FL: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人口数引自 Robert F. Spencer and Jesse D. Jennings, *The Native Americans*, 480.

[21] 引自 Costo and Henry, *Textbooks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22] 在 *The Cunning of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87), 91 的一段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反思中, Richard L. Rubenstein 强调“大屠杀见证了‘文明的进步’。”

[23] 圣诞节是欧洲文化融合的一个例证, 它把诸如弥赛亚的犹太信仰与欧洲北部诸如“冬至”以及重视冬青植物(冬青树、常春藤、常绿树、槲寄生灌木)的“异教徒”仪式结合起来。易洛魁人与其他地方民族的谷物文化,把源自墨西哥和秘鲁的谷物与东北部既有的思想观念结合起来。

[24] Pertti Pelto, *The Snowmobile Revolution* (Menlo Park, CA: Cummings, 1973).

[25] Fred Anderson, review of *The Skulking Way of War*,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9, no. 3 (December 1992): 1134.

[26] Robert Utley, *The Indian Frontier of the American West*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4), 12.

[27] 土著社会中人口的这种混合使人很难鉴别今天人的生理类型。“克里克人”与“拉姆毕人”(Lumbee)是文化而非种族称谓;见 J. Leitch Wright Jr., *The Only Land They Knew*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 230. 更有力的集权政府也是由欧洲势力针对本土居民所建立的,这样他们就有了可对付的竞争对手。

[28] Gary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4), 257; James Axtell, *The European and the Indi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257.

[29] 关于爱尔兰, 见 Allen Barton, *Communities in Disaste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0), 11-12. 墨西哥和秘鲁的大规模的民族,像欧洲的民族一样,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在今天美国所处的大多数区域,特别是西北部,部落战争在欧洲人的影响到来之前有时是凶残的。

- [30] Wright, *The Only Land They Knew*, 138; Patricia Galloway, "Choctaw Factionalism and Civil War, 1746-1750," *Journal of Mississippi History* 44, no. 4 (11/1982): 289-327; Joseph L. Peyser, "The Chickasaw Wars of 1736 and 1740," *Journal of Mississippi History* 44, no. 1 (1/1982): 1-25.
- [31] 18本书中有6本提到“皮科特战争”或“菲利普王战争”的幸存者被卖为奴隶,但是它们认为那是个别的事件,并且没有提到印第安奴隶贸易。
- [32] Wright, *The Only Land They Knew*, 33, 130.
- [33] Peter N. Carroll and David Noble, *The Free and the Unfree* (New York: Penguin, 1988), 57.
- [34] Almon W. Lauber, *Indian Slavery in Colonial Times Within the Present Lim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iamstown, MA: Corner House, 1970 [1913]), 110.
- [35] Lauber, *Indian Slavery in Colonial Times*, 106.另外,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 113, 119, 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数据:5,300名白人,可能包括契约奴以及2,900名黑人和1,400名印第安人。
- [36] J. A. Rogers, *Your History* (Baltimore: Black Classic Press, 1983 [1940]), 78. See also Frederick W. Hodge, ed., *Handbook of the Indians*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etin*, vol. 30, part 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 216.
- [37] 关于加利福尼亚,见 Albert Hurtado, *Indian Survival on the California Fronti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75.关于西南部,见 Jack Forbes, *The Indian in America's Pas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4), 94-95. Cf. Alan Galloway, *The Indian Slave Trad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38] Wright, *The Only Land They Knew*, 81-83.
- [39] Henry Dobyns, *Their Number Become Thinned*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3), 332.他还指出,由于瘟疫使一些有专门技术的人丧生并使人口锐减,由此导致劳动分工程度降低了,这对土著人技艺失传起到重要影响。另外参见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 97;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41, 87; Anthony F. C. Wallace, *The Death and Rebirth of the Sene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0), 24-25; Neal Salisbury, *Manitou and Providence* (New York: Oxford, 1982), 56-57.
- [40] Uteley, *The Indian Frontier of the American West*, 21. “绿眼白人”(Wasichu)在拉科他语(Lakota)中还指“肥胖的贪食者”(Wendy Rose, "For Some, It's a Time of Mourning," *The New World* [Smithsonian Quincentenary Publication], no. 1

[Spring 1990]: 4). 切罗基语中“白人”同样指“贪婪的抢夺土地的人”,引自与 Ray Fadden 的一次私人谈话, November 25, 1993.

[41] 《美国人》的确提到欧洲人“需要向他们竭力征服的人取经”,但连一个例子也没给出。

[42] D. W. Meinig, “A Geographical Transect of the Atlantic World, ca. 1750,” in Eugene Genovese and Leonard Hochberg, eds.,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in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197; Patricia Nelson Limerick, “The Case of the Premature Departure: The Trans-Mississippi West and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no. 4 (3/1992): 1381. 教科书的观点可以与一部名叫 Koyaanisqatsii 的电影相对照, 该电影以霍皮人(Hopi)的视角, 描写了恬静的西部大峡谷, 并与纽约市的不平静的城市峡谷相对照。

[43] Ronald Sanders, *Lost Tribes and Promised Land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sm* (Boston: Little, Brown, 1978), 373-74.

[44] Helen H. Tanner, “The Glaize in 1792: A Composite Indian Community,” *Ethnohistory* 25, no. 1 (Winter 1978): 15-39.

[45] Hurtado, *Indian Survival on the California Frontier*, 47-49.

[46]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 60.

[47] 引自 Peter Farb,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 (New York: Dutton, 1978), 313.

[48] 本杰明·富兰克林, 引自 Bruce Johansen, *Forgotten Founders: How the American Indian Helped Shape Dem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Common Press, 1982), 92-93. 另外, Farb,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 313; Frederick Turner, *Beyond Geography* (New York: Viking, 1980), 244;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 317-18; 以及 James Axtell, “The White Indians” in *The Invasion With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02-27 也认为, 反过来, 更多的白人变成了印第安人。

[49] Turner, *Beyond Geography*, 241; Karen Ordahl Kupperman,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 (London: J. M. Dent, 1980), 156. 另参见 Axtell, “The White Indians,” and *The European and the Indian*, 160-76.

[50] 本杰明·富兰克林, 引自 Jose Barreiro, ed., *Indian Roots of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American Indian Program, 1988), 43; Vogel, ed., *This Country Was Ours*, 257-59. 并非所有的印第安社会都奉行平均主义: 密西西比流域的纳齐兹人和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人带有严厉的等级制。

[51] Cadwallader Colden quoted in Vogel, ed., *This Country Was Ours*, 259.

[52] Alvin Josephy, Jr., *The Indian Heritage of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3), 35; William Brandon, *New Worlds for Old*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6), 3–26; Michel de Montaigne, “On Cannibals,” in Thomas Christensen and Carol Christensen, eds.,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nd Other Myth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1992), 110–15.

[53] 引自 Bruce Johansen and Roberto Maestas, *Wasichu: The Continuing Indian War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35.

[54] Jack Weatherford, *Indian Givers* (New York: Fawcett, 1988), Ch. 8; Johansen, *Forgotten Founders*; Barreiro, ed., *Indian Roots of American Democracy*, 29–31. 另参见 Bruce A. Burton, “Squanto’s Legacy: The Origin of the Town Meeting,” *Northeast Indian Quarterly* 6, no. 4 (Winter 1989): 4–9; Donald A. Grinde Jr., “Iroquoian Political Concept and the Genesis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ortheast Indian Quarterly* 6, no. 4 (Winter 1989): 10–21; 以及 Robert W. Venables, “The Founding Fathers,” *Northeast Indian Quarterly* 6, no. 4 (Winter 1989): 30–55. 这带有几分恭维,在这份文件以及同时期的其他文件中,国会反复从易洛魁人中借用符号和观念。不仅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以及托马斯·潘恩都了解并尊重印第安人的政治学说。然而,Elizabeth Tooker 否认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the Iroquois League” 中的这种影响, *Ethnohistory* 35, no. 4 (Fall 1988): 305–36. 另见 “Commentary” on Tooker in *Ethnohistory* 37, no. 3 (Summer 1990). In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1992), 127, Arthur Schlesinger Jr. 提出了一种“欧洲中心论”式的论断:“还是那些追求个人解放的自由学说的源头——唯一的源头……”,但他只是断言,而没有提供证据。显然,他并没意识到,欧洲人不仅惊叹土著美洲人的自由,而且震惊于中国和土耳其的信仰自由。马可·波罗曾介绍了他27年的“中国”(Cathay)之旅中神话般的所见所闻。最令他震惊的就是宗教自由: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教以及佛教信仰在国内社会里自由畅行。当西班牙在1492年驱逐犹太人时,土耳其接纳了他们,并承认他们的信仰。

[55] John Mohawk, “The Indian Way Is a Thinking Tradition,” in Barreiro, ed., *Indian Roots of American Democracy*, 16.

[56] James Axtell, “The Indian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Colonial Period,” in *The Impact of Indian History on the Teaching of United States History* (Chicago: Newberry Library, 1984), 20–23; Barreiro, ed., *Indian Roots of American Democracy*, 40–41; Bernard Sheehan, “The Ideology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in Francis Jennings, ed.,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icago: Newberry Library, 1983), 12-23; and Stewart Holbrook, *Dream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7), 137-45 中的纽约州部分。

[57] Weatherford, *Indian Givers*, Ch. 6.

[58] Wright, *The Only Land They Knew*, 264.

[59] Alfred Crosby Jr., "Demographics and Ec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eminar,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990), 4. 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懂得一种耕作方式,据说其新生的土地要比其耗竭的土地还要多。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农业中,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它们似乎把水上花园、沟渠和渔业结合到一起。

[60] Vogel, ed., *This Country Was Ours*, 268.

[61] 同上,266-67.

[62] Faith Davis Ruffins, 关于专利药品商标问题的讨论会,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Washington, D.C.: April 25, 1991). 另参见 *American Indian Medicine*, Virgil J. Vogel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0). Bruce Johansen, *Forgotten Founders*, 117; Warren Lowes, *Indian Giver* (Penticton, British Columbia: Theytus Books, 1986), 51; William B. Newell, "Contribution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to Modern Civilization," *Akwesasne Notes* (Late Spring 1987): 14-15; Lewis Hanke, *The Spanish Struggle for Justice in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9), 90, 都谈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63] Costo and Henry, *Textbooks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22.

[64] 一位名叫 Vine Deloria 的美国印第安人写了这样的一本书: *God Is Red* (Golden, CO: North American Press, 1992 [1973]).

[65] Calvin Martin, ed,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1.

[66] 引自 Lee Clark Mitchell, *Witnesses to a Vanishing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260. 另见 Richard Drinnon, *Facing We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539.

[67] James Merrell, *The Indians' New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193-95.

[68] Drinnon, *Facing West*, xvii-xix. Thomas Sanchez 在其著名小说《兔老板》(*Rabbit Boss*) (New York: Vintage, 1989 [1973]) 中,讲述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加利福尼亚的瓦肖印第安人的故事,生动地刻画了得不到平等法律地位的人所

发生的事情。

[69] David Horowitz, *The First Fronti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8), 14; Stephen Aron, "Lessons in Conque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 打印稿), 15; Wiley Sword, *President Washington's Indian Wa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5), 191-97. 《希望之地》是一个例外,它有一个副标题:“150年的战争”,出色地对印第安人战争做出了一般性介绍,并对菲利普王战争进行了具体介绍。

[70]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146.

[71] 引自 *Missouri!* 一书的护封 (New York: Bantam, 1984). Ross 系 Noel B. Gerson 的笔名,他在其中共撰写了 325 页。

[72] Joe Feagin, *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4), 181. John D. Unruh, *The Plains Indian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9).

[73] 引自 Kupperman,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 185. 另见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220.

[74] Bradford, *Of Plimoth Plantation*, 由 Valerian Paget 提交 (New York: McBride, 1909), 284-87. Underhill 引用了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223, 以及 Segal and Stineback, *Puritans, Indians, and Manifest Destiny*, 106. 印第安人很快调整了对欧洲人的战斗方式,相应地提高了他们的暴力程度。皮科特人并没有被静静地消灭,一些人仍然在康涅狄格保留地或其附近活了下来,并且在那里拥有一个大的“娱乐场”(casino)。

[75] Peter A. Thomas, "Cultural Change on the Southern New England Frontier, 1630-1655," in Fitzhugh, ed., *Cultures in Contact*, 155.

[76]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 126. 另见 Jennings 在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324. 中的较小的数据。

[77] 为说明这一点,我包括了双方的死亡人数,因为万帕诺亚格人和纳拉甘塞特族人现在都是美国人。如果只算殖民者的死亡数,菲利普王战争也要比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1812年战争、美西战争死亡人数大。另见 Stephen Saunders Webb, as paraphrased by Pauline Maier, "Second Thoughts on Our First Century,"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8/7/1985.

[78] Weatherford, *Indian Givers*, 225.

[79] Jan Carew, *Fulcrums of Change*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88), 55. Carolyn Stefanco-Schill, "Guale Indian Revolt," *Southern Exposure* 12, no. 6 (11/

1984): 4-9.

[80] Dorothy V. Jones, *License for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25.

[81] The novel *Okla Hannali* by R. A. Laffert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2), 136-42, 186-89, treats the Civil War within Indian Territory.

[82] Irving Wallace, David Wallechinsky, and Amy Wallace, *Significa* (New York: Dutton, 1983), 326. Cf. James W. Loewen, *Lies Across America* (New York: New Press, 1999), 385-89.

[83] 即使今天也是如此:人们有权在私有的乡村土地上打猎、钓鱼或散步,除非张贴了公告,告知土地新开垦过。

[84] Carleton Beals, *American Earth*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39), 327-30; Steven Hahn, "Hunting, Fishing, and Foraging,"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6 (1982): 37-64; Peter A. Thomas, "Cultural Change on the Southern New England Frontier, 1630-1655," in Fitzhugh, ed., *Cultures in Contact*, 151.

[85] 比如,参见 Pierre Berton, *The Invasion of Canada, 1812-1813*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80), 27. 这七次战役并不包括蒂帕卡努河战役,它在正式向英国人宣战之前就发生了。

[86] 1815年之后我们的印第安战争的新特点在下一场发生在西北的战争——1832年的“黑鹰之战”(the Black Hawk War)——中得到展现。虽然这种战争几乎毁灭了那个“袋与狐”(Sac and Fox)的民族(“黑鹰之战”的土著一方——译者按),但它相比1812年战争中的那些更具威胁的战役,是无足轻重的。见 Brian Dippie, *The Vanishing American*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2), 7-8.

[87] Johansen, *Forgotten Founders*, 118. 另见 Frances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 (New York: Vintage, 1980), 90-93.

[88] 根据 William Clark (of Lewis and Clark fame), 1815年之前,“离我们的居住地最近的那些部落是强大而令人生畏的敌人,但从那以后,他们的力量受到打击……他们沦为可怜的对象。”引自 Dippie, *The Vanishing American*, 7-9.

[89] Fergus M. Bordewich 对 David Roberts's *Once They Moved Like the Wind* 的书评, in *Smithsonian*, 3/ 1994, 128.

[90] Carleton Beals, *American Earth*, 63-64. See also Reginald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 3, 190-95.

[91] Kupperman,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 188; and Dippie, *The Vanishing American*, 7-9.

- [92]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 63; Jennings, *Empire of Fortune*, 63;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32–36. Cf. Leon Festinger,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1957).
- [93] William Gilmore Simms 引自 Mitchell, *Witnesses to a Vanishing America*, 255. 另见 Vogel, ed., *This Country Was Ours*, 286 以及 Francis A. Walker 于 1871 向他的部门做的汇报。
- [94] 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6), 702.
- [95] Edward 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167.
- [96] Gordon Craig, “Histor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in Paul Gagnon, ed., *Historical Literacy* (New York: Macmillan, 1989), 134.
- [97]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144.
- [98] Ronald Satz,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Jacksonian Er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5), 143.
- [99] 弗朗西斯·德雷克 (Francis Drake) 似乎在 1573 年就替北美的英国人想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从未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见 Sanders, *Lost Tribes and Promised Lands*, 218–19.
- [100] 后来，拉姆毕人和西米诺尔人变得更为种族主义。拉姆毕人禁止附近的“三族隔绝”地区的“黑人”(blacker)进入自己的学校。西米诺尔人把“黑西米诺尔人”从他们在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的展览中剔除出去。
- [101] J. F. Fausz, “Patterns of Anglo-Indian Aggression and Accommodation Along the Mid-Atlantic Coast, 1584–1634,” in William Fitzhugh, ed., *Cultures in Contact*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85), 234–35; Adolph Dial and David Eliades, *The Only Land I Know* (San Francisco: Indian Historian Press, 1975), 2–13. 另见 Turner, *Beyond Geography*, 241–42. 而 *Challenge of Freedom* 并未提及“失去的殖民地”的后裔有可能在今天的拉姆毕人中被发现。Peter Hulme, *Colonial Encounters* (London: Methuen, 1986), 143, 同样认为，“失去的殖民地”的人很可能变成了克罗亚坦(Croatoan)印第安人。《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也的确认为，“失去的殖民地”可能融入了附近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否则就不太可能有“两族”或“三族”社会。
- [102] Robert Beverly,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7 [1705]), 38.
- [103] Lauber, *Indian Slavery in Colonial Times*; Lonn Taylor, “American Encounters,” (address at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上的发言, Washington, D.C., 4/29/

1993).

[104] Thomas, "Cultural Change on the Southern New England Frontier, 1630-1655," in Fitzhugh, ed., *Cultures in Contact*, 141. 在一开始,英国人在弗吉尼亚鼓励种族通婚,以促进与临近印第安人的联盟,甚至为此奖励那些愿意娶印第安妇女的弗吉尼亚白人。但是,这种奖励没有维持多久,并且只有很少的殖民者希望得到这样的奖励。

[105] Wright, *The Only Land They Knew*, 235;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 Axtell, "The White Indians."

[106] Francis Jennings, *Empire of Fortune* (New York: Norton, 1988), 479. See also Charles J. Kappler, *Indian Treaties 1778-1883* (New York: Interland, 1972 [1904]), 5.

[107] Satz,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Jacksonian Era*, 216-18.

[108] Pearce, *The Savages of America*.

[109] S. Blancke and C.J.P. Slow Turtle, "The Teaching of the Past of the Native Peoples of North America in U.S. Schools," in Peter Stone and Robert MacKenzie, eds., *The Excluded Past* (London: Unwin Hyman, 1990), 123.

[110] Reginald Horsman, "American India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Manifest Destiny," in Francis Prucha, ed., *The Indian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22.

[111] Drinnon, *Facing West*, 85.

[112]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 285. Cf. Evon Vogt, "Acculturation of American Indians," in Prucha, ed., *The Indian in American History*, 99-107; and Axtell, *The European and the Indian*, 168.

[113] Hurtado, *Indian Survival on the California Frontier*, 122.

[114] Chief Seattle, "Our People Are Ebbing Away," in Wayne Moquin with Charles Van Doren, *Great Documents in American Indian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1973), 80-83.今天的曼哈顿人到佛蒙特避暑,他们一定能够理解印第安人的这种迁徙模式。

[115] Ruellen Ottery, "Treatment of Native American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lymouth Colony" (Johnson, VT, 1984, typescript), 8-9;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144-45. Alden Vaughan, *New England Frontier* (New York: Norton, 1979), 该书声称印第安人在新英格兰的法庭上受到保护,但这种观点受到新学术界的攻击。

- [116] David A. Nichols, *Lincoln and the India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8), 189-90.
- [117] Inmuttooyahlatlat quoted in Robert C. Baron, ed., *Soul of America* (Golden, CO: Fulcrum, 1989), 289.
- [118] Farb,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 317.
- [119] Charles M. Segal and David C. Stineback, *Puritans, Indians, and Manifest Destiny* (New York: Putnam, 1977), 48. Turner, *Beyond Geography*, 215-16, 也说, 在威廉姆斯看来, 印白关系以及白人对土地的豪夺是“不公正和亵渎神明的”, 这是他出走的关键原因。
- [120] Prucha, ed., *The Indian in American History*, 7.
- [121] Satz,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Jacksonian Era*, 25.
- [122] Blancke and Slow Turtle, “The Teaching of the Past of the Native Peoples of North America in U.S. Schools,” 121.
- [123] 这种观点暗含于 Dean A. Crawford, David L. Peterson, and Virgil Wurr, “Why They Remain Indians,” in Vogel, ed., *This Country Was Ours*, 282-84. 另见 Robert Berkhofer, *The White Man's India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192-93.
- [124] Christopher Vecsey, “Envision Ourselves Darkly, Imagine Ourselves Richly,” in Martin, ed.,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 126. Jennings 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见 *The Ambiguous Iroquois Empire* (New York: Norton, 1984), 482.

第五章

《飘》：美国历史教科书隐瞒种族主义

135

历史,尽管充满痛苦,
但仍不可能被遗忘;
只要我们勇敢地面对,
就不会悲剧重唱。

——玛雅·安吉洛^{[1]①}

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裂缝处于美国历史的核心。我们必须用对自由的最大热情,去迎接这一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忘记——我们忘记了奴隶制的最大污点就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心脏里,忘记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教训,忘记了我们是谁;那么,我们就会使那一裂缝更深、更宽。

——肯·伯恩斯坦^{[2]②}

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不能把我们内战期间或之后的那些经验用于启迪和提升人类。

——W. E. B. 杜博伊斯^[3]

更多的美国人是从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而非关于那一时期历史的各种大部头著作中了解内战与重建中的南方历史的。

——沃伦·贝克与迈勒斯·科洛斯^[4]

在我们现在称作“合众国”的这块土地上,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定居呢?如果我们暂不考虑上一章的内容——土著印第安人首先定居;那么,最好的答案或许是

① 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美国当代黑人女诗人。

② 肯·伯恩斯坦(Ken Burns),美国当代著名导演。

1526年。那年夏天,500名西班牙人和100名黑人奴隶在大约今天的南卡罗莱纳州的皮迪河口建立了一个小镇。在定居之初的几个月里,疾病加上与附近印第安人的冲突使很多人死去。11月,奴隶们反抗,杀死了一些主人,逃到了印第安人那里。到这时,只有150名西班牙人幸存下来,他们撤退到了海地。以前的奴隶留了下来,并且可能与附近的印第安人融合到了一起。^[5] 136

这只是鸡尾酒会上的闲谈。我们不能挑剔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没有提到美国的第一批非本土定居者是黑人。然而,从教育的角度来考虑,这段历史还是有用途的。它说明非洲人(这里称他们为非裔美国人还为时太早吧?)从一开始就反对奴隶制。它指出了三边种族关系(印第安人——非洲人——欧洲人)这一被大多数教科书完全忽略的重要主题。^[6]它告诉人们,奴隶制如果失去国境的保障,要想存在下去将不那么容易。同时,作为某种象征,它表明,自第一批欧洲人尝试定居之日起,非裔美国人本身以及与之相伴的黑—白种族关系问题,就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或许,我们历史学中最为常见的主题就是黑美洲被白美洲所支配这一问题。种族是美国社会里最尖锐、最深刻的争端。黑人和白人的关系问题曾使辉格党瓦解,曾促成了共和党的形成,并且导致民主党在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标榜自己是一个“白人的政党”。1866年,共和党违背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愿望,通过了《民权法案》,这或许是国会否决总统否决案的最早案例之一。1964年,为反对《民权法案》,一些参议员曾发起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阻挠性演讲——534小时。托马斯·伯恩·埃德萨尔展示了种族问题曾如何推动了1964至1972年政治阵线的大改组,当时,白人主导的南方由民主党的堡垒变成共和党的据点。^[7]今天,种族关系依然影响着政治。在2004年大选中,乔治·W. 布什只赢得黑人选票的11%,而白人选票为57%。

几乎没有哪种大众文化与种族问题无关。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或许内战和重建时期除外,以一种反常的方式发源于种植园奴隶制下的黑脸滑稽表演,是美国大众娱乐的主要形式。在那一时期,《汤姆叔叔的小屋》是最为经久不衰的作品,印刷量以千计。美国第一部史诗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以及电影巨片《乱世佳人》,实际上都和种族问题有关。《阿莫斯与安迪》一直以来都是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节目中两名白人假扮成滑稽而无能的非裔美国人。^[8]最受欢迎的电视连续短剧《根》激起人们对宗教和种族背景的兴趣,从而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在音乐方面,种族关系为我们 137

的圣歌、蓝调乐曲、“雷格”音乐^①和说唱音乐的创作提供了基本的主题和素材。

① “雷格”音乐(reggae):源于牙买加的流行音乐,含有民间音乐、黑人布鲁斯音乐、摇滚乐的成份。

围绕种族奴役的斗争或许是美国历史学最突出的主题。直到19世纪末,棉花一直是我們最重要的出口产品,而它从种植、护理、采摘到去籽,大部分都是由奴隶来完成的。^[9]我们今天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那些优雅漂亮的大房子,大部分都是当年的奴隶们建造的,或者是受益于当年的奴隶和棉花贸易。内战夺取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其数量相当于我们在其他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而在内战期间,黑人和白人的关系是一个中心话题。内战结束后,黑人和白人的关系又成为重建的主要焦点。美国没有赋予非裔美国人平等的权利,这最终导致了一个世纪之后争取民权的斗争。

在我们最不怀疑这一问题的地方——阿拉莫,在整个西米诺尔人战争期间,甚至在摩门教徒被逐出密苏里时,这一问题反而表现得愈加激烈。^[10]斯特兹·特克尔是对的:种族问题是我们“美国人的魔怔”。^[11]自从第一批非洲人和西班牙人1526年登上卡罗莱纳的海岸后,我们的社会就不断地被这种黑白关系所撕裂,有时也因此而团结起来。

长期以来,白人主导的美国本身就一直在讲述着关于奴役黑人的各种故事。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H.B.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都是以奴隶制为背景。两部书讲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汤姆叔叔的小屋》把奴隶制描述成理应反对的恶的制度;而《飘》则暗示,奴隶制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它的消失令人惋惜。在这一时期,一直到民权运动,美国历史教科书都十分赞同米切尔的观点。1959年,我所用的中学教科书称奴隶制并非那么糟糕的事情。既然奴役对非裔美国人来讲是一种负担,那么,奴隶们也是旧式奴隶主老爷及夫人的一种负担。此外,奴隶们生活还算快乐,被主人们喂得饱饱的。这些言论构成了“木兰神话”^①。根据这种神话,人们认为奴隶制是一个和谐的、上天恩赐的社会结构,它不会对任何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带来真正的危害。出版于1950年由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和亨利·斯蒂尔·康麦格编撰的一本书籍竟然说:“山伯^②们遭受的冤屈使废奴主义者陷入怒火与泪水之中;但是有理由相信,对于山伯们来说,他们从南部的‘特殊制度’中受到的伤害要比南部的其他阶层少得多。”^[12]当然,“特殊制度”意味着奴役。该书这里对这一制度的描绘,直接取材于《飘》。

然而,今天的教科书中不再这样说了。自民权运动以来,教科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斯托夫人对那一制度的控诉之路上。《美国历史》在讨论这一制度时,一开始以一种肯定的态度描述了奴隶们的生活环境:“通常,他们被给予足够

① “木兰神话”(magnolia myth);“木兰”(magnolia),密西西比州的别名。

② “山伯”(Sambo),对黑人与印第安人或欧洲人混血后裔的蔑称。

的衣物、食物和栖身之所。”但接下来作者指出：“奴隶们绝对没有权利。他们没有选举权和个人财产权，不仅如此，他们的主人完全掌控他们的生命。”作者总结道：“奴隶制简直是非人性的。”《美国的经历》告诉我们：“奴隶制导致了绝望，绝望有时会使黑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一些情况下，绝望还会使奴隶们造反，以反抗白人奴隶主的奴役。”《生活与自由》轻快地写道：“历史学家并不认为奴隶们受到了多么严重的伤害。”但该书又指出，在某些地方，鞭打奴隶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从没听说过没有这种情况的种植园。此外，《生活与自由》在其最后一节介绍奴隶生活时，引用了一些灵歌的标题——“我所有的磨难，哦，上帝，就要结束”，还列举了奴隶法典中的一些非人道条文。读过这三本书的人，没有谁会认为奴隶制是好的。实际上，我所考察的大多数教科书都提出奴隶制对于奴隶而言是无法忍受的。^[13]

今天的教科书还向人们描述了 19 世纪上半叶奴隶制问题如何逐步深入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它们说轧棉机使奴隶制更加有利可图。^[14]它们还讲述了 19 世纪 30 年代南方各州和联邦政府如何把印第安人逐出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和佐治亚等广阔地带，而奴隶制的范围也在扩大。此外，它们还提到，在 1830 到 1860 年间，为奴隶制辩护的意识形态要求越来越尖利，也越来越公开地宣扬种族主义。种植园主和奴隶贩子们曾说奴隶制是一种邪恶但必要的制度，并为此感到抱歉，但到这时，这些观念都已远远不够了。用《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中的话说，他们开始认为奴隶制是“对奴隶本人有积极价值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与一些更加粗暴的法律和习俗相唱和。《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说：“在南方，谈论奴隶解放问题变得越来越危险。”在一些蓄奴州，仅仅是接受鼓吹废奴的文献就构成重罪。南方各州颁布新的法令，干预奴隶主释放奴隶的权利。已经获得自由的非裔美国人的法律地位变得更不稳定，甚至在北方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南方白人在联邦政府中占上风，他们使限制奴隶制的企图在全国任何地方变得更加艰难。^[15]

与此同时，许多北方白人和一些生活“梅森-狄克森线”^①以南的人越来越不满，他们认为国家已经丧失了理想。^[16]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愈演愈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主题。1848 年，一位来自密苏里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把该问题的普遍性比作《圣经》中的“蛙灾”^②：“你不忍看饭桌，那里青蛙蹦跳；你不愿赴宴入席，那里青蛙蹦跳；你不能踏婚床掀锦被，那里青蛙蹦跳。这场蛙灾搅乱了我们，我们目不能视，手不能触，无计可施。”^[17]

① “梅森-狄克森线”，Mason-Dixon line，南方蓄奴州与北方自由州的大致分界线。

② 源自《圣经·出埃及记 7》。以下引文为托马斯·哈特·本顿语，非《圣经》原文。

奴隶制是南卡罗莱纳州以及随后另外 10 个州脱离联邦的根本原因。1860 年,该州领导人明确宣布他们为什么要脱离联邦。圣诞节前夜,他们签署了《南卡罗来纳脱离联邦宣言》。他们第一个不满是“有 14 个州长期以来故意拒绝履行他们的宪法义务”,特别是这一条款:“没有一位根据一州的法律在该州工作和服务的人逃到它州时,可以免于在该州的工作和服务;此人应该被遣返该州。”这当然是指“逃亡奴隶条款”。根据这一条款,国会曾通过了《1850 年逃亡奴隶法案》,对于该法案,南卡罗莱纳州当然赞同。它要求,自由州的执法官员乃至每个公民都应积极抓捕和遣返那些一旦被白人称为自己的奴隶的非裔美国人。这使得自由州与奴隶制为伍。一些自由州巧妙周旋,试图逃避部分责任。例如,宾夕法尼亚州颁布了一项法律,它承认联邦法案的最高权威,但同时指出,宾夕法尼亚人依然有权决定是否支付他们的执法官员的工资,并且可以拒绝为抓捕和遣返所谓的奴隶支付报酬。南卡罗莱纳州抨击对州权的如下理解:

但是,非蓄奴州方面对奴隶制度的日益敌视,已经导致了对本州义务的漠视……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罗德岛、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以及爱荷华州都颁布法律,要么宣布国会的法案无效,要么阻止任何实施国会法案的企图。

因此,当自由州主张州权时,南卡罗莱纳州却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来看,美国的任何在野党都呼吁州权。南方白人在 19 世纪 50 年代掌控着联邦政府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并且还通过民主党掌控着立法机构。因此,他们当然反对州权。1857 年,最高法院大法官坦尼判定:在全国范围内,不管州或者准州的政府意愿如何,黑人不享有白人必须尊重的权利。这时,奴隶主们高兴了。第二年,奴隶主们敦促总统布坎南动用联邦权利使蓄奴在堪萨斯合法化。只是在 1860 年大选中失去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之后,奴隶主们才开始建议限制联邦权利。

南卡罗莱纳州的领导者们还谴责纽约州甚至不给奴隶过境权,并谴责其他北方州让非裔美国人有投票权。在南北战争之前,这些本都属于各州自己的权利。然而,南卡罗莱纳州声称自己有权决定纽约州是否能够在纽约州范围内禁止奴隶制,或者佛蒙特州是否有权限制佛蒙特州范围内的公民权。卡罗莱纳人甚至辩称其他州的居民没有权利对他们的特殊制度做与自己不同的思考。他们将北方人“宣布奴隶制度是有罪的”作为自己脱离联邦的又一个理由。简言之,奴隶制问题从一开始就反映到这份文件之中。当然,虽然林肯当选成为一个导火线,但

是脱离联邦的长远目的在于保护、维持和加强奴隶制。南卡罗莱纳州脱离联邦时,就是以此为理由,其他州也不例外。

尽管这一点已很明显,但在1970年前,很多教科书虽然承认导致南方脱离联邦的各种原因,比如,它们承认在关税与内部改革方面的分歧,承认以农业为主的南方与以工业为主的北方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州权”问题上的冲突,但唯独不承认奴隶制是其原因之一。这是为南方的辩护。^[18]如此糟糕的学术表述是永远不能被原谅的。自民权运动之后,大多数教科书作者开始同意亚伯拉罕·林肯当年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上的讲话:“(奴隶制)在某种程度上是战争的起因。”1981年,《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指出:“冲突的核心在于奴隶制,这个问题不会自动消失。”

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那些最新的历史教科书在这一问题上反而倒退了。比如,《美利坚之旅》说:

南方以“州权”为由脱离联邦。它们认为,每个州自愿加入联邦;宪法是独立州之间的契约。现在,全国政府违背了这一契约——它拒绝推行《逃亡奴隶法案》,否定南方诸州在那些新领地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这些州就有理由退出联邦。

141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全国政府并没有拒绝推行《逃亡奴隶法案》,不管是南方州还是北方州,都没有被剥夺其“新领地的权利”,因此,这段话与其说是在解释,不如说是在混淆黑白。其他几部最近出版的教科书也同样在制造混乱。《走向今天》画了一个小方框,将“南方的目的”与“北方的目的”相比较。它引用1861年7月25日的国会决议,证明合众国是在“为维护联邦”而战。就战争起因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1863年之前,结束奴隶制一直并非战争的目的。)但是该书为说明南方的战争目的,只引用杰佛逊·戴维斯就职演讲中的这句话:“我们竭力确保安宁,希望我们既有权利得到尊重,但徒劳无功。”什么权利?南方为什么要脱离联邦?该书缄口不言。布尔斯廷与凯利从未讨论南方为什么要脱离联邦,只是提到林肯当选成为导火线。那为什么不干脆只引用南卡罗莱纳州的《脱离宣言》呢?毕竟,南卡罗莱纳州的这个《宣言》就是为了“证明脱离联邦的正当性”。^[19]

大多数教科书在关于奴隶制对于南方脱离联邦的作用这一问题上都有所倒退,但除此之外,它们现在都能从更深层次来处理这类问题。教科书为什么又有所进步呢?这一问题涉及“历史编撰学”,即,关于历史写作的考察。谁写的教科书?在什么背景下?面向什么读者?又是什么时候写的?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

出版商受制于南方白人。在20世纪20年代,佛罗里达等南方州颁布法律,要求“确保正确书写合众国的历史,包括真实而正确地再现南方“联盟”的历史。”^[20]许多州要求教科书把内战称为“州际战争”,似乎原来就不曾有需要脱离的统一国家。(我没找到证据,说明在战争进行期间,有人曾称那场战争为“州际战争”。)

然而,在从1955年到1970年的15年间,民权运动打击了作为美国官方制度的种族隔离政策。这项运动虽然在改变美国种族关系方面没有获得成功,但它确实帮助非裔美国人赢得了更多的权利。今天,许多学校的理事会、课程委员会和中学历史部都吸纳了非裔美国人,以及那些摒弃了“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的美国白人。因此,写作时间影响了写作内容。当今的教科书能够投入更多的篇幅来论述奴隶制这一话题,并且能够在这些篇幅里提供更正确的描述。^[21] 142

美国人似乎总会为奴隶制感到震惊。当孩子们了解到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曾拥有奴隶时,他们会感到震惊。威廉斯堡殖民地旅游景点的讲解员说,许多游客在听到奴隶制就曾存在于这里,这里曾是弗吉尼亚种植园的中心时,也感到十分惊讶。今天,大人们很少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奴隶制的时间远比奴隶获得自由的时间长。甚至更少有人知道,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前,奴隶制在北方也十分重要。第一块使奴隶制合法化的殖民地不是弗吉尼亚,而是马萨诸塞。在1720年,纽约市的7000人中,1600名是非裔美国人,而后者大部分是奴隶。华尔街就是一个主子们按天或按周出租自己的奴隶的大市场。^[22]

大部分教科书对北方的奴隶制不予重视,因此奴隶制看似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事实上,相比我们教科书中的整个故事线索,奴隶制的蔓延仅是一种不幸而又微小的瑕疵。詹姆斯·奥利弗·霍顿指出:“如果不从新的视角研究美国历史,黑人的经历就不会得到全面而清晰的阐释。”^[23]但是,教科书作者们没能提出任何新的视角;相反,他们把自己关于奴隶制的改进了的、更加准确的描述,硬塞进旧式的“一贯进步的”故事线索之中。在这一传奇中,美国的民主从一开始就是固有的,而且不断得到加强,而奴隶制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异常现象,并不是历史的主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民权运动的成功,使得教科书作者们能够说黑白种族关系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至少在形式上是解决了。这使得教科书在讨论奴隶制问题时,不会偏离其一贯的乐观基调。

今天的教科书在描写奴隶制的那些令人恐惧之处以及它对美国黑人的影响时,几乎不提奴隶制对美国白人社会——无论南方的还是北方的白人社会——的影响。教科书难以承认美国白人乃至整个美国有什么错误。或许,真实地讲述奴隶制对于奴隶来说意味着什么本是容易的事。毕竟,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消亡了。我们已经超越了它而取得进步,因此我们能够承认它的罪恶。甚至里士

满的“联盟博物馆”也设置了一个关于奴隶制的展览,对奴隶制也不再浪漫化。^[24]然而,不解释奴隶制对今天的影响,奴隶制占据那么大的篇幅就像《霍利-斯姆特关税法》^①占据很大篇幅一样:对于11年级的学生来说,真倒霉,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记。

奴隶制对于当今社会,有两个孪生遗产:一是造成黑人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低下;一是向白人灌输文化种族主义。二者继续像幽灵般困扰着我们这个社会。因此,如何对待奴隶制的持久影响,必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奴隶制消亡了,但种族主义尚未结束。

在我们这个不平静的时代,学生们要想在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懂得是什么导致了种族主义。尽管种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但在西方世界,种族主义主要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历史源头:消灭土著人并强占他们的土地;把非洲人变成奴隶,迫使他们在那片土地上劳动。要讲清这种关系,教科书就必须向学生讲述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奴隶制与作为思想体系的种族主义之间的动态的关系。社会学家把这些叫做“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在非洲奴隶贸易之前和之后,奴隶制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欧洲人凭借军事与技术上的优势,在15世纪使奴隶制变得有所不同,因为它变成了种族对种族的奴役。渐渐地,白人认为对白人的奴役是不正当的,而对非洲人的奴役则是可以接受的。与先前的奴隶制不同,美国非裔奴隶的孩子永远是奴隶,即便与主子阶级通婚,也不能获得自由。这种区别对待的原则就是种族主义。正如孟德斯鸠1748年所言——这位法国社会哲学家对美国民主有着深刻的影响——“设想这些生灵也是人,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若他们是人,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就不是基督徒。”^[25]这里,孟德斯鸠预言了“认知失调”现象,指出了“我们”是如何调整自己(关于黑人)的观念,以证明自己的行为的合理性。

关于种族主义在西方兴起,历史学家们已经理出了其历史脉络。在15世纪50年代以前,欧洲人视非洲人为异族,但不一定把他们视为次等民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奴隶贸易的队伍中来,欧洲人开始把非洲人说成是愚蠢的、落后的、未开化的。健忘症流行一时。来自非洲的摩尔人曾经给西班牙和意大利带来很多知识,由此引起了文艺复兴,但欧洲人发现,忘记这一历史是有利的。欧洲人当年知道,廷巴克图^②是学问的中心,以大学和图书馆闻名于世;现在,欧洲人和欧裔美国人忘记了廷巴克图,把非洲看成是“黑暗大陆”。^[26]到19世纪50年

① 《霍利-斯姆特关税法》(Hawley-Smoot Tariff),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的一项实行高关税壁垒政策的法案。

② 廷巴克图(Timbuktu),现名“通布图”(Tombouctou),是西非的马里共和国的一个城市。

代,许多美国白人,也包括一些北方人,都认为黑人极其低劣,几乎不可救药,对于他们来说,奴役是一种最适当的教育方式;同时,奴隶制还在空间上把他们与所谓“黑暗大陆”上的野蛮习俗隔离开来。

种族主义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生命力远远超过了产生这一上层建筑的奴隶制的社会结构。下面一段话来自玛格丽特·米切尔 20 世纪 30 年代所著的《飘》,它说明了种族主义到那时依然具有强盛的生命力。讲故事的人是这样诠释内战后的重建:

以前的庄稼汉发现自己突然上升到权势的宝座上。他们像一些耍小聪明的生灵一样颐指气使。他们像猴子或顽童一样,把玩着自己手中的宝物,但无法理解其价值。他们疯狂了——要么是因为破坏所带来的快意,要么仅仅是因为无知。^[27]

白人优越论的观点弥漫在玛格丽特的这部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畅销书中。然而,1988 年,当美国图书馆协会要求图书馆赞助人列出最优秀藏书时,《飘》的得票比此前出版的任何图书都要多。^[28]

我们从奴隶制那里继承来的一切,其精髓就在于这样一种观念:白人在上、黑人在下是恰当的,甚至是“自然”的。这一观念的核心,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非裔美国人——欧洲在世界获得主导地位,原因就在于欧洲人更加聪明。很多白人,甚至一些有色人种,都在内心深处相信这一观点。诚然,白人至上的观点不仅仅是奴隶制的残余。在美国历史上,奴隶制结束以后的社会发展一直在维护白人至上论。在我所考察的 18 部教科书中,有 9 部教科书在索引中确实列出了种族主义(或种族歧视、种族偏见,等等),但有些教科书连正文也没有提到这一术语。种族主义仅仅成为一种检索词条,以便检索那些关于奴隶制、种族隔离等问题的段落。只有一本书——《走向今天》——对这一术语做了定义。^[29]

更糟糕的是,只有 3 本教科书讨论了是什么可能导致了种族主义(或种族偏见,等等)。《美利坚盛典》向我们讲述了奴隶主们是如何“渐渐地生活在一个想象的围城之中”,然后说:“他们的恐惧滋生了一种令人陶醉的种族优越论……”这句话可以说是各种教科书中关于奴隶制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的最贴切的解释了。《美国的传统》中有句很相似但却更加模糊的话:“为了捍卫他们的‘特殊制度’,南方人越来越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样的描述无法充分地 145 向今天的学生们说明我们的社会出现种族主义的原因——它甚至都没有使用

“种族主义”这个词。《美国的冒险历程》提供了目前关于奴隶制的最长的论述：“（非裔美国人）看起来与白种人有差别。他们的肤色使得同化他们十分困难。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一直是外族人。”在这里，《美国的冒险历程》从历史学中退出来，转到一种外行的心理学。不幸的是，肤色本身不能解释种族主义。简·艾略特（Jane Elliot）在爱荷华州的课堂上做的那个著名试验已经充分证明，孩子们根据眼睛的颜色就能快速形成歧视性的行为和偏见。相反，在从厄瓜多尔到北极圈的一些美洲印第安人之中，非裔美国人常常能获得领导地位。这说明，人们不会由于肤色就自动地产生对他人的歧视。^[30]

美国从奴隶制到如今的包含各种事件和过程的历史，都展现出种族主义。然而，除了上面从《美利坚盛典》中引用的那半句话，没有一本教科书把历史与种族主义联系到一起。教科书留下了分析真空，一些粗糙的、无知的观念就很快填充进来。《美国的冒险历程》里的那三句话就说明，把其他肤色的人排除在外是很自然的事。白人学生会得出结论，或许从本质上看，所有的社会都是种族主义的，因此种族主义无可厚非；黑人学生则会得出结论，或许从本质上看，所有的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因此反对白人是名正言顺的。《美国的冒险历程》里的那三句话的这一基本思路是十分明显的。在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无论新旧，处理种族主义问题时的最为根本的思路也都是如此。在《我们美国人》中，有6页以“隔离与歧视”为题的内容，它们讲述了私刑（但没有插图）、种族隔离法律以及苛刻的种族礼节，但是对其原因却只字不提。

一些教科书不但没有分析种族主义，反而巧妙地举例为种族主义辩护。看看《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一书中的最后一页（第1083页），它居然宣扬DNA检测的价值：“因为杰弗逊没有儿子，科学家就把杰弗逊祖父那一支的男性后裔的DNA与萨莉·海明丝^①的最小的儿子厄斯通·海明丝的后裔的DNA放在一起鉴定。他们发现两种基因很匹配。由于基因匹配的几率不到百分之一，因此杰弗逊很可能就是厄斯通·海明丝的父亲。该书没有注意到，这段话前后矛盾。杰弗逊至少有一个儿子——厄斯通·海明丝。如果把“没有儿子”改成“不承认有儿子”，就更合适了。当然，这一不雅之处应该被忽略，因为杰弗逊没有白人儿子，所以就没有“真正”的儿子。

由于忽略或没能很好地处理种族主义问题，历史教科书逃避了一个批判的责任。并非所有的白人都是或曾经是种族主义者。而且，种族主义的程度也在随着时代而改变。^[31]教科书要想解释这一点，就要为学生提供视角，让他们思考过

① 萨莉·海明丝（Sally Hemings, 1773-1835），托马斯·杰斐逊的黑人女佣。有学者考证其与杰斐逊有38年的暧昧关系，并生有子女。

去是什么引起了种族主义,而今天又是什么使其依然存在,将来我们又如何使其消亡。

尽管教科书的作者不再掩饰奴隶制对非裔美国人的影响,但是他们竭力降低白人与奴隶制的牵连。事实上,他们把奴隶制描述成一个没有原因的悲剧,而不认为它是由一些人强加给另一些人的一个错误。一些教科书死抱种植园主也在种植园里劳作这一说法不放。《美利坚民族的胜利》说:“活总是干不完,一个棉花庄园主同时还要种粮食给家人和奴隶们吃。”尽管经营庞大的生意确实要花费时间,但要说谁在种植园里做了大部分的工作,下面这段引自一位密西西比种植园主的话就说得十分明白。这位种植园主哀叹自己内战后的状况时说:“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干过一整天的活,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可是,你看,我现在穿着这身粗布旧衣,但是在战前,我从没穿过粗布衣服。”^[32]

教科书中关于奴隶制的描述,在人们心中引起的只会是悲哀,而不会是愤怒,因为没有一个人让人发怒的对象。不管怎么说,我们终结的是美国400万奴隶,而不是奴隶主。这正是我们教科书的部分模式:在美国历史中,任何糟糕的事都不知道是谁干的。教科书上写出名字的人做出的都是积极的贡献,(除了约翰·布朗之外,我们在下一章会讨论他。)或者正如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1979年在做教科书分析时所说的,“在所有的历史书中,我们看不见一个例子,说明某个人曾为别人制造麻烦。”^[33]

当然,国父们从来没有制造过麻烦。历史学家戴维·洛温塔尔指出:“关于华盛顿和杰斐逊,当代流行的描述与他们作为18世纪奴隶主和种植园主的生活不太一样。”^[34]教科书在淡化国父们生活中的奴隶制方面功不可没。就像对伍德罗·威尔逊、海伦·凯勒以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样,作者们不愿揭露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任何瑕疵。2003年,伊利诺斯州的一名老师告诉自己六年级的学生,林肯之前的大部分总统都是奴隶主。她的学生被激怒了——不是因为总统,而是因为这位老师,学生们认为她在向他们说谎。学生们抗议道:“那不是真的,否则书中会写到的!”他们说自己的教科书中大量关于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杰克逊及其他早期总统的介绍,但介绍中却从未提到他们曾经拥有奴隶。当然,这名老师是没错的。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我将介绍她对学生的创造性应答。

在现实生活中,国父们及其夫人们与奴隶制纠缠不清。帕特里克·亨利因“不自由,毋宁死”的演讲而被教科书封为圣徒。没有人会向我们讲述,帕特里克·亨利在发表演讲的八个月之后,曾命令“加强巡逻”以阻止弗吉尼亚州的奴隶接受英国提供的自由而站到英国一边。亨利也为这种矛盾苦恼,他大叫:“有谁会相信我是自己购买奴隶?我是奴隶主吗?”^[35]今天,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因为在我所考

察的所有教科书中,只有两本教科书——《希望之地》与《美国的冒险历程》——提到了这一矛盾。^[36]亨利虽然意识到自己言行之间的矛盾,但对于自己的奴隶的那些不幸,他从未采取什么行动。在整个革命时期,他的奴隶数量有增无减,并且与弗吉尼亚的一些种植园主不同,亨利在临终时也没有释放任何奴隶。然而,《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一书引用了亨利关于奴隶制的论述:“(奴隶制)背离人性,正如其背离《圣经》,是对自由的破坏。”但是,该书却没提到亨利拥有奴隶。《美国的经历》一书用三整页的篇幅介绍亨利,虚构了一个情节——他父亲曾经担心:“他怎样才能谋生呢?”然后,又向我们讲述他如何开店失败,他“试图以种植烟草谋生”,“开始经营另一家商店”,“要养活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他“知道自己必须自谋出路了”,“因此他决定当一名律师”。读过这一章的学生,如果后来知道亨利是从大量的奴隶劳动中聚集起财富时,有权利感到上当了。在这个问题上,新版教科书也没有哪一本做得更好。

国父托马斯·杰斐逊的情况更令人尴尬。杰斐逊指出,人人都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他在写这些话时,却拥有 175 名奴隶。对于这一矛盾,美国历史教科书用各种办法予以调和。杰斐逊拥有奴隶,这几乎影响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从他国内改革的反对到他的外交政策。^[37]尽管如此,在我一开始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中,有一半都没有提到杰斐逊拥有奴隶。《生活与自由》一书提供了半页篇幅的杰斐逊小传,说他“害羞”、“口吃”,但“对自己的工作总是很卖力”。该书还在其他地方提到他的彬彬有礼的生活细节,例如,他拒绝戴假发,他在就职游行中走路而不是骑马,但就是不提杰斐逊与奴隶制有染。

所有新教科书都提到杰斐逊拥有奴隶,但这就是他们提到的全部内容,并且它们总是被放在从句里。以下是《美国人》的整个叙述:“尽管带有精英背景和奴隶主身份,杰斐逊仍是小农场主与普通市民的得力盟友。”《美利坚之旅》同样简单地指出:“在《独立宣言》中,他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他是一个奴隶主。”《走向今天》对于杰斐逊与这种制度的牵连,只写了六个字。而这六个字又是写在四段对他颂扬的文字之后,包括赞扬他反对奴隶制:“在他一生中,杰斐逊倾向于白人之间的平等,且反对奴隶制。这是勇敢而进步的思想。今天,杰斐逊对历史学家仍是一个难解之谜:这位写作了关于人类自由的某些最有影响力的文字的作者,竟是个奴隶主。”实际上,到 1820 年,杰斐逊积极鼓吹向西部边疆推行奴隶制。杰斐逊从来不让自己关于奴隶制的矛盾情感影响个人生活。杰斐逊与一般的奴隶主一样,也会鞭打他的奴隶,也会把奴隶卖到“大南方”,然后买进一个更听话的奴隶。到 1822 年,杰斐逊拥有 267 名奴隶。终其一生,他先后有几百名各种奴隶,他死前只释放过三到五名——这几个奴隶全都与他有血缘关系。^[38]

为淡化杰斐逊的奴隶主身份，教科书采用的另外一个策略是，承认这一事实，但强调别人也好不到哪去：《希望之地》指出：“杰斐逊自身说明，他只是那个时代的一员。”那么，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当然，在18世纪70年代，大部分美国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然而，由于解放战争及由杰斐逊等人大力传播的人权意识的扩散缘故，种族关系开始有所变化。根据《美利坚民族的胜利》，5000名黑人士兵与白人在大陆军中并肩作战，且“有勇有谋”。当然，事实上，一些黑人士兵像白人士兵一样在战斗中“有勇有谋”，也有一些黑人士兵与白人新兵一样，打不好枪，甚至开了小差。^[39]但是，由于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同一支部队里作战并且得到同样的军饷，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有利于削弱白人的种族偏见。^[40]

此外，在我们的历史上，在某些时刻，思想的力量会引起现实的改变。美国革命就是这种时刻之一。当时有位上尉曾说：“在争取与生俱来的自由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懂得同情被奴役的人。”^[41]阿比盖尔·亚当斯^①1774年写信给丈夫问道：“我们整天劫掠那些与我们一样有着自由权的人，那么我们又如何为这种权利而战呢？”^[42]帕特里克·亨利的一些言论也常常与他自己的奴隶主身份不协调，这使他感到尴尬，对此他有个蹩脚^②的理由——“在这里，我没有他们，生活多有不便。”他也承认，“我不会，也不能证明这是对的。”^[43]种植园主们其实可以不这么做。一 149
一些人，包括乔治·华盛顿，要比亨利或杰斐逊更重视言行一致，他们干脆就把奴隶释放了，或者根据奴隶自己的意愿释放他们。还有一些奴隶主释放男性奴隶，让他们参加殖民地军队，还为每个人伍者募集了一笔赏金钱。在革命之后的头20年，弗吉尼亚的自由黑人的数量成十倍地增长，从1780年的2000人猛增到1800年的20000人。大多数北方州都取消了奴隶制。因此，在奴隶制问题上，杰斐逊的行动落后于同时代的其他白人。^[44]

然而，奴隶解放事业渐渐偃旗息鼓，因为像杰斐逊这样保有奴隶的大多数南方白人致富了。他们的邻居看好他们，就像人们常常看好比自己富的人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变成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革命的后退，这种意识形态越来越支持奴隶制。杰斐逊把自己通过奴隶得到的财富用于建造他位于蒙蒂塞洛的私邸以及收藏图书，后来又把那些图书捐赠给了弗吉尼亚大学。这些支出成为他那笔被神圣化了的遗产的一个部分，为历史学增添了又一个缅怀他的理由。^[45]

然而，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1829年，也就是杰斐逊去世后三年，一位名叫戴维·沃克的波士顿黑人警告同族人，要他们记住杰斐逊是自己的最大敌人：“杰

① 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夫人。

② 帕特里克·亨利是个瘸子，作者此语带讥讽之意。

斐逊先生关于我们的那些评论已经深深浸透到数百万白人心中，永远不会被消除。”^[46]此后的一百年间，民主党公开宣扬白人优越论，这是杰斐逊为我们这个国家留下的政治遗产，而这正应验了沃克当年的警告是正确的。

教科书并不孤单。杰斐逊纪念堂也在美化这一主题。在杰斐逊纪念堂的大理石墙上，第三块宣传栏将杰斐逊一生不同时期的部分言论拼凑到一起，其结果给人产生的印象是，杰斐逊几乎是一个废奴主义者。在原来的语境中，这些引文表达的是杰斐逊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矛盾——有时是严厉的批评，但更多时候是辩解。或许，要求大理石讲出真相勉为其难。但是，难道教科书也是这样的神龛吗？教科书是应该鼓励学生去崇拜杰斐逊，还是应该帮助学生去理解他，解开他的困惑，既了解他的成就，也认识他的不足？

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火花，尽管曾让帕特里克·亨利说出那些无奈的话，但一开始的确使美国成为世界上一个追求民主的国家。然而，奴隶制及其伴随的思想观念，使等级与支配成为正当的现象，损害了革命的理想。大多数教科书从来不提这种思想上的冲突，更不用说论述它对我们外交政策的影响。

革命之后，许多美国人期望自己的榜样能够激励其他民族，而这一点的确实现了。在18世纪90年代，当海地反抗法国时，我们年轻的国家得到了第一次帮助他人的机会。总统是否拥有奴隶似乎已经决定了他对这个西半球里第二个独立国家的政策。乔治·华盛顿拥有奴隶，因此他的政府贷款大量美元给海地的法国种植园主，以帮助他们镇压奴隶。约翰·亚当斯却没有这么做，他的政府给海地人大量的帮助。杰斐逊任职总统标志着他从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的一个大倒退。像其他奴隶主一样，杰斐逊宁愿要一个拿破仑一世的殖民地，也不愿意要一个加勒比海的黑人共和国。1801年，他改变了美国对海地的政策，并且私下里纵容法国重新征服这座岛屿。美国这样做，不仅背叛了自己的传统，也有悖于自己的利益。因为如果法国真的重新占领了海地，那么拿破仑就有可能继续美洲帝国的梦想。这样一来，美国在西面会被法国包围，北面被英国包围，南面被西班牙包围。^[47]但是，美国的种植园主害怕海地的革命。他们认为这场革命可能会激起美国的奴隶反抗（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尽管我们的态度来了个大逆转，海地革命依然取得了胜利。这时，美国并没有从外交上承认海地，以免——用一位佐治亚州的参议员的话说——海地大使会“通过现身说法展现一个造反成功的实例”点燃我们的奴隶的反叛热情。^[48]在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有9本提到了海地的抵抗导致法国将其对路易斯安那的声称拥有权出卖给我们，但是，没有教科书提到我们在政策上的大逆转。

种族奴役还影响到我们对于接下来造反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政策。海地

的榜样激励了那些地区寻求独立,海地政府还向西蒙·玻利瓦尔提供直接援助。我们的政治家们摇摆不定,既想帮着把欧洲列强赶出西半球,又对那些种族混杂的造反者深怀疑虑。一些种植园主,希望我国政府取代西班牙的殖民势力,尤其是在古巴。杰斐逊曾提议吞并古巴。50年之后,富兰克林·皮尔斯政府的外交家们签署了《奥斯坦德宣言》,提议美国购买或夺取西班牙占有的岛屿。奴隶主们依然担忧海地的榜样作用,希望能够阻止古巴成为第二个海地,用《奥斯坦德宣言》的话说,担心“火焰会蔓延到与我们比邻的海岸。”^[49]简言之,奴隶制促使美国按照帝国主义而不是民主自由的模式设计拉丁美洲的未来。 151

奴隶制还以其他方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政策。一个奴隶制社会的首要条件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边界。我们不想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像东德那样的警察国家,在那里,人们不得不逃亡,但是,那些蓄奴州却正是如此。事实上,1850年《逃亡奴隶法案》使白人很容易绑架自由黑人并将其贩卖为奴,法案一经颁布,数以千计的自由的非裔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即便在北方各州也不会得到保证,于是逃到了加拿大、墨西哥和海地。^[50]1857年的“德雷德·司各脱案”^①判决“黑人不享有白人必须尊重的权利”,这证明了黑人担忧是有道理的。内战之前,我们的外交政策一直为奴隶主们所左右。他们一直关注我们的印第安人边界,竭力通过与土族人签订各种协议促使印第安人交出所有的非裔美国人,并且遣返任何逃犯。^[51]

1787到1855年间的美国领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奴隶主们的影响。在1812年战争的幕后,最大的推手是奴隶主们。他们觊觎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土地,还想把印第安人驱赶到远离蓄奴州的地方,以防奴隶逃跑。尽管西班牙在那场战争中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但是战争之后,我们还是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了佛罗里达,因为奴隶主们要求我们这么做。事实上,安德鲁·杰克逊在1816年袭击了西米诺尔人位于佛罗里达的一个要塞,就是因为该地藏匿了数百名逃亡奴隶,这次军事行动引发了“第一次西米诺尔战争”。^[52]

在欧洲人和非洲人到来之前,西米诺尔并不是一个部落或民族。它只是一个“三族飞地”,由克里克印第安人、小部落的残余、逃亡奴隶以及一些愿意生活在印第安社会的白人组成。“西米诺尔”一词本身就是西班牙语 *cimarron* (在牙买加语中变为 *maroons*) 的变形,后来才指逃亡奴隶。^[53]西米诺尔人拒绝交出他们当中的非裔美国人,这导致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西米诺尔战争(1816-1818,1835-1842)。白人的打击行动不是为了夺取“大沼泽”——这块地在19世纪对美国毫

① 德雷德·司各脱是一名奴隶,后从密苏里州主人家里逃脱。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对此案的判决使奴隶制在所有准州合法化。

无经济价值,而是要铲除逃亡奴隶的避难所。第二次西米诺尔战争是美国对印第安人发动的历时最长、耗费最大的一场战争。^[54]大学教科书《美利坚:过去与现在》讲述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场战争,并且把战争放在了奴隶反叛的语境之中:

在 1835 至 1842 年间的佛罗里达,发生了奴隶们以武力争取自由的最顽强、也最成功的斗争。当时,数百名黑人逃亡者在第二次西米诺尔战争中与为自己提供了避难所的印第安人并肩战斗。西米诺尔人拒不向俄克拉荷马迁移,而对于一起战斗的黑人来说,战斗是为了自己的自由。战争结束后,签订了和约,大多数黑人宁愿陪伴着他们的印第安盟友向西比河以西迁移。

152

在六本新教科书中,有五本都提到了这场战争,但只有《走向今天》隐约提到奴隶逃亡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

奴隶制或许还是德克萨斯战争(1835-1836)的关键原因。戴维·克罗基特^①与詹姆斯·包威等人在阿拉莫之战中所捍卫的自由,是拥有奴隶的自由。盎格鲁人刚刚建立德克萨斯共和国不久,其立法机关就命令所有的自由黑人离开共和国。^[55]接下来的一场大的战争——墨西哥战争(1846-1848),也主要是由南方的种植园主发起的,他们想让自由土地的边界更加远离蓄奴州。

或许,关于奴隶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清晰的标志是内战。在 1861 至 1865 年间,我们有两种外交政策:联邦的和联盟的。联邦承认海地,并且与革命后的墨西哥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多一致之处;而南部联盟则扬言要入侵墨西哥并且欢迎路易·波拿巴把墨西哥变为法国的殖民地,因为那样就会把作为自由旗手和逃亡奴隶避难所的墨西哥消除掉。^[56]南部联盟如果赢得了内战,他们的外交官还会把目光投向古巴。

在我们国家成立的最初 70 年间,奴隶制使我们的外交政策更支持帝国主义而不支持民族自决。如果教科书不愿意向我们讲述诸如种族主义这种会使白人看上去很坏的观念,那么它们就无法描述奴隶制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即便在教科书的作者们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回到国内政策上时,关于种族主义的介绍同样是看不到的。因此,尽管教科书对斯蒂芬·A. 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这位 19 世纪中叶民主党最重要的领袖倍加关注,但它们却没有提及他的种族主义。应该记住,道格拉斯曾破坏后来国会在 1854 年通过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道格拉斯是来自伊利诺斯州的国会参议院,曾角逐总统职位,对于奴隶

① 戴维·克罗基特(Davy Crockett, 1786-1836),美国政治家。

制，他本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的主要想法是让合众国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此前一直是印第安人的土地——组织地方政府，因为在他的身上，维系着一种利益，那就是在这些区域经营铁路。^[57]他需要南方人的选票。在19世纪40 153年代和50年代的大多时候，南方种植园主控制着最高法院、总统职位以及国会中的至少一个议院。奴隶主们借助自己的权势，同时出于担心自己在白人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变小，开始同意，只要道格拉斯在法案中写进新边疆对奴隶制开放的条款，他们就支持开辟新边疆。道格拉斯有条件地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在法案中加进了他所谓的“主权在民”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堪萨斯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蓄奴区，尽管它位于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所规定的奴隶制地区与自由地区的分界线以北。因此，据此情形，内布拉斯加也可以选择蓄奴。其结果，就是堪萨斯州内战的爆发。

教科书尽管并没有把斯蒂芬·道格拉斯看成是一位和哥伦布或威尔逊一样的大英雄，但也以赞赏的语调描述他。1858年，道格拉斯再次竞选总统，其竞争对手是林肯。这次大选预示了此后30年里两党各自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58]因此，教科书对这次辩论投下大量篇幅：平均有7个自然段和2幅图片。^[59]一开始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的作者们花这么多的篇幅，仿佛他们是在为《GQ》杂志^①写作。《美国历史》就那场辩论写了16个自然段，以下是其中的两段：

即使不戴他的大“烟囱帽”，身高6英尺6英寸（作者加了2英寸）的林肯在“小巨人”面前也像是一座高塔。他身着正式的、但常常皱巴巴并且袖子与裤腿有点短的礼服。而道格拉斯属于我们可能会说的那种衣着讲究的人。他身穿带皱褶的衬衫、带花边的背心，头戴宽边毡帽。相比林肯缓慢、慎重的说话风格，道格拉斯说话很快……

林肯的声调很高，而道格拉斯声调低沉。两人都一定肺活量很大，否则他们的声音很难穿过街道或者在嘈杂的人群中被听到。他们在公共场合都不需要借助演讲设备。

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到，道格拉斯穿着讲究，讲话铿锵有力——但是，他的思想怎么样呢？他都说了些什么呢？我一开始所考察的12本教课书都只断章取义地摘取了道格拉斯本人所说的三句话。以下是它们摘录的全部文字：“……永远分成自由州和蓄奴州，父辈们就是如此”，“……视黑人为兄弟”，“……一天或一个小时”。12本书仅有这几个字！有九本教科书称赞这位“小巨人”为他“铿锵

① “GQ”，“Gentlemen’s Quarterly”，《绅士季刊》，一份著名的男性杂志。

有力的演讲”或者是“雄辩的口才”，但它们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

在六本新教科书中，有两本教科书至少提供了道格拉斯这样一句较长一些的演讲：“要不是受到地方治安法规的支持，奴隶制在任何地方都连一天或一个小时也存在不下去。”——这就是道格拉斯所谓的“自由港”理论。《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的摘录更长。《走向今天》虽然没有摘录一个字，但它总结说：“在奴隶制等问题上，道格拉斯支持主权在民。”因此，这四本新教科书确实讲到了这场辩论与奴隶制问题有关。但这些教科书尚需完善。道格拉斯的立场并不暧昧。那些辩论主要是关于种族问题，以及非裔美国人将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安格尔^①把其纪念那些辩论 100 周年的作品起名为《生而平等？》的原因。^[60]1858 年夏，道格拉斯在各地反复阐述自己的立场，其中 7 月 9 日在芝加哥发表的以下演讲，阐述得最为清晰：

在我看来，我们的这个政府本来就是以白人为基础建立的。它由白人建立，服务于白人的利益，由白人管理……

我反对采取任何行动将黑人或印第安人视为与白人平等的人。我反对赋予他们在政府管理中的发言权。我愿意扩大黑人、印第安人，以及所有不独立的种族的权利，使其享有与白人种族的安全与幸福不冲突的任何权利、特权及豁免权；但是他们从来不应该享有平等，不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别的任何方面。

朋友们，你们看，这些问题已讲得非常明白了。^[61]

然而，教科书的读者看不出这些问题已讲得非常明白了，因为，即便是最新的教科书也没有透露任何有关道格拉斯的种族主义的线索。在所有 18 本教科书中，只有《美国历史》这一本书收录了道格拉斯关于种族问题的这段话：“‘小巨人’嘲笑说，林肯‘视黑人为兄弟’。”在 18 本教科书中，仅有一本书，而且是已经绝版的一本书中，才有这六个字，从中我们几乎不能公正评判道格拉斯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

教科书为什么要筛选关于道格拉斯的内容呢？既然他们可以花几个自然段描述他的衣着，那说明版面不是问题。的确，教科书作者们很少引述他人的话；但更主要的是，教科书在这里再次使用了英雄化的描写手法。道格拉斯关于种族主义所说的那些话，会使我们把他想得很坏。那么，就不提它好了。

与道格拉斯相比，林肯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但在伊利诺斯州南

① 保罗·安格尔(Paul Angle)，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华人作家聂华苓的丈夫。

部,当与道格拉斯辩论时,他也表达过白人优越论的观点。在查尔斯顿的那场辩论中,林肯说:“我一直都没有赞同、也从未赞同让白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社会和政治平等。(鼓掌)我一直都不支持、也从未支持让黑人成为选民或者陪审团成员。”大部分教科书的作者不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林肯。这样一来,它们使学生没办法把种族主义视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一支力量。因为,如果林肯是种族主义者,那么我们其余所有的人也都是种族主义者;如果林肯能够超越种族主义,正如他偶尔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其余所有的人也能超越。

在内战中,北方的民主党人反对共和党人指责自己袒护反叛,声言自己是“白人的政党”。他们抗议政府在哥伦比亚特区解放奴隶,反对政府在外交上承认海地。他们宣称共和党人“脑子里除了有黑鬼之外一无所有”。当联邦军队接受非裔美国人入伍时,他们被激怒了。他们把种族问题作为自己重要的竞选纲领。

在没有电视的那些日子里,各政党举行同步集会。在大选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民主党参议员们到每一个大城市向群众发表演讲,其地方组织的官员也在小城市擂鼓助威。所有的集会都有标志性音乐。这时,成千上万的歌本会被印刷,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该党成员都唱着同一些歌曲。1864年有一首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以“杨基调”^①的调式这样唱道:

新国家颂

“黑鬼杜多逞能一时”

杨基杜多隐姓埋名,
风光不再;
黑鬼杜多来临,
胡乱倒腾。
(合唱)黑鬼杜多逞能一时。

乌檀稍长即拧,
“效忠”的人全对
黑鬼杜多俯身听命;
白种人孤掌难鸣。
这里缺少有钱的“大——兵”,

^① “杨基”(Yankee)意为“美国佬”,“杨基调”是美国一种广为流传的曲调,有各种不同的填词。本文杨基歌里的“杜多”(Doodle)是美国民间传说的常用人名,常指衣着花哨、举止轻浮之辈。

请给我们黑沥青，
 请给我们“老贝宁”。
 (合唱)黑鬼杜多逞能一时。

厚嘴唇糟蹋了甜心，
 卷毛们头上亮晶晶；
 哦，这里的软脚汉
 居然也插足兵营。
 (合唱)黑鬼杜多逞能一时。

我曾经让几百名大学生和几十名中学历史教师了解这类歌曲。为了让他们注意其中的歌词，我通常给他们领唱。通常情况下，即便他们全是白人，他们也拒绝唱这支歌。他们为所读到的歌词感到震惊。在他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一点也没提到国家政治的这类情形。

当联邦取得胜利的时候，民主党沦为少数派；这部分原因是，民主党的很多成员及领袖并不认同这次战争。共和党人控制着重建。与奴隶制问题一样，战后重建这个主题在民权运动之后的教科书里有所改进。一些较早的论述——有的甚至写在重建结束之前——都说共和党州政府虽然在努力实行公平施政，但却面临着大量的问题，特别是前联盟种族主义者的暴力抵抗。然而，写于大约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之间的教科书，却勾画出了一幅战后时期共和党人压迫统治的画卷，我们可以称这幅画卷为“联盟虚构的重建”。很多年来，黑人家庭一直鲜活地保存着重建的真相。WPA^①作家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记录的那些年老的奴隶们的故事，仍然透露着对黑人在重建中的作用的自豪感。一些故事里甚至还有 60 年前被选进政府任职的非裔美国人的名字。一位 88 岁的当年的奴隶说：“我知道，一般人会认为教科书会讲真话，但是事情并非如此。”^[62]然而，随着那些亲身经历过重建的人死去，即便是在黑人社区，这些故事也被教科书的描写取代了。

关于“联盟虚构的重建”，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发生在 1970 年 1 月的一个下午，那天，我与密西西比州陶格鲁学院这所以黑人为主的学校的 17 名大一学生讨论。我打算讲一单元关于战后重建的课，因此我要先了解学生们知道些什么。我问道：“什么是战后重建？”“提起那个时代，你脑子里会出现什么场景？”同学们

① WPA,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公共事业振兴署), 是美国 19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临时性政府机构, 发起了包括“联邦作家计划”在内的一系列加快社会发展的计划。

一致认为:战后重建是非裔美国人接管对南方各州,包括密西西比州的统治。但是,由于脱离奴隶身份不久,他们乱搞一气,并且统治腐败,最后白人不得不重新控制了各州政府。 157

我深感震惊地坐了下来。学生们的这一说法中有太多的重大误解,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反驳。非裔美国人从来没有接管过南方各州。在整个重建时期,所有的州长都是白人,而且,在几乎所有的立法机构中,白人占了多数。非裔美国人并没有“乱搞一气”,而且,实际上,相比随后的几十年,密西西比州重建时期的政府较少腐败。“白人”并没有重新接管南方各州政府,但是,某些白人民主党人使用武力和欺诈手段从白人与黑人结盟的共和党手中夺取了控制权。

年轻的非裔美国人居然相信那些诬蔑自己先人的神话,真可谓悲剧。这使得他们怀疑自己的能力,因为他们的种族一登上美国历史的中心舞台就“乱搞一气”。这也使他们得出结论:白人处于控制地位总是正当的。但是,我的学生们知道的只是教科书教给他们的那些内容。就像几乎所有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学毕业的美国人一样,他们在自己美国历史课上遇到了“联盟虚构的重建”。我也从我的大学历史教科书上看到过这一“虚构”。约翰·F.肯尼迪及其枪手们写作的《勇者无惧》——该书获得了普利策奖——在描述L. Q. C. 拉马尔^①时也重述了这个“虚构”。

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较,今天的教科书在战后重建问题上已有很大的改进。在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除4本外,其他的对战后重建的描述都与小说《飘》中的场景不同。^[6]历史学界不再说联邦军队控制了南方社会达十年或更久。它们现在指出,到1868年,除了在三个州之外,军事统治已经结束。他们也不再说允许男性非裔美国人参加选举会掀起抢夺与腐败的狂潮。1961年版的《美利坚民族的胜利》曾谴责共和党在南方的统治:“政府中的许多‘掮包客’都是无能的、无用的、腐败的。”而该书的1986年版就截然不同地解释道:“重建时期的一些南方立法机关在公共事务方面开始有了很多必要的、期待已久的改善……它们加强了大众教育……更加公平地安排税收负担……并且在当地的政府和司法部门实施了期待已久的改革。”在那些最新的教课书中,只有布尔斯廷与凯利的教科书把国会主持的重建称作“把这些州变成被征服的行省的报复性行为”。

像在奴隶制问题上一样,大多数教科书在重建问题上的新观念代表了一种突变,它虽然姗姗来迟,但更符合有关这一时期的第一手材料,也较少受到白人优越论的支配。自1995年初版《老师的谎言》问世以来,这一改进一直在继续。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的教科书仍然茫然无知地采用白人优越论的观

① L. Q. C. Lamar (1825-1893),美国内战时期南部“联盟”的政府官员及民主党主要人物。

点。按它们的那些说法，“有问题的”是非裔美国人，而不是白人；并且它们推断，重建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非裔美国人在经济和政治上融入制度。《美国之路》说：“奴隶制结束了，但是南方被摧毁了，黑人不得被带进劳工社会。”其实，黑人一直在劳动。真不知道该书作者怎么想奴隶在奴役状态下都做着些什么的！^[64]同样，根据《美利坚民族的胜利》，重建“旨在解决如何使黑人融入国家生活的主流这一问题。”该书是一个有益的例子，它虚构了一群懒惰的、无助的黑人群体：“当白人种植园主放弃了南卡罗莱纳海岸岛屿上的种植园时，那儿的黑人们就处于无助的、贫困的状态。”事实上，这些黑人们参加了联邦军队，自己经营种植园，并且打到内陆，解放那里的种植园里的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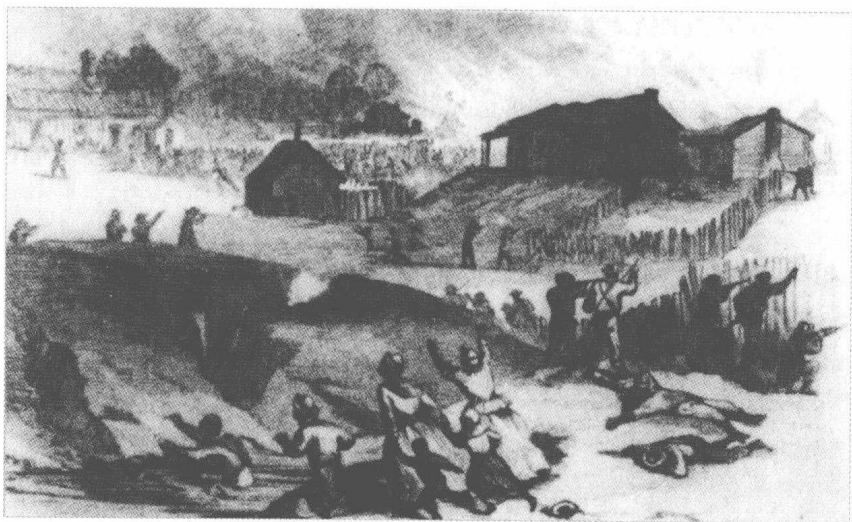


图1 孟菲斯骚乱

这幅图反映了在1866年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骚乱中，一群武装白人袭击了附近的黑人居住区。它说明了重建期间或之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在这场骚乱中，40名非裔美国人丧生，白人烧毁了这座城市里黑人的每一所学校和教堂。

今天的教科书描述了非裔美国人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但是作者依然低调处理重建时期的关键问题——白人暴力问题。这方面的数据是令人震惊的：内战的胜利一方只处死了一名联盟派官员，即臭名昭著的安德森维尔监狱长官亨利·沃兹；而失败一方却屠杀了数百名官员及其他联邦主义者，其中有白人也有黑人。^[65]仅在密西西比州海恩兹县，在联盟重建期间，即1865至1867年，联盟派控制大多数南方州政府期间，白人平均每天杀死一个非裔美国人，后者有很多人曾在军队服役。在路易斯安那，1868年夏秋两季，白人民主党人杀死了1081人，其中大多数是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共和党人。^[66]在北卡罗莱纳的一个司法辖区，一位共和党法官统计出700宗殴打案和12桩谋杀案。^[67]而且，暴力活动还只是白人

阻止黑人进步的一种最直观的形式罢了。

破坏教育是白人优越论者的一个重要手段。当时的“自由人事务署”的领导 O. O. 霍华德将军说：“反对黑人受教育的做法俯拾皆是，他们不向自由人提供可用于办学的房舍或建筑。在 1865 年、1866 年和 1867 年，处于社会底层的暴民不时地在南方各地烧毁被用作学校的建筑物或是教堂，鞭打或驱逐老师，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杀死他们。”^[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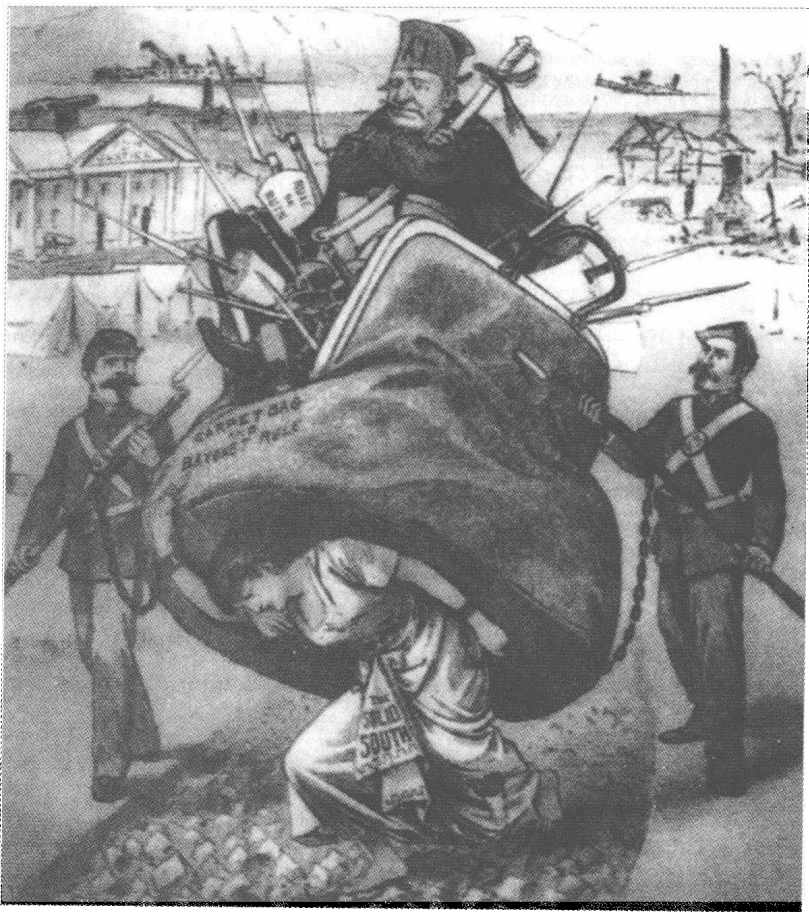


图 2 《牢固的南方》

虽然教科书在叙述上有所进步，但有些图片却没有。我所考察的 18 本教科书中，有七本收录了这幅漫画，它名为《牢固的南方》(The Solid South)，画的是一位文弱的白人妇女。她背负着格兰特和一个塞满各种武器装备的捆包，由穿蓝色制服的占领军士兵扶持着。有两本新教科书让学生解读这幅画。新版的《美利坚盛典》直接说到“格兰特政府的捆包和刺刀”，让人觉得确有此事。另外四本教科书只用这幅漫画去描绘重建，《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为之取的标题为“南方的沉重负担”。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写进了至少一段关于重建时期白人暴力的文字。大部分教科书介绍了暴力活动与美国推行民权法律的失败同时出现时，如何在终结南方的共和党州政府并由此结束重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总体看来，教科书对重建的介绍依然不得要领：重建的关键问题是要把联盟而不是非裔美国人整合到新的秩序之中。一旦联邦政府不再介入白人种族主义问题，重建就结束了。一些教科书发现，说一些真正关于白人的坏话很难，因此，在为什么重建会失败这一问题上，它们依然含糊其辞。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美国历史教科书依然把重建的结束描述成非裔美国人的失败。1990 年版的《美利坚民族的胜利》解释道：“其他一些北方人对南方黑人问题变得厌烦起来，不太愿意帮助他们学习作为公民的新角色。”《美国的冒险历程》也附和道：“数百万以前的奴隶不可能在 10 年之内转变为有教养的选举人或成功的政治家、农场主或商人。”其实，黑人选民比大多数白人选民在选举中更加明智。在重建时期投票给共和党是他们的明显的利益所在，而且大部分非裔美国人都这么做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愿意把票投给那些曾竭力讨好自己的白人民主党。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南方白人盲目地把选票投给了白人民主党，仅仅因为后者赞成白人优越论。

由于我也“学到过”非裔美国人是重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说法，因此，¹⁶¹ 阅读冈纳·缪达尔^①的《美国的困境》一书，于我来说就是一次扩大视野的经历。缪达尔在介绍他的 1944 年版该书时，描述了自己在进行这项研究时，被逼着改变自己的观点的情况：

当前的研究者在开始他的研究时，首先会想到，必须把焦点放在黑人问题上……但是，一旦他进入对黑人问题的研究，他就会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单纯用黑人本身的独特性去解释一些问题，即便提出来，也是很难成功的……黑人问题首先是一个白人……的问题。^[69]

这恰恰就是很多非白人依然缺乏的认识。对重建的失败的认识与我们的文化背道而驰。一位大学生曾对我说：“你决不会相信我在中学阶段所囫囵吞枣地学到的那些关于重建的知识——比如，重建并非太糟糕，它建立起了学校体制。后来我看了《飘》，了解了重建的真相！”对问题的设计决定了对修辞与手法的选择。缪达尔主张关注白人，这一见解对于理解重建是十分重要的。教科书至今没

^① 冈纳·缪达尔(Karl Gunnar Myrdal, 1898-1987), 瑞典经济学家, 新制度学派重要人物, 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能用一种同样有力的分析来批驳诸如《飘》所描绘的“联盟虚构的重建”。

关注白人种族主义对于理解雷福德·洛根(Rayford Logan)所说的“美国种族关系的最低谷”时期更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种族关系的最低谷”是指1890到1940年间,那时,非裔美国人被重新归为二等公民。^[70]在这一时期,北方与南方的白人联手限制黑人的公民权和经济权。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国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术语。在我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中,没有一本使用过它;相反,他们把这一时期分割成不同的时代,其中大部分都是不正确和不合逻辑的,比如“快乐的90年代”以及“怒吼的20年代”。就拿“快乐的90年代”来说,那时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第二次严重的大萧条,同时还发生了普尔曼铁路大罢工和霍姆斯特德大罢工等劳工纠纷。由此“快乐的90年代”在逻辑上引出一个问题:“谁在快乐?”

尽管没有教科书使用“美国种族关系的最低谷”这一术语,但它们大部分确实描述了一些低谷时期的细枝末节,只不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罢了。最好的概述出现在《美国历史》一书中。该书在某一节中以“长夜开始”为题,这样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历史:“在‘1877年妥协’之后,北方的白人公民背弃了南方的黑人公民。渐渐地,南方各州撕毁了它们关于平等对待黑人的许诺。它们一步步地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把他们归为二等公民。”《美国历史》接着明确地指出了南方白人维护白人优势的那些伎俩——限制选举、在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绝、滥用私刑等。 162

另一方面,《美利坚民族的胜利》泛总结说:“重建使很多重大问题悬而未决,同时又引发了一些新的、同样很紧急的问题。尽管南方和北方的各种力量都极力在双方之间进行协调,但这种情况仍然是真实存在的。”这段话太含混了,实际上什么也没讲。弗朗西斯·费茨杰拉德沿用这段话的较早的一种说法,去抨击她所称的美国历史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她冷冷地说:“这些‘问题’似乎是突然出现在各个地方的。这些教科书中的历史总是问题成堆。”^[71]在《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中,在上述这段话的500页之后,当作者谈到民权运动时,种族关系再次成为“问题”。作者没能把美国1877年在保障黑人民权方面的失败,与一个世纪以后的民权运动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事情会事出有因,事情只是在发生。

事实上,在战后重建时期以及低谷时期,进行着一场拯救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战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拯救整个国家灵魂的战斗。这与二战后的德国重建颇为相似。德国的重建也是一场为德意志人民的灵魂而战的斗争,在那场斗争中,纳粹主义最终失败(我们希望如此)。但是在美国,正如《美国历史》所讲的,种族主义获胜了。在1890至1907年间,每一个南方州和边疆州“合法地”剥夺了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的选举权,私刑更是猖獗一时。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莱西

诉弗格森案”中赞成种族隔离。

不幸的是,教科书大多误解了种族隔离。因此,他们误读了“布朗案”——1954年,最高法院在这一案件中判定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美利坚之旅》说:“然而,问题在于,设施是隔离的,但绝不是平等的。”《美国人》也说:“供白人使用的设备都无一例外要比供非白人使用的设备高级。”的确,“隔离”很少意味着“平等”,但这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所称:“本案所涉的黑人学校与白人学校在诸如教学楼、课程设置、教学质量、教师收入等方面,以及其他‘实体’因素上,一直是平等的,或者说正在被平等化。因此,本案的判决不能停留在关于这些实体因素的比较上。”

只有布尔斯廷与凯利对“布朗案”的评价是正确的:“当然,问题在于,对于两个种族来说,从来不可能真正存在‘隔离但平等’的设施。当一个民族被与其他民族隔离时,它的平等就被剥夺了——平等意味着同等对待所有公民。”教科书需要对种族隔离下一个社会学定义:种族隔离是一种种族礼仪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当被压迫人群与压迫人群在做某些同样的事情,如,在背诵九九乘法表时,会被隔离开来;但当工作有高低之分,如为白人雇主烹饪或打扫卫生时,却允许存在某种心照不宣的接触。因此,种族隔离的理论基础在于,被压迫者是一群贱民。“不洁净”一度是任何供有色人种使用的水源、候车室以及法庭用《圣经》的代名词,而“低贱”就是任何一所排斥黑人(常常还有墨西哥人、土著美洲人以及“东方人”)的学校的籍口。这种意识形态脱胎于奴隶制时期,在重建之后依然健在,并被用以证明将非裔美国人强行归为二等公民这一做法的合理性。这一污点说明了为什么隔离不可能意味着平等,即便黑人的设施比白人的更新或者更高级。今天,这一污点中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并伤害着一些非裔美国人的自我想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移民到美国的加勒比黑人要比美国黑人更出色。^[72]

在低谷时期,种族隔离制度四处扩散。杰基·罗宾逊^①并不是主要的棒球联合会中的第一个黑人运动员。在19世纪,黑人已经在大的联赛中打球,但是到1889年,白人把他们驱逐出了联赛。在1911年的肯塔基赛马大会上,黑人骑手赢得了首轮28场公开赛的15场比赛。此后,黑人骑手就被排挤出了该项赛事。^[73]特别是在南方,白人袭击最富有而且最成功的非裔美国人,正如他们过去对待那些最接受白人文化的印第安人一样。因此,社会地位的上升不仅没有为黑人提供前途,反而使他们更加成为白人攻击的目标。在北方与南方一样,白人强迫黑人不得从事技术性的工作,甚至连邮递员这样非技术性的工作也不让他们做。^[74]最后,我们的种族隔离制度甚至传到了南非、百慕大群岛,直至欧洲人控制的中国

① 杰基·罗宾逊(Jackie Robinson, 1919-1972),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现代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球员。

和印度的租界内。

北方人对后来的“密西西比方案”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措施——该州 1890 年通过的这条州宪法“合法地”(但是有悖于美国《宪法》第 14 和第 15 条修正案)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由此,北方人成为这项方案的共谋者。所有的南方州以及远至俄克拉荷马的一些地方在 1907 年之前都遵从这一方案,而国家也默许了这一做法。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也倾向于证明白人夺回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是合理的。布朗克斯动物园曾在围栏后展出一位非洲人,就像展览大猩猩一样。^[75]各种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戏剧,在低谷时期一直上演。但 164 是,由于这部小说对奴隶制的控诉不再适合种族主义日趋强盛的白人社会,人们就把汤姆叔叔从一个为保护同伴而英勇献身的殉道者,改写为一个忠于好心的奴隶主的多愁善感的糊涂蛋。渐渐地,在黑人社会,汤姆叔叔变成了出卖自己同伴利益的不诚实的非裔美国人。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巡演艺人们用黑脸表现那些笨拙的、口齿不清的白人,这种表演流行于从新英格兰到加利福尼亚的广大地区。这些表演着力描写非裔美国人在种植园里的幸福生活,以及离开种植园之后的迷茫与无奈,由此贬低了黑人的能力。《把我带回老弗吉尼亚》、《老黑乔》以及《我的肯塔基老家》等巡演歌曲都在告诉白人们: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全错了,因为黑人们的确很喜欢奴隶制,二等公民的身份对于这些可悲的人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76]

为了迎合“联盟的虚构”,今天的教科书抛弃了它们关于重建的理想描述。因为,如果黑人是低劣的,那么,在他们享有平等权利的历史时期,掌权的那些美国人一定是思想有问题的,并且肯定是私欲使然。一些后来的歌舞节目仍在继续表现出那些巡演剧目的腔调,它们刻画了很多愚蠢、懒惰、好偷鸡的黑人傻瓜的形象。早期的无声电影也有类似的描述。一些电影对非裔美国人的谴责更为严厉:大卫·W. 格里菲斯在其种族主义史诗《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展示了非裔美国人在跨种族性关系上的迷乱,以及他们受到的白人“掮包客”们的腐蚀。

在政治上,到 1892 年,白人选民的种族主义倾向变得如此严重,最终,民主党 165 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入主白宫,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强烈指责共和党人试图保证为非裔美国人赋予公民权利,这样他就在北方人和南方白人心中唤起了对“黑人掌权”的恐惧。从内战到 19 世纪末,国会中没有一个代表南方或者北方的民主党人投票支持过民权立法。最高法院的情形就更糟了,从 1896 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至少到 1927 年的“龚路诉赖斯案”——该案判决禁止华人就读白人学校——最高法院多次通过支持种族隔离的判决。这是在告诉整个国家,白人就是统治民族。本书已经介绍,伍德罗·威尔逊是怎样赢得 1912 年总统大选,又如何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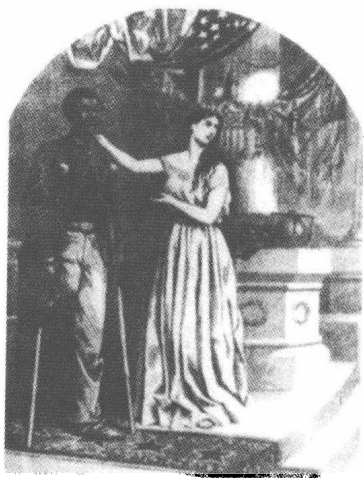


图3 《不是这个男人吗?》

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的这类作品反映的是种族主义在北方的复苏;这幅《不是这个男人吗?》选自1865年8月5日的《哈珀斯周刊》(Harper's Weekly),它说明了纳斯特在内战结束初期的理想主义。与此相对,9年后,当重建走下坡路时,纳斯特关于非裔美国人的想象反映的是那个时代不断增长的种族主义倾向,这类绘画作品有选自该刊1874年3月14日中的《重建(?)州里的有色统治》^①。当北方白人试图在黑人民权问题上做出让步时,这类愚蠢的立法者显然贬值了。

续在联邦政府里搞种族隔离的。借助《一个国家的诞生》在1915年的上映,“三K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自称达400多万余众。“三K党”一度公然控制了佐治亚州、印第安纳州、俄克拉荷马州和俄勒冈州的政府。此外,“三K党”可能还出席了沃伦·G. 哈定白宫的就职典礼。在威尔逊和哈定任总统期间,发生了大约100起种族骚乱,这比重建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多。白人暴徒在全国范围内屠杀非裔美国人,其中有些事件,如1919年的芝加哥骚乱,是众所周知的。其他的一些事件,如在1921年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发生的暴乱中,白人甚至从飞机上向黑人居住区投炸弹,造成至少75人受伤,1100多间房屋被毁,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这类事件只字未提。^[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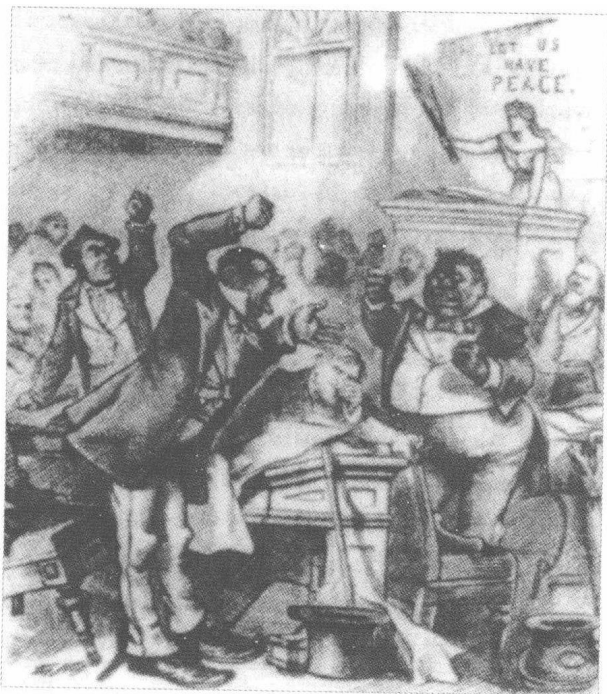


图4 种族骚乱

① 此处书名号中的问号,原文如此。



图5 只招白人
在某些城市，不仅工业方面的工作，甚至连搬家的活都为白人留着。

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在低谷时期，美国的种族主义达到何等的程度。从佛罗里达州玛雅克卡市到俄勒冈州梅福德市，白人袭击黑人邻居，把他们赶走，让整个城镇变成白人的世界。各种没有黑人成员的委员会颁布针对新来的非裔美国人的法令，或对其进行非官方的威胁；如果他们在白人区留宿的话，就可能丧命。这样，出现了数千个“日落之镇”(sundown town)，它们大多分布于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俄勒冈州以及一些北方州的黑白混合社区。“日落之镇”大小不等，伊利诺斯州的德兰德里市仅有 500 人，而威斯康星州的阿普尔顿市的人口达 57000，密歇根州的沃伦市人口数量几乎达到了 20 万。许多郊区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在西部，很多城镇排斥华人、墨西哥人和土著美国人，包括奥扎克^①地区、坎伯兰、密歇根半岛前半部在内的整个地区几乎都不见非裔美国人的身影。在很多大城市，白人把黑人驱赶到某些居住区，这些居住区后来随着城市在居住区方面越来越强的种族隔离化倾向，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所谓“黑人邻区”！^[78]

在整个南部以及很多北部地区，非裔美国人不能参加陪审团，这通常意味着，即便遭受白人诸如袭击、偷窃或是纵火等明显的不公正对待时，他们也不会想到去寻求法律救助。当时的私刑证明了黑人是多么没有自卫能力。私刑的明显特征就是，谋杀发生在公共场所，因此人人都知道谁是凶手，但罪犯却逍遥法外。

① 奥扎克(Ozarks)，指美国密苏里州西南、阿肯色州西北和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的高地。

在低谷时期,连德卢斯市这样的北部偏远地区都有私刑发生。这让我们再次想起1857年“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定:“黑人不享有白人必须尊重的权利。”非裔美国人每次遇到欧裔美国人时,无论那次相遇多么平常,他们都得明白自己该如何表现,以免犯下拿眼睛盯着别人、忘记说“先生”,或者走出了“他们的区域”等罪责。在那些现象背后,总是隐藏着武力的威胁。^[79]

在低谷时期,非裔美国人进退维谷。“集体出走”、在西部建立新的黑人社区的努力没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向北方的移民只是导致了城市种族隔离居住区的出现。只关注布克·T. 华盛顿^①的经济改革计划,却放弃公民权和政治权利,是不可行的,因为在没有公民权和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人们的经济利益无法得到维护。^[80]“回到非洲”是不切实际的。

很多非裔美国人丧失希望,家庭不稳定,致使犯罪率上升。在非裔美国人社会,社会学家所称的“病理性的混乱”开始了,只不过在这一时期的症状并非奴隶制,而是美国生活。^[81]事实上,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黑人的士气低落发生于较后的事件,如:1918至1970年间的向北方城市的大迁徙,1929至1939年间的经济大萧条,或者二战之后城市生活和职业结构的改变。这种混乱是非裔美国人遭受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结果,而不是起因。骑手和邮递员的工作向黑人关闭,这不是因为他们无能,而是因为他们成功了。

关于低谷时期,一些新版教科书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美国之路》中,学生们了解到:“到20世纪初为止,(白人工人)说服了大多数劳工组织不接纳黑人。”《美国人》讲道:“非裔美国人发觉自己被迫进入(北方)的隔离区。”布尔斯廷与凯利使伍德罗·威尔逊与其执政时期的极端种族主义脱离了干系,但谴责首席检察官A. 米切尔·帕尔默煽动“易冲动的市民”向“看上去‘不同’的美国人发泄他们的恐惧和憎恨”,包括向“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有几本教科书提到了私刑,但没有一本书有相关的插图。三本新教科书提到了1908年发生在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骚乱,在那场骚乱中,白人逐出了三分之二的黑人,试图把斯普林菲尔德变成一个“日落之镇”。这些新教科书无不提到“第二个”“三K党”的兴起。 168

另一方面,有10本教科书或含蓄或明确地提到,杰基·罗宾逊是“棒球大联赛中的第一个非裔美国人运球员”——《美利坚之旅》这样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学生们从不知道,在低谷时期之前,黑人一直参加大联赛,因此,教科书中常见的故事线索——社会总体上一一直在进步——仍然大行其道。在介绍斯普林菲尔德的骚乱时,没有一本教科书中提到骚乱是因为驱逐城市里的全部黑人。甚至也没

① 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 1856-1915),美国黑人政治家、教育家和作家。

有一本教科书提到“日落之镇”。《美国人》指出，“进步运动”几乎没有为非裔美国人做任何事情——这一说法几乎无法解释那场通过全国性的投票在全国范围内把黑人议员从市议会中开除出去的运动。今天的一些作者确实强调，非裔美国人不只是受害者，他们对身边的新压迫也有所应对。然而，在这样写时，《美利坚之旅》又走得太过了。它告诉我们：“非裔美国人起而反抗，以获得平等权”，接下来，有两个副标题：“非裔美国人的平等”和“其他的成功之处”。这里，低谷没有了！一些教科书虽然或多或少地承认存在低谷时期，但没有一本对形势恶化的原因作出分析。

对低谷时期进行准确描述，教科书作者们并非只能“白手起家”。在这一时期，非裔美国人为历史留下了丰富而悲情的遗产。学生们只要读过理查德·赖特在《黑男孩》中关于自己童年生活的叙述，只要读过艾达·威尔斯^①在《红色记录》中关于私刑的描述，只要大声唱过大比尔布隆其^②的《如果你是黑人，请回来！》，都肯定能理解，人们的困境映射出选择余地的狭窄。撇开被压迫人群的素材，没有哪本书籍能够触及黑人经历的最深处。而在我一开始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中，没有一本书让非裔美国人自己说出自己所面临的那些处境。

非裔美国人在低谷时期（以及后来）所遭受的歧视并非局限于南方，而是全国性的，让学生们意识到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很少教科书提到这一点。因此，我的大一学生大部分都并不知道，直至二战以后，北方在很多场合也都是实行种族隔离的——黑人不允许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周围的社区购房，不允许在费城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作，不允许在芝加哥当百货商店的售货员，等等。迟至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北方的一些市郊实际上依然将黑人隔离在外。在“布朗案”¹⁶⁹判决半个多世纪后，数百座中立的衰败城镇也依然如此。

甚至连《美国的冒险历程》也忘记了自己曾对低谷时期做过好的论述，结果在其他地方对这一时期又提出了这样一种简单化的论断：“1880 到 1910 年间似乎充满了矛盾……在重建时期，许多人竭力帮助南方黑人。但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大部分美国白人对黑人都不怎么注意。然而再后来，一点一点地，人们开始重新关注黑人。”麻烦的是，很多白人中学毕业生都持有这种观点。他们会问，即使白人对黑人的关注只是时断时续的，那为什么重建结束一百多年之后，非裔美国人今天依然没有振作起来？毕竟，移民群体并没有得到本属于他们的一切。¹⁷⁰

毋庸置疑，一些移民群体面临着严重的歧视，从波士顿的“不受理爱尔兰人

① 艾达·威尔斯 (Ida B. Wells, 1862-1931), 美国知名的女黑人记者, 致力于黑人和妇女权利运动。

② 大比尔布隆其 (Big Bill Broonzy, 1893? -1958), 原名 William Lee Conley Broonzy, 美国著名蓝调歌手。



图6 私刑

私刑暴徒们喜欢在照相机前摆 pose。他们不怕被人认出,因为他们知道没有白人陪审团会判自己有罪。我与他人合著的州历史教科书《密西西比:冲突与变革》的修订本被密西西比州教科书委员会拒绝采用,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收录了这幅图片。在随后的审查中,评估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说,这种材料使教师难以驾驭学生,特别是当一位“白人女教师”在给一群黑人居多的学生上课时。对这个问题,审查员自己接过了问答。他问道:“密西西比州确有私刑发生吗?”是的,这位评估委员会委员承认道,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为什么今天还要提它呢?“这是历史书呀,不是吗?”审查员接着问道。他最终做出了倾向于我这本书的裁定。在我所考察的 18 本教科书中,没有一本有关于私刑的插图。我赶紧保证,没有一起课堂混乱是由于我的教科书或这幅图片引起的。

需求”的标识牌,到新奥尔良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私刑,再到加利福尼亚州针对华工营的大屠杀。直到近些年,北方的一些白人城郊社区还一直对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封闭。此外,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隔离和身体暴力事件在不断升级。在低谷时期,如果非裔美国人遭受的仅仅是如《美国的冒险历程》中所提到的白人对他们的歧视,而不是公开的暴力抵制,那么他们就能够继续赢得肯塔基州的赛马比赛,能够投递信件,甚至能够在白人居住区买房子。问题不在于黑人的失败或者是白人的冷漠,而在于白人的种族主义。

尽管官方的种族歧视在不断减少,但是,年轻一代的美国人成长起来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种族关系的裂缝。他们会在电视上看到,主要由白人组成的拉拉队为主要由黑人组成的运动队加油助威,会看到大学校园里主动隔离的餐厅,以

及对在工作场所实行平权措施的争论。相比其他的社会因素(性别除外),种族身份更决定他们的婚姻。大部分朋友圈依然按种族互相隔离。此外,大部分教堂、联谊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都要么差不多全是黑人,要么差不多全不是黑人。未来的种族事件和族群骚乱还会引发更令人苦恼的纷争。

低谷时期以后,种族关系的环境有所改善,这尤其要归功于民权运动。但是,种族差距今天依然大量存在,这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略举一二。2000年,非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中等家庭的收入平均为白人家庭收入的62%,西班牙裔中等家庭的收入大约为白人家庭收入的64%。在我们的社会中,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从在SAT测试中得高分到学会游泳,但是,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家庭很难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事物。有钱可以拥有良好的营养、健康护理,并远离危险与压力,有钱甚至能买到生命本身。因此,无怪乎,2000年,非裔美国人和土著人的平均寿命比白人短六岁。

平均来看,非裔美国人的住房条件依然较差,SAT^①测试得分较低,年轻人坐牢的比例也较高。在一些黑人和许多白人心中,潜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怀疑:非裔美国人或许是低贱的。人们容易责难受害者,认为有色人种自己应该为处于 171 社会底层负责。不做因果关系的历史分析,很难解释这些种族差距。

当教科书掩盖美国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时,它们阻碍了我们发挥本来就可怜的能力,而这能力是今天我们认识历史所必需的。它们对种族问题的最接近正确的分析也只是要表达一种模糊的乐观主义感情:在种族关系上,就像在其他事物上一样,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地改进:我们过去是有过奴隶制,但我们现在没有了;我们过去是有过私刑,但我们现在没有了;过去,棒球运动员都是白人,现在不是了。在提到白人和黑人的种族关系时,教科书中里都弥漫着进步的观点,并暗示种族关系自身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稳步改善。这种令人喜悦的乐观情绪只会混淆问题,因为白人可以由此断言种族主义结束了。《美国的传统》使我们相信,“在历史上,美国在实现人人平等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做得都要多。”显然,该书作者们没有认真考虑今天的荷兰、莱索托、加拿大,或者1800年的乔克托族社会的人权水平,他们不打算把自己的结论作为一种严肃的比较史学的论断——它只不过是 在为种族优越论摇旗呐喊罢了。

全国民调显示,中学生“对当今美国的种族关系现状持悲观看法。”各种族背景的学生都在深思这一问题。^[82]另一项民调显示,本世纪以来白人青年第一次比

① SAT,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学校智能测试”, 是美国大学选拔优秀学生入学的一种权威性的标准化考试。

三十岁以上的白人更加不能容忍美国黑人,原因之一就是“三十岁以下的那一代人可悲地不了解近期的美国历史”。^[83]这些人太年轻了,他们没有经历过或者目睹过民权运动的发生,这些年轻人不知道美国社会中种族主义在过去和现今的发生方式。

教育家证明教历史是必要的,因为它为我们提供观察现实的视角。如果今天有个问题需要作者们与他们所讲述的历史联系到一起,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种族主义。但是,只要教科书隐瞒 20 世纪的白人种族主义,那么,不论是这些教科书,还是使用这些教科书的学生们,都将不能在 21 世纪就种族关系做出有见地的分析。

注释

[1] Maya Angelou, “On the Pulse of Morning,” 这首诗歌为克林顿 1993 年 1 月 20 日就职演说而作。

[2] Ken Burns,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 Burlington, September 12, 1991).

[3] W.E.B. Du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Cleveland: World Meridian, 1964 [1935]), 722.

[4] Warren Beck and Myles Clowers, *Understanding American History Through Fi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75), 1ix.

[5] Herbert Apthek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egro*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64 [1945]), 17; Irving J. Sloan, *Blacks in America, 1492-1970* (Dobbs Ferry, NY: Oceana, 1971), 1. 根据 J. A. Rogers, *Your History* (Baltimore: Black Classic Press, 1983 [1940]), 73, 黑人也有可能和西班牙奴隶主一起跑了。我沿用第二章的提法,但西班牙人称海地为“圣多明戈”。

[6] 两本新教科书——《美国人》与《走向今天》在论述早期美国历史时,注意这些文化领域的三边关系,这使得教育更有效果,也使历史更加真实。然而,它们从未提出“三边种族关系”这一概念。

[7] 关于阻挠性演讲的资料,见 John and Claire Whitecomb, *Oh Say Can You See?* (New York: Morrow, 1987), 116. 关于共和党人,见 Richard H. Sewell, *Ballots for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92. 关于各政党,见 Thomas Byrne Edsall, *Chain Reaction* (New York: Norton, 1991), 以及 “Willie Hor-

ton's Messag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13/1992, 7-11.

[8] 说唱艺术在 1850 年到 1930 年之间是一种重要的大众娱乐形式，而且从 1875 年前后一直到一战时期，它更是最主要的大众娱乐形式。《乱世佳人》是收获美元最多的电影。当它第一次在电视上放映时，它赢得了那个时代娱乐节目最高的收视率。应该承认，它一开始是一部传奇故事，但它的广阔社会背景首先是关于种族问题的。《时代》2/ 14/ 1977 报道了《根》(Roots) 的流行。关于大众媒体中黑人艺术模式的广泛讨论，见 Michael Rogin, "Making America Hom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9, no. 3 (12/ 1992): 1071-73; Donald J. Bogle, *Toms, Coons, Mulattoes, Mammies, and Bucks* (New York: Bantam, 1974); and James W. Loewen, "Black Image in White Vermont: The Origin, Meaning, and Abolition of Kake Walk," in Robert V. Daniels, ed., *Bi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1).

这段话在初稿时引用的种族关系的内容，源自我对第一部长篇动画片 *Fantasia* 的记忆。当我后来租来录像核对时，发现其中并没有种族关系的内容。于是，我求教 Ariel Dorfman (*The Empire's Old Clothes* [New York: Pantheon, 1983]，发现迪斯尼公司从再版的声像中消除了任何种族问题的内容。

[9] 1993 展览：“The Cotton Gin and Its Bittersweet Harvest” at the Old State Capitol Museum in Jackson, MS.

[10] 阿拉莫与西米诺尔人问题本章稍后再做讨论。密苏里白人在 1830 年把魔门教徒从密苏里驱逐到伊利诺斯，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怀疑他们在奴隶问题上不“可靠”。实际上，后者的确如此。魔门教徒曾允许男性黑人当牧师，并邀请自由黑人到密苏里加入摩门教。面对压力，魔门教徒们不仅逃离密苏里，而且改变了态度和策略。和 19 世纪 40 年代的大多数白人相似，他们宣称，黑人是低劣的，不能成为真正的魔门教徒。这项政策，他们一直延续到 1978 年。见 Ray West Jr., *Kingdom of the Saints* (New York: Viking, 1957), 45-49, 88; Forrest G. Wood, *The Arrogance of Faith*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0), 96-97; and Newell Bringhurst, *Saints, Slaves, and Blacks*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81).

[11] Studs Terkel, *Race: How Blacks and Whites Think and Feel About the American Obsession* (New York: New Press, 1992).

[12] Samuel Eliot Morison and Henry Steele Commager,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521. 在 Andrew Rooney 与 Perry Wolf 的电影 *Black History: Lost, Stolen or Strayed?* (Santa Monica, CA: BFA, 1968) 中，Bill Cosby 指出，这本教科书出自另外两位获得普利策奖的北

方历史学家之手。

[13] Nancy Bauer 的《美国之路》很少讲到奴隶们所体验到的奴隶制度,但是她确实提到奴隶反叛与“地下铁路”。《发现美国历史》用第一手材料讲述奴隶制,但是那些材料全出自白人之手,并且很少站在奴隶角度的观点。该书考虑到了很多奴隶的口述材料,但却排除了黑人的口述材料,这是令人奇怪的。

在该书关于奴隶制的内容中,没有任何“前沿”东西。20年前,历史学家提出“奴隶社群”的说法,以强调非裔美国人在这一制度中的感受,没有教科书提出与这一学说相似的观点,也没有哪位作者介绍了不同学派之间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些学说的集中介绍,见 James W. Loewen, “Slave Narratives and Sociolog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1, no. 4 (7/1982): 380-84, 该书的书评作者有: Blassingame, Escott, Genovese, Gutman, and Rawick.

[14] 奴隶制在 19 世纪是否有益,这一问题激起了一次小规模的历史学争论。虽然奴隶制腐蚀着南方的土地,虽然南方经济越来越依赖北方,但证据显示,种植园主们确实发现奴隶制是有利可图的。见, Herbert Aptheker, *And Why Not Every Ma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61), 191-92.

[15] James Currie, review of *The South and Politics of Slavery*, *Journal of Mississippi History* 41 (1979): 389; 另见 William Cooper, Jr., *The South and the Politics of Slavery, 1828-56*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6] Roger Thompson, “Slavery, Sectionalism, and Secess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1, no. 2 (7/1981): 3, 5; William R. Brock, *Parties and Political Conscience* (Millwood, NY: KTO Press, 1979).

[17] Joseph R. Conlin, ed., *Morrow Book of Quota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Morrow, 1984), 38.

[18] Frank Owsley 是一位同情南方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战争的原因并不在于奴隶制。然而,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实际上每个人,包括联邦一方的亚伯拉罕·林肯、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尤里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以及联盟一方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和副总统亚历山大·H. 斯蒂芬斯 Alexander H. Stephens, 都认为战争因奴隶制而起。见 Daniel Aaron, *The Unwritten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8, 180.

[19] Pageant 从该文件中引用了一小段话,但是它意义太模糊,很少读者能理解。

[20] Bessie L. Pierc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6), 66-70. 在那几十年里,北方也并非进步

教科书的孵化地。

[21] Frances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 (New York: Vintage, 1980), 该书描述了历史教科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如何改变自己对奴隶制以及重建问题的态度的。Hillel Black 描述了以前主张种族隔离制度的南方白人的影响,以及后来黑人在北方城市校区的影响,认为这后一种影响源自民权运动以及黑人权力运动。见 *The American Schoolbook* (New York: Morrow, 1967), Chapter 8. 而“Liberating Our Past,” *Southern Exposure*, 11/1984, 2-3 论述了民权运动的影响,它对于奴隶制的新态度与一手材料以及当时的大多数历史著述相近。

[22] 在威廉斯堡的访谈; Sloan, *Blacks in America, 1492-1970*, 2; Howard Zinn,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Boston: Beacon, 1970), 67.

[23] Horton, 转引自 Robert Moore in *Stereotypes, Distortions, and Omissions in U.S. History Textbooks* (New York: 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 1977), 17.

[24] *Before Freedom Came*, 这是 E. D. C. Campbell Jr. 编撰的另一本书 (Richmond, VA: Museum of the Confederacy, 1991).

[25] 引自 Felix Okoye, *The American Image of Africa: Myth and Reality* (Buffalo: Black Academy Press, 1971), 37. 这里, 孟德斯鸠预言了费斯廷格 (Festinger) 的“认知失调”理论。见 Leon Festinger,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1957).

[26] Okoye, *The American Image of Africa*.

[27] Margaret Mitchell, *Gone With the Wind* (New York: Avon, 1964 [1936]), 645.

[28] 在报导这一调查结果时, 一位记者还乏味地补充说:“《圣经》也名列前茅。”

[29] 我还检索过“白人种族主义”(white racism)、“白人优越论”(white supremacy)等词条,但是没有结果。

[30] 关于厄瓜多尔, 见 Ivan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30. 关于黑人在西米诺尔人中的影响, 见 Daniel F. Littlefield, Jr., *Africans and Creeks*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79). 关于艾略特在爱荷华州眼睛颜色的试验, 见 the PBS *Frontline* documentary, *A Class Divided* (video, Yale University Films. Alexandria, Virginia: PBS, 1986). 关于北极, 见“Discoverers' Sons Arrive for Reunion,” *Burlington Free Press*, May 1, 1987; Susan A. Kaplan, introduction to Matthew Henson, *A Black Explorer at the North Pol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以及 Irving Wallace, David Wallechinsky,

and Amy Wallace, *Significa* (New York: Dutton, 1983), 17-18. 注意《美国的冒险历程》愉快地断定,向白人社会同化是大势所趋。

[31] 对于一些黑人演说家来说,说种族主义已经有所变化是成问题的。他们试图将种族主义问题永远作为历史的支配性力量,当然,这削弱了我们认识其他因素的能力。

[32] James W. Loewen and Charles Sallis, *Mississippi: Conflict and Change* (New York: Pantheon, 1980), 141.

[33]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 158. Matthew Downey 也持同样的观点,见“Speaking of Textbooks: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Publishers,” *History Teacher* 14 (1980): 68.

[34]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43.

[35] Richard R. Beeman, *Patrick Hen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182; Henry quoted in J. Franklin James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Movement* (Boston: Beacon Press, 1965), 23.

[36] 《美国的冒险历程》是一本探究型的教科书,它很大部分是由第一手材料组成,包括很多信件,这里引用的这句话就源于那些信件。亨利还写道:“让我们将奴隶——对他们的不幸我深感同情,也将对奴隶制的厌恶代代相传。”亨利的传记作家 Richard R. Beeman 一语中的地指出了亨利的奴隶观:“如果不是伪善,那至少也是明摆着在自欺欺人。”见 *Patrick Hen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97.

[37] Paul Finkelman, “Jefferson and Slavery,” in Peter S. Onuf, ed., *Jeffersonian Legacie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3), 181-221, 这篇文章对杰斐逊的奴隶身份以及这一身份在杰斐逊的思想上产生的差异作了广泛的分析。

[38] Paul Finkelman, “Treason Against the Hopes of the World: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Problem of Slaver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colloquium, March 23, 1993); Roger Kennedy, *Mr. Lincoln's Ancient Egyp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1991, typescript), 93; 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Boston: Little, Brown, 1993), 69. William W. Freehling 也讨论了杰斐逊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矛盾, 见 *The Road to Dis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3-31, 136.

[39] 如此这般的献媚的确是为了取悦教科书采用委员会里的非裔美国人或自

由派白人。也或许,出版商认为,这样的颂扬有助于今天的白人学生不再把非裔美国人想得那么差劲。然而,证明革命减弱了白人的种族主义倾向,的确是一种更合法的历史论述而且还可能更有助于软化今天的顽固派。

[40] Bruce Glasrud and Alan Smith, *Race Relations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1607-1783* (Chicago: Nelson-Hall, 1982), 330.

[41] George Imlay, 引自 Okoye, *The American Image of Africa*, 55. 另见 Glasrud and Smith, *Race Relations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278-330.

[42] Apthek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egro*, 76.

[43] 引自 James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Movement*, 23.

[44] 关于革命对奴隶制的影响,见 Glasrud and Smith, *Race Relations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278; Richard H. Sewell, *Ballots for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3; Dwight Dumond, *Antislavery* (New York: Norton, 1966 [1961]), 27-34; Arthur Zilversmit, *The First Emancip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and Paul Finkelman, *An Imperfect Un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关于 Virginia 的数据源自 Finkelman, "Jefferson and Slavery," 187.

[45] Finkelman, "Treason Against the Hopes of the World."

[46] David Walker, 引自 Okoye, *The American Image of Africa*, 45-46. 他尽管攻击杰斐逊,但也曾赞赏地引用过《独立宣言》。

[47] 一旦意识到拿破仑是真的要占领“路易斯安那”,杰斐逊就改变了对法国的倾斜态度,回到中立的立场上。见 John Chester Miller, *The Wolf by the Ea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134-37.

[48] Piero Gleijeses "The Limits of Sympathy,"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4, no. 3 (October 1992): 486, 500; Roger Kennedy, *Orders from Fran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140-45, 152-57.

[49] Gleijeses, "The Limits of Sympathy," 504; 《奥斯坦德宣言》引自 Dumond, *Antislavery*, 361. 另见 Robert May, *The Southern Dream of a Caribbean Empire, 1854-1861*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50] Henry Sterks, *The Free Negro in Antebellum Louisiana* (Rutherford, NJ: Fairleigh Dickens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301-4.

[51] William S. Willis, "Division and Rule: Red, White, and Black in the Southeast," 载 Leonard Dinnerstein and Kenneth Jackson, eds., *American Vistas, 1607-*

187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61-64; 另见 Littlefield, *Africans and Creeks*, 10-100, 及 Theda Perdue, "Red and Black in the Southern Appalachians," *Southern Exposure* 12, no. 6 (November 1984): 19.

[52] Sloan, *Blacks in America*, 9; Littlefield, *Africans and Creeks*, 72-80.

[53] William C. Sturtevant, "Creek Into Seminole," 载 Eleanor Burke Leacock and Nancy O. Lurie, eds., *North American India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1988 [1971]), 92-128.

[54] J. Leitch Wright Jr., *The Only Land They Knew*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 277; William Loren Katz, *Teachers' Guide to American Negro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1971), 34, 63. 另见 Scott Thybony, "Against All Odds, Black Seminole Won Their Freedom," *Smithsonian Magazine* 22, no. 5 (8/1991): 90-100; and Littlefield, *Africans and Creeks*, 85-90.

[55] Reginald Horsman, "American India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Manifest Destiny," in Francis Prucha, ed., *The Indian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28. 几乎每本教科书都提到奴隶制是德克萨斯的一个问题,但是大多数都将奴隶制隐藏在墨西哥人不承认北美白人的其他“权利”之内。关于自由黑人,见 Moore, *Stereotypes, Distortions, and Omissions in U.S. History Textbooks*, 24. 读者还可以阅读一本卓越的历史小说:R. A. Lafferty, *Okla Hannali*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2), 100, 该书声称:“无论怎么编造(编造一直是一种经典行为),有一件事是确凿的:奴隶制。”

[56] Thomas David Schoonover, *Dollars Over Domin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41, 78.

[57] Patricia N. Limerick, *The Legacy of Conquest* (New York: Norton, 1987), 92-93.

[58] 那场竞选在当时是美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竞选辩论内容被逐字逐句地传播和阅读,为新闻提供了更完整、更正确内容。

[59] 令人惊奇的是,两本探究型教科书却忽略了那些辩论。《美国的冒险历程》只有一个提问型的段落;《发现美国历史》只有一段描述性的短文(虽然它引自林肯的演讲“House Divided”)。在介绍竞选的一些行为时,这些探究型教科书的确很难吸纳一手材料,那些材料本来就是文字而非行为。这里,行为包含文字——然而教科书忽略了它们!

[60] Paul M. Angle, *Created Equal? The Complete Lincoln-Douglas Debates of 185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另见 Gustave Koerner, *Memoirs*,

2:58-60, quoted in Angle, *The American Reader* (New York: Rand McNally, 1958), 297.

[61] Angle, *Created Equal?* 22-23.

[62] 引自 Paul D. Escott, *Slavery Remembere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153.

[63] 《美利坚盛典》、《美国之路》以及《发现美国历史》三本书是个例外。《美利坚盛典》是 David Kennedy 对 Thomas Bailey 原来的教科书的修订,后者出版于 1956 年! Thomas Bailey 相信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描述:“战前‘旧南方’那些月光温柔、木兰盛开的日子已经随风而逝了。”在“日子”一词之前,David Kennedy 添加了“如梦如幻的”几个字。即使添加了这些新材料,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对“大刀下的重建”(Reconstruction by the Sword)的过时的、种族主义的解释,仍然是在强调其“激进的立法”,并完全无视大量的、可接受的共和政策曾赢得了多数南方白人的支持。《美国之路》把“激进的”共和党人描述为机会主义者,认为他们“把北方人送到南方,是为了确保黑人记住投票给这个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党。”(当然,黑人不需要这种提醒,很多黑人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仍然投共和党的票!)《美国之路》还声称:“激进分子觉得赋予黑人与白人同等的权利仍然是不够的”,因此他们“设法通过第 14 条修正案。”——但这条修正案恰恰是赋予了黑人与白人同等的权利!总体看来,《美国之路》的手法是非职业的。内容更贫乏的是《发现美国历史》;这是一本探究型教科书,只花了两页去写所有的国会重建,而大多数内容都是在摘录第 14 和第 15 条修正案。《发现美国历史》是唯一一本不使用“掬包客”、“南方佬”这类术语的教科书,但是它也只字不提重建。

[64] 或许,该书作者鲍尔受到了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影响,在后者的笔下,一旦奴隶制结束,白人的监管松懈之后,非裔美国人就变得懒散了。然而,一些获得自由的人的作品及回忆录并不支持这种描述。见 Escott, *Slavery Remembered*, 该书关于人们对重建的记忆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另见一些全国性或局部性的研究,如 Roberta Sue Alexander, *North Carolina Faces the Freedme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5)。

[65] George C. Rable, *But There Was No Peac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4), 1.

[66] Morgan Kousser, “The Voting Rights Act and the Two Reconstruc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October 19, 1990); Du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681.

[67]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及 C. Vann

Woodward 的书评, 载 “Unfinished Busines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12/1988 中关于 Albion W. Tourgée 所收集到的数据的介绍。另见 Alexander, *North Carolina Faces the Freedmen*.

[68] Gen. O. O. Howard, 引自 Robert Moore, *Reconstruction: The Promise and Betrayal of Democracy* (New York: CIBC, 1983), 17.

[69]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1944]), lxxv-lxxvi.

[70] Rayford W. Logan, *The Betrayal of the Negro*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1954]). 另见 Foner, *Reconstruction*, 604.

[71]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 157.

[72] 在 *Minority Education and Cast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中, 人类学家 John Ogbu 用这一事实解释为什么少数被压迫群体通常在其本土社会之外会过得更好。

[73] Michael L. Cooper, *Playing America's Game* (New York: Lodestar, 1993), 10; Gordon Morgan, “Emancipation Bowl”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d., typescript).

[74] Robert Azug and Stephen Maizlis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Race and Slavery in Americ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6), 118-21, 125; Loewen and Sallis, *Mississippi: Conflict and Change*, 241.

[75] Wallace, Wallechinsky, and Wallace, *Significa*, 26-27, “Man in the Zoo.”

[76] 关于巡演艺人的文化意义, 见 Robert Toll, *Blackening U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57, 以及 Ike Simond, *Old Slack's Reminiscence and Pocket History of the Colored Profession* (Bowling Green, OH: Popular Press, 1974), xxv 中的导言部分; Joseph Boskin, *Samb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9;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989; 及 Loewen, “Black Image in White Vermont.”

[77] 关于克利夫兰, 见 Stanley Hirshson, *Farewell to the Bloody Shirt* (Chicago: Quadrangle, 1968), 239-45. 关于民主党人, 见 Kousser, “The Voting Rights Act and the Two Reconstructions,” 12. 关于哈定, 见 Wyn Craig Wade, *The Fiery Cro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165. 哈定的邀请只不过说明“三 K 党”的合法性, 他任职总统期间的种族主义倾向不及威尔逊那样强烈, 虽然他没有取消威尔逊的种族隔离政策。关于“龚路诉赖斯案”, 见 James W. Loewen,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1988), 66-68. 关于塔尔萨市, 见 Wallace, Wallechinsky, and Wallace, *Significa*, 60-61. 当我 1992 年写作这一章时, 洛杉矶市爆发骚乱, 很多记者称之为“本世纪最严重的骚乱”。或许, 在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断奶”之后, 这些记者就不知道低谷时期的那些骚乱了。

[78] 见 James W. Loewen, *Sundown Towns: A Hidden Dimension of American Racism* (New York: New Press, 2005), 特别是其中的第 3 章。

[79] 种族隔离制度在大约 1970 年结束, 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 会认为这些是一场闹剧。美国历史教科书并不有助于今天的学生们去感知那一时期的真相。请看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最后一个区域的研究: Loewen,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45-48, 51, and 131-34.

[80] 在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48, 我证明, 黑人在经济上的成功本身构成南方白人的耻辱, 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 很难维持。

[81] 见 Stanley Lieberson, *A Piece of the Pie: Blacks and White Immigrants Since 18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Herbert Gutman 在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New York: Vintage, 1977) 中指出, 黑人家庭的不稳定不能归咎于奴隶制或者重建。Edmund S. Morgan 在 “Negrophobi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6/ 16/ 1988, 27-29 的这份 Roger Lane 的研究综述中指出, 在 19 世纪 90 年代前的费城, 黑人的职业犯罪比白人多得多, 原因在于他们被排挤出了所有的实质性工业职业。另见 Vernon Burton, *In My Father's House Are Many Mansion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关于“病理性的混乱”, 见 Lee Rainwater, ed., *The Moynihan Report and the Politics of Controvers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7).

[82] “Racial Division Taking Root in Young America, People for Finds,”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Forum* 2, no. 1 (3/1992): 1.

[83] Richard Cohen, “Generation of Bigots,” *Washington Post*, 7/ 23/ 1993; Marttila & Kiley, Inc., *Highlights from an Anti-Defamation League Survey on Racial Attitudes in America* (New York: Anti-Defamation League, 1993), 21.

第六章

约翰·布朗和亚伯拉罕·林肯：美国历史教科书 172 隐瞒反种族主义

教科书所忽略的，并不仅仅是那些激进的，或者不再新潮的思想；它们其实不提任何思想，包括它们笔下的那些英雄人物的思想。

——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1]

你们可以轻易地处理我，我现在就要被处理掉了。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我指的是，黑人问题，它还没有完。

——约翰·布朗，1859年^[2]

我在这里为他的事业辩护。我辩护的不是他的生命，而是他的品格——这才是他不朽的生命。因此，它将变成你们的事业，至少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业。

——亨利·戴维·梭罗^①，“为约翰·布朗上尉辩护”，1859年^[3]

我们这个国家将需要这种反对奴隶制的全部热忱，或许这还不够。你们可以回家，竭力使人们相信你的观点。你们随便说我什么都行，只要对你们有帮助……一旦处理奴隶制的时刻来临，我相信，我会恪守职责，哪怕牺牲我的生命。

——亚伯拉罕·林肯致废奴主义“一神论”牧师们，1862年^[4]

1979年，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出版了《重写美国》一书，对美国历史教科书做了整体回顾，其中最有力的批评或许就是指出了那些教科书都缺乏思想性。她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的教科书看，“美国政治生活完全是没有思想的。”^[5]

^①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美国著名思想家和作家，著有《瓦尔登湖》等。

为什么教科书的作者避免谈论哪怕是他们同意的那些思想呢?那是因为,重视人们的思想并不符合教科书的写作风格。教科书在叙述事件时,总想使它们看起来预先就存在于一个持续进步的轨迹之内,如果把人们的想法写进来,就会使历史带有偶然性,即:事情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不是非得如此。历史上,拥有“正确”思想的“正确”的人并不总能胜利,而一旦他们没能胜利,教科书的作者们就会很为难,因为他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某一结果表示批评。把思想写进来还会导致不确定性,而这也并非教科书的风格。教科书展现历史,不要真实的戏剧性或悬念,只要情节剧。

在种族关系问题上,约翰·布朗宣称“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这句话虽然说在1859年,但几乎是一种预言,在今天似乎仍有意义。当然,种族主义的对立面是反种族主义,或者说是种族理想主义或种族平等主义,但是,尚不清楚,这种主张能否取胜。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历史教科书很少提供帮助。教科书在淡化白人种族主义的同时,也忽视种族理想主义。这样一来,教科书就剥夺了学生在试图弥合从过去的大裂缝延伸到将来的新裂缝时可以学习的榜样。

既然思想与意识形态在内战时代具有特别的重要作用,那么美国历史教科书对那场斗争所做的评价就是极为肤浅的。教科书谈论奴隶制却避而不谈种族主义,同样,它们谈论废奴主义却避而不谈大量的理想主义观念。^[6]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白人当中最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

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布朗问题的论述,就像关于奴隶制与重建问题的论述一样,今天已经有所改变。从1890年到大约1970年这段时期,约翰·布朗曾被认为是精神异常者。而在1890年以前,他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1970年之后,他慢慢又被认为是正常的。我曾以为,此后的教科书将沿着这一思路,在塑造布朗的形象时,会认为布朗的那些行为不说是英明的至少也是思路正常的。然而,当我又考察了2006至2007年间的6本教科书之后,发现自己错了。不管怎么说,在布朗问题上,最近的教科书与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总体上并没有多大不同,因此,我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既然布朗本人在死后依然还是那个布朗——除了尸骸渐腐外,那么,教科书关于他精神状况的论述就无意间为我们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衡量白人种族主义程度的标尺。或许,从我们的新教科书中,人们会看出,2007年的种族关系不比1987年好多少。

在我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布朗出现了两次:一次出现在堪萨斯的波多瓦托米河,另一次出现在弗吉尼亚的哈珀斯渡口。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该法案试图通过“主权在民”的方式解决奴隶制问题。实践证明,让奴隶问题由那些堪萨斯的新移民自己决定,乃是一项意识形态激励下

的不明智的举措。北方人蜂拥而至，在堪萨斯地区定居和从事农业，使之成为“自由土地”。而南方种植业者虽然很少携带奴隶移居堪萨斯，但是来自密苏里的奴隶主们一再越过密苏里河，加入到该地域的选举中来，并建立其恐怖统治，以驱逐“自由土地”上的那些农业人口。1856年5月，数百名拥护奴隶制的“边疆歹徒”——人们后来这样称呼他们——袭击了属于“自由土地”的堪萨斯地区的劳伦斯镇，杀死了两人，焚烧了旅馆，捣毁了两家出版社。《美国的传统》这本较早的教科书泛泛地描述了布朗在波多瓦托米河地区的活动，它指出，“出于报复，一位名叫约翰·布朗的废奴主义好战分子在一个夜间发动了对波多瓦托米河地区蓄奴派定居点的袭击。有五人被布朗及其同党杀死。”2006年版的《美利坚盛典》提供了一段更为完备的描述，但其立场远非中立。

约翰·布朗的狂热形象今天依然潜行在堪萨斯的那块战场上：瘦高个、灰色胡须、意志坚定，献身于废奴事业并至死不悔。他灰色的眼珠炯炯有神，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的目光可以使一只狗或猫夺门而逃。由于涉嫌卷入一些可疑的交易，比如，盗马，布朗与他大家庭的一些成员一道从俄亥俄迁居到堪萨斯。为酝酿对劳伦斯镇的攻击，这位来自奥沙瓦托密（Osawatomie）的“老布朗”带领一批随从于1856年5月来到波多瓦托米河地区。在那里，他们居然把5个据说是蓄奴主义者的人在惊愕中剁成碎片。这种恶魔般的杀戮玷污了争取自由土地的事业，遭致了蓄奴势力的恶意报复。

《美利坚盛典》的这段文字是那些写作于种族关系处于最低谷的时期——1890至1940年——的书籍的一个典型代表（那时，大多数美国白人，包括历史学家，都认为黑人不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段文字在21世纪初读起来更让人震惊，按照这样的描述，那些为黑人平等权而战的人肯定是脑子有问题。

实际上，这本教科书初版于1956年。那时，民权运动所带来的各种变化还没有机会将以这种方式写作出来的历史教科书从我们的文化中滤去它的影响。那些措辞——从“狂热的形象”到“可疑的交易”再到“恶魔般的杀戮”——很难做到客观。一个人在“潜行”就意味着跟踪另一个“前行”的人。这里，在细节取舍上，有着明显的偏见。这样的叙述从头到尾把北方人说成是肇事者，而无视那些南方蓄奴派所发起的更早的屠杀。事实上，赞成自由州的人居于多数，他们试图以民主和合法的方式赢得堪萨斯，是蓄奴派试图运用恐怖和威胁的手段控制整个堪

萨斯。读过《美利坚盛典》的人,没有人会想到蓄奴派曾杀害了5名赞成自由州的定居者,其中两人死于在劳伦斯的那场袭击中。实际上,布朗并未“与他的大家庭”一道迁居到堪萨斯,相反,他去了阿迪朗达克山地区,希望在那里与自己的几个儿子汇合,但是,他的五个儿子却带着家眷去了堪萨斯,希望在那里安居乐业。后来,儿子们受到一些蓄奴派邻居的威胁,转而向父亲求助。其他的错误措辞还有:“据说是蓄奴派”(实际上那些人的确是蓄奴派)、“居然把那些人剁成碎片”(实际上他们没有那样做)。^[7]

在那18本教科书中,还有一本新书名叫《走向今天》。该书对布朗报以最强的同情,但也不失中立立场。它简洁地描述了布朗的哈珀斯渡口战役:

1859年10月16日,当年堪萨斯的袭击者约翰·布朗又伙同一群人袭击了位于弗吉尼亚哈珀斯渡口的联邦军械库……布朗等人希望获得武器,以武装奴隶,发动奴隶起义。

合众国军队在罗伯特·E.李上校的指挥下,把布朗等人逼至绝境并将其击败。布朗被控叛国罪,并被判处绞刑。就在行刑前,他写下一个字条,其中的话后来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清洗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

还有8本书,其中有新的也有旧的,虽然没有明言布朗是疯子,但也都对其持否定的态度。其他9本书的态度则是公开的仇视。有些书,包括6本新书中的4本,强调实际上没有奴隶加入了布朗的反抗行动。布尔斯廷与凯利对此做了详述:“那帮人强行‘解放’了大约30名奴隶。这批人不情愿地被布朗及其同伙挟持着退到军械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事件中第一位死去的人——被约翰·布朗及其同伙所杀——是已经自由的黑人,现在却死于那帮‘解放者’的枪口之下。”

“联盟之女联合会”(The 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UDC)或许会喜欢这种论述,因为这种论述暗示了非裔美国人对自由不感兴趣。UDC曾在哈珀斯渡口为一位黑人海伍德·谢泼德(Haywood Shepherd)树立一块纪念碑,照布尔斯廷与凯利的说法,此人是自由的黑人。1931年,UDC在碑文中指出,海伍德·谢泼德“代表了身边那些不愿参加反叛的黑人。”但是,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汉娜·格费特与吉恩·利比已经证明,布朗得到了哈珀斯渡口附近受奴役的非裔美国人的大量支持。布朗的队伍武装了30名布尔斯廷与凯利所说的那些人,其中一些人来自他们从未袭击过的附近种植园。^[8]这些新获得自由的人后来拦截了一辆东

行的旅客列车,将其监管起来,以便于战士们搜寻奴隶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或许杀死了该镇的一名武装的白人居民,因为他在受到警告时拒绝放下武器。(在这次袭击之后,该州指控其中 11 人参与这些行动)在这次袭击之后,当地的非裔美国人继续布朗所激起的反抗奴隶制的事业。利比指出,在 1860 年的人口普查中,很多来自这一地区的奴隶被统计为“逃亡者”,并且,“所有参与审判约翰·布朗的陪审团成员的谷仓都被焚烧——这种做法向来是革命的信号。”^[9]这样一来,那些教科书里所提供的 UDC 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即,奴隶本人并不支持废奴事业——显然是不正确的。

有 4 本教科书仍然停留在以前的时代,仍然说布朗的行为证明他是疯子。《美国历史》认为,“约翰·布朗可能真有精神病。”《美国之路》说,“后来,布朗被证明精神有问题”,这真是弥天大谎。2006 年版的《美利坚盛典》也与此前出版的那些书籍一样,继续把布朗刻画为“疯狂的”、“憔悴的”、“无情的”和“可怕的”,称“布朗的 13 位近亲,包括他的母亲和祖母,都曾被认为有精神病”,并断言哈珀斯渡口袭击是一桩“疯子的业绩”。其他的教科书在手法上要更具技巧一些,它们说布朗只是有些“狂热”。没有一位作者,不论是新作者还是老作者,对布朗表示同情,对他的理想和行为感到满意。

像我这样的读者,从小就被告知布朗如果不是疯子,至少也是狂徒。出于为这样的读者考虑,让我们来看看事实究竟如何。的确,布朗的一些律师和亲戚为了挽救布朗免于绞刑,指出他患有精神疾病。但是认识布朗的人没有人会认为他是疯子。在他被捕后,一些人与他交谈,其中包括狱卒甚至那些为支持奴隶制的民主报纸撰稿的记者。布朗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一次非正式辩论中,弗吉尼亚州长怀斯曾被布朗击败,怀斯称布朗是“一位头脑清醒的人”,并说“那些认为他是疯子的人自身是有问题的。”在写给弗吉尼亚立法机构的一封信中,怀斯说布朗表现出“敏捷而清晰的思维”、“理性的假设和连贯的推理”,以及“镇定自若的态度”。^[10]

老实说,布朗的事业很难成功。1890 年之后,教科书的作者们据此断定布朗是疯子,但不用担心,约翰·布朗本人有先验之明,他告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177 他的事业即便失败,也将留下足够的影响。也不用担心他的余部,那 20 多人也不可能全被看成是疯子。^[11]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学家强加在约翰·布朗身上的精神问题从来不是精神上的,而是意识形态上的。布朗的行为对于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教科书作者们来说,是无意义的。无意义就是疯狂。



图1 约翰·布朗的两幅肖像

约翰·布朗 1858 年的肖像。他看上去像一位中年商人——实际上他的确是。在以后的年月里,他开始留胡子,部分原因是,当时人们需要他帮助 11 位非裔美国人逃离密苏里的奴隶制,为此,他乔装改扮。很少美国人能认出这幅肖像画的是谁。(左图)

1937 年约翰·斯图尔特·柯里(John Stuart Curry)所想象的布朗的肖像。柯里在堪萨斯州议会大厦的墙上画下这幅肖像画。画中布朗显得憔悴而疯狂。在 1937 年以前,布朗在我们的文化中就是这幅模样。令人震惊的是,新千年之后,《美利坚之旅》把这幅画摘编为布朗的唯一一幅肖像画。很多美国人能说出画中人的名字。(右图)

很明显,布朗的同时代人并不认为布朗有精神病。布朗的思想的影响不论是在其被绞死之前的一个月里,还是在其身后,都是巨大的。他铲除了在奴隶问题上的思想和行为界限。在哈珀斯渡口起事之前,做一位废奴主义者即使在北部也是很难被人接受的。仅仅是讨论给奴隶自由这一问题——即,主张立即解放奴隶——也是一件超出了意识形态限制的行为。约翰·布朗采取了武装行动,包括杀人,这使得那些口头上的废奴主义言论算不上激进了。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在最初对布朗行为感到震惊和反感之后,美国人开始 178 如痴如醉地倾听布朗所说的话。在 1859 年受审时,布朗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其程度远胜于此前此后的任何其他废奴主义者及奴隶主。布朗知道这一点,他说:“我此前的整个生活都没有为我提供一个捍卫正义的机会。”^[12]在 11 月 2 日,即被法官宣判死刑之前,布朗当庭辩论道:“如果我这般抗争代表的是有钱有势的人,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他在审判间里看见一部《圣经》,遂援引其中的句子说

道：“它教导我，要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它还教导我，记住枷锁下的人们，就如同和他们被囚在一起一样。我努力遵循这训条行事。”接着，布朗宣布了最高道德的基础：“我相信，我这般抗争及一直公开承认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代表了上帝的卑贱的穷人。我相信我做的是对的，我做的没错。”虽然他知道死刑即将来临，并认为那是不公正的，但他接受那一结果，并指出了其严重的不正义性：“现在，在这个奴隶制的国度里，千百万人的权利全被邪恶、残暴和不义的法制剥夺。如果认为必要，我应当为了实现正义的目的付出我的生命，让我的鲜血、我子女的鲜血与千百万人的鲜血流在一起。那么，我请求判决，请便吧！”^[13]

布朗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并甘愿为之赴刑，这种行为本身具有道德感染力。亨利·戴维·梭罗在波士顿致悼词：“过去似乎没有人在美国真正地死去，因为要想死，首先要有生。今天的这批人，教会了我们怎样死，同时也教会了我们如何生。”梭罗甚至把布朗比作拿撒勒^①的耶稣，后者同样地死于国家之手。^[14]

在11月底，布朗来日不多了，他优雅地向整个国家展示了如何面对死亡。在纽约市拉奇芒德镇，乔治·坦普莱顿·斯特朗^②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所信奉的任何东西，当被他人以死（绞刑）相驳时，就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动摇。”^[15]布朗在写给家人与朋友的信里，表现了其温柔的形象，流露出人性的一面，并表达了对自己的孩子及未来的遗孀，而不是对自己的极大的悲悯。他写给那些支持者的书信，以及向记者发表的那些评论，被广为流传，形成对奴隶制的不断控诉。一封署名为“保守的基督徒”、写给狱中的布朗的信说：“虽然我不能赞同你的全部行为，但我对你被捕后的立场肃然起敬。我没敢反对你，以免发现自己是在与上帝作对。你的言辞显示出你的威望，似乎那是从上天得到的力量。”^[16]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布朗身上的影响力。12月2日，弗吉尼亚当局对布朗执行死刑。布朗成为 179 美国自建国以来第一位以叛国罪被处绞刑的美国人。在北部各城，教堂钟声齐鸣，为其哀悼。路易莎·梅·埃尔科特、威廉·迪安·豪威尔斯、赫尔曼·梅尔维尔、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以及沃尔特·惠特曼等诗人们，对这一事件都予以关注。在法国，维克多·雨果说道：“整个欧洲的目光在那一刻都对准美国。”他预言，绞死布朗“将会使美国潜在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最终将把这个国家撕成碎片。约翰·布朗的受刑，可能会巩固弗吉尼亚的奴隶制度，但也必将打碎美国的民主。你们在掩盖藏拙的同时，也戕杀了自己的光荣。”^[17]

布朗死后，人们陷入争论。共和党国会议员们与他的杀人犯罪行为保持距离。然而，南方奴隶主为北方人对布朗的同情态度感到惊恐，决心采取一切必要

① 拿撒勒(Nazareth)，相传耶稣的故乡。

② 乔治·坦普莱顿·斯特朗(George Templeton Strong)，美国19世纪日记体作家。

手段维护奴隶制。如果失去下一届总统选举,他们甚至不惜退出联邦。同时,在北方,布朗的“克里斯马”并没消失,而是不断增长,人们把很多事物都看成是他殉难的神迹。内战来临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发现自己与约翰·布朗面临同样的生死困境,因此,布朗的模范力量呈现出新的现实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士兵们会高唱着“约翰·布朗的兄弟”^①这支歌曲奔赴战场。两年后,人们在教区聚会时开始传唱由茱莉亚·沃德·豪威^②为这首歌曲填写的新词:“他死去,世人成圣;我们赴死,世人自由。”——约翰·布朗与耶稣基督在这里互换了身份。再次年,“第54马萨诸塞有色人种团”举行大游行,队伍高唱这首歌,从波士顿开始出发,大无畏地奔向位于南卡罗莱纳的死亡的“天命”之所。威廉·劳埃德·盖瑞森^③从阳台上俯瞰欢呼的围观人群,将一只手衬在一座约翰·布朗的半身像上。1865年2月,另外一支马萨诸塞有色人种团又高唱此歌穿过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街道。^[18]

这是老约翰·布朗的极盛时期。在19、20世纪之交,当一些南方州和边疆州剥夺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的时候;当私刑泛滥的时候;当黑面表演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主流的时候,美国白人开始放弃其残存的种族主义理想。1923年出版的一本历史书籍对布朗的精神问题做了坦诚的介绍:“我们离1859年的那个热潮越远,就越容易把这位不平凡的人看作是妄想症的受害者。”^[19]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白人才放弃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并开始承认,一个白人如果愿意为黑人平等权而献身,那未必就是疯狂之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密西180西比的米奇·谢维娜和安德鲁·古德曼谋杀案、阿拉巴马的詹姆斯·里伯和维奥拉·柳佐谋杀案,以及20世纪60年代南部各州发生的针对其他民权运动白人工作者的谋杀案,都促使教科书作者们再次发现约翰·布朗是精神正常的。写作于1961年的《美利坚民族的兴起》把哈珀斯渡口起义称为“疯狂的念头,注定会失败”,但到1986年,在《美利坚民族的胜利》里,这场起义变成了“果敢的念头,只不过几乎注定要失败”。^[20]

在美国历史上,白人种族主义者与黑人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意识形态需求常常不谋而合。在如何看待约翰·布朗问题上,就是如此。在“黑人力量”(Black Power)运动的鼎盛时期,我在密西西比的讨论会上听到人们轮番上台谴责白人。

① 这支歌曲的旋律源自古老的英格兰。美国内战期间,北方士兵将废奴事业与约翰·布朗联系在一起,将此曲冠名为“约翰·布朗的兄弟”而传唱,又将约翰·布朗与耶稣联系在一起,视布朗的尸体与耶稣的尸体一样,象征着生者的食物,且信者皆兄弟。内战初期,北方军队战事不利,后文的女作家茱莉亚·沃德·豪威(也是母亲节的倡议者)遂为此曲填词,取约翰·布朗及耶稣的受难经历激励士兵的战斗激情。今天,这首歌曲在美国广为人知,有“共和国战歌”之誉,在体育竞技和战争困境中常被唱响,具有特别的激励意义。

② 威廉·劳埃德·盖瑞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 1805-1879),美国19世纪废奴运动领袖。参见本章原注6。

“他们是大家的敌人，”一位黑人好战分子怒吼道：“没有一位白人打心眼里在乎黑人”。这时候，约翰·布朗映入我的脑海，但发言人似乎预感到了我会反对，于是说：“你或许会说，约翰·布朗就是那样的白人，但是请记住，他是疯子。”对于这种针对白人的整体攻击，约翰·布朗或许提供了一种反例，但不幸的是，美国历史教科书却把这位有用的人物一笔抹去了。

没有哪位见过约翰·布朗的黑人认为他是疯子。当时的很多黑人领袖——马丁·德拉尼、亨利·海兰德·加尼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以及哈丽特·塔布曼等——都认识并尊敬布朗。塔布曼只是因为疾病缠身才没有参加哈珀斯渡口起义。在布朗就义的那一天，整个北方的黑人商铺停业一天，表示哀悼。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称布朗是“誉满全国的最伟大的英雄之一”。^[21]有一所黑人大学将校址选在哈珀斯渡口。1918年，校友会捐赠了一块纪念布朗及其战友的碑石，碑文写道：“为了这个国家的自由的新生，为了将奴隶制度从美利坚的土壤上根除，约翰·布朗及其21位战友，献出了生命。”

教科书不会将这位“杀人犯”视为英雄，但是，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纳特·特纳^①的众多杀人者却受到英雄的待遇，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教科书描述布朗的那些文字，貌似平实，其实并不中立。随处可见的是，教科书的作者们不再同情布朗，而他们在描述布朗时的语调也几乎与用于其他任何人物的语调都不相同。比如，从他们对待布朗的宗教信仰问题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布朗是位严格的基督徒，他熟读《圣经》，将其中的道德戒令铭记在心。然而，除了《走向今天》外，最近的教科书没有一本赞赏布朗的宗教观，相反，却谴责他的宗教观。^[22]《美国人》两次提到：“布朗相信上帝召唤他为废除奴隶制而战。”但是，布朗其实从来不相信是上帝在命令他，亦即，不是上帝直接给了他指示。相反，布朗深谙基督教的道德内涵，认为奴隶制与基督教是水火不容的。布尔斯廷与凯利称布朗“自封为反奴隶制的救世主”，但其实布朗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救世主。相反，他希望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或者哈丽特·塔布曼参与到自己的事业中来，他认为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将会追随的，更可能是这两个人，而非自己。 181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布朗与纳特·特纳，后者在1831年领导了美国自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奴隶起义。约翰·布朗和纳特·特纳都无情地杀害过白人。两人也都是信教的，但是，与布朗不同，纳特·特纳毁誉不一。在多数教科书中，特纳成为某种英雄人物。有些教科书称特纳“笃信宗教”或称其为“天才的布道士”。没有哪本书会说他是“宗教狂徒”。它们只把这一词留给布朗。即便提出特纳也曾疯狂，

① 纳特·特纳(Nat Turner, 1800-1831),美国废奴运动领袖,曾在弗吉尼亚的南安普顿发动奴隶起义。

也莫过于《美国历史》中的这样一段话：“历史学家尚在争论，特纳是否有精神问题。”但是该书作者很快又证实道：“关键是，几乎每个奴隶都痛恨奴役，几乎所有的奴隶都盼望看到有捣毁这一制度的事件发生。”因此，即便是《美国历史》，也是在强调特纳的行为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而非其据称有问题的心理动机。

教科书不对布朗寄予同情，还表现在它们介绍其在哈珀斯渡口起义之前的生活时的选材上。根据《美国的经历》，“在 19 世纪 40 年代，不知为何，布朗开始对帮助黑奴产生兴趣。”其实，布朗的兴趣并不神秘。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思想，他的父亲是奥柏林学院的理事，而这所学校是当时倾向废奴主义的中心。只要《美国的经历》愿意，它完全可以详述一个众所周知的布朗与黑人的故事：年少的布朗在 1812 年战争期间，与一位黑人男孩成为朋友，由此开始认为黑人其实并不比白人低劣。但相反，这本书所下的结论像是在诬陷。堪萨斯暴乱先于波多瓦托米河杀人事件发生，但教科书的作者们避而不谈堪萨斯暴乱首先是由蓄奴派挑起的，这样一来，布朗在波多瓦托米河地区的杀人行为似乎也是莫名其妙的了。实际上，蓄奴派一开始杀害了 6 名自由土地的拓殖者。在波多瓦托米河事件几个月之后，在堪萨斯的奥沙瓦托密，布朗才帮助 36 名自由土地的拓殖者抵御那些来自密苏里的数百名蓄奴派的劫掠，并因此获得了“奥沙瓦托密的约翰·布朗”这一称谓。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布朗在奥沙瓦托密的所作所为——在那里，布朗是一位防卫者。但是，在 18 本教科书中，有 14 本讲到了他在波多瓦托米河的所作所为——在那里，他是攻击者。^[23]

我们的教科书还对布朗设置障碍，不给他辩护的机会。其实，即便是狱卒，182 也还为布朗提供纸笔！在我所考察的 18 本教科书中，有 12 本没有引用哪怕他说过或写过的一段话。因此，布朗的话语，虽然曾经打动了整个国家，但现在却无法打动学生。

教科书的作者们还回避谈论布朗的思想，因为那些思想带有基督教的色彩。在我们这个国家，宗教是激励和理解人们的各项事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教科书虽然也提到一些宗教组织，如夏克会、基督教科学会，但从来不能认真对待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宗教思想。^[24]如果深入介绍摩门教、基督教科学会或者“大觉醒运动”中的“殉道宗”^①，都将会引起争议。如果提到无神论或自然神论，情况则更糟糕。“你是想告诉孩子，托马斯·杰斐逊不信耶稣吗？我不想！”一位教科书编辑这样对我说。若是中立地、不站在任何教派一边去对待宗教思想，只把它视为一种社会现实，这样的做法也不被接受，因为它会冒犯一些笃信者。对此，教科书的解决办

① “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在此指 18 世纪中期北美的宗教复兴运动，“殉道宗”(Methodism)是其中的一个流派。

法是，整个地把宗教思想搁置一边。^[25]甚至引用约翰·布朗在法庭上所讲的宗教“箴言”——“要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也是会冒犯禁忌的。

意识形态冲突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是有力量的。激励约翰·布朗的事业的那些思想，以及约翰·布朗所树立的榜样，在其长眠于地下之后，仍然在很长时间内发挥着作用。然而，美国历史教科书没有为我们理解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提供任何途经。

毋庸置疑，教科书的作者在忽视约翰·布朗的思想，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布朗的暴力行为使他不配具有值得人们尊重的思想。现在，让我们从美国历史上这位最有争议的人物转到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亚伯拉罕·林肯上来。当然，教科书对亚伯拉罕·林肯是持赞赏态度的。然而，它们仍然尽可能少地谈论他的思想，特别是在种族问题上。亚伯拉罕·林肯一生与种族问题相纠缠，其公开程度比其他任何总统（尤其是托马斯·杰斐逊）更甚，但是与杰斐逊不同，他有时是言行一致的。我们的教科书大多避而不谈林肯的内心冲突。如果它们谈了，那将是多好的教学设计哦！学生们会明白，一个人在说话时会为了安抚或煽动不同的听众，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思想，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去理解他们的言论。如果教科书承认了林肯的种族主义，学生们会认为，种族主义不仅影响了“三K党”极端主义者，而且在我们整个历史上都是“正常的”。而当学生们看到林肯本人如何进行自我斗争，在有色人群中贯彻民主原则时，他们就会明白，思想是可以改变的，而人也是会长大的。

在日常谈话中，林肯也曾像那个时代的很多白人一样，把黑人称为“黑鬼”。¹⁸³在林肯-道格拉斯辩论中，林肯有时会像我们在本书上一章所看到的那样，流露出白人优越论的观点。然而，林肯的种族观念要比道格拉斯复杂得多。道格拉斯曾在芝加哥为白人优越论辩护，宣称这类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次日，林肯做了应答，并实际上清楚地指出这一问题：

我想知道，如果接受那个陈旧的《独立宣言》——它宣称法律面前原则上人人平等，或者对其有所拒绝，那么，限度在哪里？如果有人说这个平等原则不适合黑人，那么为什么别人不能说它不适合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呢？如果《独立宣言》……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就把它撕得粉碎吧！（众呼：“不，不！”）那好，让我们遵守它，让我们坚定地支持它。^[26]

没有一本教科书引用了这段话。林肯对于自己与道格拉斯真正争论的是什么，曾做了响亮的总结，但只有一本教科书没有对这段总结弃之不顾：“这是一个

长期的问题。在道格拉斯法官^①与我自己的话音都消逝之后,这个问题仍将在这个国家延续。它是这两条大是大非的原则在整个世界的永恒斗争。”^[27]

林肯对非裔美国人持有基本的同情,这或许源自他的父亲。林肯的父亲曾举家迁至印第安纳州,部分原因就是厌恶肯塔基州通过的种族奴役制度。或者,林肯对非裔美国人的同情来自于自己 1841 年的一次汽船旅行的经历。多年之后,在写信给老朋友乔希·斯皮德时,林肯回忆道:“你我都记得,从路易斯维尔到俄亥俄的湖口,甲板上有 10 或 12 个奴隶,他们被用镣铐锁在一起。这幅景象一直在折磨着我的心。每次我接触到俄亥俄,或者其他的蓄奴地区,我都看到类似的场景。”后来林肯总结说,这种记忆“极具震撼力,让我感到悲伤不已”。^[28]对这封信或者类似的材料,没有哪本教科书做过引用。

早在 1835 年,林肯任伊利诺斯州众议院议员(首任)时,对一项谴责废奴主义者的提案投了仅有的五张反对票中的一张。一些教科书认为,林肯获得 1860 年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就是由于他在奴隶问题上的温和立场。但实际上,共和党选择林肯,放弃前任被提名人威廉·H. 西华德,部分原因是由于林肯“岩石般坚定地反奴隶制信仰”,而西华德被认为是妥协者。^[29]

作为总统,林肯懂得使用象征手段在改善种族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他任期内,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海地和利比里亚互派大使。1863 年,林肯废除了白 184 宫对工作人员实施的种族隔离制度,后来这种改革扩大到了联邦政府部门,直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职时期。林肯将白宫向黑人侍者开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林肯还努力克服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他曾让助手们去调查把非裔美国人驱逐(委婉的说法是“殖民”)到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可行性。

大多数教科书都提到了林肯“个人”是反对奴隶制的。有两本教科书甚至引用了他 1864 年的一封信:“如果连奴隶制都没错,那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是错误的了。”^[30]然而,大多数的教科书作者都竭力把林肯与在奴隶制问题上的那些不恰当的理想主义观念分开。他们尊敬林肯,主要是因为他“挽救了联邦”。迄今为止,那 18 本教科书中的 15 本所最乐于引用或阐释的,是林肯 1862 年 8 月 22 日致信霍勒斯·格里利创办的《纽约论坛报》所写的这样一段话:

在这场斗争中,我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联邦,而非奴隶制的存废。如果不解放一个奴隶,就能使联邦得以维持,那我就会不解放奴隶。如果要解放所有的奴隶,联邦才能维持,那我就解放所有的奴隶。如果解放一部

^① 道格拉斯法官, Judge Douglas, 斯蒂芬·A·道格拉斯曾任法官;但林肯说这话时,道格拉斯已身为参议员。此系林肯对斯蒂芬·A·道格拉斯的戏称。

分奴隶，而其他奴隶继续被奴役，联邦才能维持，那我也就会这样做。对于奴隶制及有色人种问题，我有所作为，那是因为我认为那样有助于维持联邦。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所忍耐，这同样也是因为，我认为这样有助于维持联邦……

通过强调这一段话，在大多数教科书的笔下，林肯对奴隶制有一种道德冷漠，当然也不关心黑人。《走向今天》指出，“林肯逐渐把结束奴隶制作为结束战争的策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黑人民族主义者也是这样展示林肯的，劝说非裔美国人不要把他想得再好。^[31]

为了塑造这样的林肯，教科书不得不删除了这段文字的语境。它们首先删除的恰恰就是林肯接下来所表达的这样一种观点：“……我已经在这里陈述了我的意图，那源自我对自己官方职务的理解。我一贯主张，所有人、所有地方都是自由的，对此我无意于做任何更改。”当然，林肯这里关于奴隶制所说的话完全不同。因此，除了3本教科书外，几乎其他所有的教科书都忽略了这段话。

接下来，那些教科书还删除了政治语境。每一位历史学家都知道，大多数教科书所引用的林肯致格里利的信中的这段文字，并不只说明他在奴隶制方面的意向。林肯写这封信，目的是争取纽约市民对战争的支持，因为纽约市是民主党（因此也是白人优越论者）在北部最活跃的城市。林肯从来没指望通过宣扬战争会终止奴隶制而赢得这一支持，那样做只会招致反对。因此，林肯所能提出的唯一呼吁就是：支持战争吧！它能维护联邦的完整！林肯其实不是在向格里利呼吁——格里利希望结束奴隶制，而是在向反战的民主党人和反黑人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呼吁，同时也是在向边疆各州的州长呼吁，向反对解放奴隶的北方人呼吁。挽救联邦从来不是林肯的唯一目的。1860年，《克里坦登协议案》出台，作为对宪法的修正案，该法案旨在通过永远保留奴隶制度而维护联邦。在这一“关键时刻”，林肯提出了反对。^[32]没有一位教科书作者对这封致格里利的信的政治背景及其所期待的听众做出解释。在那个夏天，林肯还鼓励支持联邦的人“回到家乡，劝说那里的人民支持你的观点，”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将需要这种反对奴隶制的全部热忱，或许这还不够。”对这段话，也没有一本教科书引用过。如果那些教科书引用了这些话，学生们就会明白，林肯对美国奴隶制问题的反应并不是冷漠的。

教科书在讨论《解放宣言》时，以一种“现实主义政治”(realpolitik)的方式解释林肯的行为。《美利坚民族的胜利》说：“到1862年9月，林肯不情愿地发现，一场至少部分地带有解放奴隶的目的的战争，却会赢得欧洲的支持，并减少国外势力为支持‘联盟’而武装干涉的可能。”的确，作为主政者，林肯必须考虑国际国内

的政治状况,但是。是非观念对于他也同样重要。政治分析家们在当时乃至今天都相信,林肯于1862年9月发布的解放宣言使共和党人在接下来的那个11月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因为北方白人的舆论对黑人自由的支持要到下一年才形成。^[33]林肯之所以仍然那样做,至少部分是因为他觉得那样做是对的。教科书作者们掩盖了这一可能性。从印第安战争到奴隶制再到越南战争,教科书作者们不仅回避提出我们过去的行为的对错问题,而且拒绝承认当时的美国人曾提出那一问题。

亚伯拉罕·林肯是位英语大师。在他就种族关系及奴隶制问题发表演讲时,常常或许要比其他任何总统都更能调动和运用强有力的语言符号,打动公众舆论。但是那些习惯于对一切问题都采用乏味的权威语调的教科书,只是结结巴巴地说出林肯的片言只语。它们所提供的唯一完整的言语或书信就是“葛底斯堡演讲”,但在那18本教科书中,也只有6本做到了这一点。林肯“葛底斯堡演讲”中的那三段话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但这三段话在那些引用了它们的教科书中只占了四分之一页的页面。而且,有5本教科书甚至对这篇演讲只字不提,另外5本教科书只提供了其中的最后一句或一段:“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最愚蠢的是,新版的《美利坚盛典》花了一整页来介绍这一演讲,但一页中的大多数版面都用来展示林肯的手稿,并且为适应版面,将手稿缩得很小,竟难以辨认了!^[34]该书提供的更多的论述,是关于那篇演讲的议论,而非演讲本身,因此没能引用林肯所写的哪怕一段话。

然而,林肯的那些话是重要的,让学生思考那些话更为重要。林肯懂得,从意识形态上看,为自由而战要比单单是为维护一个道德中立的联邦而战,更令人满意。为了挽救联邦,就有必要从“挽救联邦”之外去寻找战争的理由。在葛底斯堡,他做到了。

林肯是一位精明的律师。他深知,合众国脱胎于奴隶制,宪法中至少五处特别提到了奴隶问题。但是,他一开始就说:“我们的父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他们追求自由,极力主张人人人生而平等,至今已有87岁了。”由此,林肯把维护联邦的事业,包裹于《独立宣言》的修辞之内。《独立宣言》强调自由,但当年的很多签名者还都是奴隶主。^[35]这样一来,林肯同时运用《独立宣言》来重新解释联邦事业,并指出,宣言从根本上暗示了全体美国人不分种族一律权利平等。

“现在,我们正投入一场大的内战”,林肯继续说:“它在考验我们这个、或者任何一个经过如此精心构思、如此全力构建的国家能否长存。”林肯更知道:到1863年,其他国家已经加入到了我们的民主事业中来。当时,每一个欧洲国家以及大多数美洲国家都已经废除了奴隶制。但是,我们的内战如何检验它们

是否会一如既往呢？这里，林肯是在用一件旧斗篷掩藏自己的联邦事业。那件旧斗篷代表着“人类的最后和最好的希望”，是对那种圣约观念——合众国与上帝的特殊盟约——的世俗理解。^[36]这种修辞虽然不太符合历史，但作为演讲，极具感染力。因此，这位总统呼吁北方反战的民主党人支持这项为全人类的利益而战的事业。

林肯在提出第三个强有力的语言符号——“勇敢的人们，不论生者还是死者，都在这里战斗”——之后，随即指出，很多人为之死去，这项事业可以结束了：“感谢上帝，这个国家应该从自由中获得新生。”林肯在这里所称的自由是指什么呢？当然是指黑人自由。林肯深知，战争本身正在使奴隶制解体，为挽救联邦而战已变成黑人自由而战。当时的美国公民非常明白林肯的意思。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中，美国人争相聆听和阅读各种政治演说，讨论国是。在各种关于林肯的投票表决中，赞同票的比例之高，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的一份民主报纸《芝加哥时报》曾抨击林肯的这一演讲，但那恰恰是因为“人人生而平等”这一主张。该报称：“如果人人都拥有太多的自尊，不愿宣扬黑人与自己是平等的，或不能承认他们有平等的权利”，那么，联邦就已经完蛋了。^[37] 187

教科书并不需要像我这样去解释林肯在葛底斯堡所说的那些话。“葛底斯堡演讲”寓意丰富，值得做各种各样的分析。^[38]有六本教科书刊印了这一演讲，但其中的四本只是在书页的角落里插入了一个小方框。《走向今天》在这段演讲后提供的述评是相当空泛的。只有《生活与自由》对这段演讲提出了很有思想深度的问题。^[39]结果，我至今没有遇到有哪一位中学生曾花时间对“葛底斯堡演讲”进行思考。 188

更糟糕的是，教科书还不能很好地介绍林肯第二次就任总统时的就职演讲。在这篇堪称美国演说史上经典之作的杰出演讲中，林肯特别区分了作为内战的首要诱因的奴隶问题，与战争进行到惨烈的第四个年头里的奴隶问题。^[40]

如果我们设想，美国的奴隶制度是我们的众多过错之一，只不过它原是秉承了上帝的旨意，必然地来到我们中间，而现在，上帝约定的时间已过，他要它消失。如果我们设想，上帝将这场可怕的战争降于北方和南方，而悲痛缘于那些犯下过错的人们，那么，我们还能认为，这件事有悖于凡是相信上帝永生的信众们都能在上帝身上发现的那种神性吗？

沿着这一思路，林肯接着谈到“天命论”，这种思想对于国家的思想体系来说，在当时要比今天更为重要：

我们深情地期望，虔诚地祈祷，这场浩大的战争的重罚能够很快过去。但是如果上帝要它继续，直至奴隶们 250 年来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或如人们在 3000 年前说过的，从鞭子下流出的每滴血都要从剑下流出的每滴血来偿还，那么今天我们还得说：“主的审判是完全正确和公正的。”

这最后一句话是令人惊奇的，它回味悠长而令人震惊。今天的政治家不再这样说话。当学生们在大声朗读这一段落时，难免会慢慢地、有意无意地去想；它似乎是对美国压迫黑人的原罪的强烈控诉。内战是迄今为止我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经历。然而，林肯在这里说，是我们使得它发生。在他雄辩的上下文里，原罪或犯罪，而不仅仅是悲剧，乃是最恰当的措词。实际上，对美国种族关系的这种控



图2 林肯的木屋

林肯出生于一座小木屋里，这座木屋的传奇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教科书对林肯的态度。真实的小木屋可能在林肯就任总统前就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根据 D. T. 皮特蔡斯利 (D. T. Pitcaithley) 的研究，新木屋建于 1894 年，但样子修建得很滑稽，当时租给了两位公园娱乐设施所有人。后来，木屋又被迁至康尼岛，在那里，这座木屋与杰佛逊·戴维斯总统所诞生于其中的那座木屋（另一个滑稽的木屋）合在了一起。最后，林肯的木屋被缩小，放入了肯塔基的一个大理石结构的纪念堂里，并一直存放到今天。

木屋后来成为孩子们的一个玩具，名叫“林肯的木屋”。它是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 美国建筑师。——译者按) 的儿子约翰·劳埃德·赖特 (John Lloyd Wright) 于 1920 年发明的，它的说明书里居然告诉人们如何将林肯的木屋与汤姆叔叔的木屋建到一起！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木屋还被呈现为一种符号，象征着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从赤贫到暴富的传奇经历。难怪一位大学生在谈到林肯时也会鹦鹉学舌地出洋相：“他出生在一个小木屋里，那是他亲手搭建的。”

诉,在布朗的遗言中已有先声:“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清洗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41]

林肯的第二任就职演说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一个月之后 189
林肯被枪杀时,纽约和俄亥俄的农民们用大幅标语写上其中的段落,向送葬的长队致哀。但是,只有《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使用了这份材料。^[42]另外七本教科书把引文局限在演讲的最后部分,即“以不伤害任何人”的方式去包扎国家的伤口。还有十本教科书则完全忽略了这个演讲。

对于教科书的作者们来说,像海伦·凯勒对社会阶级间的不公正的关注一样,林肯对于种族主义罪恶的关注也似乎是不体面的。让我们别去管它好了!——难道我们必须这样去纪念林肯吗?对林肯的这样一种态度可以被称为“沃尔特·迪斯尼式的解释”:在1964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迪斯尼展区,有一个林肯活动塑像,它能说上几分钟话,但那精心选择的几句话却只字不提奴隶制。

一些教科书回避林肯的是非观念,对内战也如法炮制。实际上,联邦士兵一开始只是为挽救联邦而战,但后来就不再是了,他们后来为“葛底斯堡演说”中所有那些带有隐约预示的思想而战。1862年之后,联邦军队唱起了《为自由而战的呐喊》,这首歌由乔治·鲁特作于同年夏天:

来吧,我们欢迎忠贞、诚实和勇气
——发出为自由而战的呐喊。
虽然,他们很穷,但没人要做奴隶
——发出为自由而战的呐喊。^[43]

的确,今天的人在唱这支歌时,没有人不会认为自由与保护联邦乃是合众国 190
的战争目的;也没有人不会感到那种潜在的联合所具有的的某种力量。这种力量是教科书所忽略的:它们根本不向学生提示思想的重要性。

在反抗白人种族主义方面,非裔美国人的行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奴隶们纷纷逃亡到联邦一方。而被允许参战之后,黑人军队对战争的贡献使白人很难否认黑人也是真正的人。^[44]一位联邦军队上尉给妻子写信说:“很多(白)人认为,所有的黑人都远比自己低劣。但我想,在这里过上几个星期的不带偏见的生活之后,他们就会醒悟。我对黑人的能力产生了比以前高得多的评价。”^[45]今天的教科书作者与几十年前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意识到,要想叙述内战又不提非裔美国人的行为,写出来的只会是糟糕的历史书。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至少全都提到,有超过18万黑人加入了联邦陆、海军部队。有几本教科书还附有非裔美国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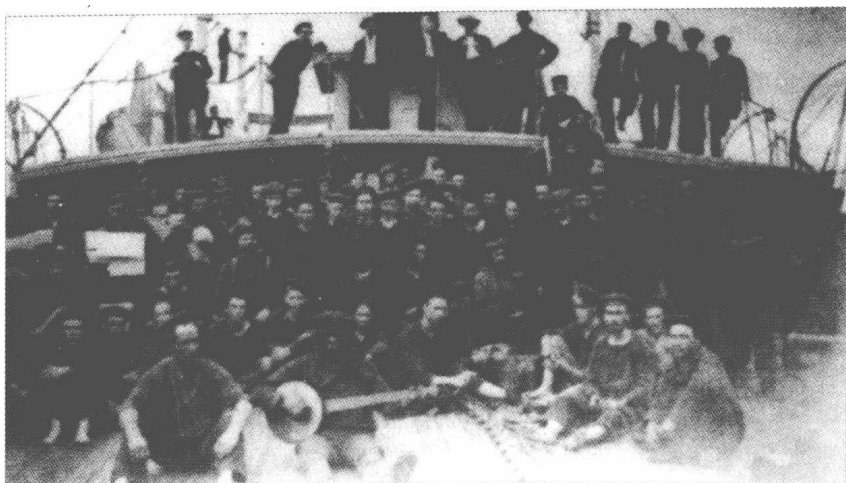


图3 军舰上的士兵

《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中录入的这幅照片令人遐想,照片上是内战中一群“驼号”合众国军舰上的士兵。在1890至1940年美国种族关系的低谷时期,这种种族融合现象消失了。

的插图,并描写了在战争后期之前,他们的薪俸一直是不平等的。^[46]《发现美国历史》还提到,被困在南方的联邦士兵发现奴隶可以提供“宝贵的援助”。然而,只有《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更进一步指出了黑人军队的存在和胜利是如何打击了白人种族主义。^[47]

内战引起的反种族主义在边疆各州特别明显。林肯的《解放宣言》只针对南部联盟,它没有触及特拉华、马里兰、肯塔基及密苏里等支持联邦的州的奴隶制。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种植园主的身份变得模糊了:拥有黑人不再是年轻一代的白人所极力追求的目标,也不再是年轻的白人妇女的出嫁条件。马里兰本是蓄奴州,在战争一开始极力支持南部联盟,但是马里兰同时也支持联邦,并派出几千名士兵守卫华盛顿。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从“正面”证明了认识上的分歧所带来的影响:对马里兰的白人来说,既为反对奴隶主而战,又允许自己的州保留奴隶制度,这种做法的矛盾急需克服。1864年,该州废奴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最后 191 选择投票表决。在未统计那些缺席者的票数之前,投票结果刚刚构成对解放奴隶的反对,后来追加大量的投票后,结果变得支持解放奴隶了。那么,是什么导致马里兰在1864年有那么多的投票缺额呢?显然,是士兵和水手没有参加投票。当这些士兵嘴上唱着《约翰·布朗的兄弟》奔赴战场时,他们的思想也变得热爱自由了,只不过在行动上稍后一步罢了。^[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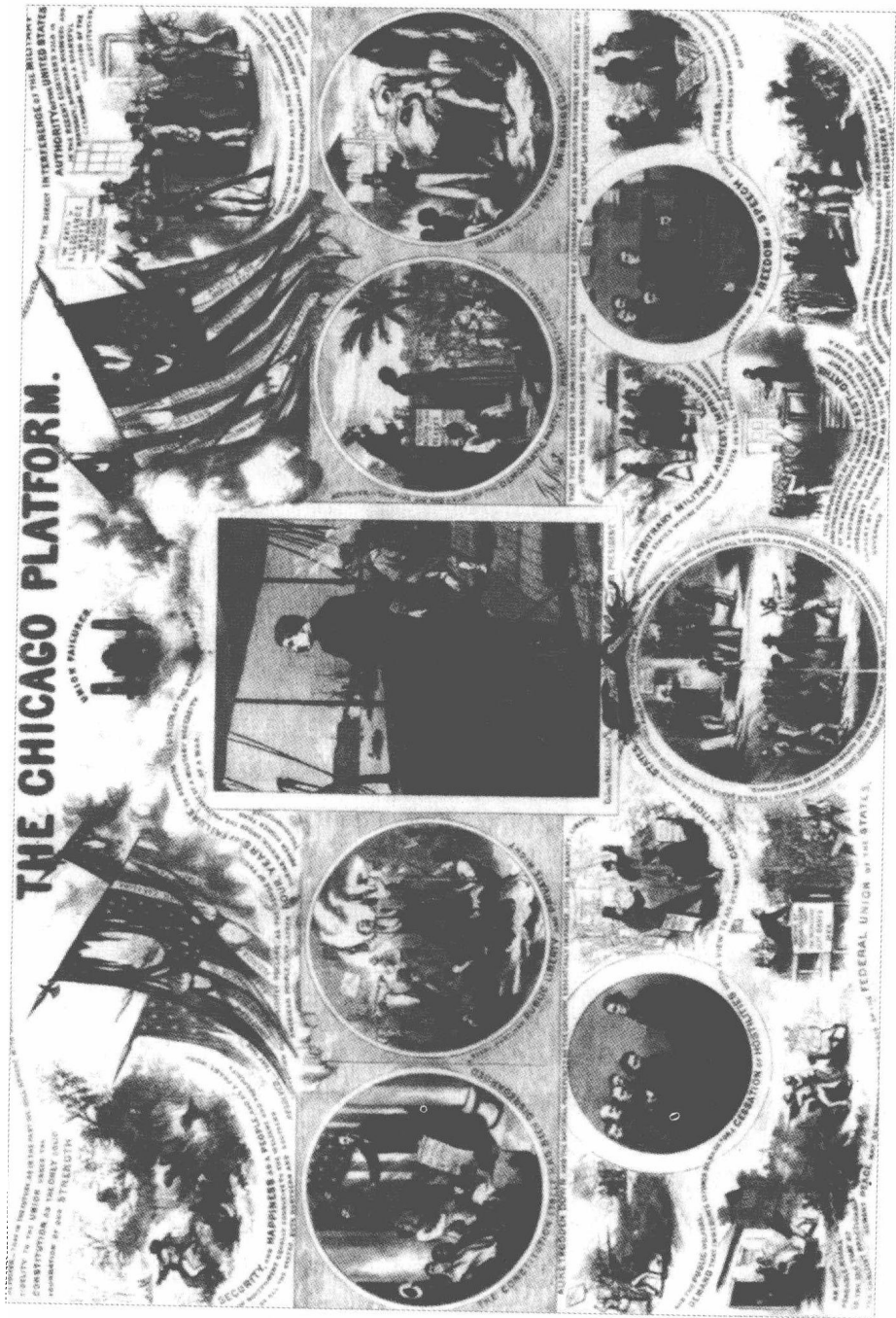


图4 芝加哥论坛

这是《哈珀斯周刊》杂志1864年10月15日的中间插图。该杂志在整个19世纪是共和党的传声筒。图为托马斯·纳斯特年轻时所作，反映的是民主党纲领的缺陷。很难想象今天的政党会以这样一种种族主义理想去寻求白人的选票支持。



图5 捕奴者及其猎狗

民主党的政纲一开始是完全无害的：“我们愿意在宪法之下对联邦忠诚，并视之为我们作为‘人民’所应有的力量、安全和幸福的唯一稳固的基础。”但是，纳斯特的图解对此迎头一击：它向我们展示了捕奴者及其猎狗把不幸的逃亡者追向沼泽。它让读者不禁惊呼：“他们怎么了？他们也是‘人民’啊！”

正如前面一章所指出的，诸如《黑鬼杜多》这类歌曲反映了1864年民主党在竞选总统中的种族主义论调。那么，共和党如何应战的呢？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通过反种族主义而寻求白人的支持。共和党在1864年秋季军事胜利的推动下，卓有成效地开展竞选活动。最终，民主党对种族主义的公开支持走向了失败，而反种族主义的共和党则几乎在所有地方取得了胜利。纽约的一位共和党人写道：“在奴隶问题上的思想变化……是巨大的和历史性的。谁曾料到会发生……这样一场伟大而高尚的革命呢？”^[49]联邦由于其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各地的人民的支持。仅加拿大就有四万人自愿南下支持联邦事业，其中不乏黑人。废奴主义者、参议员查尔斯·萨默说：“思想远比战役重要得多。”此时，战事已近尾声。^[50]

这类思想造成对南部联盟的不利影响。意识形态的冲突甚至在内战爆发前就冲击着奴隶制度。约翰·布朗知道，奴隶主们哪怕是在向废奴主义者信誓旦旦地说奴隶真的喜欢奴隶式生活时，其实内心也很害怕奴隶造反。布朗的哈珀斯渡口袭击之所以在南部引起轩然大波，一个原因就是那些奴隶主们担心自己的奴隶也会加入到布朗的队伍中去。他们谴责布朗，也谴责那些为他提供经济支持的“黑色共和党人”。然而，这些谴责非但没能说服北方的那些中立派，反而将他们推向了废奴主义者的阵营。毕竟，如果布朗确如奴隶主们所说的是个危险人物，



图6 “公共自由与个人权利”

图中文字为：“公共自由与个人权利”，纳斯特以此展示1863年的纽约市征兵骚乱。图中白人暴徒在行使他们的“权利”：鞭打和杀害非裔美国人。图中一个孩子在被倒提着。

那么奴隶制也确是不公正的。幸福的奴隶绝不会反叛。

南方白人把联盟建立在白人优越论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南部联盟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曾说：“我们的新政府的基础就在于以下真理：黑人与白人是不平等的，奴隶应该服从比他们优越的种族，这是其天性使然，是很正常的事情。”联盟士兵进攻联邦，向安铁顿和葛底斯堡进军——这是他们进攻联邦的两场主要战役，就是在把这一意识形态付诸实践。他们在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成批地抓捕自由黑人，把他们送到南方做奴隶。南部“联盟”还虐待被俘的北部联邦的黑人士兵。^[51]历史学家保罗·伊斯科特指出，在整个内战期间，“保护奴隶制一直是联盟的中心目的。”^[52]教科书对此完全不予重视，或许是因为它们不想冒犯今天的南方白人。 194

上一章指出，对州权的关注并没有导致分离。而且，随着战争的继续，南部联盟开始在他们建立的新国家里否认州的权利。早在1862年12月，杰佛逊·戴维斯总统就指责州权对于联盟具有破坏性。弗吉尼亚西部的山区县投向联邦。南部联盟军队占领了东部田纳西，以防止它效仿“西弗吉尼亚”。路易斯安那的温县拒绝脱离联邦。阿拉巴马的温斯顿县宣布成立“温斯顿自由邦”。密西西比的琼斯县的农民和林区居民宣布成立“琼斯自由邦”。除南卡罗莱纳外，南部联盟的每个州都有一个团，或至少一个连的白人士兵，或者黑人新兵加入联邦军队。武装游击战在每个南方州打响。（密苏里除外，1863年纽约的征兵骚乱也除外，北方州很少发生这样的问题。）后来，对于支持南部联盟的人来说，在阿拉巴马、佛罗里达、南卡罗莱纳以及田纳西等州的部分地区旅行，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战争不仅发生在北方和南方之间，也是发生在南部联盟（以及密苏里）内部的联邦派和联盟

派之间。^[53]到1864年2月,戴维斯总统开始绝望:“带有背叛特征的公开聚会,在州权的名义下,开始出现了。”因此说,州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身是矛盾的,从长远看,它并没能起到动员南方白人的作用。

每本新教科书都介绍了州权问题是如何妨碍了南部联盟的事业,但却都忽略了思想在南方的作用。事实上,联盟方面的种族思想甚至更不能服务于其战争目的。按照联盟的意识形态,黑人是喜欢奴隶制的,然而,为了防止他们反叛和逃亡,联盟各州出台了所谓“二十个黑鬼条例”,规定一个白人如果监管二十个以上奴隶就可以免征入伍。整个战争期间,南部联盟从前线撤回了三分之一的战斗力量,把他们分布到奴隶人口较多的地区,以防止奴隶起义。^[54]当联邦允许非裔美国人入伍时,联盟方面迫于其意识形态的局限,断言那不会奏效——黑人几乎不可能像白人那样作战。“第54马萨诸塞有色人种团”以及其他黑人连队都以其无可辩驳的英勇气概驳斥了黑人低劣论。接下来发生了更不相称的行为:南方白人对黑人战俘采取了真正野兽般的行径,比如,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①把黑人囚犯钉在195帐篷架上,然后把他们活活烧死,他还指挥军队实施针对黑人的“皮洛堡大屠杀”。而所有这些都,都是在保护白人文明的名义下发生的。^[55]

在维克斯堡陷落之后,戴维斯总统提议将奴隶武装起来为联盟而战,并且为了赢得他们的合作,向他们许诺自由。但是,既然据称奴隶是奴隶制度的支持者,奴役是他们的最好状态,那么,自由怎么成了对他们的奖赏呢?黑人的行为证明了奴隶真的珍视自由。有几本教科书讲到奴隶制度如何在联邦军队逼近时土崩瓦解,但是作者们遗漏了一点:奴隶的逃亡引起了奴隶主内部的意识形态混乱。矛盾越积越多。为了赢得外部支持,有一些联盟领导人提议完全废除奴隶制度。一些报纸编辑也为此造势。“虽然奴隶制度是我们一开始为之而战的一项原则”,《杰克逊密西西比人报》写道,但是,如果要想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就必须废弃奴隶制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废弃它吧!”“阿波马托克斯^②受降”前一个月,南部联盟议会通过了一个征召黑人士兵入伍的标准,这说明战争是如何使奴隶主也提高了对黑人能力的估价,并充分暴露了意识形态的混乱。毕竟,黑人新兵们是为什么而战呢?为奴役,还是为脱离联邦?就此而论,一旦黑人也被武装起来了,南方白人军队又是为什么而战呢?正如佐治亚的豪威尔·柯布^③所说的,“如果奴隶能成为好的战士,那我们的整个奴隶制理论就都是错误的。”^[56]

早从1862年开始,一些联盟士兵就转变了立场,其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观

① 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联盟将领。

② 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位于弗吉尼亚,1865年4月9日北方军队在此接受南方军队的投降。

③ 豪威尔·柯布(Howell Cobb),美国内战时期南方政治家,一开始主张维护联邦,后又主张脱离联邦。

念上的冲突。当谢尔曼^①开始他那著名的从亚特兰大到萨凡纳港的“向海洋进军”时,他的部队的确壮大得很快,几千名南方白人自愿加入到队伍中来。同时,与谢尔曼对阵的联盟士兵中有三分之二都开了小差。^[57]还有多达1万8千名奴隶加入到谢尔曼的军队中,以至于军队不得不解散他们中的一部分。这些,都与教科书通常关于谢尔曼在南方各州沿途烧杀抢掠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

一方面是联盟在意识形态上日益混乱,另一方面是联邦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日益增强,这有助于说明联邦为什么胜利。卡勒顿·比尔斯说:“即便在形势全面艰难的情况下,南方其实也一直有强大的资源和人力。”很多国家、很多人都一直在用非常落后的武器和战术作战。比尔斯认为,南部联盟的意识形态冲突才是其最严重的缺陷,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比尔斯告诉人们,到1865年春,德克萨斯等州的联盟军队是如何在联邦军队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就开始涣散了。杰佛逊·戴维斯总统也曾指出,在后方,“民心开始涣散。”^[58] 196

为什么教科书缄口不提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是南部联盟的缺陷呢?^[59]毕竟,内战总是事出有因的,而有因就必有果,教科书应该告诉我们那些原因是什么。^[60]

这种沉默延续了很久。在整个20世纪,教科书一直将内战视为“本质上一致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在美国种族关系的最低谷(1890-1940),人们开始心照不宣地认为,南方白人与北方白人都一样是美国人,^[61]在那些年代,北方白人和南方白人达成了和解,一致对抗非裔美国人;这样,废奴主义者成为了坏人。

当低谷来临时,当时有“联盟灰鬼”^②之称的南部联盟上校约翰·S. 莫斯比(John S. Mosby)对历史学家在内战为何发生问题上制造迷雾而深感沮丧。他1907年写道:“南方是因奴隶制问题而战”,希望以此恢复历史的原貌。他引用南卡罗莱纳的脱离联邦宣言,并轻蔑地说道:“南卡罗莱纳应该知道自己是为为什么而脱离联邦。”到20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共和国大军”的联邦老兵组织抱怨美国历史教科书在描写内战时“没有指出”联邦的事业是正义的。“联盟之女联合会”显然为出版商带来了更大的压力。^[62]该组织除了影响到教科书,使其以一种同情的语调去描述南部联盟外,甚至在威斯康星建立起一座塑像,以纪念联盟阵亡将士。碑文宣称:将士们“为击退违宪的入侵者、为保卫人民所保有的权利、为不朽的州的主权而献身。”^[63]碑文只字未提奴隶制乃至分裂问题。

到今天,历史教科书仍然将联邦与联盟的各自同情者同样视为理想主义者。

① 威廉·特库赛·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 1820-1891), 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联邦军队将领。

② 在美语中,灰色(Gray)有时指美国内战中南部“联盟”军队的士兵。

北方为了维护联邦而战；而根据《美国之路》的说法，南方各州“为了保卫自决的权利与自由”而战。没有人是为了保护种族奴役而战，也没有人是为了废除它而战。结果，与纳粹的十字党徽不同——它毕竟太可耻了，即便是在北方，白人今天仍在把南部联盟的“星杠旗”(Stars and Bars)大肆渲染在寓所墙壁、各种证件、T恤衫以及中学校训上。甚至一些北方(白)人也在为那项所谓“失败的事业”感到隐隐的遗憾。似乎，那种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乡愁”。^[64]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波马托克斯受降”已成过去，联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97

“阿波马托克斯受降”五天后，林肯总统遇难。他的殉难使联邦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深入人心。即使当初反对解放奴隶的白人现在也同样称林肯为伟大的解放者。^[65]在共和党的领导下，国家进入“重建”时期，这是一个仍然存在意识形态冲突的时期。

一开始，南部联盟以它们的奴隶法典以及内战前关于黑人自由的各种限令为基础，通过了一批新的法律，试图以此来维持战前的形势。密西西比是第一个通过严酷的《黑人法典》的州。然而，那些法律并没奏效。内战改变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的火焰里铸造起来的新的反种族主义，主宰北部思想潮流达十年之久。《芝加哥论坛报》是共和党在中西部的最重要的机关报纸，它对此反应激烈：“我们要告诉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们，你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安葬着我们的战士们的尸骨，飘扬着自由的旗帜，而北方人要把这个州变成一个癞蛤蟆鼓噪的池塘，然后用这样的法律来羞辱它。”^[66]这样，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黑人民权再次成为中心问题。“支持国会，你就是在支持黑人，”民主党人竞选时在一幅鄙视非裔美国人的漫画中这样说，“支持总统，你就是在保护白人。”^[67]但北方选民并不买账。他们向国会回敬了一批“激进的”共和党人，那些人大声谴责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任用前联盟派人士。比1864年更进一步的是，共和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1866年国会选举时，反种族主义成为国家政策，为绝大多数选民所接受。尽管约翰逊反对，国会和一些州还是通过了《第十四条修正案》，使所有的人都具有公民身份，并保证他们“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我们的宪法中为黑人写下的这些散发着光芒的宝贵段落，表明了共和党政府官员是多么地富有理想，特别是当我们想到，维护妇女的类似立法在今天仍无法获得通过。^[68]

在重建期间，各色人等涌向新的民政“前线”，与南部新获自由的非裔美国人一起工作。其中很多人是北方黑人，包括欧柏林学院的毕业生。下面这段话，选自黑人妇女埃德蒙尼亚·海格特的一封信，她曾来到南方一所学校教书，在信中描述了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拉法叶特教区的生活。

我的学生多数来自种植园，离校三四英里甚至八英里远。他们如此渴望学习，为了不迟到，每天早早起床，走很远的路。

学校常常遭到敌视。我在房间里曾两次遭到枪击。我的夜校同事也被枪击但幸免于难。一周前，一个获得解放的老人在过马路时被射中，一只胳膊和一只腿伤势很重。这里的闹事者威胁要烧毁我学校和我赖以起居的校舍，只不过现在他们还没有真的下手伤害我们。能给我们提供保护的最近的军队也在 200 英里之外的新奥尔良。^[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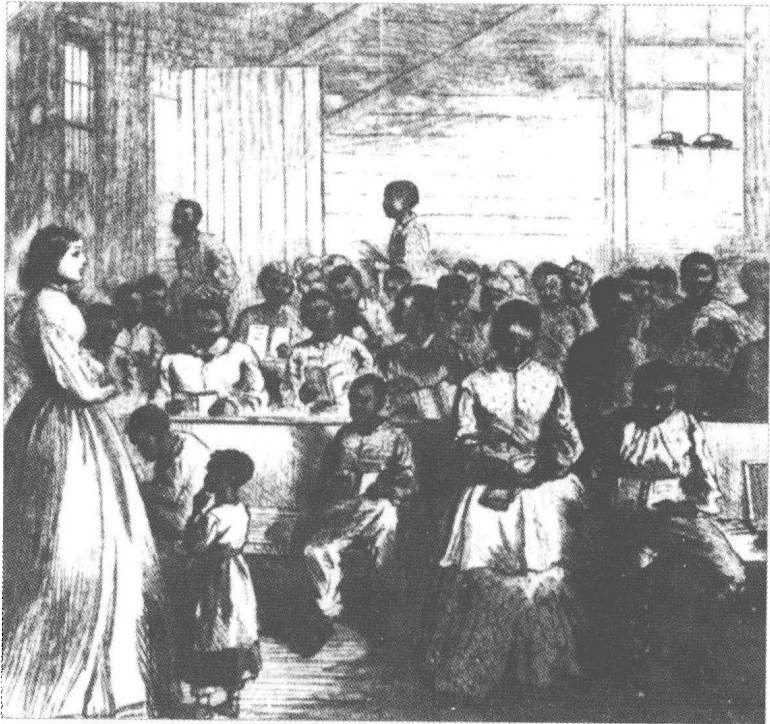


图7 “掮包客”

左边的这位白人妇女——教科书称这种人为“掮包客”(carpetbagger)——几乎没想过要通过在维克斯堡教书而发财。这幅画就作于这个地方。这位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在重建期间教非裔美国人的大人小孩读书识字。

一些联邦士兵复员后就留在了南方。一些想要从政的北方共和党人也来到南方，在战前没有共和党组织的地方组建自己的政党。有些人来到南方希望通过选举或任命获得一官半职。很多废奴主义者继续他们的事业，在“自由人事务署”¹⁹⁹或私人机构工作，以帮助黑人取得完全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从党派渊源上看，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共和党人；从其他方面看，则是各色人等。在那 18 本教科书中，除一本外，其余全部照常使用“掮包客”这一诋毁性的术语去描述重建期间生活

在南方的北方白人共和党人，但不加任何注释，通常也不指出其中所带有的偏见。^[70]

很多出生在南方的白人支持重建。每一个南方州都以自己州的联邦主义者为荣，其中有些人还曾自愿参加联邦军队。他们中大多数人成为共和党人。一些以前的联盟派人士，包括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将军，这位葛底斯堡战役中李将军麾下的又一名大将，后来也变成了共和党人，因为他们渐渐相信，黑人的平等权是合乎道义的。一位名叫罗伯特·弗鲁努瓦的密西西比种植园主，曾经组建了一支联盟连队，但后来解甲归田，因为“我的内心存在着冲突”。内战期间，他一度被逮捕，原因是他鼓励黑人叛逃到联邦战线。重建期间，他协助组织共和党，出版报纸《平等权》，并主张废除密西西比大学以及其他新建的公立学校系统里的种族隔离制度。^[71]共和党的政策，包括免费公共教育这项以前从来没有在南方各种族孩子身上真正实施过的政策，说服了一些贫困白人投票支持共和党。很多以前的辉格党人也变成了共和党，而没有加入自己的旧友民主党。一些南方白人变成共和党人，因为他们相信黑人普选权已既成事实，他们更希望把黑人一方的政治力量拉到自己一边，而不是失去他们。其他的人变成共和党人，以便与共和党新政府保持联系并在一些项目中中标。重建期间，在南方派往国会的113名白人共和党议员中，有53名是原来的南方人，并且有很多人来自富裕家庭。^[72]总体来看，这是一支新的力量，占据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白人人口，并在某些县占据了多数。然而，对于这些南方白人共和党人，只有一本教科书没有照常把他们贴上“南赖子”(scalawags)这样的不雅的旧标签。^[73]

南方白人民主党人杜撰出“掳包客”和“南赖子”这两个术语，以诋毁他们的对手。那时，密西西比的一些报纸，至少是《共和党人》，更常使用“掳包客”或“南赖子”这类术语。“掳包客”暗指北方的社会渣滓，用一个毯子包裹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来到南方，想从那些“受挫的南方(白人)”身上碰运气。“南赖子”就是“流氓恶棍”。重建很久之后，在种族关系的低谷时期，美国白人，不论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都发现很难相信北方白人来到南方是为了帮助黑人，而不带其他的目的；于是，这两个术语被精心挑选出来。如果教科书的作者们解释了这两个术语流行于何时，又为什么会流行，那么，学生们就会了解到关于重建、低谷时期以及历史写作的一些更重要的内容。在这方面，最接近正确的表达可以说是《美国人》中的这样一段话：“虽然‘南赖子’和‘掳包客’这两个术语是由政敌强加的负面标签，但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两群人时仍在使用它们。”这样，与其他所有的教科书一样，《美国人》使用这两个术语时，没有做任何注解，好像它们是恰当的历史标签似的。

再看一下《走向今天》中所列的以下牺牲于“三K党”暴行之下的人的名单：

“掳包客、南赖子以及发迹的被解放者，甚至那些目不识丁的人”。为什么不直接说“共和党人——白人及黑人共和党人”呢？还有，《美国的传统》也说：“虽然南方白人竭力反对，但激进派当权者不是以黑人，而是以‘掳包客’和‘南赖子’为主。”当然，所谓“南赖子”实际上都是些南方白人，但是这句话却把他们从南方白人中一笔勾销了，就像那些顽固不化的联盟派所惯常做的那样。把完全合法的政府说成为“当权者”，也是一种使它非法化的修辞。《美国的传统》的这种伎俩不适合描写任何其他政府，甚至也不适合描写 1836 年的“德克萨斯共和国”以及 1893 年杜尔在夏威夷发动的政变^①。

的确，一些新版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不再将那些参与南方政治与社会活动的北方人诋毁为“不诚实的冒险家，他们唯一想的就是用自己的同党来丰满自己的羽翼”——《美利坚民族的兴起》1961 年如是说。但是，民权运动又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今天的一些教科书作者们，由于曾亲眼目睹北方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来到南方帮助黑人赢得了民权，因此能够对那些在重建期间与南方黑人并肩战斗的北方人怀有更多的同情。^[74]以下一段关于所谓“掳包客”的描述选自 2003 年在《美利坚民族的兴起》基础上改写的《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

共和党人——不论是白人还是非裔美国人——急切地参加（南方——译者按）各州大会。他们的到来，增加了很多南方白人的怨恨。南方白人把这些北方共和党人称为“掳包客”。他们笑话这些新来者“是来自最低阶层的潦倒的冒险家”，用一块毯子包裹起自己的全部家当——那真是最便宜的手提箱了。

201

而关于“南赖子”，该书写道：

以前的联盟派极其蔑视那些曾经支持联邦的事业现在又转而支持重建的南方白人。他们把这些人称为“南赖子”，或者“流氓恶棍”。在他们的眼里，那些人是“南方的变节者，其族、其国的叛徒”。

这种新写法使作者本人脱离了与这些诋毁性词语的干系，使它们出自“很多南方白人”之口，但是这些词语本身从没受到什么指责。相反，它们需要被记

^① 1893 年，夏威夷的里欧卡拉尼女王被推翻，成立了亲美的临时政府，由珊佛 B. 杜尔 (Sanford B. Dole) 监督。前文德克萨斯共和国也有类似经历。

住,这就是使用黑体字的原因。教科书还用贪婪来“解释”那些相信黑人应该享有民权和政治权利的白人。当然,这些作者尽可以用“个人所得”这一说法去贬低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始祖移民”到乔治·华盛顿,再到杰基·罗宾逊^①等每一位教科书里的英雄。但是它们没有那样做。教科书把自私动机只加到它们不予同情的那些人物身上,比如重建时期的那些理想主义者身上。“掳包客”、“南赖子”这类带有欺骗性、诋毁性的术语紧紧地粘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了牢固的消极影响,而那些更恰当的术语——“很多南方白人”——则很可能被人们遗忘。

重建期间的每一个在南方支持黑人权利的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一事业。在重建初期,单单是到学校去给学生上课都可能在路上受到生命威胁。重建接近尾声时,在很多社区,如果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也会遇到生命威胁。一些支持重建的人确在经济上受益,但是,这种挣钱方式很危险。教科书需要告诉人们这些危险,也要展示多数敢于冒险者心中怀有的种族理想主义。^[75]

但是,多数教科书剥夺了我们了解那些种族理想主义者的机会——包括从被它们忽略的海格特和弗鲁努瓦,到被它们视为狂徒的布朗,再到被它们抹去理想主义的林肯。在这些事件中,林肯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布朗在哈珀斯渡口想要完成的事业,即,帮助非裔美国人动员起来与奴隶制作战。最后,与约翰·布朗一样,亚伯拉罕·林肯成为一位烈士和英雄。当时,七百万美国人——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站立着目送林肯的出殡队伍。^[76]非裔美国人哀悼得特别强烈。时任海军部长的吉迪恩·韦尔斯在总统停止呼吸前一个小时的黎明时分正步行在华盛顿大街上,他对当时的情景描写道:“特别是有色人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们的数量甚至比白人还多。”韦尔斯接着讲到,整整一天,“在白宫前的大街上,几百位黑人——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为痛失总统而哭泣,在寒冷而潮湿的天气里,人群似乎并没有变小。”非裔美国人的悲痛,既非被误导,也不是出于幼稚。正如林肯总结的,奴隶问题必须解决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为之付出了生命。^[77]亚伯拉罕·林肯,尽管有着种族主义及其他一切缺点,最终成为黑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就像先前的约翰·布朗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布朗与林肯的被害,是因为同样一桩事业,即,为了黑人的自由。全世界的人都会为他们的死感到悲伤。



图8 哀悼林肯

在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这些非裔美国人聚集在法院大楼前，倾听和证实林肯去世的消息，表达他们的悲伤，或许，也是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寻求某种保护。

但是，当我在开课第一天问我的（白人）大学生，在他们心中，谁是美国历史上的英雄时，在一百个学生当中，只有一两个人提到了林肯。^[78]那些提到林肯的人，即使知道林肯是“真正的伟人”，也并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他们的无知很能说明问题——毕竟，在教科书中，林肯几乎是空洞乏味的。更没有学生选择约翰·布朗。也没有人提到哪怕是一位白人废奴主义者、一位重建时期的共和党人，或者一位白人民权烈士。然而，同样是这些学生，却同情美国为改进种族关系所做的斗争。他们通常较多选择的是一些非裔美国人，从索杰纳·特鲁斯^①、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到罗萨·帕克斯、马尔科姆·X。

约翰·布朗受审时，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曾说到布朗在历史上的地位。菲利普斯预见到，奴隶制是一件不合时宜的制度。他向未来的“美国人民”发问，当未来奴隶制终于在“20世纪的文明社会中”消亡时，“当那一天来临，人们将如何思考这些先驱？谁将教会我们如何生、如何死？”^[79]菲利普斯的问题意味深长。他做梦也没想到，美国人会对那些帮助引领国家废除奴隶制的人感到不满，教科书会把布朗那一小帮人贴上不是被误导者就是狂徒的标签，把布朗本人说成是疯子。^[80]

反种族主义是美国献给世界的伟大礼物。其意义远远超越种族关系之外。

① 索杰纳·特鲁斯 (Sojourner Truth, 约 1797-1883), 美国废奴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原名伊莎贝拉·鲍姆弗里 (Isabella Baumfree), 改名后的姓 Truth 意为“真理”, 名 Sojourner 意为“旅居者”。

反种族主义导致了内战后“自由的新生”，并且那还不局限于非裔美国人。两个世纪来，黑人权利运动两次触发了女权运动，一个世纪一次，并且这两次都使我们一度萎缩的民主精神得到复兴。在这个世界上，从南非到北爱尔兰，被压迫人民的各种运动一直从我们的废奴主义者身上或民权运动中借用策略和话语。在东德，在反共产主义者的早期的秘密会议上，也唱着《我们一定会胜利》^①这支歌曲。伊朗人用从梭罗和马丁·路德·金那学来的非暴力手段，去推翻他们所憎恨的“沙阿”^②政体。在胡志明临终前，其河内官邸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本约翰·布朗的传记。亚伯拉罕·林肯的思想与其他英雄人物的思想一道，也曾鼓舞了中国的年轻学子，他的话语曾在学生们的口中传颂。^[81]然而，虽然我们美国的那些反种族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称羨，但我们似乎失去了这些英雄的儿女。我们的教科书应该表现他们的理想主义，让我们能够珍视自己的这种传统。

注释

[1] Frances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 (New York: Vintage, 1980), 151.

[2] John Brown quoted by Henry David Thoreau in “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 in Richard Scheidenhelm, ed., *The Response to John Brown* (Belmont, CA: Wadsworth, 1972), 58.

[3] 同上, 57.

[4] Said to Rev. M. D. Conway and Rev. William Henry Channing and quoted in Carl Sandburg, *Abraham Lincol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54), 315.

[5]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 151. Paul Gagnon 也指出，教科书同样低估了美国革命的世界影响，见 *Democracy's Half-Told Story* (New York: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1989), 46-47.

[6] 很多教科书的作者的确描写了威廉·劳埃德·盖瑞森 (William Lloyd Garrison)、西奥多·韦尔德 (Theodore Weld) 的事迹，有时也提到其他的一些废奴主义者，但是没有提到他们的言论和思想，也没有对他们寄予同情。索杰纳·特鲁斯 (Sojourner Truth)、哈里特·塔布曼 (Harriet Tubman) 以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① 《我们一定会胜利》(We Shall Overcome), 美国的一首广为传唱的描写抗议者心声的歌曲，为美国民谣大师皮特·希格 (Pete Seeger) 所作，深受马丁·路德·金的推崇。

② “沙阿”，shah，指伊朗的国王及其君主政体。

(Frederick Douglass)等黑人废奴主义者则在教科书中比较活跃。《美国的经历》是个例外，它对撒迪厄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予以了热烈的评价和广泛的介绍。《发现美国历史》是一本探究型的教科书，它引用了很多盖瑞森的话，学生们可以据此了解他的立场。

[7] Sara Robinson, *Kansas: Its Interior and Exterior Life*, Ch. 16, "The Attack upon Lawrence," kancoll.org/books/robinson/r_chap16.htm; Marvin Stottelmire, "John Brown: Madman or Martyr?" *Brown Quarterly* 3, no. 3 (Winter 2000), brownboard.org/brwnqurt/03-3/03-3a.htm#cap1, 9/2006; Louis A. DeCaro, Jr., *John Brown—The Cost of Freedo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2007), 41–42.

[8] 不愿意参加反叛的奴隶听任自便。

[9] Hannah Geffert and Jean Libby, "Regional Involvement in John Brown's Raid on Harpers Ferry," in T. M. McCarthy and J. Stauffer, eds., *Prophets of Protest* (New York: New Press, 2006), 173–75; Jean Libby, ed., *John Brown Mysteries* (Missoula, MT: Pictorial Histories Publishing, 1999), 16–21, 25, 29–35.

[10] 当然，怀斯说布朗是健全的，目的是为了能绞死他；而布朗的辩护者们声称布朗有精神疾病，那也是为了他获释。关于布朗的精神状态的最好证据是他自己的书信、声明和会谈，而这些材料都不能证明布朗是精神有问题的。参见 Stephen B. Oates, *To Purge This Land With Bloo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329–34. 怀斯的那封信 "Message to the Virginia Legislature, December 5, 1859," 再版于 Scheidenhelm, ed., *The Response to John Brown*, 132–53; 他对布朗的评论见其中的第 143 页。怀斯的话还被引用于 Henry David Thoreau in "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 中第 51 页关于精神问题的部分。

[11] 正如布朗在法庭上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每个人“自愿地与我走到一起”。这句话，哪怕是对他的儿子们来说，也是正确的。

[12] Letter to Judge Daniel R. Tilden, 11/ 28/ 1959, 引自 Barrie Stavis, *John Brown: The Sword and the Word* (New York: A. S. Barnes, 1970), 164.

[13] John Brown, "Last Words in Court," in Scheidenhelm, ed., *The Response to John Brown*, 36–37.

[14] Thoreau, "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 in Scheidenhelm, ed., *The Response to John Brown*, 53.

[15] George Templeton Strong quoted in Daniel Aaron, *The Unwritten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4.

[16] Letter quoted in William J. Schafer, ed., *The Truman Nelson Reade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9), 250.

[17] Stavis, *John Brown: The Sword and the Word*, 14, 167; Richard Warch and Jonathan Fanton, eds., *John Brow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3), 142.

[18] 因此,这首歌曲有始有终,因为它以卫理公会教派的赞美诗为开头:“兄弟,你们是否会相遇,在迦南的乐土?”Leon Litwack 描述了波士顿的这一幕,见 *Been in the Storm So Long*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77-78. 好莱坞最后也将此搬上银幕,片名为《光荣》(*Glory*, 1990)。

[19] John Spencer Basset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23), 502.

[20] 当前的《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最终放弃了这类说法,不再讨论布朗的精神问题。

[21] 参见 Benjamin Quarles, *The Black Abolition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244.

[22] 《走向今天》也从未提到布朗是信教的。

[23] 参见 Oates, *To Purge This Land With Blood*, 对布朗的活动做了完整的介绍。

[24] 《美利坚盛典》最为接近,它将宗教作为社会制度做了充分的介绍,并对一些宗教思想做了讨论。至于其他方面,我赞同 Robert Bryan 在 *History, Pseudo-History, Anti-History: How Public School Textbooks Treat Religion* (Washington, D. C.: Learn, Inc., 1984), 3 中的评论:在介绍到“始祖移民”清教徒之后,基督教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就不再出现了。另见 Paul Gagnon, *Democracy's Untold Story: What World History Textbooks Neglec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1987); Charles C. Haynes, *Religion in American History*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1990); and William F. Jasper, “America's Textbooks Are Censored in Favor of the Left,” in Lisa Orr, ed., *Censorship: Opposing Viewpoints* (San Diego: Greenhaven, 1990), 154-59.

[25] 一些右翼教科书批评者恰恰为此感到愤怒,正如 Mel Gabler,《生命与自由》的一位评论者指出的,“很明显,如果承认阿拉帕霍人(Arapaho)是有信仰的,出版商们不会感到有什么担心,那么,为什么说到那些更值得一提的过去或现在的(非印第安)美国人时,情况就不同了昵? (Deborah L. Brezina [n.p., typescript distributed by Mel Gabler's Educational Research Analysts, 1993], 7). 不幸的是, Gabler 的书评者们只想对宗教问题,并且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基督教做正面评价,

因此，我们反对其他的教科书把本杰明·富兰克林说成是无神论者。

[26] Paul M. Angle, *Created Equal? The Complete Lincoln-Douglas Debates of 185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41.

[27] 新版《美利坚盛典》精选了一段话，这段话反映出，林肯与道格拉斯都认为白人在与黑人的社会交往中应该享有优越地位，但林肯指出黑人也有平等的权利。

[28] Richard Current, *The Lincoln Nobody Know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0[1958]), 216.

[29] Richard H. Sewell, *A House Divid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74-75.

[30] 《美国的经历》和《美国历史》引用了林肯写给 Albert Hodges 的信，April 4, 1864. 该信的完整内容见 Herbert Aptheker, *And Why Not Every Ma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61), 249.

[31] 比如，参见 Jehuti El-Mali Amen-Ra, *Shattering the Myth of the Man Who Freed the Slaves* (Silver Spring, MD: Fourth Dynasty Publishing, 1990), 21. Amen-Ra 是一位“非洲”(Afrikan)民族主义者，来自巴尔的摩，像教科书作者们一样编辑了林肯的信，对其加以贬低。

[32] 该法案由边疆各州提出，它有可能推翻“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决，恢复《密苏里妥协案》，保证奴隶制在南方得以永久保存。林肯不可能赞同《密苏里妥协案》，他引导共和党国会议员不要支持它。如果没有共和党的支持，这差一点就在国会两院失败。一些新教科书的确提到林肯对《克里坦登妥协案》的反对。

[33] V. J.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62-63, 128-50.

[34] 《美利坚盛典》放大了最后半句话，因此可以勉强看见。

[35] 同年稍晚，林肯打算将感恩节设立为对国父们创制合众国的纪念。

[36] 为防止这种分析使林肯显得过于种族主义，请注意一些欧洲人，包括托克维尔，以及很多 19 世纪的美国人都相信，合众国是未来世界的榜样。见 Abbott Gleason, “Republic of Humbug,” *American Quarterly* 44, no. 1 (3/1992): 1-20; and G. D. Lillibridge, *Beacon of Freedo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5).

[37] Quoted in M. Hirsh Goldberg, *The Book of Lies* (New York: Morrow, 1990), 79-80.

[38] 知识界仍然在争论这一演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涵义。其中有：

Clarence Thomas,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Winston-Salem, NC: The Tocqueville Forum, 4/ 18/ 1988); Garry Wills, *Lincoln at Gettysbur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Robert Lowell as described in Allan Nevins, ed., *Lincoln and the Gettysburg Addre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4), 88-89; Robert Bellah,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Daedalus* (Winter 1967): 1-21; Willmoore Kendall, "Equality: Commitment or Ideal?" *Intercollegiate Review* (Fall 1989): 25-33; and Harry V. Jaffa, "Inventing the Gettysburg Address," *Intercollegiate Review* (Fall 1992): 51-56.

[39] 《美利坚民族的胜利》提出了两个问题,但又把那两个问题掩藏在两页篇幅的诸如“重要术语回顾”及“关键思维技巧训练”等内容里,然后这一单元就结束了。

[40] 出于同样的理由,Paul Gagnon 也认为,“所有的教科书都应该重新完整地介绍(林肯的第二任就职演说)。”见 *Democracy's Half-Told Story*, 70-71.

[41] 参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138.

[42] 《走向今天》也包含了另外一句关于奴隶制问题的话。

[43] 诗句引自 James M.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vi.

[44] 见 Carleton Beals, *War Within a War* (Philadelphia: Chilton, 1965), 145-50.

[45] 引自 James M. McPherson, "Wartim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12, 1990, 33. 根据 Litwack, *Been in the Storm So Long*, 100, 黑人士兵使人们产生了“思想革命”。

[46] 《美国的冒险历程》,《自由的挑战》,《发现美国历史》,《发现美国历史》以及《生活与自由》都很好地处理了黑人士兵问题。

[47] 特别敏锐的读者或许还能从《美利坚之旅》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中推论出这一点。

[48] Bill Evans 指出(在一次个人谈话中, 12/ 1993),另外一个因素也形成了对边疆州废奴主义的支持,那就是,一些同情奴隶制的人在联盟军队中作战,因而没有参加投票。

[49] 转引自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688 (his ellipses).

[50] Hugh L. Keenleyside,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Knopf, 1952), 115; Apthek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egro*, 159; Charles Sumner, speech, 6/1/1865.

[51] 只有《美国的冒险历程》这本探究型的教科书提出了这一点。《美利坚盛

典》提供了一段废奴主义者 James Russell Lowell 就南部为什么要脱离合众国所说的话。此外，虽然现在全国都在误传所谓南方的“黑工厂”(raison d'être)，并且这段话能够对此予以澄清，但仍没有教科书引用它。见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649; Reid Mitchell, “The Creation of Confederate Loyalties,” in Robert Azug and Stephen Maizlis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Race and Slavery in Americ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6), 101–2.

[52] Paul Escott, *After Secess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54.

[53] James W. Loewen and Charles Sallis, eds., *Mississippi: Conflict and Change* (New York: Pantheon, 1980), 129–31; Beals, *War Within a War*; Mitchell, “The Creation of Confederate Loyalties,” 93–108.

[54] Beals, *War Within a War*, 12, 142; see also Stavis, *John Brown: The Sword and the Word*, 100–101.

[55] John Cimprich and Robert C. Mainfort Jr., “The Fort Pillow Massacre: A Statistical Not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2 (12/ 89), 832–37; Brian S. Wills, *A Battle from the Start* (NY: Harper, 1993), 77–78, 178, 186–93, 215; David Ndilei, *Extinguish the Flames of Racial Prejudice* (Gainesville, FL: I.E.F. Publications, 1996), 40, 91, 131, 157–58; John L. Jordan, “Was There a Massacre at Fort Pillow?”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6 (1947); Nathan Bedford Forrest, 4/ 15/ 64 dispatch, from *War of the Rebellion: Official Records*, v.32 pt. 1 (DC: GPO, 1891), 609–10; Richard Nelson Current, *Lincoln's Loyalist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9–43; Richard L. Fuchs, *An Unerring Fire: The Massacre at Fort Pillow* (Rutherford,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3, 116–17, 144–46; James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65–66, 793–95; McPherson, *The Negro's Civil War* (NY: Pantheon, 1965), 186–7; Joseph T. Glatthaar, *Forged in Battle: The Civil War Alliance of Black Soldiers and White Officers* (NY: Free Press, 1990), 133–34.

[56] Escott, *After Secession*, 198;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833–35; Beals, *War Within a War*, 147.

[57] Stavis, *John Brown: The Sword and the Word*, 101–2; see also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832–38; Joseph T. Glatthaar, *The March to the Sea and Beyond*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联邦军队的士兵逃亡率几乎与联盟军队一样高，但是，逃亡的联邦士兵很少加入

到联盟军队中。

[58] Beals, *War Within a War*, 73. 见 Gabor Boritt, ed., *Why the Confederacy Lo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59] 我以前所考察的一本老的教科书《美国的冒险历程》,曾引用过关于联邦的战争目的的那句话,并问道,“这些立场是如何影响到战争的开展及其结局的呢?”

[60] 《美国历史》的作者显然不熟悉关于南方分裂的文献,以至于说“他们孤注一掷地投入了全部军队,这鼓舞了士气,克服了人员与供给上的不足”,并把这说成是南方的优势。当然,思想并非联邦军队胜利的唯一原因。很多教科书提到,北方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人口、工业和铁路;有些教科书提到了对南方的海上封锁,以及该地区内部交通的不便;一些教科书承认,北部联邦的政府以及财政支持都很到位。另一方面,一些教科书指出,联盟军队的优势在于在自己的后方草原上、以及在短线补给的情况下与北方作战;有些教科书指出,南方一开始还得到了法国和英国政府的同情。在这些事实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历史学家视之为历史偶然性。南方一开始拥有更好的大将。但作为总统,林肯要比戴维斯优秀得多。麦克莱伦(McClellan,美国内战中北方将领。——译者按)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南方的两位最有能力的将军阿尔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Albert Sidney Johnston)和斯通维尔·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在战争伊始就被杀。在某些战役,在某些时刻,某些将领的确曾经或不曾率兵艰苦作战。李将军的安铁顿作战方案落入了联邦军队之手。如此等等。因此,战争的结局并没有必然性,而我也并没有说,教科书说北方联邦胜利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但我的确认为,既然美国历史教科书很少讨论因果关系,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很好地解释北方联邦胜利的原因,并且实际上,有五本教科书根本没解释任何原因。既然教科书更少讨论思想问题,它们就更不可能将思想问题视为内战的原因。但《美国的冒险历程》却明智地做到了这一点。

[61]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45; see also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74-80.

[62] Bessie L. Pierc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6), 146-70; 另见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345; 以及 John S. Mosby 致 Sam Chapman 的信, 7/ 4/ 1907, at Gilder Lehrman Institute of American History, gilderlehrman.org/collection/docs_current.html.

- [63] Michael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118.
- [64] 关于联盟“星杠旗”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复兴及其在反对民权运动上的象征意义, Mark Halton 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论述, 见 “Time to Furl the Confederate Flag,” *Christian Century* 105, no. 17 (5/ 18/ 1988): 494–96. 在“联盟”博物馆(the Museum of the Confederacy)举办的一项名为“受困的战徽”(Embattled Emblem)的展览中, 展示了北弗吉尼亚军队的军旗从重建时代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演变历程。该展览同样认为这面军旗的复兴表明白人是反对民权的。南方白人今天在慢慢放弃他们的“联盟人”的身份。1983 年, 甚至连密西西比大学这座当年反对种族变革的大本营, 也不再将“联盟”旗帜作为自己的官方校旗。2001 年, 佐治亚州将“联盟”旗帜从其旗杆上降下, 2004 年, 投票通过了新的州旗设计。
- [65] Carl Sandburg, *Abraham Lincoln: The War Yea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9), 4:347–49.
- [66] Loewen and Sallis, eds., *Mississippi: Conflict and Change*, 145–47. John Hope Franklin suggested renaming “Presidential Reconstruction” “Confederate Reconstruction.”
- [67]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Project, *Who Built America ?* (New York: Pantheon, 1989), 482.
- [68]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267.
- [69] Edmonia Highgate quoted in Robert Moore, *Reconstruction: The Promise and Betrayal of Democracy* (New York: CIBC, 1983), 17.
- [70] 《发现美国历史》是个例外, 它根本没有提到南方的共和党人, 也几乎没有介绍重建。
- [71] William C. Harri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ississippi Scalawag,” *Journal of Mississippi History* 37, no. 1 (2/ 1970): 11–13.
- [72] 同上, 3–42; C. Vann Woodward, “Unfinished Busines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12, 1988.
- [73] 《发现美国历史》再次是个例外, 因为它根本没有提到南方共和党人, 也没有提到重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大多数出于经济目的来到南方的北方白人都是民主党人。
- [74] The editors, “Liberating Our Past,” *Southern Exposure* 12, no. 6 (11/ 1984): 2.
- [75] 见 LaWanda Cox and John Cox, “Negro Suffrage and Republican Politics: The Problem of Motivation in Reconstruction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33 (August 1967): 317–26; Richard Curry, ed., *Radicalism, Racism, and Party Realign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9).

[76]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853. 当时的联邦人口为 2200 万。而在 “The Reconstruction of Abraham Lincoln,” Ch. 5 of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eds., *Collective Remembering* (London: Sage, 1991) 一文中, Barry Schwartz 分析, 葬礼是林肯偶像化的重要一环。

[77] Sandburg, *Abraham Lincoln: The War Years*, 4: 296, 373–80; John T. Morse Jr., ed., *The Diary of Gideon Well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1), 2:288–90.

[78] 在针对白人的调查中, 林肯通常是排在第一的“最伟大的总统”或“最伟大的美国人”, 这部分原因在于, 白人喜欢他的个人特性, 比如: 博爱、和蔼可亲、执着。见 Barry Schwartz in “Abraham Lincoln in the Black Community of Memor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colloquium, 8/ 24/ 1993).

[79] “The Lesson of the Hour,” in Warch and Fanton, *John Brown*, 108.

[80] 我必须指出一个重要的例外:《美国的经历》。该书主要为年轻的或者“领悟慢的”读者而作, 它用两三百页介绍了威廉·劳埃德·盖瑞森和撒迪厄斯·史蒂文斯, 并且认为他们有非凡的才能。

[81] 关于布朗和胡志明, 见 Truman Nelson, *The Truman Nelson Reade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9), 285; 关于南非和北爱尔兰, 见 Peter Maas, “Generations of Tormen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6/ 10/ 1988, 32; 1988 PBS documentary, *We Shall Overcome*.

第七章

机遇之地

204

劳动先于资本,独立于资本之外。资本只是劳动的成果;如果不是先有劳动,资本就决不能存在。劳动先于资本,更加值得重视。

——亚伯拉罕·林肯^[1]

我一度相信,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可以随意地塑造自己的生活……我克服了盲聋的障碍,这给我带来足够的欢乐。我还认为,只要投入到与生活的抗争中,任何人都能取得胜利。但是随着走访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我认识到,我对于自己知之甚少的事情说得过于肯定了……现在,我懂得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往上爬的能力。

——海伦·凯勒^[2]

我们国家的十个人就可以买下整个世界,但是有一千万人买不起足够的食品。

——威尔·罗杰斯^①,1931

不幸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太容易被写成其统治阶级的历史。

——克瓦米·恩克鲁玛^{②[3]}

中学生都有自己的眼睛,有自己的耳朵,他们还有电视机可看(许多人有自己的电视机),因此他们对美国的特权现象都有很多的了解。他们能够衡量自己的家庭相对于其他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自己的圈子相对于其他圈子的社会地位。然而,有些学生,特别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对美国阶级结构的运行方式知

① 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美国20世纪著名慈善家。

② 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纳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之甚少,对美国社会阶层在不同时代的变化更是一无所知。当这些学生离开学校时,他们尽管对阶级结构的运行方式茫然无知,但却可能会成为令人可怕的社会学家。“人为什么会穷?”我曾经向一年级的大学学生提出这一问题。而如果我发现有些学生属于某种特权阶层,我又会问他们:“为什么你的家庭很富裕?”我得到的那些答案,往好处说,是幼稚的和一知半解的。学生们鄙视贫穷,认为那是由于不成功的缘故。^[4]他们不理解美国社会是如何机会不平等的,不懂得是社会结构 205 在把人分门别类,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图1 “血汗工厂”

这幅照片摄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纽约唐人街的一家“血汗工厂”,描绘了工人阶级在美国的工作条件,它的工作场所与一个世纪以前没有什么不同。

中学历史教科书可能要对这种状况负一定的责任。有些教科书的确写到了劳工史上的某些极端事件,比如,1894年克利夫兰总统调用联邦军队镇压芝加哥附近的普尔曼铁路工人大罢工;1911年纽约市一家三角女衫公司发生火灾,使146名妇女丧生。但是,大多数教科书所提到的这方面的最近的一次事件却是60年前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①。没有教科书提到20世纪末的那些失败的工人大罢工,比如1985年明尼苏达州奥斯汀市的荷美尔肉类食品公司包装工人罢工,1991年伊利诺斯州迪凯特镇的特卡特彼勒公司^②工人罢工——这些罢工的失败标志着劳工力量在今天的衰落。^[5]大多数教科书也没有描述劳工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跨国公司的扩展及其向海外输出工作岗位。忽略了这些,教科书

① 美国历史上的一项劳工法案,1947年由参议员塔夫脱和哈特莱提出。该法案规定,要求资方只雇佣工会会员是不合法的。

② 卡特彼勒(Caterpillar)公司,美国目前最大的建筑设备制造商。

的作者们就把劳工史解释成诸如奴隶制那样久远的历史,并且似乎像奴隶问题一样,劳工问题很久以前就被解决了。照此逻辑,工会现在看来是个时代性错误。206 人们曾经认为,工会是工人在工厂内表达自己声音的必备机构。但现在,这种观念无人问津了。

在这些教科书中,相比关于社会阶层问题的论述,关于劳工史的些许论述却显得精彩得多。教科书讨论的任何问题,甚至罢工问题,都没有涉及对社会阶级的分析。^[6]这等于是用注脚代替了正文!在我所考察的18本中学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有一半在索引中根本没列出诸如“社会等级”、“社会分层”、“阶级结构”、“收入分配”、“不平等”或其他任何让人能想到的相关条目。也没有哪本教科书列出了“上层阶级”、“下层阶级”这两个条目。有3本书列出了“中产阶级”这一条目,但只是在向学生灌输,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希望之地》说:“除了奴隶之外,大多数殖民者都是‘中等阶层’中的一员。”该书对我们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深信不疑,甚至要求学生“列出能把自由美国的各阶层联系到一起的三个‘中产阶级’价值观。”有些教科书提到二战后中产阶级市郊居住区的急剧发展。然而,讨论中产阶级与讨论社会分层几乎不相干。相反,就像格里高利·曼修斯指出的,“这些参考书之所以能被人接受,似乎恰恰是因为它们闭口不提阶级差别。”^[7]

今天,强调我们如何都是中产阶级越来越成问题,因为自1967年以来,家庭收入达到社会平均家庭收入的75%至125%的家庭的数量在持续下降。在里根-布什执政时代,中产阶级队伍进一步缩小,大多数脱离中产阶级队伍的家庭在社会分层中是下降而不是上升。^[8]晚至1970年,美国的家庭收入水平几乎只能与加拿大持平。到2000年,美国的不平等现象比加拿大还严重,美国变得更像墨西哥那种社会分层严重的国家。^[9]布什连任期间,实施公开的对有钱人的减税政策,结果使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人们会认为,这类历史变化应该被历史教科书视为恰当主题,但在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只有5本提供了关于美国社会分层的某种分析。即便是这些零碎的分析,也主要针对的是殖民地时代。布尔斯廷和凯利曾有所不同,他们确在自己的教科书的索引里列出了“社会阶级”这一条目,但只延伸到“1790年的社会阶级”和“美国早期的社会阶级”这两个二级词条。而这两个条目提示的是正文中的同一个段落,那个段落告诉我们,英国“是一个社会等级区分严格的国度”,而在美国,“各社会等级的流动要流畅得多。”对此,《美国的传统》也附和道:“殖民地与欧洲社会的一个巨大差异就是,殖民地人更具社会流动性。”这些教科书根本不顾及美国历史上最严重 207 的阶级冲突——培根叛乱和谢斯起义——都发生在殖民地时代及其刚刚结束时。一些教科书仍然在说,殖民地社会相对来说是无阶级的,并且其最大特征是

各阶层的向上流动。

此后的事情似乎都尽如人意。《自由的挑战》明确告诉我们：“到1815年，”阶级对立已不存在，“美国是一个由中产阶级构成的国家，中产阶级是美国的理想。”这本书每写大约50年的历史，就回到那一主题——在美国，机会是如何如何的开放。在这些教科书中，对社会向上流动的强调是令人震惊的。它们几乎没有提到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也没有提到在向上流动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希望之地》曾问道：“在殖民地，是什么使得贫穷的白人移民成为富人？”但是，对“是什么使他们难以成为富人？”这一问题，却不作回答。布尔斯廷与凯利用这样一句欢快的话结束了他们关于社会阶级问题（1790年的，如上文）的讨论：“正如众多美国总统的经历告诉我们的，在美国，一个人可以凭借努力工作、知识、技艺，或许再加上一点运气，从社会的底层上升到顶端。”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社会阶级或许是社会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变量。它关乎一个人从子宫到坟墓的几乎所有可衡量的其他社会特征。一个富裕的孕妇更可能获得好的产前照料，收到及时的医学咨询，享受全面的医疗、健康和营养。而很多贫穷的、工人阶级的孕妇只是在临盆前一个月甚至一个小时，才第一次接触专业医生。富人家的婴儿出生时就要比穷人家的婴儿更重、更健康。回到家后，婴儿的条件也相差很大。穷人家的婴儿在身体和环境方面可能面临更高风险的铅中毒。而富人家的婴儿能与父母相处更长的时间、进行更多的口头交流，当父母不在时，也能得到更高质量的日护。在从幼儿园一直到12岁的年龄段，富人家的孩子在市郊学校接受教育，其学费相当于市中心或贫困乡村的孩子的学费的二到三倍。穷人家的孩子就读的班级通常要比富人家孩子的班级大一倍。这些差异，可以说明为什么穷人家孩子的辍学率要更高。

即便穷人家的孩子有幸与富人家的孩子进入同一所学校，他们遇到的老师通常也会认为，只有富人家的孩子才知道正确答案。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当穷人家的孩子更胜一筹时，教师经常会感到诧异甚至沮丧。老师和辅导员相信自己能够预言谁是“上大学的料子”。由于很多工人阶级的孩子甚至在一年级就流露出不良的兆头，他们最终止步于中学的“一般教育”课程。^[10]根据西奥多·赛泽研究美国中学的畅销书《霍勒斯^①的妥协》的说法，“如果你来自低收入家庭，你在中学只能得到大人的有限的、时常是无心的注意”，“如果你来自中高等收入家庭，你就能得到充分的、细致的关照。”^[11]研究员丽巴·佩奇生动地描述了中学美国历史课程是如何用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使来自低层家庭的学生感到厌烦的。^[12]由此看来，学校是在实践伍德罗·威尔逊的如下劝告：“我们需要某一等级的人接受‘博

① 霍勒斯，在此指霍勒斯·曼（Horace Mann, 1796-1859），美国杰出的教育家。

雅教育’,也需要另一等级的人,即一个大得多的、每个社会都存在的贫困阶级,去放弃博雅教育的权利,他们更适合完成专业的、艰难的手工任务。”^[13]

家庭与学校生活的这种不平等似乎远不止如此。富家青少年学生能够参加“普林斯顿教育咨询”^①等培训班,以通过 SAT 测试。即便不参加培训班,富人家的孩子也具有优势,因为他们的背景与那些出卷人相似,他们能够更轻松地应付测试中的那些词汇以及精细的亚文化推测。社会阶级与 SAT 的成绩紧密相关,对此没有人会感到奇怪。

所有这些,都部分说明了为什么不管怎么衡量,社会阶级都比其他因素,比如智力,更能决定入学率和所上大学的类型。读完大学后,大多数富家子弟都能成为白领,而工人阶级的孩子只能找一份蓝领的工作。于是,阶级差别继续存在。长大成人后,富人更容易请到律师,加入某个能提升自己权势的正式组织。穷人更经常看电视。富人家庭拥有储蓄,而穷人家庭几乎花光了全部收入,因此两者之间的财富差距要比收入差距大到十倍。因此,多数穷人或工人阶级家庭都无力支付购房所需的按揭,这反过来使他们无法享受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税收优惠政策——无息抵押购房贷款。工人阶级父母无力生活在精英阶层圈中,也请不起高级的日护,这样,教育不平等的过程被一代代地复制下去。最后,美国富人还比下层阶级或工人阶级寿命更长,这是他们更有能力接受好的医疗的最直接的结果。^[14] 研究者发现,健康状况差的人并非随机地分布在各社会阶级,而是集中在下层阶 209 级之中,这印证海伦·凯勒关于盲人的那一研究结果。这样,“社保”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中转机构,用全体美国人贡献出来的钱不成比例地为长寿的美国富人支付账单。

最后,社会阶级还决定了人们如何看待社会阶级。当被问及“美国的贫穷现象是穷人的过错还是社会制度的过错”时,57%的企业领导人认为是穷人的过错,只有9%的企业领导人谴责社会制度。而劳工领导人的答案完全相反:只有15%的人说那是穷人的错,而56%的人都谴责社会制度。(有些人回答说“不知道”,或者选择中间立场。)我们的两大政党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其成员如何看待社会阶级:在共和党中,55%的人认为穷人是造成贫穷的根源,而只有13%的人认为贫穷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在民主党中,68%的人谴责社会制度,只有5%的人责备穷人。^[15]

我知道,这些说法并不是什么新闻,这就是我为什么懒得记录它们的原因。但中学生并不知道它们,也不理解这些观点。而且,事情总在随时间而变化,今天

① “普林斯顿教育咨询”(Princeton Review),是美国一家闻名世界的考试辅导与教育咨询公司。其在中国的官方网站为:www.tprbeijing.com

美国的社会结构已经与 1890 年的社会结构很不相同,更不用说相比殖民地时代了。然而,在最新的教科书《美利坚盛典》中,就没有提到 20 世纪的社会阶级。很多教师避免谈论 21 世纪的社会阶级,对这类问题敷衍了事。一项针对历史课与社会课教师的研究,“揭示出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中,他们所具备的经济学知识都比自己在课堂上所允许探讨的更为丰富。”教师们“表示担心,学生会发现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的不公正和不足之处。”^[16]美国历史课从不谴责社会制度,由此宣讲的是共和党人的历史。

历史上,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过去的各个阶段,无不与社会阶级紧密相关。我们的政府体制是有钱人制订的,其理论基础在于强调“政府是有产阶级的壁垒”这样一种学说。詹姆斯·麦迪逊虽然自己是富人,但也对社会不平等问题感到担忧,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10 章中指出,拟议中的新政府不应受制于富人的影响。爱德华·佩森对里根之后的美国各任总统的社会阶级背景进行了考察。根据他的研究,麦迪逊的设想并未完全实现。佩森发现,40%以上的总统发迹于上层社会,其中大多数来自精英阶层的上层,15%的总统来自于介于中层与上层之间的家庭。25%以上的总统有着稳定的中上层社会背景。只有六位总统,也就是 15%的总统来自中下层阶级。只有一位总统,即安德鲁·约翰逊代表下层社会的利益。较近的一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美国所有总统中来自下层的总共也就这么两人。因此,佩森把自己的著作起名为《木屋神话》是有道理的。^[17]显然,布尔斯廷与凯利没有读过佩森的书,否则他们不会断言总统们的经历证明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从最低上升到最高”。事实上,社会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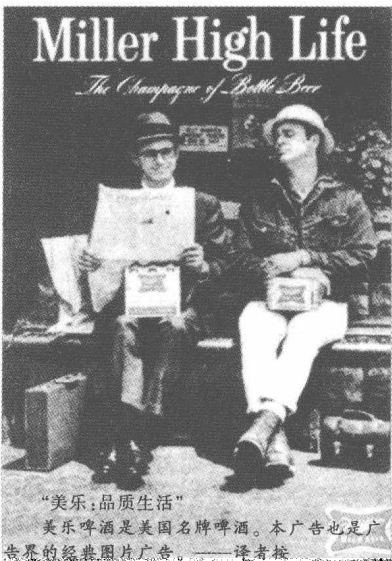


图2 “美乐：品质生活”

对于少数产品(如敞篷小货车、某些专利药品、假牙清洁器等等),广告商试图用工人阶级的形象推销出去,啤酒就是其中之一。而对于大多数商品,从葡萄酒、尼龙制品、到马桶清洁器,广告商都使用上层阶级的形象去推销。上图两位人物身上,从头到脚的穿戴,都带有社会阶级的标记。还请注意一下分别是谁拿着报纸、公文包、午餐盒,最后,还有罐头和酒瓶。

已证明,多数美国人在某个社会阶级老死终生,那些变动的人通常也只能上升或下降一个社会阶级。

社会阶级甚至可以在险境中以钱换命。当巨轮“泰坦尼克号”沉没,那支老歌重复响起,人们无限悲伤之时,最令人痛心的还是下层阶级:在妇女船客中,143位头等舱旅客中只有4人丧生,93位二等舱旅客中有15人溺亡,而在179位三等舱旅客中,有81人丧命。船员命令三等舱的乘客留在甲板以下,甚至把枪口对准他们。^[18]再往近看,在决定谁去越南打仗这一问题上,社会阶级起着主要的作用。尽管实行所谓“普遍”征兵案,但是富家子弟在大多数战争中因教育或健康问题获得了缓召入伍的机会。伊拉克战争中的志愿兵更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把入伍当作摆脱贫穷的途经。^[19]教科书和教师们都忽略了这一切。

教师们避免谈论社会阶级问题,以免使自己的学生感到困扰,其动机或许值得称许。但若果真如此,他们就多虑了。我的那些来自不富裕背景的学生们在了²¹¹解到社会制度后,感到如释重负。他们一旦明白是社会因素促使自己的家庭陷入贫穷,就会走出那种身为穷人的消极的自我想象。如果理解就意味着宽恕,那么,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懂得了社会分层是如何存在的,就会宽恕自己、谅解自己的家庭。认识到社会阶级制度的存在,还会阻止其他社会等级的美国人去责备贫穷的受害者。在教育学上,社会分层提供了一个吸引人的学习案例。学生们惊讶地发现,上层社会是如何滥用其不恰当的权力操纵一切事物的——从国会里的能源法案,到小镇的分区规划。

让我们来看一下佛蒙特的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小镇上一位正在学习美国历史的九年级白人女生。她的父亲是做石膏板的,在建筑淡季,他收入甚微,家庭陷入贫困。她的母亲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和妹妹,还兼职开校车以贴补家用。这个女生与她的家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小房子里,为了御寒,房子装上了以前夏季才用的那种木板。而她的大多数同学都住在市郊的大房子里。这个女生该如何理解自己的贫穷呢?由于历史教科书把美国历史说成是400年的进步历程,还把我们的社会描绘成“机遇之地”,所有的人得到应得的东西,也只该如此,因此工人阶级子弟想要超越其阶级出身,一出门就注定失败。

由于生活在白人工人阶级圈中,这个女生在她的身边人——老师、教区邻居、家人——中很难找到人能给她讲与自己相同背景的人们中的英雄或斗争的事迹,因为,工人阶级通常会忘记自身的历史,除非他们身陷不断的阶级冲突之中。工人阶级出身的白人学生比其他人更相信自己应该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羞耻之心接踵而来。这种消极的自我想象首先存在于理查德·赛尼特和乔纳森·柯布所称的“隐秘的阶级伤害”之中。^[20]我的两个学生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佛蒙特的

伯灵顿,一次,他们驾驶着一辆崭新的、闪闪发亮的、豪华黑色小汽车;另一次,他们驾驶着一辆十年之久的破旧微型车。在每次驾驶中,当到达路口停下来,信号灯变绿后,后面的车辆都会按喇叭催促他们快点启动。在开那辆微型车时,平均不到七秒就会被人按喇叭催促,但在那辆豪华汽车里,要等到平均 13.2 秒之后才会有人按喇叭。这段经历除了劝告人们要买一辆好车之外,还证明美国人会无意中对那些受过教育的、成功的人报以尊重。由于社会上所有阶层的驾驶员都更容易对微型车鸣笛,工人阶级的驾驶员就会在比自己富有的人面前自惭形秽。“你这么聪明,怎么不见你富起来?”这句挖苦人的话让人心疼。当“美国是精英社会”这一观念在学校里大行其道时,这句话对穷人的自我想象造成了伤害。

问题还在于,美国历史教科书把美国教育本身说成“唯才是举”。大量的研究证明,教育受阶级结构的支配,并且把那一阶级结构一代代地复制下去。^[21]同时,历史教科书还津津乐道地谈论诸如林登·约翰逊总统任期内通过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等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慷慨”之举。没有一本教科书提供了关于教育机构内的不平等现象的数据或分析。也没有教科书提到,低收入地区所分片的学校如何苦于惊人的财政限制,以至于乔纳森·科佐尔称这种现象为“野蛮的不平等”。^[22]也没有教科书建议学生去研究自己学校的历史及其服务的人群。仅有的那些将教育与阶级制度联到一起的教科书却视这种现象为一副良药——学校教育“是战后美国人社会升迁的关键”,《自由的挑战》如是说。但是,这种现象也是社会不平等得以延续的关键原因。^[23]

教师和教科书避免谈论社会阶级问题,似乎那些都是肮脏的小秘密,这只会促使工人阶级家庭也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1912年,马萨诸塞州发生了著名的劳伦斯轧花厂工人罢工。保罗·科旺(Paul Cowan)曾谈到自己采访过其中的一些意大利移民工人的孩子。科旺说,在罢工事件爆发前,一位名叫卡美拉·泰奥利的劳伦斯厂女工——那时才13岁——被一架轧花机削去了头皮,后来住了好几个月的院。她曾到华盛顿出席国会调查此次罢工事件的听证会,她的证词“成为全美国的头条新闻”。1976年,泰奥利去世后,科旺采访了她的女儿,但那次采访却不能给科旺提供什么帮助。关于自己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泰奥利对女儿缄口不言。虽然几乎每天,女儿“都为妈妈梳头,把一些头发盘起来去遮掩受伤的头皮”^[24],但母亲闭口不提自己的华盛顿之行,也不提自己的事件对美国人的良知产生的影响。一位工人出生的女艺人也曾告诉我们一个类似的事情:她羞于自己的叔叔“是一位钢铁厂工人”。某种防卫之心已经渗透到工人阶级的文化之中,即便是那些成功的反抗行为,比如劳伦斯厂罢工,也难免表明了自己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并由此意味着某种卑贱。就像教科书告诉我们的,如果较大的社群是美好 213

的,那么记住甚或纪念与他们相冲突的事件,似乎就是某种背叛。

教科书也确曾写到移民史。在世纪之交,移民是美国大都市,甚至是远至德梅因和路易斯维尔这样的海岸城市里的工人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些地方,白人人口中本地人占70%以上,而在城市工人阶级中,只有不到10%的人是本地人。^[25]但是,教科书在讲移民史时,强调的只是约瑟夫·普利策^①、安德鲁·卡耐基及其家族——他们是出类拔萃的移民。一些教科书用“从赤贫到暴富”、“机遇之地”等说法描述移民经历。诚然,有人取得了这种传奇般的成功,但那只是例外,不是常规。在美国,在世纪之交,95%的执行官和金融家来自上层社会或中上层社会;不到3%的人是从贫穷的移民或农业家庭发达起来的。在整个19世纪,只有2%的美国实业家来自于工人阶级。^[26]通过集中介绍这些令人振奋的个案移民史成为美国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机遇之地”的又一个鼓舞人心的证明。

还有,教科书强调美国与欧洲国家如何不同,美国的阶级分层如何更细微,经济和社会流动如何更通畅。这是“美国例外论”的又一表现——我们的社会公平是举世无双的。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比如说,法国或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从来不会认为他们的社会格外平等。我们这样描述美国历史,能让学生为现实做好准备吗?它不可能准确描述我们今天的国家。社会科学家已在很多场合比较了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内的阶级平等程度。根据他们采用的标准,美国在被比较的六个国家中排名第六,在七个国家中排名第七,在12个国家中排名第九,在13个国家中排名第十三,在14个国家中排名第十四。^[27]在美国,5%的最富有的人的收入是5%的最贫穷的人的12倍,这种悬殊在各国工业化国家里是最大的。在英国,这一比例是7:1,在日本只是4:1^[28]1965年,美国普通的CEO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收入的26倍。到2004年,CEO的薪水达到普通工人的431倍。同时,日本CEO的收入也达到其普通工人同事的26倍。在通用和福特的领导层,情况也很难说要比丰田或本田好。^[29]杰斐逊所设想的独立的农业和商业国一去不复返了。在美国,13个人中才有一个人是自主执业者,西欧是8个人中一个。^[30]这样一来,我们的独立企业法人不仅比两百年前要少得多,而且比今天的欧洲也要少。

既然教科书宣称殖民地时代的美国的社会分层要比欧洲细微得多,那么它们就应该告诉读者,不平等现象是何时发生的——它显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在1910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口的收入占有所有个人收入的1/3,而最底层的1/5人口的收入只占不到1/80。^[31]这种不平等状况与德国和英国不相上下。^[32]既然教

① 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 1847-1911),美国报业巨头,出生于匈牙利。1917年根据其遗愿设立的“普利策奖”被认为是当今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

科书认识到不平等的存在，就应该介绍我们的社会结构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变化，这或许能引起学生对史学争论的兴趣。^[33]

比如，有些历史学家说，殖民地社会的财富分配要比今天更平均，经济不平等情况是在安德鲁·杰克逊时代开始增长起来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克逊的时代被公认为“平民的时代”。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9世纪末大公司的兴起使得阶级结构更趋尖锐。瓦尔特·迪安·伯纳姆^①指出，1896年共和党竞选总统的胜利（麦金利胜布莱恩）导致了大规模的政治重组，致使“一个相当民主的政体变成了一个基础广泛的寡头政体”，由此开始，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商业控制了公共政策。^[34]显然，贫富差距就像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时代”要比它1890年前后刚刚发生时大得多。^[35]社会分层在历史上并非总是在加剧，在“大萧条”到二战结束这一段时间，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渐趋平均。此后，收入分配一度保持适度的稳定水准，到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不平等程度又开始加剧。^[3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自革命之后，这种变化就已露苗头。比如，李·索尔托发现，美国在1798年存在着“惊人的财富及收入的不平等”。至少就波士顿而言，正如斯蒂芬·特恩斯特伦所总结的，由社会阶级所导致的生活机遇上的不平等，一直在惊人地延续着。^[37]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却不是中学所教的那种历史的一部分。

对社会科学家而言，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是认识这个社会的一个指针。当我们用这个变量去排列一些国家时，我们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是最平等的，而哥伦比亚及津巴布韦这样的农业社会几乎垫底。里根及老布什首任期间，²¹⁵公开地偏向富人，纵容业已存在的趋势，导致不平等程度在1981-1992年间大幅提高。美国在社会不平等上趋向哥伦比亚，是由于不发展小额进口。^[38]的确，中学生们会满怀兴趣地发现，1950年的内科医生的收入还只是加入工联的产业工人的两倍半，但今天，这一差距已扩大到五倍。的确，他们需要明白，一些服装公司的上层经理以前的收入是其美国员工的50倍，但现在，是孟加拉工人的1500倍。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教师压制那些能够促进和指引学生讨论这些趋势的历史知识，这种做法的确是错误的。

为什么教科书和教师们会犯下如此错误？最主要的，是由于出版商对教科书作者的审查。一位供职于一家大型出版社、负责社会课与历史课用书的女编辑曾告诉我说：“你们谈论社会阶级问题，这总是在冒险，有可能被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这位编辑向她的每位作者或正式、或委婉地提醒这一禁忌，她还暗示，其他编辑也大都如此。

① 瓦尔特·迪安·伯纳姆(Walter Dean Burnham, 1930-)，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

出版商的压力又来自于各州及学区的教科书采用部门或其委员会。而后者又屈从于自己面对的那些有组织的群体和个人的压力。或许,这类机构中,最活跃的仍是“教育研究分析师”,在2004年以前,该机构一直由德克萨斯州的梅尔·加布勒领导。加布勒为首的右翼批评家甚至认为,只要提出教科书应该包含一些社会阶级的内容,就是一种破坏性的批评。正如一位作者指出的,“用阶级方法去分析问题是不被接受的,甚至是非美国式的。”^[39]担心教科书不能在德克萨斯州被采用,是出版商最主要的忧虑,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生活与自由》把自己关于社会阶级的分析局限在殖民地时代的英国。相比之下,甚至早在那个时代,“殖民地就是伟大的机遇之地”。但是,有些德克萨斯人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加布勒的一位合作者黛博拉·L. 布雷齐纳曾写道,《生活与自由》把美国描绘“成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并指出这个社会对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不公,因此是不值得称赞的社会。^[40]这些压力并不新鲜。哈罗德·拉格的《美国文化问题导论》以及他的那本畅销的历史教科书写于“大萧条”时期,根据弗朗西斯·费茨杰拉德的说法,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制造商协会攻击拉格的著作,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包含了一些阶级分析的内容。此后,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社会和经济分析“走到了尽头”。^[41]

通常,上层社会的影响较不直接。美国历史上,阶级特权的最有力的理论基础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模型对今天的美国文化仍然影响很大。人在适者生存这一法则中上升或下降,这种观念虽然并不符合美国的代际流动情况,但也几乎没有导致这种理论模型从美国教育中,特别是从美国历史课堂里退出。^[42]那些并不符合这一理论模型的事物,比如关于社会分层的全部文献,都只会被搁置。

教科书作者甚至并非由于出版商、右翼势力、上层社会或者文化模型的压力才避免谈论社会分层问题。作为英雄化过程的一部分,教科书作者把美国本身视为英雄——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的英雄,因此,他们剔除了美国的瑕疵。即便是透露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一些事实,也构成对英雄美国的批评,因为对于为什么1%的人控制着几乎40%的财富,我们很难找到一种社会正义理论去解释。难道我们剩下的99%的人都是懒汉或没价值的人?谈论上层社会赖以保持其上层地位的某些机制——诸如学校教育的不平等——也将无疑是对我们深爱的国家的批评。

出于部分或所有的这些原因,教科书淡化了社会分层问题。这样一来,它们的有些做法就难以理解了:它们没有解释自由企业制度有什么好处。在谈论某本出版年代较早的教科书时,弗朗西斯·费茨杰拉德写道,那时候的书籍都忽视了“当时的经济制度的好与坏”。^[43]教师们谈到自由企业制度时或许会满怀尊敬,但

是他们的言语很少能脱离某种口号。^[44]这种疏忽是奇怪的,因为,资本主义毕竟是有其优越性的。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李·艾柯卡、冰激凌制造商“本与杰”(Ben and Jerry)都是通过提供人们所需要的美好商品和服务而致富。诚然,很多社会分层都不能被说成是好的,因为它乃是一些人滥用财富与权力的结果,那些人凭借自己的优势把其他人排除在权势之外。作为一种经济与政治秩序,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多地方值得批判,但也有很多地方值得称赞。对于很多人来说,美国确是一个机遇之地。并且,一方面,资本主义导致了美国的各种扭曲现象;另一方面,公共领域与个人领域之间的分权也有利于民主的成长。我们的教科书没能讲授这些优势。

出版商以及影响他们的各种机构都明显地得出结论:要使美国社会保持强大,就要有一批不假思索地认同其经济制度及社会分层的公民。结果,今天的教科书盲目地维护我们的经济制度,对其在社会分层方面的特有缺失表现出毫无根据的虔诚。这样,美国历史课程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把对我们的社会分层制度的维护或批评建立在可靠的知识基础上。 217

但是,相信美国是平等社会有什么不好吗?或许,“机遇之地”是一个有力的神话——相信它或许就能实现它。因为,如果学生相信天并非高不可攀,他们就能上天;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就不能。

性别分析也暴露了这种思路存在的问题。如果教科书告诉女中学生,从殖民地时代到现在,妇女在升迁和政治参与上都有平等的机遇,那么,她们该如何思考自己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呢?她们如何理解为什么没有妇女当上总统呢?姑娘们或许会无意识地想到,那是由于她们的性别缺陷——这是个很令人沮丧的结论。

一些教科书确实提到,1920年以前,妇女在很多州是如何被剥夺选举权,又是如何面临各种升迁障碍的。一些教科书还讲到少数族裔所面临的阻碍。《希望之地》在其“社会流动”一节后为学生留下的问题是,“是什么社会障碍阻止了黑人、印第安人和妇女在平等基础上与男性白人殖民者竞争?”《自由的挑战》在那段大肆赞赏社会升迁体制的文字后指出:“然而,并非所有的人在改善自己的生活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或平等的机遇”,接下来还对性别和种族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这两本书(及其他多数教科书)都没有在这里或其他章节论及美国今天来自下层或工人阶级的白人不能享受机会平等。^[45]从统计结果看,甚至连商界领袖和共和党人这些或许最倾向于采取社会学家所称的“责难受难者”这一做法的受访者也谴责说,造成黑人贫困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而不在于非裔美国人本身,造成妇女在职场成绩平平的原因也是由于体制而非妇女本身。总之,像教科

书一样,富裕的美国人愿意把种族歧视说成是黑人与印第安人贫困的原因,把性别歧视说成是妇女不平等的原因,但是,他们不把阶级歧视说成是普遍贫困的原因。^[46]

与数学或科学课不同,甚至也与美国文学课程不同,美国历史课承担着一项任务,那就是告诉中学生,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他们所在的群体和所生活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社会阶级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一个诱因。虽然穷人或工人阶级的孩子不能认同自己遭排挤的原因,但是历史课会改变他们的想法,因为历史课不是在解释现状,而是在证明其合理性。如果这些学生掉队了——即使不是身体上的掉队,也至少是思想上的掉队,那么他们在学校里的不佳表现将使他们以及他们那些掉得更远的同伴相信,我们的体制是一种唯才是举的体制,而他们自己却一无是处。最终,美国历史课程在社会阶层分析上的缺失,将致使美国的教育又走上一条与工人阶级相对立的道路。

注释

[1] 亚伯拉罕·林肯,引自 Carl Sandburg, *Abraham Lincol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4). 271.

[2] Helen Keller, *Midstream: My Later Life* (New York: Greenwood, 1968[1929]), 156.

[3] Kwame Nkrumah, *Conscienc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4), 63.

[4] 同样, Cynthia S. Sunal 和 Perry D. Phillips 也讲到他的 6-18 岁的学生“似乎不能解释不平等现象”,见“Rural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ion of Economic Inequality” (New Orlean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1988, abstract, ERIC ED299069).

[5] 最近有两本教科书的确提到里根总统镇压空中交通管理员大罢工,但那只被作为里根执政的一部分,而非劳工史的一部分。

[6] Jean Anyon, “Ideology and United States History Textbook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9, no. 3 (8/ 1979): 373. Anyon 声称,中学历史教科书总是偏重“同样的三次罢工”:1877 年铁路大罢工、1892 年荷姆斯泰德(Homestead)钢铁工人大罢工,以及 1894 年普尔曼铁路(Pullman)工人大罢工。Anyon 写道,这三次罢工每次都“很暴力”,工人最后都失败了,因此她强调这几次罢工“都使人们对罢工行为的有效性开始产生怀疑。”然而,如果教科书偏重那些成功的罢工,Anyon

可能又会指责教科书降低了劳工所面临的斗争的严峻性。这样,一些极端暴力的阶级冲突事件就不再出现于大多数教科书中。

[7] Gregory Mantsios, "Class in America: Myths and Realities," in Paula S. Roth-ernberg, ed., *Racism and Sexism: An Integrated Study* (New York: St. Martin's, 1988), 56. 2003年版的《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的确提到了1900年前后的“新工人阶级”(The New Working Class),在有些地方还讨论了贫穷问题。

[8] 同上,60; Kevin Phillips, *The Politics of Rich and Po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Robert Heilbroner, "Lifting the Silent Depress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0/ 24/ 1991, 6; and Sylvia Nasar, "The Rich Get Richer," *New York Times*, 8/ 16/ 1992. Stephen J. Ro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New Press, 2007)有一幅张贴画,显示了中产阶级队伍在1979至2004年间的萎缩。

[9] "Income Disparity Since World War II—The Gini Index," in "Gini coefficient," en.wikipedia.org/wiki/Gini_coefficient, 9/ 2006.

[10] Jere Brophy and Thomas Good 对一些关于社会等级、教师期望以及分班学习的大量文献进行了总结,见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New York: Holt, 1974), esp. 7-171. Ray Rist 观测了黑人学校一年级各班根据社会阶层进行同样分班和不同教师的情况,Edsel Erickson 等人也对此做了总结,见 "The Educability of Dominant Groups," *Phi Delta Kappan* (December 1972): 320. Dale Harvey and Gerald Slatin 证明,教师根据照片,自然地根据社会阶层将学生分类,对中、上层社会的孩子的期望值要高,见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s SES and Teacher Expectations," *Social Forces* 54, no. 1 (1975): 140-59. See also Richard H. DeLone, *Small Futur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11] Sizer quoted in Walter Karp, "Why Johnny Can't Think," *Harper's*, 6/1985, 73.

[12] Reba Page, "The Lower-Track Students' View of Curriculu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1987).

[13] Woodrow Wilson 引自 Lewis H. Lapham, "Notebook," *Harper's*, 7/1991, 10.

[14] 在电影 *Health Care: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New York: Downtown Community TV Center, c. 1977)中,记录了这种巨大差异。该片比较了纽约市里比邻的两家公立医院,一家主要接受穷人患者,一家主要接受富人光顾。

[15] 调查数据选自 1979 Sidney Verba and Gary Orren 的报告, *Equality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72-75. 此前或此后的其他

调查也证明了同样的结果。

[16] Linda McNeil, "Defensiv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Control," in Michael W. Apple and Lois Weis, eds.,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School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6.

[17] Edward Pessen, *The Log Cabin My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8] August Hollingshead and Frederick C. Redlich, *Social Class and Mental Illness* (New York: Wiley, 1958), 6. 传统的性别角色——英雄救美,使得各等船舱中男性旅客的死亡率要比女性高。

[19] Lawrence M. Baskir and William Strauss, *Chance and Circumsta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6).

[20] Richard Sennett and Jonathan Cobb,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2).

[21] 只引用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文献,另见 Joel Spring,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State* (Boston: Beacon, 1972); Ray Rist, *The Urban School: A Factory for Failure* (Cambridge: MIT Press, 1973);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Joel Spring, *The Sorting Machine*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6); James Rosenbaum, *Making Inequality* (New York: Wiley, 1976); Paul Willis, *Learning to Labor* (Farnborough, Eng.: Saxon House, Teakfield Ltd., 1977); and Jerome Karabel and A. H. Halsey, eds.,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2] Jonathan Kozol, *Savage Inequalities* (New York: Crown, 1991).

[23] 在我所考察的 18 本书中,探究型教科书《美国的冒险历程》最接近于这种对教育和社会等级的分析。

[24] 对科旺的作品的介绍和引用,见 Herbert Gutman, *Power and Culture* (New York: Pantheon, 1987), 396-97.

[25] Gutman, *Power and Culture*, 386-90.

[26] William Miller,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Business Elite," in Miller, ed., *Men in Busines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326-28, 书中 Reinhard Bendix and F. W. Howton 总结了 William Miller 的研究和著作。另见 David Montgomery, *Beyond Equality* (New York: Vintage, 1967), 15. 还有一些研究也表明了较高的边际比例,包括新泽西的帕特森市,除了机会的分散外,它们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

- [27] Verba and Orren, *Equality in America*, 10. 另见 Paul Gagnon, *Democracy's Half-Told Story* (New York: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1989), 84-85; "Income Disparity Since World War II," 前引书。
- [28] Mantsios, "Class in America," 59; Isaac Shapiro and Robert Greenstein, *The Widening Gulf* (Washington, D.C.: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1999).
- [29] "Index," *Harper's*, May 1990, 19, citing data from the 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 Jeanne Sahadi, "CEO Pay: Sky High Gets Even Higher," *CNNMoney.com*, 8/ 30/ 2005; money/cnn.com/2005/08/26/news/economy/ceo_pay/.
- [30] "Index," *Harper's*, January 1993, 19, 引自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31] David Tyack and Elisabeth Hansot,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 *Daedalus* 110, no. 2 (Summer 1981): 11-12.
- [32] Jeffrey Williamson and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 A Macro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Chapter 3.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324-26, 都指出,英国虽然财富不平等,但是收入是比较平均的。
- [33] 《美利坚盛典》(2006)与众不同,它指出,“很多国家都吹嘘自己在财富分配上更加平等。”还指出,“贫富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扩大。”不幸的是,该书又说,20世纪90年代,80%的劳动力从事白领工作,这比实际数据要大一倍。
- [34] Walter Dean Burnham, "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Univers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9 (1965): 23-25.
- [35] Barry Schwartz, "The Reconstruction of Abraham Lincoln," in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eds., *Collective Remembering* (London: Sage, 1991).
- [36] Williamson and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 41-42, 49-51; Robert E. Gallman, "Trends i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Lee Soltow, ed., *Six Papers 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ncome*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69), 6-7.
- [37] Lee Soltow,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798*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9), 252; Stephan Thernstrom, *The Other Bostoni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apters 5, 9.
- [38] 见 Alan MacRobert, "The Unfairness of It All," *Vermont Vanguard Press*, September 30, 1984, 12-13; Alfie Kohn, *You Know What They Say . . .*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0), 38-39; Heilbroner, "Lifting the Silent Depression," 6; Sheldon Danziger and Peter Gottschalk, *Uneven Tides* (New York: Sage, 1993).

- [39] Mantsios, "Class in America," 56.
- [40] Deborah L. Brezina, "Critique of *Life and Liberty*" (np, n.d., typescript, distributed by Mel Gabler's Educational Research Analysts, 1993), 2.
- [41] Frances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 (New York: Vintage, 1979), 108-9.
- [42] David Tyack and Elisabeth Hansot,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 *Daedalus* 110, no. 2 (Summer 1981): 1-25, 发现, 阶级不平等现象通常得到“精英政治”和“机会均等”这两个孪生观念的支撑。
- [43]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 109. 加布勒及其合作者也重复了这一批评, 见 Brezina, "Critique of *Life and Liberty*," 2.
- [44] McNeil, "Defensiv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Control," 125.
- [45] 有两个例外: 一个是《美国之路》中题为 "A Permanent Class of Poor Workers" 的章节; 另一个是《美利坚盛典》中的部分章节。
- [46] 调查数据选自 Verba and Orren, *Equality in America*, 72-75.

第八章

看看“老大哥”^①:教科书是这样讲联邦政府的

219

史家无国界。

——约翰·昆西·亚当斯^[1]

今天你在学校学到了什么,我亲爱的孩子?

我学到了:我们的政府应该强大,

政府始终正确,永不犯错……

这就是我在学校里学到的。

——汤姆·帕克斯顿^②,

《今天你在学校学到了什么?》,1963年^[2]

对于人类历史,包括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我们各族群的历史,我们既要面对其积极方面,也要正视令人不快的一面。我们必须了解那些丑陋的事实,以保护我们不受官方关于事实的看法的干扰。

——比尔·莫耶斯^{[3]③}

只要你相信自己什么也没做成,你就什么也做不成。

——马尔科姆·X^[4]

研究外交事务不换位思考,就等于沉迷幻想,等于把我们的学生置于终身误解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境地。

——保罗·加尼翁^{[5]④}

① “老大哥”(Big Brother),出自英国作家奥威尔的政治小说《1984》,意指专制政府。

② 汤姆·帕克斯顿(Tom Paxton),美国现代民谣歌手。

③ 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美国当代著名记者。

④ 保罗·加尼翁(Paul Gagnon),美国当代历史学家。

一些传统的历史学家批评最近重视文化与社会史的倾向,认为美国历史教科书被带离了它们的叙述中心——美国的国家历史。本人以为,他们的抱怨太过分了。今天的教科书越来越重视妇女问题、奴隶问题、交通模式问题,以及大众音乐的发展等与国家并无直接关系的话题,但是还没有产生一个新的叙述中心。因此,在某些人看来,这些似乎都是不必要的分散话题,因为它们打断了教科书仍在进行的那一基本叙述——美国政府的历史。在我早先考察的12本教科书中,有两本属于“探究型”教科书,其中收录了很多的第一手资料。这两本书不再把国家的历史作为其十分核心的主题。^[6]另外十本“叙事型”教科书以及目前的所有教科书都依然对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举动给予最大的关注。它们仍在把美国历史界定为一系列的总统执政史。

这样一来,比如说《希望之地》为每位总统配了一幅附有小传的肖像,即便对威廉·亨利·哈里森(他只当过一个月的总统)也是如此,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明确提到诸如我们最伟大的作曲家查尔斯·艾夫斯、最有影响的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以及我们最杰出的维护印第安人权利的非印第安族人道主义者海伦·亨特·杰克逊。虽然今天的教科书作者对社会史要比过去着墨更多,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政府的言行要比美国人民所做的事、所听到的东西、所睡的地方、所思考的问题,以及他们的谋生方式重要得多。特别是对伍德罗·威尔逊执政之前的几个世纪来说,这种对于国家的强调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时的联邦行政部门并不像今天这么重要。

关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教科书都讲了些什么呢?首先,它们似乎在说,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国家与1789年所创建的那个国家没什么不同。宪法所设定的制衡机制把某些权力赋予联邦政府各部门,把某些权力赋予州,而把某些权利留给个人。但两个世纪以来,这种制度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对此,教科书作者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所描绘的联邦政府依然是人民的仆人,易于管理、易于驾驭。更荒谬的是,这些教科书贬低非政府机构或普通公民在改善环境、种族关系、教育等各种社会问题上的作用。总之,教科书作者们塑造了一个英雄的国家。这个国家与它的其他英雄人物一样,完美而不带任何瑕疵。这种做法只会把教科书变成一本本反公民手册——要求服从的手册。

要说明教科书的谄媚作风,或许最好的方法是,考察一下当政府的行为应该受到指责时,教科书作者们是如何对待政府的。让我们从各种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思考开始。

大学的政治学课程在分析美国的国外行动时,通常选择以下两种做法中的一种。一种做法是,有些教授或教科书对所谓的“美国巨人”论提出严厉的批评。

在这个“美国世纪”(1917-2017?)里,美国成为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的行为通常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这种批评认为,我们美国人久已放弃我们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真的曾经有过的话。我们现在的行为通常都是为了压制其他国家和人民为争取民族自决而开展的各种合法努力。

另一种更为常见的是那种“现实主义政治”的观念。乔治·凯南在几乎长达半个世纪里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和评论家,他曾在1948年对我们的这一观念做了简洁的论述。身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凯南在一本今天很著名的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的人口只占世界的6.3%,但拥有世界财富的50%。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很难不成为嫉恨的对象。在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面临的真正考验是找到一种能使自己维持这种不对等状况的外交关系模式。我们不必自欺欺人,说什么我们今天有能力为诸如人权、提高生活水平以及民主化等他人全世界的幸福——那是不现实的目标——支付高昂的代价。^[7]

在这种观念下,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进而把美国的国家利益看成是过去的决策者以及今天的历史学家所标榜的那样。因此,他们对我们的行为与政策的分析,目的是为了评价我们这些利益被扩大的程度。

当然,中学美国历史教科书并不接受或暗示“美国巨人论”。不幸的是,它们同时也没提“现实主义政治”的观念。相反,它们接受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套路。它们把我们的政策理解为一幕道德剧:美国所做的一切代表的常常都是人权、民主以及“美国之路”。根据这种观念,当美国人犯错时,那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人误解了我们,或者因为我们误解了形势,但是我们的动机总是好的。这种观念,我们或许可称之为“国际好人论”。

教科书并不致力于直接讨论“好人”是什么意思,或者应该是什么意思。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写道,教科书把美国说成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救兵”。^[8]教科书 222 在这样做时,把我们国家说成是世界的领导,就像把我们的领袖说成是公民的领导一样——他们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化身,是大公无私的和平卫士,是高度负责的世界公民。1961年,肯尼迪总统自豪地说起我们在全球的所谓“义务”,并认为“其他的国家只为自己的利益”,“只有美国这个人口不到世界六分之一的国家,才担当着这一重任。”^[9]今天,这种“和平卫士的负担”已经难以承受:现在的美国在世界144个国家派驻军队,其军费开支比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高。但是,按照肯尼迪以及我们的教科书作者们所倡导的这种“国际好人”观念,这些行为

恰恰表明了我们的利他主义,而不再是我们的霸权的象征。从至少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教科书作者们还在声称,美国在提供外交援助方面,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慷慨。^[10]这种神话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也同样不符合今天的现实。今天,至少有 20 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或者政府支出的比例都比美国大得多。^[11]

教科书作者总想突出我们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的人道主义,这决定了他们对素材的取舍。在我早先考察的 12 本教科书中,除一本外其他全都至少用一个段落写到“和平队”^①,并且充满了崇敬的语调。《生活与自由》夸大地说:“和平队使美国到处被当作朋友”。最近的教科书大部分也同意这种说法。《美国人》声称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只有一本书承认它存在问题。布尔斯廷与凯利指出,“医治贫困人口的病症并不那么简单。”“美国知识青年那时虽然有着崇高的理想,但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必要的技艺。”

“和平队”至少意愿是好的。但美国输出的更重要的、通常也更不具亲和力的,是我们的跨国公司。就拿一家跨国公司来说,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在帮助我国政府动摇萨尔瓦多·阿连德^②的社会主义政府上,起着领导作用;它对智利的影 响胜过美国派往拉丁美洲的所有“和平队”工作者。可以说,同样的情况还发生 在美国驻印度的联合碳化物公司,以及驻危地马拉的联合果业公司上。其他一些 本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也通过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对其他国家产生更为深 远的影响。^[12]有时候,跨国公司的影响是建设性的。比如,当杰拉德·福特总统试 图劝说国会支持对安哥拉的军事干涉,扶植该国内战中的“安盟”(UNITA,全 称为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反政府组织时,海湾石油公司却游说反对这项 干涉。海湾石油公司与安哥拉的马克思主义者政府在开采石油方面有着愉快的 223 合作,但却发现自己的炼油厂处于“安盟”掌握的美军的炮火之下。另一些时候, 跨国公司仅仅是由于本公司的利益,而不是由于国家的利益面临危险,才劝说政 府出兵干涉。

一些学生毕业后可能会被派往国外参战,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对于他们都有 224 着很大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因为美国的政策一直受到诸如特拉华公司、德克萨斯 建筑公司以及纽约银行等的不恰当的影响。还有一些学生可能会发现跨国公司 使自己丢了工作,原因是跨国公司把工厂或计算机流程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 在那里,人们必须为少得可怜的收入工作。^[13]在社会学家以往的描述中,世界被

① “和平队”(Peace Corps),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国会通过《和平队法》,下令成立“和平队”,主要招募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的美国青年到发展中国家从事支援建设工作。

② 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智利总统(1970-1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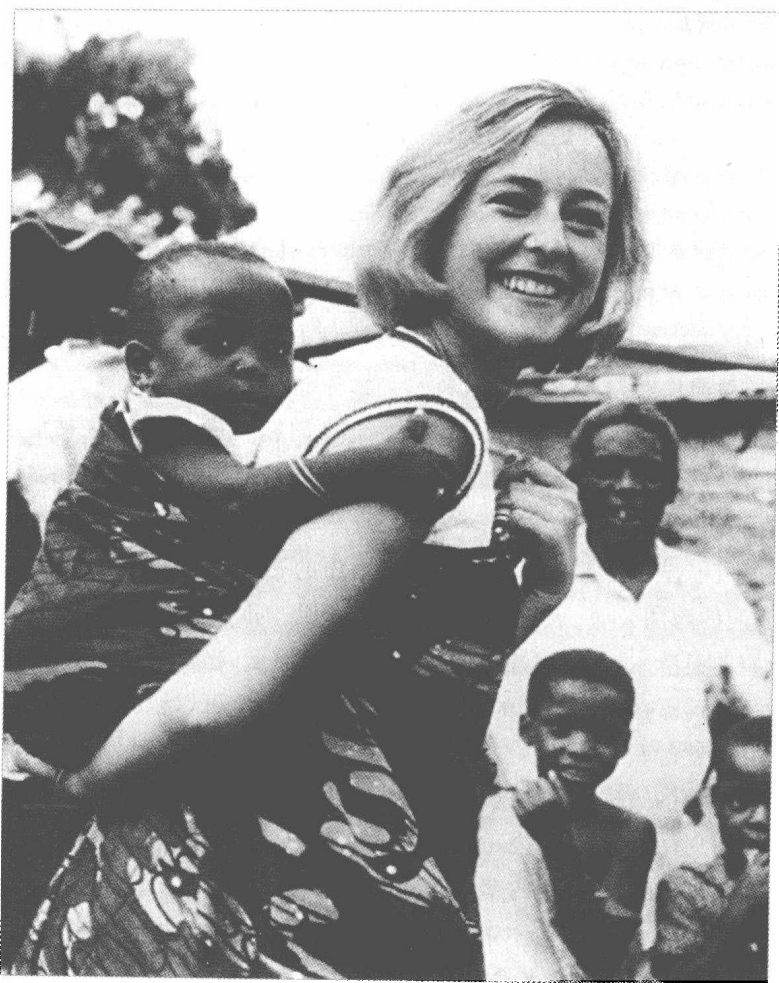


图1 和平队

教科书作者们精选一些图片，以强调我们国家在世界各地的主要作用是带去美好。这幅照片摘自《美国人》，图解为：“一位‘和平队’志愿者身背一个尼日利亚女孩”。我并不反感“和平队”，但是学生们应该知道，“和平队”的主要影响在于其志愿者本身的思想发展上。

分成富裕的工业化中心和贫穷的殖民地边缘；今天的一些社会学家坚持认为，跨国公司以及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使得管理层成为新的中心，而国内外的工人都成为新的边缘。即便学生个人没有受到这种影响，他们也将面对世界的跨国化趋势。由于像沃尔玛或三菱这样的跨国公司的预算渐渐比很多国家政府的预算还要大，“民族经济”这类术语就成为陈词滥调了。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曾指出：“美国经济这种概念正变得没有意义，美国公司、美国资本、美国产品、美国技术等概念也是如此。”^[14]跨国公司可以说是代表了对国家自主权的威

胁,它不仅影响到一些小国,而且影响到美国自己。

当美国人试图思考与我们的政治经济利益有纠缠的跨国公司的各种问题时,他们从美国历史课中所学到的东西不会提供什么帮助。多数历史教科书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跨国公司。这一话题不适合他们的“国际好人”的主旨。在我早先考察的12本教科书中,只有《美国的经历》在其索引中列出了“跨国公司”这一条目,而它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也只有这样一句话:“(一战后在欧洲的)这些投资导致了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拥有利益的大型公司——的发展。”即使这仅有的一句话,也是不正确的:欧洲的跨国公司可上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美国的跨国公司至少从1900年就开始在我们的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

在6本新教科书中,只有两本提到这一条目,并且都把它与“益处”相连。《走向今天》写有这样两句话:

跨国公司提供新的产品和工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方法,由此使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和工人受益。另一方面,强有力的大型公司有时使用它们的经济力量不恰当地对政治家们施加影响,或用不光彩的手段保持利润的增长,由此避开了法律的约束。

这还不够。跨国公司还经常贿赂诸如赤道几内亚、哈萨克斯坦以及尼日利亚 225 等贫穷国家的上层人物。IBM、孟山都^①、先灵葆雅^②等很多大型公司都在这个或那个后来被发现是腐败的国家里或合作或直接介入贿赂事件。比如,在赤道几内亚,石油公司为了获得在这个国家开采石油的特权,为该国政府领导人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为他们在国外学习的子女提供奢侈的生活,或用于租借他们的建筑,或干脆直接用现金贿赂。但与此同时,四分之三的赤道几内亚人营养不良。为什么我们的石油公司要这样来做生意呢?因为他们开采赤道几内亚的石油时只付了大约10%的税额——这比他们在那些公正治理的国家里必须交的税额低得多。^[15]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公司构成了一种反民主势力,牢牢控制这一国家里那些贪婪的上层人物。不管是从现实主义政治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好人”的模式看,这些做法恰恰与美国所应该发挥的那种影响格格不入。渐渐地,我们与诸如几内亚政府等的瓜葛被搬到诸如伊朗等国家里时,可能会反过来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

跨国公司对政府的不恰当影响还不限于外国。教科书还应该讨论它们对美

① 孟山都(Monsanto),美国一家大型农业公司。

② 先灵葆雅(Schering-Plough),美国一家全球性的跨国制药公司。

国自身外交政策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许始于伍德罗·威尔逊执政时期。比如,正是由于纽约第一国家银行的压力,威尔逊出兵干涉海地。按照历史学家巴里·韦斯伯格的观点,当俄国新生的共产主义政府将所有石油资源都国有化后,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就成为美国1918年入侵俄国的幕后“最主要的推手”。^[16]然而,一些教科书使这些背景神秘化。关于经济因素对于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影响,教科书中的最接近正确的描述莫过于新版《美利坚盛典》中的这样一段话:

为了减少麻烦,华府敦促华尔街银行家们把美元大量抛向洪都拉斯以及海地等金融真空区,以阻止其他国家的资金流入该地。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美国不可能允许其他国家介入美洲。后来,美国觉得自己有责任把钱撤向任何它口称要阻止发生经济与政治动荡的地区。

我们的金融介入居然是出于人道主义!《美利坚盛典》的作者们本来可以利用前海军陆战队将军斯梅德利·D. 巴特勒提供的现实主义子弹。他在1931年的声明现在已经很著名了:

我在1914年使墨西哥对美国的石油利益是安全的。我还把海地和古巴变成文雅之地,以便于国家城市银行^①的那帮小生们去捞取利润。我还为布朗兄弟国际银行家族把尼加拉瓜打扫干净……我1916年为多米尼加共和国送去了照明,以便美国糖业在那里发展。我1903年使洪都拉斯变得“右倾”,以适合美国的果业公司。回想起来,我当时或许还可以给“老大”卡邦^②一些暗示。^[17]

226

商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不始于伍德罗·威尔逊执政时期。约翰·A. 霍布森在1903年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描写了富有阶层中的“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用他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的政治力量去干扰那些有他们实业投资的国家的政治环境。”^[18]商业对外交的影响也不是止于威尔逊执政时期。乔纳森·奎特尼的精美之作《无穷敌》列举了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各种不当做法,那些政策或出于个人公司的具体利益,或出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们对美国意识形态利

① 国家城市银行,英文名为 National City Bank,是花旗银行的前身,1927年以后改为现名,1974年再次更名为花旗集团。2007年,作为首批外贸银行之一,在中国正式成立本地法人银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② “老大”卡邦(Al Capone, 1899-1947),美国黑社会头目。

益的误解,或两者皆是。奎特尼指出,从1953年至1977年,掌管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全都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薪水单上榜上有名。迪安·腊斯克^①、亨利·基辛格是1961至1977年间我们的外交政策的负责人,他们的每一笔开支都仰仗于洛克菲勒。^[19]尽管如此,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跨国公司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这种情况并不必然地是由于教科书的作者们害怕冒犯跨国公司,而是因为它们从来就不讨论美国政策所受到的任何影响。相反,它们把我们政府的政策说成是克服艰难形势的理性的、人道主义的应对。它们并不想揭穿政府对自身行为所做的各种解释。

教科书没有解释联邦政府为什么那样做,而且还回避政府的大多数所作所为。即使美国的政府官员承认自己的行为带有各种殊异的动机与意图,教科书作者们仍然把美国政府的行为说成是良好和令人愉快的。在各种不太体面的例子中,突出的是美国的一些官员和机构曾尝试用各种手段刺杀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推翻其政府。在威尔逊执政时代,美国曾雇佣两个日裔墨西哥人企图毒死潘齐奥·维拉^②,至少从这个时代以来,美国就一直沉溺于这类行为。^[20]我考察了所有的18本教科书,想明白它们是如何论述美国后来旨在颠覆他国政府的行为的。为了确信这类事件都得到了历史著作的充分记载,我只考察了1973年以前,即这些教科书问世之前所发生的六个这类事件。这些事件包括:

227

1. 我们援助伊朗的“沙阿”派,废黜首相摩萨德,于1953年恢复了“沙阿”政权。
2. 我们参与推翻1954年的危地马拉民选政府。
3. 我们操纵1957年的黎巴嫩选举,确立了基督徒的上层地位,导致次年爆发了穆斯林反抗和内战。
4. 我们卷入1961年谋杀扎伊尔的帕特里斯·卢蒙巴^③的行动。
5. 我们一再企图谋杀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用恐怖和破坏手段推翻其政府。
6. 我们参与推翻1973年的智利民选政府。

当其他国家对我们做这种事时,美国政府就称之为“国家发起的恐怖主义”。

① 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越战时代美国国务卿。

② 潘齐奥·维拉(Pancho Villa),墨西哥革命领袖。

③ 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 1925-1961),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金)]首任总理。美国被认为于1961年1月17日假手冲伯集团将帕特里斯·卢蒙巴杀害。

当我们得知古巴或利比亚试图影响我们的政治或搅乱我们的经济时，我们会愤愤不平。1993年当我们的离任总统乔治·H. W. 布什访问科威特时，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企图对其实施谋杀，因此，我们的政府对萨达姆表示强烈愤怒，并对巴格达实施报复性轰炸。然而，美国也一直在重演同样的刺杀活动。

我们的评论开始受到重视。在我写作本书第一版时考察的那12本教科书中，有八本只字未提中央情报局(CIA)1953年在伊朗推动政变，将巴列维“沙阿”推上台。现在所有的六本新书都提到我们推翻了摩萨德政权。《美利坚盛典》提供了这样的叙述：

伊朗政府据称是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影响，开始抵制那些控制着伊朗石油的大型西方公司的势力。为此……中情局于1953年帮助策划了一场政变，把穆罕默德·理查·巴列维这位年轻的“沙阿”拥为独裁者。美国的这一干涉行为虽然在短时间内确保了伊朗石油向西方开放，但在很多伊朗人心中埋下了严重的仇恨种子。

这几句话确实为学生提供了某些资料，便于他们理解为什么伊朗人会在1979年占领美国大使馆，并把使馆人员关押一年多时间。

伊朗人长期敌视美国的中东政策，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教科书今天要更加完整地介绍我们在那里所遇到的挑衅行为。不幸的是，与介绍伊朗问题 228 不同，我们的教科书在描写我们的外交冒险时并无改进。在危地马拉，1944年，大学生、城市工人，以及危地马拉中产阶级联手推翻独裁者，建立起民主政府。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民选政府把选举权扩展到美洲印第安人、穷人（暂且用这个词）以及妇女，结束了咖啡种植园里的强制劳动，并发起各项改革。但所有这些，到1954年结束了，当时，中情局威胁要对哈科沃·阿本斯^①政府实行武装入侵。阿本斯曾对抗联合果业公司，打算进行土地改革，并计划修建公路和铁路，那将有可能打破那些公司的贸易垄断。美国选择了一位卑微的陆军上校出任新政府总统，而当阿本斯出逃到墨西哥大使馆寻求避难时，我们就用美国大使的私人飞机把我们的人送到危地马拉的首都。结果，一个压迫集团对多数印第安人实施了长达40年的野蛮统治。

在六本新教科书中，有四本的确提到了这一事件。《美利坚之旅》的描述具有代表性：

^① 哈科沃·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án, 1913-1971)，危地马拉总统(1951-1954)。

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也面临着来自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威胁。1954年，中情局帮助推翻了危地马拉的哈科沃·阿本斯政府，因为一些美国领导人担心它会倒向共产主义一边。

在这里，《美利坚之旅》把反共产主义作为美国政策的唯一动机。可是别忘了，这一事件发生在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正如时事评论家刘易斯·拉普罕指出的，在美国眼里，任何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当危地马拉真正的民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开始像一位民主人士那样说话时，美国却指责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者。”^[21]50年之后，《美利坚之旅》依然保持着美国政府的那种麦卡锡主义论调。其他的教科书只要提到危地马拉，也都如此。

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美国1957年是如何帮助黎巴嫩的基督徒在这个当时不太稳定的国家里控制国会选举的。次年，穆斯林由于在选举中失去了其公平的政治份额，掀起了武装抗争，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派舰队去维护基督徒的利益。在那18本教科书中，有8本提到了1959年的那次武装干涉。《希望之地》的描述最为完整：

接下来，黎巴嫩爆发了骚乱。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担心左翼政变，229
遂向美国请求帮助。虽然不愿意干涉，但是艾森豪威尔还是于1958年7
月向黎巴嫩派出一支15000人的海军。秩序很快得以恢复，军队撤回了。

这是标准的教科书语言：骚乱似乎总是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而美国的干涉总是“不情愿的”。教科书在解释对方行为时所采用的词语，常常是“骚乱”，而非共产主义。新版《美利坚盛典》却基于老套的解释——共产主义：

黎巴嫩这个亲西方的海湾国家受到埃及人的及共产主义者阴谋的双重威胁。在其总统寻求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帮助时，美国果断派出数千人的军队，帮助其恢复了秩序，没有一人丧生。

但是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是黎巴嫩的重要问题。用共产主义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其他国家的骚乱。奎特尼指出，美国在第三世界的行为常常如此拙劣，以至于某些政府和独立运动觉得除投靠苏联之外别无他路。^[22]既然教科书作者们不愿意批评美国政府，他们就把美国的手们说成是不可理喻的。这只会误导和迷惑学生。教科书只有开诚布公地介绍我们的各种行为，才能为读者们提供关于我们

的对手的合理叙述。

《希望之地》接下来讲我们的干涉带去了令人愉快的结果：“虽然黎巴嫩并没有受到共产主义的直接威胁，但是艾森豪威尔表明美国能够很快做出反应。结果，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了缓和。”实际上，黎巴嫩于1975年再度爆发内战，贝鲁特以及整个国家遭到的破坏日益严重。1983年，全面动乱爆发，于是里根总统再次派出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后来，一个汽车炸弹炸死了美军营地里的241名士兵，这促使里根撤兵。有几本教科书提到了这一事件，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对黎巴嫩的持续冲突或者我们在事态发生上的作用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介绍。2006年，“骚乱”再次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组织“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小规模战争的形式在黎巴嫩爆发。教科书对于黎巴嫩历史的肤浅讨论无益于学生去理解这 230 一新的冲突。

“扎伊尔”或“刚果”这样的条目只出现在两本较早的教科书中，一本是《美利坚民族的胜利》，另一本是1991年版的《美利坚盛典》。这两本书都没有提到，中情局促成了1961年对帕特里斯·卢蒙巴的谋杀。^[23]《美利坚盛典》对那场冲突的发生提供了准确的描述：“非洲刚果1960年从比利时手中独立，旋即陷入暴力冲突。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华府出了很多钱，但没有出人。”但该书的描述也到此为止。《美利坚民族的胜利》指名道姓地提到卢蒙巴：“当亲共产主义派的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于1961年被杀时，新的危机发生了。”该书没有提到美国卷入这场谋杀，最后却用愉快的笔调结尾道：“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内战的伤口似乎弥合，刚果（扎伊尔）成为非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但愿如此哦！中情局扶植了前军官约瑟夫·蒙博托上台。到20世纪60年代末，与《美利坚民族的胜利》所描述的恰恰相反，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成为非洲经济和政治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在拙作初版中，我曾预言：“到1994年，扎伊尔爆发‘新’危机的时机成熟了。”事实上，没过多久，扎伊尔就爆发了内战，蒙博托1997年被迫流亡国外。自此，全国各地都开始面临持续不断的冲突，几乎400万人被杀死。然而，今天的学生和作者却无从了解这一新爆发的“骚乱”，因为没有一本提到“刚果”或“扎伊尔”。

也没有教科书——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提到我们多次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24]根据美国参议院的指证，到1965年，联邦政府曾8次试图杀死卡斯特罗，而根据古巴的说法，到1975年，卡斯特罗24次绝处逢生。刺杀的手段层出不穷，包括从拙劣地想让卡斯特罗点燃可爆炸的雪茄，到约请黑手党谋杀他。猪湾入侵失败后，约翰·F·肯尼迪总统发起“猫鼬计划”，以颠覆古巴，用肯尼迪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的话说，这是一次旨在动摇古巴的“大规模的隐秘行动”。塞林格还写道，肯尼迪曾计划动用美国武装力量入侵古巴，但后来迫于古

巴导弹危机而放弃。^[25]没有教科书提到这个“猫鼬计划”。

一些作者避而不谈我们试图刺杀卡斯特罗，这殃及他们对肯尼迪遇刺案的论述。肯尼迪可能批准过早先几次对卡斯特罗个人的刺杀，包括约请黑手党；如此以来，肯尼迪本人的被杀或许可以解释为报复性谋杀。当然，李·哈维·奥斯瓦尔德^①可能是出于他个人目的刺杀肯尼迪，杰克·鲁比可能也是出于他的个人目的杀死了奥斯瓦尔德。然而，由于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肯尼迪如何试图杀死卡斯特罗，因此没有人在谈论肯尼迪之死时能够从逻辑上联想到古巴人或黑手党。^[26]相反，教科书作者局限于诸如《走向今天》中的这种模糊论述：“一些调查支持这样的推论：奥斯瓦尔德身陷一个更大的阴谋，杀了他，有利于保护那些策划肯尼迪谋杀案的人。”

中情局没有从在古巴的失败中学乖，反而把注意力南移。我所考察的 18 本教科书中只有六本提到智利。其中，《生活与自由》坦言：“尼克松总统帮助智利军队推翻了智利的民选政府，因为他不喜欢那里的激进社会主义政策。”这句话埋在论述卡特总统的人权记录的某一章节中，是该书就相关问题所提到的唯一的一句话，但这已是所有教科书中最好的叙述了。《美利坚之旅》与《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这两本新教科书，也附和《生活与自由》的说法，但没那么坦率。这 3 本书把美国卷入的事实——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模糊化。而其他的 12 本书对此完全不着一词。

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卷入变成尚不清楚的问题？历史学家深知，中情局早先曾联手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ITT)，企图使阿连德在 1970 年大选中落败。计划落空后，美国又试图搅乱智利经济，颠覆阿连德政府。美国封锁了各项对智利的国际援助，资助反对派报纸、劳工组织及政党，拒绝出口工业配件，资助并煽动那场全国性卡车司机大罢工，使智利经济陷入瘫痪，并资助和训练军事力量，最终于 1973 年上演血腥政变，杀死了阿连德。次年，中情局局长威廉姆·科尔比证实，“一个受基辛格本人领导的秘密的高级情报委员会曾授权发布一项预算，在 1970 至 1973 年间，先后为中情局共拨付高达 800 多万美元的经费，以‘动摇’阿连德总统的政府。”^[27]国务卿基辛格本人后来解释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只是因为一些国家的人民的不负责任，就把那个国家推向马克思主义。”^[28]由于智利人民的“不负责任”包括推选阿连德任总统，基辛格在这里就公然说美国不应该、也不会尊重其他国家的选举程序或主权——只要那些选举结果不令我们满意。^[29]

①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Lee Harvey Oswald, 1939-1963)，美籍古巴人，被认为是肯尼迪遇刺案的主凶。案发两天后，奥斯瓦尔德在警察的严密戒备和全国性电视直播中当众被后文的杰克·鲁比 (Jack Ruby) 开枪击毙。

教科书需要介绍政府的所有的欺诈行为吗?当然不必。我不是在提倡保罗·加尼翁的所谓“秉笔直书”。^[30]然而,对于我们的至少某些干涉,教科书的确需要 232 予以深入分析,因为那些事件事关重大。从道德立场上去维护这些行动并不是很容易的,但这些行动把美国的外交政策降低到黑手党暗杀的水平,剥去了美国为自己的行动所宣称的合法外衣,并且削弱了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威望。诚然,依据“现实主义政治”的理由,用隐秘的暴力手段去适当地处理国际问题是情有可原的。可以说,美国应该去动摇他国政府,刺杀对我们不友好的领导人,对他们不宣而战。然而,上述6个阴谋行动并不符合这类情况。比如,在古巴,用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的话来说,中情局的“无目的的破坏活动只会提高卡斯特罗的威望。”即便那些破坏得逞了,这些隐秘的行动也只能带来短暂的效果,暂时使那些烦扰我们的人失去权力,但却使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压迫的、不民主的、不受欢迎的主权国家,由此损害了我们的长远利益。^[31]历史学家罗纳·凯斯勒说,中情局一位曾负责策划危地马拉阿本斯下台的官员后来承认,推翻民选领导人是一项目光短浅的政策。^[32]历史学家查尔斯·阿梅林格质疑我们在伊朗的“成功”。他说:“用摩萨德去换阿亚图拉·霍梅尼合算吗?”秘密行动总会有后遗症——来自国外的报复,对此我们很难有效地应付,因为我们在发起行动时没有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当秘密进攻失败时——就像1961年的猪湾登陆,那些行动使得美国政府找不到可行的下一步方案,甚至既不能尴尬地后退,又不能公开地进行军事干涉。如果我们当初不是采取秘密行动,而是将如何处理摩萨德或卡斯特罗问题置于公众讨论,我们或许能够在霍梅尼或者猪湾问题上遭致如此惨败。罗伯特·F.史密斯认为,除非我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那些肩负着其人民梦想的民族主义政府,否则我们将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危机”。^[33]

然而,这种争论不可能出现在美国历史课上,因为,大多数教科书不会透露我们政府的所作所为。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绝大多数都没提到上述6个事件——伊朗的那个事件除外。当有些作者确实提到其中的一两个事件时,他们也通常暗指我们的行动乃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这样,教科书作者们把美国刻画成基本上是个理想主义的行动者,在其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灾难面前表现得慷慨大方。罗伯特·莱基曾谈及“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国家这一神话”,并指出那存在“于美国民谣中”。其实它也存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34]

这些干涉行为还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它们与民主相称吗?针对其他国家、个 233 人或政党采取秘密的暴力行动违反了我们的民主所赖以存在的公开性原则。秘密的国际干涉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内说谎。美国公民如果不了解政府的政策,或许就不能够对它们提出批评。这样,秘密暴力行动常常是对大众意志的愚弄。那些

行动还威胁到我们一贯的分权机制——这一机制是教科书在谈论宪法的章节里所重点介绍的。秘密行动总是由行政部门来执行,行政部门对自己所做的或打算做的事情,通常向立法部门撒谎,由此妨碍了国会履行宪法所赋予它的职能。

美国政府对上述6个对外干涉事件都没说实话。1961年,我国的古巴流放者在猪湾登陆,实施他们那倒霉的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计划。就在同一天,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说:“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我们有没有正在入侵古巴,或者有没有打算在将来那么干。我的回答是:没有。”三天后,在阵亡者中,有四名是美国飞行员。1973年,当作为国务卿出席参议院关于智利问题的听证会时,亨利·基辛格回答道:“我知道,我也相信,中情局与(智利)政变毫无关系。我有资格这样说,以免有些疯子在那里不经引见就向他人乱说一气。”后来中情局局长威廉姆·科尔比以及基辛格本人的声明都与这一证词直接矛盾。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后来也逐渐谴责我们针对阿连德政府的那些行动。^[35]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被人发现明显是在撒谎时,便以国家安全来搪塞。他曾否认美国飞越苏联领空,但结果,那位被俘的飞行员加里·鲍尔斯在苏联电视上承认了事实真相。很久以后,公众才知道,鲍尔斯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至少有31架飞机在苏联上空坠毁,飞机至少载有170人。几十年来,我们的政府向失踪者家庭撒谎,也从来没有向苏联做出足够的交代,以使失踪者返回。因为,我们的飞行是不合法的,被认为是个秘密。^[36]同样,在越南战争中,我们的政府也就我们轰炸老挝保密了很多年,后来也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这种做法并没能欺骗老挝人,他们十分清楚我们在轰炸他们,但美国人被欺骗了。总统及其幕僚严守行动秘密,通常并非出于国外战略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们担心这些 234 行动在国会和美国人民中不得人心。

一次又一次,美国总统们选择不拿自己的声誉去冒险,不愿意通过必需的程序劝说美国人支持自己的秘密军事政策。^[37]我们的宪法明文规定,宣战必须经过国会。早在1918年,伍德罗·威尔逊就曾试图向国会和美国人民隐瞒我们对俄国的干涉。海伦·凯勒帮助揭露了真相。她于1919年给纽约的一家报纸写道:“我们的政府不诚实。他们并没有向俄国公开宣战并宣布战争理由。”“他们嘴上说着民主,暗地里半隐秘地与俄国人作战。”^[38]最终,威尔逊还是未能守住秘密,但是,他却能使那场入侵躲到美国历史教科书之外。这里就出现了问题:对于本章所描述的6次对外干涉,教科书不可能既对它们做出准确的介绍,又不提美国政府在掩盖它们。

大多数教科书所涉及的一致的政府犯罪行为是被称为“水门事件”的一系列丑闻。就大众影响而论,“擅闯水门”事件最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早期,国会和

美国人民发现,尼克松总统曾帮助掩盖一系列的非法行动,包括偷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以及心理医师刘易斯·菲尔丁的办公室。尼克松还试图通过某些途径动用美国国税局、联邦调查局、中情局等各种监管机构,使那些胆敢反对他的政策或反对他连选的、被列入他的“敌对者”名单的人产生畏惧之心。在讲到“水门事件”时,教科书都谴责理查德·尼克松——他的确罪责难逃。^[39]但是,它们都浅尝辄止。面对这一无可否认的政府劣迹,教科书设法保持它们一贯的关于政府的乐观论调。《走向今天》中的如下这段话很有代表性:

很多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政府的信任和信赖。然而,这一丑闻也加强了国家的宪法体制,特别是制衡机制。当行政部门的人违背法律而不是维护法律时,政府的司法和立法部门就会介入并阻止他们。

然而,罢免尼克松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是结构性的,它源于联邦行政官僚机构权力的急剧膨胀。事实上,里根任职期间及老布什首任期间的“伊朗门事件”牵涉到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特工(如奥利弗·诺思)以及以色列、伊朗、文莱等各国政府官员等一大批人的合法与非法的行为。在某些方面,这些丑闻说明当时的行政部门要比尼克松时代更加不受控制。^[40]教科书未能从这个角度去对待“水门事件”,这说明作者们明显在粉饰联邦政府,以使学校里的孩子们对其怀有尊重。既然政府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学生们在他们成年后仍然可能遇到失控的联邦政府实行秘密的、违法的国内外政策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有人已经指出,小布什任职期间的一些“后9·11”行为就是如此。^[41]学生们对政府的认识来自他们的美国历史课程,就此而言,学生们会对这些事件感到震惊和措手不及,不知道该如何去思考它们。

1816年,斯蒂芬·德凯特^①举杯祝酒道:“为我们的国家干杯!……愿她永远正确;但不论对错,她是我们的国家。”教育家以及教科书作者们似乎想教导下一代人对我们的国家盲目地忠诚。超越德凯特一步,教科书的分析就无法用对错标准或现实主义政治的标准去评价我们的对外政策。相反,教科书只是假定,政府在试图做正确的事情。公民们如果接受教科书的观点,大概就会支持我们的任何干涉路径——不管是武装的还是其他方式的,也会支持我们的任何政策——不管它是否会保护我们合法的国家利益,因为他们被劝导相信,我们所有的那些政策和干涉行为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他们从不认为我们的敌人具有同等的人性。

如果我们希望培养公民理性思考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一“国际好人”的说法

^① 斯蒂芬·德凯特(Stephen Decatur),美国军官和战斗英雄,曾参加1812年战争。

恰恰是一种教育上的失策。^[42]对于那些用教科书的陈词滥调培养出来的公民来说,接受乔治·凯南的现实主义政治论或许是最痛苦的事情。在“美国一切都好”的模式束缚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期望过高。但是凯南告诉了我们世界各国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如果我们只让学生接触那些对我们的外交政策的真实描述和分析,我们就不存在民主的没落和西方文明的终结这样的危险。目前,中学课本所谈论的美国外交政策与中学课本的“大哥哥们”——大学政治学课本——所介绍的外交政策之间,还存在着令人尴尬的差异。如果我们能秉笔直书,这种差距或许会缩小。

当中学历史教科书转向美国政府的国内事务时,它们再次与政治学家发生分歧。在分析各种影响我国政府的国内政策的力量时,我们有一大堆导论性的政治学著作可做参考。而中学美国历史教科书简单地把已有的大多数成就都归功于政府。这不足为奇,因为教科书作者在理想化联邦政府时,就必然地扭曲了政府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真正互动关系。当我们考察这一问题在民权领域里的反映时,结果特别令人沮丧。实际上,在这一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数千名公民的果敢行动赢得了政府之认可甚至迫使政府采取行动。

在1960至1968年期间,民权运动一再呼吁联邦政府维护和执行联邦法律,包括《第十四条修正案》以及重建期间通过的其他法案。肯尼迪任职期间,政府的反应尤其不足和令人悲叹。在密西西比,民权运动的各办公室里悬挂了这样一幅感人的控诉文字:

图2 自由

在伊塔贝纳,有一条街,它叫自由。
在密西西比,有一个镇子,它叫独立。
在华盛顿,有一个部门,它叫正义(指司法部——译者按)。

联邦调查局是重要的国家法律执行机构,它对这场运动所提要求做出的反应,具有特别的意义。该部门对非裔美国人的敌对态度由来已久且令人痛心。在伍德罗·威尔逊任职期间,简·埃德加·胡佛以及那个后来发展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组织一开始就展开针对共产主义嫌疑份子的调查。在威尔逊任职的最后四年里,虽然发生的反黑人种族骚乱比我们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但是,威尔逊让密探们主要集中精力收集非裔美国人的情报,而非那些侵犯了黑人民权的美国白人的情报。针对1919年华盛顿特区发生的反黑人种族骚乱,胡佛认为其原因在于“大量的黑人对白人妇女的攻击”。在那一年,特工们设立专门机构,对黑人组织进行监视,而不是对诸如“三K党”这样的白人组织进行监视。联邦调查局成立

之初,其中的黑人特工还为数不少,但是到 20 世纪 30 年代,胡佛把他们削减到只剩两个。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联邦调查局里已没有一位黑人,可是胡佛还是硬说其中有黑人,那就是他的司机。^[43]在南部,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主要是南方白人,他们在乎的只是他们的南方白人邻居们怎么看待自己,并且他们本身就是白人优越论者。虽然这种事后的抱怨使人联想到一位就餐者既抗议汤太难喝,又说汤不够喝,但调查局在南方人手远不够用。在密西西比,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只能将收集第一手资料的任务托付给那些地方长官和警察局长,而民权运动恰恰希望从这些人身上寻求保护。 237

即使在 20 世纪 60 年代,胡佛仍然是一位公开的白人优越论者。他认为,1954 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宣布种族隔离为不合法,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他帮助肯塔基州公诉一位民权运动领袖、白人卡尔·布莱登(Carl Braden,原文如此——译者按),因为此人把白人居住区的房子卖给黑人家庭。1963 年 8 月,胡佛发起一项打击马丁·路德·金及民权运动的活动。在首席检察官罗伯特·F. 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的批准下,胡佛窃听金的电话,在金的旅馆房间里安装窃听器,用录音带录下金与妇女、或关于妇女问题的谈话。联邦调查局把这些惊人的情报,包括电报、手抄本、录音带,送到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等白人优越论者、记者、劳工领袖、基金会理事,当然,还包括总统的手中。1964 年,一位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把一盘记录了金性生活的录影带送到金所在的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办公室,并附上一张建议金去自杀的匿名条子。联邦调查局想必知道,这件事不能使金真的就去自杀。他们的目的明显是想让科雷塔·斯科特·金与丈夫离婚,或者要挟金放弃民权运动。^[44]当金到欧洲去领诺贝尔和平奖时,联邦调查局想方设法地破坏金接受这项荣誉。胡佛称金是“这个国家最令人不齿的说谎者”,并竭力证明“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金不是胡佛的唯一攻击对象。胡佛还对很多人和机构造谣中伤,包括“密西西比之夏”、“种族平等大会”(CORE)、“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等民权组织,以及包括杰西·杰克逊在内的民权运动领导人。^[45]

同时,联邦调查局还拒绝向金转达那些威胁要杀死他的情报。^[46]联邦调查局知道那些威胁是认真的,因为一些民权运动工作者就正在被杀害了。单在密西西比,民权运动工作者有 1000 余人经地方官员之手被逮捕,另有 35 人遭枪击,6 人被杀害。然而,联邦调查局反复强调,保护民权运动工作者免遭暴力侵害不是自己的职责。^[47]1962 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向罗伯特·F. 肯尼迪和简·埃德加·胡佛控诉,要求他们保护民权运动示威者。对联邦政府在远南各州贯彻那些维护民权的法律不报希望后,密西西比的民权运动工作者阿米奇·摩尔和罗伯 238

特·摩西于是想出了1964年“自由之夏”的主意：带领1000多名大学生——多数是白人——到密西西比去与黑人一起争取民权。即便如此，也收效甚微：白人优越论者仅在1964年夏天就炸毁了30座房屋，焚毁了37座黑人教堂。^[48]不过后来，詹姆斯·钱尼(James Chaney)、安德鲁·古德曼(Andrew Goodman)和迈克尔·施沃纳(Michael Schwerner)等民权运动领袖在费城和密西西比被杀害，激起了全国性抗议，于是，联邦调查局最终在杰克逊^①设立了一个办公室。那年夏季之后，在亚特兰大市召开的196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联邦调查局窃听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以及马丁·路德·金的电话。调查局这样做，是奉林登·约翰逊总统之命。^[49]

由于我生活和做研究的地点都在密西西比州，因此我特别关注这个州的联邦政府的行动和民权运动，但是，联邦调查局对黑人组织以及多种族组织的打击是全国性的。比如，在国会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之后，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奥兰治堡，有一家保龄球馆却拒绝执行这项法律。来自附近的黑人州立大学的学生对此提出抗议。州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3人，伤28人，很多人在奔跑时被射中了脚踝，只好伏倒在地，以躲避射击。对此，联邦调查局非但不去协助证实哪些官员在那场现在被称为“奥兰治大屠杀”中开枪射击，反而假传情报，谎称学生们用自己的掩体保护士兵。^[50]在加利福尼亚、芝加哥等北部地区，调查局试图消除“黑豹”组织的“早餐行动计划”，还散布关于性病和召妓的谣言，以破坏“黑豹”队员的家庭。1969年，他们帮助芝加哥警察袭击“黑豹”组织领导人福来德·汉普顿的公寓，并将其杀死在床上。^[51]联邦调查局警告黑人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母亲，谎称“黑豹”组织正密谋杀害她的儿子，卡迈克尔最好逃出美国。^[52]甚至有可能，联邦调查局或者中央情报局曾卷入对马丁·路德·金的谋杀。供出杀害金的凶手詹姆斯·厄尔·雷(James Earl Ray，化名为“艾瑞克·高尔特”[Eric Gault])的那位蒙特利尔的“雷欧”(Raoul)可能与中情局有染。^[53]当然，作为一个没有收入的乡下小伙子，雷从未到过蒙特利尔，也没有能力制造假身份并在孤身无援的情况下逃到伦敦和里斯本。尽管存在这些破绽，或者说正由于存在这些破绽，联邦调查局才从未有兴趣揭发金谋杀案的真相。相反，在1968年金死后不久，联邦调查局两次闯进“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办公室。几年后，调查局又试图阻挠将金的生日设为全国性节日。^[54]

从弗吉尼亚到蒙大拿再到加利福尼亚，联邦调查局对各高校的黑人教职工进行调查。1970年，胡佛批准对“对所有旨在反映黑人学生要求的学生联合会及类似组织可自动实行监视。”我所任教的陶格鲁学院首当其冲：位于杰克逊的调查机构有时甚至要求“压制”整个学校，原因部分在于，该校学生中不乏“无法无

① 杰克逊，Jackson，在此指美国密西西比州首府，因纪念安德鲁·杰克逊而得名。

天的好战的黑人演说家、选举人注册活动者,他们时常举办关于非洲文化的讨论和报告会……(而且)在密西西比广泛宣传黑人民权遭到的各种侵犯。”据此说来,这些行为罪大恶极!^[55]

不仅仅1964年《民权法案》以及1965年《选举法案》这些积极的成就,而且联邦调查局的上述行为,以及联邦领导人对它的姑息乃至指使,都是20世纪60年代遗产的一部分。正如历史学家肯尼斯·奥瑞利指出的,“当联邦调查局与黑人作对时,政府也是如此。”^[56]美国历史教科书是如何对待这一历史产物的呢?它们只简单地撇开政府所做的一切坏事。它们不仅忽略了联邦调查局各种针对民权运动的活动,而且避而不谈它对各种教会组织、各种旨在改进美国的拉美政策的组织,甚至对最高法院的横冲直撞与秘密调查。^[57]教科书甚至对州政府也不想说任何坏话;我所考察的16本叙述型的教科书无不写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这篇著名演讲,但是其中的15本都删除了金对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两州的负面评价。

教科书不仅不谴责联邦政府对民权运动的打压,而且很多教科书事实上几乎片面地赞扬政府在那一时期所带来的进步。这样一来,教科书处理民权问题时遵从的是那种我们可称之为“好莱坞式”的方式。迄今为止,好莱坞关于这场运动的最主要的代表作是艾伦·帕克的《密西西比在燃烧》。^[58]在这部电影中,在一开始的5分钟镜头里,就有3位民权运动工作者被杀,而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却没有出现一位民权运动工作者或密西西比黑人,即使有,他们的年龄也不会超过12岁,观众不可能辨认出那是谁。相反,帕克虚构出两位联邦调查局白人特工,他们一边玩着那种“好警察坏警察”的古老游戏,一边一起动手干掉了杀人者。实际上,在电影所反映的事件中,民权运动的很多支持者,包括迈克尔·施沃纳的遗孀丽塔,以及这场运动所能得到的每一位北方白人朋友,都劝说国会及联邦政府行政部门责令联邦调查局在密西西比设立一个机构,优先考虑将杀人者绳之以法。同时,胡佛还监听谢维纳的父亲电话,看他是否是共产主义者。密西西比州东部的每个人都在几周内就知道了谁是杀害谢维纳的元凶,并且知道纳什巴县的代理县长与之有染。但警察工作没有被要求改进。联邦调查局花3万美元诱使其中的一位案犯供出其同谋者,结果才把那些人逮捕归案。^[59]

本书初版时所考察的那12本教科书对整个民权运动都采用这种帕克式的分析。与抓捕密西西比的“三K党”分子一样,民权运动的进步只是好政府的成就。联邦的好意本身就足以“解释”诸如1964年《民权法案》及1965年《选举法案》这类里程碑似的事件。约翰·F.肯尼迪提出了这些法案,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使它们得以在国会通过,于是,我们今天有了这两项法案,或者,用《美国历史》中

那种不变的被动语态来表达,“另一项民权措施——《选举法案》——被通过。”有几本教科书甚至颠倒了时间顺序,把这些法案写在前面,把民权运动写在后面。《自由的挑战》最为典型:

肯尼迪总统及其内阁响应种族平等的呼声。1963年6月,总统呼吁国会就广泛的权利平等的立法采取行动。在总统的垂范下,数千名美国人开始加入民权运动。1963年8月,20多万人加入到向华盛顿进军的队伍中。

这种论述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颠倒了。肯尼迪一开始曾试图阻止进军活动,并把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打发到挪威,使他不能染指进军活动,因为感到他过于偏向民权运动了。对此,甚至连肯尼迪本人的同党小亚瑟·施勒辛格^①也冷淡地指出:“肯尼迪的优秀品质总体上在他任职期间没能用到种族问题上。”^[60]

糟糕的还不仅仅在于教科书无端地吹捧肯尼迪。更大的危险来自于否认非裔美国人具有学者们所说的“能动性”。1954年最高法院的裁定意味着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批判达到顶峰。以前的畅销书《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与今天的一本畅销书《美利坚盛典》都没有提到,“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的原告与律师都是非裔美国人,也没有提到,先前那个同样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起的诉讼,为此铺垫了道路。最新出版的《美利坚盛典》实际上宣称,肯尼迪的家人——杰克·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推动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及其他民权团体促使黑人参加投票注册。所有的推动过程都被说反了!今天,很多年轻的非裔美国人认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联邦政府在黑人社会强制实施的,他们不知道,那是黑人社会对联邦政府施压的结果。^[61]同时,美国很多白人青年都有理由地认为,联邦政府对黑人够好的了。把非裔美国人及其白人盟友的那些行动都归功于联邦政府,的确挫伤了今天美国非裔学生的能力,也的确使他们觉得自己正如马尔科姆·X指出的——“无所作为”。

幸运的是,最近的6本教科书的确有所进步。它们无不提到阿拉巴马州塞尔马市的非裔美国人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是如何遭到了白人警察的袭击。它们还都提到,作为诱因的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进军是如何促使约翰逊总统和国会通过了1965年的《选举法案》。其中的3本书——《走向今天》、《美国人》、《美利坚之旅》还证明,非裔美国人迫使联邦政府在民权问题上采取更为广泛的措施,只不过它们又宣称,肯尼迪总统本人也倾向于此。^[62]这些

① 小亚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与中情局交往颇深。

书与《美国的经历》、《发现美国历史》一道,的确揭示了民权运动的活力所在:非裔美国人——通常还与其白人盟友一道——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向不公正的法律或现实挑战,后来却导致白人做出野蛮的反应,以保护所谓的“文明”。结果,全国震惊,一些人开始相信,那一法律或现实必须改变。这些书赞扬民权运动志愿者们的勇气。但是,只有1974年出版的《发现美国历史》,才讲到那些运动如何向种族隔离的旧俗发起直接挑战,结果,一些民权运动工作者遭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毒打甚至杀害,只是因为他们作为跨种族夫妻手挽手,或者在餐馆里一起吃饭。

教科书对待环保运动也是如此。它们讲述了“国会通过了”法律,批准成立环境保护署,但却不注意或很少注意环保运动。学生们只会再次得出结论,政府通常总是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新教科书并不比旧教科书要好。对此,很多教师也没有办法。一项针对12位随机抽选的12年级“美国政府”课教师的研究发现,教师们认为,个人能够影响地方或全国政府的唯一途径几乎就是投票。^[63] 242

教科书作者们似乎认为,美国人只要相信自己的政府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他们就会忠于政府。因此,教科书把美国政府描述成值得学生去效忠,而非去批判。“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里”,右翼教科书批评家梅尔·加布勒的搭档詹姆斯·F·德朗在批评《美国的经历》时这样写道,“任何一本旨在描写这个国家的历史的书籍都应该充分认识这份遗产和荣耀。”《美国的经历》在介绍民权运动的基本态势时,含蓄地指出美国政府没有为民权做出它所应该做的一切。结果,《美国的经历》或许不能通过德朗的这一爱国主义检验:“我不会、我也不能同意这样的书在我们的学校使用。”^[64]

教科书这种对联邦政府的近乎谄媚的描述或许有助于自己赢得学校的采用,但却不能赢得学生的注意。如果我们阅读到的全是政府自己所做的一切好事,没有戏剧性的冲突,那真的就没意思了。而且,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已经不再像自己20世纪50年代那样轻信政府了。从越战到“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再到克林顿的性生活,乃至乔治·W·布什为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而杜撰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一件件丑行被揭发,一个个谎言被戳穿,联邦行政部门在美国人民心中的信任被打碎,民调和投票都证明了这一点。1964年,64%的美国人还都相信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而30年之后,这一比例缩小到只有19%。教科书作者们既然不愿意说政府的不是,他们就成为美国最后一批轻信者。他们的信用是很成问题的。他们为学生呈现的是一个良好的政府,这个政府所说的一切都应该被相信。这几乎不是学生父母们的观念,民调显示,学生们的父母们对联

邦政府领导人所说的话保持深刻的怀疑。在学校里几乎看不到关于政府所做的坏事的材料,而父母以及报纸每天都在说着相反的故事,这“使得所有的教育都令人怀疑。”——教育研究者唐纳德·巴尔这样说。^[65]

教科书对政府的这种奴颜婢膝的做法也不能教育学生成为有益的公民。就像“英明的哥伦布”这一故事反映出其背后是一群盲信而鲁莽的船员一样,一个英明的好政府意味着我们公民的恰当角色就是去听从其领袖人物的安排。远的不说,像“第三帝国”、“中非帝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非民主国家,培养的国民都对其政府似乎怀有太多的、而不是太少的忠诚。另一方面,美国却幸运地拥有一批不同政见者。但这些不同政见者有的不得不逃到他国。自1776年以来,加拿大一直是那些对美国政府政策不满的美国人的避难所,从革命时期及之后的那些逃避迫害的托利党,到希望逃避“德雷德·司各脱案判决”的自由黑人,再到逃避越战征兵的适龄青年。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加拿大的这一角色,因为没有一本教科书曾刻画某届美国政府遭受过这样的原则性抵抗。^[66] 243

当然,美国的很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对于民主,政府擅权是一种比公民不忠更大的威胁。很多人担忧,行政部门一枝独秀会腐蚀宪法所设定的制衡机制。一些分析家还认为,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压制力量,已经形成对联邦制的嘲弄。从伍德罗·威尔逊政府至今,联邦行政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强大,现在,联邦行政部门几乎成为国家的最大雇主。过去50年里,中情局、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秘密机构的权力不断增长,在某些人的眼里,它们俨然成为令人生畏的第四个政府部门。当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等政府机构的官员们不仅决定着我们的政策,而且决定着人民与国会对于那些政策的知情程度时,对民主的威胁就愈加严重了。^[67]

通过回避政府的秘密或非法的行为,教科书作者们麻痹学生,使他们不能思考诸如行政部门如何变得越来越独断和越来越隐秘这类问题。教科书站在政府一边,引导学生得出结论:批评政府是与公民身份不相宜的。教科书是在真空中描述政府行为,而不是把它们视为对诸如跨国公司、民权组织等机构的应对,由此,教科书隐匿了人民与其领导者之间的富有创造性的张力。所有这些,都鼓励学生去相信政府已经把一切都决定好了,他们只需举手赞同就可以了,因此,何来忧惧呢?特别是,政府的行为通常都是那么的温良。这样,我们的美国历史教科书最大限度地降低人民的潜在力量,尽管这带有种种爱国主义的努力,但实际上采取了公开的反民主立场。

注释

- [1] 此话针对的是那些关于墨西哥战争的历史著述。引自“JQA...,”in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newsletter, 2/ 1988.
- [2] 引自歌谣:Tom Paxton’s “That’s What I Learned in School,” Cherry Lane Music Publishing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sed by permission, copyright 1962, 1990.
- [3] “An Interview with Bill Moyers,” in *Facing History and Ourselves News*, c. 1991, 4.
- [4] 4. Malcolm X quoted in Gil Noble’s film *El Hajj Malik el Shabazz (Malcolm X)* (Carlsbad, CA: CRM Films, 1965).
- [5] Paul Gagnon, “Why Study History?” *Atlantic*, 11/ 1988, 63.
- [6] 不幸的是,这些探究型教科书绝版了。
- [7] George Kennan, 转引自 Sheila D. Collins, “From the Bottom Up and the Outside In,” *CALC Report* 15, no. 3 (3/1990): 9-10.
- [8] Frances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 (New York: Vintage, 1980), 129.
- [9] 转引自 James Oliver Robertson, *American Myth, American Realit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0), 272.
- [10] Bessie L. Pierce, *Civic Attitudes in American School Textbook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110-11.
- [11] Ruth Leger Sivard, *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 1985 (Washington, D.C.: World Priorities, 1985), 35-37; Curt Tarnoff and Larry Nowels, “Foreign Aid: An Introductory Overview of U.S. Programs and Policy,”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4; David Wallechinsky “Is America Still No. 1?” *Parade* (1/ 14/ 2007) 4. 而且,多数对外援助只针对四五个国家,其中总有以色列和埃及,并且多具有军事特征,较少具有社会或教育特征。
- [12] Larry Adelman 的录像 *Controlling Interest: The World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Newsreel, 1978) 记录了与一些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访谈,表明这些人对美国对于智利的政策有着特别的影响。
- [13] 随着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结束,“第二世界”不再有它过去的意义,“第三世界”也始终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这暗示着我们的世界是第一的。虽然诸如“欠发达国家”这类术语能反映这些国家自身的问题,但由于“第三世界”是这一阶段所

使用的术语,因此我沿用这一术语。

[14] Robert Reich, 引自 Robert Heilbroner,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New York Times*, 2/ 14/ 1993, 25.

[15] “Corporate Crime and Abuse,” Center for Corporate Policy, 网页 corporatepolicy.org/issues/FCPA.htm, 1/ 2007; “Kuwait of Africa?” *60 Minutes*, 7/ 18/ 2004, CBS News website, cbsnews.com/stories/2003/11/14/60minutes; Katy Shaw, “Making a Killing: Corporations, Conflict and Poverty in Equatorial Guinea,” War on Want annual conference 2005, War on Want website, waronwant.org/download.php?id=299, 10/ 2006; Eduardo Cue, “Dictator and Diplomat,” *U.S. News & World Report*, 9/ 17/ 2006, usnews.com/usnews/news/articles/060917/25oil.htm, 1/ 2006; John Vidal, “Oil Rich, Dirt Poor,” *The Guardian*, 8/ 26/ 2004, guardian.co.uk/print/0,,5001814-114321,00.html, 1/ 2007; Justin Blum, “U.S. Oil Firms Entwined in Equatorial Guinea Deals,” *Washington Post*, 9/ 7/ 2004, washingtonpost.com/ac2/wp-dyn/A1101-2004Sep6..., 1/ 2007.

[16] Barry Weisberg, *Beyond Repair*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79. 各种野心以及威尔逊的反共产主义可能是更大的问题。

[17] Gen. Smedley D. Butler, 引自 *New York Times*, 8/ 21/ 1931 的一篇评论, 重印于 Joseph R. Conlin, ed., *The Morrow Book of Quota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Morrow, 1984), 58.

[18] John A. Hobson, 引自 Lloyd C. Gardner, *Safe for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

[19] Jonathan Kwitny, *Endless Enemies* (New York: Congdon and Weed, 1984), 178.

[20] Charles Harriss III and Louis Sadler, *The Border and the Revolution* (Silver City, NM: High- Lonesome Books, 1988), Chapter 1.

[21] Lewis H. Lapham, *America's Century Series Transcript* (San Francisco: KQED, 1989), 48; Greg Grandin, “Your Americanism and Mine: Americanism and Anti-Americanism in the America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orum*, 10/ 2006, 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ahr/111.4/grandin.html (11/ 2006), 1.

[22] Kwitny, *Endless Enemies*, 389. Andrew Kopkind 也指出了这一点, 见 “One-and-a-Half (Strangled) Cheers for the USSR,” *Village Voice*, 2/ 4/ 1980.

[23] 根据美国参议院“丘奇委员会”的举证, 中情局主任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曾指示驻扎伊尔的中情局人员, “干掉”卢蒙巴“应该是我们压倒一切的秘密行动”。见 Satish Kumar, *The CIA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Delhi: Vikas,

1981), 86-90. 后来, 中情局总部把有毒物质送给其驻扎伊尔的特工, 用以毒害处于联合国羁押之下的卢蒙巴。Charles Ameringer 描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于 1960 年 8 月 18 日间接下令杀害卢蒙巴, 见 *U.S. Foreign Intelligence* (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90), 291. 最后, 卢蒙巴离开联合国后, 是刚果人, 而非中情局人员杀害了卢蒙巴, 因此, 虽然中情局同意谋杀, 并曾试图亲自实施, 而且最了解那个将卢蒙巴转移到可被杀害的地方的方案, 但美国还是能够否认与卢蒙巴的死有任何直接关系。另见 Ellen Ray et al., eds., *Dirty Work 2* (Secaucus, NJ: Lyle Stuart, 1979), 15-19, 185-92, and 202-11; Victor Marchetti and John D. Marks,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 Dell, 1974), 131-32; and Kevin Reilly, *The West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9), 412-15.

[24] 《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的确提到美国想要“干掉”卡斯特罗。

[25] Pierre Salinger, “Gaps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Story,” *New York Times*, 2/5/1989. See also Lapham, *America’s Century Series Transcript*, 51; Ameringer, *U. S. Foreign Intelligence*, 285-95; Rhodri Jeffreys-Jones, *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1-40.

[26] Philip Agee and Louis Wolf, *Dirty Work* (Secaucus, NJ: Lyle Stuart, 1978), 270-71.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位肯尼迪刺杀案的嫌疑犯, 只是偶然地恰巧试图进入古巴。我们不知道, “华伦委员会”的官方解释难以服众, 到今天一直引人深思。很多美国人发现, Oliver Stone 的电影《肯尼迪》(JFK) 虽然编造的共谋犯似乎包括副总统约翰逊、五角大楼的高级人物、CIA、军火商、黑手党, 以及摩门教圣殿合唱队员, 但仍不乏信众。教科书对于这种大众轻信情况负有一定责任, 因为它们在讨论肯尼迪遇刺案时十分拙劣。一些人盲目地相信“华伦委员会”的结论, 认为奥斯瓦尔德是唯一的、有着特定动机的刺杀者。也有一些人对华伦委员会心存疑窦, 但对还有什么人可能参与了刺杀完全无知。根据历史学家 Jeffreys-Jones, *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 140, 首席检察官罗伯特·肯尼迪并不想让人们知道肯尼迪总统的“猫鼬计划”或与黑手党之间的密约。在这些问题上的保密, 使得华伦报告不能完整介绍卡斯特罗和黑手党。林登·约翰逊认为, 卡斯特罗可能刺杀了肯尼迪, 以报复肯尼迪对自己的刺杀企图, 但是没有教科书提及这一可能性。见 Nathan Miller, *Spying for America* (New York: Paragon, 1989), 375. 1978 年, 美国国会“众议院遇刺案特别委员会”得出结论, 凶手可能是黑手党, 因为奥斯瓦尔德和刺杀他的凶手杰克·鲁比都是乌合之众; 对这种可能性, 也没有教科书提到。见 G. R. Blakey, “Murdered by the Mob?” *Washington Post*, 11/7/1993.

- [27] Christopher Cerf and Victor Navasky, *The Experts Speak* (New York: Pantheon, 1984), 145; 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 261–64.
- [28] Kissinger, quoted in Thomas G. Paterson, J. G. Clifford, and K. J. Hage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Since 1900* (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83), 589.
- [29] 感谢 David Shiman, 本文这一段里关于智利的一些思想和文字部分源于其 “U.S. in the Third World: Challenging the Textbook Myth,” by David Shiman and James W. Loewen, Chapter 11 of T. M. Thomas et al., eds., *Global Images of Peace: Transforming the War System* (Kottayam, India: Prakasam Publications, 1985), 并在该国再版为 *Global Images of Peace and Education* (Ann Arbor: Prakken, 1987). David 还提醒我“国际好人”这一术语, 并提出了建议。
- [30] Gagnon, “Why Study History?” 60.
- [31] George W. Ball, “JFK’s Big Momen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 13/ 1992, 16–20; Jeffreys–Jones, *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 131; 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 250, 268.
- [32] Ronald Kessler, *Inside the CIA*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92), 41; see also George W. Ball, “JFK’s Big Moment,” 16; Marchetti and Marks,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350–54.
- [33] Robert F.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in Mexico, 1916–193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xiii; see also 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 268.
- [34] Robert Leckie, *The Wars of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8), 12.
- [35] Nicolas Shumway, “Someone to Be Stopped in Chil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5/ 9/ 1993, 19; *Oversight of U.S. Government Intelligence Functions: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U.S. Senate, 94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 [36] Thomas W. Lippman, “138 Reported Missing in U.S. Spy Flights,” *Washington Post*, March 5, 1993; Thomas Powers, “Notes from Undergroun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6/ 21/ 2001, 51.
- [37] Mark Danner, “How the Foreign Policy Machine Broke Dow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3/ 7/ 1993, 33–34.
- [38] Helen Keller, letter to *New York Call*, November 10, 1919, in Philip S. Foner, ed., *Helen Keller: Her Socialist Year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100.

- [39] 有一本书,《生活与自由》为尼克松开脱,它在两处提到,“后来发现的证据表明,尼克松在那个入室案发生之前并不知晓。”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 [40] Richard Rubenstein, *The Cunning of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82.
- [41] Peter Kornbluh, “Back Into the Loop,” *Washington Post*, 8/ 22/ 1993, C2; Fritz Schwartz, *Unchecked and Unbalanced* (New York: New Press, 2007).
- [42] Theodore Draper 也指出了这一点,见“American Hubris: From Truman to the Persian Gulf,”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7/ 16/ 1987, 40–48.
- [43] Kenneth O’Reilly, “Racial Matte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9, 12–13, 17, and 96–99; 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 109.
- [44] O’Reilly, “Racial Matters,” 43, 126, 144, and 355; David J. Garrow, *The FBI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New York: Penguin, 1981), 125–26, 161–64; Taylor Branch, *Parting the Wate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861; 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 322–23; Frank J.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0), 214–19; Athan Theoharis and John Stuart Cox, *The Bo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54–57. 那时候的媒体重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分野,通常也拒绝采用这些材料。
- [45] 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 323; Branch, *Parting the Waters*, 835–65; O’Reilly, “Racial Matters,” 140, 186; Garrow, *The FBI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130–31;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217.
- [46] Branch, *Parting the Waters*, 692.
- [47] O’Reilly, “Racial Matters,” 357.
- [48] James W. Loewen and Charles Sallis, eds., *Mississippi: Conflict and Change* (New York: Pantheon, 1980), 265–83.
- [49] O’Reilly, “Racial Matters,” 186.
- [50] 同上, 256; Arlie Schardt, “Civil Rights: Too Much, Too Late,” in Pat Watters and Stephen Gillers, *Investigating the FBI* (New York: Ballantine, 1973), 167–79.
- [51] Adam Hochschild, “His Life as a Panther,”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uary 31, 1993; O’Reilly, “Racial Matters,” 302–16;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220–32.
- [52]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220.
- [53] 这位 Raoul, 明显姓 Maora, 并不一定和 “Raoul” 是同一人。根据 Ray, “Raoul” 策划了整个谋杀,但是,一直查无此人,因此他很可能是虚构的。

[54]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214-19; John Edginton and John Sergeant, "The Murder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Covert Action Information Bulletin*, no. 34 (Summer 1990): 21-27; Theoharis and Cox, *The Boss*, 439. See also Ameringer, *U. S. Foreign Intelligence*, 322; John Elliff, "Aspects of Federal Civil Rights Enforcement," in *Law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5 of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643-47.

[55] O'Reilly, "Racial Matters," 336-37. 分区主管曾批评杰克逊的调查局特工,提醒他们要把精力集中在“陶格鲁政治行动委员会”(Tougaloo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上,“因为陶格鲁学院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反情报目标。”另见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219-20. Donner 指出,联邦调查局强迫穆罕默德·肯亚塔(Muhammad Kenyatta)这位杰克逊的杰出的黑人民族主义者离开密西西比。在内部备忘录中,联邦调查局特工提出要捉拿肯亚塔,罪名是他试图偷盗陶格鲁学院的电视机。实际上,肯亚塔在那样做刚要被抓住时就匆忙离开了。

[56] O'Reilly, "Racial Matters," 337.

[57] Ross Gelbspan, *Break-ins, Death Threats, and the FBI*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1).

[58] Danny Glover 的 *Freedom Song* 虽然描写得更准确,但几乎不为人知。

[59] Seth Cagin and Philip Dray, *We Are Not Afrai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1)写到了那些凶手,以及联邦调查局是如何勉强地、但最终还是有效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60] Arthur Schlesinger Jr., 引自 Branch, *Parting the Waters*, 918-19.

[61] See Beverly Kraft, "Some Lack Knowledge About Evers," *Jackson Clar-ion Ledger*, January 20, 1994, 1A.

[62] 在一定程度上,Boorstin and Kelley 也提出了这种分析,但是他们在总体上仍很含糊,可能会使学生得出相反的结论。

[63] Patrick Ferguson, "Promot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eachers' Attitudes and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San Francisco: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1989).

[64] Critique by James F. DeLong (Hoover, AL: 1986, 手稿,散见于 Mel Gabler's Educational Research Analysts, 1993).

[65] Donald Barr, *Who Pushed Humpty Dumpty? Dilemmas in American Education Today* (New York: Atheneum, 1972), 308; Lewis Lapham, *Pretensions to Empire* (New York: New Press, 2006), 24.

[66] Michigan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1982~83 Michigan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Report* (Lansing, MI: Michigan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1984).

[67] Rubenstein, *The Cunning of History*, 80-82; Clarence Lusane, *Pipe Dream Blue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1), 4, 116-22, and 200-201.

第九章

不见罪恶：教科书选择不讲越南战争

244

如果我们不说,别人就会胡编乱造。每一个尸袋、所有的坟墓就会被重新开启,从里面发出的咒语就会渗进高尚的事业。

——乔治·斯维尔斯,越战老兵^[1]

我们毁坏了他们两个最宝贵的组织:家庭和村庄。我们毁坏了他们的土地和庄稼……我们毁了他们的妇女和儿童,杀死了他们的男人。

——马丁·路德·金^[2]

若没有书刊审查,在公众思想中,事情将变得可极其混乱。

——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3]①}

他热爱自己的国家,但谴责并绝不宽恕它的罪恶。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4]

我们这些大学教授们年事渐高,却越来越惊讶地发现,我们的大学生们对近期的历史反而知之甚少。我第一次发现这种现象时,岁月正从20世纪70年代无情地迈进80年代。我讲授越南战争,但台下变得表情漠然。在大学一年级新生中,一开始是四分之一的人,后来是二分之一的人,到90年代变成五分之四的人,都不知道“鹰”(hawk)与“鸽”(dove)这两个四字母单词的含义。1989年,我为学生上第一节课时,给他们做了个小测验,要求他们自由回答一个问题:“谁在越南打仗?”几乎1/4的学生说交战双方是北韩和南韩!我惊呆了,这就好像问:“1812年英美战争始于哪一年?”居然回答“1957年”。事实上,很多近年毕业的高

① 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 1914-2005),美国陆军上将,曾任驻越美军最高指挥官。

中生对 1812 年英美战争的了解多于对越南战争的了解。^[5]

指责学生没有多大意义,也的确于事无补。这很难说是他们的错。如果我们 245 对国家事务的记忆始于 10 岁左右,那么有越战记忆的年龄最小的一届中学生应该毕业于 1983 年春季。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学生的父母来说,越战已是记忆的盲区,妇女运动、“水门事件”、伊朗人质危机也是如此。现在的学生们需要从中学美国历史课中了解关于越南战争的知识。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教科书中,学生们并不能了解到多少东西。战争结束在 1975 年,在讲起诸如所谓“美国最漫长的战争”等冲突时,即便是最早出版的教科书也可以因为是事后评论而沾光,教科书作者们本来可以充分展示关于事件的个人看法。但他们把这些优势白白浪费了。

比较一下我一开始所考察的 12 本教科书在越战和 1812 年战争上的不同篇幅,会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1812 年战争发生在几乎两个世纪以前,可能有 2000 美国人被杀。可是,我一开始所考察的那些中学历史教科书却对 1812 年战争与越战花了同样多的篇幅——9 页。我想,有人会说,1812 年战争比越战重要得多,即便发生在那么久之前,也值得花这么多的篇幅来讨论。我们的教科书就是这样认为的,但他们的大多数作者并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 1812 年战争,也没有指出它的特殊重要性在哪里。

由于 1812 年战争持续的时间只有越战的一半,教科书作者们就对其介绍得更详细。他们在讲到一些个别战斗或个人英雄时,从不惜墨。比如,《希望之地》用 3 个段落去写伊利湖普汀湾^①的海战,每一个小时的战斗就写一段。而越战就没有这么多的篇幅。

篇幅不足还只是问题的一个部分。关于越战,长达 9 页的分析应该说是足够了。^[6]我们应该问的是,教科书的那些篇幅都讲了些什么呢?

在本书初版时,我并没有就越战做出自己的论述,因此也就无从批评教科书作者提出了与我不同的分析。相反,为了避免被指责带主观性,我把讨论焦点放在教科书所提供的那些照片上。越战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形成了一大批照片,这些照片深深地烙入了大众思想之中。我考察了其中的 7 幅照片:5 幅著名照片(如:一个小女孩赤身跑向摄像机,以逃避燃烧弹的袭击;梅莱(My Lai)大屠杀中堆放在沟渠里的尸体)和 2 幅反映战争破坏性的图片。自从马修·布雷迪^②拍下他 246 那些著名的内战照片以来,照片就是美国战争记录的一部分。越战期间,电视图

① 普汀湾(Put-in-Bay),地名,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伊利湖附近。1812 年战争期间,英国与美国海军曾于此战斗。

② 马修·布雷迪(Matthew Brady),美国 19 世纪著名摄影师。

像加入进来,与照片一道塑造了美国人民的认识与鉴赏力。即便包括我们最近的两次伊拉克战争在内,越南战争依然是与照片和电视关系最密切的战争。

我曾让很多生活在那个战争年代的老年人告诉我们他们所记得的战争场景,他们提供的差不多都是那几幅画面。现简要列举下列5种:

1. 一个佛教僧人坐在西贡街口自焚,以抗议南越政府;
2. 一个小女孩赤身裸体在一号公路上奔跑,以逃避燃烧弹的袭击;
3. 国家警察局长枪决一个惊魂不定的越共男人,用左轮手枪对准他的头部一侧;
4. 梅莱大屠杀中布满尸体的壕沟;
5. 美国人用直升机从西贡的屋顶上撤离,绝望的越南人试图爬上直升机。

这个名单还不包括另外两幅图片:B-52 轰炸机在投弹,下面是千疮百孔的越南乡村;当美军和南越军队在“新年攻势”之后重新占领顺化等城市时,城市一片破败,只剩下碎石瓦砾。^[7]



图1 自焚抗议

僧人释广德,率先以自焚的方式抗议美国支持的南越吴庭艳政权,此举让越南人民与美国人民感到震惊。战争结束前,还有几位越南人和至少一位美国人效仿释广德的这一做法。



图2 燃烧弹下的“裸奔”

这个小女孩名叫潘金菊，正尖叫着在一号公路上奔跑，以逃避南越飞机对她的村庄的突然袭击。她一边跑一边脱掉自己被烧着的衣服。关于她逃跑的电视与照片记录当时是战争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这幅照片同时冒犯了教科书的两条禁忌：没有教科书刊登裸体照片，也没有教科书刊登这样的痛苦场景，即便那是在战争时代。

只需读一读这些简短的描述，大多数美国老人就能回忆起那些惊人的细节场景。与这些描述相伴随的那些情感，也会鲜活起来。当然，由于美国人主要是在1965到1973年间卷入战争的，那么，能回忆起那些战争场景的美国人今天大多超过40岁了。如果教科书不介绍这些场景，年轻一代的美国人是没有机会看到或者回想起它们的。

1995年，我所考察的那12本教科书有很大的失误。只有一本书《美利坚盛典》包含了其中的一幅图画：警察局长枪杀那位惊魂不定的男人。^[8]其他的教科书都没有收录上述任何一张照片。《美国的经历》包含了一幅我们轰炸越南的照片，但是那幅照片从低处拍摄B-52轰炸机和炸弹，没能反映地面上的破坏情况。因此，需要改进的地方仍然很多。

这里提到的7幅照片是越战第一手资料的重要代表。“鹰派”（支持战争的人）或许会说，这些照片夸大了那场战争的某些方面，然而，这些照片还有着另外的历史意义：它们实实在在地制造了历史，增强了新闻的故事性，改变了世界各地看到这些图片的人思考那场冲突的方式。帕特里克·哈格皮安曾研究了美国人 248 关于越南战争的记忆模式。根据他的说法，这些照片中有些“即使在今天（1991年）仍不失为举世闻名的图片。”^[9]不用这些照片，就是在欺骗读者。我的一位学生写道：“通过展示那个女孩在遭到燃烧弹袭击后赤身裸体地哭喊的照片，那场



图3 枪杀越共

南越国家警察局长阮隆(Nguyen Ngoc Loan)在西贡街头随手就枪杀了这名越共成员,时间是1968年2月1日。一名美国摄影师和电视工作者看到这一幕。这个照片有助于告诉美国人,站在自己一方的人并不比共产主义分子更具道德。^[10]这个照片如此令人难忘,以至于40年之后,我还经常像举枪一样举起我的手指,而那些到1968年已不能再读报看电视的老人一看到这个照片,就立刻回想起那一事件,并能够描述其中的一些细节。

战争在中学生心目中的意义整个地改变了。”

在越南,美国投下了三倍于二战战场上的爆炸物,包括我们的在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因此,教科书作者们有很多反映炸弹造成的破坏的照片可供选择。在地面上,在“新年攻势”中,越共与北越军队一度占领了越南南部的全部城市和乡村,但后来,美国与南越军队在夺回顺化、槟知、广治等城市之前,对它们狂轰滥炸。没有一本教科书说到了我们这一方造成的破坏。

那时就是那样。本书第11章将讨论在最近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越战如何仍然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以及教科书如何轻视年代较近的历史, 249 无论它是多么重要。既然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那场战争已渐渐远去,那么教科书该怎么办呢?

两个“遗产型教科书”——布尔斯廷与凯利的那本教科书,以及《美利坚盛典》——都借鉴于比自己早半个世纪出版的教科书。这两本教科书都还在漫无目的地在1812年战争与越南战争上花同样大小的篇幅。两本书都没有收录关于越南的那些重要照片。《美利坚盛典》实际上在倒退:它撤除了那张警察局长枪决越共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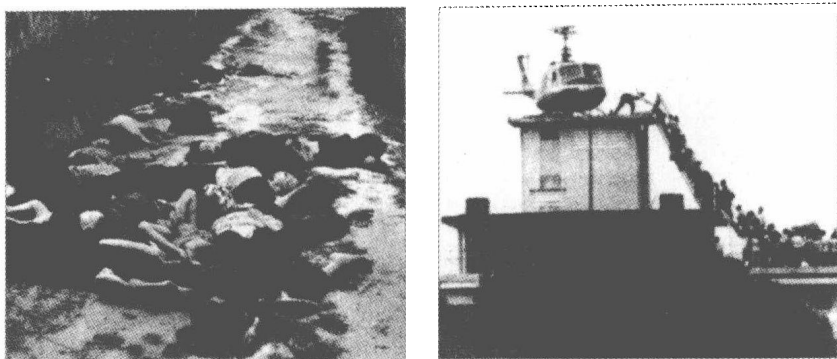


图4 越战图片(两幅)

左图:在梅莱大屠杀中,美国作战部队屠杀了妇女、老人和儿童。这幅照片是罗纳德·黑伯利的众多摄影作品之一,当时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它把那场大屠杀深深映入了全国人民的头脑中,并且至今对我们的文化仍有影响。^[11]大多数描写越战的好莱坞电影都讲到了梅莱大屠杀。《野战排》就是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

右图:1975年4月29日,这架美国直升机从西贡的一个房顶上撤离人员。第二天,西贡陷落,美国人(以及越南人)的漫长噩梦从此结束。这幅照片拍摄时,今天活着的美国人多半还不到10岁,甚至还没有出生。因此,多数美国人只是从电影和教科书中去了解战争。2007年1月4日,《华盛顿邮报》用半页篇幅刊登了这幅照片,并加上标题:“在伊拉克最后也是如此吗?”

三本“全新的”书籍,以及《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其版本可上溯到托德与柯蒂的《美利坚民族的胜利》),对越战花了更大的篇幅。《美国人》写了34页,但是,它软弱的笔调使它对战争问题的处理不够有力。虽然《美国人》包含了21幅战争插图,但只有一幅——《僧人自焚》——属于我所列的那7幅照片之一。它的21幅插图没有一幅能说明美国给越南带来的破坏。《走向今天》也包括了那幅自焚图片,它与《美利坚之旅》还都介绍了那次从我们的大使馆附近的一个屋顶上的撤离。《美利坚之旅》还提供了一幅很普通的坍塌建筑物的照片;《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描写了B-52轰炸机轰炸后留下的弹坑。这就是所有的6本新教科书的情况。

当然,教科书的作者与编辑是在数千幅关于越战的照片中做出这样的选择的。他们或许还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而且依然可以恰当地论述这场战争。但是,他们至少必须写到对越南平民的暴行,因为在那场没有前线的战争中,我们的武装力量常常陷于敌我难辨的境地,因此,那些对平民的暴行时有发生且难以避免。实际上,打击越南平民是美国的既定政策。关于平民伤亡问题,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描述道:“战争的确削减了敌方的人口,难道不是吗?”^[12]我们衡量战绩的标准是死亡数,以及新增的自由开火区的数量——在那些区域,所有平民都被视为敌人。这样的战术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罪行。任何一幅关于美国士兵放火烧毁越民“草棚”——这在那场战争中是司空见惯的——的照片,都可以说明这一

点,但是没有教科书描述了这类行为。^[13]《美利坚之旅》收录了一幅快照,反映的是一群水兵“爬上一个碎石堆,那曾经是顺化的一个碉堡”。读者或许能推断出,我们的军队已经把碉堡夷为碎石堆。结果,这幅照片成为教科书中仅有的一幅反映由我们所导致的、甚至是对于战争目标的合法的破坏的照片。今天的教科书本身似乎就在实行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在指挥越战时所盼望的那种书刊审查机制(见本章开头的引语)。不幸的是,书刊审查只是混淆了视听,无助于纠正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认识。

梅莱大屠杀并非一个小的事件而不值得写进一个国家的历史;相反,恰恰由于它是整个越战中众多错误事件的一个象征,它才具有重要价值。梅莱大屠杀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以前的“反越战老兵组织”成员、现任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说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在各级指挥官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在日常行为的基础上犯下的罪行。”1971年4月,在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演讲时,克里说道:“150多位功勋卓著、光荣退伍的老兵都可以证明发生在南亚的那种战争罪行。”他接下来还讲到美国士兵如何“强奸越南民女,割掉越南人的耳朵,砍下他们的头颅,把电话线缠到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接通电源,卸去人的四肢,向尸体里充气,随意地射杀平民,效仿成吉思汗那样把村庄夷为平地,射杀家畜或狗以取乐,向谷仓里掺毒,在南越乡村进行大扫荡。”克里在其证词中指出,所有这些,“都还不包括常规的战争破坏”。^[14]

251

在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其实只有《发现美国历史》这本最老的教科书把梅莱大屠杀视为只不过是一个独立的事件。《美国人》对于梅莱大屠杀的报道非常充分,比其他教科书都要好得多,但它也从来不提对平民的攻击是一个常见现象。教科书对这一事件的沉默,除了使学生不了解那场战争的历史外,也会使反战运动变得不可理解。

詹姆斯·W. 戴维森与马克·H. 莱特尔这两位教科书作者还有一点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他们都知道梅莱大屠杀的意义。莱特尔曾对我说:“美国将暴行纳入战术之中。”戴维森和莱特尔在其《事实的背后》的某一章中,将主要篇幅用于介绍梅莱大屠杀。在那一章里,他们介绍了梅莱大屠杀的消息如何使美国举国震惊。“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他们写道,“那场遭遇在大众的战观念中是个决定性的时刻。”^[15]但是,坦率地说,他们并不认为中学生需要知道那场大屠杀。他们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与我所考察的另外10本教科书一样,从未提及梅莱大屠杀。^[16]

教科书如果排除了这些关于越战的重要照片,还能收录什么呢?首先,是那些不带争议的快照:一批军人在沼泽地带巡逻,或者从直升飞机上空降。有10本 252



图5 约翰逊视察金兰湾

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战争期间视察金兰湾的美军基地，士兵们高兴地簇拥在他的周围。这是《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中唯一一幅军队照片。

教科书展示了由“敌方”造成的破坏和产生的难民，但是由于这种破坏比起我们的炮击来说常常程度较轻，因此这些照片就没有什么吸引力。

这是一种让人愤怒的行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其开脱。乔伊·哈基姆以她为五年级左右的学生所写的教科书《合众国的历史》向人们证明，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她在书中收录了那张警察局长射杀那位惊魂不定的男人的照片、一位卫兵用小刀威胁一名越南战俘的照片、被“我方”捣毁的一个市镇的照片，以及那张最著名的关于梅莱大屠杀的照片。令人惊奇的是，哈基姆还向读者提供了那副裸体小女孩在一号高速公路上奔跑的照片。这之所以令人惊奇，主要是因为，教科书出版商们通常遵循一条“无裸体”原则。一位编辑曾告诉我：“在小学书籍中，连奶牛都是没有乳房的。”然而，哈基姆的这套教科书十分畅销，这或许还因为它比大多数正统教科书更加易读。

那么那些教科书的文字又如何呢？大多数教科书作者都忽略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令人难忘的名言。马丁·路德·金是第一位站出来反对越战的主要人物，本章篇头引用了他那标志性的抑扬顿挫的话语，但没有教科书引用这段话。^[17]更著名的是当时的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穆罕默德·阿里的抗议。阿里拒绝应招人伍，因此被剥夺了冠军头衔。他说：“越共从来不把我叫做‘黑鬼’。”所有的18本教科书都不提这句话。“新年攻势”之后，一位曾参加过槟知镇争夺战的美军官员说：“现在，为了守住它，我们不惜捣毁它。”对于几百万美国人而言，这句话道出了美国对越南

的影响。但没有教科书提到这句话。^[18]也没有教科书提到约翰·克里关于立即撤军的呼吁：“你怎能要求一个人为了一个错误战死到最后？”^[19]大多数教科书也都没有引用下面这样一些反战歌词——“地狱，不；我们不去！”，以及“嘿，嘿，约翰逊，今天你杀了多少子孙？”。当然，最主要的，是忽略了反战热情。实际上，在很多教科书中，反战运动整个地变得不可理喻，因为它们不给反战运动说话的机会。实际上，那些被引用的人仅限于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以及国务卿亨利·基辛格。^[20]

有3本新教科书做得较好。新版的《美利坚盛典》以及《我们美国人》(We Americans)从反面引用了这些歌曲。它们与《走向今天》都比以往的教科书花了更多的篇幅去介绍反战运动以及战争背后的污点。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总会有所改进。越战离我们越来越远，终将被将盖棺定论，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教科书作者们将更加坦白地对待这场战争，就像现在对待奴隶制问题一样，毕竟，冷战已经结束，就像以前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已经结束一样。 253

然而，这些教科书内容庞杂，这或许反映了它们是多位作者合作的产物。本书第12章将揭示，中学美国历史教科书封面上所列的那些作者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动笔撰写，特别是没有动笔撰写其后来的版本。有两本相互竞争的教科书关于越南战争的写法说明了这一点。

图6 关于越战的两段论述

由于一些敌军生活在普通百姓中间，美军很难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一个向美军士兵出售饮料的妇女可能是越共间谍，一个站在角落里的男孩可能会扔来手榴弹。

——《美国人》

美军……从来不能确认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一位在路边卖饮料的越南妇女可能是越共分子，在默数着有多少政府军经过。一个叫卖糖果的小孩或许正在打开手榴弹的拉环。

——《走向今天》

很难说这两段话是由各自独立的作者写成的。难道是吉拉德·丹泽(或其某位所谓的“合著者”)模仿了《走向今天》，或者阿兰·温克勒(或其某位所谓的“合著者”)模仿了《美国人》？若如此，就会有人指责他们抄袭。然而没有人提出针对中学教科书的这种指责，因为出版业的每个人都知道，那些教科书的“作者们”并没有真正地撰写它们。或许，《走向今天》以及《美国人》的出版商们碰巧请了同样一位自由撰稿人去编写或修订这两本书。另外还有一些未署名的参编者为其添加了照片，并编配了标题和教学建议。

用不署名的不同作者撰写不同的章节，编配不同的图片，进行不同的修订只会造成误导，因为学校系统在选择某种教科书时，部分原因是觉得它出自杰出的

历史学家之手。不仅如此,这种做法还使教科书内容前后不符。在一篇关键论述中,不同段落往往前后矛盾。展现不同的观点是件好事,但教科书却不应那样做。相反,在讲述越战时,那些段落总是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地讲,很少表现出总体的组织性,也没有提供观点和解释。它们不可能有组织性,因为它们的编委会缺 254 乏组织性,其成员甚至从未谋面。难怪,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重写美国》之外,还著有《湖中战火》,这是一本很不错的越战书籍。关于自己 1979 年所评论的那些书籍,她说它们“在越战问题上既非‘鹰派’也非‘鸽派’——它们只是在躲闪。”她还说:“既然讨论越战而避开那些主要问题的确是非常困难的,那么那些教科书中关于越南问题的章节就非常耐人寻味了。”^[21]

在某种程度上,确定问题就是在解释问题。我也不想去挑剔这些教科书,指责它们提出的解释与我自己的不同。或许我与那些作者还可以达成一致:任何关于越战的合乎情理的论述,都应该至少包含以下六个问题:

美国为什么出兵越南?

美国介入之前,战争是什么样子? 我们导致了哪些变化?

战争是如何改变美国的?

为什么反战运动在美国变得如此强烈? 它对越战提出了哪些批评? 那些人批评得对吗?

为什么美国打败了?

我们可以从中吸取那些教训?

这些问题一列出来,我们就能够认识到,每个问题都仍然充满争议。首先看第一个问题。今天一些人坚称,美国在越南作战是为了确保得到这个国家的宝贵的自然资源。而上一章提到的“国际好人论”认为,我们在越南作战是为了给越南人民带去民主。或许更常见的是对我们国内政治的这样一种分析: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亲眼看到共和党人是如何严厉谴责杜鲁门“失去”中国的,他们不想被人认为正在“失去”越南。有一种现实主义政治观强调这样的“多米诺效应”:一些领导人认为,如果越南“落入”共产主义者之手,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也会如此。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越南的共产主义者与中国是敌对的,但我们今天知道了。然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感到自己的优势难以维系,因此不希望在越南战败,以免“美帝国治下的和平”^①在非洲、南美洲等世界各

① “美帝国治下的和平”,原文作 Pax Americana,源自拉丁文 Pax Romana(罗马帝国治下的和平)。

地受到威胁。^[21]一些“共谋论者”甚至声称,是一些大公司在调唆战争,以带动经济发展。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目光较为长远,他们指出,我们对越南的干涉源于一种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始于1622年发生在弗吉尼亚的第一次印第安战争,经过19世纪的“天定命运”,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所谓“美国世纪”。²⁵⁵他们指出,在越南的“美国大兵”收集并展览越南人的耳朵,这种做法与英国殖民者在北美收集和展览印第安人的头皮如出一辙。^[23]最终的观点或许是这样的:那场战争没有明确的原因,当然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或者说,我们鲁莽地卷入了那场战争,只是因为后来的政府没有勇气去解决我们在1946年犯下的那个错误——反对普遍兴起的独立运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写道,当“我们的政府听信”法国和英国,去“恢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位”时,“我们在印度支那的错误在1945年就被奠定了基础。”^[24]

也许,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战略在1918年凡尔赛和会期间就埋下了种子。当时,伍德罗·威尔逊拒绝采纳胡志明提出的关于国家独立的呼吁。也许,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定下的不支持法国在二战后重新殖民东南亚的政策随着他的去世而走向终结时,这些种子开始发芽了。既然教科书很少提到一个阶段的事件会导致下一个阶段的事件,那么就不必奇怪,我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没有哪本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历史去寻找对越战的解释。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能为这些自相矛盾的解释提供的历史证据并不多,相比之下,它能为其他解释提供较为充分的证据。只不过在这里,我并不偏向任何一种解释了。^[25]教科书作者们也不需要选择偏向哪一种。他们可以提出好几种解释——每一种都能找到历史支持,并向学生推荐自己的结论。然而,这种挑战做法并非教科书作者们的风格。他们似乎热衷于对所有的问题,哪怕是悬而未决的争论性问题提出“正确的”答案。

那么,他们选择什么样的解释呢?不管怎样,那一定不是上面说到的那些!大部分教科书只是在回避问题。下面是《美国的经历》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分析:“在20世纪50年代末,越南战争爆发了。这次美国选择支持南越政府。”“战争爆发了。”——还能有比这更简单的描述吗?《美国的经历》花了4页讨论我们为什么卷入1812年战争,但是对于我们为何参加越战,只写了短短这两句话。一些新教科书也仅从反共产主义角度去解释美国的介入。

教师也不能弥补教科书在越战问题上的缺陷。根据琳达·麦克尼尔的研究,大多数教师都特别不想讲越南问题。“他们对越战时代的记忆使他们想回避那些可能会使学生不同意的结论,或者可能会使学生对美国的各种机构变得“愤世嫉俗”的问题。”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来看,教师一学年中对越战只讲0到

4.5分钟。从这时起,相关内容有减无增,很多大学生透露,他们的中学历史课程对朝鲜战争时代讲得越来越少。^[26]

我们的教科书和大多数教师都没有帮助学生去批判性地思考越战问题,寻找证据去支持自己的结论。他(它)们也从未提出“战争是正义的吗?它合乎伦理吗?”诸如此类问题。有些书籍似乎提到了道德问题,但只是点到为止。比如,《自由的挑战》问道:“为什么美国要在南越动用如此多的军事力量?”尝试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很有趣的。难道答案是:因为我们的对手不是白人?因为他们不可能到美国来罢工?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一问题?因为美国从印第安战争到1899至1913年间的美菲战争,最后到越南战争,都有着针对“原始”民族的帝国历史?因为,像多数国家一样,我们的行为不是以道德而是以现实主义政治为标准?然而,《自由的挑战》为教师推荐的答案表明,教科书作者们并不真的希望学生去思考我们为什么卷入战争,当然也不希望学生去思考我们是否应该那样做,他们只是一再重复本书前面提到的约翰逊总统为那些狂轰滥炸提供的理由:“为了向越共及其同伙北越证明,他们不可能赢得战争。”这种回答在混淆视听,因为越共和北越事实上赢了战争。再者,教科书作者们声称知道约翰逊的动机,但现在又提不出什么证据。根据该书所设定的说法,一个教师提出道德问题,将是对课堂规则的冒犯。

同样,布尔斯廷与凯利问的主要只是“认识迪安·腊斯克”之类的问题,偶尔也穿插一些“批评与思考”,如:“东京湾^①事件如何使我们在越南事务上越陷越深?”实际上,1964年8月2日,一艘“马多克斯”号美国驱逐舰在距北越所属岛屿四英里外海域巡航,同时,一些小型美国船只运送南越突击队员去攻打那里的几座岛屿。三艘北越巡逻艇向“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发射鱼雷,但未能击中。驱逐舰击伤两艘北越巡逻艇,击沉一艘。北越向“国际控制委员会”提出抗议。第二天,当美国小型船只运送南越突击队员去攻打陆地战斗目标时,“马多克斯”开始返航,并被认为再次遭到攻击,遂四处开火。但很快,真相大白,“马多克斯”遭受的 257
那些攻击只是一种幻象,由天气和误读声纳所致。尽管如此,约翰逊总统仍表示愤慨,并向国会提交了后来被称为“东京湾决议案”的提案,该提案在国会以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该决议案授权总统在越南采取一切他想采取的行动。约翰逊总统立即运用这一法案轰炸北越。一个真正的“批评与思考”应该能引导学生认识到任何事件都有其背景,特别是,既然导致“我们在越南越陷越深”的“马多克斯”

^① 东京湾(Tonkin Gulf),又称“北部湾”,美国与越南于1964年8月在此发生军事摩擦,称“东京湾事件”或“北部湾事件”。

号第二次遭袭只是一种臆测,从未发生(约翰逊当时曾对一位助手说:“那些愚蠢的哑巴海员只知道对飞鱼射击。”^[27]),那么,正是我们“在越南越陷越深”导致了东京湾事件。不幸的是,除了1974年版《发现美国历史》外,我所考察的所有中学历史教科书都羞于真正地鼓励学生对越战进行批评性思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们有可能摆脱批判性思考,但同时又不使其父辈们感到难堪。今天至少有70%的美国人认为越战在道德上是失败的,在战略上是失策的。^[28]对此人们的看法相当一致。尽管如此,乔治·W. 布什与约翰·克里在2004年总统竞选期间关于军事记录问题的激烈争论表明,人们在越战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迪斯尼乐园里,有一个名为“美国历程”的关于美国历史的展览。或许是由于害怕引起争议,这个29分钟的展览笨拙地将越战内容完全排除了出去。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历史教科书排除了那些可能会扰乱今天的学生——或他们的父母——的思想的图片和问题。

越南战争神秘化使学生不能够正确理解此后的很多公共评论。在政治谱系的另一端,一些政治家用“越战的教训”去驳斥对安哥拉、黎巴嫩、科威特、索马里、波斯尼亚以及最近对伊拉克的干涉。读过《萨尔瓦多是西班牙语的越南》的人,都坚决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约翰·杜布莱尔与大卫·赖安合著的《伊拉克的越南》以及罗伯特·布里格姆的《伊拉克是另一个越南吗?》,对这两场看来都没有尽头的战争进行了细节对比。^[29]2006年,亨利·基辛格用他自己对我们越南的大崩溃的不恰当理解——他谴责国会当年的撤军——去劝告乔治·W. 布什在伊拉克要“延缓撤军进程”。^[30]所谓“越南的教训”还被用以指导或误导关于保密、新闻发布,以及联邦政府如何运作,甚至军营是否允许同性恋等问题的讨论。中学 258 毕业生有权利获得足够的关于越战的知识,以明智地加入这种争论。毕竟,他们是一群将被征召入伍,参加我们下一场(或者我们眼下正在进行的)战争的人,不论那些战争是否是越战的重演。^[31]

注释

[1] George Swiers, 引自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et al., eds.,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Norton, 1989), ix.

[2] Martin Luther King Jr., “Beyond Vietnam” (New York: Riverside Church sermon, 4/ 4/ 1967).

[3] Gen. William C. Westmoreland 引自网页: Brainy Quote, brainyquote. com, 5/

2007; Antiwar, antiwar.com/ quotes.php, 5/ 2007; and elsewhere.

[4] Frederick Douglass, 引自内封页; Robert Moore, *Reconstruction: The Promise and Betrayal of Democracy* (New York: 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 1983).

[5] 学生们的无知并非偶然。在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661-62, 历史学家 Michael Kammen 指出, 福特总统希望我们能忘记越南。里根总统一度削减国家档案预算经费, 延长档案的保密期限, 以干扰我们保存和知道关于近期过去的历史。在 *A Shared Author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16-18, Michael Frisch 引证了一件发生在教室里的令人震惊的事情: 一位女学生居然认为美国赢得了越南战争。他还通过饶有趣味的分析, 反驳了她关于只有一次失败的记忆, 并赞同 Kammen 的说法: 我们的政治领导人, 一般会影响到我们的政治文化, 习惯上总需要把战争“置于我们身后”, 以避免我们去讨论它。

[6] 实际上, 有一本探究型的教科书《发现美国历史》对整个战争只写了不到 2 页。但是该书把主要篇幅用在对战争的原因和结果的分析上, 这恰是传统的叙述型教科书所不足的, 由此, 该书比其他教科书中的那些长得多的大幅论述要更具思想性和更容易记忆。

[7] Lewis H. Lapham 对“一系列惨不忍睹的景象”的意义的分析, 更加证明了上述观点。他只描述了这里所列的第一, 第三和第七幅图景, 见 *America's Century Series Transcript* (San Francisco: KQED, 1989), 57-58.

[8] 该书还包括了一幅不太清晰的一个美国人推搡越南人的照片, 或许是为了把他赶下正从南越撤离的直升飞机。

[9] Hagopian 还特别提到了那个遭燃烧弹袭击的裸体女孩以及梅莱大屠杀的遇难者, 并提到一位编配了僧人自焚和警察局长射杀越共嫌疑犯图片的实习摄影记者。

[10] Michael Delli Carpini, “Vietnam and the Press,” 125-56, in D. Michael Shafer, ed., *The Legacy* (Boston: Beacon, 1990), 142.

[11] “The Massacre at Mylai,” *Life*, December 5, 1969, 36-42;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647; James Davidson and Mark Lytle, *After the Fact* (New York: McGraw-Hill, 1992), 2: 379-82.

[12] Gen. William C. Westmoreland, quoted in Murray Kempton, “Heart of Darknes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1/ 24/ 1988, 26.

[13] 《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收录了一幅照片, 描写“大兵们”从一个正被焚毁

的高棉村庄撤出,但是从该照片中看不出是谁放的火。

[14] John Kerry, "Winter Soldier Investigation," testimony to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4/ 1971, 重印于 Williams et al., eds., *America in Vietnam*, 295. 2006年,一些新闻故事证明梅莱大屠杀代表着一类罪行,见"Declassified Papers Show U.S. Atrocities in Vietnam Went Far Beyond My Lai," *Los Angeles Times*, (8/ 6/ 06), at History News Network, hnn.us/roundup/entries/28956.html.

[15] Davidson and Lytle, *After the Fact*, 2: 356-83, 引自 2:371.

[16] 戴维森后来继续编著美国历史,有时与莱特尔一道,有时是自己独自一人。他的新作《美利坚民族》(*The American Nation*)初版于2005年。我这里没有评论这本书,因为它的市场主要在中学。该书继续保持自己的套路:闭口不提梅莱大屠杀或类似事件。《事实的背后》(*After the Fact*)本身就是对这本新书的学术责任感的批评。

[17] *We Americans* 引用了金的其他两句话,大意是黑人士兵在越南付出了同样的牺牲,但回国后却得不到平等的权利。

[18] 有一本教科书《自由的挑战》,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槟知战役的苍白论述:"有些‘鸽派’人物认为,战争对南越有害。这些人说,捣毁这个国家以防止它转向共产主义,是没有意义的。"

[19] John Kerry 的证词重印于 Williams et al., eds., *America in Vietnam*, 295.

[20] George W. Chilcoat 显示了越战时代的这些歌曲——从反战方的《花落何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给和平以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到亲战方的《来自马斯科吉的民工》(*Okie from Muskogee*)、《绿色贝雷帽之歌》(*Ballad of the Green Berets*)——如何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入门,以便它们去了解自己的著作所讨论的那些问题,见"The Images of Vietnam: A Popular Music Approach," *Social Education* 49 (1985): 601-3.

[21] Frances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 (New York: Vintage, 1980), 126.

[22] 在"Falling Dominoe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0/ 27/ 1983, 19, Theodore Draper 指出,在这种论调下,国家的大小、地理位置、重要性以及它们或我们所面临的实际威胁,都无关紧要了,因为这种观点可以证明对任何地区的干涉都是合理的。

[23] 见 Richard Drinnon, *Facing We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以及 Richard Slotkin, *Regeneration Through Violence*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3).

[24] John Foster Dulles, quoted in Williams et al., eds., *America in Vietnam*, 167.

[25] Frances FitzGerald, *Fire in the Lake* (Boston: Atlantic-Little, Brown, 1972), 对美国为何干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Stanley Karnow, *Vietnam* (New York: Viking, 1983) 描述了事态是如何不断升级的。

[26] Linda McNeil, "Defensiv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Control," 载 Michael W. Apple and Lois Weis, eds.,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School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6, 126-27; 另参 David Jenness, *Making Sense of Social Stud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90), 270-75; Jim DeFrongo, "How Sociologists Can Help Prevent War" (Storrs, CT: n.d., typescript). 在纽约市“无畏号”航空母舰博物馆里, 越战也同样被简化了。博物馆的电影和幻灯片都没显示“无畏号”在那场战争中的作用。退役海军上将委员会曾对该博物馆按照海军序列安排解说程序的做法提出“老兵审查”, 根据他们的意见, 越南问题被过于“政治化”了。见 James W. Loewen, *Lies Across America* (New York: New Press, 1999), 404-7.

[27] Karnow, *Vietnam*, 365-76.

[28] Gallup poll, November 1986; Roper poll, 8/ 1984.

[29] 见 Dick Cluster, ed., *They Should Have Served That Cup of Coffe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9), 149-79; John Dumbrell and David Ryan, *Vietnam in Iraq* (Taylor & Francis, 2006); Robert Brigham, *Is Iraq Another Vietnam?*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2006).

[30] 基辛格的论断在两个方面是不恰当的。首先, 他参加过撤军谈判, 他十分清楚他所达成的一切协议都是为了挽回面子, 并在那次撤军与越南人的最后攻击之间做出所谓“有分寸的间歇”。其次, “延缓撤军进程”是为了谁? 他也清楚, 反对南越“政府”的大游行并没给越南人民带来有长远意义的领袖人物或意识形态。

[31]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639.

第十章

探索记忆之洞：消失了的近期历史

259

我们看事物并非按照它们的样子，而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样子。

——阿娜伊斯·宁^①

只有在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无立足之地的地方，爱国主义才能兴盛。我们永远不要把爱国主义误以为民族主义。一个爱国者是热爱自己祖国的人，而一个民族主义者则是一个蔑视他人祖国的人。

——约翰内斯·劳^{①②}

当然，人们不希望战争……但是，毕竟，决定国家政策的是领袖人物。对于他们来说，让人民追随自己总是件很容易的事，不论那个国家是民主的、法西斯独裁的、议会制的，还是共产主义者专政的。人民不论说话还是沉默，总是被教导听从领袖的召唤。这很容易。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他们正遭到攻击，然后谴责和平人士缺乏爱国精神。

——德国战区元帅赫尔曼·戈林，1946年4月18日，纽伦堡^②

当本来应属于公众的信息被当权者有系统地阻截时，人民就会变得对自己的事漠不关心，对那些管理自己的人不抱信任，最终，他们就失去了判定自己的目标的能力。

——理查德·尼克松^③

非洲社会常常把人分为三类：还活在世上的人、“撒哈”(sasha)和“扎马尼”(zamani)。如果刚刚去世的人与还活在世上的人曾活在某个相同的时间段，这种

① 阿娜伊斯·宁(Anais Nin, 1903-1977), 美国女作家。

② 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 原德国总统(1999-2004)。

人就是“撒哈”，即活的死人。他们还没有完全死去，因为他们还能出现在活人的记忆中，活着的人可以通过思想回忆他们，通过艺术重塑他们的样子，通过故事使他们再生。当最后一个认识先人的人死去后，那个先人就不再是“撒哈”，而成为“扎马尼”，即死人。如果是偶像化的先人，“扎马尼”非但不会被遗忘，反而会得到尊敬。很多人，比如乔治·华盛顿或克拉拉·巴顿^①，是可以通过名字唤醒人们的记忆的。但是他们不是活的死人。这是有差别的。^[4] 260

由于我们的语言中没有这些斯瓦希里语术语，我们很少系统地考虑对人的这类区分。但是我们也是有这种区分的。让我们看一下我们是如何阅读那些关于我们有生之年发生的某一事件，特别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件的叙述的，不论那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伊拉克战争。我们的阅读部分地带有批评精神：对作者出错的地方进行评判，对作者说对的地方表示同意甚至学习它。而当我们研究更遥远的过去时，我们或许也会批判性地阅读。但是今天，我们最主要的阅读模式只是吸收，特别是，如果我们第一次阅读某一事件时，我们会无所凭藉，难以对所读到的东西提出批评。

美国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似乎也全都知道一些“撒哈”——他们知道，当近期的历史发生时，教师、父母以及教科书采用委员会的成员都尚在人世。他们似乎对此感到不安。于是，尊崇“扎马尼”——偶像化的祖先——就成为他们更常见的风格。根据以上的定义，“撒哈”的世界是充满争议的，因为读者们会在其中加进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会不同意书中所写的某些内容。因此，对于近期的历史，还是少说为好。

我考察过，我一开始所考察的那 10 本叙述型美国历史教科书是如何介绍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 50 年的历史的（但不包括 80 年代本身，因为某些旧教科书就是在这个年代问世的，因此不能指望它们能完整地介绍这个时代）。平均来看，教科书用 47 页写 30 年代，用 44 页写 40 年代，至于后三个年代，都不到 35 页。即使是动荡的 60 年代——民权运动、越战（的主要时期）、马丁·路德·金、麦格·艾佛斯^②、马尔科姆·X 以及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兄弟的遇害——也只写了不到 35 页。^[5]

2006 至 2007 年间出版的教科书在写作手法上则完全不同。今天，20 世纪 60 年代不再是近期的历史了，教科书可以赋予它们本该一直得到的重视——55 页。（这个数字要比 20 世纪任何年代所得到的都要多。）但是，今天的教科书出版于 2000 至“2007 年”^[6]间，它们对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以来这些

① 克拉拉·巴顿 (Clara Barton)，美国内战时期护士，红十字会主要创始人之一。

② 麦格·艾佛斯 (Medgar Evers)，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近期历史敷衍了事。它们虽然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写了 49 页,对 40 年代的历史写了 47 页,但是对 80 和 90 年代(甚至包括新千年的前几年)的历史却只写了不到 20 页。然而,后者都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年代:美国两次攻打伊拉克;美国总统受到有史以来第二次弹劾;美国出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选票最接近、也最 261 充满争议的大选;还遭受了 2001 年“9·11”恐怖袭击。

当然,每个事件都有争议。学生家长中有些是民主党人,有些是共和党人。因此,教科书作者们关于比尔·克林顿受弹劾和受审所说的那些话,很可能会冒犯半个社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个糟糕的主意。但是如果教科书作者们这样说,他们就会得罪某些重要的人,包括校董事会成员。同性恋更是一个禁忌话题,不能在美国的中学讨论和探究。平权措施也会招致大动肝火的辩论。妇女运动虽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十分突出,但今天仍然是个雷区。每一所学校的辖区都既有强烈支持关于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的父母,也有反对那种观念的父母。因此,我们别去说今天的女权运动吧,就让我们把它留在 70 年代吧。这样,教科书作者们在涉足“撒哈”时蹑手蹑脚,格外小心,尽量回避所有的重大问题和所有的“为什么”。

对中学历史课轻视近期历史这一做法,教科书作者并非惟一要负责的人。很多教师胆子小,或者只是没有时间。即便教科书在“撒哈”上花了应有的篇幅,大多数学生也不得不自己去阅读,因为,大多数教师从来都不能把教科书讲到最后一页。特雷西·基德的《学童纪事》一书刻画了一位五年级美国历史课教师克丽丝·扎雅克,这位教师一学年里居然从未把课本讲到重建!^[7]课时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与出版商一样,教师并不想冒险冒犯家长们。结果,对待近期历史,人们就像桑普^①的妈妈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没能说一些好事,你就根本不要说任何事。”

教科书的作者们和出版商们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对近期历史进行压缩和简单处理时,还有一个借口恰恰就是,它们离现在太近了。我们不知道,一旦历史学家由于历史视角的不同而各执一词时,将分别如何看待这一阶段的历史,因此干脆免开尊口,说得越少越好。

至于那些“扎马尼”,教科书作者们实际上是在以历史视角为挡箭牌。他们以一种无所不知的、乏味的语调描写“扎马尼”,似乎有某种单一的历史真理存在。它们为历史学家所一致同意,它们是教师们今天所教的,也是学生们今天应该学的。这种写法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历史视角总会更趋恰当,更能赐予今天的教科书作者们深刻的历史见解。然而,教科书作者们并不能以历史视角为由,为自己对“撒哈”事件的处理方式辩护。若剔除历史视角,教科书作者们就现 262

① 桑普(Thumper),迪斯尼作品《小鹿斑比》中的角色,是一只兔子。

了原形：他们不再有什么特殊的资格像奥林匹斯神那样以超然和绝对的确定性展开对近期历史的叙述，就像他们对待“扎马尼”那样。此外，教科书本身是第三手材料，被认为是以第二手材料为基础的，而那些第二手的关于近期历史的书籍和文章大多还没有写出来呢。

人们通常认为，由于历史视角的缘故，忽略“撒哈”的做法的确可以说是正当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近期的事件离现在太近，我们无法拉开距离在语境中对它们进行思考。他们声称，随着新的档案材料的不断发现，或者随着那些事件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能够接近更“客观的”评论。然而，时间的流逝本身并不能带来合适的视角。各种信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因此，不能以历史视角不足为由就忽视“撒哈”。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前面几章提到的视角上的那三个变化。伍德罗·威尔逊今天所获得的评价比起他 1920 年去世时有了显著的提升。他的声誉的提升并非源于其任期资料的新发现，而是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的意识形态需求。在那个年代，历史学家很少指责威尔逊在联邦政府内搞种族隔离，因为舆论通常不认为种族隔离是错误的。战后年代最主要的公共问题不是种族关系，而是遏制共产主义。冷战时期，我们的政府与威尔逊执政时期一样，发动半公开的战争，绕过国会施政，并以反共的名义压制国内自由。威尔逊的某些政策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受到争议甚至不受欢迎，但到 50 年代，人们对类似的政策却习以为常了。20 世纪 50 年代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反对孤立主义，甚至对其不屑一顾。为了促成联合国——联合国的成立后来完全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他们对威尔逊为建立国联而做的努力大加赞赏。历史学家小戈登·莱文一语中的：“最终，在战后年代，威尔逊的价值标准在两党沆瀣一气的冷战政策中大获全胜。”^[8]这样，威尔逊的地位之所以在今天的教科书中不断提升，主要还应归于这样的事实：20 世纪 50 年代，威尔逊已属于“扎马尼”，当时的意识形态需求与 20 世纪 20 年代不同，那时他尚属于“撒哈”。

时代变迁也能够改变我们关于较远历史的观念。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等作家和传教士在哥伦布还是“撒哈”时就指出过西班牙人对加勒比海地区印第安人的虐待和奴役。但是后来，哥伦布被尊为科学勇士，人们认为他驳斥了“地平说”，为新半球打开了进步的大门。19 世纪的哥伦布谋求的是一个建立在 300 年来对印第安各民族的征服基础上的国家，但是到 1992 年，许多纪念哥伦布的活动引发了美洲土著的反纪念活动。现在作为剥削压迫者的哥伦布已经开始与作为开拓者的哥伦布一样被广为宣传。这个“新”哥伦布更接近于“撒哈”哥伦布，他所寻求的国家必须与这些过去是欧洲势力的殖民地、今天通常由有色人种来治

理的国家相吻合。我们看到,到2007年,我们的教科书开始在介绍“哥伦布交换”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介绍它所导致的灾难。1892年与1992年之间对哥伦布首航的不同纪念再一次证明,不同的主导观念有不同的影响,正如阿娜伊斯·宁指出的,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看待事物,1892年与1992年之间的“我们”发生了变化。

“联盟虚构的重建”在1890年至1940年种族关系的低谷时期第一次渗透到史学作品中,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重建政权那时被描述为非法的,是“黑鬼统治”的腐败典型。今天,历史学家又回到共和党政府还控制着南方各州时的历史学家们所提出的关于重建的观点上。埃里克·方纳对这种变化大加赞赏,把它归功于“客观学术与现代体验”——这种说法将两种原因简明地联系到了一起。历史学中并不存在客观学术,因此我才敢冒险使用“真实”与“谎言”这两个术语。不幸的是,时间的推移并不能促进学术的客观化。单纯地从年代上拉开距离并不能带来关于重建的更为准确的描述。重建方面的事实并不适合那一低谷时期的“现代体验”。由于这一点,那些事实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一直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忽略,直到民权运动改变了人们的“现代体验”,那些事实才大白于天下。^[9]因此,时间流逝并不能带来历史视角。从利昂·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论”中,我们可以得到更为准确的答案。“认知失调论”告诉我们,历史著述时期的社会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关于过去事件的历史观点。^[10]“客观学术”必然与那个促其盛行的“现代体验”相关联。

那么,在著述近期历史时,教科书作者们其实不会受到缺乏历史视角的不利影响。相反,近期的事件为他们带来三种潜在的益处:第一,既然作者本人生活在事件发生之时,他们就耳濡目染大量关于当前事件的电视和报刊信息,并能够与 264 他人交流;第二,他们可以听到多种观点,并且每一种观点都有或多或少可信的证据;第三,教科书作者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研究——钻研报纸、走访历史当事人、与做着同类研究的诸如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分享自己的历史见解。有了这些信息,教科书作者们就能够对近期事件勾勒出一条既有趣又信息量大的故事线索。我写作本章时就是这么做的。^[11]我总结,过去十年里最重要的事件有三个: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我们在阿富汗做出的反应、我们对伊拉克的(第二次)战争。相比其他事件,比如克林顿弹劾案,这三个事件对我们未来生活的影响重大得多。关于它们,教科书都说了些什么呢?又应该说些什么呢?

关于“9·11”,学生们与其他美国人一样,会追问四个问题:第一,发生了什么?第二,我们为什么遭到攻击?第三,我们是如何听任事件发生的?第二与第三个问题又从逻辑上导致了第四个问题:类似事件还会发生吗?

教科书的确讲述了2001年9月11日所发生的事情,并且花了很大篇幅,或许由于这是件轻松活吧。比如,《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以及《美国人》花了5个整页的篇幅描述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所发生的事情,但其中仍有错误。比如,《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称:“这是自1812年战争以来发生的第一次外敌攻击美国本土的事件。”对于新墨西哥州哥伦布市居民来说,这倒是件很新鲜的说法。在哥伦布市,潘齐奥·维拉国家公园依然保持着对1916年墨西哥之战的记忆。在那场进攻中,24位美国人被杀,哥伦布市沦为一片废墟。在这类描述中,还有很多的信手拈来之笔——那些本来不必要的废话。比如,《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在某处告诉我们:“这座庞大建筑的倒塌使大楼内外数以千计的人死去或被困,其中包括数百名消防员、警察及其他救援者。”在后面的一页,它又重复道:“在世贸中心遭袭中,大约2500人丧生。这一数据包括300多名消防员及很多当时在事故现场的救援者。”

如果只讲发生了什么事,教科书只是回答了上述四个问题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因为今天的中学生已经知道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了。(然而,在三四年后,那些年龄太小、还不能记得这一事件的学生就需要这些描述了。)那个“为什么”的问题又怎么样呢?这是今天的学生确实需要思考的问题。在教师用书中,《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明确地说,“为什么”之类的问题不是教师应该提出的:“请在本节告诉学生,他们将了解到2001年‘9·11’袭击及其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影响,以及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做出的反应。”《走向今天》以及布尔斯廷与凯利的教科书也忽视“为什么”问题。《美国人》扯到了爱尔兰共和军、秘鲁的“光辉道路”运动、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恐怖主义行动,反而搅乱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思考。^[12]只有《美利坚盛典》讲到了美国为什么遭到袭击:

据悉,本·拉登对美国深怀仇恨。他痛恨美国对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的经济封锁,痛恨美国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在阿拉伯半岛的圣地上)越来越大的军事存在,痛恨美国支持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敌对行动。本·拉登还得到世界各地仇恨美国巨大的经济、军事与文化力量的人的支持。

第一句话是对本·拉登的话的准确总结。这位声称对“9·11”袭击负责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曾在1998年提出:“‘世界穆斯林前线’向犹太教徒与十字军发起‘圣战’的宣言”。^[13]第二句话同样也是正确而有用的。

不幸的是,今天的其他教科书与《美利坚盛典》不同,它们使学生在政府蓄意

传播的曲解面前毫无防备能力。在袭击发生九天后，乔治·W. 布什向国会给出了自己对“为什么”这类问题的回答：

美国人在问：为什么他们恨我们？他们恨我们的民主选举的政府——这种政府在我们的这个议事厅里看来是正确的；而他们的领导人是自封的。他们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选举、集会和异议的自由。^[14]

多么令人惬意的想法：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很好。

一直到第二年，布什反复说着大同小异的话。或许因为他的解释令人愉快，所以它被广泛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米奇·弗兰克写的《理解“9·11”》是第一本、或许也是最主要的向年轻人解释这一恐怖袭击事件的书籍，该书特别就世贸中心的遭袭，做了同样的解释：

这两座大厦被视为和平的象征。在其 1973 年竣工不久，设计者山崎实 (Minoru Yamasaki) 说：“世界贸易意味着和平。世贸中心是人们献身和平的活的符号。它应该成为一种代表——代表着人们对博爱的信仰、对人的尊严的渴望、对人类合作、以及通过合作去发现伟大事物的能力的信赖。”^[15]

266

这当然是在胡说。如果在 2001 年 9 月 10 日，弗兰克问一百位世贸中心的造访者，世贸中心对于他们来说象征着什么，没有人会回答象征着“世界和平”、“人的尊严”或者“人类合作”。^[16]说到底，这座建筑里容纳的是股票经纪人和投资银行家。2005 年，《美国的遗产》的编辑写了一篇文章，对修复和再现这两座大厦的建筑模型的做法予以赞扬，文中指出，这两座大厦是“国际公认的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17]

认为恐怖分子攻击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价值标准、我们的自由或者我们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也是肤浅的和错误的。根据本章题头引用的约翰内斯·劳语录中所做的区分，这种思想或许可被称为民族主义，但很难说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并不鼓励我们批评和改进自己的国家。因此，民族主义只是在短期内对我们有益。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国家需要的公民应该能够对各种决策提出质疑，而非对其一味称诺。实际上，有知识的美国人在接受记者詹姆斯·法洛斯的采访时都指出了这一点。詹姆斯·法洛斯曾在《大西洋月刊》中总结说：“我

采访过士兵、特工、学者以及外交家,他们不无一致地认为,说‘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是美国人’真是一种危险的阿谀之词。”法洛斯本人把这种“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是美国人”的说法说成是“懒人的自我辩护和自我陶醉”。中情局“本·拉登专案组”的第一长官迈克尔·舒尔也说道:

本·拉登已经准确地告诉美国人他对我们开战的原因。其中没有一条关乎我们的自由、独立和民主,相反却都与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政策与行动有关。

2004年11月,有一条有趣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来自五角大楼的报告指出“穆斯林并不‘仇恨我们的自由’,而是仇恨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认真考虑这句话,我们或许就会质疑甚至改变我们的中东政策。但布什的分析——267大多数教科书都回避任何分析——扼杀了这种思想。^[18]

教科书发现,质疑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很难的,因为教科书自始至终都假定美国就是本书第八章所说的那种“国际好人”。比如,看一看《走向今天》的第一页吧,它介绍说,历史就是一个个“题目”(地理学、经济学等亦如此。)下面就是它就此所告诉学生的那段话:

为自由与民主而战;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中,美国人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海外,都冒着生命危险去为保卫自己的自由和为民主而战。请用410-411页所描绘的“美国的道路”,把一系列为保护和捍卫这些宝贵思想而战的的具体事件串联起来。

当根据这类指令把书翻到那些页时,会看到同样的标题和同样的文字,同时还会看到一些关于革命战争、内战、一战、二战的图片,以及“9·11”事件后消防员在世贸中心的废墟前升国旗的肖像照。而几个世纪里的战争留下的那些不能被强塞进“在本土和国外为民主而战”之类的图片,比如关于反映土著美国人的战争、墨西哥战争、菲律宾战争等的图片,都被明显地忽略了。我们耗时最长的战争——越南战争——甚至被认为不值得一提。诚然,我们的某些军事行动——1999年出兵塞尔维亚-科索沃地区,或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适合所谓“国际好人”这一标题,但其他的——西米诺尔战争、菲律宾战争——就不能了。当教科书作者们好心地把我们的军事史置于“为自由与民主而战”这一标题之下时,他们只不过是在提醒学生,自己没有做过认真的分析。

在《合众国的历史》这本书中,刚刚讲完越战的结束,布尔斯廷与凯利就给学生送去同样的信号:“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自美国革命以来,美国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渴望获得自治的人们的希望。”很显然,这两位作者没有想到学生们会注意到美国刚刚花了十年的时间去发动战争,那场战争不是为了“维护和平”,反而恰恰是为了剥夺越南人民“自治”的能力。照此“分析”,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攻击一个和平卫士、一座“希望的灯塔”。

就在阿普尔比、布林克利和麦克弗森合著的《美利坚之旅》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它可以说是所有这类写法的集中体现:

美国把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用于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很多美国人一直相信,自己的国家应该成为世界的楷模。正如克林顿总统在其 1997 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的,“从中东到海地,美国必须继续是一支不屈不挠的和平力量……”

此时,是的,我们的确是这样说。不过这很难说是在“讲述历史的真相”——这是阿普尔比在 1995 年出版的一本史学史著作^①的标题。这段话只不过是趋炎附势;果真如此,它似乎达到了目的。2004 年,托马斯·B. 福特汉姆研究会,这个保守主义思想的巢窠,抛出一本由戴安娜·拉维奇、切斯特·芬恩等人合著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购阅指南》,列出了 6 本美国历史教科书,其中,《美利坚之旅》排名第一:“其分析总体上公正、有理、有据。”^[19]但是,拉维奇与芬恩肯定不会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座中宣称“美国把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用于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甚至这个国家是否有这样的计划尚不得而知。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首先寻求的是自己的繁荣和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在我为写作本书所考察的 6 本新教科书中,版权日期标为“2000 年”的《美利坚之旅》是最早的了。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当该书作者后来看到美国不再“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于 3 年后“先发制人”攻打伊拉克时,他们还会说什么。面对与自己为这个国家所刻画的形象出入如此之大的那些行为,他们会不会感到震惊呢?当然不会,毕竟,在该书问世之前的 60 年间,美国几乎每一年都在某地战争。以上述的那样一段话来做全书的结尾,这样的书无异于是在混淆论证与事实,在用意识形态取代分析。而且,这样的话并不能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其他国家要攻击这样一个无私而清白的国家。

① Joyce O. Appleby,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95; 中译本有《历史的真相》,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

把一个国家说成是没有任何罪恶的——比如它总是光明正大地、怀着最好的意愿去处理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的问题——只会让学生变得更加无知,从而使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人对我们感到厌烦。这类说法还助长了学生的民族优越感——他们相信我们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该向我们学习。美国人本来就比其他国家的人有更多的优越感,这部分是由于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这鼓励我们相信,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的国家不仅是最强大的,而且是最好的。任何历史课程,只要是进一步助长这种已经膨胀的民族优越感,都只会削弱学生向其他文化学习的能力。 269

除了削足适履般拘泥于“国际好人”论外,教科书作者们还带来另外一个不利因素。我们与伊拉克的战争由来已久。第八章已经指出教科书在讨论美国出兵中东的历史时表现得如何令人遗憾。美国一开始曾帮助萨达姆·侯赛因上台。1963年,用记者安东尼·拉佩和斯蒂芬·马歇尔的话说,伊拉克的什叶派总理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将军“开始威胁到美英势力”。中情局一手策划了卡赛姆的倒台。作为回报,侯赛因及其复兴党一开始欢迎西方石油公司的到来。但是几年后,侯赛因将伊拉克的石油企业收归国有。不过,当伊拉克1980年入侵伊朗时,美国根据“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老套的战争和外交原则,仍然对侯赛因予以支持。1982年,里根总统将伊拉克从我们已知的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抹去,以便我们能够帮助伊拉克装备军队,向其提供各种其他援助,促其与伊朗作战。根据记者约翰·金的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美国向伊拉克出售直升飞机、计算机、科研设备、化学药品,以及伊拉克生产导弹、生产生化与原子武器所需要的各种物资。中情局与国防情报局向伊拉克提供信息,帮助其军队使用化学武器进攻伊朗军队,虽然这类武器早就被禁用,但美国后来还是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伊拉克动用这些武器的决议案。甚至在两伊战争结束,我们知道侯赛因在对自己的人民使用这些武器之时,我们仍然向伊拉克输出武器级炭疽菌、氰化物等各种化学与生物武器。没有哪本教科书承认我们过去与侯赛因的这种瓜葛。^[20]

要理解“9·11”事件,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我们在伊朗的行动。第八章讲到我们多次干涉伊朗,扶植其“沙阿”政权。那些干涉可以解释那个国家为什么今天会对我们心怀敌意。伊朗革命推翻了“沙阿”政权,这对后来的中东历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大多数教科书都不能如实介绍我们在伊朗所起的作用,它们在解释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时,自然就“先天残疾”了。因此,学生们就不能通过历史去理解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支持伊朗的“沙阿”政权一样,我们今天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很多地方扶植强权 270

政体,这使得多数阿拉伯人和很多穆斯林视美国为“最大的伪君子”——历史学家斯科特·阿普尔比如是说。我们一面鼓吹民主,一面又支持独裁。^[21]

要理解中东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还有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对以色列的袒护。美国强硬地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通过声称伊朗企图拥有核武器,布什总统使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先发制人”合法化。然而对于以色列,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警告其不该拥有核武器,哪怕是口头上的,哪怕我们在大约几十年前就已经知道这一事实。^[22]相反,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至今,美国一直坐视其发展核武器及其他政策,一直向其提供关键的财政和军事援助。

在忽略了“我们为什么遭到攻击”这一问题后,大多数教科书又忽略了第三个问题:我们是如何听任其发生的?教科书作者们并不想批评美国政府,但是两党都是应该被打板子的。在为期八年的执政时间里,克林顿政府很少采取措施去加强我们对恐怖袭击的防范。特别是,多年以来,美国的移民归化局的不称职是众所周知的——它不能够提供一份那些不应该被准许入境的人的名单,不能追踪到那些超过学习或工作护照年限的人,甚至不愿意查找那些没能出庭接受关于非法移民的听证的人。布什政府在我们的安全方面所做的工作甚至不如从前。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总统曾接到恐怖警告,但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对此,教科书作者们多缄口不言。2000年,克林顿政府曾经做过一次安全演习,模拟一架飞机正被驾驶着撞向五角大楼,这说明他们当时知道类似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根据拉佩和马歇尔的报道,“至少在‘9·11’之前的三个月,一些德国驻美机构曾警告中情局:‘中东恐怖分子打算拦截商用飞行器,并以此为武器,袭击美国文化的某些重要象征物。’”中情局甚至没有把这份警告转达给一些航空公司。联邦调查局的一些特工也曾向其上级汇报:一些可疑的阿拉伯人正在美国飞行学校受训驾驶商用喷气式飞机,但是这也并没有起到作用。就在恐怖袭击发生前一个多月,乔治 W. 布什曾收到一份简报,标题是“本·拉登决定袭击美国”,但他没采取任何行动。^[23]

国会也对这些失误感到震惊。后来,在“9·11”遇难家属的鼓动下,国会决心 271 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情报、国防和执法部门在合作、调查、和预告恐怖袭击方面的失职。《美国人》将乔治·布什说成是“9·11委员会”的倡导者。实际上,他反对成立这个委员会,而当各种舆论迫使他不得不同意时,他的政府不情愿地合作。其他的教科书都完全不提这个委员会。

类似事件还会发生吗?教科书也没有说,当然,它们也说不了。但是,它们的语调充满着乐观。《走向今天》说:“总统很快发动了打击各种针对本土恐怖袭击的战斗,‘9·11’之后不到一个月,布什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说完之后,还有三

大段关于这次政府改组的褒奖的话,其中没有一个批评或质疑的词语。诚然,《走向今天》出版在联邦政府应对“卡特里娜飓风”^①失策之前,当时,布什政府实际上已经削弱和裁减“联邦应急管理局”,将之合并到国土安全部,那次失策说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国家的应对灾难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但是,教科书作者们实际上应该知道当时广为人知的专家质疑:我们对恐怖分子使用工具通过我们口岸的防范措施不利,我们的免签方案使沙特阿拉伯人很容易获得签证,以及还有一些国土安全部尚未考虑的问题。乐观的文字会让学生安心,就怕到某一天,袭击再次到来。到那时,他们就会感到受骗了。

美国对于“9·11”的最初应对措施就是在2001年10月进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与侯赛因一样,这个原教旨主义穆斯林政体一开始也得到过我们的中情局的支持,因为他们反对先前受苏联支持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在20世纪80年代,中情局不仅向阿富汗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分子派出美国顾问,提供携带导弹的飞机,而且协助其从其他国家招募穆斯林与阿富汗人并肩作战。不幸的是,这些极端分子一旦掌权后,就为奥萨马·本·拉登提供保护,并听任其组建训练营,后来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分子就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在2001年“9·11”袭击之后,迫于美国的要求,塔利班政府答应将本·拉登移交到第三国。美国拒绝这一方案,说那是不够的。^[24]相反,在一个月之内,我们开始扶植塔利班的敌人“北部联盟”,轰炸塔利班武装。在我们的空袭协助下,“北部联盟”很快取得了胜利。身为阿富汗人,“北部联盟”的成员有能力区分塔利班支持者和其他阿富汗人。然而,为忙于准备即将到来的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不再集中精力去抓捕奥萨马·本·拉登,不再确保阿富汗是一个中立的或者对我们有利的国家。这些发生在2002年初的错误,五年后仍然困扰着今天的美国:本·拉登尚未被捕获,现任的阿富汗政府几乎对阿富汗的大多数地区失去控制。^[25]

只有一本教科书——《美利坚盛典》,讲到了美国曾经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与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战斗。《美利坚盛典》与其他书籍一道,曾经不正确地指出,塔利班断然拒绝交出本·拉登。尽管大多数教科书对于美国如何与“北部联盟”一道颠覆了塔利班政府,都做了集中的、正确的论述,但它们并没有指出奥萨马·本·拉登已经逃脱。或许,我们不应该奇怪它们的论述是正确的:我们入侵阿富汗是有道理的,也是有效的,至少一开始如此。^[26]

① “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造成重灾。



图1 瓦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

对于美国来说,开战似乎越来越轻率,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知道战争所带来的人员伤亡。我们的无知有很多原因。在伊拉克,我们的“人体装甲”、我们的医疗保护等等,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结果,战斗伤亡率大幅下降,大约是1:9;而在越战中,这一比例是1:3。士兵死得少了当然是件好事。然而,由于更多的人受伤,某些甚至伤势更重,就像图中这位躺在瓦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的人这样,那么,死亡率就不能反映全部问题了。死亡率下降的进一步原因是,很多战斗服务,比如驾驶和护卫卡车,都被转交私人公司承担,而这些公司的人员伤亡不属于官方的统计之列。伊拉克人的死亡数——远大于我们自身——也没有计算在总数里。然而,既然我们的人大多数都没有牺牲,死亡数就构成了我们关于战争代价的主要认识。

在历史上,接下来的事件是,美国于2003年3月发起对伊拉克的战争。然而,从年代上看,我们对伊拉克的攻击与上述事件并无明显逻辑关联。布什政府一开始的确宣称过“9·11”事件与萨达姆·侯赛因有关。在攻打伊拉克两天后,布什政府在解释这一行动时,给出了三条理由:“解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束萨达姆·侯赛因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解放伊拉克人民。”同样,副总统迪克·切尼也称伊拉克是“那些多年来将我们置于攻击目标之内的恐怖分子,特别是发起‘9·11’袭击的恐怖分子的根据地。”即便那时,这二位所称的这种关联也是没有意义的。伊拉克与美国“9·11”遭袭事件没有关联。奥萨马·本·拉登一直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世俗的、残忍的独裁统治嗤之以鼻;反过来,侯赛因也无意让恐怖分子在自己的警察国家里建立组织。^[27]

所谓W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也是没有意义的。布什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已经迫使侯赛因同意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早在11月就重返伊拉克,但结果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存在这类武器的证据。侯赛因政府在次月还提交了一份报告(后来证明是如实的),描述了伊拉克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取消了自己发展WMD的方案。核查员们请求布什让他们完成自己的核查工作,但是布什命令驻伊拉克的联合国官员撤出,以便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在最初的军事胜利之后,经过反复搜查,也没有发现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时秘而不宣的情报后来清楚地证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以及美国总统布什在进攻前就已经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伊拉克没有WMD。^[28]而且,即便伊拉克据称拥有的WMD方案已经像布什政府所宣称的那样正在进行之中,其进度也应该远远滞后于布什所

称的另外两个“邪恶轴心”国家：伊朗和朝鲜。从逻辑上讲，我们应该先进攻那两个国家才对，但相反，我们进攻的是伊拉克——这恰恰是因为它当时是最软弱的靶子。^[29]由此，我们对伊拉克的攻击，加上其他问题，一起促使伊朗和朝鲜——与其他一些希望能预先知道美国在将来可能对自己实施进攻的国家一道——设法 274 搞到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很明显，我们进攻伊拉克并非因为其拥有 WMD，相反恰恰是因为它没有！

布什总统的上述第三条攻打伊拉克的理由——“解放伊拉克人民”是美国外交政策上所谓“国际好人”论的又一实例。毫无疑问，在侯赛因的统治下，伊拉克人民蒙受苦难，什叶派多数和库尔德人少数尤甚。结果，伊拉克社会的很多民众一开始都视我们的军队为解放者，这至少暂时是正确的。然而，作为我们入侵的理由，侯赛因的压迫绝不算是突出的。如果人民的苦难促使美国干涉，那么我们的军队首先派往的应是苏丹南部的达尔富尔，在那里，阿拉伯人执掌的政府杀害或听任其土著同盟杀害了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或者，我们应该派兵进入津巴布韦，在那里，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的压迫与日俱增。“国际好人”的说法的确为入侵添加了说辞，但的确使一些民主党人相信应该投票支持赋予总统战争权力。

如果美国政府所宣称的攻打伊拉克的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怎么解释这次军事冒险呢？的确，有一个巨大的、人们心照不宣的理由就是：布什及其同僚希望通过战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利。大家都知道，侯赛因的武装力量在 1991 年的波斯湾战争中被美国轻易击溃，现在已经非常软弱了。在那场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拥有 4280 辆坦克，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下 580 辆。^[30]伊拉克的武装力量还由于美国及其盟军自 1991 年以来强行划定的“禁飞区”而受到很大限制，这意味着美国飞机可以控制伊拉克的领空，使敌对力量一开始就不能接近。政治家们都知道，反对一次我们能够在数星期内取得胜利的战争，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实际上，在 2004 年 11 月，那场表面上胜利了的战争以及抓获侯赛因所产生的选举效应，都有助于布什再次获选和其政党控制国会。经济的作用更为明显。布什家族的很多朋友都一直与石油工业建设和武装力量项目有关。2003 年 4 月，布什政府向国际社会表示，伊拉克的重建，将由美国的公司与政府机构，而非由其他国家的公司与政府机构负责。没有人会感到奇怪，副总统切尼以前的企业哈利伯顿公司比任何其他公司都获得了更多的由政府拨付的重建资金——当然，该公司后来被查出有欺诈和失职行为。同时，切尼继续享受每年 15 万美元的哈利伯顿公司延期补偿金，以及该公司价值超过 1800 万美元的股票期权。反过来，为了确保切 275 尼及其同僚再次当选，哈利伯顿公司塞给共和党 50 多万美元。^[31]

布什家族与石油产业的关系由来已久。布什上任伊始，副总统切尼组建了一

支主要由石油产业圈内人士组成的秘密的能源特别委员会。2003年,一位圈内政治家、前白宫发言人汤姆·弗里对美国的所谓“好人”外交政策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抨击,并为美国政府描绘了一幅远非阿谀奉承的图景,含蓄地指出美国政府是出于私人石油公司的利益发动战争:“我们的信念是:我们是无私的。比如,我们认为,我们不是为了控制石油市场才去攻打伊拉克,并且,如果有人想那样做,我们也将属受害者之列。我们总是为自己的自私动机开脱。”^[32]如果还有人还在怀疑石油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就请看看2007年道琼斯的这样一项声明:伊拉克的傀儡议会正在考虑通过一项“由美国政府协助起草的”法律,赋予大型西方石油公司30年的开采伊拉克石油的权利。此外,最初几年的利润的75%都应该属于外国公司,而在其他的石油生产国,这一比例平均只是10%。^[33]

对于上述这些原因,没有教科书提到它们在我们决定发动战争、我们选择伊拉克为目标,以及我们的一些现在看来大错特错的战术——比如,将诸如法国、德国、联合国等国际实体排挤出伊拉克的重建和政权重组——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教科书从来不这样做。即使有几本教科书指出,当美国快速取得波斯湾战争的胜利之后,乔治·H. W. 布什的声誉在民调中急剧上升,但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也从来不提倡从国内政治中寻找战争原因。^[34]相反,他们宁愿相信官方为其行为提供的理由,而不愿探究表面现象背后的东西。比如,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人》,其论述伊拉克战争的第一句话就采用了这样的视角:“2003年,布什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我们已经知道,进攻伊拉克与所谓的“反恐战争”毫无关系。很久以后,甚至布什也不得不承认,二者之间没有联系。^[35]然而,总统和副总统仍然用它们自相矛盾的陈述来说明伊拉克与“9·11”恐怖袭击之间的联系。政治学家艾米·杰西科夫与莎娜·库斯纳证明,这种假想的联系是大众支持战争的首要源泉。这再次证明了赫尔曼·戈林的以下论断是正确的:要使人民支持战争,“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他们正遭到攻击”,并谴责反战派们缺乏爱国精神。当诸如《美国人》这类教科书反复强调恐怖主义与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之间的虚构的关联时,它们就是在我们的年轻人中散布对这场被误导的战争的支持。^[36]

不论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什么,在战事初捷后,布什政府忘记了任何成功占领都应奉行的基本规则:斩除占领区的原首领,然后,通过先前存在的社会机构去治理它。毕竟,萨达姆·侯赛因动用50多万大军和警察才得以控制伊拉克的秩序。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压倒了五角大楼的其他高级军官,在他的坚持之下,我们派驻少得多的部队深入占领区,其中几乎没人会说阿拉伯语。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使用伊拉克军队去负责警戒临时军火库、维持交通、协同巡逻及其他有益的工作。我们不听杰伊·加纳等一批有着处理伊拉克事

务丰富经验的美国官员的建议,一味宣布伊拉克军事力量是非法的。而且,我们这样做时,还没来得及对其进行收编和解除武装,就立即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组建了一支非法的武装。占领伊拉克不是放火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效仿过去 500 年来最成功的占领经验。比如,20 世纪 40 年代,德国人是如何治理法国的?他们凭借的是法国警察、地方领袖以及强行建立的维希政府。而我们所选择的路线只能证明我们没有能力建立更好的秩序。^[37]

从现实主义政治的立场看,伊拉克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愚蠢的念头。对于美国来说,萨达姆·侯赛因已经是瓮中之鳖。他向联合国屈服,再次同意 WMD 核查团进入,这本身说明他已进退两难;他依靠军事力量统治着自己的国家,但又动员不起有效的力量对付联合国和美国。而且,伊拉克即便算不上民主国家,也是个世俗化的阿拉伯国家。到 2004 年,一些中东问题专家、军事指挥官以及中情局官员都在讲着记者法洛斯的观点:我们选择进攻伊拉克,“妨碍了我们的阿富汗战事。在后者尚未打响之前,我们过早地打草惊蛇,最终会丧失抓捕奥萨马·本·拉登的机会。”它还使我们分散注意力,不能关注 2001 年“9·11”恐怖袭击的真正源头——在沙特阿拉伯、埃及与巴基斯坦境内,也不能关注我们本土安全体系上的漏洞。法洛斯继续说道,那场战争“过于依赖和过度使用武力”,“没有委派足够的军队去实施成功的占领。”最糟糕的是,它导致了新的恐怖主义。就在攻打伊拉克四个月之后,布什总统使穆斯林极端分子“胆敢在那里攻击我们”;而极端分子也做出了反应:“我的回答就是,让他们来吧。”^[38]。基地组织在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本来不存在,现在却发现,布什统治下的伊拉克是自己征募新兵的肥沃土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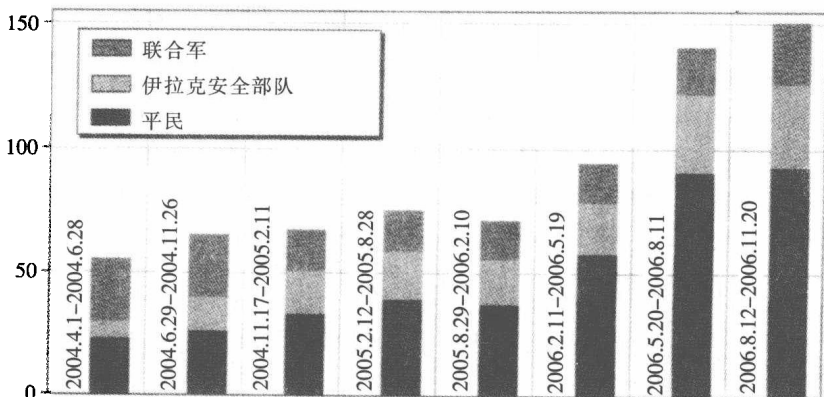


图2 每日平均伤亡表

上表说明了伊拉克日益陷入无政府状态。当然,无政府状态可能是在美国解散伊拉克政府及其武装力量之后才开始的。

材料来源: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Attacks); Brookings Institution (Bombing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ctarian Violence, Casualties)

的确,在2004年,战争看上去还不像2007年那样错误和混乱,所以,要求教科书作者们那时就知道今天看来很明显的事情,在我看来是不公平的。然而,我还是最大限度地总结了2002至2004年间(那时,这些教科书中有一本尚未出版)记者、历史学家以及政府官员提出的各种批评。当然,到2007年,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和政策分析家——以及多数美国公民——都得出结论: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的决定。今天,伊拉克不再是一个世俗化的(如果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它正在陷入无政府状态——这将滋生恐怖主义,或者正在倒向日益受伊朗影响的什叶派控制的原教旨主义。与伊拉克不同,伊朗在中东资助多个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势力将因我们的入侵而逐渐壮大。这绝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军队以占领者的面目出现,在穆斯林世界引起的仇恨与日俱增,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恐怖分子招兵买马。由于国内的破坏活动,伊拉克现在很少出口石油,并且自身开始入不敷出,因此,那场战争几乎没有帮助世界应对能源短缺问题。美国的国际声望也跌至一个新的水平,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对那些被当作恐怖主义嫌疑犯而拘禁起来的人的非法和非人道的做法。所有这些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就可以预料到。实际上,中情局曾警告布什政府,我们的入侵可能带来消极的结果,但是布什与切尼并不在意。对这个问题,早在1999年4月,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278所采取的一系列被称为“穿越沙漠”的军事演练,就有所预察。再往后看,设在卡托研究所的国防政策研究室主任伊万·伊兰德曾发表报告,题为:“美国的海外干涉是否会培育恐怖主义?——一份历史记录”,并对这一提问做了肯定的回答。^[39]

然而只有一本教科书——还是《美利坚盛典》——提出那场战争是个错误。为说明这一点,该书收录了老布什阐述在海湾战争后不进而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理由:

试图消灭萨达姆……需要付出不可估量的人员与政治代价……开赴并占领伊拉克单方面超出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将会破坏我们所希望建立的国际社会在对付侵略行为方面的惯例。如果我们奉行这条侵略路线,美国就一定依然是一支占领着充满仇恨的土地的力量。其结果将不仅完全不同,或许还一无所获。

就像该书作者所指出的,这段话“若放在小布什后来入侵伊拉克的语境中去解读,将会令人有所醒悟。”然而,不要过分强调其他五本教科书对政府角色的支持。或许,那些书的作者们会说他们既不支持也不谴责政府的决策。但是,既然他

们大多采用政府提供的那些术语,既然他们的出发点是“国际好人”这一观念,那么总体上,他们就的确给人产生了支持者的印象。另外,如果说在伊拉克深陷泥潭——就像其他的一些徒劳一样——并非美国的最大利益所在,那么,即便是中立的评价也似乎是不恰当的。

在一些美国历史教科书中,与一开始的那些章节不同,最后的几页总让人感到“一页比一页更差劲”(据说此语出自以下人之口:亨利·福特、温斯顿·丘吉尔、哈里·杜鲁门、历史学家 H. A. L. 费希尔、伏尔泰或某个无名氏。)虽然这些书籍的封面上不乏著名历史学家的名字,并编配了个性化的图像,但是它们的最后几章似乎特别缺少观点和见解。我怀疑这是因为没有人写过观点,至少没有人付钱请人写观点。本书第 12 章将讲述出版商如何经常地把历史教科书转包给下属去撰写,特别是在其已出一版之后。这些员工和自由写手并不够格写出观点——他 279 们有些人根本没有历史学背景,甚至连学士学位都没有。他们也付不起时间——不像我在写作这一章时这样,能够阅读文献,并提出自己最具说服力的观点。他们被请来只是为了对最近发生的事件汇总一下,对自己的所写的内容做个总结。这样写出的东西没有风格,甚至比这些大部头多卷本中的其他部分还要乏味得多。难怪老师们通常会将最后几章一带而过!

不论怎样,认为历史课应该少讲“撒哈”,多讲更遥远的“扎马尼”,是不正确的。如果怠慢“撒哈”——就像多数教科书那样,或者尽量避免讨论近期的历史,将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教科书作者们可能在一厢情愿地认为,从头到尾地讲述近期历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学生已经知道它们。然而,教科书作者们会渐渐老去,他们眼中的“撒哈”将是学生眼中的“扎马尼”。学生们需要了解近期历史,以理解目前的形势发展。低年级中学生还几乎没有关于克林顿任职时期历史的记忆,更不用说再早一些,比如妇女运动的历史了。要不了多久,颇受争议的 2000 年佛罗里达州大选结果——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很近的事——将成为中学生的古代历史。而且,当教科书和教师删减“撒哈”时,他们就使学生更难在他们所学到的历史与他们将面临的未来之间建立联系,其结果,只会促使学生认为历史全是无关紧要的。

“过去从未死去,”威廉·福克纳写道,“它甚至没有过去。”这无疑是对“撒哈”的最好评述。“撒哈”或许是我们最重要的过去,因为它还没有死去,而是活着的死者。教科书和教师偷走了它。这是学校对中学生犯下的最邪恶的罪行,它剥夺了学生们思考那些对自己影响最深的问题的能力。学生们从教科书的真假掺半的论述中获得的关于“普汀湾战斗”或“沉默的卡尔·柯立芝”^①的半生不熟的记

① “沉默的卡尔·柯立芝”,指美国总统约翰·卡尔文·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1872-1933)。他奉行不干预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也是一位少言寡语的人,故获此绰号。

忆,几乎不能帮助他们理解自己毕业后将要步入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一直是性别差异的;那个世界将面对诸如巴基斯坦、伊朗、朝鲜等拥有越来越强的制造原子弹能力的国家;那个世界充斥着日益加剧的国际或国内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一道,使我们注定无力将非法移民拒之门外。对近期的历史弃之不顾,注定使学生们从他们的历史课上收获不到什么东西,可以用来面对将来的世界。

注释

- [1] 引自 Daniel Barenboim, "Germans, Jews, and Music,"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 29/ 2001, 50.
- [2] Goering, 引自美军上尉 Gustave Gilbert, *Nuremberg Diary* (Cambridge, MA: Da Capo, 1995 [1947?]); 参见网页: pinkfreud- ga, "Answer," 7/ 26/ 2003, at answers. google. com/ answers/ main? cmd=threadview&id=235519, 5/ 2007.
- [3] 1972 年总统对加强《信息自由法案》的宣告,引自 Tim Weiner, "The Cold War Freezer Keeps Historians Out," *New York Times*, May 23, 1993.
- [4] John Mbiti, *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Oxford: Heinemann, 1990).
- [5] 我在上一段使用“叙述型”这一特定术语,因为我经过考察发现,有 2 本“探究型”教科书与这些叙述型书籍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发现美国历史》与《美国的冒险历程》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地图、插图和对一手材料的摘录,并非不重视“撒哈”。实际上,它们对近期历史的注意反映出其作者有意于将历史与现实相连。因此,这两本书尽管出版于 20 世纪 70 年代结束之前,仍然比那 16 本叙述型教科书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上花了更大的篇幅。不幸的是,探究型书籍已经远离人们的喜好,很久都不再出版了。就我所知,市场上已经见不到这样的书籍了。
- [6] 我为“2007”加了引号,因为出版商在版权页上作了假。我在 2006 年初就得到了所谓“2007”年版的书籍,它不包括 2005 年中期以后的信息。
- [7] Tracy Kidder, *Among Schoolchildre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0).
- [8] Gordon Levin J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60. 另可比较 Arthur S. Link 的未署名文章,收录于 J. J. Huthmacher and W. I. Susman, eds., *Wilson's Diplomacy: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ambridge: Schenkman, 1973), 9.
- [9] Eric Foner 对重建史学做过概要性的论述,见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xix-xxiii and 609-11.

[10] Leon Festinger,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1957).

[11] 只不过,我还没有走访过近期历史的当事人。

[12] 《美利坚之旅》这本书在恐怖袭击之前继续再版。

[13] 引自“9·11委员会”成员 Warren Bass 关于本·拉登的总结,见“Incendiary,”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1/ 14/ 2007.

[14] George W. Bush, “Address to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9/ 20/ 2001,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

[15] Mitch Frank, *Understanding September 11th* (New York: Viking, 2002), 16, Mitch Frank, “Restoring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merican Heritage*, 2/ 2005, 9.

[16] 他们的建筑物的确依赖“人际合作”,但是任何大规模的事业,包括恐怖袭击,都需要人际合作。

[17] Frank, “Restoring the World Trade Center,” 2/ 2005, 9.

[18] James Fallows 在 *Atlantic* 里的文章又摘要刊登于其著作 *Blind into Baghdad* (New York: Random House Vintage, 2006); Michael Scheuer 的话引自 Jason Burke, “Will the Real al-Qaida Please Stand Up?” *The Guardian*, 3/ 11/ 2006, books.guardian.co.uk/review/story/0,,1726185,00.html (May 2007); 五角大楼 11/ 2004 的报告引自 Thom Shanker, “U.S. Failing to Persuade Muslims, Panel Say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1/ 25/ 2004.

[19] Diane Ravitch, Chester Finn, et al., *A Consumer's Guide to High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Washington, D.C.: Thomas B. Fordham Institute, 2004).

[20] Anthony Lappé and Stephen Marshall, *True Lies* (New York: Penguin Plume, 2004), 125-26; Gerald D. Mc-Knight, “How the Warren Commission Failed the Nation and Why,” excerpted on History News Network, 11/ 28/ 05, hnn.us/articles/16615.html; John King, “Arming Iraq and the Path to War,” *U.N. Observer and International Report*, 3/ 31/ 2003, unobserver.com/index.php?pagina=layout5.php&id=815&blz=1.

[21] R. Scott Appleby, “History in the Fundamentalist Imagin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 2002, 511.

[22]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Nuclear Weapons,” fas.org/nuke/guide/israel/nuke/, 1/ 2007.

[23] Gerald Posner, *Why America Slep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121, 152, 157, 169; Lappé and Marshall, *True Lies*, 52-53.

[24] 一些观察家认为,塔利班可能一直在拖延。

[25] Mahmood Mamdani, "Good Muslim, Bad Muslim," in Eric Hershberg and Kevin Moore, eds., *Critical Views of September 11* (New York: New Press, 2002), 52; Seymour Hersh, *Chain of Command*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5), 151.

[26] 我们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还有更为阴暗的一面。中情局通过毒品贸易为那场反苏战争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就像当初在尼加拉瓜和东南亚所做的一样。这促使阿富汗和临近的巴基斯坦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和鸦片生产地。塔利班遵循《古兰经》的教义,于2000年在很大程度上终止了阿富汗的毒品生产。今天,在我们所扶植的政府的统治下,罂粟又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收成。此外,从阿富汗战争一开始直到今天,美国囚禁了数百名所谓的“敌方战斗人员”,并且他们很可能一直被关押,至死也得不到审判,甚至见不到家人,也不被允许见律师。当我们的公民在第三世界国家受到这样的遭遇时,我们所悲叹的,正是这样的行径。

[27] Cheney and Bush, 引自 Staughton Lynd and Carl Mirra, "I Am a Revisionist Historian," History News Network, hnn.us/articles/22700.html 31306.

[28] Colin Brown and Andy McSmith, "Diplomat's Suppressed Document Lays Bare the Lies Behind Iraq War," *The Independent*, 12/ 15/ 2006, news.independent.co.uk/uk/politics/article2076137.

[29] Carl M. Cannon, "Untruth and Consequences," *Atlantic*, 1/ 2007 theatlantic.com/doc/200701/cannonlying, 1/ 2007; Eric Alterman, "Liar, 'Liar,'" *Nation*, 12/ 11/ 2006, 9.

[30] Lappé and Marshall, *True Lies*, 146.

[31] David E. Sanger, "Bush Aide Says US, Not UN, Will Rebuild Iraq," *New York Times*, 4/ 5/ 2003;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CorpWatch, 2004, corpwatch.org/article.php?id=11322, 2/ 2007; Frances Fox Piven, *The War at Home* (New York: New Press, 2006), 17-18.

[32] Lappé and Marshall, *True Lies*, 120; cf. Linda McQuaig, "Iraq's Oil," ZNet 9/ 27/ 2004, at netscape.com/viewstory/2006/10/21/iraqs-oil, 10/ 2006.

[33] "Western Companies May Get 75% of Iraqi Oil Profits," Dow Jones Newswires, 1/ 8/ 2007, Market Watch website, marketwatch.com/news/story/western-companies-may-get-75/story.

[34] Michael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1995), 1.

[35] 见 The Memory Hole, thememoryhole.org/war/no-saddam-qaeda.htm 2/ 2007, for transcript of 1/ 31/ 2003 press conference, and Think Progress, thinkprogress.org/2006/08/21/bushon-911/, 2/ 2007, 其中有段视频,反映布什在回答“9·11”

与伊拉克之间的联系有何证据时,他回答说,“没有联系”。后来“9·11 委员会”发现,“没有证据证明,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关联。”见 Seymour Hersh, *Chain of Command*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5), 210–11. See also Lynd and Mirra, “I Am a Revisionist Historian.”

[36] Amy Gerkshoff and Shana Kushner,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e 9/11–Iraq Connection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Rhetoric,”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3 no. 3 (9/ 2005), 525.

[37] Fallows, *Blind Into Baghdad*, 155–63; cf. Thomas E. Ricks, *Fiasco* (New York: Penguin, 2006), and Nancy Trejos and K. I. Ibrahim, “A Call to Hussein–Era Soldiers,” *Washington Post*, 12/ 17/ 2006.

[38] Fallows, *Blind Into Baghdad*, 146; Bush quoted, 167.

[39]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07, 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207/index.htm, 12/ 2007; Ivan Eland, “Does U.S. Intervention Overseas Breed Terrorism? The Historical Record”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1998); Walter Pincus, “Before War, CIA Warned of Negative Outcomes,” *Washington Post*, 6/ 3/ 2007.

第十一章

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

280

千余年来，上帝对英语民族和条顿民族的训练并非毫无目的……他给了我们追求进步的精神，让我们战胜世界上所有的阻挠力量。他使我们精于政府管理，有能力治理那些野蛮和衰败的人们……在所有的种族中，他将我们美国人标识为他的选民，让我们最终引导世界的救赎。

——参议员阿尔伯特·J.贝弗里奇，1900^[1]

美国人把历史看做一条直线，自己处于最前端，代表全人类。

——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2]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不能只交由经济学家去处理。

——E. J. 米山^[3]

越来越明显，我们受益于这个世界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了。世界生态循环的大毁灭是可预见的。要阻止这种大毁灭，我们必须从目前的把世界看做试验场的幼稚观念，立即转向把宇宙看成是包容各种生命形式的母体的这样一种较为成熟的观念。这种思想转变，本质上是宗教的，而非经济的或政治的。

——小瓦因·德洛里亚^[4]

执着的读者，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是美国教育史上美国中学历史课从未做过的，那就是，把教科书读到最后一页。美国历史课上到最后，都给学生讲了些什么呢？

《美国的传统》使学生相信：“美国的传统一直是强大的——足以迎接横在面

前的任何挑战。”《美国的冒险历程》也说：“如果这些价值为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同，那么，美国的发展将永无止境。”《希望之地》写道：“大多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保持乐观。他们相信，他们的自由制度、他们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上他们的天赋，能使美国继续是——过去也一直是——‘希望之地’。” 281

一些教科书即便不是以书名结尾，也大都以同样乏味的乐观语调收尾。1991年，《美利坚盛典》的作者们告诉我们：“当美国引领这个世界迈向20世纪的终点时，美国精神爆发出澎湃的活力。”实际上，他们无视民意调查中显示的相反的结果。15年后，他们又写道：“美国精神在21世纪初跃动着充满活力的脉搏”，但是现在，“一些严重的问题依然困扰着这个共和国。”《生活与自由》进一步强调了这类空洞的见解：“在未来的这些事件中，美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都取决于它的人民。”你无法说它讲得不对！《美国的经历》预言：“当然，前方仍然存在着问题，但也充满着机遇。”《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也说，美国人民“只需要树立坚定的意志和使命感，去面对未来的新的挑战。”总之，面对未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集体的昂扬斗志，或者就像《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在2003年指出的，“美国人用希望与决心去面对未来。”^[5]

拙作早在1995年版中就取笑过教科书这样的收尾方法，但显然我的书对教科书出版商影响不大。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教科书不该以欢快的笔调收尾呢？我们不想让中学生感到沮丧。毕竟，未来不是历史——我们无法确定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是什麼。那么让我们欢乐地收尾吧。

实际上，就像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几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也不能准确预知下一步将会发生什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书的结尾为作者留下了一个空间，以恰到好处地激发人们的求知心理。学生能否把自己从这些大部头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所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呢？毕竟，正如莎士比亚所言：“往日就是序曲。”如果我们知道是什麼引发了过去的那些事件，我们就能够预言将来会发生什麼，甚至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些知识去选择我们的国家政策。的确，帮助学生学会这样做，是历史教育的第一要务。如果历史教科书能提供一些工具，让人去思考那些在将来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重演的过去的因果关系，或者提供相关的事例，那么，它们就能鼓励学生思考自己花了一年时间所学到的那些东西。对于历史教科书来说，这将是多么令人兴奋的结尾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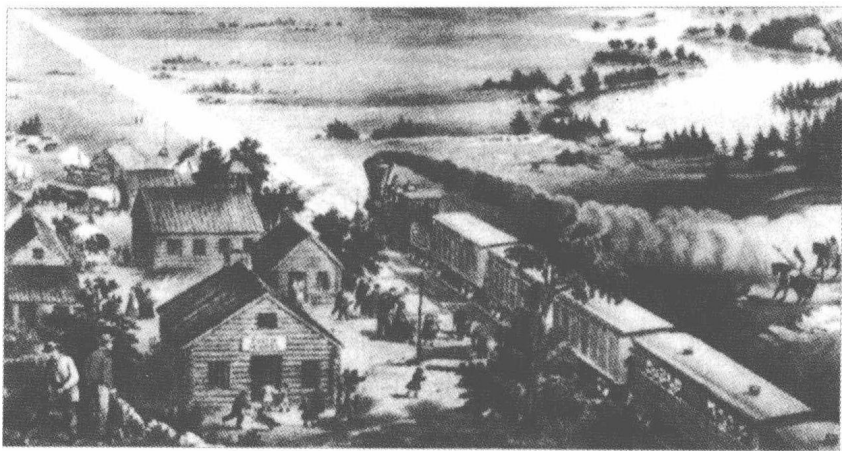


图1 《帝国大业踏上西进征途》

按照《美国历史》的说法,柯里尔和艾夫斯的绘画作品《帝国大业踏上西进征途》要比他们的其他作品更频繁地被重印在美国历史书籍中。这幅绘画中,“原始的”土著渔猎者与熙熙攘攘的白人殖民者对比鲜明,似乎告诉人们,社会进步注定会带来印第安人的厄运,因此我们今天无需特别在意对印第安人的剥夺过程。

但情况并非如此。缺少思想上的刺激,是这些书籍在其结尾处最突出的问题。作者们安慰我们:一切都好,让我们平静、再平静。我们无需思考我们的国家或全人类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根本没必要!这不仅是令人乏味的教学法,而且是糟糕的历史。然而,这样的结尾在教科书中已成惯例。

通常情况下,这种千篇一律的空洞内容表明它的背后一定潜伏着某种社会模型。这模型就是社会进步。它就像一朵花,虽然在教科书的最后几页才绽放,但种子自开头几章就已经埋下了。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视自己的历史为对进步观念的现实证明。托马斯·杰斐逊指出:

让有识之士来一次从落基山脉的蛮荒之地向东奔向海岸的旅行吧。在早期的联盟阶段,他会看到:人们生活在没有法律、依靠自然法则行事的阶段……后来,他在我们田园牧歌般的边疆州份里看到,人们在那里圈养牲畜,以弥补捕猎导致的匮乏……这样,在进步过程中,他会看到,先进人群的身影越来越稠密,最后,他来到我们的一些港口城镇,那里是最为先进的。事实上,这就等于是在从时间上考察自殖民地创建之初直到今天的人类的进步过程。没有人能说,进步的脚步将止于何处。^[6]

进步观念支配着美国的19世纪文化。1933年,芝加哥还举办了一场以“进

步的世纪”为主题的博览会。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的夸张与赞美更加泛滥。每一个中西部城镇都打出标语,显示出市民为自己的城市所容纳的最大人口数而感到荣耀,如:“欢迎来到伊利诺斯州迪凯特镇,该镇人口6.5万,并且还在增长。”那时人们基本上不假思索地认为,增长意味着进步,而进步就是目标。在华盛顿,当我们国家的“人口钟”每跳到一个新的数字——比如,从1.70亿到1.85亿时,商务部长都要照例进行庆祝。^[7]我们欢呼,美国的非凡的经济制度已经使美国拥有“世界上72%的汽车,61%的电话,92%的浴缸”,但人口却只有世界总人口的6%,^[8]而且未来更加光明——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孩子继承到的将是一个更好的星球,享受的将是更完美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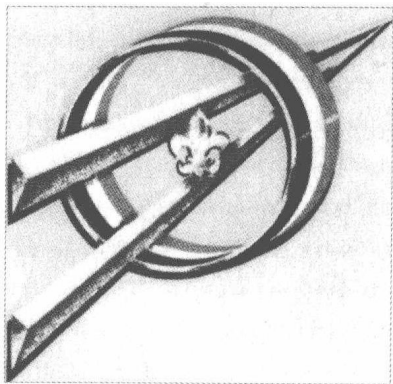


图2 “探险童子军”徽章

20世纪50年代,一家图片公司重新设计了“探险童子军”的徽章,使其更“与时俱进”。这个新图案前上方的尖刺,极好地体现了进步的含义。

这就是大多数教科书作者从小到大所经历的美国,也是他们今天依然试图向学生兜售的美国。或许,对于“最大就是最好”这类观念,教科书并不质疑,因为进步观念符合美国人所喜爱的思考教育的方式:正确引导,使每个人一步步得到机遇,使全社会一步步进步。这种进步观念还为未来提供希望。当然,大多数美国人愿意相信,他们的社会对人类以及这个星球虽然有功也有过,但总体上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9]历史教科书甚至进一步认为,只要融入社会,美国人就为国家的持久进步做出了贡献,并为世界提供了希望。就像布尔斯廷与凯利在《合众国的历史》一书的最后部分所说的,“美国人——白手起家—— 284 为世界各国遥远角落的人开辟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这样,“美国例外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在我们教科书里一开始是用在“始祖移民”身上,现在又指向了未来。

进步观念在社会上和美国历史教科书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从字面上理解,进步观念改进了现状,因为它宣称,要想进步,我们只需多做一些同样的事情。这种观念对于上层社会特别有益,因为如果美国人都被误导,认为经济馅饼

对所有的人来说都一直越来越大,那么他们就认识不到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进步观念还非常适合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观念认为,下层阶级是由于其自身的缺陷造成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进步论在本质上一一直是反革命的;由于情况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好,每一个人都应该对社会制度抱以信任。如此乐观地描述美国,还有助于教科书抵御采用这类教科书的德克萨斯等州的极端爱国人士的批评。

从国际上看,把那些“无产”国家说成是“发展中国家”,将使“发达国家”无需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公正分化。实际上,相比第一世界国家,“发展”问题一直使第三世界国家更加贫穷。1850年,第一世界的人均国民收入是第三世界的5倍;到1960年,变成10倍;到1970年,变成14倍。尽管这些比率有欺骗性,因为一美元在第三世界能比在第一世界买到更多的东西,但是第一世界的人均国民收入现在却是第三世界的20到60倍。^[10]然而,对“不发达国家”而言,“进步”这一术语仍意味着一丝微弱的希望。正如经济学家E. J. 米山所言,“用‘发展中国家’这一虚妄的叫法去形容那些贫困的、有时甚至是绝望的国家,结果使全世界都弥漫着一种自满情绪。”^[11]在19世纪,进步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同样华丽的理由:欧洲人与美国人认为自己在开发遥远国家的自然资源方面起到的是政府服务的作用——那些国家太落后了,自己是不能开发那些资源的。

渐渐地,进步模式失去了其吸引力。在上世纪的最后25年里,美国知识界大都放弃了这种观念。民调显示,一般大众也不再相信将来会自然地比现在要好。1982年,召开了一个“进步及其不满”研讨会,最后成书的主编是这样描述这种公众舆论变化的:“将来的历史学家会这样写:自20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很难再相信那种认为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和持续不断的观念了。”^[12]

或许,甚至连教科书也不再相信越大就必然越好。没有人再庆祝人口的增长。^[13]今天,我们不再炫耀我们的消费,更多的是悲叹自己的浪费,正如唐奈拉·H. 梅多斯在《增长的极限》(与人合著)一书中指出的:“在破坏环境和使用世界资源方面,我们是最不负责任和最危险的公民。”每一位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人都将扔掉1万只不回收的瓶子和几乎2万只罐头盒,制造126吨垃圾和9.8吨空气污染颗粒。而这只是“废山一角”,因为在消费链的末端每多1吨废物,就要求在消费品生产阶段多产生5吨废物,而在一开始的能源提炼阶段,可能会产生更多。^[14]

某些情况下,越大仍然似乎就越好。当我们把自己与周围的人相比较时,拥有更多的东西似乎就会更幸福,因为,有很多钱或者驾驶一辆昂贵的汽车意味着这个人在社会上更有价值。社会学家通常发现,收入与幸福成正比。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可以绝对地说,有更多的钱并不意味着更幸福。美国人认为自己在1970年没有在1957年幸福,在1998年又没有在1970年幸福,尽管他们在1998年人均消耗更多的能源与自然资源。^[15]

1973年能源危机引发了新的舆论氛围,因为那场危机暴露了美国在经济上甚至在地质环境方面的脆弱性,而我们对它束手无策。在那一年,一本生态学著作《增长的极限》十分流行,这反映出某种新悲观主义的倾向。^[16]第二年,罗伯特·海尔布龙纳^①在其著作中指出了这种新悲观主义:“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疑问……:‘人还有希望吗?’”^[17]罗伯特·尼斯贝特^②认为,进步观念“在西方历史的2500年间一直为人们带来好处……在这一点上它比其他任何观念都强”,^[18]但他又认为,这一观念正日趋淡薄。这种变化不是一两天就发生的。知识分子对进步观念的挑战由来已久,甚至可上溯到一战时期出版的《西方的没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该书中指出,西方文明正开始步入一个不可避免的、深刻的衰退。^[19]“一战”、大萧条、斯大林主义、大屠杀、“二战”都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人对进步的信仰。

社会学理论的新发展使得社会达尔文主义变成迂腐的教条,从而进一步颠覆了进步观念。现代人类学家不再相信我们的社会“领先于”所谓的“原始的”社 286 会,或比它们更是“适者”。他们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社会要比以前的社会复杂得多,但他们并不认为我们的信仰比那些所谓“原始的”信仰要高级,或者认为我们的族群制度更优越。甚至连我们的技术,虽然可以肯定地说更先进,但从长远看,并不能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从这个方面说,这种技术也未必就更好。^[20]

我们相信进步论的另外一个核心理由来来自于生态学理论。生态学家过去常常用适者生存来解释自然界的进化。到1973年,一大批关于机体进化的更为复杂的观点席卷了生态学领域。史蒂芬·杰·古尔德^③说,“生命并非进步的传说,而是一个枝蔓丛生、蜿蜒曲折的故事,短暂的生存者适应着当地环境的变化,而非改变着宇宙,或创造着完美。”^[21]

既然教科书不讨论思想问题,我们就不必奇怪,它们不会讨论“一战”、“二战”、大屠杀或斯大林主义对美国思想造成的影响,更不用说人类学或生物学理论上的那些新发展对美国思想造成的影响了。然而,到1973年,另外一个有关进步的问题显现出来,那就是,衰退使我们冒险去变本加厉地控制自然。环境问题每年都呈现出更可怕的兆头。

① 罗伯特·海尔布龙纳(Robert Heilbroner, 1920-2005),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② 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 1913-1996),美国社会学家。

③ 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美国古生物学家。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大部分教科书至少都提到由于 1973 年的石油禁运以及 1980 年的两伊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然而, 人们似乎不必为此担心, 教科书作者们暗示我们, 那两场危机当时就找到了解决办法。《美利坚民族的胜利》告诉我们, 作为 1973 年禁运的“结果, 尼克松宣布一项法案, 使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之前在能源需求上将不依赖任何其他国家。”十页后, 在讲到 1979 年的天然气配给问题时, 该书写道: “卡特发布了一条新的能源方案, 要求大规模发展合成燃料。这项计划的长期目标是使石油进口削减一半。”但该书在讲 1979 年时, 又不提尼克松的 1973 年的方案了, 那一方案遭到惨痛的失败, 致使我们对国外石油的依赖不是下降, 而是螺旋上升。^[22]它也没有讲, 国会认为卡特 1979 年计划不恰当, 因此从未批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事实上, 所有的教科书都采用这种少惹麻烦的论述方法。《希望之地》使读者相信, “到卡特任期快结束时, 能源危机已经平息了。”《美国的传统》也说: “美国人开始制造和购买更小的汽车。”“人们开始少用汽油和储备能源。”

事情要真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在 1950 到 1975 年间, 世界燃料消费增长了一倍, 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增长了两倍, 电力应用几乎增长了七倍。^[23]自那时起, 事情 287 变得越来越糟糕。同时, 世界石油生产已经达到饱和。这一点, M. K. 休伯特^①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了。1994 年, 我曾写道: “如果我们的能源不是无限的——这是很可能的, 因为我们住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 那么总有一天, 我们会遭遇短缺。”到 2007 年, 这种短缺已变成事实, 它所导致的混乱也是巨大的。一个世纪以前, 美国的农业在能源上还是自足的: 家畜提供肥料和畜力, 农民一家人干着种植和除草的活, 木头可以用来生火取暖, 风力可用于灌溉, 光合作用使作物生长。今天, 美国农业开始大量依靠石油, 这不仅是指拖拉机和卡车以及空气调节, 而且还包括肥料和除草剂。在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从 1973 年能源危机中得出结论, 我们不可能一直愉快地保持经济增长。1977 年, 米山写道: “任何人只要对物理学中的热、能量和物质等有最基本的了解, 都会意识到, 用历史的眼光看, 经济增长的终结, 就像我们现在所体验到的这样, 不会太遥远了。”^[24]这主要是由于“复合利息”的可怕力量。如果经济增长指数为 3%——这是通常的标准, 那就意味着经济在每四分之一世纪增长一倍, 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源的支出, 以及产生的废物通常也都增长一倍。

1973 年与 1979 年的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一个难题: 资本主义这种巨大的生产体系, 在设计上从来就没能考虑能源不足的问题。对过度供给的需求被认为

① M. K. 休伯特(M. K. Hubbert), 美国 20 世纪石油地质学家, 提出著名的“石油峰值理论”。

对资本主义是“有好处的”，能够带来生产的增长，而且常常会降低成本。然而，石油并非是生长出来的，而是被提取出来的。石油公司及 OPEC 根据未知但有限的石油层对石油进行定量配给。这样，我们习惯上将石油公司视为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商，但更准确地说，石油公司或许应被视为公共资源的保管人。

美国以前一直存在公共资源问题。设想一下，在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某一小镇，每一个家庭都养一头奶牛。每天早晨，大家都到小镇的公共草地上放牛，各家的牛一整天都聚集在一起吃草，镇上还出钱请来一位放牧者看着。后来，一些富裕的人家又买了第二头牛并获得了更大的收益，他们可以把剩余的牛奶和黄油卖给那些没有奶牛的海员和商人。然而，这类扩展会受到时间限制，最终，公共草地会被啃光。在短时间内对于单个家庭来说有益的事情，在长时间内对群体利益可能没有益处。如果我们把当代的石油公司与有奶牛的殖民地家庭相比，我们就 288 会懂得，有必要建立新的政府管理形式，规定对公共资源的使用，确保我们的子孙将来还有公共资源——在这里，就是石油层。^[25]

公共资源问题还在其他方面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水产业正处于危机之中。在切萨皮克海湾，1892 年可打捞 2000 万蒲式耳的螃蟹和牡蛎，1982 年可打捞 350 万蒲式耳，到 1992 年，只能打捞 16.6 万蒲式耳。渔民的生活水平面临下降的危险，对此，他们的应对办法一如往常：更加辛勤地劳动，也就是说，用加倍的努力去更多地打捞所剩无几的螃蟹和牡蛎。虽然这种做法对于单个家庭来说可能是有益的，但对大众来说只会带来灾难。2006 年以前，科学家就曾估计，只有 1/5 的港湾能够在较少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下获得与以前同样多的收获。港湾的这种问题还由于海洋问题而更加尖锐。人们在海洋渔业方面的技术越来越老练。《科学》杂志 2006 年的一篇报道指出，今天人们所食用的所有鱼贝类到 2048 年将灭绝 90%，这些生物中，29% 已经濒临灭绝；这意味着，这方面的收成还不到以前的 1/10。联合国正在努力推行一项旨在“管理和繁殖幸存鱼类”的全球计划。然而，这一计划涉及国际水域。不到很多物种已经灭绝的那一天，国际协商是很难奏效的。^[26]

由于经济全球化，公共资源今天已覆盖全球。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全世界汽车保有量在 1990 年是 1950 年的 10 倍，那么，没有哪位思维健全的人会预测，这一比例的增长还能够维持或还应该维持 40 年。^[27] 根据贾雷德·戴蒙德的研究，2005 年，美国人平均消费是世界的 32 倍，污染排放也是第三世界人民平均水平的 32 倍。^[28] 我们持续的经济发展在某些方面与进步论的一个结论并行不悖，那就是：美国人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这样，我们的经济领导作用就与我们的政治领导作用发生背离。政治上，我们可以希望其他国家实行我们的民主形式和

尊重公民自由；经济上，我们只希望其他国家永远不要达到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为，如果它们达到了，地球就变成一片沙漠了。经济上，我们是世界的祸害，而非希望。由于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当我们扩张我们的经济时，我们就使那些不如我们发达的国家较少可能去扩张它们的经济。今天，中国的交通工具对燃料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已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石油短缺。 289

几乎每一天，人们都会获得新的关注生态问题的理由：从赤道森林的过度砍伐，到极地的臭氧洞。癌症发病率一直上升，但我们不知道病因何在。^[29]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完全估量人类对地球的影响程度。在过去 50 年里，全世界健康男性的平均精子数减少了将近 50%。如果这是由于环境所致，这就并不好笑了。在未来的 50 年，精子数还会直线下降，我们把人类从地球上抹去了，但自己却不知道是怎么搞的。^[30]很多年里，我们都一直不知道，用 DDT 杀蚊子会在全球驱赶扑食蚊子的鸟类。我们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也越来越有可能使这个星球由于外在原因不适合人类居住。实际上，有好几次，我们几乎已经如此了。比如，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世界各国一致同意停止生产很多有损于高层大气臭氧层的氟氯烃化合物。2006 年，《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阿申巴赫指出：“科学家们意识到，如果氟氯烃化合物当初是用一种哪怕稍许不同的化学形式制造，那么它们就将整个地球的臭氧层损坏殆尽了。想想真是后怕。”^[31]我们侥幸逃过一劫。

所有的这些思考告诉人们，这类经济发展得越快，这类民族国家的治理能力越发达，就越会将我们带上一条不归路，而不会把我们引向一个可供人类长远生存的星球。我们面临的还不仅是一个能源危机问题，因为只要我们开发出低成本又不带来污染或导致地球变暖的能源，能源危机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相反，如果我们有更廉价的能源，想一想我们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浩劫！科学家已经掌握了怎样使用这类能源去降低海水的含盐量、扩大我们的可耕种土地面积，以及怎样用其他的一些方法使我们的这个星球变得更加美好——至少短时间内如此。我们必须开始善待地球，把它当作我们永远的居住地。将来某个时刻，或许就在今天这些中学课本的读者度过他们 50 岁生日之前，包括美国在内的那些工业化国家，在能源与原材料消费方面将不得不趋于稳定。这样，我们的石油危机最好应该被视为一种警醒，它将唤醒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然而，经济的零增长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关于公共资源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率先发展零增长型经济，就像没有哪个家庭觉得只养一头奶牛就够了一样。这就要求有一种新型的国际协调机制，但目前还几乎没有人想到那种机制是什么样的。海尔布龙纳悲叹道：“没有自愿的对增长的削减，更没有对社会的有计划的重组。那些在今天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32]即便明天的公民终将懂得对增长 290

的削减,我们今天也不能坐视等待,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中学历史课程都还没有让美国人为将来做好任何准备,让人们发挥想象力去思考这类问题。我们的教科书依然不假思索地死守进步观念,这只会是一种障碍,使学生看不到变革的必要性,由此也使变革更加艰难。大卫·唐纳德^①说,美国历史课程中的这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不仅不着边际而且是十分危险的”。^[3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环境危机乃是一个教育问题。对此,美国历史课难咎其责。

爱德华·O. 威尔逊^②把那些环境问题作家分为两个阵营:环保主义者和例外论者。^[34]大多数学者、作家,包括威尔逊本人都属于前者;与之相对的,是一小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其中不少人还与右翼思想阵营相连,这些人提出了重要的反对环境末日论的观点。1994年,当朱利安·西蒙^③和赫尔曼·卡恩等人将他们的世界与我们祖先的世界相对照时,我对他们说,虽然现代社会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去伤害这个星球,但也更有力量改善环境问题。毕竟,环境破坏是偶然造成的。美国的一些河流在50年前曾被认为污染得无可救药,但现在又重新适合鱼类生长和人们去游泳了。韩国的森林也人为得到了恢复。^[35]由此,例外论者宣称,现代技术能够使我们免于环境的压力。他们指出,人们今天在诸如大地震等天灾或诸如二战等人祸之后的恢复期,要比19世纪短得多了,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庞大的官僚机构能够调用各方面的信息,并组织大规模的行动。作为一项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人的寿命在继续延长。赫伯特·伦敦^④有本书名为“他们为什么对我们的孩子们说谎?”他认为教师与教科书都过于强调经济增长的危险,他指出,1990年的食品供应要比20年前多。^[36]西蒙也指出,人们曾多次短视地预言各种物资的大短缺,从上个世纪预言鲸油短缺到20世纪90年代预言银的短缺,现在那些预言都被新的技术发明否定了。^[37]的确,在高昂的价格面前,通过某些特殊的方法——如蒸汽压力等——去提炼石油会收益更大。

1994年,我曾指责教科书没能向学生提供这两派不同的观点,进而鼓励学生自己去思考。那些教科书不仅忽略了那些隐约迫近的问题,而且没能提到现代社会的应变能力。教科书作者们应该介绍过去那些提醒人们警惕灾难到来的思想,同时也应该介绍其他的寻求解决办法的思想。这样做,可以鼓励学生运用历史证据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教科书作者们却让我们相信,事情最终都会变好的,我们无需忧虑去向何方。^[38]他们对进步的赞赏与通用电器公司一样肤浅,这

① 大卫·唐纳德(David Donald),美国当代历史学家。

② 爱德华·O. 威尔逊(Edward O. Wilson, 1929-)美国著名生物学家。

③ 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美国当代经济学家;下文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系美国当代战略学家。

④ 赫伯特·伦敦(Herbert London),当代美国纽约大学教授。

家公司宣称：“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但是，这家公司在生态问题上的失责使它多次在《财富》期刊“十大环境破坏公司”里榜上有名。^[39]

我不再推崇这种左右逢源的论调。即便西蒙是正确的，即便资本主义是温驯的，我们目前的危机也至少在两个方面仍是新出现的，而且是资本主义本身所无法解决的。首先，我们面临着永久性的能源短缺，石油短缺还只是开始。这种短缺导致供不应求——这是一种“自然的”卡特尔，而不是约翰·D. 洛克菲勒与标准石油公司在1900年前后所结成的那种卡特尔——卡特尔并非好的资本主义。如果一批公司联合起来控制着雪橇制造业，那么他们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定价。或许有人会另外创办公司，不服从他们的协议，用新的、更便宜的材料去制造雪橇，或者干脆发明滑雪板——那样我们大家就再也不买雪橇了。但是，如果一批公司或国家控制着石油产业，就没有哪个新的生产商能够挤进来。而且，交通运输所用的石油，是很难轻易找到替代品的。

其次，我们对石油（以及其他各种矿石燃料）的使用带来了严重的、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全球变暖。大家都知道——除了某些中学历史教科书作者外，全球变暖使极地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在上个世纪，海平面上升了1英尺。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乔治·W. 布什政府赞同这种估计，本世纪还将上升3英尺。全世界——从迈阿密到威尼斯再到孟加拉——几亿人生活在与海平面非常接近的高度，这足以威胁到他们的生活与居住。由此引发的混乱将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而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如果格陵兰岛所覆盖的冰层融化了，海平面将上升23英尺。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①曾在1970年提出著名的“盖亚假说”，指出地球是一个自我平衡的系统。最近，洛夫洛克又指出，当地球的平衡被打破时，某些不平衡过程甚至会加快地球变暖。比如，当极地冰层融化时，它们就不再反射太阳射线，地球会吸收更多的热量并变得更热。洛夫洛克预言，要死掉数十亿人之后，平衡才会重新建立起来。全球变暖还引发另外一个气候问题：在过去30年里，飓风的速度平均增加了一倍，并且发生得更频繁了。^[40]

事情还不止于此。有证据表明，二氧化碳这种石油或煤炭燃烧后的常见排放物，会增强海洋的酸性。科学家警告，到本世纪末，这种酸性将损害珊瑚礁，并且灭绝那些对海洋食物链有加固作用的食物。“这是我整个学术生涯中所知道的最为深刻的一种环境变化”，《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作者托马斯·洛夫乔伊这样说。斯坦福大学的海洋学家肯·卡尔代拉也说：“我们在下一个十年所做的事情，将影响海洋数百万年。”^[41]

除能源危机与全球变暖危机之外，我们还面临其他的严重问题。数千个物种

^① 詹姆斯·洛夫洛克 (James Lovelock)，英国当代科学家。

濒临灭绝。在可能灭绝的物种的名单上,有现有的三分之一的两栖类动物,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八分之一的鸟类。爱德华·O. 威尔逊认为,这份名单还是乐观的,他相信,到本世纪末,所有生物中将有三分之二灭绝。核扩散又是一种威胁。1945年,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拥有制造核武器的知识和经济手段。此后,英国、苏联、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南非等国家加入了这个核武俱乐部——很明显,朝鲜也在此列。如果巴基斯坦和朝鲜能够制造核武器,那么很显然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以及某些私人组织,包括恐怖主义分子,都有这个能力。美国1969年差点在越南使用核武器,印度与巴基斯坦也在2002年差点要以核武器互相攻击。^[42]

从长远来看,一味地用旧方法处理这些新问题是很难奏效的。“只要看看人类是如何活到今天的,就别指望将来充满希望,”米山说,“人类只会灭亡一次。”^[43]如果本书新版的这一章里的观点倾向于环保主义者的口味的話,那么或许是那些潜在的下滑趋势——假设真有那些趋势的话——以及本书自初版以来越来越糟的形势,使这一倾向显得正当。毕竟,历史告诉我们,很多早先的重要社会,从玛雅和复活节岛到海地和加那利群岛,都无可挽回地损坏了自己的生态系统。^[44] 293 哥伦布在第一次见到海地时写道:“想一想大陆的美景,到那里面去一定大有所获。”哥伦布与西班牙人改变了该岛的生态结构,为其带去了疾病、植物与牲畜。猪、猎犬、牛、马快速繁殖,导致了巨大的环境破坏。到1550年,哥伦布在1493年带来的8只猪已经发展到“成千上万只猪”。1518年,一位西班牙殖民者写道:“这些岛屿自上帝造物以来,一直充满生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应有尽有”,但当欧洲人到来后,“岛上到处是垃圾,只有野兽和鸟才来栖息。”^[45]后来,在快速获利的名义下,甘蔗的单一种植取代了田园耕作,使得土地日益贫瘠。再后来,人口压力导致海地人与多米尼加人耕种到岛屿的边缘峭壁,这使得地表土壤被侵蚀。这个岛屿的生态系统曾经养活大批人口并能保持生态平衡,但今天,这里的环境要比哥伦布到来时差很多了。这个悲哀的故事是对未来的预言,今天的现代技术有能力使整个地球变成昔日的海地。

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在鲸油、海地等问题上的教训,或者让人们从过去的历史中提出对进步与环境问题的质疑。总之,虽然这类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丝毫没有透露这种严重性。我感到诧异的是,在环境问题上,今天的教科书实际上比以前的教科书更糟糕。除了《美利坚盛典》写了两段、《美利坚之旅》写了一段关于环境问题的文字外,其他教科书对卡特执政以来的环境问题就没有任何论述了。1970年“地球日”的设立、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1979年的伊朗人质危机,以及尼克松执政时期“环境保护署”的设立,都是我们教科书中所提到的环境事件。自这些事件发生后,15年乃至更多的时间又

过去了。教科书作者们没有注意到一些基本的趋势,只是浮光掠影地提到一些个别事件,无怪乎他们认为这段时间里没什么历史好写。若把能源危机问题在时间上回推那么远,只会让人觉得,这类问题已经是过时的新闻了,而且,教科书似乎认为,这类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美国人》中有一段话很典型,它要我们相信:“在《(国家能源)法》的帮助下,到1979年,美国对国外石油的依赖程度有所好转。”若真如此,1979年倒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在1975年——那时卡特还没有上台,美国35%的石油依赖进口,而在2005年,我们的石油进口量为58%。

指望1990年前后出版的教科书论述全球变暖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在2006年《大西洋月刊》里,格莱格·伊斯特布鲁克指出,这个问题当时尚未得到证实:

50年前,关注全球变暖问题的有识之士或许关心的还只是这一问题的不确定性,那时,连国家科学院本身强调的也只是这种不确定性。今天,关注科学发展、包括关注国家科学院的那些声明的有识之士,都一定会得出结论,那种不确定性已经变成了实际的危险。

伊斯特布鲁克形容自己一开始也是“怀疑派”,但后来“逐渐被事实说服”。对此,居住在北极的因纽特人会感同身受。他们警告,那里的整个生态系统都处于崩溃之中。在有记录的十个最热年份里,1997年到2005年之间的每一年都在其中,并且2005年创了新高。^[46]

那么,今天的教科书是如何对待这个堪称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的呢?下面是所有的六本新教科书在这一问题上总共说过的话;此外,《美利坚盛典》的最后还有另外一段话,我们留待本章的最后再作分析。

21世纪伊始,像全球变暖这类问题的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警告:地球行星是所有系统中最大的生态系统——它是没有国界之分的。美国人曾经夸耀自己如何清理自己的地盘,并大量地消耗了自己的林地,他们有什么资格告诫巴西人,他们不应该砍伐亚马逊热带雨林?

——《美利坚盛典》

虽然没有人知道全球变暖的原因究竟何在,但联合国的一个报告警告说,大气污染可能是原因之一。

——《美利坚之旅》

这里,《美利坚盛典》的意思是,虽然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占全球总量的25%,但第三世界国家才是最大的问题。《美利坚之旅》也只是在闪烁其词:大气污染“可能是原因之一”。而另外4本新教科书则从来就不提这类问题。^[47]

为什么教科书对环境问题的处理显得如此薄弱?如果教科书作者们在书的 295 结尾几页里不再推崇那些未经深思的进步观念的话,那么他们的最后几章将与前面的章节很不相称。他们整本书的基调都要改变。从书名开始,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就在歌功颂德,而进步观念又在使这种基调显得正当。教科书作者们把我们的国家说成在所有方面都越来越好,从种族关系到交通运输,莫不如此。传统上,它们把重建描述为“北方佬”豪夺和“黑鬼”放荡的时代,这种描述也符合上升的曲线,因为,如果种族关系在重建时期是不好的——或许还没有奴隶制时期那么坏,但肯定要比后来更糟糕,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想得到,种族关系一直在好转。然而,关于重建的事实迫使我们承认,在很多方面,我们国家的种族关系还没有回到比如说,1870年的水平。举个较小但有象征意义的例子吧。在那一年,A. T. 摩根这位来自密西西比州海恩兹县的州参议员,娶了一位名叫卡莉·海格特的来自纽约的黑人妇女,并且再次当选为州议员。^[48]今天,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再发生,不仅在密西西比州的海恩兹县,而且在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但是,进步论让很多美国白人得出结论,今天,美国黑人不应该再要求我们给予关注了,因为种族关系问题已经确有改善。^[49]

A. T. 摩根的婚姻让我们很难想像了。美国人关于进步的文化模型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今天的我们深信,我们比过去更宽容、更成熟,还有,更进步。甚至连亚伯拉罕·林肯的胡子这类琐碎的描述也能给我们其他的教益。1860年,剃去胡须的林肯赢得总统大选;1864年,蓄着胡须的林肯再次当选。今天这样的事会发生吗?今天的很多机构,从投资金融公司到杨百翰大学^①,都不接纳有胡须的白人男性。自1948年的汤姆·杜威^②之后,没有哪位白人总统候选人或者最高法院提名人敢于留点胡须。胡子本身并非进步的符号。虽然我的胡须微妙地促进了我的思维,但是,我们的不宽容曾经达到一种令人望而却步的状态——大型的迪斯尼公司是由一位留胡须的男人创立的,但这个男人后来不允许任何员工留胡子。具有更为深远意义的是,林肯还是最后一位上任时不属于任何一个基督教教派的

① 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隶属摩门教,是全美最大的教会大学之一。

② 据研究,汤姆·杜威(Tom Dewey)是最后一位留山羊须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他在1948年大选中败给杜鲁门。虽然美国此后也有不少留胡须的政治人物想问鼎白宫,但不无巧合的是,他们都在政党初选阶段就被淘汰了。

美国总统。美国人可能并没有变得更加宽容,我们只是在认为自己越来越宽容。于是,进步论就成为种族优越论的编年史。

高歌猛进的进步之声蛊惑着我们,使我们认为今天的一切都更加“高级”。不仅如此,它还诱导我们得出结论,远古社会其实比我们所知的更原始。进步论 296 还为各种单线条的进化模式奠定了基础,我们的社会过去常常根据那种模式对不同的人和文化进行分类,比如:野蛮—愚昧—文明,或者,采集—渔猎—园圃—农业—工业。在那些模式的影响下,学者们误以为“原始的”人类生活在霍布斯所言的“污秽、野蛮而短命的”状态之中,只有那些“较高级的”文化才可以说有充足的闲暇去发展艺术、文学或宗教。



图3 我家砍的树最多

美国赖以建国的一个精神基础是控制自然。约翰·亚当斯曾吹嘘:“我相信,我家砍的树比美国其他家庭都要多!”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是一位革命战争中的将军,他在1792年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同时代的多数美国人说:“我们在文明的指引下尽可能地、从土地上消除那些自然生长的事物。”亚当斯—林肯的这一思维模式在实际中使美国向太平洋岸的快速扩张成为可能,也使芝加哥建筑学校和亨利·福特装配流水线成为可能。然而,今天日益增长的环境意识对这些成就不屑一顾。1950年以来,这个地球上仅有的森林又被砍伐了25%以上。如果知道这些树木就是这个星球的肺,就没有人会认为上述扩张代表着进步。

人类学家对这些早就更为了解。人类学家彼得·法布指出:“不管传统的中学社会课传授的是什么样的理论;事实在于,越是原始的社会,生活方式越安逸。”^[50] 这样,“原始文化”很难说是“污秽的”。至于“野蛮”,我们可以把爱好和平的阿拉瓦克人与他们的西班牙征服者做个比较。而“短命”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在碰到欧洲人和非洲人所带来的那些疾病之前,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诸岛上的很多人以 297

及美洲人可能都非常长寿,特别是与欧洲和非洲的城市居民相比。乔万尼·达·维拉扎诺^①曾经指出:“他们寿命很长,很少生病。”今天位于纽约市的维拉扎诺海湾和维拉扎诺大桥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51]新英格兰的一位相当早期的殖民者曾这样说:“印第安人体格健壮,体会不到五花八门的这些疾病对健康的损害,但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这些疾病往往构成突发事件。”显然,他没想到,这些由欧洲人新带来的疾病后来也吞噬了土著美洲人的生命。这位殖民者还说,印第安人能活到“60岁、80岁,有些甚至能活到100岁,直到这个世界的万物召唤者把他们引到他们渴望已久的墓穴。”^[52]在马里兰,另外一位早期殖民者惊叹,很多印第安人已是曾祖父,而在英国,很少人能活到这个辈份。^[53]第一批遇见澳洲土著人的欧洲人记下了一些年龄数据,说明一大批土著人活到70岁。就此而论,《圣经》中《诗篇,第90篇》的意思就是,在几千年前的中东,大多数人都活到70岁——“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得强壮,可到八十,但其中尽是劳苦烦愁……”^[54]

进步观念除了助长学生对过去社会的忽视外,还使学生只记得自己的长处,却忘了同时代其他社会的优点。有人说,其他文化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成就,这种说法乃是受到了那种相信我们的社会是最进步的思想的影响。人类学教授们对很多一年级大学生中存在的严重的种族优越论深感失望。通俗类人类学教科书作者威廉·A·哈维兰说,在他的经验中,“我们今天所渴望的某些事情——比如,仅以男女平等问题为例——有可能在其他人中已经实现了,只不过一般的新入学的大学生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罢了。”^[55]很少中学开设人类学课程,在十个美国人中,学过大学人类学课程的也不到1人,因此我们几乎不能依靠人类学去消除大家的种族优越论。中学历史与社会课本应从其他文化中帮助打开人们的思维,然而,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因为在这些课程内容里,从哥伦布讲到最后,进步观念都充斥其中。因此,这些课程只会助长种族优越论,而不是消除它。而且,西方文化中关于进步的种族优越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那些相信自己的社会是地球上最进步的社会和未来的先锋的人,全都极易沉迷于一些极端残忍的行为,比如皮科特大屠杀,斯大林肃反、大屠杀以及“大跃进”。

298

教科书作者应竭力激发学生去思考美国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断言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某些现代医学手段确实比以前更加有效,并且基于更好的理论,但另一方面,那种大约从1930年到至少1970年在产房里盛行一时的所谓“科学的”反重力助产方式,却是进步观念留下的最大笑柄。人们把分娩比为一场手术:医生将母亲麻醉,然后像取胆囊一样把麻醉了的胎儿取出来。^[56]虽然今天的我们知道——“原始”社会的人也从未忘记,母乳——而非牛奶

① 乔万尼·达·维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ano,1485-1528),意大利探险家。

或所谓“配方乳品”，最适合人类婴儿，但是，甚至到 1992 年，也有一半的在医院分娩的美国妈妈哺乳他们的宝宝。^[57]如果历史教科书放弃它们对进步模式的那种盲目热衷，它们就能激发学生正确评价技术在哪些方面是真正进步的。“进步”的定义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组织的更新提供了可能，甚至或许使之成为必要。这些都应考虑。比如，今天的孩子们看到，民族国家在衰落，因为这个星球的共同资源迫使全球人共同决策，而部族文化的兴盛又可能使很多国家从内部瓦解。^[58]历史教科书的结尾几章应该成为探究性的练习，以引导学生发现事实，并阅读关于这类问题的两方面的资料。的确，这种方式要比今天教科书中那些盲目乐观的结尾方式更好地为学生们读完中学后 60 年的生命时光打下基础。

在诸如生活品质这类问题上做一个有思想的人，常常被吹捧为人文学科的教育目标，但是，历史教科书却把这类话题清扫到了色彩鲜艳的进步地毯之下。教科书甚至对我们的经济与科学体制使环境状况每况愈下的问题没有表示真正的担忧。相反，它们强调我们的政府做了充分而有效的反应。教科书作者们似乎更愿意讲述政府的反应——主要是环境保护署的设立，而较少讨论任何持续不断的环境问题。迄今为止，在新教科书中最为严肃地讨论我们的未来的，是《美利坚盛典》倒数第二页的这样一段话：

299

环境的困扰使国家的未来阴云密布。以煤炭为燃料的火力发电车间助长了酸雨的形成，可能还会导致温室效应——这是一种对地球变暖的可怕警告。放射性垃圾还没有得到处理，这妨碍了核动力生产的发展。这个星球的石油正在被抽干……

21 世纪伊始，对替代性燃料的呼唤不再孤掌难鸣，太阳能、风能、沼气、电混合动力汽车，以及对氢燃料电池的追逐，都是大众热衷的主流。保护能源问题依然呈现出另外一种严重而又奇异的现象——在政治家的讲台上大肆鼓噪，但很少进入公共政策领域……

这些话虽然几乎起不到警示作用，但至少提出了问题，并且不再暗示说这些问题是不值得担忧的。

不幸的是，在下一页，也就是最后一页，《美利坚盛典》又再次殷勤地保证：“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共和国，有着独特的传统，充满智慧，能应付一切困难。”但是，很多学生并不轻信这些话。根据 1993 年的一项调查，当时的孩子们比父辈们更担忧环境问题。^[59]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三个高

中生中就有一个认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核武器或生物武器有可能毁灭人类。^[60]“我曾经与我的朋友谈论此事,”我的一位女生在她的班刊上写道:“大家都说,我们觉得自己将来似乎不会过成年生活。”1999年的一项针对中学生的调查显示,几乎一半的中学生认为“美国最好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61]这些学生都上过美国历史课,但是教科书对正面思想的偏重似乎并没有将其他思想从学生们心中抹去。学生们在被操纵时,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他们意识到,潜藏的愚蠢的乐观思想只是一种防卫,它所环绕的,是一个空洞。或者,学生们可能从来就没去读他们教科书中那些令人乐观的结尾。

教科书偏爱进步观念,掩饰环境问题,这样做的主要后果可能正是告诉中学生,美国历史课是不合适的,它们不能引导出将来的美国历史课程。^[62]今天看来或许关键的问题,将不得不在其他课堂——或许是科学课或健康课——上讨论,虽然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生物或健康问题。同时,历史课背后那些盲目的、乏味的、缺少数据的说教将得到改进。

300

E. J. 米山提出,向学生灌输进步会自然到来这一动听的故事,会使学生保持被动,因为它把将来描述为一个不为他们控制的过程。^[63]然而,我不认为这就是教科书那样结尾的原因。它们的那种乐观向上的结尾最好被理解为出版商的一种策略,出版商们希望以民族主义的乐观情绪结尾会使自己的书被采用。而且,他们知道,共和党已经从尼克松时代的共和党——那时他们通过了《环境保护法》,沦为乔治·W. 布什的共和党——这时,大公司,特别是石油公司主导着我们的环境和能源政策。在今天的政治气候下,出版商可能担心,若指出全球变暖或能源短缺的问题是真正威胁,可能会被看成站在民主党一边。那样,他们的书就不会被采用。

然而,我们的教科书中的这种乐观的结尾最终将落得失败的下场。教科书作者们似乎在说,关于我们的将来,没有什么真正的问题需要去问,关于我们历史上的各种发展趋势,也没有什么地方真正需要去思考。这样,他们就无意中承认,我们的历史对于我们的将来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无怪乎学生会由此得出结论:学不学历史与他们的未来无关。

注释

[1] 参议员 Albert J. Beveridge 在参议院的演讲, January 9, 1900, *Congressional Record*, 56th Congress 3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0).

[2] Frances FitzGerald, *Fire in the Lake* (Boston: Atlantic-Little, Brown, 1972), 8.

[3] E. J. Mishan, *The Economic Growth Debat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7), 12.

[4] Vine Deloria Jr., *God Is Red* (New York: Dell, 1983 [1973]), 290.

[5] 两本新教科书——《走向今天》与布尔斯廷与凯利合著的那本书——都发出铿锵有力、但充满悲叹的声音：

2003年5月，布什签发了另外一项减税法律，共减去3500亿美元的税收。总统坚持说，这项“大胆的一揽子减税计划”将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增加一百万个工作职位，并能拉动股市。批评家指出，这一减税方案将会导致巨大的预算赤字。

——《走向今天》

然而，在2003年5月，布什签发了另外一项减税法律，共减去3500亿美元的税收。总统坚持说，这项大胆的一揽子减税计划将增进就业和拉动股市。批评家指出，这一减税方案将为未来的很多年带去巨大的赤字。

——布尔斯廷与凯利

第12章将介绍，这两段文字都不是署名作者写的，而是出版商雇来的一位职员或自由撰稿人写的。很明显，出版商以为这个人写完了书；但是，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这个人没把书真正写完。所以，这两本书的这一章在放上这一细节资料后，就都匆匆收尾了。

[6] Thomas Jefferson, 引自 Robert Nisbet,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198.

[7] Jules Henry, *Culture Against 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3), 16-17. Crawford Young 引用印第安领导人 Jawaharlal Nehru 和社会学家 Orlando Patterson 的话，指出，第三世界也在开始进步，见“Ideas of Progress in the Third World,” in Gabriel Almond et al., eds., *Progress and Its Disconten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83.

[8] 根据广告业理事会的市民手册《好市民》，引自 Stuart Little, “The Freedom Trai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c. 1990, typescript), 11.

[9] Edward 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158, 166; 另见 Almond et al., eds., *Progress and Its Discontents*, xi. 有些美国人的看法相反，他们愿意相信美国对人类是有害的。这种思想造成另外一种心理学和文化上的结果，那就是，它让那些相信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自己要比其同类更高

明、“更左倾”、或者说更挑剔。

[10] Carr, *What Is History?*, 116; L. S. Stavrianos, *Global Rift* (New York: Morrow, 1981), 38. In *Why Are They Lying to Our Children?*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84), 124, Herbert London 指出, 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在加大, 另见 Cliff DuRand, “Mexico– U.S. igration: We Fly, They Walk,” talk at Morgan State University, 11/ 16/ 2005, at World Prout Assembly website, worldproutassembly.org/archives/2006/01/mexicous_migrat.html, 11/ 2006; Giovanni Arrighi, “The African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5, 5/ 2002, newleftreview.org/?page=article&view=2387, 11/ 2006.

[11] Mishan, *The Economic Growth Debate*, 116.

[12] Almond et al., eds., *Progress and Its Discontents*, xi.

[13] 里根与布什政府仍然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坚持认为没有出现人口危机, 即便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如此, 因为, 更多的人口会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然而, 这种说法旨在呼吁反对私人堕胎, 而不是对那些嘲笑美国立场的国家的社会结构缺陷进行严肃地分析。

[14] Donella H. Meadows, “A Look at the Future,” in Robin Clarke, ed., *Notes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6), 63; Donella H. Meadows, correspondence, 11/ 15/ 1993.

[15] General Social Survey, “If you were to consider your life in general these days, how happy or unhappy would you say you are, on the whole. . . .” webapp.icpsr.umich.edu/GSS/, 11/ 2006.

[16] Donella H. Meadows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2d ed., 1974).

[17] Robert L. Heilbroner,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 (New York: Norton, 1974), 13.

[18] Nisbet,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8.

[19]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65).

[20] Colin Turnbull, *The Human Cycl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21.

[21] Stephen Jay Gould, *Hen’s Teeth and Horse’s Toes* (New York: Norton, 1983).

[22] 1980 年的石油进口比 1973 年高了 63%, 见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3*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3).

- [23] Mike Feinsilber and William B. Mead, *American Averag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0), 277; 另见 Matthew Wald, “20年后, 美国人的步伐仍然停留在天然气上。” *New York Times*, 10/ 17/ 1993.
- [24] Mishan, *The Economic Growth Debate*, 53. 另见 Warren Johnson, *The Future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 (New York: Dodd, Mead, 1985), 22–24.
- [25] 见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968): 1243–48; 以及 Garrett Hardin and John Baden, eds., *Managing the Commons*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77).
- [26] B. D. Ayres Jr., “Hard Times for Chesapeake’s Oyster Harve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1993; David E. Pitt, “U.N. Talks Combat Threat to Fishery,” *New York Times*, 7/ 25/ 1993; Pitt, “Despite Gaps, Data Leave Little Doubt That Fish Are in Peril,” *New York Times*, August 3, 1993; Elizabeth Weise, “90% of the Ocean’s Edible Species May Be Gone By 2048, Study Finds,” *USA Today*, 11/3/ 2006; Juliet Eilperin, “U.S. Attempting to Reshape Fishing Rule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8, 2006; Chesapeake Research Consortium. “Managed Fisheries of the Chesapeake Bay,” [chesapeake.org/FEP-ManagedFisheries .pdf](http://chesapeake.org/FEP-ManagedFisheries.pdf), 11/ 2006.
- [27] Noel Perrin, “Who Needs the World When You Have Cabl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pril 26, 1992.
- [28] 自然历史博物馆 (Natural History Museum) 展览: “Seeds of Chang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92); Richard A. Falk, *This Endangered Plane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139; Jared Diamond 在 *Politics and Prose* 的谈话 (Washington, D. C.) 1/ 18/ 2006.
- [29] 见 Barry Weisberg, *Beyond Repair* (Boston: Beacon, 1971), 9.
- [30] “Sperm Counts Drop Over 50 Years,” *Facts on File* 52, no. 2706 (10/ 1/ 1992): 743(1); Michael Castleman, “The Sperm Crisis,” *Mother Earth News*, no. 83 (9/ 1983): 176–77. The best guess as to the cause of the sperm-count drop may be disposable diapers that are too tight and overheat the testicles. See, inter alia, Andrea Braslavsky, “Could Disposable Diapers Lead to Infertility?” at AT&T Worldnet, dailynews.att.net, 9/ 28/ 2000. That’s a relief!
- [31] Joel Achenbach, “The Tempest,”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5/ 28/ 2006, 24.
- [32] Heilbroner,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 133.
- [33] David Donald, 转引自 Paul Gagnon, “Why Study History?” *Atlantic*, 11/

1988, 46.

[34] Edward O. Wilson, "Is Humanity Suicidal?"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5/ 30/ 1993, 24-29.

[35] Clyde Haberman, "South Korea Goes from Wasteland to Woodland," *New York Times*, 7/ 7/ 1985, 6E.

[36] London, *Why Are They Lying to Our Children?* 53. London must not have read the endings of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

[37] John Tierney, "Betting the Plane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2/ 2/ 1990, 52-53, 75-81.

[38] Jane Newitt, *The Treatment of Limits-to-Growth Issues in US High School Textbooks* (Croton-on-Hudson, NY: Hudson Institute, 1982), 13. 她还批评教科书偏袒争论中赞同“有限增长”的一方——我对这种“有限增长”论也是不能赞同的,我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也并不真正地把环境问题当作一个严肃问题来对待。

[39] Faye Rice, "Who Scores Best on the Environment?" *Fortune* (7/ 26/1993): 122. 另见 Debra Chasnoff 关于通用电器公司的电影胶片, *Deadly Deception* (Boston:Infact, 1990). 通用电器公司新的企业宣传口号为“GE 带来美好生活”。

[40] Mike Tidwell, talk at Politics and Prose (Washington, D.C.): 8/ 30/2006; Bill McKibben, "How Close to Catastrop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1/16/ 2006.

[41] Juliet Eilperin, "Growing Acidity of Oceans May Kill Corals," *Washington Post*, 7/ 5/ 2006.

[42] "The Red List," iucnredlist.org, as reported by Sam Cane, "16,000 Species Said to Face Extinction" Associated Press, 05/ 01/ 2006, cnn.netscape.cnn.com/news/story.jsp; Jeremy Rifkin, "The Risks of Too Much City," *Washington Post*, 12/ 17/ 2006; 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Kimball, eds., "Nixon White House Considered Nuclear Options Against North Vietnam,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ve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195, 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95/index.htm (7/ 31/ 2006).

[43] Mishan, *The Economic Growth Debate*, Ch. 8.

[44] 关于玛雅, 见 Allen Chen, "Unraveling Another Mayan Mystery," *Discover*, 6/ 1987, 40-49; 关于加那利群岛, 见 Alfred W. Crosby Jr., *Ecological Imperi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80, 94-97.

[45] Alfred W. Crosby Jr., "Demographics and Ecology," 1990, 手稿, 引自 Las Casas; John Varner and Jeanette Varner, *Dogs of the Conques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3), 19–20; 西班牙人的信引自 Kirkpatrick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0), 165.

[46] Gregg Easterbrook 就其所提 “Some Convenient Truths” 问题的回信, 载 *Atlantic Monthly*, 11/ 2006, 21; Gretel Ehrlich, “Last Days of the Ice Hunters?” *National Geographic*, 1/ 2006, 80, 84; Eugene Linden, “Why You Can’t Ignore the Changing Climate,” *Parade*, 6/ 25/ 2006, 4.

[47] 《美国人》中有一节两页(1122–1123)的内容叫“保守派的争辩”,但这隐藏在上一章讲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之后。可以预见,没有哪位学生会读到这两页。

[48] Lerone Bennett, *Black Power U.S.A.* (Baltimore: Penguin, 1969), 345–46.

[49] 但是可以参见 Jonathan Kozol, *Savage Inequalities* (New York: Crown, 1991), 3.

[50] Peter Farb,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 (New York: Avon, 1969), 49–50.

[51] Verrazano, 引自 Neal Salisbury, *Manitou and Provid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6.

[52] 引自 Russell Thornton, *American Indian Holocaust and Survival*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7), 39.

[53] Karen Ordahl Kupperman,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 (London: J. M. Dent, 1980), 58.

[54] Psalm 90, verse 10. 另见 S. Boyd Eaton et al., *The Paleolithic Prescrip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以及 Marshall Sahlins, *Stone Age Economics* (Chicago: Aldine and Atherton, 1972).

这里有一个统计学的问题。如果所有的新生儿在一周岁前有 40% 夭折,那么出生人口的平均寿命就非常低,因此较好的统计标准是一岁或十岁人口的平均寿命。当欧洲人与非洲人的疾病已经被带入甚至提前发作时,衡量那欧洲人与非洲人带来之前的平均寿命也并非易事。另一方面, Jared Diamond 从考古学中总结的信息也表明,上述的早期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寿命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见 “The Worst Mistak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Discover*, 5/ 1987, 64–66.

[55] William A. Haviland, “Cleansing Young Minds, or What Should We Be Doing in the Introductory Course to Anthropology?” (在美国人类学学会年会上提交的论文, New Orleans, 1990), 3.

[56] 人们为这种手术发明了专门的设备。整个过程不仅要克服自然力量,而且要向上克服重力的影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Las Casas 关于欧洲人到来之前海地

人生孩子的描述：“孕妇干活到临盆前最后一分钟，却分娩得几乎没有痛苦。第二天，她们就到河里洗澡，洗得与分娩前一样干净，人也一样健康。”(*History of the Ind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64).

[57] “Harper’s Index,” *Harper’s*, 2/ 1993, 15, 引自 Ross Labs. 很多医院依然实行母婴分离的办法，除非是在哺乳时间，即便科学研究——这似乎是唯一一种能够矫正生育方法的力量——证明，在随即抽查中，有双亲陪伴长大的孩子智商会更高。见 Feinsilber and Mead, *American Averages*, 227–28.

[58] Philip D. Curt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sp. 35, 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分析，把民族国家的兴起视为对邻国军事力量的必然反应。Curtin 认为，在有些情况下，民族国家并非必然就对公民有利。如果对核武器的控制导致在下个世纪出现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那么，那将消除民族国家的最初的存在理由。

[59] Ruth Bond, “In the Ozone, a Child Shall Lead Them,” *New York Times*, 1/ 10, / 1993.

[60] Daniel Evan Weiss, *The Great Divide* (New York: Poseidon, 1991), 136.

[61]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retaries of State New Millennium Survey, 1999, [stateofthevote.org/ New%20Mill%20Survey%20Update. pdf](http://stateofthevote.org/New%20Mill%20Survey%20Update.pdf), 12/ 2006.

[62] 见 Catherine Cornbleth, Geneva Gay, and K. G. Dueck, “Pluralism and Unity,” 载 Howard Mehlinger and O. L. Davis, eds., *The Social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SSE Yearbook, 1981), 174.

[63] E. J. Mishan, *Pornography, Psychedelics, and Technolog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0), 25, 150–51. 另见 Jonathan Kozol, *The Night Is Dark and I Am Far from Hom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5), 40.

第十二章

历史为什么要这样教？

301

我不知道,还有哪个知识领域,会像历史学这样惨遭蹂躏,出现年复一年、一本书接一本书的盲目重复。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①

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在一些职业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与教师的基本教学内容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

——马克·费罗^[2]^②

在出书时,凡有争议之处,最好拿掉。

——霍尔特出版公司驻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代表^[3]

他们雇人写,我不记得那人的名字了。

——《合众国的历史》的参编者布鲁克斯·马瑟·凯利解释谁是该书最后一章的真正作者。^[4]

这是给撰稿人的 3000 美元,我们的编辑会拿走稿子……那些人写东西很快,只需一两天,就能搞定“内战”部分。

——一位资深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编辑。^[5]

以上各章表明,在讨论从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到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等诸多问题时,我们的教科书提供了不相干的、甚至错误的细节,同时忽略了关键的事实与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历史教科书没能放手让学生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运

①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英国历史学家。

② 马克·费罗(Marc Ferro, 1924-),法国历史学家。

用到现实关怀中去,因此也就不能为他们理性地思考未来问题提供基础。随着教科书作者们越来越远离第一手乃至第二手材料,真正的事实被遗忘了。教科书很少介绍不同派别的史学分歧,也几乎从来不向学生展示各方所依赖的那些证据。在某些方面,教科书还缺乏学术性。在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只有两本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的旧教科书带有注释。^[6]有10本教科书甚至不给学生提供参考书目。

尽管受到学者们的严厉批评^[7],旧教科书依然年复一年地再版,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书一年一年地在出,据称还是新人新作,但其实都是“克隆”,几乎还是那些封面、那些书名、那些内容。如何解释这些令人震惊的雷同呢?

教科书必须取悦某些人。

出版商们出版教科书时,脑子里会想到好几种读者。学生是他们预期的读者群之一。出版商认为,学生的特点——出版商们所认为的特点——对教科书的阅读深度与封面设计具有特别的影响,这一点我们随后再讲。历史学家与教育学教授是另一个读者群——或许是两种读者群。教师构成第三个读者群,他们的特点与需求我们也会讨论。普通大众的思想观念也会进入出版商的考虑范围,因为公共舆论影响着教科书采用委员会。而家长也代表着另外一个潜在的利益群体,对他们,出版商们尽量不去惊扰。

有些读者群的成员从不羞于对教科书提出自己的那些要求。1925年,“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宣称,理想的教科书——

应该激发孩子们的爱国心……

应该谨慎地、乐观地讲出真相……

少讲失败,如果要讲,那也只是由于其在道德教化上的价值;应该主要讲成就……

应该为每个州、每个片区写足够的篇幅,去讲它们各自的成就与价值。^[8]

雪莉·恩格尔与安娜·奥乔亚一直是社会课教学方面令人瞩目的杰出人物。相比之下,1986年,她们对教科书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建议。从她们具有独特优势的角度看,理想的教科书应该——

让学生面对重要的问题,并且不提供现成的答案;
经过精心选择;

围绕重大社会问题,研究有深度;

利用……史学、社会学、文学、新闻等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第一手材料, 303
以及学生的亲身体验。^[9]

今天的教科书紧跟“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路线,却不接受雪莉·恩格尔与安娜·奥乔亚的建议。为什么如此呢?

是不是历史书用二手文献就应该遭到谴责呢?我们很难指望教科书作者们回到一手材料,从中挖掘出还不明朗的事实。几十年前,历史书中的二手文献是带有相当偏见的。直到二战前,历史学一直公开带有反犹和反黑人的倾向,其强烈程度超过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彼得·诺维克的《高贵的梦》考察了美国的每一所白人大学和学院,是近年关于历史职业圈的最好报道。根据他的研究,1945年之前,这些学校中只有一位黑人受聘讲授历史。^[10]那时,大部分历史学家都是来自有权势的白人家庭的男性。他们闭门造车。小亚瑟·施勒辛格发现自己竟可以在不提安德鲁·杰克逊任职总统时期的那一或许最为重要的事件——把美洲印第安人赶出东南部——的情况下,写出一部完整的关于杰克逊总统任期的书。更特别的是,施勒辛格的书竟获得了普利策奖!^[11]

然而,近来,美国历史研究中的二手文献比原来要全面的多。实际上,本书的每一章都基于很容易见到的研究成果,虽然对于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在这些二手文献中,有我们所要的全部信息,但这些信息没有进入我们的教科书、课件或教师培训课程,因此也就没有进入我们的学校。^[12]结果,用比较史学家马克·费罗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职业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与教师的基本教学内容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13]

这些疏漏是否是由于专业选择的问题呢?教科书作者们不可能写进所有的事件。史海无涯,没有哪本书敢说是完整的。我们必须做出选择。什么是重要的?对于某个年级,什么样的内容才是恰当的?或许,教师不应该花时间去讲海伦·凯勒,不论她是怎样的一位英雄。

教科书的有些细节是错误的,它们夹杂在比如说关于哥伦布的介绍之中混进了课本。如果我们看看教科书究竟都说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些细节凝思片刻,我们就得重新思考了。时间和篇幅的局限,不应该成为教科书不讨论哥伦布对美洲人做了什么、欧洲人如何称霸世界等问题的理由,因为这些在 304
宏观历史中当属至关重要的问题。

或许上层社会的预谋才是罪魁祸首。或许我们都是受骗者,受着白人精英男性资本家的愚弄,他们编配历史的基调,使之成为他们永久维系自己的势力与特

权、牺牲我们其他人的利益的工具。中学历史教科书正是如此,它们一看就知道全都出自同一个资产阶级执行委员会之手。在《1984》一书中,乔治·奥威尔鲜明地道出了是谁在决定着历史书的编写:“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历史。”^[14]

在一个分层社会里,社会的历史的象征符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当然是一个分层社会,有着阶级、种族、性别等不同阶层。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社会不平等可以促进人民辛勤劳动和不断创新。事实的确如此。但是,社会分层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因为那些有钱有势的上层人能够利用特权为自己和孩子谋求更多的利益。在以不平等为标志的社会中,那些长期得不到发展机遇的人可能变得叛逆,而幸运者们可能对于不公平现象感到羞愧,从而不能在受压制阶层面前甚至在自身面前为这种不平等辩护。要维护社会分层体系,控制人们对这一体系的思考就极其重要。马克思曾以“虚假意识”这一鲜明的标题,对此提出了分析。思考过去是人的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社会精英分子开始认为他们的特权是历史造成的,从历史上看是公正的,那么,就很难说服他们为别人制造机会。如果被剥夺者开始认为他们的被剥夺乃是自身的缺陷造成的,那么,就不再需要动用暴力而甘于现状。

“教科书明显在提供如何实现教育霸权的方法,”威廉·L·格里芬与约翰·马尔恰诺在分析教科书关于越战的论述时指出:

“我们所说的霸权具体指的是,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通过控制学校等能够对诸如越战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形成认识的机构,对社会施加各种影响……比如,在历史教科书中,忽略某些重要的事实与观点,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学生去认识历史事件。而且,通过其单向度的手法,教科书将学生保护起来,不让他们在思想上与现实世界相遇,尽管那样会增强他们的批评能力。”^[15]

305

这里,格里芬与马尔恰诺用委婉的学术语言告诉我们,我们社会中的那些支配力量使我们远离最重要的事实,使我们麻木和愚昧。

大多数教育学方面的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通常称之为“批判理论”。^[16]乔纳森·科佐尔属于这一学派,他批评道:“学校都以培养可靠的人为要务。”^[17]巴西学者保罗·弗莱雷这样说:“指望统治阶级提出某种教育模式,使被统治阶级能够批判地认识到社会的不公正,是相当幼稚的。”^[18]亨利·吉鲁是弗莱雷在美国的主要弟子,他也指出:“主流文化热衷于压制大众的批判性历史意识的发展。”^[19]大卫·提奥克与伊丽莎白·汉斯在这一学派刚刚兴起时就告诉我们,在1890到1920年

之间,商人对大众教育开始产生迄今为止比其他任何职业或阶层都要强的影响。^[20]一些教育研究者甚至著文总结说,上层阶级的控制使得真正的进步不可能存在。亨利·M. 列文在批评一些教育改革的动机时指出,“教育体制将总被用来为传播文化及维持现状而服务。”^[21]“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就是有权势的人用权势造就出来的,”瓦尔特·卡普写道,“一些琐碎的改革很难挽救它们。”^[22]

这些教育评论家传承了社会科学中一个较有分量的思想流派——“权力精英论”学派。这个流派认为,美国的确存在上层社会,其成员出入于高雅的私人俱乐部,集中在“三边委员会”^①中,往往还是跨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富裕的资本家们控制着主要的电视网、大多数的报纸以及所有的教科书出版公司,因此,他们掌握强大的力量,能够塑造我们关于时事的谈论和思考方式。他们动辄运用这一力量,比如,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从某个角度衡量,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在过去10年间,为“全国科学教师协会”(NSTA)提供了600万美元。这笔钱对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来说是九牛一毛,但对教师们来说,却是一大笔财富了。结果,NSTA一开始就拒绝接受阿尔·戈尔(Al Gore)为其免费提供的5万份关于地球变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该片曾以“最佳纪录片”获得“动画片学院奖”,而其拒绝的理由是,若接受了就等于“在无利可图的事情上作不必要的冒险”。但NSTA却曾发放美国石油学会制作的纪录片,《华盛顿邮报》的一 306 位记者称此为“可耻的石油依赖”。这都是金钱导致的腐败。^[23]

然而,把这件特殊的包袱扔在上层阶级的门口,也是不合适的。指责权力精英分子影响了佛蒙特的某所乡村学校或市区的某个教室里的教学,是很轻率的。如果精英分子如此霸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审查那些揭发自己对教育施加影响的书籍或文章呢?自相矛盾的是,“批判理论”不能解释自身的盛行。任何真正的上层阶级——他们的地位如此之高、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能够决定几乎所有的美国课堂如何教美国历史——都一定有能力使那些揭发自己的社会科学家边缘化。但是,上层阶级几乎没有将“批判理论”从教育中排除出去。相反,“批判理论家”主导着这一领域的学术活动。他们的著作得到优先出版并收到大量的书评,教育学教授们每年指定数以千计的学生阅读这类书籍。

的确,上层社会控制着出版,但是,这种控制不会殃及出版物的内容,至少当那些有问题的书籍明显会赚钱的时候如此。罗伯特·海尔布龙纳指出,不论美国发生什么事情,上层阶级总会有人插手,但是他们的介入并不意味着他们决定着事情的发展方向,也不意味着那是他们的阶级利益所在。^[24]那些批评美国教育的

① 三边委员会,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是北美、西欧和日本三个地区十四个国家组成的民间组织,实际上是西方国际金融财团及其控制下的跨国公司的政策协调机构。

书籍的出版商,同时也出版他们自己所批评的教科书。资本主义引以为豪的一点就是,到处都有愿意出版任何书籍的出版商,只要他们能从中获利。如果上层阶级强行删除那些“至关重要的事实与观点”,那么,他们为什么没审查掉那些令人震惊的关于美国历史的研究作品呢?——这些作品一度挤入美国电视的某些黄金时段,比如《关注大奖》^①这套讲述民权运动的纪录片。上层阶级似乎没好好干活。

精英阶层明显失去了对景观的控制。在美国各地,新的、更正确的历史标记与纪念物被纷纷建立起来,比如,在阿拉巴马州和伊利诺斯州,新的旅游景点给观光客们提供了一种关于切罗基人和乔克托人的“血泪之路”的更好的理解。在明尼苏达州德鲁斯市,一座新纪念碑讲述的是在种族关系低谷时期的某个悲惨的一天:白人对三名黑人马戏团演员滥施私刑。美国印第安人也建立了新博物馆,如康涅狄格州的皮科特族博物馆,该馆讲述了完整的皮科特族历史,包括他们几乎被“始祖移民”们灭绝,他们在种族关系低谷时期的顽强生存,以及他们在新型博彩业上的成功。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盟”博物馆第一次展出了奴隶制的历史,包括镣铐、刑具,以及后来出现的一本并不掩饰这一制度的惨无人道之处的书籍。^[25]或许我们应该得出结论,借用一个比喻,权力精英并没有染指一切。 307

有趣的是,上层阶级甚至没有控制“自己的”历史课堂上的教学内容。精英“预科”学校的中学毕业生们所遇到的历史老师要比公立中学的毕业生们所遇到的历史老师更有可能鼓励他们远离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这类教师成功地在上层阶级的腹地进行“颠覆性”教学,这使我们相信,在其他领域,同样可以如此。^[26]另一方面,如果教科书是由上层阶级为控制青少年及维持现状而设计的,那么,他们似乎很难如愿。学生们不仅不对哥伦布等人报以尊敬,而且最终会厌恶历史。有证据表明,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历史教科书以及历史课在增强学生对合众国的信赖、培养好公民方面,都收效甚微。^[27]

总体看来,“权力精英”理论似乎解释了一切问题,但可能什么也没有解释。根据这一理论,上层阶级拥有比实际上更大的权力、更强的统一性和自利意识。实际上,就其所谓的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影响而言,上层阶级只是替罪羊。谴责权力精英是令人愉快的。“权力精英”理论在自圆其说:教育制度无法改革,因为那样做不符合那一阶级的利益,因此,上层阶级阻止变革。这样一来,“权力精英”理论创造了一个“令人满意”的世界,这个世界比我们大家共同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包含更深的罪恶。这样,“权力精英”理论使我们这些非精英阶层感到,并非

① 《夺标》, *Eyes on the Prize*; 全称为 *Eyes on the Prize: America's Civil Rights Years (1954-1965)*。取名于美国一首同名民谣。

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到这种文化扭曲的过程之中。这一思路不仅使我们无需为当前美国历史教学的可悲现状负责,而且使我们没有责任去改变它。有什么用呢?照这样的定义,我们采取的任何行为都是不合逻辑的。

然而,上层阶级的控制或许并不足以解释教科书为什么会出错。教科书出版界里的具体压力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历史教科书为什么会如此单调和迟钝。在美国,几乎一半的州都设有教科书采用委员会。这类委员会有些直接充当书刊审查者的角色,它们要保证教科书不仅在篇幅、内容、读者层次方面符合标准,而且避免涉及某些可能会冒犯家长的话题或观点。那些没有设立这种采用委员会的州也并不免于书刊审查,因为它们对教科书的筛选常常停留在本位层次,它们更直接关注的是是否会冒犯某些人。而且,没有设立教科书采用委员会的州的市场较小,出版商要想获得许可权,就必须深入到街区或学校层次。因此,没有这些委员会的州对于出版商的影响相对较小,出版商会把自己的努力放到那些有这种委员会的大州上。具体地说,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对出版商有直接的影响,因为这两个州的市场很大,对教科书的采用是全州范围内的,并且有很多人在积极宣传。在那些没有采用委员会的州,学校和学区必然会选择那些为较大市场发行的教科书。^[28] 308

教科书的采用过程是相当复杂的。^[29]有些州,比如田纳西州,接受几乎每一种教科书,只要它在装订、读者层次以及论述主题等方面符合基本的标准。田纳西州的学校常常从大约12本书中为一个学区选定适用的教科书。^[30]另一种情况是,阿拉巴马州过去常常为全州每门课只选择一种教科书。州教科书委员会常常较小,并且其成员由州长或州教育专员任命,通常由教师、律师、家长或其他热心市民志愿担任。教科书委员会的日常工作通常由一个小型的工作组完成,这个工作组首先散发一些规范说明书,告诉各出版商自己下一步打算订的各科教科书的适用年级、技术要求(大小、装订和外形)以及内容大纲。出版商据此送出样书及相关辅助材料。同时,教科书委员会根据任命自己的那个(那些)人提供的信息,有时还结合工作组提供的信息,分科目——比如,中学美国历史——建立评估委员会。这些评估委员会事先召开工作组意向会议,阐述各种教科书评估表格,然后,把样书送至评估者。

通常,有一种正式的会议,供出版商代表向评估委员会呈述情况。大州还在州内不同的区域分别开会。在所有的这类会议上,出版商代表都极力突出自己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们推出的是形式而非内容:他们吹捧自己在装帧、美术、“技巧训练”以及视频、测验等辅助材料上的特色。

评估委员会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大家须记住,我所考察的近期出版的教

科书平均每本厚达 1150 页。略微统计一下就知道,评估专家们不可能把这些书全部读一遍,更不要说把它们放在一起认真比较了。评估专家们还要耗费大量精力为每本书填写平均 73 条评估指标——这好比一个“奥吉亚斯的牛圈”^①。既然他们只能大致浏览,他们就挑选那些容易读的、较新颖的、封面色彩鲜艳的、装帧吸引人的、带彩色插图及视听等辅助材料的、有教辅说明以及测试题目的书籍去看。辅助材料是至关重要的。很多教师,特别是那些学术背景不深的教师,都相当依赖它们。出版商提供完整的讲课提纲、使讲课增色的小故事,以及带有——用迈克道格拉-利特尔出版公司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话说——“动画地图”和“信息图表”的一些网站。测试题目也特别重要。很多教师既没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自己设计测试,他们在这门课程的四个阶段里要带 120 名学生。于是,2006 年秋季,在一个美国历史“高级课程”教师讨论小组上,有人通报说,有教师发某网站粘贴《美利坚盛典》的配套试题库里的题目和答案。“不管怎么讲,这真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一位教师惊叹地写道:“我已经给那位老师写电子邮件,让他尽快撤除那些链接。”^[31]

不幸的是,教科书的营销就好像是兜售鱼饵,关键在于抓住垂钓者而不是鱼本身。这样,很多被采用的教科书都是很花哨的,它们只注意吸引采用委员会的眼球,但学生们读起来却空洞乏味。乔伊斯·阿普尔比、艾伦·布林克利和詹姆斯·麦克弗森合著的新版七年级教科书《美利坚之旅》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该书杂乱无章,内容脱节。或许,面对今天学生们的所谓“小跨度注意力”,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版面设计部可以大显身手了。让我们看一下其中的一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章本应该是有趣而紧凑的。该章开头有一个加星号的方框,方框里那段话的标题是:“这为什么重要”。另外一个加星号的方框里给出了五个“本章主题”。每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在这本教科书的开头部分“我怎么能够记住所有的内容”里所说的“在历史上反复发生的一个概念或主要观念”。概念或观念是否“发生”出来的,这本身就是可疑的,就像诸如“连续与变革”这类主题是否有助于人们记住所有事情一样是可疑的。比如,我们在读这一章的第一节“通向战争之路”时,它怎么有助于我们知道它符合“连续与变革”这一主题?又有什么是不符合这种主题的呢?

接下来,该书亮出了一个题为“历史与艺术”的加星号和方框的标题,然后是一副巴斯·米勒(Barse Miller)的油画,油画所配的标题是“启航,旧金山,加利福尼亚”,油画的说明文字是:“二战中的美国士兵相信他们是在为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而战: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作

① The Augean Stable,“奥吉亚斯的牛圈”,原指古希腊国王奥吉亚斯的一个粪便堆积如山的大牛圈,常比喻繁重而粗鄙的劳动。

为历史论述,这段文字是很成问题的,丝毫没有显示出该书作者之一詹姆斯·麦克弗森在个人专著《为了理想与同志:内战中人们为什么而战》一书中所具有的老练。在接下来的一页,有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时间表,其中只列了四个事件:日本入侵满洲,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以及德国强占捷克斯洛伐克。该书不怕引起更多的混乱,把接下来的大量篇幅用于描写更多的条目,如1938年的“水晶之夜”(由此,德国发起对犹太人的大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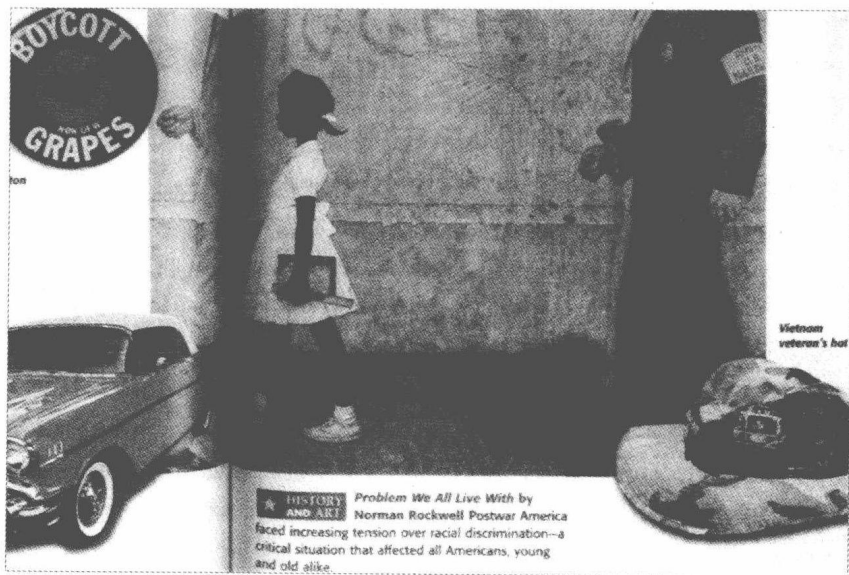


图1 《我们生活中的问题》

甚至连插图也在现代教科书的仓促之间被毁了。在《美利坚之旅》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章节之后,我们看到了诺曼·罗克韦尔的著名绘画《我们生活中的问题》。画面上,一个黑人小女孩穿着漂亮的节日服装第一天去上学,几名联邦礼兵前后簇拥保护。这幅画我们今天怎么也看不明白。与这幅插图叠在一起的,还有一顶帽子的图画,以及一副1957年的雪佛兰汽车广告图片——这幅广告引发了美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葡萄业联合抵制运动。这幅插图的作用还由于排版问题大打折扣。设计者将这幅插图移到两页之间的夹缝里,以腾出地方写上“越战老兵的帽子”。(这本书的作者们还在100页之后提供了另外一幅“越战老兵的帽子”的图片,并配以同样的标题;这说明了他们是多么的杂乱无章。)这幅画删掉了走在女孩前面的联邦礼兵,这使得小女孩似乎是在走向书本的中缝。

接着,出现了一个标题:“第一节”,并标以一个小金蛋,以及标题文字“通向战争之路”。这一章还没开始,我们就先看到了总结,题目是“阅读,然后发现……”。这个总结下面包含三个话题(我觉得它们应该叫“主题”,但这个术语已经被搞乱了。)接下来,我们看到五个“要记的术语”,它们共用一个标题:“讲故事”,下面又引入一段威廉·夏伊勒^①关于一次纳粹集会的描写。最后,在看到《我的奋斗》一书

① 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美国著名记者,著有《第三帝国的兴亡》。

的护封照片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字叙述。总体上,二战这一章的 55% 的内容都不是叙述文字,而是对叙述的干扰。有些扉页文字以及文字框引用了一些一手材料的摘录或有益的插图,而另外一些扉页文字以及文字框中则是没什么用处的“活动”与“学习方法”。总体上,它们很分散。叙述性文字还不到整个内容的一半,被淹没在页面之中,只不过是一种不协调罢了。 311

难道这种杂乱无章的现象是必然的吗?数百万中学生都自行读过全套《哈利·波特》,其中每一册都有数百个双面的文字页,没有插图,没有扉页文字——除了故事主体外,什么都没有。为每一页都配上“多渠道活动”、“讲故事”以及“要记的术语”等,其考虑对象只是那些教科书采用委员会,而不是现实的读者。那些叙述性文字看上去比《哈利·波特》更可读,但实际上可读性比它差得很多。

撇开风格不说,教科书采用委员会想看到哪些内容呢?首先,他们努力善待对于自己的州来说很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声名不佳的美国第 14 位总统富兰克林·W. 皮尔斯来自新罕布什尔州,在该州,凡对这位总统秉笔直书的教科书,都落下了可悲的下场。皮尔斯总统或许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二位最糟糕的总统,在他的任期内,堪萨斯即将爆发内战,他召集他的外交官们发布了令人难堪的《奥斯坦德宣言》(该宣言扬言要占领古巴,后来美国国务院不得不拒绝承认这个文件。)并且在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喝得醉醺醺。但是他是从新罕布什尔州走出的唯一一位总统。还有,阿拉莫要塞^①深深地扎根于(盎格鲁)德克萨斯人的心中,而任何一本教科书,只要指出是对奴隶制的爱激发了盎格鲁人在那里为“自由”而战,也将得到可悲的结局。一些地方部门的要求反而更符合历史:加利福尼亚的立法机构最近在讨论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扣留写进教科书。^[32]

征订者通常都在教科书里找寻自己想要的那些细节。大多数教科书编撰者最初都在出版机构里做过销售代表。他们并非历史学家,但是他们了解市场。他们能确保自己的教科书包含任何可能引起关注的问题。教科书包罗万象。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前任主任林恩·切尼谴责这一现象说:“教科书越来越像历史事件的术语表——沦为一种主题概要。”^[33]近些年,教科书要关注的历史事件更多了,原因在于,很多州为迎合《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②,编制了很多多项选择题试卷。教师们总在搞应试教育,特别是要应付那些决定学生能否得到文凭 312

① 阿拉莫,Alamo,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附近一座由传教站扩建成的要塞。在 1836 年德克萨斯反抗墨西哥统治的起义中,大约 182 德克萨斯人被围困在此,所有起义者都被杀害。

② 2002 年 1 月,美国总统布什颁布《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旨在推进教育公平。

或者学校是否会被勒令整顿的重要考试。多项选择题的考试几乎都要考“细枝末节的历史”——比如，“1812年战争什么时候开始”等以讹传讹的小问题。^[34]《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并未要求用多项选择题考历史，实际上，它没有要求对历史课进行任何考试。然而，教师们悲哀地认识到，比多项选择题考试更糟的唯一一件事情，恰恰就是没有历史考试，这样一来，学校的片区就整个不再重视历史课，而只关注那些有考试的课程了。然而，问题是有解决办法的，有些州已经找到了：设计一种值得教师去施行的测试——“学业档案”(portfolio)或者其他模式。但是，另一方面，《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及其导致的全州统考又使教科书有理由越来越长，教师用起来也越来越无奈。

在一些州，下一个步骤就是听证。评估委员会邀请社会各界在听证会上就被列入评估对象的各种书籍展开评论。至少，在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些听证会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些团体可以借此有组织地对选定的一本或多本教科书提出批评或推荐，他们通常指责某本书不符合大纲或规范的要求。虽然出版商们抵触这一程序，但是批评者们，特别是德克萨斯州的那些吹毛求疵的人还是挑出几百处错误，从拼写错误到大的硬伤，并责令出版商改正。由于采用委员会总是竭力迎合那些提名自己进入委员会的人的要求，那么那些在听证会上说三道四的人常常一言九鼎，不论其说得对与不对。

有采用委员会的州过去还常常逼迫出版商们公开表示赞同某些观点。多年来，在“迪克西”^①出售的任何一本教科书都不得不称内战为“州际战争”。早期版本的《美利坚盛典》甚至使用“南方独立战争”这一亲联盟派的称谓。这就是糟糕的历史学。在1861年到1865年内战进行期间，这场战争被称为“内战”、“叛乱”或“大叛乱”——因此是叛逆性的，但是《美利坚盛典》对南部各州“情有独钟”，因此，管它叫什么呢？只是到了民权运动的章节之后，《美利坚盛典》才恢复“内战”这一叫法。^[35]在阿拉巴马州，法律过去常常要求学校避免“教科书涉及任何对本州(白人)利益带有党派性的、偏见的或者敌意的内容”，或者那些可能“引起对本州白人历史的反思的内容”。^[36]德克萨斯州至今还在要求“教科书不应该涉及那些旨在颠覆当局的内容。”^[37]这类标准适用范围之广令人震惊，它们可能迫使几乎任何教科书的任何章节都做大幅度的删改，除非作者本人已经略去了那些令人不快和有争议的内容。

很多州修订了自己的教科书规范，以屈从这种对教科书内容的无理要求。至少自1970年以来，比如说，密西西比州的规范里就包含了一系列的“陈词滥调”，³¹³对此，没有哪位明智的教科书作者或批评者会予以反驳。然而，如果出版商们承

① “迪克西”，Dixie，美国南方各州的统称，有调侃之意。

认旧条款的精神仍然起作用,他们或许会得到宽宥。当初《密西西比:冲突与变革》一书被拒,就说明了那些精神的确存在。我当时是该书的主要作者,该书修订后作为州历史教科书终于在1974年由哲人图书公司出版。我说“终于”,是因为在此之前,该书已遭到11家出版社的拒绝。问题还不在于书稿的质量——该书曾赢得当年“最佳南部非虚构类”作品的“莉莲·史密斯奖”。问题在于,传统的出版商说他们不能出版教科书,而教科书出版商又说他们不能出版这种不太可能被采用的教科书。一些出版商甚至担心密西西比州会因此报复自己出版的其他科目的教科书。教科书出版商也有道理——教科书委员会已经拒绝接纳我们写的这本书。根据评估委员会中人数居多的白人委员的意见,它包含了太多的“黑色历史”,收录了一副私刑的照片,并且过于关注近期的历史。我和我的合著者在三所希望该书得到采用的学校的配合下,以对方违背《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为由上诉该州,这就是“洛温诉特尼浦西德案”。1980年,该书被列入该州批准的教科书名单。

尽管“特尼浦西德案”有例在先,出版商们还是担心来自右翼分子的批评。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2006年,佛罗里达州通过了一项法律,宣称“美国历史应该被当作纯正的历史去教,不能够追随修正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的相对真理观念……美国历史应该被视为实在的,而非建构的。”这一法律乃是对那些“解释”历史而非“如实讲述”的“自由化”教授们当头棒喝。起草这一法律的人没有认识到,任何一种对历史的讲述,都要求在讲哪些不讲哪些上做出选择,因此准确地说,都是一种解释。

另外一种导致教科书趋于一致和保守的力量来自出版机构本身。卡洛琳·杰克逊编写过的美国历史教科书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她告诉我说:“抄袭现象太普遍了。”20世纪80年代,《美利坚民族的胜利》占领了市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它的成功让每个出版社都羡慕不已,因此,大多数教科书都模仿《美利坚民族的胜利》。实际上,它们今天依然如此。虽然二手文献有足够的学术性,足以从知识上支持人们去冒险追求学术性,但是目前,在主流出版社中,还没有产生一本左翼或者右翼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也没有产生一本重视非裔美国人、拉丁美洲人、劳工或女性的历史,314并视之为整个美国历史的一个门类的教科书。^[38]这类书籍其实一年可卖1万多本,赚几千块钱的利润。至少,它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上撕开一道“裂缝”。若不是德克萨斯州的苛求,出版商可能做得更好。^[39]但是,没有哪家出版机构看到了这种可能性。所有的出版商的眼光都为出版下一本《美利坚民族的胜利》和赚取数百万美元这类美好前景所蒙蔽。一位编辑曾评论——或许是错误的——本颇有前景的书籍说,它过于专注于美国历史上“对黑人的虐待”。他还说,“我们不能把那些事情当作

我们唯一的美国历史,因此,我中止了出版协议。”那本书稿从未获出版。编辑总结说:“我们不需要一本绵里藏针的书。”当然,一个人的观点在另一个人看来就是藏在棉里的针,所以,教科书就止于不藏任何“针”,也不带任何观点。

因此,教科书的雷同不能只归罪于众所周知的州的审查。即便在以前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书刊审查也主要受作者、编辑以及出版商的影响,而不是州审查官的影响,并且,它“说到底属于一种对意识形态氛围的敏感。”^[40]这里没有太大的区别:教科书出版商很少做那些在他们想象中可能不被州批准的事情。因此,他们在教科书的形式、腔调与内容上从来不会偏离传统教科书太远。实际上,当弗斯曼与斯科特只是在其文学读本中用《哈姆雷特》取代《麦克白斯》时,教育家与编辑们就认为这种改变太严重,以至于希勒尔·布莱克在其那本关于教科书出版问题的专著《美国教科书》中,不惜花3页的篇幅去讨论这一事件。^[41]在美国历史学领域,甚至在文学界,出版商总是竭力寻求“平衡”,以不冒犯任何一方。

出版商们在接受某种有冲击力的论述——比如说,关于哥伦布的那个论述——之前,一定是经过再三考虑。在第十二章,我用“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形容加勒比地区阿拉瓦克人的覆灭。当学者们向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递交项目申请,请求拍摄关于哥伦布的电视连续剧,并在申请书中使用这一词时,他们的申请遭到了拒绝。^[42]林恩·切尼说,措辞有问题。对于基金会来说,《1492年:视觉的碰撞》整个项目都过于亲印第安人。电视连续剧的制片人抱怨说:“谈印第安人的野蛮没问题,但谈欧洲人的野蛮就不好了。”^[43]

然而,对于出版商们来说,要想不得罪人越来越难了。一大群批评者——作家、极右分子、公民自由组织、激进少数派、女权主义者,甚至职业历史学家——都加入闹哄哄的批评队伍。教科书不再只受到反种族隔离主义者或自由人士的谴责,^[44]它们还被指责为殖民主义、“欧洲中心论”或“东海岸中心论”。出版商们删去一些针对美国政策的温和批评,以迎合某州右翼分子的批评,但结果却发现,自己冒犯了另一个州的左翼分子。这时,他们一定感到很狼狈。收录亨利·希斯诺斯^①的照片或许能让西班牙裔满意,但可能遭到新英格兰人的谴责,后者希望看到的是约翰·亚当斯的图片。

出版商们虽然自许为有道德的人,但是他们也想挣钱。在调查我们写的那本密西西比州的教科书的商业前景时,哲人图书公司的总公司兰登书屋的总裁告诉我说:“我们既想做好事也想挣钱。”^[45]思想性是有底线的,这缩小了出版商在教科书里所能容忍的思想的范围。每出版一本新教科书,出版商就要面对50多

① 亨利·希斯诺斯(Henry Cisneros),西班牙裔美国人,后文的约翰·亚当斯系盎格鲁裔美国人。

万美元的生产成本风险。可以理解,这吓着了他们。

作者方面又如何呢?每一个不好的段落都有其作者,作者一定处于编写过程的核心位置,然而,人们并不总是很清楚每一段文字的真正作者是谁。教科书封面上署名的那些人很少是真正写书的人。^[46]刘易斯·托德与默尔·柯蒂是《美利坚民族的兴起》早在1949年的初版作者,然而,到该书1991年出第10版并改名为《美利坚民族的胜利》时,柯蒂已经95岁,住进了一家疗养院,而托德已经作古。其他教科书中列出的作者名单或许与那些教科书更没有关系。一些教师与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名字借给出版商。作为一小部分常规版税的回报,他们偶尔也提出一些建议。而出版商的那些内幕枪手们才是教科书的组稿和撰稿者。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的一位编辑说,通常,那些不具名的编写人员只有英语学士学位。^[47]

普仁蒂斯-霍尔出版集团(Prentice Hall)的一位主管告诉我,丹尼尔·布尔斯廷“控制着进入自己的教科书里的每一个字”。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写了这本书,而是暗示实际上还另有作者插手其中。随后我们将看见,甚至这句话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根据出版商的说法,普仁蒂斯-霍尔出版集团依靠戴维森与莱特尔使《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在历史学界得以畅行。然而,甚至连这些委婉的说法也是令人怀疑的。马克·莱特尔承认,对于那些新版本,他与合著者只起到“鉴定者的作用”。出版商把新教材传过来,而“新教材到我们手中时,已来不及作出重大修改了。”

2006年,我为了修订初版《老师的谎言》,研读了6本新教科书。我集中关注 316 它们对于近期事件的处理方式,特别是对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9·11”世贸中心与五角大楼遭袭事件的态度。让我震惊的是,我发现,有两本书——由安德鲁·凯顿、伊丽莎白·佩里、琳达·里德及艾伦·温克勒合著的《美利坚:走向今天》,以及由丹尼尔·布尔斯廷与布鲁克斯·马瑟·凯利合著的《合众国的历史》——是雷同,或者说几乎雷同的。比如,下面就是它们对2000年布什与戈尔在佛罗里达州那场令人争议的选举活动的介绍。

图2 两段雷同的文字(一)

在选举之夜,好几个州的选票如此接近,没有哪位候选人获得了赢得总统大选所必需的270张选票。佛罗里达州的局势不明,该州可能为候选人带来当选总统所需的足够选票。由于该州的选票如此接近,按照州法律,需要重新计票。佛罗里达州成为争夺总统职位的战场,律师、政客与媒体蜂拥而至,监督计票。

——《美利坚:走向今天》

在选举之夜,好几个州的选票如此接近,没有哪位候选人获得了胜选所必需的270张选票。佛罗里达州的局势不明,该州或许能为候选人带来胜利所需的选票。根据法律,该州要进行重新计票,因为选票接近将对布什略微有利。佛罗里达州成为争夺总统职位的战场,律师、政客与媒体蜂拥而至,监督计票。

——《合众国的历史》

两本书还都选择同样的图片来展现“9·11”世贸中心被毁的场景：三个人戴着消防帽升国旗，这让人联想到那幅硫磺岛海军的照片^①。两本书都为那幅照片配上同样的说明文字：“救援人员在世贸大厦的废墟上举起美国国旗”，只不过布尔斯廷与凯利添加了日期。两本书余下的关于“9·11”袭击事件的论述是完全相同的。《走向今天》说，“几架加满油的喷气式飞机的撞击导致两座大楼陷入一片火海”；而《合众国的历史》也是说，“几架加满油的喷气式飞机的撞击导致一对大楼陷入一片火海”。

一页一页，都是如此。两本书还用同样的句子描述我们的阿富汗战争。两本书都包含一节题为“本土安全(部)”的内容，只不过《走向今天》漏了“部”字。在这 317 两本书中，这一节一开始都说，“总统很快采取行动，在本土打击恐怖主义。”接下来它们写道：

图3 两段雷同的文字(二)

<p>“9·11”袭击后不到一个月，布什设立国土安全办公室，由宾夕法尼亚州长汤姆·里奇领导。里奇受命于新的神秘袭击可能到来之际。一种吸入后可致死的炭疽热病毒，开始在信件中出现……</p> <p>——《走向今天》</p>	<p>“9·11”袭击后不到一个月，布什设立国土安全办公室，由宾夕法尼亚州长汤姆·里奇负责。里奇受命于新的神秘袭击可能到来之际。一种吸入后可致死的炭疽热病毒，开始在信件中出现……</p> <p>——《合众国的历史》</p>
---	---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会不会认为，是布尔斯廷与凯利抄袭了凯顿、佩里、里德和温克勒？丹尼尔·J.布尔斯廷是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前任国会图书馆馆长，出版有 20 多本书籍。根据《曼彻斯特卫报》为他发布的讣告，他“具有传奇般的学问与勤奋精神”。但是，当他这本教科书出版之际，他已 89 岁高龄，次年就去世了。或许，问题出在他的合著者身上。布鲁克斯·马瑟·凯利曾任耶鲁大学档案馆馆员及历史原稿部主任，因此，他应当了解真正的学术背景和撰稿人。

或者，是凯顿、佩里、里德和温克勒抄袭了布尔斯廷与凯利？他们没有布尔斯廷出名，但是，他们全都是终身教授，并且都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因此，他们都应当知晓学术规范。其中艾伦·温克勒系奥尔良州迈阿密大学的“杰出的历史学教授”，其专业领域是当代史，特别是二战期间的后方史。因此，或许是他撰写了上文的那些段落，而布尔斯廷与马瑟抄袭了他们。

① 硫磺岛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与日军为争夺硫磺岛进行的一次激战。战争间隙，美军士兵在战场顽强地树起国旗，美联社一名记者拍下了这幅照片。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广场上，有一座根据这幅著名照片塑成的巨型雕像。

如果这些书都称自己是原创的,那么历史学家们就会屏住呼吸,等着看凯利(及布尔斯廷的继承人)控告凯顿等人,或者相反,凯顿控告凯利等人。毕竟,这些雷同的段落太长,雷同之处太明显,其程度远胜于几年前使斯蒂芬·安布罗斯与桃瑞丝·科恩斯·古德温深陷泥潭的那场抄袭事件,比如,安布罗斯的一项罪名就是,明明在第二手材料中读到第一手材料,却把第一手材料当作自己的发现而使用,并且未予注明转引。这里的问题还没有这么细微。这两本书之间,一页与另一页,一个题目与另一个题目,玩的都是互换的把戏。 318

我问凯利,他认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自己与2005年版本没有关系,“布尔斯廷与那一版本有关系。”(凯利声称自己与“经典版”更有关系,但该书也出了2005年版,并且封面相同,标的价格相同,看上去像同一本书。)我问是谁写的那些关于近期历史的材料,“他们雇人写的”,他回答,“我不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丹那时统管这项工作,我敢说,他按自己独特的样式对书进行了重写。”当他得知这些段落与其他一些教科书的段落雷同时,倒吸了一口气。“这太可怕了!”他大叫,“我怀疑他们是不是雇了写那本书的同一群人中的某个人。”当被问到对这个雷同本的反应时,他回答:“我难过极了。”^[48]

一开始,艾伦·温克勒说自己是《走向今天》的最后一章的作者:“我写了那一章的大部分内容。后来编辑们对它动了手脚。”当我告诉他,他的书与布尔斯廷及凯利的书一段接一段地雷同或几乎雷同时,他赶紧否认自己是抄袭了它们:“我从未打开过布尔斯廷与凯利的书。”后来,他不再提自己就是那本书的作者了。“有可能,出版社内部有人为两本书写了那些东西,这让我心寒,”当被问到对这个复制本的反应时,温克勒回答:“这让我深感不安。天哪!”^[49]

这么说,没有哪一方的作者抄袭了对方。这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写任何东西。普仁蒂斯-霍尔出版集团出版了这两本教科书,两本教科书的新的章节都是由同一个不知名的人撰写,那个人只有编辑人员才认识。两本教科书之间的微小差别可能只在于编辑过程上。然而,普仁蒂斯-霍尔出版集团的低价策略的确为编制教科书的龌龊过程拉上了遮羞幕帘。

我问温克勒,他怎么看待那些以他的名义出版的关于近期历史的论述。他回答,“哦,让我把书下架吧。”他后来承认,他没有读过那些文字。凯利也没有读过《合众国的历史》的最后一章,他也不再说布尔斯廷读过它。

乍看起来,布尔斯廷、凯利、温克勒等人的这些行为让人想起那些忙碌的大学生,他们从网上买来学期报告,再在上面加上自己的名字,把它当作自己写的交上去。两本书的“作者”们都因他人的工作而收益,那些人只得报酬,不留姓名。然而,关键的差别在于,作弊的学生们虽然没有动笔写,但至少还读过那些材料, 319

而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却从来就不愿意“费力”去读读那些将要以自己的名义出版的文字。布尔斯廷、凯利以及温克勒会说萨达姆·侯赛因有核武器，他们会把本·拉登说成是犹太拉比。若出现这种写法，他们也将是最后才知道情况的人。

这些段落还不仅仅是对那些较早的、由那些假定的作者所真正撰写的材料的简单修订。它们是全新的历史。而且，那些最后的章节肯定属于那些书籍的最重要部分。它们涉及的都是重要的、争论激烈的、正在发生的问题。它们不像1812年战争，甚至也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们无疑与现实密切相关。如果作者名单之列的那些人从来没有写过这些段落，那么，它们是谁写的呢？如果他们从来没有审读过这些段落，那么，谁审读过呢？比如，近30年来在美洲印第安人问题上出现的新的学术成果，肯定不是被历史解释中的这些小的、或者说不这么小的更改所删除去的。

并非只有这两本书存在匿名写作的问题。编辑们告诉我，美国历史教科书的新章节“通常”都是由自由写手们撰稿的。不仅最后几章如此。朱迪思·科纳韦曾代笔写过好几个学科的小学教科书。她写道：“在教科书出版业，把所有的教科书转让给自由写手撰写，绝对是标准的做法。最后，在封面上借用一下某人的名字。”由于托德与科蒂的《美利坚民族的兴起/胜利》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卖得很火，出版商总想一直署他们的名字。1994年，托德已死，科蒂也进了疗养院。在这一令人窘迫的事实面前，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等出版商只好将他们的名字移到书名中，并聘请保罗·博耶“撰写”内容，这就是今天所见的《托德与柯蒂的美利坚民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耶成了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默尔·柯蒂历史学教授”。当被问道他当时是否真正地改写了这本书时，博耶不愿回答，却反问说：“在讨论我的职业生涯之前，我真的更想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我声明，我是“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以及“美国历史学会”的成员，并解释说，我是《老师的谎言》一书的作者，而该书即将出新版本。博耶虽然听说过《老师的谎言》，但仍不愿意 320 透露是谁写作了《托德与柯蒂的美利坚民族》，只向我提到霍尔特出版公司的一位编辑。1998年，“他的”书再印，改名为《美利坚民族》。2003年，该书再次更名为《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这个版本还算诚实，因为是出版商，而非作者写作了该书的大部分内容。面对《纽约时报》，博耶俏皮地为这种做法辩解：“教科书与《伊利亚特》或者《贝奥武甫》^①毕竟不同。”布鲁克斯·马瑟·凯利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说，“坦白说，这些教科书与我们的不同，它们很多并非由那些一度与之有关的作者所写。”他说“与我们的不同”，这真令人诧异，因为我刚刚把他与布尔斯廷抓个现行。而且，他声称他与布尔斯廷撰写了他们的书籍的早期版本，可是两

① 《贝奥武甫》(Beowulf)，英国古典文学作品，被称为“英国的民族史诗”，作者不详。

天后,这种说法就与詹姆斯·古德文的说法矛盾了,后者透露,大约15年前,他曾撰写和修改了该书的某些章节。“我干那是为了钱,”古德文说,“兼职几个月,我可以挣到1万美元。”^[50]

本章开头引用了一位编辑的话,这位编辑的意思是,在那种做法中,大家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因为那些写手们“写东西很快,只需一两天,就能搞定内战部分。”然而,那些花几十年时间研究那场战争的历史学家不会认为两天就能把它写好。雇一些新手和替身去做作者的工作,这足以解释教科书为什么有时会犯那么令人震惊的错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本所谓“20世纪90年代的标志性教科书”写道:“杜鲁门总统投下原子弹,轻易地解决了朝鲜战争。”^[51]杜鲁门的行为对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来说当然是奇怪的,后者1952年竞选总统的口号就是:“我会去朝鲜。”同样的错误,在一些教科书中从头到尾随处可见。比如,布尔斯廷与凯利告诉我们,哥伦布从加那利群岛而非西班牙出发远航美洲,一个原因就是“加那利群岛与日本在同一维度,因此他认为,如果他向正西方航行,他可以到达自己所要去的地方。”真够呛,西班牙当时最主要的海港塞维利亚,恰恰就在日本最大的岛屿本州的中部。只要看看地球仪就知道,加那利群岛比较靠南。再举个例子。《美利坚之旅》声称,“玛吉·莉娜”“是第一位出任银行总裁的美国妇女”,但却漏写了她的姓——沃克(Walker)^①。詹姆斯·麦克弗森被认为是《美利坚之旅》的三位作者之一,他是内战史非裔美国人问题的专家。他可能从未写过——甚至从未读过——那段文字,否则他不会留下那样的错误。

《美利坚盛典》最后一章的不知名的作者一定不是位专家,否则就不会出现下面这种关于2004年大选的惊人错误:

在选举日,布什胜券在握。他当年的三项选举政纲——强化税收、打击恐怖主义和道德价值——完美地兑现了。他取得了近十多年来第一次大众选举的多数选票:60639281票对克里的57355978票,在选举人团中也以286票对252票占绝对优势。

321

这种绝对优势实际上是捏造出来的!克里几乎赢得俄亥俄州的20张选举人票,若如此,他将获得272票,战胜布什的266票。难道作者们没有想到大选之夜的悬念,也没有想起有人已经指出俄亥俄州下周投票期间的非常规性吗?而且,

① 玛吉·莉娜·沃克(Maggie Lena Walker),夫姓“沃克”(Walker),美国内战时期有着传奇经历的女性。后人传其为黑人,实际上,她的生父是南方白人,母亲是获得自由的非裔奴隶,后携女再嫁。

从百分比上看,在两人得票总数中,布什占 51.4%;而 1996 年,在克林顿与多尔的得票合计中,克林顿占 54.7%。那种颠倒选举结果、在那些未见分晓的地方搞“慷慨的”托管,或许是好的政治手段,但却是坏的历史。

教科书再版时应该不仅仅在后面添加新的章节,以补充介绍其上一版之后发生的新事件。旧的事件上会有新的事实被发现,从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那些事件的新信息,上至影响到我们关于西半球最早人类的认识的考古学新发现,莫不如此。再版修订过程还会因署名作者或其他人的监管疏忽而问题百出。让我们来看看洛克比破坏案。1988 年,泛美航空公司 103 号航班在苏格兰的洛克比上空爆炸。在 1989 年、1992 年以及 1995 年各版中,布尔斯廷与凯利一致写道:“大量证据表明,伊朗人指使了这场爆炸案。”他们的书在 2005 年版中依然提出这样的观点,这说明作者们不相信 2001 年对一位利比亚人的定罪,没注意到了利比亚曾于 2002 年为遇难者赔付了 200 万美元,也不相信利比亚于 2003 年的认罪。^[52]当然,那些不具名的作者和修订者,由于不留名,也就没有风险被指责犯了这种错误。

那些作者即便真正执笔,也只是撰写了那些核心的叙述。渐渐地,这些叙述只占全书内容的很小的比例。今天,那些数不清的方框文字、教师参考、课后问答、照片说明以及所谓“活动”常常占据了比叙述文字大得多的篇幅,但是,教科书的真正作者们与这些东西无关。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教材常常显得漫无目的的原因。再看一下《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它在讲完“内战的来临”这一章之后,提出学习建议:“家庭作业:每位同学找到并阅读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所作《约翰·布朗的兄弟》,并写出两段长的关于这首诗的回应文章。”这种安排太可笑了,其结果只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结论:在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社,没有人是内行。这一目标被设计在关于约翰·布朗 1859 年占领哈珀斯渡口军械库的那段叙述之后,但是《约翰·布朗的兄弟》与那次占领全无关系。何况,这首诗歌唤起的,是人们对内战以及那个导致内战发生的那个社会的某种回忆,而且,这首诗歌近 400 页长,怎么能“让每位同学去找到并阅读”它?实际上,大多数成年人一生中从未读过 400 页的长诗,即便有人读过,他又如何只写两段长的回应文章呢?^[53]

其他的提问也都是大而无当的。比如,《美国人》问:“地理位置是如何影响你所在城市或乡镇的历史的?”今天看来,这真是一个问题。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或许能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把它设计给某一个人,就像是让他开一门美国历史的新课程。该书接下来又问:“相比上一代人,你所在的地区的特点,以及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有何变化?”这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我们站在南方人的角度思考这一

问题,我们就认识到它是多么棘手。南方是美国最独特的地区。而确定“中西部的特点,以及中西部人关心的问题”就更难了,更不用说评价其变化了。这些作者脑子里在想什么呢?我说,他们什么也没想。只要有人认定在每一页写上问题就会看上去好些,就有人去提供这类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真的是让人去回答。不幸的是,这类问题会鼓励学生得出结论,认为思考那些无聊的提问也是一种学习方式。

一些问题即便不是无厘头的,也常常是呆木头式的。好几本教科书都有个很讨厌的习惯,在每张照片后加一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美利坚之旅》在一幅关于希特勒纳粹集会的照片之后的提问:“哪类人受纳粹迫害最深?”在这幅照片的上方3英寸位置,课本讲述了希特勒的“极端反犹主义”。如果这里问的“哪类人”是复数,指多个群体,那么问题就变得有趣了,因为人们还有可能回答吉普赛人、社会主义者、同性恋者,等等。然而,《美利坚之旅》只是想要学生悄悄回答“犹太人”。《美国人》在页边安排了一些问题,并冠以“中心思想”的标题。比如,在一段关于为什么妇女们成立“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的论述之后,提出的问题是“是什么促使妇女们成立这个组织?”对于这个问题,学生们所要做的,只是亲手把那段论述抄一遍而已。瞧,他们就是这么学历史的!

即便问题有趣,但由于答案往往唾手可得,问题也就变得乏味了。《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在第六章引用了一段来自《芝加哥论坛报》的话,那段话本来是针对密西西比的《黑人法典》的:“密西西比州人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安葬着我们的战士们的尸骨、飘扬着自由的旗帜。而北方人要把这个州变成一个癞蛤蟆鼓噪的池塘,然后用这样的法律来羞辱它。”这段话引人注目,也是很重要的。该书接着提问道:“纠偏:作者是如何提出自己关于《黑人法典》的观点的?”这个提问虽然不尽完美,但是可以引导学生展开有趣的思考。这段引文反映出,在何种程度上,内战变得与黑人自由的事业联在一起,比如至少在共和党人心目中,《芝加哥论坛报》是共和党的重要机关报。这样,《芝加哥论坛报》就把那种附加在“我们的”战争之上的强烈感情与反对种族主义的事业紧紧地联在了一起。“变成一个癞蛤蟆鼓噪的池塘”也值得分析。它可以说是一种修辞,使对密西西比州的不敬之情跃然纸上,也道出了北方人对该州的控制。然而,该书教师用书提供的答案却没有展现出什么真正的思想:“通过写出北方人先是把密西西比州变成一个癞蛤蟆鼓噪的池塘,然后就会在该州强制实施《黑人法典》。”这只不过是重复了引文,把问题的设计变成了一种对死记硬背的训练。

虽然我们希望教科书的作者们与这些愚蠢的教学建议无关,但是他们的名字却写在书的封面上,他们应该对封面之下的内容负主要责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偶尔,出版部门的工作人员所添加的那些材料虽与基本叙述相冲突,但却能起到强化的效果。在《美利坚之旅》中,有人在“越南战争”地图旁添加了梅莱大屠杀的图片及日期,虽然课文中从未提到这一屠杀事件。对于这张地图说明,学生们将作何感想,确实不太清楚。

在与我的访谈中,出版机构的负责人们抱怨教科书采用委员会、学校主管或者学生家长,觉得自己不得不取悦这些人,而删改造成的谎言与曲解损害了美国历史教科书。家长们,无论是黑人斗士抑或保守的德克萨斯人,都指责出版商。教师们抱怨学校主管,认为他们逼自己使用乏味的教科书,同时也抱怨那些制作了这些书籍的出版商。而教科书作者们又指责我,他们看好自己的教科书。有几位作者告诉我,他们没有受到编辑的干扰。实际上,有3本不同教科书的作者告诉我,他们的编辑连一条内容建议也没提过。“那本书里,编辑改动的字还不到50个”,一位编辑这样说。而另一位编辑说:“他们尊重我的选择,他们很愿意屈就。”“我等着他们说,但他们从不说。”^[54]

教科书作者们如果宣称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撰写了那些教科书,或许会因此受到指责:他们有时也有知识欠缺。我曾问《美国历史》的作者约翰·加勒蒂,为什么他不写“始祖移民”到来之前,新英格兰发生的那场足以破坏印第安社会的瘟疫。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不了解。”值得称道的是,没过多久,加勒蒂了解了哥伦布交换,并把它写进自己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美国历史上的1001件事》一书的第一个条目。^[55] 324

有时,作者们知识也很丰富。前面提到,在《事实的背后》这本主要面向大学历史专业学生的书籍中,詹姆斯·戴维森与马克·莱特尔出色地讲述了那几次印第安瘟疫,这表明他们懂得这些事件的地缘政治意义,懂得它们对于印第安文化与宗教的破坏性影响,以及它们对于如何估计“前海通时代”印第安人口的影响。在《事实的背后》中,戴维森与莱特尔高屋建瓴地总结道:“教科书终于开始注意这些大规模的流行病。”但同时,他们自己编写的中学教科书里却没提这些事件。^[56]

我们如何理解这种行为呢?作者们知道,即便他们的教科书是好的,在大多数大学里,他们也不会因此获得终身教席或升迁机会。学界有句话:“真正的学者不写教科书。”^[57]如果教科书写得不好,作者也不会受到业内的处罚,因为职业历史学家并不读中学课本。^[58]《美国历史评论》、《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史学书评》都并不发表关于中学教科书的书评。这样,作者们的学术声誉并不受影响。^[59]

教科书采用委员会的身影有时会萦绕在教科书作者的脑海里,特别是当出版商一手将这些作者提携起来的时候。作者们对于教科书被采用的过程知之甚少——我是个不幸的例外。出版社编辑们会警告作者们不要冒犯学生家长以及

教科书采用委员会。一位作者告诉我说：“我希望教科书能够在每个州被采用。”她依赖她的出版商，以出版商的取向决定哪些有助于、哪些不利于实现这一目标。马克·莱特尔说把自己的教科书形容为“麦当劳版的历史——如果加香料，就没有人买了。”他的这一结论来自于其出版商“对市场需求的考察”。^[60]

另一方面，正如一位编辑告诉我的，出版商知道，“学生、家长以及教师都想看到教科书代表了自己的利益”。有时，这些人还影响到作者把书写得不那么传统。迈克尔·坎曼曾谈起一位出版商，这位出版商试图劝说一本美国历史教科书的两位作者在土著美国人问题上多花篇幅。托马斯·贝利的出版商强迫他在《美利坚盛典》中写进更多的关于妇女与非裔美国人的内容。^[61]

不论那些内容来自什么方向，出版商总是难咎其责。马克·莱特尔解释为什么大出版商会找到他与詹姆斯·戴维森这种无名之辈。他告诉我：“他们不想要名人，因为我们更好使唤。”两位写作领域甚广的作者告诉我，出版商撕毁了与他们的教科书合同，因为他们不喜欢书稿中的那些政治倾向。一位编辑坦率地告诉我说：“我们有分歧，但获胜的常常是我们。”

历史学研究著作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类著作所预设的读者通常包含职业历史学家。大部头二手著作的作者知道，出版商及刊物编辑会聘请职业历史学家评审书稿；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在为别的历史学家写作。这些作者们还知道，自己的专著出版后会被其他的历史学家评论，自己的声誉将因史学期刊中的那些书评而被提升或贬低。

由于读者不同，研究著作与教科书自然就差异很大。由于出版商是借爱国主义，而不是学术性来销售自己出版的教科书，教科书作者们就不必过于关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侧重不足为怪：要求美国历史成为必修课乃是本世纪初民族主义者狂热爱国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62]出版商从封面就开始大动手脚。在很多护封上，诸如“自由的挑战”、“希望之地”等民族主义的标题与一些传统的爱国主义图案，比如，鹰、独立大厅、星条旗以及自由女神像相呼应。我所考察的那6本新教科书中，有4本在封面上印有美国国旗，其他2本将书名和作者名标上红、白、蓝三种颜色。^[63]出版商对教科书的定位是，以教科书为工具，帮助学生“发现”我们的“共同信仰”，并“珍视我们的遗产”。没有哪家出版商在卖教科书时宣称自己的教科书比别人的写得更准确。

在一定程度上，教科书作者们心里也会揣着读者。从我自身的经验，我知道，想想自己的读者需要什么，是历史教科书撰写过程的重要一步。有些教科书作者是中学教师，但是大多数大学教授本人只认识少许高中生和初中生。在与教科书作者的访谈中，我发现，他们对学生的需求的设想是一个奇怪的过程。在编写高

中美国历史教科书这一过程中,有些事情会使历史学家转变成一位爱国者。一位作者告诉我,当她开始自己的教科书编写工作时,自己是一位单亲妈妈,女儿11岁。她“想写一本让萨曼塔感到骄傲的书。”我理解她的这种想法,并对她讲了我自己的经历,我像她那么大时,也是一位单亲父亲,也有一个女儿。然而,经过进一步的交流,我又发现,这位作者并非只想写一本让自己的女儿重视和喜欢的书籍,她想写一本让女儿为美国感到自豪的书。这就是两码事了。^[64]

也有一些教科书作者的看法与我相同。他们想要培育好公民——他们指的是,人们要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教科书作者们觉得自己应该肩负起传播和保护西方文明的重任。有时,在他们的言辞中,有一丝近乎绝望的气息——“在我死后,洪水滔天”^①。教科书作者们能够感觉到,对于这些孩子,他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今天不能打动孩子们,美国的未来将处于险境。反过来,这导致了一种自视甚高的感觉——他们以为自己处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前线,要帮助美国保持强大。不仅教科书作者有这种感觉,历史学家与历史教师通常也会以自己在培育好公民方面的作用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正当性。艾伦·尼文斯以一种“历史的自豪话语”为“那些讲述了普利茅斯岩、福吉谷^②、阿拉莫等的教科书”大加赞词。他颂扬历史在塑造国家的强大方面的作用。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前任主席理查德·格罗斯(Richard Gross)说:“在年轻人中培养诸如个性、道德、伦理以及好公民等品格,是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学习历史与社会科学的缘由。”^[65]当初在写作密西西比史时,我与合著者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应该通过向下一代传播知识和改变他们的态度而改进我们的州及其公民。

美国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不失时机地向广大下一代高谈阔论,然而,那些在专著或访谈中批判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问题的人,却似乎只想维护而非改变美国。一位名叫卡罗尔·伯金的教科书作者在接受我的访谈时,一开口就说:“作为历史学家,我是主张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者。”^[66]我下巴差点没掉下来,因为她的教科书里没有任何女权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痕迹。按理,一位女权主义者所写的教科书应该有助于读者理解为什么没有一位妇女担任过美国总统或副总统;按理,一位社会主义者所写的教科书应该让读者理解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孩子很少成为总统或副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神话是个例外。^[67]

如果教科书庞杂、冗长,而且常常错误百出、粗心大意、令人乏味,如此等等, 327

① *après moi le déluge*, 语出《圣经》“大洪荒”典故。据传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曾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② 福吉谷(Valley Forge), 现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国家公园, 乔治·华盛顿率领大陆军在此度过独立战争最艰难的时期。

那么,为什么教师们要用它们呢?在一定意义上,教师对我们历史课堂上出现的错误教育负有责任。毕竟,本书前面十章所披露的那些曲解与疏忽都是老师告诉我们的谎言。如果有足够多的教师抱怨美国历史教科书,难道出版商不会改变它们吗?教师们教材选用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在大多数州,教科书评估委员会主要是由教师组成,但从他们身上,出版商没有遇到反对的呼声。相反,很多教师喜欢这样的教科书。根据 K. K. 王与 T. 拉乌里斯两位研究员的研究,大多数教师认为历史教科书状况良好且日趋完善。^[68]

有没有可能他们不了解史实呢?很多历史教师并不知道多少历史。1990年一项针对 257 位教师的全国调查显示,13%的历史教师从未学习过一门大学历史课程,只有 40%的历史教师有历史学学士学位,或者取得过历史学或某一“带有历史性”的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的硕士学位。^[69]一项针对印第安纳州教师的研究发现,在 5 个教师中,只有不到 1 人还在坚持阅读美国历史方面的书籍与文章,以保持思想不落伍。在 1992 年的一个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学术会议上,当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听到哥伦布之前人们就知道地球是圆的时,甚至感到喘不过气来。这些教师痛苦地意识到,多少年来,自己一直被错误的信息所蒙蔽。当然,教师们不可能讲授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大多数教师并不喜欢辩论。几年前有项研究发现,92%的教师并不就有争议的问题发起讨论,89%的教师在学生提出有争议的问题时,并不予以讨论,79%的教师并不认为他们应该那样做。有些话题,教师们觉得学生会有兴趣讨论,但大多数教师又不认为有必要在教室里讨论。这类话题有:越南战争、政治问题、种族关系、核战争、宗教以及离婚等家庭问题。^[70]

很多教师害怕辩论,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这样的学术背景和体验,也不知道如何操作。雪莉·恩格尔说:“美国学校里的大多数社会课教师在自己做学生时都没有很好地学会如何处理不确定性问题。”“一旦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时,这些问题就显得高深莫测了。”教育体制中还存在着惯性,很多教师像当年别人教自己一样 328
去教学生。甚至,很多学院的历史学教授本来知道历史充满着矛盾与争论,现在自己在课堂上却变成了搬运知识的老学究。^[71]

由于教科书采用的是确定性的修辞,教师们就很难把争论与不确定性引入课堂,并且同时不会偏离惯常的讲课标准。教师们很少在课堂上说“我不知道”,更很少接着讨论该如何寻找答案。“我不知道”这种说法不合规范。教师就像教科书一样,被认为是无所不知的。而学生们被认为就是要学习教师与教科书作者所知道的东西。^[72]

教师们很难进行开放式教学。他们害怕超出答案范围,害怕在课堂上失去威

信。琳达·麦克尼尔完成了三项关于 1975 年至 1981 年间的中学社会课课堂的研究,根据她的研究,为了避免暴露自己在知识上的缺陷,教师们“很少让学生运用学校里的广泛资源”。^[73]谁知道问题会导向何处,又如何控制它?约翰·古德莱德发现,在教师的讲授时间中,用于那些“需要推理甚至需要由学生得出结论”的课堂讨论的,还不到 1%。^[74]教师不重视讨论与研究,相反却重视那些“简单化的、能为教师所控制的信息”。麦克尼尔说:“根据他们自己在访谈录音中的说法,教师们的各种控制知识的做法根源于他们控制课堂的欲望。”^[75]结果,他们与教科书一样,采取无所不知的语调。结果,教师们所呈现的,是一种令人乏味的、总体上现成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远不如人们真正的思维方式有趣。阿尔伯特·尚卡尔本人也是一位替教师说话的人,他在总结麦克尼尔的话时指出,那些“在私下谈话中表现得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教师,“在课堂上却变得狭隘、迟钝和僵化。”^[76]

大卫·詹内斯指出,至少一个世纪以来,一些历史学专业组织反复告诫教师们不要把历史当作对史实的记忆来教。1893 年,美国历史学会大声疾呼:“激发孩子们的思想”。1934 年,历史学家们敦促不要再强调“数据、名称和具体的事件”。此后几乎每隔 10 年,历史学界的领导人物都发出同样的呼吁。^[77]但是,教师们依然拿出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让学生去记忆。与教科书作者一样,教师也会偷懒。教学是一项充满压力的工作。教科书虽不好,但它们能使日子过得轻松。它们能使组织教案变得容易。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出版商们已经提供了一大堆东西,有录像资料可供在教室里放映,教师手册里包含了如何导入每一个话题的建议,有试卷可供调用并用机器阅卷。教科书还让教师们放心,确保他们能覆盖到边边角角,这样他们的学生在全州或全国标准考试中就不会失利。 329

出于这些原因,正如一些全国性调查已经证实的,教师们 70% 以上的时间里使用教科书。^[78]而且,大多数教师愿意选用那些与自己正在使用的教科书相似的教科书;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探究型教科书”运动无果而终的一大原因。泰森-伯恩斯坦甚至声称:“教师们常常宁愿沿用那些自己熟悉的错误信息,也不要那些正确但不熟悉的信息。”——这是错误得以存在并代代相传的另一原因。^[79]

然而,准确地说,指责教师懒惰是不公正的。你认为教师什么时候还有时间去做研究,以改进自己的教案,扩大自己的阅读?他们每周已经工作了 55 个小时。大多数教师忙于上课、评卷、维持秩序、提交公告、接受咨询、迎合督察、保持餐厅安静,还要把自己的家务丢在一边,去研究那些他们根本无从解答的问题。干了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常常还要监管课外活动,再也没有时间去评卷和备课了。^[80]在每学年,大多数学区只给教师 2 天或 4 天的时间去接受“在职培训”。到

了暑假,按说是有时间“回回炉”了,但是又没钱,我们不能指望一些教师资助另一些教师,让他们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自学两个月的美国历史。

上述的一些压力影响到任何学科的教师,但另外还有一些束缚对美国历史课教师的影响最大。像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一样,历史教师会进入某种思维定势,他们感觉自己要为美国辩护,特别是在少数族裔学生面前。与作者们一样,教师们感到自己在人们心中是美国的保卫者和支持者。甚至连非裔美国教师也隐约感觉到批评美国会对自己构成威胁,觉得那样自己也会受到攻击。这样教师们就自然认可他们所教的内容。既然教科书都成了为美国辩护的说客,那么使用它们的教师也就有沦为说客之虞。相比之下,英语教师就更幸福,比如,在教兰斯顿·休斯^①的稍带颠覆性的诗歌《自由列车》时,他们自身很少不会变得稍带颠覆性。同样,讲《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的教师很难不变得有些无味。

社会课与历史课的教师常常不如其他学科的教师那样得到同事们的尊重。当被问到什么课程可能会被砍掉时,小学教师常常回答社会课而非其他学科或领域。^[81]特别是在中部和南部,中学校长常常把历史课交给体育老师上,那些体育老师只得去教点什么,毕竟,体育课没有那么多,轮不过来。让非历史专业出身的教师承担美国历史课的教学——根据一项全国性调查,美国60%的教历史的老师都有这种情况——显然是在表示,这门课程不重要,“任何人都能教”。此外,历史教师所带的班级比其他学科的教师都要多。^[82]

学生们也认为历史很不重要。根据最近一项关于学生对于历史课的态度研究,“美国各年级的大多数学生都发现社会课是最不令人感兴趣的课程之一,并且是学校总课表中最无关紧要的课程。”^[83]很多教师都知道学生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课程的。太多的教师也就在内心里放弃了,不求创造性,只对学生提最低要求,只比学生提前一步阅读课本。反过来,学生“在教室里也只付出最小的努力”。如此循环下去。^[84]

有了教科书做依赖,学生以及教师都可以尽量少花力气。教科书里数不尽的名目——重要观念、关键词、人物识记、日期、技巧训练、搭配、填空以及自我测评——这些看上去是对学生的折磨,其实具有推动的作用。这些名目使课程内容显得严谨而实在,教师与学生们就自以为是在学习知识。这些名目使教师显得很有知识,但较为自由的讨论却会暴露出他(她)在信息或思想上的欠缺。这些名目让学生感到评分是公正的:“客观性”考试追求对具体的、所谓的史实的回忆,它易于衡量。这样,通过准确告诉学生需要记忆哪些东西,这些名目就排除了不确定性。^[85]此外,把历史分割成互不相干的“事实”碎片,还可以确保学生不会把很

① 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 1902-1967),美国著名黑人诗人。

多条目与他们的现实生活结合到一起,并且保证他们在6个星期的评分期结束后,把那些条目忘得一干二净。^[86]

在某些方面,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那两本探究型教科书要比那16本叙述型教科书好。《美国的冒险历程》与《发现美国历史》这两本探究型教科书建议学生运用一手材料,并考证它们是否真实。《美国的冒险历程》在其《教师指南》中直接挑战民族优越论,这个话题在其他的任何教科书或其教师指南中都未被涉及。研究显示,探究型学习方法会使学生对当前政治问题产生更浓厚的兴趣。^[87]然而,探究型教科书要求更积极的教学,学生们也不仅仅是串读课本。教师必须为学生补充新的信息,舍去书中的某些内容,选择该布置的作业,并与学校的图书馆保持一致。或许,正是因为探究型教科书不依赖死记硬背,教师与学校管理层才不采用它们。探究型学习法过于有效了。^[88]

如果教师都受制于传统的叙述型教科书,为什么他们在教学中不抵触它们,至少偶尔为之呢?答案仍然是,逆教科书而教是很难的。我们已经指出时间与工作负荷等后勤问题。事实上,教学资源也是问题。教师们到哪里去找支点呢?如果附近就有州历史博物馆或大学,或许能得到帮助。但是,当教师不知道某个问题时,你叫他们如何解决?当他们手中的教科书是错误的或者带有误导性时,你叫他们如何发现?而且,学生们已经被训练得相信他们所读到的一切印刷品。教师们如何能够与那些既定作者的专门知识相抗衡,何况那些作者背后都有强大的出版商做后盾?

逆教科书而教的做法还是令人忧虑的。教科书让人觉得踏实。当受到校长、父母或者学生的指责时,教师们可以拿教科书作挡箭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逆教科书而教可能被视为对学校制度、督学、校长或者选用那种教科书的教研部的批评。要是这样做,教师们就会招惹麻烦。他们大概也想到这一点。^[89]

我的一个学生在一所小学做实习教师时,想给她的学生介绍她自己从我的课程里学到的那些关于“始祖移民”、瘟疫、感恩节等内容。结果监管她的学科的教育学教授否定了她的方案。“讲这类信息,有悖于学生的传统观念,无异于是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这位教授还担心这类信息会“导致学生与家庭产生大矛盾”。然而,在教师同行的赞同下,我的学生坚持了自己的方案。她没有受到家长的抱怨;但是的确,她是在冒险被视为忽略或敌视某些家长、主管甚至教师同行。

毕竟,教师也会被解雇。我采访过一些中学的教师和图书管理员,他们由于一些轻微的自作主张的行为,比如向学生提供一些家长认为有争议性的材料,而被解雇或被威胁停职。一些教师曾因在巴尔的摩讲授《美丽新世界》、在爱达荷州

讲《飞越疯人院》，或者在这两州讲其他的什么东西遭到解雇。^[90]知道了这一点，很多教师都能预料到强权会对自己产生影响，思虑什么人会成为自己不能攻击的对象，因此，他们松懈了，肯尼思·卡尔森称此为“自我安全审查”。^[91]但是，我还是相信，大多数教师在实践中都享有实质性的自由。特雷西·基德在《学童纪事》一书中写道：“大多数教师不能支配学校的政策或课程，但是他们在教室之内享有很高的自治权。”在《谁控制着我们的学校？》一书中，迈克尔·W. 柯尔斯特同意：“教师们实际上对所教内容有否决权。美国公立学校有一条旧传统：教室的门一旦关上，没有人能检查教师在里面做了什么。”^[92]虽然如此，一些教师即便知道真的没有多少理由要为自己的工作担心，也通常避免冒不必要的风险。

或许，我这里在教师问题上过于悲观了。我每到一处谈论教科书问题时，我都遇到一些教师渴望正确的历史知识。我还遇到很多富有想象力的教师，他们使美国历史鲜活起来——他们把有争议的以及第一手的材料带给学生，激励他们去思考。然而，尽管美国各地学校都有这种不一般的英雄人物，多数社会课与历史课教师本身都仍然是问题的对象，而非问题的解决者。

让我们把话题撒得再开一点。我们是否全都有责任呢？毕竟，我们的历史中的那些神话并非只出现在学校。这些文化谎言已经被编织到我们整个社会之中。从“哥伦布节”（某个周末）的那幅“地平”广告，到《飘》中对重建时期所做的种族主义曲解，我们的社会在对自己说着关于自己过去的谎言。质疑这些谎言似乎是在反对美国。教科书可能只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些谎言才写进它们。教科书还可能是因为我们需要避免纷争才不写那些带争议性的问题。在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中，至少半数受访者同意“含有危险内容的书籍应该被禁止进入公立学校图书馆。”^[93]全国教育进步评估中心曾将自己关于社会课的评估文件交给专业之外的评论者去看，以“确保（它们）能够被一般大众所接受”，这时，大众的反应是，“那些关于个别的少数群体的资料应该尽可能删除。”在涉及联邦调查局、总统、劳工联盟及其他组织时，措辞上要“格外小心”，“关于国家的英雄人物，任何虽然符合事实但带有贬低形式的习题，都是一种冒犯。”^[94]

约翰·威廉姆逊是一家大型教科书出版公司的总裁，他用下面这段话为出版商辩护：“在30年代，教科书对女性和黑人的处理方式明显反映的是当时社会对这些人群的态度。当时所有的女性都被描绘成家庭妇女……黑人则根本没有被提及。”接下来，威廉姆逊承认，近期在妇女与黑人问题上的进步没有被归功于出版商，“至少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多。”与过去一样，“教科书反映的是我们的社会，写的是社会所可能接受的内容。”威廉姆逊总结说，所有这一切，原该如此——家长、教师以及社区成员都有权利给出版商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把历史写

成他们想看到的那样。^[95]

威廉姆逊说的不无道理。然而,出版商以“社会”为遁词,他们的说法实际上是“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如果教科书的种类再多一些,社会各界就可以做出选择。而且,威廉姆逊承认了最主要的问题:相比大多数其他学科的教科书与其各自领域的关系,历史教科书与历史学科的关系十分不同。“社会”决定着历史教科书里该写什么。无独有偶,数学界决定着数学课本都写些什么;生物学界也依然决定着生物教科书里该写些什么,尽管存在着神创论者的压力。诚然,与美国历史教科书一样,数学与生物教科书也都出自于同样复杂的组织与采用程序。诚然,数学与生物教科书也都有错误,但是,只是针对历史与社会课,教科书作者才会问:“教科书能搞学术真诚吗?”^[96]只是在历史课中,准确性才如此关乎政治。

再看一下内战中黑人士兵的例子吧。即便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有的人都很容易在第一手资料甚至在关于内战及重建时代的教科书中看到黑人士兵的贡献,但到了大萧条时代,教科书开始忽略这些事实,这并非因为这些事实鲜为人知,而是因为写进非裔美国人的那些重要行动“并不反映(种族关系低谷时期的白人)社会的态度”。因此,要理解 20 世纪 30 年代的教科书是如何描写内战的,我们并不需要去看 19 世纪 60 年代的历史,而只需去看 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同样,要理解今天的教科书如何描写内战、“始祖移民”、哥伦布,我们也无需看 20 世纪 60 年代、17 世纪 20 年代或者 15 世纪 90 年代,而只需看看我们这个年代。那么,我们的社会导致了什么样的对历史的歪曲呢?我们不必自欺欺人,说什么歪曲历史的做法已经奇迹般地结束了。我们不必庆贺我们的社会现在已经能够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并且能够公开表示允许对过去进行准确的解读。我们不必像上一代人那样,伪称我们写的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已经看见,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甚至常常不打算写真实的历史。当家长与教师并不要求出版商和学校也像我们在其他学科中所期盼的那样去努力展现准确的历史,我们就变成了问题的一个部分。 334

由此看来,目前出版的很多历史教科书其实根本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品。第五章讲到 1890 到 1940 年间美国种族关系的低谷时期。在那一时期,我们不仅在种族关系问题上倒退,而且对于当时还就在眼前的历史——重建(1866—1877)、接下来的混乱时期(1877—1890),以及低谷时期本身——做出了带有深刻偏见的理解。第六章揭示了约翰·布朗在 1890 年之后如何被视为精神病患者,其实布朗的精神问题并非低谷时代的唯一牺牲品。低谷时期炮制出来的解释至今还影响着教科书关于格兰特政府、伍德罗·威尔逊,甚至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都讲些什么。在低谷时期,非裔美国人似乎“明显”低劣,以至于大多数白人不能想象

格兰特总统、“顽固派”以及南方的大多数共和党政府官员是真的关心种族平等。从逻辑上看,他们必定另有动机——最有可能的是,贪婪或权欲。因此,像2006年版《美利坚盛典》这样的教科书强调,腐败与理想丧失是共和党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声誉下降的原因。低谷何以至今仍对一本出版于2006年的教科书产生歪曲性的影响?原因之一就是,《美利坚盛典》关于格兰特的解读并非写于2006年,而是在1956年,那时,民权运动尚未对美国历史教科书产生影响。这个成于1956年的解读还基于低谷时代的那些观念,而《美利坚盛典》的作者托马斯·贝利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是1927年,那正是这一阶段的核心时期。20世纪80年代对于哥伦布的解读源于对1892年的纪念。本书第二章揭示了新教科书如何受到1992年纪念活动的影响——这次的纪念活动更为复杂。因此,一本书的写作时代,或者更恰当地说,一本书关于一个事件的解读被置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决定了该书的内容。

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净化历史,以保护学生不受污染,至少,在他们18岁左右之前应该如此。这些人说,孩子们终将会长大,让他们享受童年吧。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年轻一代面对连我们成年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呢?比如,难道我们必须告诉五年级孩子当年哥伦布在海地所做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的各种细节?^[97]西塞拉·博克写过一本书,书中全部内容都是关于撒谎的,虽然她总体上是反对撒 335 谎的,但她似乎认为,可以对孩子说谎,并将此比作保护孩子不受坏天气之害。^[98]

当然,结合学生的年龄段进行审查是教科书审查的一种形式,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它是有必要的,比如,五年级学生不应该读到暴力与色情的文字。一些五年级或者十二年级的学生在碰到西班牙人砍掉印第安人的手或者印第安人自杀的图片时,可能一想到哥伦布就会做噩梦。然而,禁止暴力色情文字并不等于要净化历史。比如,当我们没能向学生提供关于哥伦布的真相时,我们就是在说谎,至少是一种严重的疏忽。我不信保护孩子不受恐怖与暴力的影响真的就是教科书歪曲和删改历史的理由。毕竟,教科书的确写了暴力内容,只要它们不是“我们”所为。比如,《美国历史》这样描述约翰·布朗1856年在堪萨斯的波多瓦托米河的行为:

当布朗听说(劳伦斯)袭击案后,就带上7个人……在一个死亡之夜,这些人闯进了三个与此案无关的人的家庭。他们没有明显的理由,就杀死了5个人。他们用沉重而锋利的斧头,劈开那些人的脑壳。他们甚至砍下其中一人的一只手。

这里讲到脑壳被劈开,并且提到斧头的沉重与锋利,这促使我们放弃对布朗

的好感。显然,作者提供这些细节,并非为了保护学生不受毒害。

如果教科书要写一些断手的事件,那么被哥伦布断手的那些阿拉瓦克人就更有历史意义。哥伦布的残忍是系统性的,它使海地人口锐减。《美国历史》忽略了这些暴行,因此不能说自己是在公正地描述波多瓦托米河事件。

除暴力之外,还要保护孩子们不受我们社会的哪些其他不良影响的影响呢?比如,社会课如何为年轻一代讲治安问题?是否应该使用“警察友好执法”方案来分析?或者孩子们是否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去解释权力阶层是如何将警察力量用作自己控制城市犹太人的第一战线?我们选用的分析手法是否取决于我们是在市区还是在郊区教学?如果有某种关于治安问题的更为复杂的分析,它比“警察友好执法”对于市区孩子来说更有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在讲奴隶制问题时,在郊区应该与在市区采取不同的手法?

1992年,洛杉矶发生种族骚乱。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四名警察殴打一名违犯 336了交通法规的黑人——罗德尼·金。事件过程被人录像。但结果,来自郊区的白人陪审团宣判这四名警察无罪。当时,美国几乎每一个孩子都看到了这段家喻户晓的录像。因此,美国几乎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警察友好执法”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不能为了保护学生不接触有争议的问题,就在学校里向学生只提供“友好执法”这一种分析模式。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在使学校回避当今的重大问题。13岁的孩子们唱的摇滚乐里涉及艾滋病、核战争以及全球变暖等问题。说唱音乐也讨论种族、性、毒品,以及美国历史。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孩子已经懂得认识和思考这类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样。实际上,父母试图通过遮遮掩掩去维持某种并不存在的无邪童年,其结果只会增强、而非降低焦虑之情。^[9]说谎与忽略都不是正当的方法。方法是有的,那就是:给任何年龄段的孩子讲授真相。

历史要比地理甚至美国文学更具个人性,更关乎“我们”,这为虚假地展现历史提供了另外一条理由,那就是,我们难道不想我们的孩子是乐观主义者吗?或许,教科书强调我们的社会是多么的伟大、公正和进步,会给我们的学生提供理想主义的基础。它或许能让孩子们进一步相信,单凭活着,我们就都对这个不断进步的社会有所贡献。或许,当学生们长大成人、知识渐长时,他们会有理由去改变社会制度,使其符合理想标准。或许,强调公平是美国价值的基础,会为学生们提供一个支点,当他们发现(或许是从大学历史课中)社会常常是多么不公时,他们会借之提出批评。这正符合艾米丽·迪金森^①的诗句:“真理须渐耀眼,否则众皆

① 艾米丽·迪金森 (Emily Dickinson, 1830-1886), 美国著名女诗人。这句诗的原文为: The Truth must dazzle gradually, Or every man be blind.

失明。”^[100]

既然在读完中学后,6个人中只有不到1人上过美国历史课,那么还不清楚,下一代人何时会被美国历史的真相所“耀眼”。这可能导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学生们突然意识到教师一直在对他们说谎时,他们在真相面前将感到多么眼花缭乱。我的一位学生写道,自己曾经听过“这样的故事:华盛顿在生日时得到一把斧子,他用它砍倒了父亲最喜爱的樱桃树。”令我的这位学生感到恐怖的是,她后来发现,“我一生一直视为神圣的这个故事居然是个谎言。”她“感到受到伤害,被出卖了,我早年的老师为树立华盛顿的形象不得不说谎,这导致我怀疑我早先学到的所有东西。”我这位学生的这种感受与非裔美国人的感受类似。非裔美国人要面对国父们的另外一个真相:“当我第一次听说华盛顿与杰斐逊都有奴隶时,我被击倒了,”历史学家马克·劳埃德告诉我,“我再也不想提到他们。”^[101]把华盛顿当作英雄向土著美国人兜售,终将同样碰壁,土著美国人终将发现华盛顿对易洛魁人都做了些什么。

很难相信,大人们使孩子们无知是为了维护孩子们的理想。更有可能的是,大人们使孩子们无知,这样他们就不会是理想主义者。很多成年人担心孩子,认为对权威的尊重能使孩子们不致变得狂放不羁,因此,大人们教导孩子们要尊重那些其实自己都不尊重的权威。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调查者曾向家长们展示一系列的观点,问他们是否相信,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相信。其中一个观点就是:“权威人士最了解情况。”家长们的回答成这样的比例分布:

13%:“相信,并希望孩子们也相信”

56%:“怀疑,但是仍要对孩子们这样讲”

30%:“不相信,也不想把它传给孩子们。”

这样,56%的家长即便自己怀疑,也希望孩子不会怀疑权威人物。^[102]

很多成年人只是不相信孩子们会思考。几十年来,社会学家们已经证明美国人对下一代的不信任。当孩子们找到工具,探求连成年人都得不到的信息,并以一种似乎会威胁到成年人的既定价值标准的方式运用那些信息时,家长们就会感到担忧了。很多家长希望孩子专注于“三R”^①,而不要专注于多元文化的历史。^[103]雪莉·恩格尔曾讲到,“少数叽叽喳喳的人(教师与家长)并不真的相信民主,也并不真的相信应该教会孩子思考。”^[104]或许,家长们说谎的最大理由就是,他们担

① “三R”, three R's, 系 Reading, Writing, Arithmetic 三个单词的发音合并而成,意思是“读、写、算”。

心我们的历史——担心它不是那么完美,担心如果孩子们知道那些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失去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全部尊重。因此,当爱德华·鲁佐在1964年试图掩盖沃伦·哈定写给一位已婚妇女的求爱信时,他的理由就是:“为保护年轻一代,任何有损于美国总统形象的东西都应该被查禁。”正如爱德华·鲁佐指出的,青少年犯罪实在太多了。^[10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那些本身就靠这种浅薄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历史发迹的人,才怀有这样的疑虑。哈定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但是其他美国 338 人——托马斯·潘恩、梭罗、林肯、海伦·亨特·杰克逊、马丁·路德·金,还有约翰·布朗、海伦·凯勒、伍德罗·威尔逊——却是如此,他们还在被世界各地的自由爱好者所纪念。然而,出版商、作者、教师以及家长似乎都害怕向孩子们透露这些领袖人物在其盛年时的炽热的理想主义。今天,美国生活的很多方面,从我们法律制度的前提,到大众文化的各种要素,都激励着世界上的其他社会。如果俄国能放弃其骄傲自大的情绪,正如它似乎已经做的那样,美国当然也能放弃。^[106]“我们不需要谎言做保镖,”保罗·加尼翁指出,“我们能够靠我们的全部行动展现自我。”^[107]

然而,教科书作者们似乎并不具备保罗·加尼翁那样的信心。在那些撰写带民族主义色彩的教科书的人身上,有一个必然的矛盾。一方面,在他们的笔下,国家没有压迫、没有现实的冲突;另一方面,他们明显相信,我们需要对学生说谎,向他们灌输对国家的爱。但是,如果国家如此美好,为什么我们还要说谎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说谎行为只会削弱我们自己。滚石公司“甜心”演唱组合的创建者伯妮斯·里根指出,我们自己的代言人走到国外时,会像她自己一样,开始批评美国,这给其他国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确,这就是民主的一部分。的确,在民主国家,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讲真话;的确,在民主国家,学生需要对自己的国家提出有理有据的批判,同时也要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或许,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曾在某处走向民主?

向学生说谎就是在走一条下坡路。一旦我们开始下滑,我们何时停止,如何停止?谁决定什么时候该说谎?该说什么样的谎?对什么样的年龄群说谎?我们一旦拔起事实之锚、历史证据之锚,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之舟将被大风吹得四处漂荡,一会儿向这,一会儿向那。如果因为一些事实会使哥伦布看上去很坏,我们就模糊或者忽略它们,那为什么又不忽略另外一些使美国看上去很坏的事实,比如摩门教、“三K党”气焰嚣张的密西西比州呢?这就是历史的政治化。一旦教科书作者们决定不去尊重事实,我们又怎么决定在美国历史课上教什么内容呢?如果我们的历史课不是基于事实,为什么不给白人讲一种历史,给黑人再讲另一种历

史呢? 弗斯曼与斯科特所做的事情, 难道不就类似于抛出了某种“孤星”^①版的《希望之地》, 对史实进行裁剪, 以适合德克萨斯(白)人的要求吗?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把真理定义为“使人确定、清楚和强大”, 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出版商们显然也打算这样做, 他们回避那些看来似乎会分裂美国的主 339 题。然而, 在我们放弃“符合事实”这一古老的真理标准, 以适应海德格尔的这个更有用的定义之前, 我们或许愿意回想起海德格尔是如何以此为阿道夫·希特勒服务的。而且,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他定义中的“人”这个字的涵义。难道只有欧裔美国人才是“人”吗? 或许, 公开正视那些似乎会引起争论的问题, 实际上会有利于美国人跨越种族、伦理等界限而融为一体。^[106] 毕竟, 如果教科书不真实, 一旦学生们指责美国历史课是在浪费时间, 教科书也将让我们无法再为这门课辩护。如果孩子们的教科书充满着歪曲与谎言, 他们为什么要相信自己在美国历史课中所学的内容? 他们为什么要忍耐着去学它们?

幸运的是, 正如下一章将讲到的, 孩子们没有如此。

注释

- [1] Herbert Butterfield, 引自 Stephen Vaughn, ed., *The Vital Past*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5), 222.
- [2] Marc Ferro,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225.
- [3] 引自 Joan DelFattore, *What Johnny Shouldn't Rea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20.
- [4] Brooks Mather Kelley, 访谈, 7/ 2006.
- [5] 教科书编辑, 访谈, 7/ 2006.
- [6] 《美国的冒险历程》每章不到一个注释。《发现美国历史》没有注释, 但在页边为其大段引文给出了出处。
- [7] Robert Moore, *Stereotypes, Distortions and Omissions in U.S. History Textbooks* (New York: 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 1977); Frances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 (New York: Vintage, 1980); Gerald Horne, ed., *Thinking and Rethinking U.S. History* (New York: 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 1988);

① 在此指美国历史上的“孤星共和国”(1836年——1845年), 即德克萨斯地区一度出现的独立政权。

Diane Ravitch and Chester E. Finn Jr., *What Do Our 17-Year-Olds Know?*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没有挑选教科书, 但对学生所不知道的历史做了粗略的介绍。Harriet Tyson-Bernstein, *A Conspiracy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n's Textbook Fiasco* (Washington, D.C.: Council for Basic Education, 1988); Paul Gagnon, *Democracy's Half-Told Story* (New York: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1989); Chester E. Finn Jr. and Diane Ravitch, *The Mad, Mad World of Textbook Adoption* (Washington D.C.: Thomas B. Fordham Institute, 2004). 另外一些批评家从专业角度责难美国历史教科书, 比如, 1982-83 *Michigan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Repor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1984) 发现 7 本教科书在美国与加拿大关系问题上有所欠缺。

另一方面, O. L. Davis Jr. 等人考察了 15 本初中历史教科书和 16 本中学历史教科书, 见 *Looking at History* (Washington, D.C.: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1986). 他们得出结论: “在总共 31 本教科书中, 大部分都是好的, 有些还相当精彩。” Nathan Glazer 与 Reed Ueda 对 6 本教科书做了大致的考察, 对它们有褒有贬, 见 *Ethnic Groups in History Textbooks* (Washington, D.C.: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1983) Gilbert Sewall 研究了 11 本教科书, 其中 4 本是中学的, 他们的结论也大体相同, 见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 An Assessment of Q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1987).

[8] 引自 Bessie L. Pierc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6), 329-30.

[9] Shirley Engle and Anna Ochoa, “A Curriculum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 *Social Education* 11/ 1986): 515.

[10]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72-73.

[11]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Jacks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45); James O'Brien, 个人交谈, 11/ 12/ 1993.

[12] 现在的教师培训课程经常采用拙作《老师的谎言》; 这部分是拙作所引发的各种讨论的结果, 中学的美国历史教学正在逐步好转。

[13] Ferro,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225.

[14] George Orwell, 1984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9), 35.

[15] William L. Griffen and John Marciano, *Teaching the Vietnam War* (Montclair, NJ: Allanheld, Osmun, 1979), 163-72.

[16] 这些作者包括 Michael Apple, Stanley Aronowitz, Kathleen Bennett, Samuel

Bowles, Martin Carnoy, Herbert Gintis, Henry Giroux, Margaret LeCompte, Caroline Persell, Joel Spring, Kathleen Weiler, 等等。

[17] Jonathan Kozol, *The Night Is Dark and I Am Far from Hom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1975]), 99.

[18]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South Hadley, MA: Bergin and Garvey, 1985), 102.

[19] Henry Giroux, *Ideology, Culture, and the Process of School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7. 与其他一些批判学者一样, 吉鲁特别反对那种“蓄意论”:“这并不是说, 存在某种‘不可见的’统治精英的有意识的阴谋。”这些批评学者指出上层阶级在粉饰太平, 并且这种做法自上而下地影响了我们思考历史的方式, 但是, 除了这种正确但粗略的论述外, 他们从来没有具体指出上层阶级是如何影响到比如, 乡村学校里的课堂的。在接下来的几页里, 我将更具体地指出那些影响力量。

[20] David Tyack and Elisabeth Hansot,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 *Daedalus* 110, no.2 (Summer 1981): 1, 12.

[21] Henry M. Levin, “Educational Reform: Its Meaning?” 载 Martin Carnoy and Henry M. Levin, *The Limits of Educational Reform* (New York: McKay, 1976), 24.

[22] Walter Karp, “Why Johnny Can’t Think,” *Harper’s*, 6/ 1985, 73.

[23] 关于权力精英问题, 有很多研究资料, 如: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Beth Mintz and Michael Schwartz, *The Power Structure of American Busin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G. William Domhoff, *Who Rules America Now?*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 and Laurie David, “Science à la Joe Camel,” *Washington Post*, 1/ 26/ 2006.

[24] Robert Heilbroner, “Who’s Running This Show?”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 4/ 1968, 18–21.

[25] E.D.C. Campbell Jr., ed., *Before Freedom Came* (Richmond, VA: Museum of the Confederacy, 1991).

[26] 我这里所讲的“颠覆性的”(subversive), 取意于 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ner,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New York: Delacorte, 1969). 马克思主义密谋家们或许会说, 富人们已经对大多数美国人隐瞒了关于美国历史的各种有思想的著述, 却为自己的孩子保留了它们。更加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深知, 错误的历史是错误的意识的关键组成部分, 错误的意识对于那些跃居上层社会的人来说, 同样重要: 上层阶级的孩子们与工人阶级的子女们同样需要相信, 我们的社会是公正和进步的。对于预科学校里的某些较为温和的颠覆性历史教

学而言,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预科学校的教师都毕业于预科学校,而精英私立学院只不过是在复制他们所经历过的教学模式。此外,预科学校更有可能聘请历史专业而非教育学专业的人做教师,其结果是,好的教师能更好地、也更乐于与学生一起探讨历史疑点。而且,预科学校的班级规模较小——有时只有5到10人,能够为个别学生的研究问题与方案提供更好的条件,而公立中学的班级一般有25到40人,而根据Karp,“Why Johnny Can’t Think,”这一数字可能是70或72,引自Ernest L. Boyer’s *High School*.

[27] Lee H. Ehman, “The American School in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roces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0, no. 1 (Spring 1980): 99–119. 在《老师的谎言》初版里,我指出,选举是教科书所推崇的一种公民形式,然而美国的投票数在下降,特别是在近些年的中学毕业生中。因此我指出,社会与历史课程为公民提供的貌似神圣的气息,或许能够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最近,1986年,18到24岁的年轻人的投票率不到17%,最近这一数据有所上升,2006年,18到29岁的年轻人的投票率达到24%。虽然仍有超过3/4的人不参加投票,但是这种增长毕竟是令人鼓舞的。我不知道是否这是由于历史教科书的那些温和的改进所致。

[28] Roger Farr and Michael A. Tulley 介绍过采用委员会的工作程序,见“Do Adoption Committees Perpetuate Mediocre Textbooks?” *Phi Delta Kappan*, March 1985, 467–71. 加利福尼亚州在全州范围的只采用一到八年级的教科书。然而,对于中学教科书,它发布有全州适用的采用指南。Gilbert Sewall, *Social Studies Review*, no. 5 (Summer 1990): 2, 说,加利福尼亚控制着1.7亿美元的图书市场的11%。(在这份时事通讯的较早版本no. 1:4中,Sewall为加利福尼亚提供的数据要低:10.2%。但他同时又说,四大教材采用州——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佛罗里达以及北卡罗莱纳——共占据了1/4的市场,对出版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Michael W. Kirst, *Who Controls Our Schools?* (New York: Freeman, 1984), 115–20 描述了加利福尼亚的采用委员会,以及该州和德克萨斯州对全国课本的影响,另见Michael W. Apple, “The Culture and Commerce of the Textbook,” in Michael W. Apple and Linda K. Christian-Smith,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Textbook*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Ch. 2.

[29] 更完整的论述,见J. Dan Marshall,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Some Friends: Publishers, Protesters, and Texas Textbook Decisions,” in Apple and Christian-Smith,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Textbook*, Ch. 4; Joan DelFattore, *What Johnny Shouldn’t Read*; and Michael W. Ap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xt Publishing,” *Educational Theory* 34, no. 4 (Fall 1984): 307–19.

[30] 我1994年时写的是24本;但是出版商之间的合并使得选择范围缩小了。

[31] Farr and Tulley, "Do Adoption Committees Perpetuate Mediocre Textbooks?" 470; Marshall,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Some Friends," 62; Harriet Tyson- Bernstein, "Remarks to the AERA Textbook SIG" (San Francisco, March 1989), 10; Harriet Tyson- Bernstein and Arthur Woodward, "Nineteenth Century Policies for Twenty- first Century Practice," in Philip Altbach et al., eds., *Textbooks in American Socie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94-97; 与出版经理人的多次谈话; 美国历史课大学预修课程教师讨论小组名单 (apushist@lyrics. collegeboard. com), 12/ 2006.

[32] Tyson- Bernstein, "Remarks to the AERA Textbook SIG," 5.

[33] Lynne Cheney, *Tyrannical Machin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1990), 12.

[34] 好啦, 这是个笑话; 但它让人想起本书第四章的正确答案: 1811年11月, 爆发于蒂帕卡努河。

[35] Thomas A. Bailey, *The American Pageant Revisited: Recollections of a Stanford Historian*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2), 192.

[36] 引自 Pierc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39.

[37] Marshall,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Some Friends," 66.

[38] 或许, 在有些地方, 有些人已经出版了非同寻常的大美国史的教科书。我所知道的最新的是 Howard Zinn,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该书有时被叫做“反教科书”(anti- textbook.) 至于其他的, 见前言的注脚。

[3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对于现在出版这类“夹缝”里的教科书的出版商们来说, 最新奇的事情是, 他们单独编辑教科书的封面, 以满足德克萨斯州高标准的政治化审查的压力。“洛温诉特尼浦西德案”提供了一个先例, 少数出版社只要有别的教科书可供选择, 就可以通过上诉来打开大城市里为多数出版社控制的学校片区的市场。德克萨斯州的强权类似于 Thomas R. Cripps 所描述的“南方票房的秘密”, 见 J. C. Curtis and L. J. Gould, eds., *The Black Experience in Americ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0), 116-44. 几十年来, 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人一直害怕得罪南方的影剧院老板, 在他们看来, 后者控制了 1/3 的市场。然而最近几年, 德克萨斯的形势有所好转, 详见本书结束语。

[40] Robert Darnton, "The Good Old Day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16/ 1991, 47.

[41] Hillel Black, *The American Schoolbook* (New York: Morrow, 1967), 49–52.

[42] 这个词或许听起来太刺耳了。西班牙人当年从海地的印第安人劳动中获利,他们并不希望灭绝阿拉瓦人。很多印第安人死于西班牙人无意中带来的疟疾等疾病,以及由于西班牙人中断了印第安人的园艺技术而导致的饥荒。然而,在其他的种族灭绝中,疾病以及人为的饥荒也是原因之一。Ward Churchill 指出,欧洲人对待印第安人的做法堪与纳粹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大屠杀相比。奴隶们工作至死,这种现象在奥斯维辛、在海地的金矿,比比皆是。见“Deconstructing the Columbus Myth,” in John Yewell et al., eds., *Confronting Columbu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2), 149–58.

[43] Barbara Gamarekian, “Grants Rejected; Scholars Grumble,”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1991; Karen J. Winkler, “Humanities Agency Caught in Controversy Over Columbus Grant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3/ 13/ 1991, A8.

[44] Robert Reinhold,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9/ 29/ 1991, 26–29ff.

[45] Robert Bernstein, 谈话, 1973.

[46] Black, *The American Schoolbook*, 39.

[47] Harriet Tyson– Bernstein, “The Academy’s Contribution to the Impoverishment of America’s Textbooks,” *Phi Delta Kappan* 70, no. 3 (11/ 1988): 197; Scriptor Pseudonymous, “The Ghost Behind the Classroom Door,” *Today’s Education*, 4/ 1978, 41–45, 有一个人,他从未教过历史,也没有历史学学位,却编写历史学以及很多其他学科的教科书及其辅助材料;与 McGraw– Hill 图书公司编辑的访谈, 7/ 2006.

[48] Brooks Mather Kelley, 访谈, 7/ 2006; 参见 Diana Schemo, “Schoolbooks Are Given F’s In Originality,” *New York Times*, 7/ 13/ 2006.

[49] Allan M. Winkler, 访谈, 7/ 2006.

[50] 与 Judith Conaway 访谈, 7/ 2006; 与教科书编辑访谈, 7/ 2006; 与 Paul Boyer 简短访谈, 7/ 2006; Schemo, “Schoolbooks Are Given F’s In Originality”; James Goodman, “The Mystery of the Echoing Textbooks,” *New York Times*, 7/ 7/200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耶的比喻是不确切的:教科书正如《伊利亚特》或《贝奥武甫》,没有人知道是谁写的。

[51] M. P., “Texas Schoolbook Massacre: 5200 Errors Found in 10 History Books,” *Publishers Weekly*, 3/ 2/ 1992, 11. 并非全部 5200 处都是错误的,很多错误都是琐碎的或者有争议的。

[52] 一些观察家的确认为,利比亚的赔付只是为了了结争端,重修与西方国家的正常关系,但是这只是少数人的立场,我怀疑,布尔斯廷与凯利就持这种立场,参见“Pan Am Flight 103,” Wikipedia, en. wikipedia. org/ wiki/ Pan_Am_Flight_103, 10/ 2006.

[53] 此刻,我觉得,霍尔特出版公司聘请的那位内幕写手在设计这一荒谬的问题时,可能听说内尼特的这首长诗,但他从未读过,他想象着这首诗与其他诗歌一样,只有一页长。但是不,标题是斜体的,而不是只加了引号;这表明它是一本书,而不是短诗。

[54] 访谈, 12/ 1987. Gilbert Sewall,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A View from the Publishers,” *Social Studies Review*, no. 5 (Summer 1990): 14, 该书对出版商的影响持更为灰暗的观点:“教科书作者们对于自己的产品很少有或几乎没有控制力。”Frances FitzGerald 说我不该相信教科书作者们的话。当然,教科书作者们如果迁就过编辑的干扰,他们会羞于承认。在我们的访谈之后,有一位教科书作者详细列举了几条编辑建议,这与他早先的说法是有冲突的。然而,我们可以说,毫无疑问,这些作者认为自己与出版商的关系是融洽的。

[55] John Garraty, 访谈, 11/ 1987.

[56] James Davidson and Mark Lytle, *After the Fact*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2), 106-11. *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该书提到了一个事件:墨西哥城的天花,但只有只言片语,也没有被列入索引。

[57] Tyson- Bernstein, “The Academy’s Contribution to the Impoverishment of America’s Textbooks,” 194, and “Remarks to the AERA Textbook SIG,” 9; 我所考察的某本教科书的作者 Thomas Bailey 写道,一本成功的教科书——《美利坚盛典》当属此列——“的确会伤害我和我的某些同事。” (*The American Pageant Revisited*, 180). 我所在的佛蒙特大学将“学术”与它所称的“教学作品”相区别,并且轻视后者。见 Black, *The American Schoolbook*, 39; Sewall,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A View from the Publishers,” 14; and Matthew Downey, “Speaking of Textbooks,” in David Elliott and Arthur Woodward, eds., *Textbooks and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SSE Yearbook, 1981).

[58] 美国历史学会核心刊物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全国社会研究理事会核心刊物 *Social Education*, 以及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都不评论中学课本。*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最近开始评论大专学校的教科书,并认为这是自己的创举。其他的历史刊物大多数都不倾向于评论教科书,而我也只在 *The History Teacher* 上发表了一篇针对我这里所考察的 12 本教科书中的一本教

科书的书评。

[59] 很多作者并不因写作教科书而出名,甚至也得不到其出版商的好评。在 Scott 与 Foresman 为《land of promise》所做的广告中,人们不用放大镜就看不出作者的名字。Prentice Hall 出版公司为《会众国:共和国的历史》所做的广告从来不提作者。有时,作者的名字甚至不出现在书本的封面上。对于那些并没有写“自己的”教科书的作者们来说,不招惹这种是非是相当不错的。

[60] 与 Mark Lytle 访谈, 11/ 1993.

[61] Michael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258-59; Bailey, *The American Pageant Revisited*, 192-95.

[62] Pierc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6, 10-11, and 56-62.

[63] 有两本探究型教科书则套路不同。《发现美国历史》提供了一组旧照片的拼图。它用亚伯拉罕·林肯及其他伟大领袖的鲜明图片公开表示对过去某些历史的纪念,这种安排意味着,这些旧照片属于历史材料,这反映出他们的探究手法。《美国的冒险历程》有所收敛,它展示的是林肯、印第安人住房等人物和建筑物的黑白照片,然而,制图人员只想把它们排得更漂亮,于是把它们用红色、白色和蓝色包围起来。

[64] 这有什么错呢?有人或许会问。本书下一章将论述这种历史书对学生的影响,会对此给出答案。

[65] 见 Vaughn, ed., *The Vital Past*, 46, 241.

[66] Carol Berkin, 访谈, 10/ 1987.

[67] Edward Pessen, *The Log Cabin My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该书声称,在林肯小时候,他的家庭至少与周边家庭一样富有。

[68] Kenneth Wong and Tom Loveless, "The Politics of Textbooks Policy," in Altbach, *Textbooks in American Society*, 33-34. Mary Hans 是一位教师培训者,她也告诉我:"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教师们想要的那种教科书。"

[69] Charlotte Crabtree and David O'Shea, "Teachers' Academic Preparation in History," *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 Newsletter* 1, no. 3 (11/ 1991): 4, 10.

[70] 见 Black, *The American Schoolbook*, 91-95. See also Jack L. Nelson and William B. Stanley, "Academic Freedom: Fifty Years Standing Still," *Social Education* 49 (1985): 663.

[71] Shirley Engle, "Late Night Thoughts About the New Social Studies," *Social*

Education 50, no. 1 (1/ 1986): 20-22. John Goodlad agrees in "A Study of Schooling," *Phi Delta Kappan*, March 1983, reprinted in James W. Noll, ed., *Taking Sides: Clashing Views on Controversial Educational Issues* (Guilford, CT: Dushkin, 1989), 145.

[72] Seymour B. Sarason, *The Culture of the School and the Problem of Chang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1), 180-87.

[73] Linda McNeil, "Defensiv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Control," in Michael W. Apple and Lois Weis, eds.,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School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6.

[74] Goodlad, "A Study of Schooling," 145-47.

[75] McNeil, "Defensiv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Control," 115-16. 中学教师有理由害怕冲突和失控。在任何一个课堂上,教师都不得不建立权威。那么,他们怎么会怀疑权威呢?学生们发生分歧——与教师发生分歧、与教科书发生分歧,或者彼此之间发生分歧——都似乎是失控。然而,表面现象是有欺骗性的:行为规范的确主导着学生的行为,即便那一行为连非学生都做不到。这样,教师们在课堂上通常比自己所意识到的更有威信。虽然如此,学生们仍有可能失控,但教师们想控制局面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76] Albert Shanker, "The Efficient Diploma Mill," advertisement in *New York Times*, 2/ 14/ 1988.

[77] 1893 与 1934 的告诫引自 David Jenness, *Making Sense of Social Stud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90), 262. See also Gagnon, *Democracy's Half-Told Story*, 17-19.

[78] Paul Goldstein, *Changing the American Schoolbook* (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78). 在历史课上,这一比例甚至更高。Kirst, *Who Controls Our Schools?* 115. J. Y. Cole and T. G. Sticht, eds., *The Textbook in American Society*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81), 9, 这两本书认为,教科书与相似的指导材料构成了 95% 到 100% 的课堂教学和 90% 的家庭作业时间。然而, Matthew Downey 及 Linda Levstik 质疑那种认为教科书是最主要的历史教育手段的观点,他们认为,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阅读。见 "Teaching and Learning History: The Research Base," *Social Education* 52, no. 9 (September 1988): 336-41, esp. 337. 然而,这种悲观的发现只会提供讽刺性的鼓舞,并且并不符合我从我的学生那里得到的信息,我的学生们大多指出,他们的中学历史课在大多数时间里做着与我的课相同的事情,比如,在每一章结束后回答一些乏味的问题。

[79] Tyson-Bernstein, "Remarks to the AERA Textbook SIG," 10. 她的论断或许太尖刻了。据我的经验,教师们急切地不再直接传播那些错误的信息。大多数教师努力学习,掌握和传播正确的信息,但是,这些只是指那些出席专题学术会议的教师,而非随机抽查的结果。

[80] Tracy Kidder, *Among Schoolchildre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该书描述了教师们几乎不可能做的工作。另见 John Goodlad, *A Place Called School* (New York: McGraw-Hill, 1983)。

[81] Mark Schug, "Why Teach Social Studies?" *The Social Studies* 80, no. 2 (3/1989): 74. 很不幸,他只选取了 29 位教师作为研究样本。

[82] Crabtree 与 O'Shea, "Teachers' Academic Preparation in History," 4, 10. 然而,有些教师的专业是社会科学,这对教美国历史还算是有用的。Crabtree 与 O'Shea 还指出,在 12 位历史教师中,有 1 位获得的是体育学的学士学位,或许他们大多数都是教练。另见 Robert A. Rutter, "Profile of the Profession," *Social Education*, no. 58 (4/1986): 253.

[83] Joan M. Shaughnessy and Thomas M. Haladyna, "Research on Student Attitudes Toward Social Studies," *Social Education* 49 (November 1985): 692-95. 见 Mark Schug et al., "Why Kids Don't Like Social Studies," *Social Education* 48 (5/1984): 382-87; and Goodlad, "A Study of Schooling."

[84] McNeil, "Defensiv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Control," 117.

[85] 同上, 124; Jenness, *Making Sense of Social Studies*, 264-65, 291.

[86] 因此教师也不会回过头来讲这些条目,我们在《密西西比:冲突与变革》各章的最后都除去了所有的提问。

[87] Patrick Ferguson, "Promot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eachers' Attitudes and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San Francisco: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1989), 4-5. 在讨论各种不同的学者对于欧洲对美国的影响的看法时,新版《美利坚盛典》加了一个有趣的方框,框中写“欧洲中心论”。

[88] 在两点上,探究型书籍较为突出:他们提供第一手材料,他们对于近期事件的处理完整得多。然而,我所考察的探究型书籍也存在同样的史实性错误或解读错误。Jenness 指出,这些教科书没搞明白,就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展开恰当的辩论,是需要专门知识的 (*Making Sense of Social Studies*, 292). 教科书随意提出需要花几个星期才能找到有见解的答案的问题,其自身已处在“反智”的边缘,因为它们似乎在告诉人们,它们不是真的期待这种从教师到学生的彻底的探寻。

[89] 在有些州,教师们有责任教授被采用的教科书里的那些概念。见 Sue

Dueitt, "Textbooks and the Military," in Cole and Sticht, eds., *The Textbook in American Society*, 36.

[90] Robert M. O'Neil, *Classrooms in the Crossfi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9-12, 23. 每年,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组织都会在其年鉴里记录它所称的“要知道的对自由的攻击事件”(Washington, D.C.: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1993 and prior years). Jonathan Kozol 讲述了他自己在波士顿因为讲 Langston Hughes 的诗歌而遭解雇的事情, 见 *Death at an Early Ag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5).

[91] Carlson, "Academic Freedom in Hard Times," 430.

[92] Kidder, *Among Schoolchildren*, 52; Kirst, *Who Controls Our Schools?* 135; Linda Levstik, "The Research Base for Curriculum Choice: A Response," *Social Education*, no. 54 (11/ 1990): 443.

[93] 见盖洛普调查, Gallup poll, 10/ 1987, reported in Stamford, CT, *Advocate*, 12/ 26/ 1987, 1.

[94] Jean Fair, ed., *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ocial Studies Evalu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1975), 35.

[95] John Williamson, 转引自 Cole and Sticht, eds., *The Textbook in American Society*, 39.

[96] Raymond English, "Can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Have Scholarly Integrity?" *Social Education* 50, no. 1 (1/ 1986):46-48.

[97] Donald Barr, *Who Pushed Humpty Dumpty? Dilemmas in American Education Today* (New York: Atheneum, 1972), 316-17, 该书讲述了出版商是如何使三只小猪的故事变得平淡乏味, 现在, 猪大哥与猪二哥在被大灰狼捣毁了各自的房子之后, 它们并没有死, 而是比狼跑得更快, 最后跑到猪小弟的偏僻的砖石房子里。

[98] Sissela Bok, *Lying* (New York: Pantheon, 1978), 24. 然而, 博克承认, 一方面, 人们认为, "自己处于要不要行骗的选择关头时", 以"微妙的方式"说谎是有益无害的; 另一方面, 每个人都想"尽可能避免受他人的欺骗"。波士顿儿童博物馆在一项关于死亡的展览中, 采取了完全不同但更为诚实的策略。见 "Children Learn That 'Dying Isn't a Vacation,'" *New York Times*, 8/ 26/ 1984. 关于向学生提供有争议的材料的问题的另一种讨论, 见 Black, *The American Schoolbook*, 91-95; Kirsten Lundberg, "Addressing a Child's Fears about Life in the Nuclear Age," *Boston Globe*, 3/ 9/ 1986; and Betty Reardan, John Anthony Scott, and Sam Totten,

“Nuclear Weapons: Concepts,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Social Education* 47 (11/1983): 473-522.

[99] 见 Natalie Gittelson, “The Fear That Haunts Our Children,” *McCall's*, 5/1982, 77 各处, 以及 David S.Greenwald and Steven J. Zeitlin, *No Reason to Talk About It: Families Confront the Nuclear Taboo* (New York: Norton, 1986).

[100] 见 Edward A. Wynne, “The Case for Censorship to Protect the Young,” in *Issues in Education* (Winter 1985).

[101] Mark Lloyd, 访谈, 1991.

[102] Yankelovich, Skelly, and White, 载于 “A ‘New Breed’ Emerges,” *Family Weekly*, 1/ 1/ 1978.

[103] Arthur Schlesinger Jr. 对历史学的放弃令人震惊: “如果我们能教孩子们读、写和计算,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见 “Toward a Divisive Diversity,” *Wall Street Journal*, 6/ 25/ 1991.

[104] Engle, “Late Night Thoughts About the New Social Studies,” 20.

[105] Francis Russell, *The Shadow of Blooming Grove*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8), 656.

[106] Paul Gagnon, “Why Study History?” *Atlantic* (11/ 1988), 51.

[107] Paul Gagnon, *Democracy's Untold Stor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1987), 19.

[108] Heidegger, 引自 Noam Chomsky, *The Noam Chomsky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1987), 60.

第十三章

这样教历史的后果是什么？

340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我不想我不想的问题。”

克拉伦斯·达罗：“你想过你不想的问题？”

——《“斯科普斯审判案”^①副本》^[1]

学社会课，在不小的程度上，无论是在小学还是在大学，都是在学习愚蠢。

——朱尔斯·亨利^[2]

是的，我不上课，我得了个D，因为历史对我没有意义。

——“丛林兄弟”演唱组合^[3]

真理将使我们自由，

真理将使我们自由。

终有一天，真理将使我们自由。

哦，在我的内心深处，深信不疑，

终有一天，真理将使我们自由。

——民歌《我们一定会胜利》

在美国各地，中学生坐在社会课和美国历史课的课堂里，看着课本，抄着每章后面的问题的答案，参加测验与考试，看看自己背书的能力如何。我做学生时，

① 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 1900-1970)是美国的一名教师，因在田纳西州的一所中学里讲授进化论而遭起诉，是为“斯科普斯审判案”(1925年)。此处两句引语的作者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1860-1925)与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 1857-1938)分别是该案的原告律师和辩护律师。斯科普斯被判有罪并被处轻微罚金，但后来得到平反。

也曾屈服于这种教学机制,但那时,不到第六周升级评定之前,我不会去做每章之后的名词解释。那时,我和老师商定,我要想得到A-(通常相当于百分制的85分),至少应该背哪些名词。这样,在最后两天的课堂上,我就狂写这些定义。三年后,我的妹妹上美国历史课时,发明了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她及时交作业,但只写出最前面的两个名词与最后的两个名词的真实定义,对于中间的30或40个名词,她就胡编一些废话。有一个名词她这样解释:“《霍利-斯姆特关税法》:德姆林先生,我不知道。”还有一个名词她这样解释:“‘蓝鹰’^①: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宠物鸟,主人死后这只鸟特别伤心。”今天,学生们有了互联网。“在我们学校,我们分组分工,把各自负责的部分贴到网上,下载各个名词解释,然后改变格式,打印,交上去。”教育学家称这种做法为“磨洋工”(day-to-day resistance)——这个词原用于形容当年奴隶的消极抵抗策略。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样做。我还很嫉妒: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么绝妙的省力方法呢?^[4]

当然,老师也并不是那么好愚弄的。极有可能,我妹妹的老师知道这种把戏,并且与同事们以此为笑谈。这类似于,主人们取笑他们的奴隶如此愚蠢,以至于每天傍晚都要警告他们记得把锄头带回家,否则就让他们到外面去吃夜露。一些社会课和历史课的老师为赢得学生的配合,每当引入一个新的课题时,会告诉学生们不要担忧,他们要记的东西并不多。学生们欣然接受。^[5]学生们还发明了很多办法,逼得老师浪费时间、降低要求。^[6]老师们也默认了,因为,就像奴隶制时代的“磨洋工”一样,让步并不会真的威胁到整个制度。学校里的“磨洋工”还给学生造成某种“精神距离”。这指的是,制度虽然能够指挥他们的笔,但却没能赢得他们思想上的真正合作。

怎么会这样呢?谁愿意学那些无用的琐碎东西呢?比如,《美利坚之旅》在每一章结束时,都有两至六页的“评估与活动”板块,但大多强调的是细枝末节。如,在最后一章,有一个“时间线索活动”,让学生把下列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

-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波斯尼亚穆斯林签署和平协议,内战结束。
- 苏联解体。
- 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第一任)。
- 杰罗丁·费拉罗是第一位来自主要政党去角逐副总统职位的女性候选人。

① “蓝鹰”(Blue Eagle),实指“罗斯福新政”的一项措施:每一个自愿接受“最低工资制”的雇主将得到一枚“蓝鹰”徽标。

-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 桑德拉·戴·奥康纳被提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 罗纳德·里根再次当选总统。

我觉得,读者如果不查资料,很难对这七个事件正确排序。当然,我也不能。我还敢打赌,该书封面的那几位署名作者乔伊斯·阿普尔比、艾伦·布林克利和詹姆斯·麦克弗森也不能。即便他们能,那又怎么样呢?这些事件之间大多没有因果或逻辑关系,因此,没有必要去记住谁先谁后。这一活动设计只是让学生记住无关事件的发生顺序。即使某些事件看起来有联系——比如,奥康纳与里根^①,但细究起来,只知道前者任命了后者还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知道,里根是在其第一任还是第二任做出这项任命的。

日复一日的学习表明,学生们成功地抵制了记忆这种所谓的“事实”。^[7]实际上,他们对什么都抵制。三分之二的17岁的美国人不能指出内战是在19世纪上半期还是下半期发生的,我的学生中有22%的人曾回答说越战是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这时,我们应该向这些年轻人致敬,他们远不止是无知。^[8]这是一种高水准的抵抗。学生们只是不记美国历史的那些细节,即便它们是一个有教养的公民应该知道的。此外,学生们更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我們过去的那些大发展。因此,他们不可能把历史教训用于当前问题上。

不幸的是,学生们在报考政府职员、社会学教授或者报社记者时,对于一些历史命题,无论是理解、接受,或者反驳,都不再能找到证据材料。如果知识就是力量,那么无知就不能得福。

感情是历史的亲和剂。我们能够记得自己在听到世贸中心遭袭时身在何处,因为那件事给我们的感情强烈的震撼。美国历史是一门令人神伤的课程。当学生们读到真正来自我们的过去的声音时,他们的情绪不会不受感染。让我们回忆一下拉斯·卡萨斯对西班牙人虐待印第安人的充满激情的谴责:“我们在印第安人身上所干的那些事,在我们对上帝、对人类曾经犯下的那些最不可饶恕的罪行中,最为突出。”再看一下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1896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演讲,其中最后一句话十分著名:“你不能把这顶荆棘桂冠压在劳工的额头上。你不能把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再看看海伦·凯勒对《布鲁克林鹰报》的抨击:“它在社会问题上又聋又瞎,它维护着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再看看富 343
兰克林·D. 罗斯福在大萧条时代所说的话,他使我们相信,“除了自己,我们没什

^① 1981年7月,奥康纳经里根总统(1981-1984-1989)提名出任最高法院法官,是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法官。

么可怕的。”事件与想象也能唤起强烈的感情。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在医学院里的传奇故事、美国(以及苏联、英国)士兵从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胜利逃亡、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终于培育出能够对抗小儿麻痹症的疫苗,都是扣人心弦的故事。教科书评论家 W. K. 哈拉森夫人写道:“不调动感情,那些生动而鲜活的历史事件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精确、真实的再现。”^[9]

然而,前面的章节已经证明,美国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课程既非心平气和,也不充满激情。所有的教科书作者以及很多教师都似乎没有深入地想一想,我们过去有些事或许值得付出强烈的感情乃至严肃的思考。在这些教科书中,没有真正的情感,甚至也没有真正的自豪感。^[10]相反,在另一方面,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却是个例外。大多数美国历史课和教科书都带有一种灰色的感情背景,表现出虔诚的目的。美国有着好的历史,学生学习它是有益的。“他们不认为历史有戏剧性,”一位教师告诉我,“他们全告诉我,他们恨历史课,因为它全是死板的事实,它很枯燥。”

还有一种使历史具有亲和力的方法,那就是使它贴近学生的生活。为了向学生讲解种族主义对非裔美国人有何影响,爱荷华州的一位教师在两天的课程里,将她那个由清一色白人学生组成的三年级班级根据学生眼睛的颜色分成若干组。影片《分裂的课堂》展现了这些学生在 15 年后还多么鲜活地记得那节课。^[11]相比之下,学生在学年结束 15 个星期后,很少还能记得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那些材料。教科书重视遥远的历史,这导致学生不想结合自己的家庭或社会去学历史,而这又导致学校与学生的校外生活相脱节。

两位加拿大教育家说:“像大多数成年人一样,孩子们并不乐意记那些孤立的、不连贯的、没有意思的数据。”^[12]孩子们是对的,教科书很少提供带因果关系的框架,并且缺乏连贯性,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学生会将他们在历史课上“记得”的那些杂乱细节大部分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并非所有的学生遗忘的程度都相同。相比白人或亚裔的孩子,少数族群——土著美国人、非裔美国人以及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孩子们所有的功课成绩都不好,但成绩差异最大的还是在社会课上。这是因为,美国历史课在教学上特别疏忽有色人种的学生或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把历史讲得令有钱的白人男人“感觉良好”就必然令其他人“感觉不好”。³⁴⁴我的一位学生在佛蒙特州斯旺顿镇——该镇有大量的美洲印第安人——做实习老师时注意到,在阿本乃吉族学生中,当讲到感恩节这一主题时,高 5 个年级的学生明显会更加心不在焉。在交谈中,学生会做出如下反应:“我的父亲告诉我关于那时的真相,他叫我不听像你这样的白人渣滓的话!”然而,相比诸如“哥伦布节”,感恩节的问题应该说好得多。在整个一学年里,美国历史课在数千个小问题上使很多学生受到打击。与那位阿本乃吉族少年不同,大多数无产学生并不会

有意识地反击,更不会反叛,只不过更巧妙地回避罢了。美国历史课伤害了学生的自我想象,降低了他们的历史教科书所灌输的“美国格外优越”这一观点的说服力。在黑人学生心目中,美国历史就像通常所讲的那样,是“白色的”,是“有同化目的的”,因此,他们拒绝学习它。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研究表明,穷人家的学生与富人家的学生、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在历史课中的表现差异要比在其他科目中大。^[13]女生也要比男生更不喜欢社会课与历史课,这或许是因为,妇女及妇女的兴趣与认知能力在历史课上仍然得不到重视。^[14]

历史学中“非洲中心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小亚瑟·施勒辛格把“非洲中心论”的历史贬斥为对黑人的“精神疗法”——一种旨在让非裔美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单方面的错误尝试。^[15]不幸的是,我们教科书中的“欧洲中心论”也是对白人的精神疗法。由于像施勒辛格这样的历史学家不提“欧洲中心论”,他们就不会清白地加入这一讨论。诚然,针对带有“欧洲中心论”倾向的教科书,未必就要去写单方面的“非洲中心论”的历史——非洲人发明了一切好的事物,白人发明了奴役与压迫。诚然,我们并不真的希望一代非裔美国人在反白人的“非洲中心论”的历史学中长大;但是,的确,我们也不能让一代美国白人在洋洋自得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中长大。即便学生们没有从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学到多少历史知识,他们也会受到课本的倾向的影响。教育工作者玛莎·托平发现,90位中学生居然对以下主张一致同意:“如果非洲有值得了解的历史,那么我们的西方文明早就有了。”^[16]“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向非裔美国人传递的信息是:你们的祖先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对于裔美国人以及非裔美国人,都很容易再往前跨一步,认为非裔美国人在今天并不重要。

从一开始,教科书称哥伦布1492年的航海为“一个奇迹”,并且宣称:“后来, 345 这位心怀感激的船长登上岸,向上帝表达感谢”。这时,它们是在把基督徒的神当作神,并把“他”(原文如此)放到白人一边。如果不讲阿拉瓦克人关于海地的看法,只会继续使非白人从我们的历史被拉开第一幕时就被“他者化”。如果教科书中的“我们”包括美洲印第安人、非裔美国人、拉丁美洲人、妇女及各个社会阶层,那么教科书读起来就是另外的样子了,就像白人在有色人种的面前说起话来会不一样(会更慈悲)。的确,人们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更准确、更具跨文化色彩,最终消散诸种不快,而不是歪曲历史,一味为了让有钱的白人孩子对历史感觉良好。或许,我们甚至可以把历史书写得、或者把历史课教得让非精英阶层出身的孩子也想学习它。

美国历史课对有钱的白人孩子造成的影响,也是同样令人不安的。这一严重后果在我所谓的“越南试验”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在整个越战期间,民意调查员

们不停地问美国人是否希望撤回我们的军队。一开始,只有一小批人支持撤军。到战争临近尾声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我们撤军了。

盖洛普、罗珀(Roper)、全美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NORC)及其他组织不仅就那场战争向美国人进行民意调查,而且常常收集一些背景性数据,包括性别、教育、宗教,等等,因此,它们能够发现,哪些人倾向于鹰派,哪些人倾向于鸽派。十多年来,我调查过千余名大学生和数百名其他人,问他们如果按教育程度划分,哪类成年人最支持越战。我让他们填表(表一),以为会得到与盖洛普 1971 年 1 月关于越战的全国民调同样的结果。我告诉他们,到 1971 年 1 月,在国人的情绪中,鸽派占压倒性优势:73%的人支持撤军。(不包括回答“不知道”的人。)

346

图 1 “越南试验”(表一)

1971 年 1 月,盖洛普民调:“国会已收到要求美国政府在年底前召回全部美军的提案。你希望你所支持的国会议员对该提案投赞同票还是反对票?”

根据教育情况,评估一下结果,填写下表:

成年人	大学文化	中学文化	小学文化	总计
支持撤军 (鸽派)				73%
反对撤军 (鹰派)				27%
总计	100%	100%	100%	100%

近些年的中学毕业生甚至不知道怎么填这样一份简单的表格,甚至看不懂它。因此,我教他们如何平衡表格的各个数据——比如,如果只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鸽派,他们当中支持撤军的人数超过了 73%,那么,受过其他等级教育的人群中倾向于鸽派的就不到 73%,这样,整个鸽派的比例才能平衡在 73%上。读者们,如果你们想做一名积极的读者,可以在进一步阅读之前自己先填好这个表。

被访者以压倒性的比例——几乎是 10 比 1——认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倾向于鸽派。表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图 2 “越南试验”(表二)

347

成年人	大学文化	中学文化	小学文化	总计
支持撤军 (鸽派)	90%	75%	60%	73%
反对撤军 (鹰派)	10%	25%	40%	27%
总计	100%	100%	100%	100%

我后来要求受访者,假定他们填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请提出至少两个可信的推论,去解释这些结果。他们最普遍的回答是:

受过教育的人见识广泛,有批判精神,因此更有能力识别错误的信息,并得出结论,越战符合我们最大的政治或道德利益。

受过教育的人更宽容。我们的战争行为包含着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因素,但受过教育的人较不可能接受这种偏见。

受教育较少的人从事较低级的职业,更有可能卷入与战争相关的产业,或者直接参军作战,因此,战争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

这里没什么奇怪的。大多数人觉得,学校教育是好的事物,能使我们识别事实、重视证据并理性思考。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据说是一道民主的屏障。

然而,事实完全不同。受过不同教育的人对越战的支持也各有不同。表三显示 1971 年 1 月盖洛普民调的实际结果:

图 3 “越南试验”(表三)

成年人	大学文化	中学文化	小学文化	总计
支持撤军 (鸽派)	60%	75%	80%	73%
反对撤军 (鹰派)	40%	25%	20%	27%
总计	100%	100%	100%	100%

348

这些数据甚至连职业社会科学家都会感到诧异。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鹰派占 40%,这是小学文化的人群中鹰派所占比例的两倍。这一民调结果并非个别现象,类似的结果一再出现于哈里斯(Harris)、NORC 等各种调查机构的调查之中。早在 1965 年,只有 24%的国人认为美国出兵越南“是一个错误”,其中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占 28%。后来,当将近一半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主张撤军时,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人中有 61%的人主张撤军。在我们卷入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在内的东南亚事务的整个过程中,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人总是鸽派的主要成员,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是鹰派的主要成员。

今天,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越战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是一个错误,大多数政治分析家也持这种观点,其中包括越战的发动者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与克拉克·克里福德^①。如果我们接受今天的这种普遍见解,那我们就必须承认,受教育程

①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克拉克·克里福德(Clark Clifford),越战期间曾先后任美国国防部长。

度越高的人越有可能错误地看待战争。

为什么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会支持战争？当我的调查对象了解到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成为鹰派时，他们马上去编造新的解释。由于他们局限于这样一种论断——受过教育的人要比文化较低的人更有思想，心地也更为善良。他们的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文化较低的美国人反而是对的。有一种流行见解补充推论，由于工人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付出了真正的战争代价，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就“自然地”反对战争。这种解释貌似有理，因为它的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对战争的抵349触，以及他们质朴的推理。但是，它把工人阶级的思维方式贬低为质朴的、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这等于否认文化较低的人会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这样，这一论断将工人阶级的立场贬低为一种基于自利的反应——其实工人阶级的立场比那些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的立场更正确。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人性并非如此。研究表明，在各种受过不同程度教育的人中，都有人期盼战争，都有人支持越战，因为，人们对自己打算做的事情很少怀疑。那些参战或期待参战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年轻人，要想改变自己注定要奔赴越南的命运，可不那么容易，但是，他们能够改变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变得越来越认同。这里，“认知失调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入伍适龄青年会比年长的人更支持那场战争，为什么男人要比女人更支持那场战争。有些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由于有儿子卷入了越南冲突常常也会构成一小部分越战的支持者，然而，这一小部分人是个例外，鸽派人士遍布文化较低的国人之中。^[18]

至此，读者们会急于知道，为什么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反而更倾向于鹰派。有两个社会因素——每一个都与学校教育有关，都可以说明为什么受过较高教育的美国人会支持越战。第一个因素可以用“忠诚”(allegiance)这个词来概括。受过较高教育的成年人更容易成功，收入也更高，这固然是因为，学校教育会带来好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父母的收入越高，子女就能得到越好的教育。何况，父母会直接向子女传递财富与教育。然而，在美国，成功人士通常并不认为自己仰仗父母的门第。他们常常把自己的成就解释为由于自己的个性特质，因此，他们视美国为精英社会。他们取得了自己的成就，其他人也能有自己的一杯羹。受过较高教育的小康阶层倾向于认为，美国社会是开放的，人人都可以融入社会，因此他们赞同社会的各种决策，感到自己参加了各种决策的形成。他们对我们的社会及其决策有更多的认同感。这里，我们可以用“既得利益”这一术语来形容这种现象，但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指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利益与需求——我们需要承认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仅是承认经济上的自利。在这个意义上，受过较好教育的成功人士的一个既得利益就是，相信这个为自己带来

教育与成功的社会是公正的。结果,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居于前三分之一的那些人,很可能表现出对社会的忠诚,而那些居于后三分之一的人则更可能成为社会的批评者。 350

另外一个导致受过较高教育的成年人更支持越战的因素可以用“社会化”(socialization)这个醒目的术语来概括。长期以来,社会学家一直认为,学校是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的社会化机构。在这一语境下所说的“社会化”并不指大家端着大潘趣酒杯开怀对饮,而是对个人融入社会所必需的基本社会准则——语言、规范、礼仪——的学习和“内化”(internalizing)的过程。社会化主要还不是一种认同。不是我们被说服不要随地大小便,而是我们不应该那样做。即便没有哪位权威人物藏在背后逼着我们那么做,我们也会“内化”并遵循这一规则。教师们试图说服自己,教育的主要功能是鼓励疑问,而不是鼓励模仿,但事实上,学校在社会化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至少在中学如此,而在大学,这种作用也几乎不会消失。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化过程告诉人们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并要求人们身体力行。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化过程导致学生单纯地去接受社会的善的一面。美国历史教科书公开告诉我们应该为美国感到骄傲。学校教育越强大,社会化也就越强,个人就越有可能认为美国是好的。

忠诚与社会化都导致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相信美国所做的都是对的。公众舆论调查说明,很多结论都是未经思考得出的。在1966年晚春,就在美国开始轰炸北越的河内和海防港前,支持与反对轰炸这些目标的美国人各占一半。但轰炸开始后,85%的人支持那场轰炸,只有15%的人反对。这一突然的转变是政府做出轰炸决策的后果,而不是原因。当决策向反方向转变时,忠诚与社会化也随之发挥作用。1968年,战争热情逐渐降温,但是,反对停止轰炸的人仍有51%,这部分就是因为美国仍在轰炸北越。一个月后,约翰逊总统宣布停止轰炸,这时,71%的人支持停止轰炸。这样一来,有约23%的人在一个月之内随着政府决策的改变而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这种思想随着政府决策的摇摆性,在人们关于很多问题——从我们的太空计划到环境政策——的态度上都有所反映,也证明了所谓“沉默的多数”是一群不爱思考的多数。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在这些“墙头草”们中为数不少。^[19]

我们喜欢把教育设想成各种有思想的学习过程的结合。然而,在我们这个社会或其他任何等级社会中,忠诚与社会化是学校教育的本质作用。诸如卡斯特罗这样的社会主义领袖曾在古巴大力推行教育,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受过教育的人是社会化的人和忠诚的卫士。在这些国家,教育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它鼓励学生去相信社会是好的,而不要去思考社会问题。美国历史格外值得称颂,这 351

种说法其实没有为人们提供理解各种社会问题的方法,这类问题,如越战、贫穷、不平等、国际贫富差距、环境恶化、性别角色的改变,其实都有历史根源。因此,我们可以设想,美国人在历史方面接受的传统的学校教育越多,就越不理解越战等各种有着历史根源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在越战问题上更倾向于鹰派的原因。

一些人提出,越战是个特例。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认为,它是一场共和党人的战争,而共和党人的平均教育程度要比民主党人高,这才是为什么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更容易成为鹰派的原因。这种看法在几个方面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相比我们历史上的其他战争,越战更是一场两党联手的战争。约翰·肯尼迪是民主党人,他派出了第一批士兵;林登·约翰逊是民主党人,他派出了最多的一批士兵。其次,当民主党政府发动那场战争时,受过较高教育的美国人比受过较低教育的人更支持战争。最后,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更支持战争,这方面的例子不只是越战,皮尤信托基金会(Pew Trust)关于伊拉克战争所做的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比如,2004年8月,三分之二的美国大学毕业生支持美国在伊拉克驻军的时间要“长得足以带来稳定”,而61%的不到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则支持“尽快撤军”。^[20]

表二提供了又一份受过教育的有钱人不爱思考的例子:他们搞错了是谁在支持战争。在填写表一的几百名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当中,在受过较高教育的美国人是否更趋鸽派这一问题上,肯定者与否定者的比例甚至达到九比一。这样,这项“越南试验”说明精英阶层犯了两个错误。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在1966年、1968年以及1971年,他们都曾过于好战。他们犯的第二个错误表现在对表一的填写上。

为什么在记忆或推断谁反对越战这个问题上,我的调查对象会犯如此错误?一个原因是,美国人愿意相信,学校教育是一个好东西。大多数美国人自然地倾向于把受过教育与见多识广或者性情宽容等同起来。^[21]传统的社会课与美国历史课的承担者们紧抓这一信念不放,以证明自己的事业的合理性。同时还声称,历史课能够带来更多的开明公民。在我的“越南试验”的那些答卷中, 352 一些人硬说这种试验只对越战有效,或者,它之所以有效,只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担心自己不得不上战场。这些人实际上仍是在维护自己的信条——教育能使人聪明。但我的这项“越南试验”表明,相反的观点更可能是正确的。

读者们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愚弄的。他们会想起,受教育的人过去是、今天也更容易是共和党人,而中学都没读完的人更有可能成为民主党人。那些鹰派右翼

共和党人,包括巴里·戈德华特^①1964年总统竞选以及罗纳德·里根1980年总统竞选的那些核心支持者,以及像约翰·伯奇协会^②这类组织,很多都是我们社会中那些受过最好教育、最有钱的人,特别是牙医、内科医生。因此,教育与鹰派倾向有关,对此我们不应该奇怪。在社会分层谱系的另一端,虽然大多数非裔美国人与大多数白人一样,一开始支持美国干涉越南,但是黑人一直比白人更持怀疑态度,更具鸽派倾向,而非裔美国人领袖如:穆罕默德·阿里、马丁·路德·金以及马尔科姆·X,在早期的反战分子中表现突出。^[21]

美国历史教科书忽略或贬低工人阶级中的进步因素,有助于自己去论证“安全帽”^③们的盲目爱国主义。教科书并不告诉人们,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及某些工人阶级互济会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而很多商业会所及乡村俱乐部一直是局限于白人的。很少教科书讲到劳工组织在民权运动中,包括在1963年的“向华盛顿进军”中的作用。不过,我的受访者中很多人都知道,受过较好教育的美国人更有可能成为共和党人、国防部里的强硬派,以及右翼极端主义者。我的一些受访者还知道,支持戈德华特当选总统的穆罕默德·阿里却拒绝应征入伍,知道伯奇主义者与教育的关系,或者劳工联盟与战争的关系。这些知识本来有助于他们准确地填写表一,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想过要用这些知识。大部分人在填写表格时很茫然,不使用他们所知道的东西。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导致了他们不能思考。^[23]

在讨论社会问题时,这种不思考的现象最易出现。《发现美国历史》劝勉学生:“美国公民的一项主要责任就是用头脑去分析问题和解释事件。”但我们的教科书在这一点上十分可悲。“越南试验”表明情况其实多么糟糕。在每年秋季,特别是在上一年级的课时,社会学教授们对学生们,特别是来自中上层白人家庭的学生们所展现的思考水准深感震惊和沮丧。这些学生不能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 353
现在,对历史事件的起因知之甚少,因此不能够对社会生活进行有条理地思考。套用一下朱尔斯·亨利的说法,我们可以用“社会愚蠢”来描述这类无逻辑的思维及其得出的那些结论。

“社会愚蠢”在21世纪仍在延续。比如,2005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62%的共和党人同意如下说法:“今天的穷人活得轻松,因为他们可以从政府受益,但又无需任何回报。”27%的民主党人也同意此观点。这些现象只会发生在那些既没

① 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家,是1964年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② 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二战后美国出现的一个极右政治组织。

③ “安全帽”们,在此指经常头戴安全帽的工人阶级。

与穷人交谈,也不考虑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现实,却自以为很了解他们的人身上。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更容易不假思索地得出这一孤陋寡闻的结论。^[24]

在其他课程的学习中,教育并没有这种影响。数学课上得多的人就比上得少的人对数学更精通。英语、外语以及几乎所有其他的学科,也都如此。唯独在历史课程中,课上得越多,人反而越愚蠢。为什么受过教育的人常常对这个社会提出特别荒谬的推论呢?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出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利益。上层以及中上层社会的人醉心于这样一种社会观——要重视学校教育,使之成为解决不宽容、贫困乃至战争问题的途径。这些人对教育以及教育的影响所持的这样一种乐观态度,导致他们不去考虑其他社会体制也还需要进行重要的改革。这一观念一定程度上在我们的社会蔓延,学生们自然就会认为教育是好的,并且指望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会对越战看得更加透彻。

而且,对教育的高估还会助长我们所称的“美国人的个人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使得人们对一个标榜机会均等或者说致力于机会均等的社会保持淳朴的想象,学生们认为存在着机会均等。正是从这一点上,他们谴责未受教育的人活该贫穷,就像我的那些受访者会谴责这些人在越战问题上倾向鹰派一样。那些不穷的美国人发现,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是一个令人惬意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可以让人把自己在社会上的成功解释为个人一步步奋斗的结果。这使他们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哪怕是一丝骄傲,而不会感到羞愧。把成功归因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会威胁到他们的那些美好感受。他们认为自己在教育上的成就与事业上的成功来自于雄心加努力,即认为自己的特权是靠奋斗得来的,这确实是令人愉快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工人阶级与下层人民也接受关于社 354
会与学校教育的这种主导性的伦理观。通常,那些从事没有出路的工作的工人阶级会抱怨自己,认为关键问题是自己以前在学校就不优秀,觉得自己在一些基本方面低人一等。^[25]

学生们之所以接受教师与教科书在历史课与社会课上告诉自己的关于这个社会的那些东西,当然还有一些暂时性的原因。他们要考这些东西学好这些东西是学生们的利益所在。讨论的确能焕发热情,但是无助于升级,甚至会扰乱课堂秩序。而且,记住了某些东西,也会给人带来成就感,哪怕那些东西毫无用处、毫无意义,就像大多数历史教科书在每章之后的两页里所布置的问题及其确凿无疑的答案一样。学生们如果发现真实的历史尚含糊不清,发现历史学家之间存在着争论,或者如果被要求把从历史中得到的认识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他们就会有失落感。他们会抵制改变教学计划,特别是当新的教学计划要求他们做更多的工作,甚至是一些较少提示的工作,而不是单纯的“名词解释”时。经历了

多年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后,学生们已变得习惯了,他们没有经历过其他的学习方式,也不能从中受益。^[26]

长期以来,这样去“学(背)”历史的确不令人满意。大多数历史教科书以及很多中学历史教师没有给学生带来热爱或感激这门课程的理由。学生们对自己的历史课提出的恶劣评价是一个警告信号。^[27]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劝告学生要喜爱历史。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大多数历史课堂上的那些可悲的教学现状就无法改变。当学生们找到了学习历史的关键,当学历史对他们似乎很有趣,也很重要,当他们相信历史或许关系到自己的生活与未来时,他们就会去学习历史。当他们的老师与教科书停止向他们说谎时,学生们就会觉得历史是很有趣的。

注释

[1] *Scopes trial transcript, excerpt at “Day 7”* at law.umkc.edu/faculty/projects/trials/scopes/day7.htm, 9/2006.

[2] Jules Henry, *Culture Against 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3), 287.

[3] Jungle Brothers (“丛林兄弟”), “Acknowledge Your Own History,” c. 1989. 这个非裔美国人说唱音乐组合称历史为“他的历史”(HIS story),即“男人的历史”。

[4] Greg Murry, e-mail, 2/2001.

[5] Linda McNeil, “Defensiv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Control,” 载 Michael W. Apple and Lois Weis, eds.,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School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28-41.

[6] Robert B. Everhart, “Classroom Management,” in Apple and Weis, eds.,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Schooling*, Ch. 7.

[7] 或许, Diane Ravitch and Chester E. Finn Jr., *What Do Our 17-Year-Olds Know?*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以及“国家地理学会”(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出版的 *Geography: An International Gallup Surve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988), 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它们驳斥了中学毕业生不懂历史与地理的说法。另见 Allen Bragdon, *Can You Pass These Test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129-40, 该书对1976年与1943年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全国教育进步评估中心”(National Assessment for Educational Progress)也对美国1994年与2001年中学高年级学生的美国历史知识状况提出了批评,然而,他们也看到了进步:在这12年间,“优”与“良”的分数所

占的比例从 12% 上升到 14%。“U. S. History 2006” at nces. ed. gov/nations reportcard/ pdf/ main2006/ 2007474_1. pdf.

[8] Ravitch and Finn, *What Do Our 17-Year- Olds Know?* 49.

[9] W. K. Haralson, “Objections [to *The American Adventure*]” (Longview, TX: n.d., typescript, distributed by Mel Gabler’s Educational Research Analysts, 1993), 4.

[10] John Goodlad, *A Place Called School* (New York: McGraw-Hill, 1983), 该书指出:“在他与合作者所考察的那些课堂上, 根本就缺乏感染力——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对那些课堂的评价只有一个词——平淡。

[11] Washington, D.C.: PBS *Frontline* video, 1985.

[12] A. B. Hodgetts and Paul Gallagher, *Teaching Canada for the '80s* (Toronto: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1978), 20.

[13] John Ogbu, “Ra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ducation,” 载 Gail E. Thomas, ed., *U. S. Race Relation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New York: Hemisphere, 1990), 27-30.

另见 Herbert Kohl, “I Won’t Learn from You!” in *I Won’t Learn from You and Other Thoughts on Creative Maladjustment* (New York: New Press, 1994), 1-32.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Report 1: 1969-1970 Science* (Washington, D.C.: NAEP, 1970) 表明, 在科学方面, 黑人与非黑人方面的差距较小。

Jean Fair, ed., *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ocial Studies Evaluation*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1975), 56, 63-64, 77-82, 显示, 在社会

课上, 黑人与非黑人之间的差距较大。Richard L. Sawyer, *College Student Prof les: Norms for the ACT Assessment, 1980-81* (Iowa City: ACT, 1980), 为英语、数学、社会及自然这四个学科领域的成绩制定了不同标准, 依据是收入、种族, 等等。

[14] Jeffrey Fouts, “Female Students, Women Teacher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Social Studies Classroom,” *Social Education* 54 (11/ 1990): 418-20.

[15]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When Ethnic Studies Are Un-American,” *Social Studies Review*, no. 5 (Summer 1990): 11-13.

[16] Martha Toppin, “I Know Who’s Going with Me,” *Social Education* 44 (10/ 1980): 458.

[17] 关于 Clifford, 见 Tom Wicker, “An Unwinnable War,” *New York Times*, 6/ 12/ 1991; 关于 McNamara, 见 Jonathan Mirsky, “Reconsidering Vietna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0/ 10/ 1991, 44. The Gallup poll, 11/ 1986, 发现 71% 的人同意(不包括“不知道”), “越战远不止是一半的错误, 它犯下了根本性的错误, 在本质上是道德的。”1984 年 8 月, Roper 组织问: “这个国家所做的——发动越

南战争——是对的,还是错的,或者介于二者之间?”65%的受访者回答“错误的”。既然17%的人回答“介于二者之间”,5%的人回答不知道,那么,不认为战争是正确的人就占83%。由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大众中有这样一个比例的人群在说越战是错误的,再考虑一下美国发动了那场战争,并且里根与布什总统还为之辩护,这些都表明思想的对立与独立。

[18] William L. Luch and Peter W. Sprelich,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in Vietnam,”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2 (1979): 33–34. Leon Festinger,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1957). Festinger 的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二战期间的大学男生明知道自己要走向战场,但仍比那些电气或焊接技师们——这些人知道自己将因为需要留在军工厂里工作而被缓征入伍的——支持战争。两种人的观点都与自己可预见的、无法改变的未来相关。

[19] John Muelle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Wiley, 1973), 70–74; Harris poll reported in *Boston Globe*, 7/14/1969,其中关于对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支持率;另见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ommon Defense*, 235–39.

[20]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Now Driven by 9/11 and Iraq,” Pew Trust survey, 8/18/2004, pewtrusts.org/ideas/ideas, 10/2006.

[21] 大学生特别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他们“选择”(在他们的父母及其身份地位的影响下)了接受大学教育。用“认知失调”的理论看,他们容易认为大学生生活会使人受益,并得出结论,教育带来宽容和智慧。很多美国人视学校教育为医治种族不平等、环境、贫困等问题的万能药。

[22] Richard F. Hamilton, *Restraining Myths* (Beverly Hills: Sage, 1975), 118,159; Luch and Sprelich,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in Vietnam,” 35–36.

[23] 《美国的传统》收录一幅照片,图中一些戴着安全帽的示威者支持尼克松的越南政策,这是在鼓励文中的那种错误思考。“谁属于‘沉默的多数’?”《美国的传统》问道,它所指的就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希望之地》同样声称,受过较低教育的人中有一股针对“那些领导着和平运动的学生”的逆反力量,这种力量继续支持尼克松的越战。

[24] Pew Research Center(皮尤研究中心)发言人对2005年调查的总结,电话访谈,5/7/2007.

[25] Richard Sennett and Jonathan Cobb,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2).

[26] 见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41).

[27] Robert Reinhold, Harris poll, 载 *New York Times*, 7/ 3/ 1971, 引自 Herbert Aptheker, *The Unfolding Dram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8),146; Terry Borton, *The Weekly Reader National Survey on Education* (Middletown, CT: Field Publications, 1985), 14, 16; Joan M. Shaughnessy and Thomas M. Haladyna, "Research on Student Attitudes Toward Social Studies," *Social Education* 49 (11/ 1985): 692-95; Mark Schug, Robert Todd, and R. Beery, "Why Kids Don't Like Social Studies," *Social Education* 48(5/ 1984): 382-87.

结束语

未来的谎言——兼论我们该如何应对

355

收集自己不需要的事实,束之高阁,若有恰当时机再付诸运用——没有人会这么干。人们只会是首先为一个问题所困扰,然后充分利用事实去寻找答案。

——查尔斯·塞勒斯^[1]

一旦你学会了如何提问——提出相关的、恰当的、实质性的问题,你就学会了如何学习,也就没有人能阻止你学习自己想要或者需要学习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①、查尔斯·魏因加特纳^[2]

不要好为人师,以此来填补自己的虚空。唤醒人的好奇心吧。把脑子打开就够了,而不是要把它填满。

——阿纳托尔·法朗士^[3]

人类的未来寄希望于一些终于懂得生命的意义,并担负起全部生命的责任的人。

——小维内·狄劳瑞^[4]

如果美国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注意到了本书前十一章指出的那些问题,那么教科书里就不太可能出现、教师也不太可能教那些歪曲我国历史的、站不住脚的、不充分的内容。当然,本书也并不完美。比如,它很少提到西班牙裔的历史。然而,我们的教科书中的“盎格鲁中心论”如此严重,以至于可以说它们就是一部新

^①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 1931-2003),著名文化学者和社会批评家,其《童年的消逝》畅销世界。

教徒的历史。^[5]在美国妇女史以及性别史方面——这是两个相关但完全不同的领域,情况又如何呢?《老师的谎言》一直提到了这两个话题,但是对于教科书是如何展现这两个问题的却没有做出深刻的批评。^[6]下一个谎言会是什么呢?以后 356 的历史景点、纪念碑、博物馆的展览、电影所塑造的美国历史人物、电视连续剧或者历史小说,都有可能传递更多的错误信息,至少,它们对问题的论述还会是不充分和有偏见的。那么,对于这些未来的谎言,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答案并不在于扩展本书的内容去修正传统历史教学中的每一处歪曲与错误,更不可能去讨论将来有可能出现的谎言。这种做法只会把我变成仲裁人——我只是一个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将各种久远传说当作历史事实来接受的人。^[7]相反,正确的做法在于,所有的人都要变成——用波兹曼与魏因加特纳的那个粗话来说——“垃圾检测器”^[8],即变成有判断力的学习者,对各种观点与证据进行筛选,然后做出理由充足的判断。到那时,我们就学会了如何去学习,就像波兹曼与魏因加特纳所说的,没有哪本一边倒的教科书或教科书书评能够迷惑我们。

为此,学校必须帮助我们学会如何就我们的社会及其历史提问,学会如何自己寻找答案。在这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上,大多数美国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课程都不幸失败了。

问题部分出在教科书的写作方式上。由于试图包容太多的东西,教科书——至少当前出炉的那些教科书——就不能够有效地为学生提供问题与争论,因此也就不能提供历史观点,以及相应的通过运用逻辑、整理事件去证明历史观点的技巧。问题还在于提不提某些事件上。即便教科书贬低那些卡在我们历史脉络上的神话,学生们也不会对他们的历史教科书提出哪怕一丝反驳。^[9]他们忘记了那个与这一神话模型不符的事实,因为那种事实不符合这一强有力的模型。历史教科书与历史教师要有效地顶住这些模型开展教学,还必须做出特别的努力和耗费大量的时间。米尔恰·伊利亚德曾提到,“集体记忆不能记住历史事件,除非它把那些事件转化进某种模型。”^[10]要想记住事实,就必须为事实赋予与我们所说的谎言相同的神话意义。

由于这一原因,当一些教师要我推荐教科书时,我发现自己无言以对。或许,没有哪本传统教科书能够用历史来武装我们,而是用历史来烦扰我们。

那么,该怎么办?

上两章勾画出一幅自上而下的谎言产业链的图景,其中涉及各种教科书委员会、出版商、作者、教师、学生以及民众。这幅图景或许是令人心寒的。然而,它 357 也告诉人们,可以从这个链环的某个位置去突破。下面几段论述特别针对教师而写,教师可以在教科书没变的情况下有所突破。我们当中的那些置身教室之外的

人可以支持教师将教学改革的方案付诸实践，从而共同改变历史课程的教学方式。

图1 联邦军队路过石泉

联邦军队路过石泉

在1863年5月3日占领柳泉之际，联邦军队的麦可克拉南德将军派侦察队打探通向杰克逊的路线。这支骑兵途经石泉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们聚集在路旁，静静地观看。

5月5日，奥斯特豪斯将军的小分队在石泉做短暂休整，这里是他们通往大沙漠的必经之路。次日，霍威将军的小分队到达这里过夜。5月7日，格兰特将军开始向密西西比南部铁路线疾驰。5月16日，埃文将军带领一个旅路过此地，袭击了格兰特的军队。北方佬们从没走远。在这段时间，4万5千名蓝衣入侵者以及无数车辆在这条大路通过。

在美国各地，路标、纪念碑、城堡、船舶、博物馆，都在歪曲历史。拙作《谎言遍布美国》批评了100个这类景点。上图的路标启发了我写作初版《老师的谎言》，我在那本书中批评了这个纪念牌。像很多内战时期的路标与纪念碑一样，它错误地将南方人说成是一个支持联盟的整体。事实上，1863年，由于密西西比西南部黑人居民（以及某些白人）的支持，格兰特才能够放弃自己的供给线，从南部和东部攻打维克斯堡。这块路标上写有“人们”二字，但格兰特的军队所遇到的“人们”大多数还是非裔美国人，他们对这些“蓝衣入侵者”的反应是，为他们提供食物，给他们指引通向杰克逊的最好的路，准确地告诉他们联盟军队在哪里。

到2000年，或许是因为我的那本书的缘故，这块路标被移去了。密西西比州历史与档案局并不承认知道所发生的事，但是这块牌的确不再立在密西西比的西南部了。如果让一个班级的学生去检查一下自己社区的各种路标和纪念物，判断一下哪些是最不准确的，那将是非常不同的教学设计。那样，学生们可能会提议在那个纪念物旁再竖一块牌，以矫正其中的偏见，他们甚至会自己攒钱把这块牌竖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或许会震惊于某些影响历史记忆的力量，特别是当它们出现在景点中时。

第一个突破点应该在形式方面：我们引导学生关注的话题应该少而精。对于现行教科书中那些闹哄哄的数千个话题，学生们不可能逐个找到一手或二手资料去讨论。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关注较大的画面，如：哥伦布1493年远征对海地与西班牙的影响，以及后来对美洲、欧洲、穆斯林世界和非洲的影响，而不是让他们记住一些名字，如：亚美利哥·维斯浦奇^①、乔瓦尼·维拉扎诺、庞塞·德莱昂、Hernando 德·索托等等，或者记住某段讲述这些人据说曾做过的事的话。在这类重

① 亚美利哥·维斯浦奇 (Amerigo Vespucci), 15-16 世纪意大利航海家，发现了亚马逊，美洲大陆 (America) 以他的名字命名。后文中几位也是同时代的欧洲航海家。

大问题上,联系着如此多的细节。我怀疑学生下课后究竟是记下了这些细节,还是只不过回忆起某些似是而非的描述——如果他们回忆的话。当然,学生们对自己曾做过的题目以及自己所讨论过的问题,都会印象较深。很多教育工作者已经在实施一些不注重“背课本”的教育方法,为其他教师树立了榜样。^[11]

减少话题,学生们就有可能去钻研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如果想让学生们懂得历史不只是答案,这样做就是绝对必要的。一个人所得到的答案部分取决于他所问的问题,而一个人所问的问题又部分取决于他提问的目的,以及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或许,并非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都得出同样的结论。教师需要让学生习惯这样的立场:学生之间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是正常的,只要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严肃的历史研究之上,即争论是基于证据之上的。人们有权利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不能硬说自己所说的就是事实。证据必须是被引用的,而非被炮制的,不以证据为基础的观点不能得到过多的重视。学生们如果研究过对立的两派观点,就会发现哪一方的命题与问题是有事实依据的,哪一方的命题与问题包含的是基本的价值与推论。学生们的立场应该得到尊重。当然,这并不是说,教师就应该让步,退到时下所流行的一种说法:各种观点都是同等适当的,任何观点都没有贴上“真理”标签的特权。^[12]

要帮助学生独立学习,教师们并非必须无所不知。他们可以像见多识广的图书馆员那样,指导学生去阅读各种书籍、地图,走访那些可以回答其历史问题的人。资料是现成的,教师们可以用第一手资料去创造性地教历史。^[13]

或许,最好的资料就在身边。学生们可以咨询自己的家人、社区里的各类居民、地方机构的负责人以及老年公民。^[14]一些历史课已经编纂了口述史料来说明大萧条如何影响了他们所在的市镇,以及废除种族歧视如何影响了他们所在的学校。密西西比州的一些中学生出版了一本《基于自由的思想》,讲的是本社区的民权运动。^[15]马萨诸塞州的一些学生“成为”历史人物,并出版了自己的作品。^[16] 359 学生们自己的知识创新是激动人心的,也最能锻炼人的能力,即便它们的产品只是躺在学校图书馆里。学生们或许还会建议为自己的学校或社区设立新的历史景点。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往往没有在地面上留下痕迹,而一些景点纪念的却是19世纪第一长老会的所在位置。在一所中学校园里,什么才是重要的事件,值得设立纪念物呢?哪些毕业生“应该”被纪念呢?什么创造了历史?从广义上理解“创造历史”有必要吗?本地的一些街道和建筑物的名字所纪念的那些人,其行为在今天是不是有待矫正?比如,密西西比州的罗斯·巴内特水库纪念的是一位种族主义州长,他曾试图把非裔美国人限制在密西西比大学的校门之外。谁值得纪念?为什么纪念?如何纪念?提出这些提问会把学生引入重要的问题,如果他们

的答案各有不同,那就更好了。

从现实回溯历史的教法也会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教师可以提出关于中学高年级学生的各种生活机遇的现实统计,从种族、性别、社会阶级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分析他们将来可能取得的不同程度的教育成就、可能遇到的离婚、坐牢、凶杀等问题,以及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参加选举的频率等等。这样,学生们才会就那些导致如此大差异的历史事件与过程展开讨论。

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们去批评手头的教科书。每个学生都可以找出自己认为写得糟糕的问题,或者整个班级共同讨论某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五章讲到一位伊利诺斯州的教师告诉学生林肯之前的大多数总统都是奴隶主,由此引起学生的骚动。学生们后来相信这位老师说的是对,这时他们对自己的教科书感到愤怒了——这本书花了大量篇幅去讲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杰克逊等人,但只字不提他们都有奴隶。他们联名写信给该书出版商及那些据说是作者的人。“作者”们一直没有回音,但是出版商让人写了一封委婉的回信,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出版物做出有益的反馈”,并向他们保证:“我们一直在努力改进我们的产品”,最后指出,这本教科书其实有好几页写到了民权运动。“这与我们的批评有什么关系呢?”学生们叫道。我们可以推测,这个答复的意思是:“那场运动是‘黑色的’,难道不是吗?”这件事情带有一种“双赢”的结局。如果学生们收到的是有思想的回答,对方在严肃地讨论所提的问题,那么学生们就对该书的再版改进提供了帮助。如果学生们得到的是一种套话式的答复,就像伊利诺斯州的这些六年级学生所得到的那样,那么,他们就能认识到,在这个出版机构里,没有人是内行,因此自己最好从此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这本书。

即便教师不对教科书提出挑战,学生们以及我们其他人也都是潜在的改革动力。非裔美国学生曾积极地向几所市区学校的管理机构施压,要求改革历史课程。在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市1908年的种族骚乱期间,有人试图使该市成为全白人的“日落之镇”。当时,有两名白人六年级女生发起了一项“国家历史节”的提案,敦促该市创立“种族骚乱步行街”,以示致歉和纪念。两名美国中学土著学生敦促明尼苏达州不再将“丝裤”这一对美洲印第安妇女的蔑称作为那一景点的官方命名。在美国各地,学生们对抗那些拘泥于书本的教师,用从《老师的谎言》中看到的内容向他们发起挑战。一位学生就曾对我说:“我一直在用你的书从教室后排向我的老师发难。”

不论是对待不好的教科书、看历史电影,还是参观博物馆展览,学生们——以及我们其他人——一定得学会如何正确对待素材。对于这些素材,要注意问五个问题。^[17]

第一个问题是,它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写的(或者画的,等等)?我们要注意可能的读者(参观者)所属的社会结构。我们要考虑创作者试图通过这些读者(参观者)达到什么目的。这就是社会学家们所称的“知识社会学”的一种。英语教授们称之为“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探究文本的社会语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历史编撰学”——研究历史的写作。“历史编撰学”这一概念与这一术语可以讲给四年级这样低年级的学生听,这有助于他们成为有批评能力的读者和思考者。^[18]

第二个问题,仍是历史编撰学的问题,它代表的是什么人的观点。说话者、作者等人在社会结构中居于什么地位?那一观点服务于什么样的利益、什么人,或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谁的观点被忽略了?学生们或许会尝试以一种不同的观点重写历史,并懂得历史难免会带有偏见。

第三个问题,那些论述可信吗?假定处于同样的形势之中,经历同样的社会化过程,那么每个群体的行为都会那么恰当——就像我们可能这样吗?这种研究还要求考察著作是否存在内在的矛盾,它前后一致吗?它的某些结论是否与其他结论相冲突?比如,如果教科书强调美国在拉丁美洲的表现总体上是有益的,那么,它们如何解释这一地区的反美国佬情绪?

361

第四个问题,那些论述有材料支撑吗?或者,其他作者是否不同意那些论述?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到第二手的历史与社会研究文献面前。比如,只要粗略地看一下那些关于其他国家社会阶级的研究,就足以驳倒教科书关于美国是无可比拟的机遇之地这一乐观论调。

最后一个问题是,在读到那些文字或看到那些图像之后,一个人对被那样展现出来的美国可能会作何感想呢?这类分析还包括考察作者对文字与图像的选择。“我在历史书以及日常讲课中所使用的那些词语就像精神上的深度充电,”詹姆斯·阿克斯特尔写道,“当它们渗入(我们的思想),爆炸开来时,它们所包含的共鸣力量得到释放,那些累积起来的意义与联想的碎片会劈头盖脑地向我们的各种认识浇灌下来。”^[19]

读者们只要心中牢牢记住这五个问题,就能学会如何学习历史。

教师与学生并非改革的唯一点。一些新的因素也使教科书改革变得可能。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以及其他州,右翼保守分子仍在影响着教科书的采用,很多其他州今天也依然如此。比如,从1985年开始,德克萨斯州强迫一些出版商更加如实地对待进化论,在提到土著美国人时,避免使用诸如“采取敌对行为”等词语,在合适时还要在“南方人”前面要加上“白人”字样。^[20]这样,在黑人民族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右翼分子、“第一条修正案”团体等之间会形成抗衡之势,

这为作者与出版商提供了新的施展空间。

教育的消费者——学生、教师、家长以及感兴趣的公民——呼唤风味独特的教科书,要求历史书籍能够调动人的胃口。根据迈克尔·华莱士的说法,美国人已为此做好了准备。人们普遍地“对死记硬背感到愤怒了,并且急于知道更多的东西,”他声称,“在一度似乎沉浸于《飘》的文化中,《根》取得了胜利;这就是一个好的例子。”^[21]就此而言,初版《老师的谎言》的成功就是另外一个例子。

这些都需要时间。我们已经开始理解自身及自身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历史起着核心的作用。我们需要培养所有阶级、所有种族背景以及不同性别的美国人都能掌握历史的力量——即用自己关于过去的理解去激励和证明自己当前的行动。这样,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人都将从历史中获得严肃的教益。历史不再只是令人厌倦的僵尸。成功的美国历史课所造就出来的“产品”们 362 了解美国社会的基本现实,懂得是历史进程塑造了这些现实。他们能够将自己置于社会结构之中,他们知道是某些社会的、以及意识形态的力量影响着自己的生活。这些美国人正在成长为公民,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对我们社会的变化发挥影响。他们知道如何检验历史结论,他们怀疑任何“真理”模型。他们会反对指责历史是无关紧要的学科,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历史影响现实——包括他们自身的现实——的各种方式。

托马斯·杰斐逊曾要求加强政治史教育,使美国人学会“如何自己判断哪些事物会保障、哪些事物会危害他们的自由”。^[22]杰斐逊是对的。公民就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他们愿意去识别谎言与曲解,能够运用材料判定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人将成为民主的强大力量。著名英国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写道:“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历史眼光,或因其历史学家枯燥的专业性(甚或非专业性)研究感到气馁,就会在思想上、很可能还在政治上被阉割。而且,这里所说的历史还必须是完整意义上的真正的历史。”经历了本书初版之前 11 年的研究与写作,^[23]以及初版之后 13 年的研究,我自己对美国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的探寻才刚刚开始。读罢掩卷,你也同样如此。祝你我都一路顺风!

注 释

[1] Charles Sellers, “Is History on the Way Out of the Schools and Do Historians Care?” *Social Education* 33(5/ 1969), 511, paraphrasing S. Samuel Shermis.

[2] 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ner,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New York: Delacorte, 1969), 23.

[3] Anatole France, 引自 Freeman Tilden,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7), v.

[4] Vine Deloria Jr., *God Is Red* (New York: Dell, 1973) 301.

[5] 实际上,在 20 世纪上半期,天主教学校用天主教书籍讲授美国历史;那些教科书特别强调比如乔尼帕洛·西拉神父(Father Junipero Serra),他曾于 18 世纪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传教团体。

[6] 我没有在某一章里讨论这些主题,原因在于,一直有人在做这些研究,如: Mary Kay Tetreault, "Integrating Women's History: The Case of United States History High School Textbooks," *The History Teacher* 19 (2/ 1986): 211-62; Glen Blankenship, "How to Test a Textbook for Sexism," *Social Education* 48 (4/ 1984): 282-83; Darrell F. Kirby and Nancy B. Julian, "Treatment of Women in High School U.S. History Textbooks," *Social Studies* 72 (9/ 1981): 203-7; *Social Education* 51, no. 3 (3/1987) 中的一篇不错的论文;以及更早一些的 J. W. Smith, *An Appraisal of the Treatment of Females in United States High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77), and Janice Law Trecker, "Women in U. S. History High School Textbooks," *Social Education* (March 1971): 249-60. Patricia Higgins 的文章也是令人深思的: "New Gender Perspectives in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Notes* 11, no. 3 (Fall 1989): 1-3, 13-15. 有两本书可以有效地引导人们去了解妇女史: Ruth Warren, *A Pictorial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 (New York: Crown, 1975), and Elizabeth Janeway, ed., *Women: Their Changing Roles* (New York: Times/ Arno Press, 1973).

[7] 如果你同意,给我写电子邮件: jloewen@uvm.edu, 以提醒我注意。要知道,我在这里所列出的那些忽略与歪曲之处都是偶然发现的;这正应验了陶格鲁大学社会学教授 Ernst Borinski 的话: "我没有学过的,我就不知道。"还要知道,如果我的语气过于确定,那么我的结论——无论是关于 1812 年战争的起因,还是关于民权运动的结果——都尚在变化之中。

[8] Postman and Weingartner,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这一术语在全书中经常出现。

[9] 他们的教师也不会。我所遇到的一些教师在讲授《美利坚民族的胜利》时,从来没注意到该书在“地平论”上有所出入,并继续向他们的中学生讲这一神话。一些大学教授也没有注意到那些与这一模式不符的事实。当我在亚特兰大的一所大学就“始祖移民”与瘟疫发表讲演时,一位历史学教授走过来,对瘟疫感到惊

说,并指责一些专著在论述殖民地历史时没有提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查看资料,结果证明我在瘟疫问题上所讲的是对的。而当他发现瘟疫问题在他所指责的那本教科书中其实已被提到时,更是惊诧不已。

[10] Mircea Eliade, *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 (New York: Pantheon, 1954), 46.

[11] 对于一些教师,可以从如下参考书着手。James Percoco,一位很不错的中学历史教师,写过两本小书: *A Passion for the Past* (New York: Heinemann, 1998) and *Divided We Stand* (New York: Heinemann, 2001)。他的一些建议可能对你们不起作用,但是有的有作用。David Kobrin 在其 *Beyond the Textbook* (New York: Heinemann, 1996) 中只提出了一些观点,但是每一个观点都讲得很深,指出了应该避免的那些缺陷。Stephen Botein et al., *Experiments in History Teaching* (Cambridge: Harvard-Danforth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1977) 提供了一些中学、大学或社区教师所提出的课堂训练和研究课题。Gary Smith et al., *Teaching About United States History* (Denver: Center for Teach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8), 以及 Clair Keller, "Using Creative Interviews to Personalize Decision-Making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ocial Education* 43 (3/ 1979): 271, 提出了各种学习方案的建议。John Anthony Scott 提出了一些不用课本教历史的方法,见 "There Is Another Way," *AHA Perspectives* 29, no. 5 (5/ 1991): 20-22; 参 Gary Nash, "Response," 21, 23, 对同一问题的讨论。 *Rethinking Schools* (1001 E. Keefe Ave., Milwaukee, WI, 53212) 提供了一个令人陶醉、有时又令人不安的具有全国意义的教育理念,以及一些关于密尔沃基市 (Milwaukee) 的教育政策的新闻。该书多次修订再版。还有四份期刊包含了对美国历史教师特别有用的思想: *The History Teacher*, *Social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The Radical Teacher*, and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313 McCracken Hall, Ohio University, Athens, OH 45701)。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History Education (地址是 Suite B2, 26915 Westwood Road, Westlake, OH, 44145) 发行了 Paul Gagnon 的那本重要著作, *Democracy's Half-Told Story* 以及其他一些材料旨在改进美国历史的教学方法。James Davidson and Mark Lytle's *After the Fact* (New York: McGraw-Hill, 1992) 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重要的历史问题。Social Studies School Service (PO Box 802, Culver City, CA, 90232) 的大目录列出了美国历史课的一些指定教科书,用这些教科书可以在课堂上自由而深入地讨论一些问题。

另外一种建议是同时使用两种教科书。这又导致很多问题,学生们会问,为什么它们不一致,因此,学生们会认识到,历史并不只是记下“史实”让学生去“背”。

甚至同一本教科书的两个不同版本也会起到这一作用,但采用差距很大的教科书会更有意思。在我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中,有几本探究型教科书,《发现美国历史》,以及《美国的冒险历程》与那些一般的叙述型教科书都迥然不同,但是它们都已不再出版。不过,学生们还是可以用学校图书馆里收藏的该书版本。Joy Hakim's series, *A History of 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93]) 可读性强,应该走进每一间教室。

更有趣的是用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去对比另一本与之很不相同的教科书。比如比较一下 Howard Zin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2005),——这是一部左派作品,以及 Clarence B. Carson, *A Bas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dley, AL: American Textbook Committee, 1986)——这是一部右派作品。或者,可以考察一下历史学家对某类人群或某类命题的强调,比如,下面原注 13 所列的那些问题。

在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以及各州的基金、大学、历史博物馆以及职业协会为历史教师举办的各种学术讨论会、研究会、夏季短训班中,也可看到一些新的思想。

我还希望,本书每一章第一次引用某个资料时在尾注里所提供的那些完整的引文,能够像独立的参考书目那样有用。

[12] *Using Taking Sides in the Classroom* (Guilford, CT: Dushkin, 1996), 该书引导教师如何使用 Dushkin 的那套丛书,提出了很多帮助学生提出关键问题以及处理观点冲突的技巧。该书已绝版,但是网络上常常可以下载到。另见 Bill Bigelow, ed., et al., *Rethinking Our Classrooms* (Milwaukee: Rethinking Schools, 2007)。

[13] *Jackdaws*, 这是一套第一手材料的小型汇编,由出版商 Jackdaw Publications (jackdaw.com) 出版。

还有几家教科书出版商出版了一些比它们出版的教科书更有趣的教师工具书。

网站 Teaching for Change (teachingforchange.org) 为历史教师提供了一个丰富而有用的资料目录。

Social Studies School Service 推出了 *Multicultural Studies Catalog*, 分类收集了妇女史、西班牙人史等的教学材料。

ERIC 数据库在大学图书馆里都能找到,它提供了数千种教学思想,我们可以在 CD-ROM 中通过关键词去查找,也可以在缩微胶片中去查找。有些文章还见于网站 eric.ed.gov。

美国文学也为美国历史提供了有用的关联,只要那些文学在历史上是正

确的。因此,R. A. Lafferty 的 *Okla Hannali* 提供了关于 19 世纪的丰富视角。

Anthro. Notes 是一份时事通讯,发行者是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Kaup, 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 Dept. of Anthropology, Stop 112,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20560), 中学教师可以免费读到,其中涉及前哥伦布时代的土著美洲人社会。

我自己 1992 年版的 *Lies My Teacher Told Me About Christopher Columbus* (New York:New Press, thenewpress.com) 旨在为 10 月初的课程使用,它告诉学生一些历史著述以及教科书分析方面的问题,还有大航海的问题。

Beverly Slapin and Doris Seale, *Through Indian Eyes*, published by Oyate 收录了 Michael Dorris 以及其他土著作家的诗歌与散文,列出了对各种书籍在印第安人问题的论述的评价,还有一份丰富的资料目录。

对于教师们来说,Gary Nash's *Red, White, and Black*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1974) 是处理美洲殖民地的种族关系问题的重要读物。

The Office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t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A&I Building, Room 1163, MRC 402, Washington, D.C., 20560) 推出了 *Teaching the Constitution*, 这是对其 1987 年“教育者座谈会”(Symposium for Educators) 的总结。它提出了用档案文件、研究项目使问题在今天更为生动,以及课堂上使用的参考书目。另见 *Teaching About the Bill of Rights* (Bethesda, MD: Phi Alpha Delta Public Service Center, c. 1987)。

黑人与白人的种族关系方面的历史书有:

适合中学程度的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by Langston Hughes and Milton Meltzer (New York: Scholastic, 1990) 以及适合中学高年级程度的 *Before the Mayflower* by Lerone Bennett (Baltimore: Penguin, 1966[1962]) 和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by John Hope Franklin (New York: Knopf, 2000)。

1994 年,一家名为 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 的出版社(823 United Nations Plaza, New York, NY, 10017) 推出了新版的 David Shiman 的 *The Prejudice Book*,并带有种族关系与性别关系方面的课堂练习。

James A. Banks 的很多书籍都有有益的思想,包括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Ethnic Studi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87) 以及 *Multiethnic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4)。另见 Carl A. Grant and Christine Sleeter, *Turning On Learning* (Columbus, OH: Merrill, 1989)。另一本书 *We Shall Overcome*, PBS *Frontline* video (1-800-328-7271) 讲到了美国反种族主义的海外影响。

The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1250 N. Pitt St., Alexandria, VA, 22314-1453)指出,教科书忽略了我们过去的宗教问题,于是出版了一套一手文献集:Charles C. Haynes, *Religion in American History*. 如它的副标题所讲的,它讲的是“教什么,怎么教”。

The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Project 的 *Who Built America?* (New York: Pantheon, 1989)有一套声像材料,在苹果机上用 CD-ROM 可以读到,从词条 Voyager (1-800-446-2001)进入,从中还可以读到鲜活的劳工史。

How Schools Are Teaching About Labor, 是一套连续出版物,发行者是 the AFL-CIO (815 16th St. NW, Washington, D.C., 20006),其中有一些教案和课堂用材料。

Labor's Heritage,是一份季刊,发行者是 AFL-CIO (10000 New Hampshire Ave., Silver Spring, MD, 20903)其中有教师指南,以及关于历史教学与使用地方材料的介绍。

Bill Bigelow and Norman Diamond 出版的 *Power in Our Hand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8)中有一些有趣的练习,可以帮助学生思考社会等级问题。

其他的材料或出版者还有(译文从简——译者按):

Jonathan Kwitny's *Endless Enemies* (New York: Congdon and Weed, 1984).
Lonnie Bunch and Michelle K. Smith, *Protest and Patriotism*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Office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I Building, Room 1163, MRC 402, Washington, D.C., 20560], n.d.).

The Center for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teachvietnam.net).

Brooke Workman, *Teaching the Sixties*, 1992,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ncte.org).

Teaching Tolerance 1, no. 1, 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400 Washington Ave., Montgomery, AL, 36104.

Civil Rights Teaching Kit.

Marge Piercy, *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 (New York: Fawcett Crest, 1977).

网站有: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loc.gov).

National Archives (archives.gov).

the Fisher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fisher.lib.virginia.edu/collections/stats/listcensus/).

the U.S. Census (census.gov/prod/www/abs/decennial/index.htm).

h-net.org.

History News Network (hnn.us/)

besthistorysites.net.

声像材料有:

Glory and Missing.

The Civil War, Eyes on the Prize.

Remember My Lai (PBS Frontline, 1-800-328-7271).

使用这些材料还要注意看一下 Linda Christensen 的文章 “Unlearning the Myths That Bind Us,” *Rethinking Schools* 5, no. 4 (5/ 1991): 1,15-16.

[14] Glenn Whitman 让他的学生学习地方史, 并著书解释了如何去做: *Dialogue with the Past* (Lanham, MD: Alta Mira, 2004).

[15] Rural Organizing and Cultural Center, *Minds Stayed on Freedom* (Boulder, CO: Westview, 1992). 另见 C. L. Lord, *Teaching History with Community Resource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67).

[16] Mark Hilgendorf, ed., *Forgotten Voices in American History* (available from Milton Academy, 170 Centre St., Milton, MA, 02186).

[17] Shirley Engle 告诉我, 其中的某些问题基于 Alfred North Whitehead 的著作, 是社会课教学改革的基础, 那就是“印第安纳经验”。见“Late Night Thoughts About the New Social Studies,” *Social Education* 50, no. 1 (1/ 1986): 21.

[18] 在第六章讨论亚伯拉罕·林肯致格里利的信时, 就是这么做的。

[19] James Axtell, “Forked Tongues: Moral Judgments in Indian History,” *AHA Perspectives* 25, no. 2 (2/ 1987): 10.

[20] Lee Jones, “Textbooks: A Change of View,” *Austin Star-Telegram*, 10/20/ 1985.

[21] Michael Wallace, “The Politics of Public History,” in Jo Blatti, ed., *Past Meets Present*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7), 42-43.

[22] 引自 Lewis H. Lapham, “Notebook,” *Harper's*, 7/ 1991, 12.

[23] 当然, 我还做了其他事情。

| 附录 |

以下所列书籍,前12本是我在写作初版《老师的谎言》时所考察的美国历史 435 教科书,后6本是我写作第二版《老师的谎言》时所补充考察的书籍。除特别注明外,本书所引材料均出自这些书籍。^①

1.《发现美国历史》Allan O. Kownslar and Donald B. Frizzle, *Discovering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4).

2.《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James West Davidson and Mark H. Lytle,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1).

3.《美国的传统》Robert Green, Laura L. Becker, and Robert E. Coviello, *The American Tradition* (Columbus, OH: Charles E. Merrill, 1984).

4.《美国历史》John A. Garraty with Aaron Singer and Michael Gallagher,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5.《美国的经历》Ira Peck, Steven Jantzen, and Daniel Rosen, *American Adventures* (Austin, TX: Steck-Vaughn, 1987).

6.《美国的冒险历程》Social Science Staff of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America, *The American Adventur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5).

7.《美利坚民族的胜利》Paul Lewis Todd and Merle Curti, *Triumph of the American Nation* (Orlando, FL: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8.《美利坚盛典》Thomas A. Bailey and David M. Kennedy, *The American Pageant* (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91).

9.《美国之路》Nancy Bauer, *The American Wa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9).

10.《生活与自由》Philip Roden, Robynn Greer, Bruce Kraig, and Betty Bivins, *Life and Liberty*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1984).

^① 原文书名按字母排序,译文书名按汉语拼音排序。作者还指出,其中《美国的冒险历程》与《发现美国历史》是“探究型教科书”,其他16本为“叙述型教科书。”

11. 《希望之地》 Carol Berkin and Leonard Wood, *Land of Promise*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1983).

12. 《自由的挑战》 Robert Sobel, Roger LaRaus, Linda Ann De Leon, and Harry P. Morris, *The Challenge of Freedom* (Mission Hills, CA: Glencoe, 1990).

1. 《合众国的历史》 Daniel Boorstin and Brooks Mather Kelley,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edham, MA: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5.)

2. 《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 Paul Boyer, *Holt American Nation* (Austin, TX: Holt, Rinehart & Winston [Harcourt], 2003).

3. 《美利坚：走向今天》(又：《走向今天》) Andrew Cayton, Elisabeth Perry, Linda Reed, and Allan Winkler, *America: Pathways to the Present* (Needham, MA: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5).

4. 《美国人》 Gerald A. Danzer et al., *The Americans* (Boston: McDougal Littell [Houghton Mifflin], 2007).

5. 《美利坚盛典》 David M. Kennedy, Lizabeth Cohen, and Thomas A. Bailey, *The American Pagea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6).

6. 《美利坚之旅》 Joyce Appleby, Alan Brinkley, and James McPherson, *The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Glencoe McGraw-Hill, 2000).

| 索引 |

(说明: 词条后的数字为英文原书页码, 即本书边码。)

- | | | | |
|--|----------------------------|--|-----|
| abolitionists, | 废奴主义者, | 172, 174, 177, 196, 202, 203;
另见: 约翰·布朗 (Brown, John) | 437 |
| Adams, Abigail, | 阿比盖尔·亚当斯, | 148 | |
| Adams, John, | 约翰·亚当斯, | 83, 150, 296 | |
| Adams, John Quincy, | 约翰·昆西·亚当斯 | 219 | |
| Afghanistan invasion, | 入侵阿富汗, | 264, 271-73 | |
| Africa, | 非洲, | 41, 42-43, 44-46, 62, 68, 142, 259 | |
| African Americans, | 非裔美国人, | xiv, 19-21, 135-36, 148, 149; 内战中的~, 176, 190, 194-95, 333; ~与印第安人, 125-26, 135, 151-52; 种族关系低谷时期(1890-1920)的~, 161, 163-65, 166, 167, 168-69; 重建期间的~, 156-57, 197-98, 200; 针对~的恐怖行径, 158, 159, 160, 165-67; 今天的~, 168-70; 另见: 民权运动 (civil rights)、种族主义 (racism)、奴隶制 (slavery) | |
| Afrocentric history, | 非洲中心论的历史, | 45, 344 | |
| Afro-Phoenicians, | 非裔腓尼基人, | 40, 42-45 | |
| Alamo, | 阿拉莫, | 152 | |
| Albany Plan of Union, | 《奥尔巴尼联盟计划》, | 109 | |
| Ali, Muhammad, | 穆罕默德·阿里, | 251, 352 | |
| Allende, Salvador, | 萨尔瓦多·阿连德, | 222, 231 | |
| al Qaeda, | 基地组织, | 265, 276 | |
| <i>America: Pathways to the Present,</i> | 《美利坚: 走向今天》
(又:《走向今天》), | 20, 122, 141, 180, 224, 231, 234, 249, 252-53, 265, 267, 316-19; ~关于黑白种族关系, 144, 148, 154, 180, 184, 188, 196 | |
| <i>American Adventure, The,</i> | 《美国的冒险历程》, | 247, 280-81; ~关于黑白种族关系, 144, 160, 169; ~关于哥伦布, 49, 51, 59; ~关于印第安人, 98, 123; ~作为“探究型教科书”, 331; ~关于接触外部世界之前的北美洲, 44, 96, 98 | |
| <i>American Adventures,</i> | 《美国的经历》, | 7, 80, 242, 247, 255, 281; ~关于黑白种族关系, 138, 181, 242; on Columbus, 48-49, 66 | |
| <i>American Dilemma, An,</i> | 《美国的困境》, | 161 | |

续表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rchetype of,	美国例外论,理论模型,	84,213
<i>American History</i>	《美国历史》,	83, 138, 153, 154, 335; ~关于黑白种族关系, 138, 161-62,240; ~关于印第安人, 97-98, 104, 107, 324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	美国印第安人运动	132
<i>American Journey, The</i> ,	《美利坚之旅》,	4, 81, 121, 162, 168,228, 231, 249, 250, 268, 293, 294,309 -11, 320, 322, 323, 341-42
American Legion,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	26, 273
<i>American Pageant, The</i>	《美利坚盛典》,	24, 25, 49, 84, 209, 247,249, 252, 265, 278, 281, 309, 320-21,325, 334; ~关于白黑种族关系, 144, 145, 186, 312, 325; ~关于环境问题, 293, 294,298-99; ~关于印第安人, 99-100, 104, 115,121;~关于约翰·布朗,174-75;~关于美国外交政策, 17, 26, 225, 227, 230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117, 148-49, 243; 印第安人与~, 118-19, 120-21
"Americans" (term),	"美国人"(术语),	123
<i>Americans, The</i> ,	《美国人》,	4, 5, 59, 162, 180, 222-23,249, 251-52, 264, 265, 275, 293, 322; ~关于黑白种族关系, 147-48,162, 167, 168, 200;~关于印第安人,94, 123
<i>American Tradition, The</i> ,	《美国的传统》,	22, 34, 174, 206, 280; ~关于黑白种族关系, 144, 171,200; ~关于环境问题, 286; 72, 80, 104, 119-20
<i>American Way, The</i> ,	《美国之路》,	39, 131, 196; ~关于白人和黑人的种族关系, 27, 158, 167, 196; ~中的错误,24, 34, 113, 114, 176; ~关于印第安人, 113, 128
Angelou, Maya,	玛雅·安吉洛,	135
anthropology,	人类学,	95, 286, 296-97
antiracism,	反种族主义,	另见:种族理想主义(racial idealism)
Apaches,	阿帕契族,	104, 106, 123-24
Arawaks,	阿拉瓦克人,	53-54, 55, 56, 57, 61, 65, 66, 67,68, 296, 313, 335, 345; 另见:海地(Haiti)
Arbenz, Jacobo,	哈科沃·阿本斯,	228, 232
archetypes,	模型,	25-26, 38, 53, 356; 美国例外论的~, 84, 213; 良性联邦政府的~, 235, 236, 239,240, 241, 242; 英雄的~, 24-25,203; 进步~, 142, 171, 282-87,284, 290; 重建~, 157; 野蛮印第安人~, 115, 116; 社会达尔文主义~, 216; 不进步的印第安人~, 128, 130, 131

续表

438

Arthur, Chester A.,	切斯特·A. 阿瑟,	12
Ashburn, P. M.,	P. M. 阿斯本,	80
Aspinwall, Thomas,	托马斯·阿斯平沃尔,	70
Attucks, Crispus,	阿塔克斯,	94, 126
Axtell, James,	詹姆斯·阿克斯特尔,	71, 93, 94, 361
Bailey, Thomas,	托马斯·贝利,	26, 93, 100, 325, 334; 另见:《美利坚盛典》
Baldwin, James,	詹姆斯·鲍德温,	1, 11
Barber, J. W.,	J. W. 巴伯,	80
Barzun, Jacques,	雅克·巴尔赞,	34
baseball,	棒球,	162, 167
Bay of Pigs invasion,	猪湾入侵,	230
Beals, Carleton,	卡勒顿·比尔斯,	124, 195
Beck, Warren,	沃伦·贝克,	135
Beringia,	白令,	96-97
Berkin, Carol,	卡罗尔·伯金,	326; 另见:《希望之地》
Beveridge, Albert J.,	阿尔伯特·J. 贝弗里奇,	280
Bigelow, Bill,	比尔·比奇洛,	53
bin Laden, Osama,	奥萨马·本·拉登,	265, 266, 271-73, 276
<i>Birth of a Nation</i> ,	《一个国家的诞生》,	21, 136, 165
birth practices,	分娩术	298, 417-18
Black, Hillel,	希勒尔·布莱克,	314
Black Hawk War,	“黑鹰之战”	第4章, 原注 86
black nationalists,	黑人民族主义者,	180, 184
Black Panther organization,	“黑豹”组织,	238
Blackwell, Elizabeth,	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	11, 12, 343
Bok, Sissela,	西塞拉·博克,	335
Bolivar, Simon,	西蒙·玻利瓦尔,	68, 150
Boone, Daniel,	丹尼尔·布恩,	108
Boorstin, Daniel J.,	丹尼尔·J. 布尔斯廷,	317-18; 另见:《合众国的历史》
Boston Tea Party,	波士顿倾茶事件,	111
Boyer, Paul,	保罗·博耶,	319-20
Braddock, Gen. Edward,	爱德华·布拉多克将军,	119-20
Bradford, William,	威廉·布莱德福德,	75, 79, 87, 89, 116
Brezina, Deborah L.,	黛博拉·L. 布雷齐纳,	215
Brown, John,	约翰·布朗,	146, 172, 173-93, 188, 193, 201-3, 334-35; 对~的看法的改变, 173-81, 203
<i>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i> ,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	237, 241
Bryan, William Jennings,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	7, 340, 342

续表

Burnham, Walter Dean,	瓦尔特·迪安·伯纳姆,	214
Burns, Ken,	肯·伯恩斯坦,	135
Bush, George H. W.,	乔治·H. W. 布什,	12, 60, 101, 206, 214, 227, 275, 278
Bush, George W.,	乔治·W. 布什,	136, 235, 257, 265, 270, 273-77, 291, 300
Butler, Smedley D.,	斯梅德利·D. 巴特勒,	225-26
Butterfield, Herbert,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301
Cahokia, Ill.,	克霍基亚,	74
California, and textbook adoptions,	加利福尼亚州, 和教科书的 采用,	308, 421
Canada,	加拿大,	123, 151, 192, 243
Canary Islands,	加那利群岛,	37, 38, 52, 54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63, 216, 287, 305
Carmichael, Stokely,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	238
"carpetbaggers,"	"掮包客",	198, 199-201
Castro, Fidel,	菲德尔·卡斯特罗,	227, 230-31, 351
Catlin, George,	乔治·凯特林,	78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中央情报局(中情局),	228, 231-33, 238, 243
<i>Challenge of Freedom, The,</i>	《自由的挑战》,	11, 47, 256; ~关于社会动员, 207, 212, 217; ~关于美国总统, 207, 212, 217;
Champlain, Samuel de,	塞缪尔·德·尚普兰,	77, 82
Chaney, James,	詹姆斯·钱尼,	238
Cheney, Dick,	迪克·切尼,	273, 274-75, 277
Cheney, Lynne,	林恩·切尼,	312, 314
Cherokees,	切罗基族,	65, 76, 128, 130, 131
"Chief Joseph" (Innuttooy- ahlatlat),	"约瑟夫酋长"(英穆图亚哈 拉特拉特),	130
Chile,	智利,	222, 227, 231
Choctaws,	乔克托族,	130
Christianity,	基督教,	34, 36-37, 61, 113, 177-79
civil rights legislation,	民权立法,	136, 238-40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权运动,	141, 162, 170, 179, 236-41, 260; ~的影 响, 关于课本, 137-38, 140, 141, 179- 80, 200-201
Civil War,	内战,	188-90, 192-97, 312, 333; ~中的黑人, 179, 189, 190, 194-95, 333; ~期间的外 交政策, 152, 155; ~中的印第安人, 119, 127; ~期间的政党政治, 155-56, 192-93; ~期间被视为核心问题的奴隶制, 137, 139-41; 学生对~一无所知, 5, 342; 另 见: 南部"联盟", 种族理想主义者
class distinctions,	阶级差别,	见: 社会阶级

续表

Cleveland, Grover,	格罗弗·克利夫兰,	165, 205	
Clinton, Bill,	比尔·克林顿,	210, 261, 268	
Clowers, Myles,	迈勒斯·科洛斯,	135	
Cobb, Jonathan,	乔纳森·柯布,	211	
cognitive dissonance,	认知失调,	62, 68, 124, 190, 263	
Columbian Exchange,	"哥伦布交换",	63-64, 80, 100, 324	
Columbu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30, 31-39, 42, 46-49, 262, 314, 344;?	
Columbus, Ferdinand,	斐迪南·哥伦布,	46, 61-62; ~在奴隶贸易中的作用, 58	
Columbus Day,	哥伦布节,	34, 43, 344	
Commager, Henry Steele,	亨利·斯蒂尔·康麦格,	137	
Confederacy,	"联盟",	127, 152, 190, 193-97	
Constitution,	宪法,	83, 110, 220, 233, 243	
Costo, Rupert,	鲁珀特·科斯托,	93	
Craig, Gordon,	戈登·克雷格,	125	
Crèvecoeur, Michel Guillaume Jean de,	米歇尔·克雷夫科尔,	107	
Crosby, Alfred,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	62, 77	439
Cuba,	古巴,	59, 66, 150, 152;?	
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帝国主义",	105-6	
Cushman, Robert,	罗伯特·卡西曼,	75, 76	
da Gama, Vasco	达伽马,	45, 46	
Darrow, Clarence,	克拉伦斯·德达罗,	340	
Davidson, James West,	詹姆斯·W. 戴维森,	41, 251, 315, 324, 325; 另见:《合众国: 美国的历史》	
Davis, Jefferson,	杰斐逊·戴维斯,	196	
de Alva, J. Klor,	J. 克洛尔·德·阿尔瓦,	72	
Debs, Eugene V.,	尤金·V. 德布斯,	15, 22, 24	
Decatur, Stephen,	斯蒂芬·德凯特,	235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109, 148, 183, 186	
DeLeon, Linda Ann,	琳达·安·德利翁,	72	
de Leon, Ponce,	庞塞·德莱昂,	104	
Delong, James F.,	詹姆斯·F. 德朗,	242	
Deloria, Vine, Jr.,	小瓦因·德洛里亚,	280, 355	
de Madariaga, Salvador,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	53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	209; 内战和重建时期的~155-57, 190-92, 197; 作为持白人优越论的政党, 21, 149, 153, 155-56	
Dermer, Capt. Thomas,	托马斯·德尔莫船长,	81, 87	
De Soto, Hernando,	赫尔南多·德·索托,	45-46, 77, 107	

续表

Diamond, Jared,	贾雷德·戴蒙德,	37
Díaz, Bernal,	贝纳尔·迪亚兹,	100
<i>Discovering American History,</i>	《发现美国历史》,	173, 352; ~比较好的覆盖面, 111,132, 190, 241, 251, 257; ~作为"探究型教科书", 132, 331
diseases,	疾病,	72-74, 91, 422; 另见:瘟疫(plagues)
Disney enterprises,	迪斯尼企业,	28, 189, 295
Dixon, Thomas,	托马斯·迪克松,	21
Dobyns, Henry,	亨利·杜宾斯,	77-78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16, 17
Donald, David,	大卫·唐纳德,	290
Dorris, Michael,	迈克尔·多瑞斯,	70, 90, 93
Douglas, Stephen A.,	斯蒂芬·A.道格拉斯,	153-54, 183
Douglass,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29, 174, 177, 184, 203,244
<i>Dred Scott decision,</i>	"德雷德·司各脱案"判决,	151, 167, 243
Du Bois, W. E. B.,	W.E.B. 杜博伊斯,	11, 135
Dulles, John Foster,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255
Dumbrell, John,	约翰·杜布莱尔,	257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	284, 285
Educational Research Analysts,	教育研究分析师,	215
Eisenhower, Dwight D.,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228, 229, 233
Eliade, Mircea,	米尔恰·伊利亚德,	88-89, 356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解放宣言》,	185
Engle, Shirley,	雪莉·恩格尔,	302-3, 327, 337
environmental movement,	环保运动,	241
environmental problems,	环境问题,	286-94, 298-99
epidemics,	传染病,	见瘟疫
Erasmus, William,	威廉·伊拉斯谟,	65
Escott, Paul,	保罗·伊斯科特,	193-94
ethnocentrism,	民族优越论,	88, 90, 297, 331
Europe, impact on, of conquests,	欧洲,对……的影响,对……的征服,	60-63
Evers, Medgar,	麦格·艾弗斯,	260
explorers before Columbus,	哥伦布之前的探险家,	33, 38
Fallows, James,	詹姆斯·法洛斯,	266, 276
Farb, Peter,	彼得·法布,	131, 296
Fausz, J. F.,	J. F.弗茨,	126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联邦调查局,	236-40, 243

续表

Ferro, Marc,	马克·费罗,	301, 303
Festinger, Leon,	利昂·费斯廷格,	62, 263
FitzGerald, Frances,	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	146, 162, 172, 215, 221-22, 254, 280
flat- earth fable,	地平说,	49-50, 327
Flournoy, Robert,	罗伯特·弗鲁努瓦,	199, 201
Foner, Eric,	埃里克·方纳,	263
foreign aid,	外交援助,	90, 221-22
foreign policy: realpolitik approach to,	外交政策: 对……的现实主义政治观,	221, 235; ~与奴隶制, 150-51; 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 15-19, 225, 226, 234; 二战后的~, 28, 221-24; 另见: 越战; 1812年战争
Forrest, Nathan Bedford,	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	195
Fort Pillow massacre,	“皮洛堡大屠杀”	195
Fourteenth Amendment,	《第十四条修正案》,	197, 236
France, Anatole,	阿纳托尔·弗朗斯,	355
Frank, Mitch,	米奇·弗兰克,	265-66
Franklin, 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108, 109, 111, 119
Freire, Paulo,	保罗·弗莱雷,	305
French and Indian War,	“法印战争”,	117, 118, 129
Frisch, Michael,	迈克尔·弗里奇,	24-25
Gabler, Mel,	梅尔·加布勒,	215, 242
Gabler, Norma,	诺玛·加布勒,	26
Gagnon, Paul,	保罗·加尼翁,	219, 231, 338
Garison, William Lloyd,	威廉·劳埃德·盖瑞森,	179
Garraty, John A.,	约翰·加勒蒂,	83, 324; 另见:《美国历史》
Geffert, Hannah,	汉娜·格费特,	176
Gettysburg Address,	“葛底斯堡演说”,	185-88
Giroux, Henry,	亨利·吉鲁,	305
Gleijesus, Piero,	皮耶罗·格雷耶稣士,	18
<i>Gone With the Wind</i> (novel and movie),	小说《飘》, 电影《乱世佳人》	135, 136, 144, 161, 332
Goodlad, John,	约翰·古德莱德,	328
Goodman, Andrew,	安德鲁·古德曼,	179-80, 238
“Good Neighbor Policy,”	“睦邻友好政策”,	17
Gorges, Ferdinando,	斐迪南·戈杰斯,	81, 87
Graff, Henry,	亨利·格拉夫,	34
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	“共和国大军”,	196
Grant, Ulysses S.,	尤利西斯·S.格兰特,	21
Greeley, Horace,	霍勒斯·格里利,	184-85; 林肯写给~的信, 184-85

续表

Griffen, William L.,	威廉·L.格里芬,	304-5
Griffith, David W.,	大卫·W.格里菲斯,	21; 另见:《一个国家的诞生》
Gross, Richard,	理查德·格罗斯,	326
Guatemala,	危地马拉,	222, 227, 228, 232
Haiti,	海地,	151, 225-26; 哥伦布和……, 36, 37, 46, 61-66, 63, 64, 293, 296, 344; 美国对……的外交政策, 18-19, 150, 155, 183-84, 225-26
Hakim, Joy,	乔伊·哈基姆,	252
Hampton, Fred,	福来德·汉普顿,	238
Hansberry, Lorraine,	洛兰·汉斯贝里,	11
Hansot, Elisabeth,	伊丽莎白·汉斯,	305
Haralson, Mrs. W. K.,	W. K. 哈拉森夫人,	343
Harding, Warren G.,	沃伦·哈定,	24, 165, 337
Harrison, 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哈里森,	122-23, 220
Heidegger, Martin,	马丁·海德格尔,	338-39
Heilbroner, Robert,	罗伯特·海尔布龙纳,	285, 289-90
Henry, Jules,	朱尔斯·亨利,	340, 353
Henry, Patrick,	帕特里克·亨利,	148-49, 392
Henry the Navigator, Prince,	“航海王”亨利亲王,	38, 65
heroification,	英雄化,	21-22, 26, 28, 155; 美国的……, 216; 哥伦布的……, 29, 31-32, 64, 69; ……的影响, 28-29; 海伦·凯勒的……, 12; 伍德罗·威尔逊的……, 21-22, 24
Highgate, Edmonia,	埃德蒙尼亚·海格特,	197-98, 201
<i>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i>	《合众国的历史》,	38, 50-51, 162-63, 167, 175, 181, 206, 210, 265, 267, 283-84, 316-19, 320, 321; ……有关黑白种族关系, 162-63; ……关于印第安人, 95, 96, 98-99, 107, 130; ……关于约翰·布朗, 175-76, 181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124-25, 339
Hobomok,	霍布莫克,	87, 88
Ho Chi Minh,	胡志明,	19, 203, 255
<i>Holt American Nation,</i>	《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	231, 249, 264-65, 281, 319-20, 321-23, 330; ……关于黑白种族关系, 145, 154, 200-201; ……关于印第安人, 94, 96
Homans, George,	乔治·霍曼斯,	43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261
Hoover, J. Edgar,	简·埃德加·胡佛,	236-37
Horowitz, David,	大卫·霍洛维茨,	115
Horse Capture, George P.,	乔治·P. 豪斯·开普切,	64
Horsman, Reginald,	雷金纳德·霍斯曼,	90

续表

- | | | |
|--|----------------------------------|--|
| Horton, James Oliver, | 詹姆斯·奥利弗·霍顿, | 142 |
| Howard, Gen. O. O., | O. O. 霍华德将军, | 159 |
| Howe, Julia Ward, | 茱莉亚·沃德·豪威, | 179 |
| Hussein, Saddam, | 萨达姆·侯赛因, | 265, 269, 273-74, 276 |
| immigrant groups, | 移民群体, | 170, 213 |
| Indian Historian Press, | 印第安史学家出版社, | 113 |
| Indians, | 印第安人, | xiii, 93-103, 105-6, 113-14, 120, 325 |
| Indian Territory, | “印第安人领地”, | 127 |
| Indian Wars, | 印第安战争, | 114-25, 131, 151-52 |
| inequality, | 不平等, | 217, 304; 经济……, 213; 性别……, 217, 326; 另见: 种族主义(racism); 社会阶级(social class) |
| Innuttooyahlatlat
("Chief Joseph"),
"inquiry" textbooks, | 英穆图亚哈拉特拉特("约瑟夫酋长"),
"探究型"教科书, | 130
220, 329, 330-31, 424; 另见:《美国的冒险历程》,《发现美国历史》 |
| <i>Interesting Events—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i> | 《美国历史上的有趣事件》, | 80-81 |
| Iran, | 伊朗, | 227, 232, 269-70 |
| Iran- Contra scandal, | “伊朗门事件”, | 235 |
| Iraq War, | 伊拉克战争, | 261, 264, 268, 270, 273-78, 351 |
| Ireland, | 爱尔兰, | 37, 40, 47 |
| Iroquois, | 易洛魁人, | 83, 101, 102, 111, 120 |
| Irving, Washington, | 华盛顿·欧文, | 30, 49 |
| Isabella, Queen, | 伊莎贝拉女王, | 32, 57 |
| Islam, | 伊斯兰教, | 34, 63 |
| Israel, | 以色列, | 270 |
| Ives, Charles, | 查尔斯·艾夫斯, | 220 |
| Jackson, Andrew, | 安德鲁·杰克逊, | 132, 151 |
| Jackson, Carolyn, | 卡洛琳·杰克逊, | 313 |
| Jackson, Helen Hunt, | 海伦·亨特·杰克逊, | 131, 220 |
| James, Frank, | 弗兰克·詹姆斯, | 91, 92 |
| Jamestown, | 詹姆斯敦, | 72, 84; 另见: 弗吉尼亚殖民地 |
| Jefferson, Thomas, | 托马斯·杰斐逊, | 108, 182, 282-83, 362; ……和印第安人, 108, 128; ……和奴隶制, 142, 145, 147-48, 149, 337 |
| Jenness, David, | 大卫·詹内斯, | 328 |
| Jennings, Francis, | 弗朗西斯·詹宁斯, | 70, 93 |
| Jett, Stephen, | 斯蒂芬·杰特, | 39 |
| Johnson, Andrew, | 安德鲁·约翰逊, | 136, 197, 210 |
| Johnson, Lyndon Baines, |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 212, 238, 240, 252, 351 |

续表

Kammen, Michael,	迈克尔·坎曼,	26, 324	
Kansas- Nebraska Act,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153, 173	
Karp, Walter,	瓦尔特·卡普,	18, 305	441
Käta, Ragnhild,	希尔德·卡塔,	27	
Keen, Benjamin,	本杰明·基恩,	57	
Keller, Helen,	海伦·凯勒,	12, 24, 26-27, 28, 29, 189, 204, 209, 303, 342-43; ……的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	
		13, 26-27, 229, 366	
Kelley, Brooks Matthew,	布鲁克斯·马瑟·凯利,	301, 320; 另见:《合众国的历史》	
Kennan, George,	乔治·凯南,	221, 235	
Kennedy, John F.,	约翰·F. 肯尼迪,	157, 222, 230-31, 254, 351; ……和民权运动, 236, 240; ……的谋杀, 230-31, 260, 407	
Kennedy, Robert F.,	罗伯特·F. 肯尼迪,	237, 260	
Kerry, John,	约翰·克里,	250-51, 252	
Kessler, Ronald,	罗纳德·凯斯勒,	232	
Kidder, Tracy,	特雷西·基德,	261	
King, Martin Luther, Jr.,	马丁·路德·金,	29, 237-39, 244, 252, 260	
“King Philip” (Metacomet),	“菲利普王”(梅塔科米特),	94, 110, 117	
King Philip’s War,	菲利普王战争,	117	
Kirst, Michael W.,	迈克尔·W. 克里斯蒂,	332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	226, 231, 233, 257	
Koning, Hans,	汉斯·科宁,	56	
Kozol, Jonathan,	乔纳森·科佐尔,	212, 305	
Ku Klux Klan,	“三K党”,	21, 165	
Kupperman, Karen,	卡伦·库柏曼,	77, 86, 124	
Kwitny, Jonathan,	乔纳森·奎特尼,	226, 229	
Land of Promise,	《希望之地》,	6, 34, 42, 207, 245, 281, 286, 338; ……关于黑白种族关系, 20, 24, 148; ……关于哥伦布, 48, 51; ……的版式, 11, 220; ……关于印第安人, 86-87; ……关于普利茅斯殖民地, 82-83, 86-87; ……关于社会阶级, 217; ……关于美国外交政策, 228-29	
Langer, William,	威廉·兰格,	72, 78	
Lapham, Lewis,	刘易斯·拉普罕,	228	
Las Casas, Bartolomé de,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31, 48, 55, 56, 58, 66, 68, 262, 342	
Lebanon,	黎巴嫩,	227, 228-30	
Leckie, Robert,	罗伯特·莱基,	232	
Levin, Henry M.,	亨利·M. 列文,	305	
Levin, N. Gordon, Jr.,	小N. 戈登·莱文,	28, 262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探险,	66, 77, 122	

续表

Libby, Jean,	吉恩·利比,	176
Library of Congress,	国会图书馆,	3
<i>Life and Liberty</i> ,	《生活与自由》,	45, 188, 215, 222, 231, 281; 关于黑白种族关系, 138; 关于印第安人, 105
Lincoln, 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90, 153, 182-89, 197, 201, 203, 204, 295; ……与奴隶制的憎恨, 172, 183-89, 202; ……有偏见地超越种族主义, 155, 182-84
Lincoln- Douglas debates,	林肯-道格拉斯辩论,	183
Liuzzo, Viola,	维奥拉·柳佐,	180
Lloyd, Mark,	马克·劳埃德,	337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61, 108
Loewen, James W.,	詹姆斯·W. 洛温,	1
<i>Loewen et al. v. Turnipseed et al.</i> ,	“洛温诉特尼浦西德案”,	9, 313
Logan, Rayford,	雷福德·洛根,	161
London, Herbert,	赫伯特·伦敦,	290
Longstreet, Gen. James,	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将军,	199
“Lost Colony,”	“失去的殖民地”,	127-28
Louisiana Purchase,	“路易斯安那购买”,	121-22
Lovelock, James,	詹姆斯·洛夫洛克,	291-92
Lumumba, Patrice,	帕特里斯·卢蒙巴,	227, 230
lynchings,	私刑,	162, 166-67
Lytle, Mark H.,	马克·H. 莱特尔,	41, 251, 315, 324, 325; 另见:《合众国: 共和国的历史》
McEvedy, Colin,	科林·麦克伊夫迪,	79
McNeil, Linda,	琳达·麦克尼尔,	328
McNeill, William H.,	威廉·H. 麦克尼尔,	78
McPherson, James,	詹姆斯·麦克弗森,	320
Maddox, Robert,	罗伯特·马多克斯,	17
Madison, James,	詹姆斯·麦迪逊,	108, 209
Malcolm X,	马尔科姆·X,	29, 203, 219, 241, 320
Manhattan Island, “purchase” of,	购买曼哈顿,	121
Marble, Samuel D.,	塞缪尔·D. 马布尔,	31, 45
Marciano, John,	约翰·马尔恰诺,	304-5
markers, historical,	历史标志,	357, 359
Marshall, John,	约翰·马歇尔,	65, 131-32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61, 63, 98, 304
Massasoit,	马萨索伊特,	76, 92
Mather, Increase,	英克里斯·马瑟,	76

续表

Mayflower Compact,	《五月花号公约》,	72, 83, 89	
medicine,	药,	63, 76, 112, 133, 298	
Metacomet ("King Philip"),	梅塔科米特("菲利普王"),	94, 110, 117	
Mexican War (1846-48),	墨西哥战争,	117, 119, 152	
Mexico,	墨西哥,	43, 44, 100, 151, 152, 226; ……和西班牙征服 64, 78, 103; 美国在……的部队, 17-18, 226; 另见:墨西哥战争	
Mexico City,	墨西哥城,	43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204; 另见:社会阶级	
minstrel shows,	巡回演出	136, 164, 179	
Mishan, E. J.,	E. J. 米山,	280, 284, 287, 300	
<i>Mississippi: Conflict and Change,</i>	《密西西比:冲突与变革》,	8, 169, 313	
<i>Mississippi Burning,</i>	《密西西比在燃烧》,	239-40	
mobility, social,	社会流动,	27, 162-63, 206-7, 213,217	
Mobutu, Joseph,	约瑟夫·蒙博托,	230	
Mohawk, John,	约翰·莫霍克,	110	
Montaigne,	蒙田,	61, 108	
Michel Eyquem de,			
Montesquieu, Baron,	孟德斯鸠,	61, 108, 143	
Mooney, James,	詹姆斯·穆尼,	78-79	
Moore, Amzie,	阿米奇·摩尔,	238	
Moore, Robert,	罗伯特·摩尔,	87	
More, Thomas,	托马斯·莫尔,	61, 108	
Morgan, L. H.,	L. H.摩尔根,	98	
Morison, Samuel Eliot,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	52, 137	
Mosby, John,	约翰·莫斯比,	196	442
Moses, Robert,	罗伯特·摩西,	238	
Mossadegh, Prime Minister,	首相摩萨德,	227	
movies,	电影,	12, 116, 165, 239, 247, 249, 360; 另见:《一个国家的诞生》;《乱世佳人》	
Moyers, Bill,	比尔·莫耶斯,	219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跨国公司,	222-25; ~和美国外交政策,222, 227-28	
Museum of the Confederacy,	“联盟博物馆”,	142-43,306-7	
museums,	博物馆,	2, 25, 142, 306-7	
Muslims,	穆斯林,	38, 228; 另见:伊斯兰教	
My Lai massacre,	梅莱屠杀,	246, 249	
Myrdal, Gunnar,	冈纳·缪达尔,	160-61	
nadir of race relations (1890-1920),	种族关系的低谷时期(1890-1920),	161-70, 196, 263	

续表

Nash, Gary,	加里·纳什,	107
Nast, Thomas,	托马斯·纳斯特,	162, 191, 192, 193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美国制造商协会,	215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	314
National Museum of Amer- ican History,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2
Native Americans,	土著美洲人,	见印第安人(Indian)
Nevins, Allan,	艾伦·尼文思,	326
Nicaragua,	尼加拉瓜,	16, 17, 29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	93
“Nigger Doodle Dandy,”	《黑鬼杜多》,	192
Nin, Anaïs,	阿娜伊斯·宁,	259
Nisbet, Robert,	罗伯特·尼斯贝特,	285
Nixon, Richard M.,	理查德·M. 尼克松,	231, 234, 252, 286, 300
Nkrumah, Kwame,	恩克鲁玛,	204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	311-12
Norse (Vikings),	挪威人,	36, 37, 40, 41-42, 77
Novick, Peter,	彼得·诺维克,	303
Ochoa, Anna,	安娜·奥乔亚,	302
Ohio War (1790-95),	俄亥俄战争,	115, 121, 124
O'Reilly, Kenneth,	肯尼斯·奥瑞利,	239
Page, Reba,	丽巴·佩奇,	208
Paget, Valerian,	瓦莱里安·佩克特,	89
Panama,	巴拿马,	16, 46
Parks, Rosa,	罗萨·帕克斯,	29, 203
Paxton, Tom,	汤姆·帕克斯顿,	219
Peace Corps,	“和平队”,	222, 223
Penn, William,	威廉·潘,	94
Pequot War (1636-37),	皮科特战争(1636-1637),	58, 116-17
Pessen, Edward,	爱德华·佩森,	209, 210
“Philip, King,” (Metacomet),	“菲利普王”(梅塔科米特),	94, 110, 117
Phillips, Wendell,	温德尔·菲利普斯,	203
Phoenicians (Afro-Phoeni- cians),	腓尼基人(非洲-腓尼基人),	40, 42-45
Pierce, Bessie,	贝西·皮尔斯,	88
Pitcaithley, D. T.,	D. T.皮特蔡斯利,	187
plague, bubonic,	鼠疫,	34

续表

plagues,	瘟疫,	37, 72-79; ……对土著人的灾难性影响, 37, 57, 74 -81, 127, 297, 324, 欧洲的 …… , 37, 72-73
Plains Indians,	大平原印第安人,	71, 101, 105, 124
<i>Plessy v. Ferguson</i> ,	“普莱西诉弗格森案”,	162, 165, 166
Plymouth colony: founding of,	普利茅斯殖民地: ……的建立,	36, 72, 81-83; 印第安人和~, 75, 76-77, 79-81, 85-87, 91-92, 107-8, 125-26
Pocahontas,	波卡洪塔斯人,	114, 127
population, Indian: catastrophic decline of,	人口, 印第安人: ……的灾难性锐减	57, 74-81;
Postman, Neil,	尼尔·波兹曼	355-56
power elite theory,	权力精英理论,	305-7
Profiles in Courage,	《勇者无惧》,	157
progress, archetype of,	进步模型,	142, 171, 172, 255-61, 284, 290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59
race riots,	种族骚乱,	165-66, 236, 335-36
racial idealism: in Civil War,	种族理想主义: 内战中的 ……	188-90, 192-93, 193, 194-96; 重建中的~, 197-98, 199, 200, 201; 另见: 废奴主义者 (abolitionists); 约翰·布朗 (Brown, John); 亚伯拉罕·林肯 (Lincoln, Abraham)
racism,	种族主义,	144, 148, 154-55, 173, 182-85; 共和党中的 …… , 21, 136, 149, 152-53, 155-56; 针对印第安人的 …… , 62, 116; 种族关系低谷时期 (1890-1920) 的 …… , 161-70; 人口文化中的 …… , 21, 62, 116, 136, 136-37, 144, 161, 163-64, 179, 332; …… 的根源, 143-44; 伍德罗·威尔逊的 …… ~, 16, 19-22, 24, 165-66; 另见: 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恐怖主义; 种族隔离 (segregation); 奴隶制 (slavery)
Ray, James Earl,	詹姆斯·厄尔·雷,	238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205, 206, 229
Reconstruction,	重建,	140, 144, 157, 197-202, 263, 295; 联邦政府对于~问题的遮掩, 157
Reeb, James,	詹姆斯·里伯,	180
religion,	宗教,	113-14, 177-79; 另见: 基督教; 伊斯兰教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	19, 136, 156, 190, 192, 193, 197, 198 - 200, 209
Revere, Paul,	保罗·里维尔,	24
Revolutionary War,	革命战争,	见“美国革命”
Rice v. Gong Lum,	“龚路诉赖斯案”,	165
Rise of the American Nation,	《美利坚民族的兴起》,	93-94
Roanoke Island,	罗亚诺克岛,	126
Robinson, Jackie,	杰基·罗宾逊,	163, 168
Rockefeller family,	洛克菲勒家族,	226
Rogers, Will,	威尔·罗杰斯,	204

续表

Roosevelt, Franklin D.,	富兰克林·D.罗斯福,	17, 255, 343	
Ross, Betsy,	贝琪·罗斯,	24, 25	
Ross, Dana Fuller,	德纳·富勒·罗斯,	2, 116	
Rousseau, Jean- Jacques,	卢梭,	61, 108	
Rugg, Harold,	哈罗德·拉格,	216	443
Rusk, Dean,	迪安·腊斯克,	226, 233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14; 美国对……的干涉, 16-17, 19, 26, 225, 234	
Ruzzo, Edward,	爱德华·鲁佐,	337	
Ryan, David,	大卫·赖安,	257	
Sale, Kirkpatrick,	柯克帕特里克·塞尔,	31, 48, 55, 57, 60	
Salk, Jonas,	乔纳斯·索尔克,	343	
Sand Creek massacre,	沙溪大屠杀,	115	
sasha,	“撒哈”,	259, 260, 261-62, 279	
“scalawags,”	“南赖子”,	199-200, 201	
Scheuer, Michael,	迈克尔·舒尔,	266	
Schlesinger, Arthur, Jr.,	小亚瑟·施勒辛格,	240, 303, 344	
Schwerner, Michael,	迈克尔·施沃纳,	180, 238	
Seattle, Chief,	西雅图酋长,	130	
segregation,	隔离,	19-22, 161-63, 184; 另见: 民权运动	
Seminoles,	西米诺尔人,	126, 151-52	
Sennett, Richard,	理查德·赛尼特,	211	
September 11, 2001, terrorist attacks of,	2001年“9·11”恐怖袭击,	235, 261, 264-67, 269-71, 276, 342	
Sequoyah,	希科雅,	99	
Seward, William H.,	威廉·H.西华德,	183	
Shanker, Albert,	阿尔伯特·尚卡尔,	328	
Sheridan, Gen. Philip,	菲利普·谢里丹将军,	114	
Sherman, Gen. William T.,	威廉·特库赛·谢尔曼将军,	195	
Simms, William Gilmore,	威廉·吉尔莫·西姆斯	124	
Simon, Julian,	朱利安·西蒙,	290, 291	
Simpson, Howard,	霍华德·辛普森,	70, 75	
Sizer, Theodore,	西奥多·赛泽,	208	
slavery,	奴隶制,	68, 90, 103-5, 136, 137-44, 152-53, 154;	
smallpox,	天花病毒,	74, 75, 76, 78; 另见: 瘟疫	
Smith, Capt. John,	约翰·史密斯船长,	60, 82	
social class,	社会阶级,	6, 14, 27, 204, 284, 304; 学生和~, 207-8, 210-11, 217, 345-54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216, 284, 286	

续表

social mobility,	社会流动,	27, 162-63, 206-7, 213,217
Soltow, Lee,	李·索尔托,	214
Soviet Union,	苏联,	16-17, 229; 另见:俄国革命
Spanish- American War,	美西战争,	117
Squanto,	斯宽托,	72, 74, 81, 85, 86-87, 107, 113
states' rights,	州权,	140-41, 194
Stephens, Alexander,	亚历山大·斯蒂芬,	193
strikes,	罢工,	205, 212-13
students,	学生,	307, 325-26, 334-39, 340-54;
Sutter, John,	约翰·萨特,	107
Swieres, George,	乔治·斯维尔斯,	244
syncretism,	融合,	102, 106, 111, 133
Taliban,	塔利班,	271-73
Tax, Sol,	索尔·塔克斯,	95
teachers,	教师,	45, 207-8, 307, 331-32, 340-41,356-60; 高校~, 2; ~创新, xvi,430-33; ~对课本的使用, xvi, 5, 12,327-32
technology,	技术,	35-36, 105, 286, 298
television,	电视,	2, 136-37, 306, 314
Teoli, Camella,	卡美拉·泰奥利,	212
Texas,	德克萨斯,	152; 在~的教科书改革,215, 284,308, 338, 361
textbook adoptions,	教科书改革,	8; ……的作者,315-24; ……与公民, xviii, 307,325 -26; 对……的限制, 27,28,215,284,307-15,327-39; ……间的转抄,7,313-14; ……不重视思想性,172-73,181-82,196,286; 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对……的批评,162,172,215,216,221 -22,254,280; ……缺少激情,5-6,342-43; ……市场,307-12; ……的乐观基调, 6,284,294-95,215,242; ……与二手文献, 7,302-3,307,325;……的规模,3-5
textbooks:	教科书,	
Thanksgiving,	感恩节,	70, 85, 88-90, 91, 344
Thernstrom, Stephan,	斯蒂芬·特恩斯特伦,	214
Thoreau, Henry David,	亨利·戴维·梭罗	172, 175
Tippecanoe, Battle of,	“蒂帕卡努河战役”,	123
Titanic,	“泰坦尼克号”,	210
Toppin, Martha,	玛莎·托平,	344
triracial societies ,	“三族社会”,	107-8, 126-27, 151
<i>Triumph of the American Nation,</i>	《美利坚民族的胜利》,	180, 230, 281,286; ~作为最畅销的教科书;313; ~关于黑白种族关系,22, 138, 146, 148,158, 159, 160, 162, 185, 189, 240; ~关于印第安人,94, 99, 104, 123; ~的未署名的作者, 315

续表

Tubman, Harriet,	哈丽特·塔布曼,	29, 177	
Turner, Frederick,	弗雷德克·特纳,	109, 113, 126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弗雷德克·杰克逊·特纳,	112, 259	
Turner, Nat,	纳特·特纳,	177-78	
Tyack, David,	大卫·提奥克,	305	
<i>Uncle Tom's Cabin</i> (novel and play),	《汤姆叔叔的小屋》(小说和剧本),	136, 164	444
unions,	工联,	205, 352	
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	“联盟之女联合会”,	196	
<i>United States, The - 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i>	《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	41,45, 251, 315; ~关于黑白关系, 138, 140, 190	
upper class,	上层阶级,	210, 216, 284, 304-8; 另见: 社会阶级	
USSR	苏联,	15, 229; 另见: 俄国革命	
Van Sertima, Ivan,	伊凡·范·塞蒂玛,	43, 45	
Vecsey, Christopher,	克里斯弗·韦切伊,	134	
Verrazano, Giovanni da,	乔万尼·达·维拉扎诺,	297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越战),	210, 234, 243, 244-58, 342, 345-52	
Vikings (Norse),	北欧海盗,	33, 36, 40, 41-42, 77	
Virginia colony,	弗吉尼亚殖民地,	60, 72, 82, 83, 107, 142	
von Wuthenau, Alexander,	亚历山大·冯·乌森瑙,	43	
Wabash River, Battle of,	沃巴什河战役,	115	
Walker, David,	戴维·沃克,	151-52	
Walker, Francis A.,	弗朗西斯·A. 沃克,	124	
Wallace, Michael,	迈克尔·华莱士,	64, 361	
Wampanoags,	万帕诺亚格人,	76, 91, 92, 117, 126	
War of 1812,	1812年战争,	117, 121, 122-23, 124, 151, 245, 255; 印第安人和~, 119-20, 121, 122-23, 151	
<i>War of the Worlds,</i>	《星际大战》,	54, 55	
Washington, Booker T.,	布克·T.华盛顿,	167	
Washington, George,	乔治·华盛顿,	76, 90; ~和印第安人, 124; ~和奴隶制, 142, 146, 148, 337	
Watergate,	“水门事件”,	234	
<i>We Americans,</i>	《我们美国人》,	252	
Weatherford, Jack,	杰克·魏泽福,	63	
Weingartner, Charles,	查尔斯·魏因加特纳,	355-56	
Welles, Gideon,	吉迪恩·韦尔斯,	202	
Wells, H. G.,	H. G. 威尔斯,	54	
Westmoreland, William,	威廉·威斯特摩兰,	244	
Whig Party,	辉格党,	134, 136	

续表

white supremacy,	白人优越论,	见种族主义
Wilder, Laura Ingalls,	罗兰·英格斯·怀尔德,	114
Williams, Roger,	罗杰·威廉姆斯,	131
Williamson, John,	约翰·威廉姆逊,	333
Willie, Charles V.,	查尔斯 V. 威利,	11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12, 15, 26 — 27, 208, 220, 236, 243, 255, 262; …… 的 军事干涉, 15-19, 225, 226, 234; …… 对 不同政见者的迫害, 14, 22, 24; …… 的种 族主义, 16, 19-22, 24, 165-166
Winthrop, John,	约翰·温思罗普,	76
women's history, omission of,	对妇女史的忽视,	344, 356, 363, 429-30
women's movement,	妇女运动,	6, 203, 279
women's suffrage,	妇女选举权,	13, 15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211, 352; 另见: 社会阶级
World Wide Web,	互联网,	3-4
Wounded Knee,	翁迪德尼	115, 118
Wright, Frank Lloyd,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12, 220
Zaire,	扎伊尔,	227, 230
Zajac, Chris,	克丽丝·扎雅克,	261
zamani,	“扎马尼”,	259, 260, 261-62, 279

| 图片索引 |

(本书图片标题大多为译者所加)

第一章

- 图 1 为无声者呐喊
- 图 2 关于威尔逊总统
- 图 3 间谍与谎言:CPI 在《星期六之夜邮报》上的公告
- 图 4 乔治·华盛顿像

第二章

- 图 1 巨石头像
- 图 2 这个人是谁?
- 图 3 “没有投资,大地将仍是平的。”
- 图 4 航海图
- 图 5 《哥伦布登上巴哈马群岛》
- 图 6 狄百瑞的木刻画
- 图 7 骡子与酋长

第三章

- 图 1 阿兹特克人的绘画
- 图 2 塞缪尔·德·尚普兰的航海图
- 图 3 斯宽托六次穿越大西洋

第四章

- 图 1 威廉·潘
- 图 2 悬赏通缉
- 图 3 1500 年前后的印第安人生活
- 图 4 释放白奴
- 图 5 鹰箭图案
- 图 6 “基卡普医生”

图 7 发生在威尔克斯-巴里的印第安人杀人事件

图 8 领地图

图 9 领地图

图 10 关于布拉多克将军(两幅)

图 11 印第安人

图 12 约瑟夫·万的豪宅

图 13 “我舞我神”

第五章

图 1 孟菲斯骚乱

图 2 《牢固的南方》

图 3 《不是这个男人吗？》

图 4 种族骚乱

图 5 只招白人

图 6 私刑

第六章

图 1 约翰·布朗的两幅肖像

图 2 林肯的木屋

图 3 军舰上的士兵

图 4 芝加哥论坛

图 5 捕奴者及其猎狗

图 6 “公共自由与个人权利”

图 7 “摘包容”

图 8 哀悼林肯

第七章

图 1 “血汗工厂”

图 2 “美乐：品质生活”

第八章

图 1 和平队

图 2 自由

第九章

- 图 1 自焚抗议
- 图 2 燃烧弹下的“裸奔”
- 图 3 枪杀越共
- 图 4 越战图片(两幅)
- 图 5 约翰逊视察金兰湾
- 图 6 关于越战的两段论述

第十章

- 图 1 瓦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
- 图 2 每日平均伤亡表

第十一章

- 图 1 《帝国大业踏上西进征途》
- 图 2 “探险童子军”徽章
- 图 3 我家砍的树最多

第十二章

- 图 1 《我们生活中的问题》
- 图 2 两段雷同的文字(一)
- 图 3 两段雷同的文字(二)

第十三章

- 图 1 “越南试验”(表一)
- 图 2 “越南试验”(表二)
- 图 3 “越南试验”(表三)

结束语

- 图 1 联邦军队路过石泉

译后记

这是一本讲述美国历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畅销书。中译本的读者在惊诧“美国竟也会如此”之余，难免会“对号入座”。对此，我的体会是：问题人人都有，所不同的，一是程度的轻重，二是问题能不能被提出、被批评、被改进。

在网络时代，作者詹姆斯·洛温的身份背景不需要我过多描述了，本书中的作者简介已做了基本介绍。在翻译过程中，我随时就本书的内容及翻译问题向作者发电子邮件讨教、求助。作者及时、耐心的答复不仅激励我努力把书译好，更让我感受到这位“惊世骇俗者”(horrifying,《丹佛邮报》书评)敦厚、细腻的一面。

中央编译出版社和青豆书坊苏元女士独具慧眼，策划和出版了本书；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推荐我翻译此书，并校阅了全部译稿；李剑鸣等国内外学者帮助我解决了一些术语的翻译问题。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译者不揣孤陋做了一些注释(页下注)，但愿它们是对读者的帮助而不是干扰。大多数图片标题及全书的图片目录系译者所加。凡翻译之误当由译者而不由上述各位负责。欢迎读者来信批评，我的电子邮箱：mwlhot@163.com。

作为一名中国大学历史教师，我对本书所揭示的某些美国历史教学问题感同身受。作者曾经告诉我，他期待看到一本《老师的谎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我期待本书能引起国内历史学界及教育界、思想界更进一步的思考。

马万利

2009年5月19日

于南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老师的谎言 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作者=(美)洛温著;马万利译

页数=430

SS号=12422115

出版社=北京市:中央翻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2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被历史致残：英雄的塑造过程

第二章 1493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真正意义

第三章 感恩节的真实来历

第四章 红眼人

第五章 《飘》：美国历史教科书隐瞒种族主义

第六章 约翰·布朗和亚伯拉罕·林肯：美国历史教科书隐瞒反种族主义

第七章 机遇之地

第八章 看看"老大哥"：教科书是这样讲联邦政府的

第九章 不见罪恶：教科书选择不讲越南战争

第十章 探索记忆之洞：消失了的近期历史

第十一章 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

第十二章 历史为什么要这样教？

第十三章 这样教历史的后果是什么？

结束语：未来的谎言--兼论我们该如何应对

附录

索引

图片索引

译后记